

B97
D58

丁光训文集

版权归作者所有

天主教在线
www.ccccn.org



A0933253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丁光训文集／丁光训著．—南京：译林出版社，1998.9
(1999.6 重印)

ISBN 7-80567-833-2

I . 丁… II . 丁… III . 丁光训-文集 IV . C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1999) 第 18290 号

书 名 丁光训文集
作 者 丁光训
责任编辑 孙 峰
出版发行 译林出版社(南京中央路 165 号)
E - m a i l yilin@public1.ppt.js.cn
W W W <http://cb.nj-online.nj.js.cn/Yilin>
照 排 译林出版社照排中心
印 刷 淮阴新华印刷厂(地址:淮海北路 44 号)
开 本 850×1168 毫米 1/32
印 张 16.5
插 页 4
字 数 383 千
版 次 1998 年 9 月第 1 版 2000 年 6 月第 3 次印刷
印 数 8001—16000 册
书 号 ISBN 7-80567-833-2/1·492
定 价 (平装本)22.00 元
译林版图书若有印装错误可向承印厂调换

前 言

在这本大家期待已久的《丁光训文集》付梓以前，我能拜读文集的全部文章，感到万分欣喜和荣幸。我认识丁主教，可追溯到抗日战争时期的一九三九年。那时他已从上海圣约翰大学毕业，在上海基督教青年会任学生部干事，主管宗教工作。我正在沪江大学念书，暑期被派到青年会实习，他是我的导师。他既积极工作，又勤奋好学，既雍容文雅，又热情和蔼，给我留下很深刻的印象。后来我到金陵神学院读书，他已从圣约翰大学神学院获得神学硕士学位，担任中华圣公会上海救主堂和国际礼拜堂牧师，时常到金陵神学院图书馆看书借书，我常到国际礼拜堂听他讲道。那时祖国大半河山已陷于日寇铁蹄之下，上海是个孤岛。在那种艰难险恶的环境中，他一面热心牧养信徒，一面又在青年学生中积极开展工作，同时还认真研究神学。他是吴耀宗、刘良模、邓裕志等先生领导的基督教进步力量的一部分。我体会他讲论基督教神学，不是逃避现实，把神学当作象牙之塔，遁世独善其身，而是探索如何把基督教的信仰和教训，与爱国救亡、改造社会结合起来，正如他后来当神学院院长时曾多次谆谆对神学生讲的“谈神学不应该脱离政治，有时神学是精细的政治”的教导。

抗战胜利后，他被聘到加拿大基督教学生运动总会任干事，和一些西方基督教的进步人士交朋友（见《纪念爱克尔斯顿牧

师》，《〈基督教传教运动和上帝的审判〉再版前言》和《纪念贾文逊牧师》)。后来他到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和纽约协和神学院研究神学，更深刻地体会到神学作为一种意识形态和世界观，可以为进步的或反动的政治服务。一九四八年至一九五一年他在瑞士日内瓦世界基督教学生同盟任干事。这个组织中有一些思想进步、同情中国革命的同事。当时正值中国解放、中国基督教面临走向爱国进步还是坚持反动落后两条路线生死抉择的关头。西方基督教许多头面人物带着反苏反共的政治成见，对新中国横加诬蔑。丁主教不顾某些朋友的善意劝告，毅然决然带着夫人郭秀梅女士和儿子回到上海，投入基督教反帝爱国运动，担任上海广学会总干事。

一九五一年，中国基督教三自爱国运动深入开展，华东十二所神学院合并，在南京成立金陵协和神学院，丁主教任院长，直到现在。四十多年来我有幸和他共事，在他的指导下学习了许多有益的功课，尤其是学习了在复杂的社会环境中，在社会主义的新中国，如何从事教会活动、神学研究和教育工作。数十年来他是中国基督教的主要领导人（一九八〇年至一九九七年任中国基督教三自爱国运动委员会主席和中国基督教协会会长，一九九七年一月退休，现在是名誉主席和名誉会长），实实在在地起了带头人的作用。从一九七九年至今，他担任南京大学副校长和南京大学宗教研究所所长。他是第五、六届江苏省政协副主席，第七、八届全国政协副主席。在近半个世纪繁忙紧张的教会活动、学术研究、教学工作以及政治社会活动中，他写过许多重要的文章，有一些已经发表（如收在《金陵神学文选》的八篇，其中有几篇再入本书），也有许多已遗失了。这本文集的八十多篇文章，是经他自己选编的。除五六篇属于较早的以外，其余文章都是

“文革”以后的作品，大部分是第一次发表。

丁主教还用英文写过许多文章，一部分已译成中文收在本集里。也有用英文在国外发表的，见加拿大白理明编《不再是外人》(No Longer Strangers: Selected Writings of Bishop K. H. Ting, Raymond Whitehead ed. Maryknoll, NY, Orbis Books, 1989),和英文版《中国神学志》第10期(Chinese Theological Review Vol. 10, Janice Wickeri ed. FTESEA, Holland, MI, USA, 1995,这是为庆祝丁主教八十寿辰编印的,内中还收集了许多海内外老朋友写的纪念文章)。丁主教是世界基督教界的知名人士,被公认为是当代中国基督教的主要发言人和神学家。在欧洲、北美和亚洲有九所大学和神学院颁予他神学博士和哲学博士学位,他的母校纽约协和神学院赠予他协和奖章。这本文集是以中国基督教界和知识界为主要读者而选编的。承魏恺贞女士(Janice Wickeri)全部译成英文,英文本同时由译林出版社出版。

按文章的内容和体裁,全书可分为下列几个部分:(1)出访国外讲演,(2)神学讲述,(3)三自和办好教会,(4)宗教政策和宗教研究,(5)怀念、祝愿及其他。

从一九七八年十二月中国共产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党和政府总结了党在宗教问题上的正反两个方面的历史经验,阐明了党的基本观点和基本政策,纠正了“文化大革命”的错误。在一九八二年进行宪法修订时,丁主教作为全国人大宪法修改委员会委员,参与了这部宪法修改的全部过程。这本文选中有三篇,丁主教对党的统战政策和宗教政策做了自己的阐述和说明。在宗教研究方面,也有必要拨乱反正,排除极左思潮的干扰。直到八十年代中期,我国学术界中还曾有过所谓“第三次鸦片战争”的争论。有些人以本本主义和教条主义的思想方法出发,坚持认为“宗教就是

鸦片”。丁主教积极参加了这场辩论,在许多场合用科学的、历史的、实事求是的态度,反对以鸦片作为宗教的定义,对“宗教是人民的鸦片”做出恰如其分的理解和评论,并强调宗教有其道德伦理内容,可以和社会主义相协调的见解。这里收集的两篇长文《近几年宗教研究上的若干突破》(与汪维藩合著,1989)和《〈中国社会主义时期的宗教问题〉介绍》(1988),对这场辩论做了介绍。从此以后,宗教界和学术界之间有了较多的共同语言。我们很高兴地看到今天中国在宗教研究方面已打破过去的禁区,取得了丰硕、可喜的成果。

近二十年来,丁主教以大部分时间和精力,投入中国基督教教会建设的工作。如何坚持三自爱国的正确方向,巩固和发展三自的成果,把三自爱国的工作热情落实到把中国教会办好,从“三自”(自治、自养、自传)进入“三好”(治好、养好、传好),便成为这时期的工作中心。随着宗教政策在全国进一步贯彻落实,中国教会发展很快,信徒人数和教会组织迅速增加。对信徒的牧养和教育工作跟不上发展的形势,许多地方的教会出现不少问题和困难。这其中既有部分地方干部对宗教政策的理解和落实上的问题,同时,教会内部对如何扩大团结面、把教会办好,在认识上和实践上也存在一些问题。这时中国基督教已处于“宗派已过”阶段,从一九八〇年开始成立了中国基督教协会,与一九五四年成立的中国基督教三自爱国运动委员会并称“两会”,作为中国基督教全国性的爱国组织,在思想上、组织上和教务活动上起着指导作用。丁院长以深邃的远见和宽广的胸怀提出了按三自原则(在教义、礼仪、教政上)互相尊重、扩大团结面、理顺关系、办好教会等重要主张。对全国游离于三自组织之外的教会群体,提倡凭爱心、服务、理解,以争取更大的团结。从文集中关于这方面的十篇文章可以看出他的豁

达胸怀和良苦用心。

丁主教多次率领我国教会代表团出国访问,介绍中国教会的真实情况,宣传中国的宗教政策,并发表多篇极有创见和深度的神学演讲,对促进互相了解、建立友谊、提高中国教会的世界声誉做出了巨大的贡献。这方面的许多文章现在用中文发表,对国内的读者将有极大的启发,有深远的意义。

这本文集在内容和篇幅上有一半上都涉及基督教神学。丁主教一贯很重视自传和神学研究。“神学是教会在思考。”不思考的教会是僵死的、教条式的,是捆绑灵魂的牢笼。“不讲神学的宗教,是低级和原始的;不思考问题的宗教,一定是同理性格格不入的。”丁主教所提倡的神学思考是如何把基督教的信仰和生活的现实结合起来,成为既合乎理性又具有超越能力的理论。它既不是经院式的玄而又玄的臆想,也不是被关在书斋里的“专业神学家”所垄断的。他在一篇文章中讲到五十年代初中国基督教里的“神学群众运动”,那时由教会信徒群众自发提出的许多神学思考,至今仍有很重要的现实意义。

丁主教多次提到基督教的普世性和地方性(特殊性)的相互关系。他主张中国教会应该有自己的神学。在现阶段“我们的神学工作理所当然地受到历史的、普世的教会的制约,但它不是模仿,它是中国基督徒针对中国教会自己的问题的思考”。我们现在还来不及构建和提出比较系统、全面的神学理论。我们是从我们现实的处境出发,试图把基督教信仰和中国传统文化以及民族特点结合起来。今天中国社会正处于改革开放的急剧变化过程中。我们搞的“处境化神学”不可能过早提出系统化的要求,不然,必将陷入抄袭或模仿西方传统神学的老路。几十年来,中国基督教的确从研读《圣经》和信仰实践中看到不少“新亮光”,进行了神学思

考。在这本文集的许多文章中，丁主教就一些带根本性的神学问题提出很宝贵的具有创造性、突破性的观点，也有选择地参考和吸收某些西方现代神学的理论，加以发挥，为我所用。这些都可作为今后搞中国神学的指导。例如：在《圣经》观上（见《中国基督徒怎样看待〈圣经〉》），借鉴西方近代《圣经》研究的成果，避开烦琐学究式的争论和断章取义教条式的“圣经主义”，针对中国广大信徒热爱《圣经》、尊重《圣经》权威的特点，令人信服地为一系列神学论点铺垫了“圣经基础”。在上帝观上（见《上帝是爱》和《一个中国基督徒的上帝观》等），提出上帝最本质的属性是爱，把“威严、全知、全能、公义”等作为从属于创造万有、包容一切的爱的“派生属性”，拨散形而上学的迷雾，避开西方传统神学逻辑上的矛盾，显得富有亲切的人情味和温情感，为人们所容易理解和接受。在基督论上，提出“宇宙的基督”，作为“上帝是爱”的延伸，吸收怀特海的“过程哲学”和德日进的广义进化论思想，把宇宙的创造、维护、救赎、圣化到终极的完成，都作为上帝藉着基督工作的全过程；让开一千多年来围绕着“迦西敦公式”关于基督的“完全神性和完全人性”的微妙争论，纠正传统基督论只谈救赎的片面性和狭隘性。在神学研究的取向上，历来就存在着“以创造为中心”和“以救赎为中心”的两条路线。前者比较开放，能容纳较多新思想，适应社会变迁；后者常容易导致狭隘的排他主义。丁主教在《创造和救赎》一文中对这个问题做了很好的处理，对当前中国教会存在的重救赎而轻创造的倾向起到了提醒和纠偏的作用。在人性论上，丁主教同情中国文化中“人性本善”的思想，提出“人是按上帝的形象造的”，是“上帝创造的半成品”，是“参与上帝创造的同工”的理论，既指出救赎的必要，又强调人的道德责任和发展的可能。

所有这些,由于发表的场合和篇幅的限制,未曾充分详细发挥,但可以把这些作为构成神学体系的“轨迹”(loci theologici)。如果把这些轨迹联系充实起来,不难看出一个新的中国神学体系的框架。丁主教以极有说服力而又通俗易懂的言辞,作了精辟的阐述,比用艰深的神学语言更能打动人心。此外,他还在许多文章中,就如何看待基督教外面的一切真善美、如何看待无神论者,就“信与不信不能同负一轭”这些困扰着许多信徒的问题,作出回答。他还在各种场合介绍当前国际神学界的一些热门问题,如普世教会合一运动、国际和平和社会正义、解放神学、妇女神学、生态神学等,都起到开阔神学生视野、活跃神学思考的作用,向中国教会的神学建设提出挑战,指明了前进的方向。本书的出版,是中国神学史上的一个重要里程碑,应该作为中国神学生的必读课本。

近十几年来,中国知识界对宗教研究和神学研究比以前任何时候都思想开放得多。许多教外朋友们对基督教表示理解和同情,并做出很大的贡献,如翻译和著作出版了很多高质量的基督教神学方面的书。相形之下,教会里搞神学研究的,和教堂里的讲道,却显得落后和保守,使许多知识分子不愿意接触或参加教会。丁主教曾提出“文化基督徒”的说法,虽然在教内和教外对此还有不同的理解和评论,但这总是一种积极欢迎的表示。从教会内部说,如何积极提高自己,解放思想,争取和广大知识分子有更多的共同语言,促进对话,是关系到基督教在中国能否打破划地为牢的“次文化”禁区、和全国人民共同前进的关键。希望这本书的出版,也能引起广大知识分子的关注,帮助他们对中国基督教有进一步的理解。

承丁主教谬爱,囑为本书写前言,谨就我所想到的,提供一点

背景说明,希望对阅读本书有所帮助。错误之处,在所难免,由我自己负责。敬谢广大读者。

陈泽民

1998年1月于金陵

注:陈泽民先生为金陵协和神学院副院长,神学教授,神学博士。

谈人类的饥饿和贫困问题

(一九七九年十一月四日在加拿大多伦多伊顿堂的演讲)

我很感谢,能和大家会面。特别令我高兴的是,这儿就是差派文幼章到中国去工作的教堂。他所给予基督教的形象在相当程度上能为中国人所理解。今天在中国,革命对于基督教来说已经不再陌生,而基督教对于中国革命来说也已经不再陌生,我们要感谢这位传教士,他对中国革命和中国基督教的发展和两者的沟通都作出了贡献。

首先让我们一起来思考记载在《路加福音》第9章第12至17节那里的基督给五千人吃饱这段优美的故事,我愿意提出几点与大家分享。

首先一点,在门徒看来,耶稣的工作就是传讲天国的道,至于解决人们吃饭的问题,那不是他们的事,也不是耶稣的事。他们说,叫众人散开,让他们各自去找吃的。但耶稣却对他们说,“你们给他们吃吧。”门徒所主张的,实际上就是各人自顾自,各人自扫门前雪。这个原则如果实行起来,正如在旧中国和其他地方所实行的那样,其结果将不可避免地是强者治人,弱者治于人的弱肉强食的局面,最后必然是十足的资本主义。经济学家约翰·梅纳德·凯恩斯曾给资本主义下过这样的定义:“它是一种奇特的信念,认为最糟糕的人出于最糟糕的动机,将自然而然地成全人类大家的利益。”但我们知道事情并不是这样。

其次,为了让门徒给众人吃,基督吩咐他们让众人分成五十人

一组,要他们一组一组坐下,免得四处乱跑。这话既是基督说的,我想人们总不至于给他扣上侵犯人权和剥夺个人自由的帽子吧。这是对个人自由和人权的一点必要的限制。从中国的经验看,我们知道这是必不可少的。

第三,让我们注意,基督拿着饼望天祝福、掰开、递给门徒送到众人面前。我猜想,当时,对于耶稣基督是谁,人们一定有各种不同的观点,意见纷纭。但基督对于一切观点都很尊重。他关心的是整个人群,是全人类,不单是人群中承认他为主的人。我们要明白,神是那么伟大,如果以为他只疼爱 and 关心那些称颂他的名的人,那不符合他的本性。我想,有的人由于某种原因,不但不能称颂他的名,而且还否认他的存在,对这情况他并没有十分介意。

第四,虽然那次不是筵席,但并没有不够。每个人都吃饱了,没有人挨饿。做父母的用不着担忧他们的孩子那天晚上不得不饿着肚子去睡觉。“解放”这个词就含有这样的一个重要意思。当我说中国是一个解放了的国家时,我心里就想到类似这样的事实:就是由于作出某些计划和进行某些组织工作,我们能够只用地球七分之一的可耕地生产出来的粮食,给世界四分之一的人口吃饱。这虽然不像基督当年所行的那样的神迹,但它确是我们要为之感谢上帝的一种成就。

第五,我们可以注意到,剩下的食物装满了十二篮子。《圣经》上没有说这十二篮食品后来怎样。它们到哪里去了?是扔掉做垃圾去了吗?是留在那里让野兽夜间来吞吃了吗?还是卖给了某个出高价的人囤积起来,等粮食紧张,市价升涨,然后再卖出去,致使富者愈富贫者愈贫?《圣经》在剩余食物的处理问题上完全沉默,这推动我们去思考。是的,基督的信息,一般是通过《圣经》所讲了的来启发我们;但,有时候,也通过《圣经》略过不讲的来启发我们。

这里有一条读经指导原则：有时，要在《圣经》的无声处聆听那细小微弱之音。能否设想，《路加福音》偏偏在这点上保持沉默，是为了让圣灵推动我们去思考：只是一次喂饱五千人并没有真正解决问题，十二篮子食物怎么足以解除世上五千人、五万人、五十万以至五千万人每天的饥馑呢？因此，《圣经》在这里沉默无言，正是用象征向我们表明，还有未完成任务。它启发我们，单靠慈善救济是无济于事的。不管我们好心的慈善家怎样努力，也远远跟不上世界产生贫困和饥饿的速度。传统伦理只注意看人，只注意街头忍饥挨饿的男男女女、讨饭的乞丐和小偷盗匪；但十二篮剩余食物的奥秘却驱使我们去研究社会秩序本身。

我们的大地能生产足够的粮食以满足大家的需要，但它不能生产足够多的粮食去满足人们的贪欲。我们怎样才能使机会比较均等，使财富分配比较公平合理呢？这就是这个福音书故事向我们提出的问题。今天世界上许多国家和地区正在进行实验，力图解决这个问题，对这类实验，我们基督徒不应蔑视，应善意关切。

当我还是小学生住在上海的时候，我略知当时少数富人是怎样生活的，而在相隔不远的扬州，却是那样贫穷，以至每当发生灾荒，常有男男女女衣衫褴褛，成群结队，赤脚徒步来到上海寻求生路。他们那样瘦骨嶙峋毫无生气的样子，使我感到害怕。他们并不奢望得到工资，只要能糊口活下去，他们就肯卖力。尽管如此，很多人还是找不到工作，吃不上饭，沦为乞丐。其中有些因饥寒交迫，死于街头。女孩子被卖为娼。男孩若能当上理发学徒，几年后成为理发匠，那就算为至幸者。这些都是受践踏者，是当时我国人民的多数。

几年前我有机会访问扬州。那里不再有地主向农民重租勒索盘剥。现在有了水利灌溉。人们已经迁出土屋，住进了砖瓦房。

青少年从幼儿园学习到大学,或在工厂、农场劳动。许多女工脚登皮鞋,腕带手表。其中有些身穿毛料裤、涤纶衫,口袋里插着一两支笔。不少人还骑上了自行车。这些东西在你们看来也许不足为奇,但对他们来说,变化确实巨大。听着他们的欢笑声,我几乎要流泪,因为我想起了他们的祖辈所受的苦难熬煎。我真想把我目睹过的那一切告诉这些年轻人,叫他们不至忘掉过去。

中国不是天堂。它有缺陷、错误和过头的地方。但是,财富的分配确实比从前公平得多,各种机会也确实比从前较为均等。地主现在也已经成为劳动者。中国的这一切都是由一次伟大的社会改革所带来,那就是,生产资料已经从少数人手里转到广大人民手里。所有制改变了,我们把这称作解放。这是“解放”这个词所代表的真正涵义。我们的人民不是失去了自由,而是获得了它。我们现在还穷,不能让自己享受更多的自由。我们现在正在通过组织起来的力量,加强自由生活的物质基础,为自己和为后代赢得更多的自由。

我认为基督徒理应关心物质分配的问题。基督复活后,有两个门徒前往以马忤斯。路上,基督与他们同行。你们记得,他们认出基督,不是在基督向他们讲解经文、他们心里火热的时候,也不是他坐下来要和他们同吃的时候。他们认出基督,是在他拿起了饼、祝谢、掰开、分给他们的时候。在分的时候,他们的眼睛明亮了,这才认出他是基督。因此,粮食的分配问题确实包含着圣礼的本原意义。难道我们不能这样说吗:怎样分配财富和机会,也就是怎样组织社会,这确实同耶稣基督向人们所作的显现有密切关系。

我们知道,耶稣基督到世上来向我们所显现的神,是一位既慈爱又全能的神。如果人们真正严肃认真地对待自己的上帝观,他们就会发现,要洞悉这样一位上帝并不是轻而易举的事。人们从

自己日常体验的不公正、被剥夺、受痛苦、生活死气沉沉、索然无味的种种经历出发,比较容易认为神虽慈爱,但不全能;或神虽全能,但不慈爱;或神既不慈爱,也不全能。但是我们却坚持,尽管周围充满邪恶,神还是既慈爱又全能的。要人们接受这样一位神是个很高的要求,所以人们想放弃这样的基督教上帝观。他们感到“上帝已死”这个说法倒较有吸引力。“上帝已死”作为一种神学论调只不过是昙花一现,但“上帝已死”作为实际生活中的一种世界观,却正在广为传播。一位名叫理查·L. 鲁宾斯坦的犹太拉比说过:“我说,我们生活在‘上帝已死’的时代,我的意思是:联系着神与人、天与地的线断了。我们站在一个冷酷、寂静、无情的宇宙之中。除我们自己的才智外,再没有任何有目的的力量可以来相助。在发生奥斯威辛集中营的罪行之后,一个犹太人关于上帝还能说些别的什么呢?”这里,我们看到,社会、经济和政治上赤裸裸的不公正是怎样吞噬着我们关于神既全能又慈爱的信念。只有建设一个较为健全的社会制度,实行财富更加公平合理的分配,以及随之而来的繁荣、和平、欢乐与进步,才能使人看到,我们基督教相信神是全能的父这种上帝观是有道理的;也只有这时,人们才能找到应当感谢这位神的理由。因此,我们中国基督徒认为,绝对不能忽视分配问题所具有的十分重要的广阔的灵性意义。是的,流经扬州水利灌溉系统的水固然是冷的,但我喜欢想到,它给人类生活带来的温暖有多大,许多父母心里因孩子健康、吃饱穿暖而感到无限的宽慰;许多青春少女不再迫于饥饿去做屈辱自己的事。我认为物质并不是什么丑恶的东西。它已经成为传递神的恩典的一条渠道。物质之所以具有圣礼的意义,是因为物质代表着神的慈爱和恩宠、并把神的慈爱和恩宠输送给人。

我们说这是上帝的世界。如果我们严肃认真,这话意味着世界

不是撒旦的。他意味着联系神与人、天与地的线并没有断,我们也并不是站在一个冷酷、寂静、无情的宇宙里。它意味着天父上帝,这位全爱全能的神和创造主,今天正在把他的创造工程推向完成阶段。也许这一天是在遥远的将来,但它意味着我们世人用自己的双手和心志所做的工作是有意义、有价值的,到头来我们的成就不是被毁坏、被否定、被丢进垃圾箱,而是被交到神的手里,被接受、被升华、被转化,成为完美无缺。只有那制造黑暗的人,才将遇到他们的末日。托马斯·阿奎那说,恩典不是取消自然,而是使自然完善。我们赞赏他这番话。神子道成肉身来到世界,这件事情本身就意味着神与世界之间、恩典与自然之间并没有一条不可逾越的鸿沟。所谓人类的堕落,是指人目前没有处在上帝心目中应处的崇高地位上,不是指他所做的工作都毫无价值,都将归为乌有。让我们记住圣保罗在《罗马书》第5章所说的,“若因一人的过犯,众人都死了,何况上帝的恩典与那因耶稣基督一人恩典中的赏赐,岂不更加倍地(让我们注意‘更加倍地’)临到众人吗?”换句话说,我们不只生在原罪之中,我们更是生在原恩之内。神子道成肉身,对人类所产生的影响,必然远超过亚当的犯罪所造成的影响。人与基督的联系,比人与亚当的联系更加深,更加坚。我们相信神的恩典具有普遍性。我们是在基督升天的光辉中看这个世界的。人类为促进平等,促进团结,为使广大人民能够爱,也能够获得爱,所作的种种努力,是和神的创造奇功协调一致的,因为父、子、圣灵三位一体的神自身就树立了一个爱的团契的形象,人类是按这个形象造的,现在也正朝着恢复这个形象的方向迈进。这就是我们对世界、对历史、对人类、对人民的运动的看法。这也是我们所赖以保持乐观、心怀感谢和努力工作的源泉。

德国诗人勃托尔特·白莱赫德对他所处的不公正的社会曾说

过这样的话：

那些尽吃山珍海味的人，
叫别人要懂得知足。
那些营利收税以饱私囊的人，
要求别人作出牺牲。
那些饱食终日的人对饿汉，
大谈美好的未来。
那些把国家推向悬崖的人，
却谓凡夫俗子无能治理。

给五千人吃饱的故事把我们带到一个与之截然不同的世界：这是一个祸福与共的社会，这里的生活安排使人们可以像弟兄姊妹一样和睦共处。愿这样一个未来世界的远景维系我们，使我们在信、望、爱的团契里保持相通。

我们的主耶稣基督，你曾教导我们祈祷说：“我们日用的饮食，今日赐给我们。”求你帮助我们，使我们能认识到，对于我们，这只是一句可说可不说的话，但是对于你千千万万其他儿女，不是由于他们的过错，今天这句话就是他们的哀号。主基督，我们恳切祈求你的国降临，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我们渴望看到你的国降临，求你使我们配于做促成你国降临的有用器皿。阿门。

复活的真理

(一九八二年十月一日在伦敦兰柏宫的演讲)

坎特伯雷大主教，
各位同工同道：

我们从心底里感谢上帝从各方面安排一切，使我们能够在这里会面。

当我考虑在这个场合要说些什么的时候，许多事情涌现在我的脑际。是谈谈中国的社会主义，还是谈谈中国基督徒正在怎样努力使基督教中国化呢？是谈谈我们结束了宗派结构，还是谈谈中国的宗教信仰自由问题呢？是谈谈三自运动，还是谈谈过去三十年间基层教会中的神学酝酿和再思呢？或是谈谈我们在“文革”期间的遭受，和我们目前所遇到的困难和机会呢？不，我想，我在此时此刻要介绍的，应该是这三十多年对于中国基督徒来说最真实、最宝贵的东西，那就是对复活的基督的信仰。

我的意思不是说我们在中国得到了一些有关基督空墓的新的证据，而只是要说，如果我们回顾和总结中国作为一个国家，或是中国基督徒作为一个教会所经历的一切，用“复活”这个词来概括我们的体验，是再合适不过的了。我们在个人、国家以及我们教会的生活中获得了某种死而复生的经验，这就使我们许多人认识到，从死里复活实在是上帝在这个世界上进行他的创造、救赎和圣化工作的规律，也是他维系和掌管整个宇宙的法则。由于我们的经历，我们多少减除了一些心灵上的愚钝，认识到基督在进入荣耀之

前受到苦楚的必然性。这样,我们就能够多少进入复活的主的奥秘,更加确实、更加亲切地感到他的同在。

一九四九年解放之初,许多中国基督徒十分担忧我们行将失去那么多的心爱之物。后来发现,失去的大多不过是包袱。但是“文化大革命”期间——其实它是相当反文化的,也谈不上是一场革命——我们基督徒和中国人民一道遭受了巨大的灾难。我们把福音视为珍宝,但是一些“红卫兵”和所谓的“造反派”却把它看成为“毒草”。我们无法传播这个福音,或者回答大字报上不公正的攻击。所有的教堂都被关闭了。保护宗教自由的政府机构也没有了。我们没有“造反派”来支持我们,也没有任何宣传工具可为我们利用。我们如果能在家庭中举行小规模聚会就算很幸运了。我们只是一个小群,非常软弱。按照常人的估计,基督教在中国历史上可能要第四次处于灭亡的状态了。

我们所没有看到的是,正在我们感到万分虚弱、濒临死亡之际,生命就在前头。英国诗人雪莱说过:冬天来了,春天还会远吗?软弱中孕含着力量,就像死亡中孕育着生命一样。正如保罗所说,你所种的若不死,就不会有生命;所种的是必朽坏的,复活的是不朽坏的;所种的是羞辱的,复活的是荣耀的;所种的是软弱的,复活的是强壮的。

在失去了这么许多东西之后,我们发现中国的基督徒比以往任何时候都多,而且更有献身精神。在所有的教堂被关闭之后,我们发现,最近三年来每两三天就有一两处教堂开门或重新开门,并且焕发出极大的热情和活力。由于我们与我国人民遭受了同样的命运,今天,我们同他们再也不是异己的,而且同他们有了比过去更多的共同语言。

这样,我们好像理解了保罗所说的话的意思:“我们四面受敌,

却不被困住；心里作难，却不至失望；遭逼迫，却不被丢弃；打倒了，却不至死亡。身上常带着耶稣的死，使耶稣的生也显明在我们身上”（林后 4:8—10）。所有这些都是上帝的恩典。“一粒麦子不落在地里死了，仍旧是一粒；若是死了，就结出许多子粒来”（约 12:24）。这个话已经由事实证明了，它使我们安心依靠。

我们基督徒常常想用我们自己带去的布去包裹基督的遗体。另一些人则试图把耶稣基督用沉重的石头封在墓里。但是活的基督不能这样被捆绑或封住，他冲破了一切人造的坟墓。

复活的真理告诉我们：温柔的人必承受地土。这使我想起，当老子论及水的时候曾这样说过：

“天下之至柔，驰骋天下之至坚，无有入无间，吾是以知无为之有益。不言之教，无为之益，天下希及之。”

我想，老子在这里所摸索的，正是基督复活的真理所彰显的。

复活的真理告诉我们：生命是通过损失、贫困、苦难和死亡才得着的，国家是这样，教会也是这样。它告诉我们，生命不在于权力、财富和财产，而是依靠生命的主，就是那升天以后，坐在上帝右边，用他的道的莫大权能托住万有，掌管世界的基督。

人死而复活，按照常识，是荒谬的说法，但是今天却有将近四分之一的人类愿意这样或那样承认耶稣为复活的主，这是因为这一希望的信息拨动了世界上亿万人的心弦。他们拒不接受失败、羞辱、苦难、黑暗和死亡为最终的命运。他们在人生的沉浮中，把这一信息看作是一把理解历史和现实的钥匙。这信息恢复了人们对于真、善、美价值的信念，从而使他们得着安慰、信心和力量。

复活的真理是旧的真理。我没有什么新的或出乎意外的东西向你们讲述。你们的诗人 T. S. 艾略特说得很贴切：“……一切探索最后到达我们原先出发的地方，但又像第一次找到这地方。”好

像是第一次认识复活的基督那样来认识他,这扩大和坚定了我们的信仰。我们是这一信息的继承者,并为它作见证。

这次访问,我们将能有机会共同分享对这位基督的认识,将能使我们增强对他的信心和感谢。愿使主耶稣从死里复活,赐平安的上帝保守我们,使我们在耶稣基督里遵行他的旨意。

在世基联和日内瓦教会 普世中心谈三自运动 (一九八三年)

作为基督徒,我们热切期待在日期满足的时候,看到天上地上一切都在基督里同归于一。然而,正如西面所预言的那样,这位最终使人们合一的基督,首先使人们区分开来。西面是这样说的:“这孩子(指耶稣)被立,是要叫以色列中许多人跌倒,许多人兴起;又要作毁谤的话柄,叫许多人心里的意念显露出来”(路 2:34、35)。

神子降世取得肉身产生了揭示男男女女的内心世界的结果。我们在《新约》里看到,当人们面对神子的时候,他们的反应是多种多样的,但大体上不外乎有三种类型:第一种人是基督的敌人、仇视者、摒弃者、憎恶者,像希律、该亚法、彼拉多、法利赛人和撒都该人。其次是像迦玛列这样的人,他们以公正自居,对基督默不表态。第三种人接受圣灵的启发,能够透过他们所见的耶稣而认识到他是晓谕世界的圣子,并且早已被定为承受万有的,诸世界也是藉着他创造的,他是上帝荣耀所发的光辉,是上帝本体的真像,他以他权能的命令托住万有。他们在这位基督身上看到万事万物是怎样按神的旨意安排的,从而不由自主地通过赞美、崇拜和行动献身于基督。

世间男女不仅仅对着道成肉身才分化成凶恶的鄙视者、貌似公正的自由主义者和善良友好者这样三类,他们对历史上出现的其他新生事物也每每如此。英国历史学家赫伯特·勃特菲尔德恰

当地指出了这一点，他说：“这是很希奇的，我们每每无条件地肯定过去的革命，而对当代人们正在进行着的革命，却很不理解。”这样对现行的革命就出现了拥护者、鄙视者和那些畏缩不前、怯于表态的人。

人们分成支持的、抵挡的和不介入的三类，以及从这一类转变而为另一类的情况，在教会内出现新生事物的时候也同样发生，它们贯穿了整部历史。教会中出现的先锋运动，几乎没有例外，都遭到既得利益权力集团的敌视，并且往往后来为这些势力所驯服，变得温良、因循、无所作为。

新生事物在刚出世的时候，同新生婴儿一样，总不是那么漂亮美观，那么完美无缺的。这些新生事物用英国诗人 W. H. 奥登的话来说：“把刻板的礼仪搅乱，因为它出自冰冷的内心；迫使它再次活起来，尽管有点不雅。”正由于此，新生事物出来之初，总会毛手毛脚，其中失误的事和笨拙的事也少不了。这些就成为反对派攻击的口实和观望派踌躇的理由。然而我们知道，在作出任何判断的时候，我们需要抓住事物的本质，而不是抓住其失误。正是事物的本质首先值得重视，因为它具有方向性、稳定性和持久性，而失误和偏差总是一时的，不能代表本质。假如不犯错误就是一切，那么，无所事事的人就该算为最有德行的人，而学习、探索、提高则是多余的了。可是我们不能忘记，这些无所作为的“好人”对旧事物的罪恶无所触动，这总不能算他们道德高超吧？

今天，我们两个中国基督徒来到日内瓦想要做这样两件事：

首先，我们此行是向中国的，也是向世界上的基督徒显示我们在基督里的一体和中国教会同普世基督教会的联系。我们三十年来不遗余力地使中国教会中国化。对于耶稣基督在中国的教会来说，这是一个事关存亡的问题。很明显，只要中国人民认为基

基督教是一件西方的东西，我们就不可能期望人们承认耶稣基督为普世的绝对的主。同时，假如我们不珍惜本国的特性，那么我们对普世教会就必然无所贡献。民族特性的存在和发展的前提，必然在于这教会是耶稣基督的。我们需要维护和发展中国教会的特性，但是如果脱离了耶稣基督的普世性，脱离了他福音的普世性以及他的教会的普世性，这个特性也就丧失了灵性内容。我们希望，首先对中国的基督徒来说，我们的访问是对这一真理的一次肯定和实践。

其次，我们希望看到，像几百年前一样，日内瓦仍然是教会进行新探索的先锋，是教会在世界上进行新试验的卫士，是早生婴儿的保育箱。正是本着这种希望，我们要求世界各国教会给予作为教会内新生事物的三自以应有的严肃的评估。我们将尽可能使世界上对之持否定态度的人转变为迦玛列式的人物，同时使迦玛列式的人物则转变为三自的朋友。认为三自不过是不够忠诚的基督徒、但求苟活而屈服于政治压力的产物，那是极端的浅薄、不负责任、自以为是。的确，有人仅仅从政治上来评论三自这样一个非从神学上来认识不可的事物。我们认为三自，正如事实已经表明的，在教会学上有其绝对必要，是在中国这样的国家传播福音的前提条件。它还为教会平信徒化、超越宗派主义和重新调整神学观点方面开辟了路途。通过这样一个进程，中国教会不再是其他教会传教地图上的一个点，而成为中国自己的教会。世界基督教需要我们忠诚于中国特性，以使人们对基督的理解和敬拜更丰富，更具有生命力。所以，理应承认，三自是在神家里诞生的一个孩子，是注定要超出其本身的一种记号；它在历史上是一种有意义的突破，对别处的基督徒也应当有所启发。希望我们来到此地能成为一个标志，就是在神的大家庭里互相施与受，从而导致更完美、更深刻

的了解。希望你们从新的角度对我们的目标和任务作出观察。你们这种了解能够增进正在进行三自运动的我们中国基督徒对自身的了解。我们十分需要旁人的指正,我们十分希望通过同各国基督徒更紧密的联系而得到所需要的指正。所有这一切的结果是我们各国基督徒的见证都得到支持和加强。这种支持和加强来自全世界教会丰美的属灵财富和进一步的感恩、祈祷。

在澳大利亚教会欢迎会上的演讲

(一九八四年三月于悉尼)

说我们是“来自东方的智者”，我们绝不敢当。我们来自北方，是中国的十一名没有多少智慧的人，七个男的，四个女的，年龄从三十左右到七十左右，其中四人来自上海，三人来自南京，此外来自广州、成都、福州和北京的各一人。这次到来访问，我们深深感到每一步都在上帝的爱顾之中，深深感到中国国内信徒的祈祷的支持，深深感到澳大利亚基督徒的热情接待。为了这种爱顾，这种祈祷，这种欢迎，我们内心对赐予一切恩惠的上帝充满感谢。

在《启示录》第2、第3章里，复活的基督通过约翰给以弗所、士每拿、别迦摩、推雅推喇、撒狄、非拉铁非和老底嘉那七个教会发出了七封信。因为那七个教会所处的环境很不相同，它们所面临的问题也很不相同，各自的强点和弱点又很不相同，所以他们所得到的信息也是不同的。圣灵并不企图以任何一种模式强加于七个教会。然而这七封信的结束语都是一样的：“凡有耳的，就应当听。”这就是说，每封信都是要让一切地方的一切基督徒听到的。

这也许足以说明，为什么澳大利亚教会联合会于一九八二年派遣一个代表团到中国访问和为什么我们这十一个人现在来到这里。

教会的个性、特殊性、地方性或民族性原则应该说是《新约》教会观的一个重要内容。普世教会只能由全世界各时代具有各式文化背景的特殊教会合在一起来体现。可以设想，一个教会进入一

个历史关键时刻,需要去找到它自己的民族性,从而不再作为任何其他国家教会的一件复制品存在下去。我们得是我们自己才好。耶稣基督在中国的教会必须获得一个中国的自我,成为中国的事物,才能同它过去的殖民主义历史分手、取得权利让中国人民来听听它有以告人的信息。同时,为了让我们中国的教会能给普世教会带去一些灵性财富,从而丰富普世教会对基督的崇拜和认识,我们的教会也不能一直总是其他教会海外传教地图上的一个小点,它总得成为真正中国的教会,进入国际教会之林。因此,在领导人员方面,在经济来源方面,在认识和表达关于基督的信仰方面,我们没有放松使中国教会中国化的努力。那就是说,它应当中国化,就像澳大利亚教会澳大利亚化一样。

坎特伯雷大主教伦西两年前在香港说,十六世纪英国基督徒摆脱罗马管辖,建立独立自主的教会,那也是一个三自运动。这话使我们感到得到了支持。自从我们来到澳大利亚以后,我们发现澳大利亚英格兰教会最近改了名,成为澳大利亚安立甘教会。你们的发展方向和我们相同,我们也感到得到支持。

先前从这块土地上前去中国的传教士在中国所做的一切好事,我们为之感谢上帝,也感谢澳大利亚教会。他们爱的作为的价值将是长存的。我们知道,在那时候,好的传教士都为了好使自己早日成为多余的而努力工作。所以我们愿意他们今天这样来看:一个自治、自养、自传的教会在中国出现和成长,绝不意味他们的失败,也不意味他们失落了什么,而正是标志他们的成功和光荣。

但是,与此同时,值得指出,争取民族自我的努力不可避免地具有一定的相对性。教会的自我必须以耶稣基督为主这一绝对的和普世的信仰为其内容,而这一信仰正是我们同全世界和各时代的教会所共有的。我们不但必须植根于中国土壤,我们还要同普

世教会相联结,作为它的一个肢体。我们不能失去聆听圣灵告知其他教会的信息的机会。我们说“三自”的时候,自我孤立或自我满足并非三者之一。所以我们这次可以说是来核对手表的,或者说是来交流的,这种对表和交流,是教会不时需要的。

我们是处在一个大国里的一个小教会。历史上第一次在第三世界中一个昔日半封建半殖民地的,因而是落后和带着沉重历史传统包袱的广大地区里,人们动作起来,力求自立更生,进入到自己建立新生活的历史阶段。正是在这样一个国家里,我们在人口中占极少数的基督徒,受命建立作为基督身体的教会。我们面临着许多难题。我们正在寻找一个充满活力的基督论和灵性生命,既坚持基督为太初之道和普世之主,坚持上帝创造、救赎、圣化的工作是三而一的,又对自然、历史、人类中的一切真善美抱敞开态度,并且反对敌视真善美的言行。我们愿意藉着同澳大利亚信徒的交往,来扩大对这位基督的认识。我们是一个重视为基督作见证的教会,因此是一个信徒人数不断加添的教会。但是,福音究竟是怎样在传开,我们还知之不详。我们需要在神学上总结我们在这方面的经验,从而使我们基督徒的见证工作得以在更好的指导下进行,避免一切抵消的力量。关于这个问题以及许多其他问题,来自任何方面的亮光我们都非常欢迎。例如在教会论方面,我们是进入了“后宗派主义”的历史时期,可我们对下一步该怎么走,我们心中无数,或者说意见纷纭。中国基督教协会是一个过渡性质的东西,它比其他国家的各派联合会走得远一点,但离开中国的联合教会还有一段很长的路程。我们要保护至今已经达到的联合,但我们也要保护甚至鼓励基督教会本有的多样性和丰富多彩,否则联合成了单调,决无好处。在这方面,我们愿意在全世界范围里寻找成功的经验和失败的教训。新的澳大利亚联合教会在教会历

史上是一件夺目的新生事物。我们将有机会了解到它经过的历程和瞻望中的前途,为此我们感到兴奋。

至于我们所听到的来自上帝的信息,那么,值得报告的就是:上帝的能力在我们的软弱中显明出来。我们是一个弱小的教会。同哥林多教会一样,按着肉体有智慧的不多,有能力的不多,有尊贵的也不多。所谓“文化大革命”是全国上下深受极左思潮祸害的几年。否定法纪的势力践踏了一切好的政策,包括宗教信仰自由政策,我们的全部教堂被关闭了十年以上。基督徒如果能聚会,也不过是在家里。当“文革”告终,宗教信仰自由的政策重新得以付诸实施的时候,这些家庭聚会是我国仅有的基督教。我们亲眼目睹了保罗的话是多么实在:上帝拣选了世上愚拙的,叫有智慧的羞愧;又拣选了世上软弱的,叫那强壮的羞愧。中国许多基督徒,正像老底嘉教会收到的信里所说的,是买了些火炼的金子,买了白衣遮身,也买了眼药擦自己的眼睛,好认明上帝的软弱比人们刚强得多。通过那些年的一切遭遇,我们基督徒耳边好像清楚地听到了那熟悉的、令人放心的声音:“是主。”这样,我们对复活之主的信心加强了。几年以来,全国基督教礼拜堂平均每天开出一所。播道工作、牧养工作、文字出版工作、神学教育工作都在推进,中国古代的诗句似乎很能说明我们的历程:“山重水复疑无路,柳暗花明又一村。”我们比过去更明白了,在阿拉法和俄梅戛之间,不是一条直线,它一路有许多转弯和曲折。这些痛苦和灾害是母亲生养的苦楚,它们带出来的是新生命。“妇人生产的时候就忧愁,因为她的時候到了。既生了孩子,她就不再纪念那苦楚,因为欢喜世上生了一个人。”按我们的认识,这就是历史。我们知道,上帝不是一位严厉的工头。先知何西阿告诉我们,他引领我们所用的是慈绳爱索。他放松套在我们口里的嚼环,他弯下腰来喂养我们。上帝最根本

的属性不是他的全能或全知,也不是他的自在,而是他的爱。爱不仅是上帝的一个属性,上帝就是爱。他是居于全部现实中心的那爱者,上帝是一位具有像基督所表现的那样的爱的爱者。这一启示超过和纠正我们关于上帝所能说的一切。爱是大有创造性的。爱为我们寻找至善。一切真正的善至终不会失落,它们将得到保全和提高,进入那行将来临的、以爱为其最高原则的天国。当我们说上帝是统治者时,我们所想到的就是这个。

自治、自养、自传的中国教会还面临着不少问题,有些已经提到。但是,在上帝的眷顾下,她不是弱了,而是强了;基督徒人数不是少了,而是多了;她的见证不是更暗淡了,而是更光亮了;而她的联合的范围和幅度不是窄了,而是比历史上任何时期更加宽得多。我们的祈祷是——我们知道你们也愿这样祈祷——基督的身体在中国的这一部分能真正在一切情况下接受基督的爱,接受基督的洗濯,使她成为圣洁,做个荣耀的教会,毫无玷污和瑕疵。

我们访问澳大利亚教会是中国教会历史上的重大事件。我们将有一段分享你我各自从上帝那里所得的信息的美好时机。在我们面前,有一个为时两周的丰富的属灵宴席。我们已经可以感谢上帝,通过这次访问,由于澳大利亚基督徒的见证和祈祷,中国基督徒必将变为更有信心的基督徒。

中国的神学群众运动

(一九八四年九月二十三日在东京立教大学的演讲)

一九四九年对中国来说是特殊的一年。在那一年,西方世界“失掉”了中国,但对中国人民来说,那年是政治上得到解放的一年。就中国基督徒来说,解放标志着我国教会称作“三自运动”的过程的开端。我将在其他场合介绍这个运动,此刻,让我向各位介绍新中国基督徒是怎样努力进行神学思考来强固自己的信仰的。

解放之初,有两件事给中国基督徒带来了震动。第一,我们同革命者有了直接的接触,我们发现,革命者和国民党政权的官员大不相同,和有些外国传教士和中国教会领袖对他们所作的描绘也大不相同。他们并不是妖魔鬼怪和洪水猛兽。他们是正常的人,有伦理观念,有人生理想,有理论兴趣。为了同胞的解放,不少革命者牺牲了他们的一切,乃至他们的生命。“为人民服务”不仅是一句口号,而且是他们之中很多人的生活目的。他们实践了中国古代圣贤的“严于律己”和“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格言。为了使自己对革命事业更为有用,他们很多人实行批评和自我批评。虽然他们对宗教没有好感,但并不企图逼迫宗教或消灭宗教。这里我讲的当然是真正的革命者,既不是后来有个十年期间假革命的极左分子,也不是那些令人失望的、在今天的整党过程中要加以改造乃至给予处分的少数坏党员。中国基督徒遇到了这些革命者,既因看到中国今后的希望而高兴,也因想到基督教还有什么存在的根据而苦恼。当时,有的基督徒在参加革命行列的

同时,的确是离开了教会和信仰。

第二,当时教会中有人顽固地蔑视这些革命者,否定新中国。他们说,世界是撒旦的领域,不久即将毁灭;基督徒不许爱世界和其中的一切,甚至不许爱其中可爱的东西;接受基督和不接受基督是人间的绝对矛盾,这两种人毫无共同语言;人手所做的都是罪恶,一个不信基督的人什么好事也做不出来,他或她的行为越好,越是撒旦装作光明的天使;《启示录》中那匹红马,指的就是共产党。根据这样的解经法,新中国寿命长不了;教会是圣洁没有瑕疵的,所以不需要进行批评和自我批评,不需要任何变革;在上帝心目中,是非的对立和善恶的对立都是无所谓的;上帝所关心的不是善恶间、是非间、正义非正义间的伦理区别,因为上帝不但反对人的恶,也反对人的善;非信徒只能受罚,不管他们所作所为有多好。“信者永远安全”的教义,给蒙基督拣选的人一种做什么也有自由的保证。这就是说,基督徒去破坏中国人民刚刚获得的新生活,也会得到上帝的同意,甚至赞许。这是教会史上早就出现过的“因信废行论”。五十年代初期,中国教会中少数同新中国势不两立的人(后来知道其中有些人本来就属于国民党),就用这个作为他们主要的神学武器。它曾一时吸引了一些人,但更多的基督徒认为这是无法接受的,有些因此就离开了教会。

这两件事引起中国基督徒的思索。一方面,革命者的行为诚然给人深刻的印象,但我们不能因此就离开基督,我们像彼得一样说:“主啊,你有永生之道,我们还归从谁呢?”另一方面,“因信废行”的观点要求我们对善良的壮丽的人民解放事业采取反对立场,这是我们不愿意做的。处于这两者之间,中国基督徒自发地进行起神学思考来。这是一个由成千上万基督徒重读《圣经》、进行口头和笔头探讨,以求寻到神学方位的群众运动。我记得 T. M. 林

赛和其他教会史家谈到十六世纪德国宗教改革时期许多家庭里都发生了“新思想”和“旧思想”的对立,但是我不知道教会史上是否有过类似像我们这样的群众运动的现象。按照传统,历史总是被写成大人物和天才的杰作,因此群众运动是没有多少地位的,一个神学的群众运动更不成其为教会史的一页。但是,在中国,在五十年代前期,神学从神学家的书房里走了出来,成了平信徒男男女女手里思想斗争的形式和内容。斗争的目的是使自己的信仰得到活力,让信徒积极地去对待他们置身于其中的现实。伊曼纽儿·康德曾将欧洲启蒙运动刻画为“人从他的自我束缚中直走出来的解放运动”。在这个意义上,中国基督徒的这一自我启蒙的群众运动,同欧洲的启蒙运动有相似之处。康德认为,这种“自我束缚”是由于“人们不能离开他人的指导来使用自己的理解力”。他对人们说:“拿出勇气来使用你自己的理智吧——这是启蒙运动的格言!”

中国这一神学再思运动的参与者,最初主要是一些普通基督徒和基层教牧同工。有神学教养的人那时有点裹足不前,也许他们认为,这种讨论的水平不够高。这是相当自然的:这些人处于后方,对问题的尖锐性不那么敏感,因而对不甚妥帖的新提法就看不惯。而平信徒处于教会和世界相接的边缘地带,特别感到问题的压力,因而急于提出问题,考虑问题,并试图解决问题。他们的主要依靠只能是《圣经》。当带着问题去重读《圣经》的时候,他们得到了“新的亮光”和“新的看见”。这两个词今天已经进入了中国基督教的常用词汇。

群众运动不是绣花,我们不能期望它很完美,很精确。说些过头话是少不了的。但是 W. H. 奥登有两行诗,倒很能说清楚神学群众运动对中国教会所作的贡献:

“把刻板的礼仪搅乱,因为它出自冰冷的内心;

迫使它再次活起来,尽管有点不雅。”

早期所讨论的很多问题同世界和人有关。世上的人固然不是天使,可他们是不是由于亚当的罪恶,今天变得那么败坏,以致无份于真、善、美,每个人只不过是“一条五尺高的蛆虫”?

总的说来,这个运动并没有走向极端,没有否定罪的实在。对我们的革命人道主义的朋友们,我们愿意指出,在人类实际道德状态和人类所憧憬和企图达到的最高道德状态之间,存在着一个人自身无法加以克服的距离。很多忠诚的、严于自我检查的革命者,对保罗描述自己如何自知该做的不去做,自知不该做却要去做的话(罗 7:15),会深有共鸣。这就是说,人们所处的光景远非上帝要他们达到的光景。人性中那造成这一局面的因素,基督徒很正确地称之为罪。人们不能依靠自己,得依靠上帝的拯救,才能摆脱这一局面。诚然,对中国来说,从半封建半殖民地进到社会主义,对于恢复人性尊严是十分必要的;可社会制度的变化没有除掉人们这一心灵上的贫困状态。“主,……你造我们是为了你,我们的心如不安息在你怀中,便不会安宁。”——生活在社会主义社会制度下的不少人,照样从心底里对奥古斯丁这句话发出共鸣。所以,今天在中国,在物质、文化、道德生活有了提高之后,宗教还有没有存在的余地,这已经不是一个使基督徒感到太困惑的问题。中国基督徒的人数在增长中,这也部分地解答了这个问题。我们只希望那日子快快来到,我们基督徒能有那样的爱心、亮光和语言,以致基督徒和革命者之间能够就人们的基本信念进行足以加强了解和团结的交谈。

另一方面,值得人们知道,中国几千年来圣贤和学者的教导中,极少有人突出人性中有个与生俱来的罪恶的观点。中国古代传说中没有人提出过最早的人曾经堕落的理论,去解释罪恶的存

在。他们倒是认为,人们有自然的善良和力量。女娲是人类最早的祖先,生活于宇宙开辟之初。“昔者女娲氏炼五色石以补其阙,断鳌之足立四极”(《列子·汤问篇》)。这就是说,不但做了补天的工作,而且把歪斜了的天撑起来的,是一个人。人是了不起的英雄,即使宇宙也得依靠她。对天人关系的这一观点,是同西方哲学中对人的看法颇为不同的。

作为诗人的毛泽东所继承的,正是这一传统。他写道:

“山,刺破青天锷未残,
天欲坠,赖以拄其间。”

在中国,孟子被认为仅次于孔子,他教导人们,人性是善的。他说,“恻隐之心,人皆有之。”宋朝以来,中国知识分子就是这样看待人性的。一直到二十世纪二十年代,中国小学生初学识字,读的就是《三字经》,它的第一句话就是“人之初,性本善”。

由于这一精神的陶冶,尽管受尽痛苦,中国人在内心深处始终是乐观主义者。即使对于战争,我们所看到的也不仅仅是人们的野蛮和暴行,在自卫战争中我们还看到了人的坚忍和同志间的友爱。在中国革命和建设的过程中,无数男女的勇敢、智慧和自我牺牲精神,更是备受人们的推崇。

了解了中国知识界的这一背景,那就容易理解,中国基督徒在承认人的罪性和有限性之余,为什么不愿意走得更远,无视人身上的上帝的形象,或无视圣灵在世界上的运行,以致轻易去接受“全然败坏”的公式,或者同意尼采把人类看作“地球表皮上的一种疾病”。

我们不愿意否定教会以外的人类文化的价值。在这些文化中,存在着不同程度的接近基督教上帝观的火花,我们不能任意目之为毫无价值的东西而予以抛弃。例如,三千年前的《诗经·大雅》

里就有这样的话：

“卬盛于豆，(卬：我。豆：古食器。)
于豆于登。(登：古食器。)
其香始升，
上帝居歆，(居歆：安享。)
胡臭亶时，(胡：何。臭：气味。亶：真。时：善。)
后稷肇祀，(后稷：人的代表。肇：开始。)
庶无罪悔，
以迄于今。”

这里对救恩不是有某种微弱的憧憬吗？二千五百年前，老子是这样揣摩太初之道的：

“有物混成，先天地生，寂兮寥兮，独立而不改，周行而不殆，可以为天下母，吾不知其名，字之曰道。”

我们能说，因为这些是出于基督教传统之外，因而就毫无价值吗？对不属基督教的灵性所见，我们不要像基督比喻中的那个大儿子，或者像约拿对待尼尼微人那样高傲才好。对人们向上帝走近的每一步，不管这一步多么小，我们都应当抱欢迎态度。

人的罪确实影响到了受造的世界，但是受造的世界到底仍是上帝的，不是魔鬼的占领区，否则，我们怎能诚诚实实地说上帝爱世界，让他的独生子来到世界呢？马丁·路德在注释《罗马书》第1章第20节时说：“上帝所创造的万物都是‘甚好’的(创1:31)，而且仍然是好的。”为了求证，路德引用了《提摩太前书》第4章第4节：“上帝所造的物都是好的”，和《提多书》第1章第15节：“在洁净的人，凡物都洁净。”路德认为，“整个创造是一本最美的书籍或《圣经》，上帝在其中把自己描绘并显示出来。”

在五十年代，中国基督教各个刊物发表了几百篇处理世界问

题和人的问题的文章。

从探讨上帝的创造和圣灵在教会、在世界、在历史中的运行，中国基督徒进而把自己的思想建立于一个更加坚实的基督论的基础上。不少具有“社会福音”背景的中国基督徒知识分子，简直像首次发现那样，找到了《约翰福音》、《以弗所书》和《歌罗西书》的那位基督，并接受他为自己的基督。他先在的逻各斯，把创造的全部性质和意义显示了出来。道成肉身不是神进入一个完全异己的世界，它是神对创造的肯定，也是上帝拯救人类和更新人类的途径。保罗赞颂基督为“那不能看见之上帝的像，是首生的，在一切被造的以先。因为万有都是靠他造的，无论是天上的、地上的、能看见的、不能看见的，或是有位的、主治的、执政的、掌权的，一概都是藉着他造的，又是为他造的。他在万有之先，万有也靠他而立”（西1:15-17）。中国基督徒以感谢的心怀重读这段话，因为我们觉得它有解放力。复活升天的基督像光明充满宇宙，照亮高山也照亮深谷，把各种色彩都召唤了出来。存在是一个巨大的过程，最后要达到的是男男女女按上帝的形象组成的共同体。因为三一上帝自己就是爱的共同体。

殉道者查斯丁讲到，逻各斯的种子存在于全人类之中。近几十年中国思考问题的基督徒对此深有同感。

我们也欣赏托马斯·阿奎那关于恩惠并不取消自然，而是成全自然的话。《新约》认为，创造从最初就不在基督之外。恩惠不是外加于自然的——像路德把恩惠看作落在粪堆上的白雪那样——恩惠是自然的基础。

当我们再读《罗马书》第5章第15节的时候，它变得充满信息：“过犯不如恩赐。若因一人的过犯众人都死了，何况上帝的恩典，与那因耶稣基督一人恩典中的赏赐，岂不更加倍地临到众人

吗?”“何况”这两个字和“更加倍”这三个字给了我们过去没有听到的信息。我们看到,基督强于亚当,赏赐强于悖逆,恩惠强于罪恶。如果说,上帝的儿子道成肉身给予人类的影响竟然不及亚当的堕落给予人类的影响,那是不可思议的。可是,时常有人竭力把罪普遍化,而把神的恩典和救赎局限于少数对象,似乎亚当带给人类的烙印,比基督带给人类的还要深得多。这段圣经告诉我们,不是这样,人类同基督的一体比同亚当的一体更为普遍,更为有效,更有决定性。《新约》最伟大的词不是“罪”而是“恩”。

原先,我们把信与不信的对立视为基督教向人类提出的唯一问题,后来转而认识到上帝在宇宙和历史中创造、救赎、圣化工作的一致性,这样,当代许多思想和运动不再被认为是同神的启示相矛盾或对神的启示的破坏。它们是照亮启示的一种帮助,尽管它们有片面性,它们对基督教信仰不一定是敌对性的,它们可能是我们认识基督的点滴亮光。我们这样来看现实,决不是降低神子基督的独特性,而正是增添他的荣耀。

上帝既然是爱,在自然界和历史中所发生的事情以及人们所作努力的最后命运,不可能是它们的全部消灭。它们将经过筛选,有的会消灭,但有的将在基督里得到改变和升华,在历史最后的高潮中为上帝所接纳。这些在上帝手中将是安全的、稳妥的。这样,我们在自然界和历史中的作为,以及我们对自己的处理,不但有历史意义,而且有终极意义。这就深化了我们对基督的认识,也把历史中人民的运动,连同他们的短处和毛病,放到创造中去认识。我们找到这位更广大的基督的经验,可以用 T. S. 艾略特的一句话来描述:

“……一切探索最后到达
我们原先出发的地方,但又

像第一次找到这地方。”

我们中国把一九四九年看为人民得到解放的一年。其他地方的基督徒希望知道,中国基督徒怎样看待解放神学。

我们对解放神学给予高度评价。它允许并动员拉丁美洲基督徒参加周围人民群众为独立、民主和建立一个更合乎人道的社会经济制度而斗争。解放神学重视处境和实践,这也是我们所欣赏的。它对《圣经》的解释是清新的、有启发的,能在政治上唤醒人,伦理上推动人。我们把解放神学家看为我们的朋友和同路人。

我们的一点保留是:虽然我们完全同意,在第三世界,人民把政治权力从外国人侵者和国内强暴统治者手里夺过来是急需的,但是,从我们的情况来看,把解放绝对化和以之为神学永恒的主题和中心内容,似乎不甚妥帖。我们愿意接受处境和实践作为真理的检验场所,但如果走得更远,认为它们还是救恩知识的来源,那我们就迟疑了。以历史存在的经验材料为基础的归纳性知识,需要有基于启示的演绎性知识所提供的深度和奥秘性为其补充才好。来自这两个渠道的信息要相辅相成,才能照亮我们对人性的认识,引导我们看见,基督福音和基督教神学主题,只能是上帝和人类在基督里得以和好。

我们的革命史告诉我们,穷人,由于他们在社会上处于不利地位,没有既得利益,因此,总的来说,对现状不大留恋。他们在一场革命中除了失去贫穷和低下生活的锁链外,并无所失,或所失甚少。因此,如果其他一切相等,他们在社会问题上比享有特权的人更容易接受革命和解放的概念,这就是他们在认识过程中的有利条件。

然而,根据我们解放以后的情况,我们认为,穷人仅仅因为他们是穷,并不就一定真理的代表,穷人反对富人的斗争也并不就

一定是历史赋予的使命。贫穷是痛苦的,穷人应当得到正义。但贫穷本身不是德行,除非是自觉自愿的。贫穷本身也并不一定带来智慧。就因为他们穷而把穷人视为“弥赛亚”,撇开正确的理论指导而提倡穷人来反对富人,这既不是马克思主义,也不是基督教。在我国“文化大革命”中我们看到了这种观点的危害,那场斗争既否定文化又不是什么革命。在已经解放了的中国,特别是在生产资料私有制改造已经结束以后,我们本应进入巩固和建设国家的历史时期。在这阶段,有些人通过劳动和智慧比别人先富起来,那是合理的,这是全体富裕起来的前奏。但是,“继续革命论”者继续把阶级斗争看为历史的杠杆,像反动势力还在统治着的往昔一样。为了把“革命”继续下去,他们把比较穷的人当作革命阵营,而把比较富一些的人,包括知识分子和当权的老革命当作反革命阵营。这一历史观对国家的统一和建设所起的破坏作用,我们已经看得很清楚。这批极左的教条主义者在革命的口号下制造出大量的混乱和无政府状态,给无辜的人们带来了那么多的伤害。中国的敌人想做而做不到的事,他们却做了出来。

在中国发生的这一反面实践教育了我们,使我们认识到,由于穷人的穷就把他们的正义性加以绝对化是很危险的。我们需要对人性,包括穷人的的人性,有个比较清醒的认识,以便努力建造一个最能结束个人自我中心主义倾向的社会制度,这个社会制度将导致人性较为美满的成长。

西方传统神学同西方哲学相对话,用关于罪的教义来解释罪。解放神学同当今第三世界现实相对话,想通过社会斗争克服或抑制罪的势力。我们中国基督徒力求使教会和神学植根于中国的土壤,在罪的问题上既要防止乐观主义者简单化的抹煞,也要防止以正统为标榜,过分地加以普遍化。如果说,欧洲不少神学是在帮助

信徒接受和容忍饥馑的事实,而解放神学的伟大处正是动员信徒去参与克服饥馑的斗争,那么,教会在新中国是在向那些已经开始从饥馑的威胁中解脱出来的人们宣告,人活着不是单靠面包,也要靠上帝口里出来的话语。

我们是一个很大的、但在许多方面仍然是落后的国家。我们是个很小的教会,并且是得为消除其外国形象而继续努力的教会。过去三十五年中,我们作为一个国家,作为一个教会,作为基督徒个人的经验告诉我们:力量存在于软弱之中,生命存在于死亡之中。对我们来说,从死里复活不但是发生在基督身上的一件事情,也是上帝管理自然和历史的一个原则或规律。中国一首古诗表达了我们的经验:

“山重水复疑无路,
柳暗花明又一村。”

我们对复活的基督有了更亲切的认识。我们比昔日更明白,在阿拉法和俄梅戛之间,不是一条直路,而是弯弯曲曲的。在所谓“文化大革命”时期,我们有很多灾难和痛苦,但这些不过是母亲生产前的阵痛,因为最后的时刻还没有到。当一个妇人要生产的时候,她就忧虑,因为她的时间到了,但当她生出了孩子,那些痛苦就不记得了,因为为世界上生了一个孩子而快乐。这对我们就是历史。创造是一个尚未完成的过程,随时会有挫折。先是多次的历史阵痛,最后出现的将是相互间智慧地、自觉地以爱相待的受造者。他们将是创造主真正的儿子,不是奴仆。在一个处在这一过程中的世界里,丑恶和卑劣还是必有的。让我引用德日进的鼓舞人心的话:“到一天,在我们能够管好风雨、潮汐和地心引力之后,我们将为上帝驾取爱这一能源,那时,人类将像是在世界史上第二次发现火种那样。”

我们的基督论并不徘徊于基督的神性人性问题,它引领我们进而认识上帝的基督似的性格。基督让我们看见,上帝不是强暴的工头,而像何西阿告诉我们的那样,他以慈绳爱索牵引我们。他放松我们口上的嚼环,俯身喂养我们。上帝的根本属性不是他的无所不能,或者他的无所不知,或者他的无所不在,或者他的自在永在,或者他的荣耀威严,而是他的爱。我们不仅说爱是上帝的一个属性,我们更要说上帝就是爱。他是处于存在的中央的那个爱者。上帝以基督所体现的那种爱爱着人们,这一启示足以大大提高和纠正人们关于上帝所说的其他一切。爱是创造性的,爱为我们寻求那美好的事物。上帝不但是宇宙秩序的源头,世上一切事物的初因,更重要的是,他是一切因果链索最后回归和受其影响的那位爱者。一切包含善的东西不会失落,它会在上帝那里得到安全,也就是说,会得到保守,得到改变,直到由爱统治的天国的来临。我们说上帝主宰一切,其意思就在于此。

由于这一神学见地,基督徒对世事既是冷静超脱的,又是热情参与的。这是比人们所能达到的历史观看得更长远得多的历史观。它同时又告诉我们,参与更新人类生活的斗争和担起每天的负担是大有价值的。它使基督徒既是参与者又是批评者。

经过这许多年后,我们中间仍然存在不同的神学见解。但是我们在与历史信经基本信仰内容认同的条件下实行互相尊重。一个群众运动中演化出来的、为大多数基督徒所接受的、符合《新约》和教会传统的三位一体的基督论,成了中国三自组织和基督教协会所代表的,比过去任何时期更广泛、更紧密的、宗派主义之后的这一团结的神学基础。

以上不过是我,中国基督徒之一,对中国政治解放以来中国基督教神学再思的叙述。

小亚细亚七个教会处于各不相同的环境中,面对各不相同的问题,因此从圣灵得到各不相同的信息。但是,七个信息有个相同的结尾:“圣灵向众教会所说的话,凡有耳的,就应当听。”这就解释了为什么日本和中国基督徒渴望熟悉彼此的灵性历史及其悲欢过程。我们是以这样的信念来进行访问的,我也是以这样的信念作出这一发言的:通过聆听圣灵给予双方的信息,两国基督徒将能更好地互相巩固,一同更深地进入上帝的智慧。

三自为何必要？

(一九八四年九月二十八日在日本京都同志社大学的演讲)

首先,我衷心感谢在中国颇为知名的同志社大学邀请我担任今年西间讲座的讲员。这对我,对中国基督徒,都是一个荣誉。我特别高兴在京都讲“三自为何必要?”这个题目,因为我国三自运动的教外同情者之一,已经去世的我们敬爱的周恩来总理,六十年前曾在这里生活和学习过。今天上午我们去瞻仰了为他树立的纪念碑。

让我也感谢同志社大学歌咏团这么美好地演唱了中国的赞美诗。要不是担心可能违反日本习惯,我都要鼓掌了。

在有些圈子里,让基督教取得本地或本民族色彩的问题是不作谈论的,谈这个问题简直像是破坏了基督教会的超国家性质,把一个世间的、政治的内容放进了超脱一切的基督教信仰。

其实,这问题在出现第一代基督徒那时就出现了。当时有非犹太民族的人信了主。是不是由于当时基督教是犹太教中的一派,又因为向他们传福音的人是犹太人,因此“外邦人”信主也就得归入犹太教呢?譬如说,他们在接受基督教的同时,也得接受割礼呢?《使徒行传》第15章所告诉我们的耶路撒冷会议,其主题正是这个。它决定外邦基督徒不必遵守犹太教律法习俗。这决定对基督教整个历史,以至对世界整个历史,关系太重大了。保罗关于称义是因着信,不是因着守律法的教义,是大有解放作用的。这就是说,基督教将不作为犹太教中的一派而存在,它将有自由同其他文

化进行对流,从而成为一个世界宗教。恩格斯在研究早期基督教的时候是这么说的:

“传到外邦的基督教抛弃民族宗教及其礼仪,向一切人开放,不加限制,成为第一个世界宗教。”

这一世界宗教决不是一个空洞的、不同任何文化相结合的世界主义的信仰。它总是本地的,在它同各种文化相接触的过程中,它总是取得本地的色彩。爱伦·理查逊在他所著的《〈新约〉神学导论》一书中指出,“地方性”是《新约》教会观的一个重要方面。他说:

“教会不是像一个斯多葛或伊壁鸠鲁的哲学学派,在一地的存在是很偶然的。公教会必然是一个地方性教会,是某一城市或某一国家的教会,——地方性、民族性和特殊性,这些是普世教会的必要标志。”

显然,如果基督教不从犹太教框框中解放出来,如果它不能获得自由,使它的信仰能为希腊头脑和后来能为其他许多民族的头脑所领略的话,基督教的神学创造力必然遭受严重限制,它作为犹太教中的一派,在神学发展上必然会停滞的。这样,关于三位一体的教义,关于基督的教义,关于圣灵的教义,关于教会的教义,还有其他种种教义,必然停留在极不发展的状态之中。

外邦基督徒是否必须同时做犹太教徒这一问题,在一千几百年后的中国在另一形式下又发生了:由于基督教是一个欧洲和西方的宗教,当一个中国人接受基督教的时候,他是否也得学着像一个欧洲人或西方人?一个中国化的基督教能否算基督教?利玛窦比较尊重中国文化,他愿望吸收若干中国的东西,形成一个同欧洲基督教不完全相同的中国基督教。他这么做,基督教就比较能为当时中国知识分子所接受。在利玛窦的影响下,十八世纪初期的

皇帝康熙就比较同情基督教信仰,他能够就耶稣基督的受死写出这样的一首诗:

“功成十架血成溪，
百丈恩流分自西。
身列四衢半夜路，
徒方三背两番鸡。
五千鞭挞寸肤裂，
六尺悬垂二盗齐。
惨动八埃惊九品，
七言一毕万灵啼。”

你们可以看到,在这首诗里,尽管作者没有对基督复活表示任何肯定,但对耶稣基督还是显露了同情和钦佩。看来当时本来已经具有比较成熟的条件,出现一个忠于基督、又向中国民族文化开放的宗教。

可惜,在罗马的压力下,一些后来的传教士转而对中国民族文化采取敌视态度。他们以保卫教会信仰的纯洁性为名,离开了利玛窦的思想,结果,这同一位康熙就命令驱逐传教士。

值得指出,自治、自养、自传,这作为在一个国家建立教会方针的三自,在西方基督教较开明的圈子里早就被提出和接受了。英国圣公会教会传教会主任干事亨利·樊(Henry Venn)可能是把这三者联在一起的第一个人,他在一八五〇年所写的《本地教会组织》里还提出“差会结束”的观点。他的意思是:传教士努力的方向应当是使他们自己成为不必要的人。十九世纪二十年代在华北圣公会工作的传教士罗伦特·爱伦以极大的说服力指出,保罗的传教活动旨在促使教会独立,具有地方性质,不依靠所谓“母会”。

中国是一个很早就有民族觉醒的国家。十九世纪和二十世纪

的多次反教运动,与其说是反对基督教信息,不如说是反对一个为列强插手中国效劳的宗教。这一政治性问题在中国是一个那么严重的问题,以致有民族自尊心的中国人就不会愿意来听听基督教有以告人的信息。因此,许多中国基督徒早就希望,中国教会能独立,基督教在中国能民族化。在十九世纪,中国有个基督徒为了要由一位中国牧师给他施洗,宁愿暂不受洗,后来坐了小船到几百里之外去找中国牧师。此后,他创立了一个独立的布道所。二十世纪二十年代起,中国出现了许多独立教会,它们强调教会应由中国人来领导,由中国信徒自己来维持,当时有的还形成了全国性组织。可见教会三自运动和独立运动并不是二十世纪五十年代突然出现的。这一运动的准备工作,很早就在中国和外国开始了。在中国解放以前,不少西方传教士也是支持三自这一理想的,他们有份于中国教会独立的基础工作。

我想,可以说,从公元四十九年耶路撒冷会议接触这一问题那时起,在近二千年间,不论福音传到哪里,一个地方也好,一个部落也好,一个民族也好,一个国家也好,三自的问题就都跟着出现,尽管人们不一定用“三自”这名词。香港有些仇视新中国的人试图渲染三自是共产党人强加于基督徒的,他们既没有研究《新约圣经》,也没有研究历史。

有两个重要原因,要求任何国家的教会具有一个不是借来的,而是它自己的自我,成为一个实体性的存在:(一)为了这一教会在它所处环境里有效地作出见证,(二)给普世教会对基督的认识和崇敬添砖加瓦。让我对这两点都说一些话。

福音要求人们承认罪,承认基督的道成肉身从死里复活。这就使福音成为许多人不欢迎,并加以排斥的东西。这是福音本身

内涵的“绊脚石”。这一“绊脚石”在我们是不能丢掉的，否则福音就不成其为福音而成为别的什么了。我们所能做的，也是所必须做的，就是尽我们的责任去保护福音信息传向人间的通道，不让人为的异己的东西插入进来致使人们接受福音更为困难。在接受异体移植的时候，人体有时会发生排斥异体现象，传福音也会发生这一现象，传福音者要避免这一现象的发生，非得倒空自己身上不属于福音的外来物不可。这在一个人民具有高度民族觉醒的国家更为重要。

罗伦特·爱伦在一九二二年所写的《华北方针》中是这样说到“政治性困难”的：

“现在，中国人一般把传教士看成政治人物，被派遣来收买人心，为某一外国的统治作准备。这一猜疑由于西方国家利用诸如胶州事件等等反教士事件为扩张领土的借口，而更为加强了。”

由于十字架和国旗的这种结合，人们对基督教的传播得到了一个含混不清的印象。你们一定很容易想象，在这一情况下，我们要说清楚，基督福音同西方势力的统治是完全分开的，还要说清楚，基督福音尽管同西方许多东西一并进入，可是基督耶稣不是亲西方的，他有他的绝对性和普世性，是人类不能不倾听的，这是多么困难。考虑到这个，那么，我们的教会需要非西方化和非外国化，同保罗和早期外邦信徒需要基督教非犹太化相似，就不难理解了。

中国教会作为外国的一个附属品而存在，这一事实对福音事业有多么大的危害，西方传教组织领袖并非毫不觉察。罗马教廷第一位驻华公使散尔克苏·康斯坦铁尼一九二二年首次来华途中曾写道：“在中国，外国人的政治地位是基于特权。靠着治外法权，外国人不受中国法庭约束。中国教会在法律上也处于这一特权地

位,这就得罪了有自尊心的中国人。教会是靠了条约才被容忍的。传教士是外国人,人们怀疑他们同外国列强相勾结。”“使徒时代建立教会,让独立的主教治理各地教会。……尽管当时人们有种种反对教会的话,可其中没有说它是外国宗教的一条。……如今中国人把天主教视作舶来品,还同外国政治利益联在一起,这难道是中国人的过错吗?”可是此人的正确分析不过停留在纸面上。尽管他说过这些话,直到一九四九年,在中国一百四十个左右的天主教教区中,只有二十个由中国人当主教。

反对让基督教适当接受民族文化和民族理想的人,每每莫须有地大事鼓吹“混同主义”的危害。高举批评这个“主义”的大旗每每是同殖民主义帝国以胜利者自居的僵化和目空一切联在一起的。

值得指出,起源于巴勒斯坦和小亚细亚的基督教之所以成为一个西方宗教,那是由于人们在神学上、灵性上、艺术上敢于创新,敢于使用西方文化条件为媒介来表达上帝奇妙的作为。可叹的是,当这个获得了西方自我的基督教进入现代并进入世界其他地区的时候,它这个西方自我竟然成了桎梏,对基督徒起了抑制作用,使他们难以认识和敬拜一位真正普世的基督,也使接受了其他文化教养的人们难于接受这位作为西方人的基督。

正由于此,尽管中国在长时期中曾是得到西方传教士和传教经费最多的传教区,信教的人却特别少。一九四九年中国得到解放的时候,基督教新教信徒没有超过七十万人。

今年,在解放三十五年 and 发起三自三十四年之后,根据保守的计算,基督教新教信徒增加到三百万以上。他们成为信徒的经历当然各不相同,但是,在一切经历的背后,有一个普遍的重要原因,那就是:今天,中国教会已经在相当程度上去除了它原有的西方形

象。不但它的领导同工都是中国人,不但它的经济收入依靠中国信徒,而且表达基督信仰的思想、崇拜、美术、音乐等渠道,也开始越来越中国化。

我们不是一个在教育、医药、福利等方面办有种种事业的教会,也没有高级的传播工具,但我们是一个传扬福音和日益增长中的教会。基督徒正在他们工作和居住的地方作出见证。现在,人们再也不大说“多一个基督徒,少一个中国人”了,各阶层都有人比过去更愿意听听基督教究竟说些什么。我们的全部经验告诉我们,一个教会必须自己去赢得使人们聆听的权利。

三自不是一个反对传教的运动。为了传教士把耶稣基督的福音带到中国来,为了他们在中国所做的一切好事,我们是感谢上帝的。基督徒服从载在《马太福音》第28章的基督的吩咐是一回事,西方殖民主义的政治、经济、军事扩张是另一回事,两者有牵连,这是问题之所在。到外国去传教,有它合适的时间,时间不对,外国传教士就不该去,尽可让本地教会成长,成为有自己特色的教会。自从中国对外开放以来,不少昔日在华传教士回来参观访问,他们看到中国的变化,看到中国教会的情况,就表示高兴,表示赞成三自,同我们一起感谢上帝,这给我们很大的鼓励和快乐。

关于三自对教会传扬福音工作的重大意义,就说这些。

三自对于丰富普世教会的灵性宝库,使教会真正成为普世的,也是十分重要的。

可以说,任何地方或民族的教会都有两极,它的普世性和它的特殊性。我们对两者都应当具有敏感。

一九八二年坎特伯雷大主教伦西博士讲过下列两段话:

“在十六世纪,当改教者决定用英语来诵读《圣经》的时

候,英吉利教会实践的就是一个三自运动。他们用人民的本国语言来制定了崇拜礼文。他们建立了一个安立甘教会,既不离公教会的教义,又维护地方独立和自治原则。”

“只有维护自己的性格,热爱自己的根,你才能为普世教会作出贡献。”

耶稣基督内涵的宝藏要全部开发出来,还得要让各个文化背景的基督徒都来投入才行。自天而降的新耶路撒冷不是只有一座城门,在它的北面、南面、东面、西面各有三座城门,让基督徒和教会从四面八方来进入,大家带着各自特殊的灵性宝藏和看见,一起来进入基督的丰盛。教会的普世性就存在于众多地方教会的特殊性之中。地方教会就是教会的普世性和种种文化的特殊性相结合的所在。中国基督徒愿望自己作为具有中国特色的耶稣基督的教会形成一个自己的队伍,进入新耶路撒冷,而不是作为其他教会传教地图上的一个点。

《启示录》第2、第3章里有圣灵写给以弗所、士每拿、别迦摩、推雅推喇、撒狄、非拉铁非、老底嘉七个教会的七封信。这些教会处在各不相同的环境中,各有不同的长处和短处,面临着各不相同的问题,信的内容就各不相同。但是,在每封信的末尾有一个劝告是相同的:“圣灵向众教会所说的话,凡有耳的,就应当听。”可见,这七个信息是准备让耶稣基督在全世界的各教会倾听的。

因此,当我们在中国讲三自的时候,自我孤立不在其内。是的,我们要植根于中国的土壤,但同时又要重申我们同一切其他地方的信徒的一体,要从历史上一切社会制度和一切文化环境之内一切特殊教会共同体现的使徒所传的独一、圣而公之教会怀抱里获得营养。我们不能许可自己不听听圣灵告诉其他教会的话。我们坚信基督徒之间超越国界的互相依赖的原则,只是我们认为,只

有我们先做到独立,我们才能更好地互相依赖。

教会的公性就它的广度来说包括整个世界一切时代、一切地区的教会,就它的深度来说就是把基督教信仰同一切文化中相遇的成果集中拢来。这两个层面的公性今天仍然是在实现的过程中。三自正是中国教会为实现这一公性所作的贡献。当我们看到福音怎样改变中国人,又看到中国人怎样丰富全教会对于福音的认识的时候,普世教会将变得更为富足。

任何一群基督徒的传教使命不应当同另一教会在其本国进行传教的使命发生矛盾。基督徒应当不让他们自己的自我扩张去侵占另一教会的自我的神圣空间。正是这一考虑,导致我们中国基督徒向全世界宣告:为了保护我国教会正在生长的自我的幼芽,使之不致被国际干涉主义踩在脚下,也就是为了防止教会在我国重新拾起外国形象,在中国进行传教和建立教会是中国基督徒自己的职责和任务;海外任何团体,不论其成员的肤色,在没有得到中国基督教协会许可的情况下,不得在中国进行此项工作。希望人们不要因此误会,认为我们对教会的普世性采取拒绝态度。不是的,这不过是对中国自我的成长和做到广传福音采取的保护措施。我们希望国际基督教对中国基督徒正在进行的工作采取同情态度,至少采取迦玛列式的静观态度。在旧中国,我们的海关控制在外国人手里。由于缺乏保护关税制度,舶来品价格低廉,充塞市场,我们的民族工业濒临绝境。今天,为了加强中国教会的自我,从而为普世教会作出应有的贡献,某些保护性措施也是必要的。

你们可能注意到,三自的全称里面有“爱国”二字。由于有些人在“爱国”名义下所做过的坏事,人们可能要怀疑,三自是不是一个狭隘的排外的运动。这个怀疑是可以理解的,但是我认为是不必要的,因为就教会而论,三自不过主张教会的中国化,主张它发

展中国特点,正像英国的教会有英国的特点,美国的教会有美国的特点一样。至于爱国主义或民族主义,我们要作些区别。有一种民族主义,要求人们首先忠于国家,主张“不论是非,我的国家就是我的国家”。这是国家沙文主义,在这一主义之下,对国家错误政策的批评受到抑制,压迫和侵略得到许可。把这个也称为“爱国主义”,是妄用了这个词,因为长期以来爱国主义所包含的是很高尚很美好的内容。中国很多基督徒,特别是很多基督教领袖,在“文革”时期,由于首先忠于耶稣基督而不是首先忠于政治当局,就受了许多苦。这事实说明,中国基督徒所讲的爱国主义并不是国家至上主义或国家沙文主义。

有一种民族主义,号召人民抵抗外来侵略,保卫自己的民族领土,使民族的文化、语言、经济不受强权践踏。这不容同侵略者的民族主义混为一谈。有这样的時候,小国的文化、古老的文化、包含着善和美的文化,被国内专制政权或跨国经济、科技集团的优越势力所蹂躏,那时,遭受其害的人们起来自卫,企求享受过得去的生活。在这样的時候,基督徒理应作出站在人民一边的抉择,支持一个促进历史前进的民族主义。孙逸仙博士,一位基督徒,就是作出这样抉择的,他反对清王朝的专制统治和外国侵略,于一九一二年成立中华民国。我们至今记得日本朋友给予他的支持。

真正的爱国主义为民族的落后和蒙受的耻辱而忧伤,为祖国人民的解放和成就而欢乐。这两种爱国感情《旧约圣经》里都有。《诗篇》第 137 篇为国家遭难而表示悲愤忧郁:

“我们曾在巴比伦的河边坐下,
一追想锡安就哭了。
我们把琴挂在那里的柳树上,
因为在那里,掳掠我们的要我们唱歌;

抢夺我们的，要我们作乐，说：
‘给我们唱一首锡安歌吧！’
我们怎能在外邦唱耶和華的歌呢？
耶路撒冷啊，我若忘记你，
情愿我的右手忘记技巧。
我若不纪念你，
若不看耶路撒冷过于我所最喜乐的，
情愿我的舌头贴于上膛。”

《诗篇》第 126 篇为人民的幸福而表示欢欣感谢：

“当耶和華将那些被掳的带回锡安的时候，
我们好像做梦的人。
我们满口喜笑、满舌欢呼的时候，
外邦中就有人说：
‘耶和華為他们行了大事！’
耶和華果然为我们行了大事，
我们就欢喜。
耶和華啊，求你使我们被掳的人归回，
好像南地的河水复流。
流泪撒种的，必欢呼收割。
那带种流泪出去的，
必要欢欢乐乐地带禾捆回来。”

从这两段经文和《圣经》中其他许多段落，我们知道，对祖国的一种健康的挚爱，同《圣经》不是格格不入的。对这种爱国主义，我们基督徒不应抱虚无主义态度。

今天中国人民的爱国主义意味着决心向仍旧残存的阴暗面继续斗争，也为物质生活和文化生活的提高和在更大程度上实现正

义和人的尊严而继续斗争。这是对我们的国家一种负责任的爱感。基督徒应当关心全人类的福祉，这对我们中国基督徒来说，首先意味着关怀中国人民的福祉。仅仅关怀中国人民的福祉是不够的，但关怀中国人民的福祉是我们的起点，是我们热爱全人类的起步处。这一关怀同国际主义不相矛盾，它自然地延伸到国际主义，是国际主义的一个部分。

我们欣赏内村鉴三先生的话：

“耶稣和日本(Jesus and Japan)：

我的信仰不是只有一个中心的圆圈，它是有两个中心的椭圆。我的心和脑围绕着这两个名字转着。我发现这一个J加强另一个J。”

同样地，我们也愿意说，我们的信仰也像个有两个中心的椭圆，是两个C，基督和中国(Christ and China)。

中国三自运动的结果之一是它把中国基督教推进到一个宗派主义之后的时期。在五十年代初期，战争正在朝鲜进行着，美中两国资金冻结，中华基督教协进会、各大宗派的全国性、地区性甚至基层教会组织陷于瘫痪，宗派系统再也无法用来指导全国。各地基督徒自发超越宗派界限联系起来。由于中国宗派历史较短，各地比较容易地在三自这顶伞的下面接近了起来。今天，宗派组织不再存在，但在信仰上、礼仪上凡信徒所喜爱的宗派特点，仍旧得到保持和尊重。三自运动的重点在于发展中国基督教的自我，而中国基督教协会主要以加强广义的牧养工作为宗旨，那就是在教会里培养灵命和建设神学。这里包括印发《圣经》，出版《赞美诗》和书刊，维持神学院校。这些我们都能合在一起来进行。在中国，三自和基协都是爱国宗教团体。我们相信，我们仍在过渡，在较远的将来会出现一个植根于《圣经》和中国土壤的，真正属于基督又

属于中国的教会。当然,我们到今天为止还不知道,在这方面,主愿意我们走的下一步是怎样的一步。

中国基督徒面临的问题不少,例如教会领袖和正在接受训练的新一代之间存在很大的年龄差距,牧养信徒的工作做得很粗,有些地方存在着信仰上的异端和偏差,有些地方政府干部和三自工作人员在执行宗教信仰自由政策上不够有力,如此等等。但是我们也知道,教会向来是带着种种困难而前进的。当我们在三自道路上前进的时候,其他地方的信徒为我们献上的祈祷,对我们意义重大。我们希望,通过日本基督徒和中国基督徒的互访,更大的同情、友爱和团结将出现在两国信徒之间,藉此在建立基督身体的事工上互相勉励促进。

在访问印度教会临别座谈会上的讲话

(一九八五年三月)

在这结束我们两周访问的时刻,我们首先要向印度基督教会的领导同工和广大信徒致以最诚挚的感谢。访问的每一分钟无不充满着主内的友情和团契,在所到之处都升起了感谢上帝的赞歌。

这次访问使我深切感到,印度人民是伟大的、有志气的。尽管遭受异国的长期统治,印度仍旧是十足的印度。印度敢于相信、热爱、尊重、保卫值得自己骄傲的文化传统。到处可以看到印度妇女穿着庄严、美观、历史悠久的莎丽以从容不迫的步履在行进。这正告诉我们,印度人民是不可征服的,印度文明是抹不掉的。在古代就有极高的文明,能建造那么多雄伟壮观的建筑群,能产生那么多思想家的印度人民,是谁也征服不了的。国际冒险家之退出印度,正像他们之退出中国一样,是历史无可逆转的裁决。

我对上帝的信赖是同我对人民的信赖相统一的。我的有神论同仇视人民是水火不相容的。

我们是来向印度教会学习的。中国同印度相比,情况要简单得多。中国从来没有种姓制度。我们没有几十种把我们分割开来的语言,我们的汉语是百分之九十五的人口所共同使用的。我们有许多宗教,但大概是由于孔夫子的影响,不大有偏激的狂热,各教和平相处,有史以来没有过宗教战争。几年前中国正式宣告,地主和资本家作为阶级已经消失,他们都成了自食其力的人。我们看到,印度教会处在远比中国复杂的环境中,我们钦佩你们,为你

们祈祷,更要学习你们的经验。你们成立了南印度教会和北印度教会,此中经验大大值得学习。你们在神学上探讨基督启示同其他宗教以及教外真善美的关系问题,这也正是我们的神学课题,我们应当互相学习交流。

我同印度不少教会领袖一样,认为印度那些至今还被挤到社会边缘的人们将会觉醒,起而为自己作为神的儿女应有的人格尊严而斗争。这些人得不到自由,总是印度教会和普世教会以及普世人类肌体上的损伤。但愿整个教会——不仅是少数人——成为他们的先知,他们的代言人,他们的保护者,他们的鼓舞者,他们的仆人,他们的母亲,和他们同哭泣、同欢乐。这样,当他们的好日子来到的时候,他们不致把教会视作异己,而是把教会视作长期患难中的朋友。

我怀着对印度教会以及印度人民深切的信,深切的望,深切的爱,向你们道别。不论在哪儿,愿上帝赐福给你我,并且带领我们不久再会。让我们用保罗的话互勉:“你们若靠主站立得稳,我们就活了”(帖前 3:8)。

在加拿大一所神学院的讲话

(一九八五年三月)

基督教不是那么容易被人接受的。其中有很多事情难以理解。十字架是其中之一,复活也是。《圣经》中有很多疑难之处,教会历史上有很多灰暗的篇章,教会组织和基督徒们时而表现出偏见、前后矛盾和彼此分裂,所有这些都会成为人们信仰过程中的绊脚石。尽管如此,人们并没有退缩不前,反而觉得基督教很有魅力。在世界上的许多地方,基督徒的人数每天都在增加,这是为什么?有人认为人们信仰宗教是因为痛苦、羞辱和绝望。但事实并非一概如此,中国就是一个例外。经过一个多世纪艰难的宣教工作之后,中国到一九四九年为止总共只有不到七十万的新教徒。在过去的三十六年间,人民能享受到更多的安全和自尊,而基督徒的人数不但没有减少,反而增加了四至五倍。对于某些从事社会科学研究的人来说,这出乎他们意料之外,因为他们原以为在社会主义社会里宗教会渐趋式微。对我们基督徒来说,这一现象有助于我们懂得,基督教的主题不一定非得是痛苦和无助。我们可以通过认同和参与人民解放和人道主义事业来达至更为健康的灵性。在《路加福音》第1章里,撒迦利亚就预言:人民从仇敌手中被拯救出来后,就得以终身在上帝面前坦然无惧地用圣洁、公义侍奉他。我们本来以为社会主义革命是容不得宗教的,但事实促使我们重新进行思考,进而把革命当作使宗教得到净化和成长的机会。

尽管宗教有自身的缺欠,却还是有那么多人愿意信仰宗教,

究竟是什么使宗教具有这样的吸引力？彼得给予了最令人满意的答案：“主啊，你有永生之道，我们还归从谁呢？”（约 6:68）

人类处在生物王国的顶端。我们是唯一能够就生存的意义提出问题的生命体。基督教的信息，即生命之道，正是要解答这一问题。这就是为什么人们不拘生活在何种社会制度下，都愿意倾听基督教信息的缘故。在听到了这一信息之后，一定会有人发现，他们的问题在基督里得到了解答，从而决心把自己交托给基督，不再四处盲目寻索了。

最近，我访问了一家工厂。这家工厂里有一个很大的车间，一天二十四小时只有四五位员工轮流工作六个小时，余下的时间里完全由几台机器人负责整个工作。机器人有绝佳的记忆，所做的工作很精密，能收集整个车间的情况，能在考察了环境中一切的变数后作出正确的判断和相应的动作。机器人也能测试成品，找出可能的瑕疵，进行装配包装，然后送入仓库。机器人真是很聪明，我敢说，比我们中的大多数人更聪明。但是，它们永远也不会问及永生之道的的问题，永生对它们毫无意义。

《诗篇》第 8 篇第 3 至 4 节上这样说：“我观看你指头所造的天，并你所陈设的月亮星宿，便说，人算什么，你竟顾念他？世人算什么，你竟眷顾他？”只有人类才会问及自己的属性，这是什么缘故？第 5 节给出了答案：“你叫他比天使微小一点，并赐他荣耀尊贵为冠冕。”人类在所有受造物中处于最高地位，高到足以提出终极性问题。

比如：究竟为什么要活着？活着仅是为了不死？有人只追求内心的平安，内心的平安——这就是至善吗？

世上存在着善。我们都知道应当为善。康德在《实践理性批判》中这样说：“有两件事，我们越是仔细思量就越是心生钦佩与敬

畏,那就是布满星星的天空和我们内在的道德律。”内在的道德律促使我们弃恶从善。人类向往完美的本能是使我们的世界变得比较适于居住的一个极为重要的因素。若是有朝一日人类忽然失去了内在道德律,这世界立刻会堕入混沌之中。值得一提的是,对于天良更有觉醒的那部分人来说,行善并不只是行为合乎规范就可以了,而是要进一步在良心的驱使下,不畏流俗,不计个人安危,投身于对具有奴役性、剥削性和压迫性的社会制度的根本改造。

善的源头在哪里? 很多人毅然转向上帝,认为上帝是善的源头,若非如此,我们就无以解释善的来源。

《第九交响曲》很有欣赏价值。如果我们只是说它的来源是贝多芬,这还是不够的。更好一点的说法会指出,美是预先存在于宇宙中,而贝多芬通过《第九交响曲》把美体现出来,这和耶稣基督体现了先在的逻各斯在道理上有些相仿。

还有很多刨根问底的终极或接近终极的问题:为什么这世界不是那么完美? 为什么没有更多的善? 为什么坏人坏事不但能继续存在,而且还很兴旺?

什么是死亡? 是一了百了吗? 是否善与恶、美与丑、真理与谬误最后同归于空虚、同归于消亡呢? 如果读了福音书,我们就会感到,这不可能是基督对事物的理解。

在日常生活中我们发现:应该做的我们常不做,不应该做的倒常去做。一个人越是服从良知,越是在道德上对自己严格要求,他在这方面就越是容易因敏感而受困扰。为什么会这样? 如何才能跳出这一恶性循环?

诸如此类的问题,只有古往今来的人类才有能力提出。

社会主义制度是适合中国国情的社会制度。它使中国人民脱离了极度的穷乏,使越来越多的人过上了人应该过的生活。所以

我们在中国理当支持社会主义尝试。但是社会主义所注重的是提高社会生产力,以及物质、文化和道德方面的重建工作。我们所考虑的终极问题是超出社会主义制度所顾及的范围的。

彼得作为人类的一员能够说出:“主啊,你有永生之道,我们还归从谁呢?”这说明人类在寻求真理的过程中已经达到了相当高级的阶段。这一阶段的达成显示了人类的崇高。

有时候,有人会认为人只不过是犯罪的机器罢了。对尼采来说,人只是地球表皮上的一种疾病。加尔文也至少有一次容许自己说,人是一条五尺高的蛆虫。我并不认为他们对人类的这种指控是合乎基督心意的,我要用莎士比亚借哈姆雷特之口对人类所发的颂赞来进行反驳:“人是多么了不起的一件作品!理性是多么高贵,力量是多么无穷!仪表和举止是多么端庄,多么出色!论行动,多么像天使!论了解,多么像天神!宇宙的精华!万物的灵长!”

在过去的三十六年里,我们和许多本着良心的革命者进行过接触,他们实行十分严格的批评与自我批评。他们像本着良心的基督徒一样,强烈地意识到他们的行为难以达到理想的境界,有时会做出有悖于他们崇高理想的事。

如果人仅是虫子和疾病,他们就不会提出终极问题,耶稣基督的福音也只是就无人问津的问题提供答案而已,是对空气说话。但是,我们知道这不是事实。

道成肉身是对人类的肯定,肯定人所发的问题值得回答,肯定人值得教育和救赎。能够提出这样的终极问题的人,上帝不会定意毁灭。

初期教会的神学家查斯丁曾提出一个重要的观点,他认为,道

的种子埋藏在每一个人的心里。中国基督徒最近几十年的经历使我们容易倾向于这样看待人类。如果基督是一个满圆,我们就是或长或短的圆弧。我们都是半成品。绝对和相对之间并不是断开的。

今天,尽管存在着这样或那样的阻碍,人们还是源源不断地归向基督。对于那些隐约感到了莫名的终极问题在心灵深处颤动萌发的人来说,基督的到来给他们带来了亮光、信息、安慰和鼓励。

是福音带领人们来到基督面前。是福音呼召生活在各个时代、各个地方、各种社会制度下的人进入它的丰富,并使人彼此分享它的丰富。

我愿意用生活在十一世纪末、十二世纪初的圣徒安瑟伦的祷文带领大家祷告:

上帝,你是生命、智慧、真理、丰富、祝福、永恒、惟一的至善。主,你是我的希望,我心的喜悦。我怀着感恩向你承认,我是照你的形象被造的,所以我爱你,我所有的思想转向你,以便爱你更深,以你为乐,接受你。因为在地上难以完全享受这蒙福的光景,就让我每天成长,直到在来世达到完满。在这里,我渐渐地认识你;到那里,我会完全认识你。在这里,我对你的爱渐渐增长;到那里,这爱将要成熟。在这里,我在盼望中有喜乐;到那里,这盼望将会完全实现。阿门。

上帝是爱

(一九八六年十月五日访问匈牙利教会时的讲话)

今天晚上,布达佩斯基督教各宗派举行联合礼拜,来欢迎我们中国基督教访问团,使我们四个中国基督徒能和匈牙利这么许多主内弟兄姊妹聚首一堂,共同崇拜,我从心底里感谢上主的大恩,也感谢你们每一位。叫我感到特别荣幸的是,这座高度超乎寻常的讲台下面曾是一间密室,第二次世界大战时期在里面长期掩护过犹太人,使他们免于纳粹党人的追捕、逼迫、杀害。这就说明,匈牙利基督徒不但讲道和听道,你们还冒着危险行道,反对法西斯,同时也为基督做了美好的见证。我回国之后,一定不会不把这件事向中国信徒讲述的。

今天让我们共同思考记在《路加福音》第9章第10至17节那里的基督在加利利所行的一个神迹。他做了五件事:(一)把人手里的五饼二鱼接过来,尽管微不足道;(二)叫人们一组一组坐下来,每组合五十人;(三)拿起食物,望着上天,加以祝福;(四)将食物掰开;(五)把食物分发给五千人,人所能拿出的五饼二鱼尽管少,尽管不好,他并不嫌弃,也不销毁,更不咒诅;他接受过去,加以提高,加以增多,加以圣化,使之造福于人。

我们的上帝就像基督所显示的,不是一位毁灭者,而是一位给予者。

几个月以前,我的母亲去世了。几十年来,她是全世界为我祷告得最多最热情的一位。我做牧师同她的祷告大有关系。在举

行了庆祝她一百岁的家庭感恩礼拜之后不久，她患了老年性大脑退化症，每天睡眠时间越来越长，后来整天睡觉，最后就停止了呼吸。

母亲是那么爱我，她对基督的爱，对教会的爱，对我的爱，是同一个爱，是分不开的。对她的死，我当然有一定的思想准备，但她的死是我一生中的重大事件。那时以来，我时常想到她，也时常想到死。有时我觉得她仍然离我很近，但有时，一种思想会向我袭来：她已经化为乌有，只剩骨灰。

有人渲染，能够藉着信心和祷告治好一切毛病。我不如此想。如果真正如此，世界上将挤满了人，发生人口爆炸，生态将失去平衡。

上帝既然是爱，我总是相信：就一个挚爱他人和关怀他人的人生来说，就一个充满着祈祷和赞美的人生来说，死和毁灭不可能是它的结束。基督从死里复活给了我们保证：毁灭不是生命的结局。一个活在基督里的生命所等待的，不是毁灭。基督将把这微弱的生命接到自己手里，祝福、扩大它，使人从它得益。上帝既然是爱，我们就不能设想：善良同罪恶一样归于乌有，真理同错谬一样归于乌有，美好同丑恶一样归于乌有。

我们的上帝不是一台推土机。他爱惜一切值得爱惜的生灵。他的爱波并不限于那些对他虔敬的人们，或是教会组织所能延伸到的那些地方。一切善良、真实、美好都不在他的爱的领域之外。

匈牙利牧师讲道，也讲故事的吧。让我也给你们讲一个，说明出生和去世也都不过是人的生命向新的阶段的过渡。有时，有的病人面临死亡，心里不平安，我就在床边给他讲这样一个故事：

从前有一位母亲怀孕，怀的是一对双胞胎。随着时间的过去，

母腹里的胎儿渐渐长大,有了小小的脑袋,有了感觉,后来又有了知觉,发现了他们的环境,发现了他们是一对,发现了自我。他们高兴地生活在母腹这环境里,他们说:“我们多么幸福,有这样好的一个世界。”“我们的妈妈多好,爱我们,把她自己给我们分享。”

几个月之后,他们意识到,他们不能在此久留,他们得离开这个环境。他们害怕,害怕一切都完了,害怕等待他们的是毁灭。一个说:“但愿此后生命还能继续。”另一个哭着说:“我们完蛋了,你别想入非非。”他觉得人生毫无指望,他说:“我们的成胎和成长最后带来的是一死,人生是全然荒唐的,有什么意义可言!”他甚至推论,那看不见的母亲也是没有的,是为了某种需要而想出来的。他们两个都害怕,一个是完全悲观失望,等待毁灭,另一个保持着对母亲的信赖,但也不知道出生究竟是怎么一回事。

时间到了,他们两个一边哭,一边来到光亮的世界里。当他们发现自己已经出生,第一次睁开眼睛的时候,他们发现他们是在母亲慈爱和温暖的怀抱里。此中的美好决不是他们原先所能领会的。

这故事要告诉我们的是:在上帝手里,死与生是一个事物的两面。在个人生活和人类历史的长河里,对生命的一个阶段的死别正是对生命的另一个阶段的进入。

什么是神的最重要最根本的属性?是他的爱,在基督身上看到的那种爱,在痛苦和十字架面前也不回头的那种爱,使他为他的朋友舍命的那种爱。神的公义也还是神的爱。爱要是普及到广大人群,就成为公义。就是这个爱进入了世间。爱不是来毁灭,而是来托住,来医治,来教育,来救赎,来赐予生命。

“妇人生产的时候就忧愁,因为她的时候到了;既生了孩子,就不再纪念那苦楚,因为欢喜世上生了一个人”(约 16:21)。从耶稣

这个话里,我们听得出来,他的心是多么向着世上的人。上帝也正是这样。先知何西阿告诉我们,上帝引领我们所用的是慈绳爱索。他放松戴在我们口上的嚼环,他弯下腰来喂养我们。上帝是爱,他是那居于整个宇宙、整个现实中心的那位爱者。基督的这一启示超过和纠正了人们关于上帝所能说的一切。爱为我们寻求至善。一切的善至终不会失落,它们将得到成全和提高,直到那行将来临的、以爱为其原则的境界。当我们说上帝是主宰的时候,所意味的就是这个。

死只是生命的一个阶段的終了,但不是生命本身的終了。死是长入生命的另一阶段,更接近神,更能沐浴在神的恩典和光明之中,对神的认识和挚爱更能日益增长。

再说到我的母亲,她是死了,但她又没有死。她还在长进中,还在为我祈祷着。我仍旧可以说,她是全世界最热切为我祷告的人。在那里还有许多其他爱我们的圣徒,正在用祈祷托住我们。

这都由于上帝是爱,由于基督为我们死了,由于基督胜过了死,是复活的基督,以他权能的命令托住万有。

这一规律——通过死亡到生命,在死中得到生,在软弱中得到力量——不但存在于个人生活中,也存在于国家和教会的历程中。只要温习一下我们匈牙利和中国这两个国家和我们两国的教会的历程就清楚了。我的同工沈以藩牧师将向你们报告中国和中国教会的情况。你们会同意,我们两国和两国教会共同的强音不是灰心,不是失望,不是消沉,而是希望和喜乐,是感谢和信靠。

上帝是爱,这是宇宙中一切事实中最主要的事实。上帝既然是爱,我们就能安然,甚至死也为难不了我们。我们对什么也不必发愁。我们能积极投身社会变革的行动,在历史前进运动中起应起的作用,因为有主的爱随时陪伴着我们。

我们此来是把中国基督徒的问候带给你们,就我们彼此在基督里领受的信息互相分享,把更多更大的荣耀归于我们共同侍奉的上帝,惟有他配得到一切荣耀。

新德里国际宗教自由会议上的讲稿

(一九八七年三月)

我是以高兴和感谢的心情接到参加这一会议的邀请的。这几天的会议更使我从更多方面来认识宗教自由这一复杂问题。

宗教自由不但是世界各国宗教信徒所关心的切身权利,也是让人们看到人民在任何社会享有自由的程度的一个窗户,因此为一切关心人民权益和历史进步的人们所注视。国际宗教自由协会把宗教自由看为人类尊严应有之义,为保障宗教自由作出贡献,对这一崇高工作,我们中国人民深为钦佩。

我愿意先介绍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宗教自由问题,然后就中国经验提出几点体会。

以汉族为主的中华民族几千年来的一个特殊点是对宗教比较淡薄。关于宇宙起源的神话,中国与许多其他文明古国不同,不归功于神灵的创造,却渲染一位并非神灵的凡人盘古氏对先已存在的原始物质用工具予以加工,此人后来还寿终而死。只要同其他文化的神话作个比较,我们就看到中国的传说有强烈的自然主义和人本主义的色彩。后来女娲看到苍天有了破绽,可不是束手求神,而是炼石补天。关于人类文化的起源,中国民间没有像普罗米修斯为人类上天偷取神火的故事,讲的倒是几位钻木取火,构木为巢,倡导畜牧,造耒以兴农耕,尝百草而定医药的伟人。中国是孔夫子的故乡,在他和他的学生的教导下,中国两千多年来是一个重道德人伦而不重宗教的国家。他说:“未能事人,焉能事鬼?”“未知

生,焉知死?”他主张“敬鬼神而远之”。这样,中华民族在宗教方面建树不多,除了道教是土生土长的宗教以外,其他主要宗教都是外来的。中国绝少宗教狂热现象,历史上没有发生过宗教战争。在中世纪的欧洲曾有一位君王某晚不得不赤足跑去跪求教皇的宽恕,不能想象中国发生类似的事,因为中国的神权从来不足以同政权分庭抗礼,更不用说凌驾于政权之上了。有神无神的讨论是有的,但没有哪一位学者因他主张无神而遭到罢官或其他打击。范缜著名的无神论作品《神灭论》还是他的佛教论敌为他保存到后世的。由此可见,在宗教信仰上,西方所说的“自己活也让别人活”,在中国是个长期传统。

这倒不是说,宗教的命运是始终平稳的。在中华人民共和国三十七年历史中也并不是风平浪静的。

在“文化大革命”时期——其实这是一个“大革文化之命”的时期——政党、政府和学校当局都被夺了权,“四人帮”所颁布的宪法是这样提到宗教自由问题的: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有信仰宗教的自由,也有不信宗教和宣传无神论的自由。”

那个宪法是极左分子强加于中国人民的。它光说有宣传无神论的自由,不说有宣传宗教的自由。事实上,在“文化大革命”时期,不仅传教的自由被剥夺了,连崇拜的自由也被剥夺了。按照当时上海一位“文革”领袖的说法,所谓宗教信仰自由仅仅是人们头脑里可以相信有个上帝的自由。当时全国除少数民族地区外,几乎没有一所庙宇或教堂是开着的。

“文革”以后,恢复了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在宪法修改委员会主持下,经过党内党外、教内教外各界有识人士的共同努力,又经过四个月的全民讨论,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现行宪法,其中关于宗

教的条款是这样说的：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有宗教信仰自由。

“任何国家机关、社会团体和个人不得强制公民信仰或者不信仰宗教，不得歧视信仰宗教的公民和不信仰宗教的公民。

“国家保护正常的宗教活动，任何人不得利用宗教进行破坏社会秩序、损害公民身体健康、妨碍国家教育制度的活动。宗教团体和宗教事务不受外国势力的支配。”

我们看到，条款不但详细得多，而且更符合了人类宗教信仰自由的普遍原则。

不但宣传无神论的自由不提了，连不信教的自由也不提了。当然，这并不意味公民没有不信教的自由，或者没有宣传无神论的自由。宗教信仰自由当然包括不信的自由和宣传无神论的自由。没有了这两个自由，还算什么宗教自由呢？问题在于有没有说的必要。今天，中国全国人民要团结起来，一同努力使祖国繁荣，信教的人也在其内。宪法应当避免说任何刺激信教公民的感情的话。

条文明文规定不得有宗教歧视，这是新加的，过去从来没有的。这里所说的是，在国家面前，信教的人和不信教的人是平等的，信各个宗教的人也是平等的，没有一个国家宗教、官方宗教或官办宗教，哪个宗教也不享特权，哪个宗教也不处于特别不利的地位。

条文规定，中国的宗教应由中国人自办，不得由外国支配。这是总结了十九世纪以来的历史经验教训，是对中国天主教、基督教独立自主、自办教会，实行自治、自养、自传的支持。值得指出，这里说的是，不得由外国支配，这决不应当被曲解为禁止正常的国际联系。我国各教同海外宗教界的国际交往——平等的，不存在谁

支配谁的问题的交往,现在多得很。

除了宪法的这些规定外,中国刑法第一百四十七条规定,“国家工作人员非法剥夺公民的正当的宗教信仰自由和侵犯少数民族风俗习惯,情节严重的,处二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有了这么一条,任何人在对待宗教问题上随意而行就受到很大的抑制。

除了宪法和刑法,中共中央就宗教问题给全国党员多次发出指示,苦口婆心地指出,必须按照团结原则,即统一战线的原则看待宗教问题。指示强调,信不信教是“人民内部”的问题,不是“敌我矛盾”。有一个文件说:“使全体信教和不信教的群众联合起来,把他们的意志和力量集中到建设现代化的社会主义强国这个共同目标上来,这是我们贯彻执行宗教信仰上的自由政策,处理一切宗教问题的根本出发点和落脚点。”“信教群众与不信教群众在思想信仰上的这种差异,是比较次要的差异。”值得注意,这里说的是“差异”,连“矛盾”也没有说,而且是“比较次要的差异”。我不相信我们有神甫或牧师愿意这么说的,但中国共产党是这么说了的。

在宪法、法律和中共中央文件的指导下,中国这些年来在宗教工作方面大力克服“文化大革命”的极左路线,恢复大量寺庙和教堂。以基督教面论,一九七九年以来,教堂恢复和新建的已在四千所以上,现在正在以一天一所的速度增加,此外还有数以万计的其他聚会点,不少是在家庭里。基督教办有十所神学院校,约有五百多名青年在接受教育,准备担任教牧工作。我们出版多种刊物,还出版书籍。我们在国内印刷《圣经》,一九八一年以来已经出版了两百万本以上。

在中国,无神论基本上是属于社会科学界,特别是哲学界、历史学界理论探讨的问题。中国没有一份向群众进行反宗教宣传的刊物,也没有一个反有神论的组织。信与不信之间的基本状态

是“自己活也让别人活”。为了保证团结，中国有一个久经考验的公式，叫做“求同存异”。在中国，我们天天讲“求同存异”这一原则。这一原则被应用在宗教内部、宗教之间、民族之间、信教的与不信教的之间、各党派之间、各阶层人们之间。这是求得和平进步的重要原则。

中国地域广阔，人们的水平参差不齐，各地贯彻宗教信仰自由政策不甚平衡，有些地区向我们反映的问题较多，因此，在落实宗教政策方面，我们不应满足，我们还有大量工作要做，但以全国而论，应该说，宗教享受着相当充分的自由。这倒不是因为中国共产党和革命者对宗教本身有高的评价，他们的出发点是团结全民来从事祖国的建设，而为了团结，就得尊重各式少数派的特点，包括宗教信仰。

中国广大基督徒爱护自己的国家，支持人民政府，积极为四化建设服务，但是这并不意味在教会信仰生活和工作上放弃自己的独立原则。中国严格遵守政教分离原则，宗教信仰被认为是私人的事。政府在宗教方面的职责主要在于正确落实宗教信仰自由政策，保护各宗教合法权益，凡教会本身事务，一律由教会自行决定，政府不作干预；要来干预的话，教会也是不会许可的。因此，由于中国信徒拥护社会主义新中国而把我们的教会说成是什么“官办教会”云云，是对实情的歪曲，丝毫无助于增进了解。

除了基督教，中国还有信徒众多的佛教，土生土长的道教，信徒分属十个少数民族的伊斯兰教，和同基督教一样自西方传人的天主教。这些宗教享受信仰自由的情况和基督教大致相同。

中国宗教信仰自由大体情况就介绍这些。

根据中国三十多年经验，我想说说下列几点体会，也许对宗教自由这一全球问题有些参考价值。

(一)宗教信仰自由是个法律问题,但不仅是法律问题;它是个人权问题,但不仅是人权问题。我们在护卫宗教自由的同时,也应当问一问,我们为之争取自由的那个宗教的领导人,将使用自由做些什么?做了后对宗教本身和对国家、社会会有什么后果?归根结底,一个宗教在一个特定社会里能享有多大的自由,还得看这个宗教在广大人民心目中的形象,而这个形象最终又决定于这个宗教的实际表现,即拿了自由实际上做些什么?例如:在日军侵华期间,有的基督教牧师讲道的时候说什么日军的侵略是上帝安排,因为中国人犯了罪,上帝要惩罚。当时,教外爱国心切的人们就听不进,反问:难道日本人不犯罪?上帝不要惩罚他们?上帝为什么不安排中国军队去占领日本?解放战争时期,基督教中外领袖中不少人对人民解放运动毫不同情,他们拥护国民党剿灭共产党;他们认为中国完全让美国占领亦无不可。当解放军行将横渡长江的时候,他们祈求上帝使百万解放军沉死在江中。这是多么残暴、多么没有人性的祷告。但是很多基督徒当时也不觉得这在政治上、神学上有什么不妥。其中有些人在解放之后仍旧敌视人民的国家。这些事都使国内许多人想起,这一基督教本来是一“洋教”,是靠着不平等条约进来的,靠着治外法权把中国人民压服的。在考虑给予这样一个基督教以宗教自由的时候,仅仅从抽象的人权和法律条文的角度来考虑,人们,特别是翻了身的、当家做主的人民,能通得过、能甘心乐意吗?人们会问,我们为什么要给代表这样一个敌视人民的基督教的人以自由呢?

我们注意到,在西方国家,基督教所起的是把信徒凝聚在社会里的作用,可是它传到中国,它所起的是使信徒同自己的国家疏远和分离的作用。

过去一些年间,海外有些人不谈梵蒂冈要求中国天主教主教

和神甫把天主教办成一个什么样子,不谈这一分裂中国人民也分裂中国天主教徒的“天主教”放在中国环境中是否合适,却一味从法律和人权的抽象角度来渲染有些主教和神甫失去自由这件事。应当看到,他们不仅是天主教的主教和神甫,他们还是一系列反对新中国人民政府的指示的坚决执行者,这些指示来自当时可能相信美国和国民党不久即将回到大陆的梵蒂冈。按照这些指示,天主教必须同新中国和革命者闹对抗,连《人民日报》都不准看,儿童连红领巾也不准系,才算好教徒。他们藉着所握有的神权,使中国人放弃爱国主义立场,走上敌视祖国的死胡同,为此他们得罪了广大中国人民,他们的自由被剥夺了。他们是梵蒂冈当时反华路线上的牺牲品。有人认为在教会有一定身份的人就应享有免受刑事处分的特权,他们应有为所欲为的无限自由,国家和法律对他们应当束手无策,否则就是“不自由”,外国就有权干预。这不是我们的自由观,也不是我们的宗教自由观,更不是我们的国家主权观。人们对许多其他国家都不是这么要求的。

总之,宗教信仰自由问题在有些情况上不是纯粹的宗教信仰自由问题,它可能是构成破坏广大人民享受新生活的自由的问题。从国家来说,不能因为某人某事是宗教方面的或涉及宗教的,就认为必然只是宗教问题,只是人权问题和法律问题,而把其政治性质和政治后果置诸脑后。

今天教会在中国存在,不再依靠外国政治、军事、经济力量的优势,唯有靠信徒用生活和言词见证福音本身所具有的吸引世人的信息和“得众民的喜爱”。我们三十多年来推进自治、自养、自传的三自运动,独立自主,自办教会,摆脱洋教形象,使之成为中国信徒所自办,其结果就是使我们在人们的同情而不是在人们的非议下享受自由,这样就大大有利于福音的广传。把基督放在首位就

该如此,这决不是什么“把国家放在基督之上”。我国基督教信徒三十六年间从七十万增加到三四百万,三自是一重要原因。

(二)如果一个宗教团体放弃或失掉它在昔日政权下享有的某些特权,这不能一概视作被剥夺了宗教信仰自由。

二十世纪是历史和社会急剧变化的时期,有些势力失去了统治权,有些势力得到了统治权。在好些国家,宗教处在全新的环境里。这些宗教在保持其信仰的完整性的同时,愿意尊重精神方面新的所见,使自己同时代合拍,从而作出好的见证来,这是很自然的。

在中国土改时期,佛教庙宇所拥有的超过一定面积的土地也按照土地法规归给无地的农民。基督教没有多少土地,但不平等条约保护下的治外法权让早期外国传教士,甚至中国信徒,享有不归中国法庭审判的特权。我们靠了西方列强的政治经济优势,藐视其他宗教,甚至在佛教节日直接进入庙宇讲传耶稣,攻击佛教。

如果失去这些特权也被理解为失去宗教信仰自由,那么,宗教信仰自由成了保护少数人的特权的工具,我们就不能谈宗教自由的神圣性了。事实是,放弃这些特权只能提高有关宗教的道德素质和威望,赢得人们的好感和善意。

解放以来三十七年间,中国基督徒更清楚地看到,教会在其软弱之中显出力量,在无权之中显出权威,正像基督只有经过受害、死亡和坟墓才彰显复活的生命。当日我们几千名外国传教士,许多大学、中学、小学、医院等等,可是我们难以利用宗教自由去引人归主。只有在今天,没有外国传教士,不办学校和医院,我们却能好好地使用宗教信仰自由来作出见证和建立基督的身体。用《旧约》一位先知的话来说:不是倚靠势力,不是倚靠才能,乃是倚靠耶和华的灵方能成事(亚 4:6)。

请允许我说明,我这里说的,是中国大陆宗教的经历。至于香港,中英已经有了协定,一九九七年香港回归祖国之后,实行“一国两制”,香港各教目前所享有的权益将继续享有,绝不会有放弃或失掉的问题。

(三)从对宗教自由的尊重与否来说,执政者信教或不信教,信这个教或信那个教,并非决定因素。

这三十多年来,我们在中国遇到很多自己不信宗教的无神论者尽心极力保护宗教自由,全力以赴地落实宗教信仰自由政策。他们的出发点是为人民服务,让信徒满意,从而团结信教公民于祖国大家庭之内。我们也看到有的宗教信徒,对他人的宗教信仰自由不够尊重,甚至一心“以我为主”,想化掉他人。

今天海外有一些人出于反共感情,总喜欢在共产党人是无神主义者这一点上大做文章。是的,到今天为止,对共产党人的大多数来说,上帝似乎没有给我们语言的能力,向他们作出有效的见证。在我看来这是一个奥秘,我们只能等待。但是,尽管如此,在我们的国家生活中,有神无神是个人信仰问题,是私事;执行宗教自由政策是政治问题,是公事。国家工作人员当然是按国家政策办事,不许可因本人信不信教或信某个教而影响他的工作,这是常识。我们基督教同不信基督教的人和无神主义者和平相处,合作共事,有两千年的历史经验,对他们的存在原不必大惊小怪。

对于国家和执政者,我们原就不该期待他们会对宗教有多少恩施,只要他们尊重公民信仰自由,不压迫宗教,对各教平等对待,顾到各教合法权益,就可以了。如果有执政者标榜自己是多么虔诚,多么高举十字架,给宗教许以多么多的愿,那倒是值得我们警惕的了。

(四)宗教自由不是一部分人分给另一部分人的赐予,它不是

坐等就能享受到的。它的实现和发展是基于实践,包括信教的人们的努力。这后者是重要的,因为只有我们信教的人才最有那种敏感,知道尊重和不尊重宗教信仰的界线。像中国现行宪法的制订,各教信徒是参与了的,而在其宗教条款的制订过程中,各教信徒更是起了积极作用的,结果得到了令人满意的措辞。

为了使宪法所赋予的宗教信仰自由权利得到更充分的实现,中国宗教界和政府处理宗教问题的部门还有大量工作要做。以我们基督教界来说,我们一方面要把教会建设好,使之既为信徒所热爱,又得到周围人们的善意,认为配于享受自由;另一方面要不断同政府和企业事业的有关单位协商,使它们正确对待宗教,使宗教合法权益得到维护。

我们发现,帮助社会科学理论工作者在研究宗教的时候考虑到更多方面,特别是考虑到今天中国宗教实际情况,使他们的结论更加植根于实际,这对宗教信仰自由政策的制定和理解大有裨益。近几年中国社会科学界普遍强调,马克思主义不是教条,不应仅仅背诵语录,它提供的是解决问题的立场、观点、方法,应当实事求是,从实际出发研究问题,有所创新,丰富人类对真理的认识,使结论更符合客观情况。这对我们也是一个呼召,试举一例:现在中国越来越多的社会科学家在研究宗教问题的时候并不把自己的视野局限在鸦片这一事物范围之内,似乎“鸦片”二字穷了宗教的究竟。他们认为,鸦片不过是宗教所起的作用,不足为宗教的定义,而且不过是作用之一,不是唯一作用,也不是一切情况下所起的主要作用。他们发现,中国许多虔信宗教的人还被群众选为先进生产者 and 劳动模范呢。他们发现,宗教伦理能帮助信徒为国家社会的安定团结和社会主义建设作出贡献。这种实事求是的研究,不拘泥于本本概念,在对宗教的理论研究上能有所突破,我们深为欢迎。

理论界在宗教问题上的这一发展正在召唤中国宗教界知识分子看到自己在宗教的社会科学研究方面作出贡献的责任和可能,并且已经开始参与进去。这也就是参与了宗教信仰自由政策的研究、制定、落实的全过程。

来参加这个会议是建立友谊和增长知识的好机会,请让我再次表示由衷的谢忱,也感谢大家对中国的兴趣和关心。

在维多利亚大学授予荣 誉学位典礼上的演讲

(一九八九年五月于加拿大多伦多)

首先,我代表我的夫人郭秀梅和我自己感谢维多利亚大学用同时授予我们两人荣誉学位所表示的友好情谊。加拿大是我们两人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后不久离开中国到达的第一个国家,为了来参与加拿大基督教学生运动组织的工作。许多年来事实说明,当时建立的友谊是牢固的。这种友谊我们两人视为珍贵。

在中华人民共和国一九四九年宣告成立之前,中国不少教会领袖曾给不为人民欢迎的政权做了一些捧场的事。我想你们不难想象,一九四九年以后,教会得改变方向,使自己在人民面前站得住脚。中国教会要除掉自己的西方形象,把自己从老的、无可羡慕的地位变换到一个新的、比较能为人们了解的地位,那是多么巨大的一项工程。我很高兴我能够说,好些在中国知名的加拿大基督教徒,当时采取的立场对我们是很大的支持。我也高兴地看到,在“文革”十年的隔绝之后,我们两国教会的良好关系正在进一步发展。我特别要提到,维多利亚大学以马内利学院是四十年来海外第一所帮助我们培养神学师资的学校,现在世界各国有好几所其他神学院也这样做。今晚,在这里,你们所做的将使我们两人进一步加深同这所大学的关系,同时也是进一步加深中国同加拿大两国教会和人民的关系,为此,我要再次感谢你们。

在中国也常有毕业典礼。不少讲员每每喜欢引用中国的一句老话“十年树木,百年树人”以说明学习是个很长的生长过程,接受

一张文凭不过是学习生涯中一个新阶段的开端。

《圣经》用许多方式来说明上帝和人的关系。以色列人的畜牧背景,使他们特别喜欢把上帝比作牧者,把人比作羊群。所以我们有“耶和华是我的牧者,我必不至缺乏”(诗 23:1),基督是“上帝的羔羊,除去世人罪孽的”(约 1:29)这样的经句。其他民族的基督徒也接受了这牧养的形象,它已经进入了我们共同的灵性财富之中。但是,就农业国家的人们来说,《圣经》里讲到神人关系的另一类比喻大概更觉亲切,那就是把上帝说成为播种者、耕耘者、培植者,把人们比作植物、树木、麦子、葡萄、花卉。在福音书里,我们读到那些去播种的人,读到埋入地里又生出许多子粒来的那种子,读到生长成树的那小小的芥菜种。在牧羊人和羊群的关系里,牧羊人用杖竿来防止群羊走错方向。牧羊人不得不用命令、叱责甚至杖杆,来管教群羊。所要求于群羊的是听从,是顺服,是接受吩咐。可是这些并不是人类所能达到的最高德行。在农业方面,那种植者不用杖竿。他做了该做的一切之后,就等待大自然的作为。那植物从土地、空气、阳光吸取营养,就生长起来。一棵树得经过十几年才能成材,人就得更长,难以加快。种植者的形象和牧羊人的形象不同。牧羊人忙于指挥,一直在纠正羊群的偏差,而种植者知道等候的重要,在不该做什么的时候就什么也不做。

法国语言学家兼历史学家安德列·郝德立克特就“东方的花园”和“地中海的兽槽”作一对比,我深感兴趣,尽管我觉得他的对比太强烈了,他把一方讲得太美了。他认为把人像树木花卉那样来栽培,那是中国文化;而畜牧式的,像牧羊人对付羊群那样对付人,是西方的和犹太教、基督教的传统。我不想说一个是中国或东方,一个是西方,但这的确是两种不同的传统。养驯动物得用棍棒和叱责,而对待植物、花卉、树木,我们得用耐心,惟一可做的是帮

助自然而不是干扰自然。

也许你觉得这里有些道教的味道。可是这不是教导我们懒惰、被动、无所作为。这不过表明,上帝出于他的爱和他的耐心,出于他对人的尊重,宁愿限制他自己的权能,避免把他自己的意志强加于人。他开垦、培植、看顾,等待庄稼充分长入基督的丰盛。

对于人们的成长,我们基督徒最关心的是人们对超越的追求,就是企望超过可见、可闻、可尝、可摸的一切。全世界全人类都不满足于停留在现状上,都渴望超越那有限的,达到那更高、更深的、无限的境况。整个宇宙和一切受造之物都在叹息劳苦,切望等候得到上帝儿女的荣耀。

这些年间,没有海外宗教组织的支持,中国基督教人数大有增长,这怎样解释?中国人民享受相当的宗教信仰自由是一个不容忽视的因素,但另一重要因素是革命动摇了长期束缚广大人民灵魂的封建权威,解放了人们的头脑,燃起了他们对旧境况的不满和对超越的向往和寻求。被接受了几千年的价值观念遇到了挑战。这一心态使很多人愿意认为基督福音至少值得一听,尤其因为传讲这一信息的教会今天是自治、自养、自传的。一个把超越视为上帝特征的宗教,对那些具有解放意识的人们来说,不能没有它的吸引力。

有些基督徒认为,我们得强调上帝内在于历史,认为这观点符合社会进步,而多讲上帝的超越,似乎会叫人忽视他们在世界上的责任。依我所见,事情未必是如此。我们看到西方的和东方的法西斯人物都曾热衷于宣讲神明内在于历史的意识形态,化身而为他们的政权。同时我们也看到,那超越的上帝把人们从无所作为中唤起,使他们如饥似渴地寻求生命的新素质,感动他们抬头远望,获得勇气向上攀登。这是真正的成长。

在维多利亚大学授予荣誉学位典礼上的演讲

今晚,在这里,我们看到一批神学同学完成学业而毕业。在这时代,我们可能对许多问题感到没有把握,但有一件事我们可以肯定:人们不会长期满足于他们的日常生活,人们有一个无法压制的超越的要求,要突破限制和障碍,把单调的生活变成多层次的。“主,……我们的心如不安息在你怀中,便不会安宁。”这不但是奥古斯丁的祷告,这也是历代生活在一切社会制度里的人们的呼求。正是这一事实,使神学生不是多余的,而是为加强教会,使之能把人们带到超越之神的面前所必需的。在你们完成大学这一重要阶段的时候,我们祝贺你们,愿你们继续成长,攀登高峰。

保护上帝的创造

(一九九〇年一月在莫斯科环境与发展全球论坛的讲话)

我是宗教信徒,来自中国。在中国十一亿人口中,有佛教徒、伊斯兰教徒、道教徒和基督教徒。在基督教徒中,既有天主教信徒,又有新教信徒。我们的宗教信仰各各相异,但是,谈到环境和发展的问题,我们都认为,那是一个同人类在地球上继续生存密切相关的重要问题。

我们基督徒肯定,宇宙和其中一切都是上帝的创造。这一肯定意味着受造的世界是好的,是神圣的,世界不是任何恶者的占领区。创造的工作还在继续进行,它将最后克服原始的混乱和人们对创造的罪恶破坏,把自然历史和人类历史带到这样一个境地,在那里爱心、正义、理智的统治将得到普及。基督教讲道成肉身,讲救赎,也足以反映人的可贵。我们可否这样来看宗教的任务:把人们从创造的破坏者转化而为上帝创造的协同者?中国古代传说,有个叫女娲的英雄,据说是一位女性,当她发现天的一角要坍塌下来的时候,她搬来五彩的石头,把天撑住。

可是我们今天所看到的不是那样,人们正在做那么许多事情去糟蹋、破坏自然。据统计,每一年,我们的地球上有一千七百多万英亩的树林被毁掉。要是继续三十年,这面积将有整个印度那么大。每年还有一千四百多万英亩的良田沦为沙漠。由于人类燃烧大量的煤炭、柴油、汽油,大气中二氧化碳日益增加,全球气温升高;如果这一“温室效应”听其继续,到二十一世纪中,适合于生长

农作物的地面将发生大的转移,南北两极的冰块融化将提高海洋的水位,造成一些城市淹水。工业气体将进一步损害保护着地球的臭氧层,太阳红外线辐射的增强将导致人类和动物更多的癌变。

凡此种种,都不是地球不治之症。现代科学可以处理这些问题。当代人类所需要的,是一种看到整个地球环境的眼光。

我们各宗教信仰徒要呼吁:救救自然,救救地球,救救我们的空气和我们的流水。上帝的创造只许美化,不准糟蹋。

为了保卫我们的环境,我们要同目标一致的人团结起来。在任何地方,有信宗教的,也有不信宗教的,有信这个宗教的,有信那个宗教的,我们在信仰上大可各信各的,彼此尊重。而对一切从事改善环境和发展经济的,我们只有欢迎、感谢、支持、合作,决不当疏远、排斥。这种精神我们在中国只用四个字就可以表达,就是“求同存异”。四十年来的经验告诉我们,任何时候按这原则去办,人们就团结,事情就成功。

我特别要对发达国家发出呼吁:二十世纪中叶,人类第一次能从宇宙空间遥望地球,所看到的是一整个地球。治理地球的工程早已超越一个工厂、一个地区、一个国家,只能凭全球的观点去进行。今天世界上存在着一个很不公道的事实:大量的污染来自工业化的发达国家,而许多发展中国家却承受着大量祸害。就以中国来说,她不过在最近几十年才获得条件,谋求在农业、工业、文化方面有所发展,好满足人民的基本需要。可是,中国得为保护环境和净化环境转移她相当大的一部分有限的资源。其他第三世界国家一定也面临着相同的环境和发展的矛盾。据知,拉丁美洲有些国家,被西方国家的债务所迫,本来可以用在开发上的许多自然资源不得不用以还债。好些发展中国家人民的年平均收入同十年前

相比不是增加而是降低了。我希望，发达国家在面临这全球性危机的时候，从道义责任也从自身利益出发，考虑如何负起它们应负的责任。

据我所知，各教都有一些这样的信徒，他们认为只应关心天上的事，他们认为，关心地球上人们的祸福，就是喜爱不甚高超或不甚属灵的事、是不好的。宗教关心人们死亡之后的事是正当的，但是，我多么愿意他们理解，宗教关心人们出生之后的事也是正当的。用枪炮杀人是明显的，但是乱砍树木污染空气，造成地球升温等等，也都是杀人，不过不那么显然而已。忽视生态平衡实在就是毁坏上帝的创造，无形之中让无数无辜的人们遭到杀害。自然界正在受苦叹息，我想，今天人们对环境问题的重视正是上帝对这一哀痛的顾惜和回音。让我们共同希望和祈求一个爱的、和谐的、美好的世界的来临。

中国基督徒怎样看待《圣经》

(一九九〇年十一月在美国宗教学会和
圣经学会联合年会上的演讲)

我觉得很荣幸,也觉得责任重大,来向你们作演讲。向你们这许多《圣经》学者讲《圣经》问题,像是把煤送到英国的煤都纽卡斯尔。不过我最近听说,纽卡斯尔的人们现在已经不再在那儿挖煤,因为他们发现,把煤从中国运去更便宜。

要我谈谈中国基督徒怎样看待《圣经》,尽管我讲的都是关于中国基督教新教,我希望在座的犹太教学者和伊斯兰教学者也能从中感受到中国的宗教气息。

我得先说,中国基督徒大多有《圣经》,爱《圣经》,也研究《圣经》。《圣经》在中国基督徒的心灵和生活中占据重要的地位。在“文革”时期大量《圣经》被“红卫兵”抄去之后更是如此。在我们南京神学院的图书馆里,就有两本当时手抄的全本《新约圣经》,一本来自汕头,一本来自温州。就广大信徒来说,是近几年由于中国基督教协会和中国基督教三自爱国运动委员会重新印刷出版大量《圣经》,他们才又能人手一本。

若干历史的和神学的事实,对中国基督徒的《圣经》观起着重大影响,我愿意向各位提及的是:

(一)中国是孔子的故乡,两千五百年来,以他为代表的人本的、伦理的文化传统,对宗教始终抱宽容的态度,但宗教却又从来不被认为有多大的重要意义。最近几十年更是如此。

(二)中国过去是一个西方的传教区。西方传教工作着重于推

广,不大注重把教会作为基督的身体来建立。来华传教的传教士信仰上较多倾向于基要派,以致今天中国教会里福音派和基要派影响相当大。

(三)前若干年间,中国教会同世界其他教会的接触交流中断了。这种隔离状态至今还未全被克服。

(四)中国基督教新教在教会结构上已经结束了宗派林立状态。中国基督教协会包含着极为广泛的团结,为此我们深为感谢上帝,但与此同时,为了不致妨碍这一团结,神学上的创造性有时也难免作出一定的牺牲。

(五)“文革”以来,全国批判用教条主义去对待马克思主义的做法,在社会科学方面,在研究宗教的学者中间,把卡尔·马克思一句话或几句话作为出发点这一一度时兴的方法已经不再时兴,代之而起的是调查研究我国社会实际存在着的宗教,并作出结论。把宗教简单地等同于鸦片(这两个字在中国使人想到许多不愉快的历史事件),已经被认为很肤浅。越来越多的学者承认,鸦片不足为宗教的定义,也承认中国的宗教在相当程度上能同社会主义相协调。

这些事实说明,我们虽然背负着一些历史包袱,但中国基督徒对《圣经》的认识并非一成不变。中国教会摆脱西方教会的桎梏,并面对中国新的现实,使我们在神学观点上非作出某些调整不可。这对中国基督徒如何对待《圣经》是有影响的。

刚才我说基要派在中国基督教会有较大影响,但是如果我们回顾过去四十年,中国基要派同工也有很大变化。这一变化首先表现在,他们强调《圣经》是一本敞开的书,要求基督徒不断从中获取新的领受。他们时常讲到“新的亮光”以及“每天要拾取新鲜的吗哪”。我有一位同工根据《启示录》第5章关于被杀的羔羊展开

那被封严了的书卷,来说明《圣经》不是封闭的书卷,那被杀的羔羊今天还在为中国信徒展开这本圣书。他们认为《圣经》存储着无穷的涵义,供后代去开发。这是极好的观点,同法国释经学家保罗·利科的下列理论相当一致:“一段经文的历程超过原作者有限的视野,它今天的意义比原作者当时想说的更为重要”;“使过去异己的素材为自己所掌握,这是解经学的最高目的。”这样对待《圣经》必然使基督徒向新的光照开放,同时又尊重《圣经》的权威和圣灵对原作者的感动。这一《圣经》观也意味具有不同神学见解的基督徒之间能够互相尊重并合作交流。这就为中国教会提供了一个广泛团结的基础。

人们尊重整本《圣经》的权威,但就每个基督徒个人或就每个基督徒团契来说,实际上总是《圣经》中的某些部分在起着比其他部分更大的作用,而这些起着较大作用的部分又是随着信徒内在的长进和环境的变迁而在不断发生或大或小的变化。我愿向各位介绍四个“经文库”,或四种类型的经文,它们是四十年来,特别是十年来,中国基督徒经常引用、背诵或在讲道时予以发挥的。为了减少我的主观任意性,我的选择在较大程度上是根据《金陵神学志》和《天风》两个刊物上的文章。

我首先注意到的是《圣经》中那些讲到从苦难中得蒙拯救,因而感谢上帝,以及表达在软弱之中藏有力量的那些章节。如果我们想到在极左势力下中国基督徒作为个人也作为教会所受的苦楚,这是不难理解的。在那“文革”的十年中,宗教领袖同上层政治人物和知识分子被放在一起,都成了“走资本主义道路”的。这些人被认为是社会上多余的人,受到批判和斗争。当时基督教的所有教堂都被关闭,基督徒所能做的不过是少数几个人静静地在家中聚会。他们不能理解上帝为什么要让事情发展到这样的地步。

他们感到难受,不知道基督教在中国是不是像唐、元、明、清之际那样又到了消灭的时候。他们凭记忆回想基督自己的话,并从中得到安慰,特别是他所说的:“人若因我辱骂你们,逼迫你们,捏造各样坏话毁谤你们,你们就有福了。应当欢喜快乐,因为你们在天上的赏赐是大的。在你们以前的先知,人也是这样逼迫他们”(太 5:11、12)。

但是“文革”到底结束了,我们进入了一个落实宗教信仰自由政策的时期。我们很是感到释放,以致觉得《诗篇》第 23 篇最能道出我们的经验和感受。“文革”后不久,中国基督教全国的领导同工开了一个会。那次聚会时,大家没有说一句关于自己如何受苦的话,而是立即探讨今后中国基督教该怎么办,并起草、发出一份《告全国主内弟兄姊妹书》,其主题就是《诗篇》第 23 篇,特别引用了第 4 节:“我虽然行过死荫的幽谷,也不怕遭害,因为你与我同在;你的杖,你的竿,都安慰我。”这些年来,这段经文一直在中国信徒中被引用、传讲,藉以互相安慰、互相鼓励。

引用的这一类经文既不是歌颂痛苦,也不表示敌视世界。引用这些经文反映了基督徒坚持信仰,为上帝的临在和慈爱而表达感谢。这类经文时常与一些表明上帝的大爱和正义最后必胜的经文一起被引用,例如《以赛亚书》第 42 章第 3、4 节的话:“压伤的芦苇,他不折断;将残的灯火,他不吹灭。他凭真实将公理传开。他不灰心,也不丧胆,直到他在地上设立公理。”又例如《哥林多后书》第 4 章第 8 至 11 节,那儿说:“我们四面受敌,却不被困住;心里作难,却不至失望;遭逼迫,却不被丢弃;打倒了,却不至死亡。身上常带着耶稣的死,使耶稣的生,也显明在我们身上。因为我们这活着的人,是常为耶稣被交于死地,使耶稣的生,在我们这必死的身上显明出来。”

我的同工汪维藩就《罗马书》第9章第21节写了一篇题为《窑匠有权按己意把一团泥做成什么》的灵修小品，他是这样说的：

“主是窑匠，我是泥土。窑匠如何转轮作器皿，我们也如此在他手中。

“我们可能报废无用，但他的深恩永不我弃。他将踩动转轮，重新再作。他看怎样为好，他有权如何作我。

“他有权使我们成为贵重的器皿，也有权使我成为卑微。然而，只要能够为他所用，我心已足……”

“他是我主，我岂能看窑匠如泥？我岂能向他深藏谋略？因我不过是受造之物，他乃造我之主！”（《野地里的百合花》第55篇）。

老子，中国一位和孔子齐名的智者对在软弱中显出力量的道理作过很确切的说明。他说水是万物中最无力的，但水能胜过最强的东西；水似乎不是实物，但水能在没有缝隙的地方渗透进去。老子以此说明强和弱的辩证关系。

回顾往事，我们要感谢上帝，让我们在软弱无力之中有机会同中国人民一起受苦，一起经历“文革”。这已经成为我们是中国人民一部分的一个标志或记号。和人民一起受苦意味着我们再也不靠国内外任何势力的保护，这样基督教就是中国的，也就赢得了供人们聆听的权利。在十九世纪，中国基督徒的处境很不同，那时并不处于无权地位，因为受到不平等条约和列强治外法权的保护。今天基督徒人数增加得很快，这正好说明，无权之中蕴藏着很大的力量。这样，我们和约伯不同，我们似乎比他更看得清楚我们受苦的价值和结果。

在过去四十年间对中国基督徒极为重要的第二组《圣经》段落，涉及我们对基督的认识。

中国基督教长期以来存在着两条神学路线,都需要一个以《圣经》为依据的基督观来予以纠正。一方面,有些人的关心完全集中于个人的蒙恩,世界则是撒旦的占领区,基督的重要性仅仅限于他是个人的救主。

另一方面,相当一部分基督徒知识分子接受基督教信仰是由于他们对“登山宝训”和作为教师的耶稣五体投地地赞赏钦佩。三自爱国运动的发起人吴耀宗就是由于“登山宝训”给他的感动而成为基督徒的,尽管他后来在信仰上有了更多的突破。底下是他在一九四七年关于他归向耶稣的追求:

“是三十年前一个春天的晚上,我在一个美国朋友家里,初次读到《马太福音》的‘登山宝训’。像闪电一般,这三章书好似把我从睡梦中震撼起来。我睁开眼睛,我看见一个异象,我看见一个伟大的人格,尊严、温厚、深刻、锐利——他把握了我的灵魂,他几乎停止了我的呼吸。回到寓所以后,我快乐,我欢呼,我感动到流泪,我不由自主地对这个异象说:‘主,你是我的救主!’”(《大学月刊》一九四七年七月号)。

这一信仰推动吴耀宗和许多其他基督教知识分子投身抗击日本法西斯的侵略和蒋介石独裁政权的斗争,去迎接解放和人民民主。而在人民革命运动成功的同时,共产党、人民解放军、人民政府、民主党派一时都出现在人们面前。他们中许多人都表现出相当完美的道德,对基督教知识分子具有吸引力。于是这些基督徒似乎感到,保罗所讲的“新人”已经出现,但不是基督里,而是在基督之外。这些基督徒中相当一部分就去投身他们认为作用更大的运动和团体。那时教会失去了不少信徒,包括一些最有头脑的人。留在教会的知识分子对许多革命者的大公无私和对社会的良好变化并不轻视,甚至肯定这些是出于主手的运行,是神恩的标

志。可是他们不想离开教会。他们感到,基督教不仅是登山宝训,基督教给人带来某种实质的东西,使人像彼得一样说:“主啊,你有永生之道,我们还归从谁呢?”(约 6:68)

他们还是欣赏登山宝训和耶稣这位教师,但是他们所处的时代要求他们有一个更完整的信仰,足以赋予耶稣和他的教导以一种独特性。他们似乎初次认识了《约翰福音》以及诸如《歌罗西书》和《以弗所书》两书信所介绍的基督。用《歌罗西书》第 1 章第 15 至 17 节的话来说,“因为万有都是靠他造的,无论是天上的、地上的、能看见的、不能看见的,或是有位的、主治的、执政的、掌权的,一概都是藉着他造的,又是为他造的。他在万有之先,万有也靠他而立。”还有《希伯来书》第 1 章第 3 节,说基督是“上帝荣耀所发的光辉,是上帝本体的真像,常用他权能的命令托住万有。”《约翰福音》说基督是太初之道,他是照亮一切生在世上之人的“真光”(约 1:9)。这一切给中国基督徒知识分子的信仰提供了更坚实的基础。这些经文道出了一位具有宇宙性的基督,在自然界和人类历史里看到的一切真、善、美并非存在于他之外,而是在他里面得到成全。对过去只认为基督是一位道德家的人也好,对过去认为基督只同信他的人有关的人也好,发现认识这位基督意味一个重要的过渡,过渡到认识一位充满万有的基督。再也不能把道成肉身小看为清洗亚当造成的祸害的一个办法。基督降生来到的世界原本不是“敌占区”。《新约》认为,整个创造从最初就体现了基督。对这位更大的基督取得更全面的认识使我们再也不敢把基督教信仰之外的人类活动看作毫无积极价值。

基督是道成肉身的基督,也是死而复活的基督。如果问《新约圣经》里有哪一个词对中国信徒来说最有意义,那个词不能不是“复活”。在耶稣所有称呼中,哪个称呼在中国教会信仰中最为宝

贵,占据最高地位?那个称呼只能是“复活的基督”。从死里复活不仅是基督的经历,也是中国基督徒和中国教会的经验和真理。

这位基督仍旧是我们个人的基督,但对于个人和他的关系,我们有了新的认识。一位同工从《雅歌》里书拉密女身上找到了类比。她原来只会说:“良人属我”(歌 2:16),但后来进而会说:“我属我的良人”(歌 7:10)。基督不再被视为一个宗教占有物,他成为万有的源头,信心的对象。这位同工这样说:

“三十余年前,基督之于许多信徒,不过是个人匮乏之时的某种饱足,伤痛之时的某种慰藉,空虚之中的某种充实,失落之中的某种补偿。基督被列在属于他的许多事物之中,或代替曾经属于他而又丧失了的一切。

“经过三十余年与神之间的‘较力’与‘摔跤’,许多人有如毗努伊勒经历中的雅各,逐渐丢失了那藉以支撑他全人的‘抓’的力量。而今,基督之于他,不再是被抓的许多事物之一,而是征服了他的万主之主,万王之王”(《中国教会的某些神学变迁》,《金陵神学志》第2期)。

发现基督的宇宙性,大大扩大了基督徒的基督观,给中国基督教协会所代表的广泛团结提供了神学基础。

中国基督徒的这一经验正如 T. S. 艾略特在他的一首诗里所描述的:

“……一切探索最后到达我们原先出发的地方,但又像第一次找到这地方。”

能像第一次真正认识那样认识到这位更大的基督,有什么比这更美好的呢?

这些年来特别引起中国基督徒关注的第三类《圣经》章节,是那些讲到上帝圣爱的经文。这些经文导致我们认为上帝的爱是上

帝的最高属性。有些经文直接讲到上帝的大爱。例如“上帝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约 3:16);“上帝就是爱,住在爱里面的,就是住在上帝里面,上帝也住在他里面”(约壹 4:16)等等。在不少经文里,耶稣讲到上帝对宇宙万有的眷爱,包括野地里的百合花和空中的飞鸟(太 6:26-29)。耶稣有些比喻,例如在《路加福音》第 15 章,用人间的关系来说明上帝对他失去了的孩子们的那种深爱。当耶稣提出爱的诫命的时候,他不仅是在那里给人际和平共处规定一条道德准则,他也是在告诉人们,爱正是上帝本身的性格,属于宇宙造化的本质。

长期以来,我们教会所讲的上帝的最高属性每每不是他的厚爱,而是他的权能、他令人生畏的统治这一面。因信称义的教义被某些人歪曲了用来灌输一种畸形的上帝观:即上帝凭着他的怒气,给不信的男男女女定罪;上帝对人的工作,包括人手所做的好的工作,存着敌意。他的爱只是向着信他的人。上帝已经抛弃了这世界,一切耳目所欣赏的美都出于撒旦,只不过他装作光明天使罢了,等等。传讲这一上帝观和世界观的结果是,使基督徒仇视教外的人,像约拿对待尼尼微人那样。

中国基督徒正在摆脱这些并不完全合乎《圣经》的观念,愿意和保罗一起说:“凡上帝所造的物都是好的,若感谢着领受,就没有一样可弃的”(提前 4:4)。《雅各书》告诉我们:“各样美善的恩赐和各样全备的赏赐都是从上头来的,从众光之父那里降下来的”(雅 1:17)。《旧约》把“天上的星辰和人们内心的道德律”视为对上帝荣耀的颂扬(参《诗篇》第 19 篇)。耶稣在讲天国福音的时候,常在自然界和人间找到可比的资料。我们觉得,只有这样肯定世界,才谈得上基督徒对上帝创造奇功的赞美。

中国基督徒深深认为应当保持罪的意识。我们知道人们如何

把自己的罪的倾向带进他们所从事的一切。我们看来并无私念的行为往往遮掩着私念。人们所从事的许多很好的事业,在它们的发展过程中每每会走向反面。我遇到过的几位品德很好、对自己要求也很高的革命者曾说,他们同意保罗的话:“我所作的,我自己不明白。我所愿意的,我并不作;我所恨恶的,我倒去作”(罗 7:15)。我们心灵深处这种冲突,我们所做好事之中所包含的不纯动机,都说明人们时刻需要来自上帝的赦免、纠正、医治和灵性上的支持。

但是,人堕落到了什么程度,把人说成为完全败坏是否合宜,这类问题还是存在的。我们宁愿把上帝的救赎和创造看为联在一起的一个完整的作为,不愿意把二者看为对立物。在中国过去几百年间,孩子入学第一堂课所学的六个字就是“人之初,性本善”。这样,就不难理解,在对人的估价方面,诸如尼采说的“是地球表皮上的一种疾病”,或加尔文说的“是一条五尺高的蛆虫”,不能不引起反感。人是坠落了,但人仍旧有上帝的形象,也仍旧是他的荣耀(林前 11:7)。

中国基督徒从《罗马书》第 5 章得到很大的安慰。那儿是这么说的:“过犯不如恩赐。若因一人的过犯,众人都死了,何况,上帝的恩典,与那因耶稣基督一人恩典中的赏赐,岂不更加倍地临到众人吗?……罪在哪里显多,恩典就更显多了”(罗 5:15、20)。这里,保罗是在比较罪的影响和恩的影响哪个更大。我们特别注意到保罗“更加倍地”和“更显多了”的说法。读到这些经文,感谢之情总是涌上我们的心头。

在太多的时候,我们把原罪加以扩大化,也在太多的时候,又把恩典加以局限。这就意味着,上帝之子道成肉身对世人的作用还不如亚当犯罪的作用。如果上帝是爱,如果上帝既是一位创造

之主,又要通过救赎、训诲、圣化使人类成为完全,那么,把基督献上自己的作用说得那么小,就讲不通了。

认识上帝是爱,就是认识上帝的最高属性不是他的无所不能,不是他的无所不知,不是他的自在永在,不是他的威严、权能。所有这些都是上帝的属性,但不是上帝最本质的属性。上帝的超越性意味着神爱的无穷无尽,上帝内在于世间意味着神爱临在于整个创造。怀特海在他所著《过程与现实》中描绘他看到的上帝观大多把上帝看为“统治一切的凯撒,或是严峻冷酷的道德家,或是自己不为任何事物所动的推动者。”对此我们深有同感,因为这些上帝观一旦到了传教区,有时会以更强烈的姿态出现。我们渴求一位与此形象不同的上帝,一位像基督所启示的那样的“爱者”。我们愿意离开某些神学家和讲道家所给我们的那位严峻的、吓人的上帝的形象,因为这一形象太不像四福音教导我们去信靠的那位基督似的上帝了。我们喜欢先知何西阿给我们的亲切的上帝观:他以膀臂怀抱我们,用慈绳爱索牵引我们,他像放松牛的两腮夹板把粮食放在它们面前那样对待我们(何 11:3、4)。

我们没有忘记上帝的公义,但公义也是爱的一个方面。这位上帝也恨,也发怒,但这怒气正是爱的另一面,发怒的对象正是阻止爱的一切势力。只有一位爱的上帝才会让“公平如大水滚滚,使公义如江河滔滔”(摩 5:24)。

把上帝看为一位“爱者”,我们就把现实视在发展之中。它教我们不但在历史之内,也在历史之后看到希望。我们无法知道我们所谓的历史什么时候结束或怎样结束,但我们可以确信,这一结束将是爱和恩的最后胜利。爱将陪伴我们的旅程,但是从阿拉法到俄梅戛决不是一条直线。我们将遇到许多障碍,但是,正像“文革”时期那样,在同路人之间,我们用基督这样的话互相鼓舞:“妇

人生产的时候就忧愁,因为她的时候到了;既生了孩子,就不再记念那苦楚,因为欢喜世上生了一个人”(约 16:21)。教会是守望楼上的守望者,它看到清晨来到前的黑暗,也看到黑暗之后必然来到的光明。它知道历史上新生儿进入世界之苦,也知道生产之后的欢乐。正像《诗篇》所说:“一宿虽然有哭泣,早晨便必欢呼”(诗 30:5)。

这些年间较为突出的第四类经文同基督徒的团结有关。我所指的是像《诗篇》中对弟兄和睦同居“何等的善,何等的美”这样的歌颂;基督在《约翰福音》第 17 章为门徒合一而献上的祷告;保罗在《哥林多前书》第 1 章反对分裂的劝勉和在《以弗所书》中关于一个身体、一个灵、一个指望、一个主、一个信、一个洗礼和一位众人之父的教导,等等。这类经文常常被引用,有两个原因:(一)肯定中国基督徒已经进入的团结,不再分门别类,为此向上帝表达感谢赞美;(二)保护这一至今还不够坚固的团结,对有时出现的分裂复旧倾向取否定态度。

在中国,最初是把西方国家的许多宗派都搬了进来。但是,中国基督教的宗派历史毕竟是短的,宗派主义毕竟是西方的东西,中国信徒的宗派主义情绪并不高。这样,进入今天这“宗派主义之后”的时期并不过于困难,尤其因为整个环境不利于许多大体相同的团体的分立。为了保证团结好,我们有个信仰特点上和礼仪上互相尊重的方针。当然,要求处于多数的基督徒充分尊重处于少数的基督徒的特殊点,有时是很难的;而处于少数的基督徒中有些领袖,有时也过于强调他们的特殊点。这样,保持团结就不一定一帆风顺。我们希望哪一个宗派也不会恢复。为此,我们回到《圣经》,多用《圣经》的话来巩固我们的团结。

我愿意在此说明,今天我们不过是处于“宗派主义之后”的阶

段。中国基督教协会是为教会服务的全国性团体,但它不是中国基督教会。它比各宗派基督教会联合会有更高的团结程度,但还不是全国性的基督教会。这是在团结上我们目前所能到达的水平。我们愿意由此前进而不后退。

《圣经》以“和好”与“立约”为中心信息,这对团结能起鼓舞、教导作用。也有人似乎热衷于制造分裂。他们也到《圣经》中去找根据。但他们所能找到的无非是一些指信徒之外的人而言的经文,例如“你们和不信的原不相配,……”等等(林后 6:14、15)。这些话用在作主内门徒的人身上,是如此之不公道,因而不是广大信徒所能赞许的。

你们大概已经有个印象,中国神学家在工作中没有努力去发表与众不同的或令人惊绝的言论。正是这样。我们认为,我们应当同广大信徒在一起,讲一些既能帮助他们、又能为他们所接受的话,并能解决他们所感到的问题。各搞各的,不顾教会信徒的需要,不顾对团结有无妨碍,这不是我们要鼓励的。

在世界上,今天有很多人在提倡政治神学。就西方有政治头脑的基督徒来说,我所介绍的,反映中国教会神学氛围的这四类经籍,可能很有局限于教会传统主题之感。我需要说的是,正是回到教会的这些历史遗产,我所来自的占全国人口不到百分之一的中国教会才得以保持团结而存在,并向我们的同胞提供一个独特的但又是令人向往的信息。

宇宙的基督

(一九九一年七月在英国“中国教会之友”大会上的演讲)

今天,我首先要代表中国基督徒感谢“中国教会之友”。几十年来,中国教会走过了一条不平坦的道路。我们觉得我们是蒙受着世界各地教会的祝福,同时也代表着世界教会在进行某种探索和尝试。“中国教会之友”这样一个友好团体的存在告诉我们,来自普世教会和国际间的友谊、代祷和期望托住了我们。中国基督徒一定不能辜负朋友们的厚望。你们在这里为千里之外的中国教会所做的一切,都是对我们的支持和激励。

在某种基督徒看来,宣扬“宇宙的基督”似乎是把基督送进一个漫无边际的空间,而事实并非如此。

我愿意向各位介绍一些中国的情况,使大家理解为什么越来越多的中国基督徒会接受“宇宙的基督”这一命题。我想大家都会同意,历史变革对传统信仰的冲击是促使产生这一思想的原因。这个冲击是促使中国基督徒重新研读《新约圣经》。他们好像第一次从那些熟悉的话语中寻见了新的亮光,发掘出新的含义。我特别想到诸如《歌罗西书》、《以弗所书》、《希伯来书》和《约翰福音》等卷中有关基督的许多章节。

所谓历史变革,是指一九四九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前后国内发生的一系列变化。新中国的建立,标志着基督徒和信仰共产主义的革命干部从此开始直接交往和相处。很多干部在实际工作中品德高尚,他们的这种品德激励民众奋发向上。包括基督徒在

内的中国人民对这些新朋友印象非常深刻。他们以自己的施政纲领和一言一行体现了我国古代圣贤孔子和其他哲人关于崇高的道德生活的教导。他们艰苦朴素,舍己为人,谦虚谨慎,严于律己,毫不留情地与自己队伍中的腐败现象作斗争。我认识一位共产党员,他赞同保罗下述对人类处境的分析:人常常自知该做的不做,而自知不该做的却去做。我理解五十年代西方国家一些对新中国十分热情的基督徒竟大受感动而宣称:在中国,保罗所说的新人已经来到人间,只不过这新人不在教会之内,而在教会之外。总之,共产党干部的实际行动击败了旧政权对他们的歪曲丑化,赢得了民心。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和毛泽东的著作很快成为畅销书。

我们同意保罗对人类本性的认识,因此,认为在干部和民众中进行经常的、持续不断的批评和自我批评都是必要的,否则,即使是为着崇高目标而发起的历史运动也会倒退。这情况在中国也有反映。正如你们听到的,有些地方干部中出现了官僚主义和腐败作风。但是我们也还是要看到,一大批富于献身精神的干部今天仍然在勤奋工作,无私奉献,带动广大人民也这么去做。这一不容忽视的现象引起了中国基督徒的惶惑和思考,促使我们按照我们的信仰去更好地理解它,解释它。

长期以来,基督教总是以人类的堕落和善的缺乏作为宣讲罪和救主基督的依据。然而,在新中国出现的许多新的现象和现实,不能不在一些信徒中带来对传统信仰的再思乃至怀疑。

受冲击最厉害的是这样一些基督徒:他们仅承认并赞美耶稣是一位伟大的道德教师和社会改革家,是所谓“基督教运动”的领袖。他们认为“登山宝训”是基督教信仰的核心。他们发现,革命使中国取得了巨大的、振奋人心的成果,而基督徒改造中国的设想

却显得微不足道。这一对比大大动摇了他们对自己从事多年的基督教事业的信心。像吸食鸦片、卖淫这类腐恶，基督徒口头上反对了一个世纪毫无效果，新中国建立后几个月内就被一扫而光。许多基督徒心中都有这样的想法：基督徒只是说得多，而共产党是付诸行动。这一想法使他们陷入苦恼。因此，五十年代是中国许多基督徒深感困惑的年代。作为中国人，他们欢迎解放和改革；但是，作为基督徒，他们该怎样重估自己的信仰？一大批信徒离开了教会，去参加了他们认为更有力量的组织。其中有许多人是吴耀宗先生的学生，也有一些是他的好朋友。

但不是所有的基督徒都感到困惑。有一些态度固执的人，把自己束缚在一片狭小的天地里，竭力抵制新事物和新思想。对基督教以外一切的善，他们闭目塞耳，藉此保住自己的信仰。他们不思考正义与非正义、善与恶之间的区别，他们只知道把人分为信与不信两类，他们只在信与不信上大做文章。比起德尔图良的名言“雅典和耶路撒冷有什么相干”来，他们有过之无不及。因此，正像他们当中有一位所写的：上帝憎恨人的善甚于憎恨人的恶，因为善更容易迷惑人。

这类基督徒的言论就是要人们否定人类一切所行的善，远离自然美、人格美和艺术美。在这种世界观的支配下，他们自然努力搜寻人间行为恶化的种种迹象来支撑和加强自己的信仰。新中国建国之初，有极少数人盼望蒋介石的军队立即从台湾返回大陆，爆发第三次世界大战，那个时候，震怒的、复仇的上帝就要毁灭这个世界，惩罚不信的人。多数中国基督徒不能接受这类政治性特强的说教。这种说教要求信徒以祖国为敌。这类说教只能促使又一批基督徒离开教会，用当时的话说，他们去“参加了革命”。

至于那些仍旧留在教会的基督徒，他们仿佛听见基督对他们

说：“你们也要去吗？”（《约翰福音》第6章第67节）他们像彼得那样回答：“主啊，你有永生之道，我们还归从谁呢？”他们开始重新学习《圣经》。他们意识到，一九四九年既标志着中国国家生活的重大转折，也标志着基督徒灵性生活的重大转折，他们必须为新的看见、新的灵性追求寻找，并开辟一条道路。

对于中国基督徒来说，认识基督的宇宙性，至关重要。其基本意义在于帮助他们至少明确两个问题：（一）基督的主宰、关怀和爱护普及整个宇宙；（二）基督普及到整个宇宙的主宰以爱为其本质。当我们读福音书的时候，我们在耶稣基督身上感受到，这种爱是上帝的最高属性，是上帝创造宇宙、推动宇宙的第一因，在爱的光照中，我们得以洞察人世沧桑。我不打算把在座的各位引入浩瀚的中国古典作品之中，我只想谈，中国古代哲学赞美宇宙的和谐统一，主张以仁为本治国安邦，这种文化传统使中国基督徒有足够的心理准备，乐意接受“宇宙的基督”这一种神学思想。

现在我来谈谈第一个问题：基督对整个宇宙的主宰、关怀和顾念。基督关心宗教、灵性、教会、信徒等方面的事，但是基督的关怀决不局限于如此狭小的范围之内，他也关心还没有来跟从他的人。他用他权能的命令托住万有（《希伯来书》第1章第3节）。他是首生的，在一切被造的以先。他在万有之先，万有靠他而立（《歌罗西书》第1章第15、17节）。有一种看法我们不能苟同：上帝创造了世界，却又将它弃之于叛逆者撒旦之手，基督则只是来到世上拯救他所拣选的那小部分人回到上帝那里。我们认为，上帝的创造永无止境，创造的进程悠远绵长。基督过去、现在都参与了并正在参与一切的创造。基督关切的是促使创造结出丰硕之果，到那时，爱、和平和公义将成为宇宙的准则。同教育、圣化一样，救赎并不与创造相悖，而是创造过程中的一个环节。基督不仅救赎基督徒，

他的救赎惠及全人类。非但如此,基督的救赎计划包括整个宇宙。同样,圣灵不单单是基督徒或教会的保惠师,它也以超乎寻常的美和善更新一切被造之物。

公元一世纪后半期,福音传到了犹太以外的人们中间,当时的基督徒遇到这样一个问题:怎样看待教外的真善美?是否应由犹太教取而代之?同样,二十世纪五十年代的中国基督徒也面临着类似的问题。教会正是以此为契机启发信徒进行神学再思,辨明是非,适应新形势,吸收新东西。

在此我想举几个与中国有关的例子。公元七世纪来到中国的聂斯托利派(在我国称“景教”)教徒,毫不犹豫地吸收中国民族文化。在将近二千字的景教碑文中,作者大量引用中国古代经典著作。其中引自《易经》和《诗经》的各三十处,还有二十处引自《春秋》。利玛窦也是一位沟通教内、教外真善美的先驱。十九世纪前期来到中国传教的英国汉学家理雅各是基督教新教传教士中的利玛窦。最令人遗憾的是,这两位积极方针都由于受到教会传统教条的敌视而无法推行。后来实行的墨守成规的传教方针使基督教成了一种平庸的、远离现实的宗教。旧中国的传教方法造成这样的状况:信徒受到西方殖民主义的保护和经济支持,背弃中国的文化传统,脱离人民的社会政治运动。中国革命的胜利更使中国基督教濒临崩溃的边缘。

我估计其他第三世界国家教会的经历与我们大致相同。看来贬低民族文化是殖民主义为自己辩护的手段。沙文主义、殖民主义占上风时,基督教与民族文化相融合这个思想就被扔到一边。但是,今天殖民主义的消亡和现代科技使创造了异彩纷呈文化的各民族日益接近,基督教人士再也不能对教外的真善美继续保持虚无主义态度。中国基督徒的经历较为独特之处不过是一九四

九年中国掀起了一场共产党领导的革命运动,教会的革新是通过激烈的斗争来实现的。

我们从《罗马书》第5章第15、17节中得到很大的安慰。保罗把亚当堕落的后果和基督恩典的意义做了一番比较。他用了“更加倍地”、“洪恩”、“更要”等等字眼来说明基督对人类的无限影响。当我们理解了这段《圣经》,我们感到释放,受到鼓舞。较之亚当的过犯,“道成肉身”给人类和宇宙带来了更加深刻、更加全面的影响。我们很多人每每限制和压缩基督的恩典,认为恩典仅仅赏赐给少数信了主的人。这实际上就是说,上帝藉道成肉身对人类的影响还敌不过亚当的堕落对人类的影响。这种观点同我们在基督身上所看到的上帝的爱是很矛盾的。上帝就是爱,他关注的是创造,即通过救赎、教育和圣化使人类渐臻完美,成为创造的参与者,成为摆脱了罪的桎梏,也摆脱一切低级趣味的满有智慧的人。

无神论的存在与宇宙的基督所做的能相互协调吗?我想是能够的。世界上有许许多多事物的存在可以同基督的工作一致。对某些无神论者和共产党员,我由衷地赞成他们所说的许多话,做的许多事,我不愿对他们这样那样的缺点大事指责,而是满腔热情地对待他们,帮助他们改造自己,同他们一道反对我们共同的敌人。尽管他们和我信仰上很不同,然而在各自信仰的驱动下,我们可以在许多方面,同心合力干事业。我的许多同事都认为,为教会着想,只要我们能进行崇拜,能有教会生活,能为基督做见证,只要能就许多问题进行有益的对话,我们就不应该轻易以对抗和殉道作为教会的对策。

我们宣讲基督的宇宙性,并不意味着自然界和人类历史上发生的每件事都是基督所做的工,或出于基督的设计。世界上发生着许多违反上帝的慈爱、破坏人类幸福的事情。创造,包括对人类

的创造,是一个漫长的过程,还远远没有达到完美的境界,还要遇到挫折。要通过创造使人类获得自由,使人类不再是奴隶而是上帝的孩子。一个正处于被造过程中的世界当然会有丑恶和残暴。人间发生的许多事变告诉我们,通向完美境界的道路是多么曲折。为了达到创造一个自由的、和上帝配合的儿女组成的共同体这一目标,上帝和人类还要一同艰难跋涉,付出高昂的代价。

十九世纪的许多西方传教士相信,教会走向世界各地将越来越多的国家都归属教会,他们深受这一前景鼓舞。今天,越来越多的基督徒却看到另一个远象:基督正引导着整个创造前进,实现在上帝里合一的目标。在基督的这项救赎工作中,人类争取进步、解放、民主和博爱的运动都连在一起了。教会是人们认识基督、宣讲基督、进行忏悔和敬拜活动的重要场所。全世界都需要教会所传的赦免、和好、和平的福音。但是上帝的救赎工作决不仅限于教会范围内,而及于整个宇宙。正如第二次梵蒂冈会议所说:“在有形教会之外存在着圣化和真理的因素,因此,对于所有遵从良心命令的人来说,得救所需的帮助总是随处为他们预备。”我愿意这样想:如果这些因素都是或长或短的弧线,那么基督就是那完美的圆圈,所有的因素都在他里面得以成全与完美,最后统一于他。

整个宇宙都处于上帝的关怀之中,在中国,我们正在争取更多的基督徒接受这个真理。我们从《圣经》中得到许多启示和鼓励,如:亚伯拉罕接受异教的撒冷王麦基洗德祝福;波斯王古列(或译称“居鲁士”)以一个异教徒的身份,实现了上帝的旨意,为重建圣城和圣殿作出贡献。我们在《以赛亚书》第10章中看到,上帝不但称以色列是“我的产业”,他还称埃及为“我的百姓”,称亚述为“我手的工作”。正是由于我们目睹了教会以外那些在其他道路上为追求真理矢志不移的跋涉者们所表现出来的真、善和圣洁的美德,

我们不再认为,上帝只对历史上的以色列施予特别的恩惠。我们看见这样一个远象:上帝一切的创造、救赎活动是为着全人类的。这就是我们对宇宙的基督的理解。

另一方面,发现基督的宇宙性意味着对作为宇宙原则的爱的肯定。我们从耶稣身上体会到了这种爱。这是上帝的最高属性,是主宰宇宙的最高准则。

不能把“上帝就是爱”作为一种口头上的老生常谈。我们要让基督的爱成为上帝的定义,成为上帝自身本质的最高启示。过去我们受的教育使我们误以为上帝就是至高无上的权力,他可以毁灭我们,或使我们也掌握权力。这种思想反映和证实了我们对权力的渴望,反映了那种充满了权力欲,力求役使人、垄断人的社会结构和大众心态。但是在《新约》里,上帝以牺牲自己的方式成全他的权力,他通过十字架而不是靠征服证明他的权力。我们不要再按照过去埃及、波斯、罗马和中国统治者的形象去塑造上帝,从而把法老、凯撒之类人物特有的属性加给上帝。

基督的宇宙性给我们这样一个信念,上帝不是暴君或惩罚者,而是宇宙的爱者。他不喜欢强制和压服,而是靠教育和劝导进行工作;他不采取责骂和惩戒的做法,而是吸引、邀请并等待我们出于自愿的响应。我们中国基督徒发现,福音书关于种子和植物在空气、雨水及阳光中生长的比喻比用杖和竿管辖、控制羊群的比喻更有感染力。上帝的意志是团契,不是权力。对中国基督徒来说,摒弃一个报复的、令人恐惧的、对人类具有极权的上帝的形象,而敬拜一位爱我们、同情我们、与我们一道受苦的、循循善诱的上帝,这个转变是一种真正的释放。

所谓的“文化大革命”,不仅反对文化,而且滥用“革命”二字。那时候,不公正、仇恨、权力欲和任意陷害无辜的种种丑恶横行。

正是在这样的情况下,信徒所说的仁慈的上帝向人们彰显出奇异的光辉,成为人们获得安慰和希望的源泉,吸引了众多的人归向他。他同心灵痛苦的人亲切交谈,接纳不为世界所容的人,让无家可归的人在他那里得到安息。

我们赞赏阿尔弗雷德·诺斯·怀特海在他的《过程与现实》一书中否定一些神学家对上帝的描绘,那些神学家将上帝说成是“统治一切的凯撒,或是严峻冷酷的道德家,或是自己不为任何事物所动的推动者”。这类描绘有时候在传教区里表现得更突出。我们向往一位不同的上帝,他首先是一位爱者,这个爱已经由耶稣基督彰显出来。我们要远离一位严厉的威吓人的上帝,这不是四福音书中吸引我们的像基督那样的上帝。我们喜欢《何西阿书》第11章第4节中上帝的形象:他用慈绳爱索牵引我们,举起我们就像被双亲亲吻的孩子,把粮食放在我们的面前。我想,探讨基督的神性还不如肯定神的基督性来得重要,上帝要使基督表现出的那种爱成为宇宙和人间的准则。

我们当中越来越多的人意识到,要理解上帝是爱,仅仅把他比作人间的父亲是远远不够的。多少年来直到今天,至少在中国,父亲一向被认为是严厉的,而母亲则是慈祥和蔼的。事实上,中国人在谈话中常常使用“家严”、“家慈”来分别称呼自己的父母。我想我们都知道,很难说爱是世上父亲的特征,《圣经》中有些章节很清楚地用母亲的形象来说明上帝的爱。请看《以赛亚书》第66章第13节,上帝说:“母亲怎样安慰儿子,我就照样安慰你们。”再看《以赛亚书》第49章第15节:“妇人焉能忘记她吃奶的婴孩,不怜恤她所生的儿子?即或有忘记的,我却不忘记你。”在《诗篇》第131篇第2节说:“我的心平稳安静,好像断过奶的孩子在他母亲的怀中。”

强调大爱的上帝,使我们懂得世界正处于一个形成发展的过程中,使我们对历史和超历史满怀希望。我们不必推测历史结束的方式和时间,但是我们坚信,那将是爱和恩典的胜利庆典。从出发点到目的地的道路决不平坦,然而爱伴随着全部历程。我们要走一条曲折的道路,但我们记得基督的教导:“妇人生产的时候就忧愁,因为她的时候到了;既生了孩子,就不再记念那苦楚,因为欢喜世上生了一个人”(约 16:21)。我们看见黎明前的黑暗,同样,黑夜过后黎明必定会来到。《诗篇》第 30 篇第 5 节说得好:“一宿虽然有哭泣,早晨便必欢呼。”

宇宙的基督是一个丰富的概念。它所表达的关于基督的含意远远超出了人类的理解。我们只是在探索。这是那些不再满足于传统的基督论、希望来一个转变的基督徒提出的见解。我只是尽我所能地向各位朋友介绍了中国基督徒对宇宙的基督所进行的神学思考。尽管现在我们只能对着镜子观看,模糊不清,但到那日将会面对面的。

理解上帝的心

(一九九三年九月在美国好莱坞诸圣堂的演讲)

过去我没有想到,会在好莱坞和这么多的明星和电影从业人员会面。感谢你们给我这个邀请。

“浪子回头”的故事记在《路加福音》第15章,早已为众人熟知。今天就让我们来分析一下这故事中的三个人物:那父亲和他两个儿子。关于这三个人物,我愿意各讲一些话,但主要谈一下那位父亲。

首先,这位父亲,他帮助我们看见上帝的心。

关于上帝,我们在耶稣的生平和教训中所看到的,不是他的全能,不是他的威力,不是他的严厉,不是他压服人的力量,不是他报复的欲望,也不是他惩罚人的无情,而是他的爱,他的同情,他对人的尊重,他耐心等待人们的觉醒。当小儿子决定离家的时候,父亲很难受,但没有把自己的意志强加于小儿子,上帝似乎像过分宽容,简直像无能为力。他避免用强迫或高压的手段对付儿子。他所渴求的不是人们在压力底下的服从,而是发自内心的团契。如果团契不是自觉自愿进入的,那就不成其为团契。如果只有一条路好走,其他可能都给关闭了,作出错误抉择也不许可,那就谈不上自觉自愿。因此,我们看到,上帝为了尊重人,限制了自己的权力。在对待人方面,他宁愿耐心等待人的自觉自愿,他采取宽恕、创造、救赎、圣化、教育、说服的办法。

我们中国有一个反封建的故事,讲到一位年轻妇女,不幸她的

未婚夫死了,但是封建习俗仍然要求她嫁到丈夫家里做媳妇。在挂满泪水的婚礼之后,她进入新房,只见在床上摆着一条五六尺长的木头。这将是她终生的丈夫。故事的结局是她经过斗争,摆脱封建束缚,投身抗日红色娘子军。试想,叫她怎样同木头谈什么团契?叫她怎样能同一条非人的木头发生爱情?同样的,上帝所期待的是真情,是团契。他的本性不许可他把浪子当作一架应命的机器来对待。上帝所求的是团契,他不是一位征服者,一位强求顺服的暴君。他创造的顶点是在宇宙之中将出现一种新的人,会甘心乐意和他的创造工程同工的人。在他的创造过程中,整个世界和我们大家到现在为止,都在不同程度上是尚未完成的半成品。在这一感化的过程中,男男女女的人们都在经过改造:从只会机械服从命令的人,改造而为能够欣然接受上帝的邀请,与进行中的创造过程积极配合的新人。

由于以色列民族的畜牧业背景,《圣经》中谈到牧羊人和羊群的话特多。“耶和华是我的牧者,我必不致缺乏。”“我们是他的民,也是他草场的羊。”我们知道,就羊和牧者的关系来说,所要求于羊的,不过是顺服,不过是跟随。牧羊人总是不断地在发号施令,不断地在叱骂。当羊走歪的时候,牧人就用他的杖和竿来管教它,强求它服从。但是,就人来说,在遭到叱骂的情况下变得依头顺脑,这不是人所能做到的最高的道德成就。

我们中国人几千年来是一个务农的民族。《圣经》中的另一个关于神人关系的常用比喻同中国文化更契合,那就是种植者和种植物之间的关系。“有个撒种的出去撒种”(太 13 章),“一粒麦子不落在地里死了,仍旧是一粒;若是死了,就结出许多子粒来”(约 12:24)。我们念这两段以及《圣经》中其他有关种植的话的时候,我们想到那不用杖竿也不发号施令去强迫庄稼服从自己的种植

者。种植者松土、撒种、施肥,让土地享受阳光雨露,使庄稼生长,能抵挡灾害,最后达到饱满。在做了一切该做的之后,有一个等待的时期,让它自然完成它的过程。在那时期,种植者最有效的帮助是不做什么,是等待。

老子对中国的影响不亚于孔子。他教导我们,在不该做什么的时候就不要随意动手去做。这不是教我们无所作为,这是教我们不要在时机未到的时候轻举妄动。浪子回头的故事显示这样的一位上帝:他以他永恒的爱开垦、种植、看守庄稼,耐心等待我们在基督里成长起来。他是无所不能的,但是他宁愿遏制他的无所不能,因为他不肯以他自己的意志强加于我们。

上帝以他的大爱驾驭宇宙。他温和地、感人地、毫不厌烦地、也无止境地保持同人们的关系,并且,经过人们的合作,把一切可能的善带入世界。把上帝肯定为宇宙的爱者是把爱看为上帝继续不断进行创造的动力。爱是上帝的最高属性,超过其他一切属性,使其他一切属性都退居次位。

我不说上帝的最高属性是他的公义。公义派生于爱,脱离了上帝的爱而大讲上帝的公义必然导致一个畸形的宗教,这宗教把上帝看成一位赏善罚恶的主宰。一个人遭遇不幸,那是因为此人在某处得罪了上帝,触动了上帝的怒气。同样的,当此人进入顺境的时候,这是由于他因某事蒙受了上帝的喜悦。这样的一个避灾图利的基督教是功利主义的信仰,大大削弱了它同低级宗教的区别。

现在谈一谈那小儿子。他让我们看到世界上广大男男女女的处境。

在小儿子身上,我们看到,人类不是自然而然地善良的,人类既可能下沉到一个低点,同时也可能上升到作为上帝儿女应有的

高度。人类处在罪的阴影之下,同时又摆脱不掉父亲的慈恩。在我们里面有一股力量,迫使我们去做我们不要做的,也迫使我们不去做我们知道该做的。这股力量的正确名称是罪。正像圣保罗所说的:“我所作的,我自己不明白。我所愿意的,我并不作;我所恨恶的,我倒去作”(罗 7:15)。他接下去说,是住在我们里面的罪使我们成为这样。《路加福音》第 15 章这个故事告诉我们,当我们离弃上帝的道路的时候,我们不是处在上帝创造我们时愿意我们处在的地位。然而这不必成为自暴自弃的理由,浪子即便在为别人看管猪群的时候,也还是他父亲的儿子。耶稣对浪子具有很大的信心,说他“醒悟过来”,说他又成为他自己。父亲对他的回归始终没有放弃希望,他等待着他的回归。我们不要把人生看为不变的。我们都在变化之中,我们不是一成不变的事物,像一只死了的、僵硬的、钉在硬纸片上的蝴蝶标本。我们是一个来自过去、活在今天、展望未来的活的能努力的主体。浪子也好,我们每个人也好,都是在改变之中,我们都是上帝手中的半成品,这给予浪子和我们每人以希望。

现在谈一谈那位大儿子。大儿子让我们看到我们教会中不少人如何缺乏爱怜之心。那大儿子一直呆在父亲那里,看来光景不差,但是,对弟弟正在开始的新生活,他毫不高兴。他同父亲说话的时候,不称呼弟弟为“我的弟弟”,却称他为“你这儿子”。“你的这个兄弟”是父亲说的。

关于人,一个重要的真理是我们被造是为了要我们最后都成为有爱心者。我们都是正在被造过程中的爱者。十字架的圣约翰曾说过:“当我们的日子到了黄昏的时候,我们将凭有无爱心接受审判。”在《马太福音》第 25 章里,基督自己告诉我们,进入天国的将不是那些自己以为靠近上帝却没有爱心的人,而是那些对最小

的弟兄姐妹都显出爱心的人。这大儿子叫我们想起《圣经》中的约拿，他是一位对听道的人没有爱心的传道人，惟恐他们悔改转向上帝。这些年，我们在中国不时谈到在对待我们的同胞的时候，如何克服“约拿心态”或“大儿子心态”。如果我们对人缺乏爱心，我们决不会真正期望他们接受基督的。也许你们听到中国新信徒正在增加的消息。要不是广大信徒在他们的工作和居住的所在有许多爱怜和关怀的表现，这是不可能发生的。这些爱的行为使人们不禁要问，基督教究竟是怎么回事，愿意听听基督教有以告人的信息。

上帝既然是宇宙的爱者，宁愿通过教育和等待而不愿施加压力，人类既然是在改变过程之中，不少基督徒尽管缺乏爱心，但也在改变过程之中，这样一个正在改造中的世界必然有其阴暗面和丑恶面。我们的安慰来自这样一个信念：不管事物多么黑暗，世界与我们都正在改造过程之中，那就是在上帝创造过程中，从半成品演变面为较好的产品。

我喜欢维克多·雨果的话：

“将来是否终于会到来？——我们还该向上仰望吗？我们在天边看到的一点光亮，是不是就会消失？理想是难于眼见，很小，很孤立，像个针尖，像在深处失落，像将被周围的黑暗势力所吞没，然而，并不比似乎要被黑云吃掉的一颗星辰处境更危急。”

从阿拉法到俄梅戛向来不是一条直线，但是仁爱和恩惠将一直伴随我们的征途。我们得经过曲折的长途，但基督的话安慰着我们：

“妇人生产的时候就忧愁，因为她的時候到了；既生了孩子，就不再记念那苦楚，因为欢喜世上生了一个人”（约

16:21)。

一切现实和一切人物都在演化之中,这是基督徒的观点,这观点给我们安慰,使我们充满感谢。

一个中国基督徒的上帝观

(一九九三年十月于马尼拉在菲律宾协和神学院的演讲)

首先,我要感谢菲律宾协和神学院院长给予中国教会和我个人的荣誉。从今天起,我成为菲律宾协和神学院的一分子了,这使我十分欣喜。我相信,你们今天在这里所做的必将加深我们两国人民之间和两国教会之间的关系。菲律宾基督徒为耶稣基督作见证,让人们认识世人作为上帝的儿女的价值,并且肯定民主按上帝旨意为现阶段历史的命题,对此,我们在中国给予很高的评价。中国教会会有很多该向菲律宾同工同道学习的。感谢你们邀请我向在座的教会领袖、教授和同学演讲。这给我机会转达中国信徒对你们的亲切问候。我也要感谢院长先生刚才所讲的关于我个人的友好的但大大夸大的介绍词。

我愿意谈谈,中国相当一部分基督徒,包括我在内,如何认为上帝是爱,并且认为只能这样来认识上帝,才能获得一个理智上诚实,灵性上成熟,道德上有要求的灵命。

让我先从自己谈起。我生长在一个基督徒家庭,外祖父是一位圣公会牧师。我在中国接受我大部分的正式教育,在美国接受一部分神学教育。我在教会的侍奉可以分为两个阶段,第一阶段是在基督教学生运动方面,先在中国国内,后来在加拿大,然后在世界基督教学生同盟;第二阶段我从事神学教育和宗教研究,中心在南京金陵协和神学院和南京大学。对我自己的神学造就来说,这两个阶段都很重要。

让我立即告诉你们在神学思想的地图上我站在哪里。“文化大革命”在中国制造了极大混乱，十年之久我同国外的一切联系都被割断。当再次恢复联系的时候，我发现，海外的神学气候已发生很大的变化。海外有三个神学学派同中国基督教知识分子的寻求和摸索最为合拍：一是解放神学，二是受到过程哲学影响的神学著作，三是德日进的思想。对此，我想你们会感到容易理解，这不但是由于中国古典哲学所传下来的变迁的思想，而且也是由于中国近几十年经历了解放和革新的曲折过程。

我的早年训练使我想象一位全能、有无比巨大力量和威严、自足、自在、不变的上帝。是的，那时也承认一位爱的上帝，但是爱不是上帝的最高属性，他的爱每每被他的公义、严厉、怒气、审判和任意性所掩蔽。

这些年来奔波导致我走向另一种灵性追求：把四福音所显示的基督那样的爱看为上帝的本质属性。在上帝的整个创造过程的背后是他的爱。今天，当我说耶稣基督启示了上帝的时候，我主要指的是他启示了上帝的爱。过去我曾热衷于肯定耶稣的神的性格，现在我感到更重要的是肯定上帝像基督那样的爱的性格。对我来说，爱是上帝的第一属性。上帝是爱。

A. N. 怀特海在他所著《过程与现实》一书结尾所说的一段话令我神往，那儿他讲到“加利利的远象”，认为上帝充满着爱心，他不断创造、救赎、教育、劝导，同时期待人们的反应。他说：“在西方世界接受基督教的同时，凯撒胜利了，”“那时以来，那简单的谦卑的加利利人的形象始终仅仅偶然有所出现……而保存下来的是按照埃及、波斯、罗马统治者的形象所制作的上帝。教会把属于凯撒的东西作为上帝的属性归给了上帝。”怀特海指出，大量的基督徒都把上帝看为“统治一切的凯撒，或是严峻冷酷的道德家，或是自

己不为任何事物所动的推动者”。当然,要在中国找到作为专制统治者的上帝形象并不难,但是基督所启示的是处在整个现实中心地位的爱,这个爱分享被造世界的快乐,分担被造世界的忧戚,把世界推向和谐和相爱。

让我也向你们介绍我在社会政治地图上所处的地位。我对上帝是爱的信念和中国应走社会主义道路的信念是统一的,是两者互相加强的。社会主义就是把爱为广大人民组织起来。苏联和东欧国家体系的崩溃对我的思想有影响,但我仍然坚信,封建主义、殖民主义、资本主义对中国来说都不能代替我们所称作的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这一社会主义在四十年中改善了十二亿人民的生活。我相信,我们的生活在本世纪末将得到进一步改善。如果用较长远的眼光来看,我认为社会主义不是人们走过的一段弯路,一个现在可以擦掉的偶然现象。社会主义的历史还相当短。它没有一张蓝图或可资抄袭的样板。在社会主义名义下所进行的不少事情我未必欣赏,但是我仍然认为,用“社会主义”四个字来概括旨在避免封建主义、殖民主义、资本主义的中国社会是极为确当的。这是一条解放和发展生产力,从而提高人民的物质生活、文化生活和自尊心的道路。

我们对社会主义寄予希望,不是因为我们看到了社会主义的详细蓝图,而是因为一切其他选择都不足令我们神往。其他一切选择有一个共同点:它们都保护生产资料的大规模私人所有制和财富的不公道分配,以广大人民的受苦作为代价。在那样的社会里,受苦的人们难以理解上帝是爱。经济学家凯恩斯认为,资本主义就是一个认为极坏的人以极坏的动机会给广大人民带来福利的社会制度。对这样的社会制度我们无法拥护。那无限制地追求私利的制度必须有个刹车的机制。苏联不过是计划社会的一项试

验,它的失败决不会增加我们对封建主义、殖民主义、资本主义的好感。无法想象,中国将放弃社会主义道路,转到老路上去。我相信,随着经济和教育水平的提高,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将会具有更多的社会主义民主。

有人主张无神论,这是否影响我对社会主义的支持?并不。我把无神论者和我们自己都看为上帝创造工程里的半成品,我们都在变化过程中。我认识不少无神论者,他们正在真诚努力建造一个更合乎人道的社会。他们对上帝的否定实在是对人群的肯定,他们的无神论是对宗教界人士所渲染的错误的上帝观的批评,这一批评每每是值得我们同情的。他们否认其存在的上帝是怎样一位上帝呢?这个上帝是专制的宙斯,他因为普罗米修斯为人类取得火种从而提高生活质量而用锁链把他锁在山上。这个上帝是专制的阎王,他派遣差役把人间犯了错误的人投入地狱永火作为惩罚。讲人道主义的无神论是人们寻求人生高超意义的一个方式。为了发展高超的信仰,他们可能是我们的同盟者。我们大可和多种人道主义者联合,来反对一切降低人的尊严和阻止人的解放的种种偶像崇拜。我有时讲一些欣赏某些无神论者和共产党员的话,对此我有些海外朋友感到惊奇。是的,作为基督徒,我在一定程度上对他们的主张要说“阿门”,使我不愿意谴责他们;对反对他们,我提不起热情;我情愿和他们合作,去反对我们双方都要反对的势力,尽管我同他们各自有各自的信念来源。

《新约》是我们认识耶稣基督的来源,通过耶稣基督我们得以认识上帝。关于耶稣的记载有两点是很明显的:

(1)耶稣深爱世人。他告诉我们父亲等待浪子回家的故事,也告诉我们有一百只羊的牧羊人找寻其中一只亡羊的故事。耶稣与哀哭的人同哭,与喜乐的人同乐。他没有将那犯了诫命的妇人定罪,

反而保护她。他爱他的朋友们,爱他们到底,他对他们说,“你们心里不要忧愁,你们信上帝,也当信我”(约 14:1)。耶稣带来了新的准则,他说安息日是为人设立的。我们在《新约》中所看到的耶稣,他为人所弃,却忘我地向世人倾注他的爱和怜悯。他受尽苦痛,被钉上十字架,仍然言语温柔。他最终战胜了黑暗的权势。所有这些都在于《新约》读者的人性深处激发起至善,他的生活和他的牺牲都显示出他对世人真挚的爱。

(2)耶稣是宇宙的基督。很多基督徒认为耶稣只是钉在十字架上的那位耶稣,其实这不完全对。他是用他权能的命令托住万有的那一位,他是在整个创造中居首位的,他在万有之先,万有也靠他而立,他是不能看见之上帝的像,是首生的,在一切被造的以先。万有都是靠他造的,无论是天上的、地上的、能看见的、不能看见的。并不是上帝用六天时间创造万物后停下来把控制权交给背叛的撒旦,然后进入世界拯救出一部分人,而让余剩的人承受永远的诅咒。上帝的创造力是永不衰竭的,创造是一个漫长的过程。基督从过去到现在一直在创造工作中与上帝同工。基督施行救赎,也进行创造。救赎是持续的创造工作的一部分。《新约》并没有说上帝只是创造者而不是救赎者,也没有说基督只是救赎者而不是创造者。

上帝通过基督启示他的属性,这是基督教的本质内容。认识到了耶稣的大爱和他是宇宙的基督,我们就得以认识基督所启示的上帝是宇宙中的爱者,是满有慈爱的创造主。

遗憾的是,在中国还没有太多的基督徒有这种认识,我想其他地方的情况也一样。

一般信徒一谈上帝的属性就想到他的无所不能、无所不在、无所不知、他的严厉、他对非信徒的审判。爱多少也被认为是上帝的

属性,但是这种爱似乎是带有随意性的,只有少数被上帝特别拣选的或特别蒙上帝喜悦的人才配享有。对别的人来说,上帝基本上是赏罚分明、难以取悦的。因此,就很多基督徒来说,怕得罪上帝成了他们的主要标志。

我年轻时代所信的基督教就是这样的基督教。我们每个星期天要去教堂讨上帝的喜悦;如果家里有人生病了,那是因为上帝对隐而未显的罪的责罚。当我去读神学,准备加入教会侍奉的时候,家里和教会里的人都认为,这种奉献会赢得上帝的喜欢,给家人和自己带来健康和幸福。

现在,在走访我们的基层教会的时候,我发现很多基督徒的灵性仍然停留在那个水平上。在有些村庄里,半数的基督徒是在病人经过赶鬼祷告得到医治后信主的。基层教会的基督徒喜欢“见证会”,任何人都可以上台讲,通常是有一人遭遇到不幸,他(她)就检查自己犯了什么罪,经过认罪祷告之后,上帝就挪去了这不幸。另外一方面,对于那些心肠刚硬、不思悔改的人,不幸将继续下去,并且越来越严重,导致无穷的痛苦,直至死亡下地狱。

这样的上帝观带有强烈的功利主义色彩。我们赞美尊崇上帝,所得到的回报就是健康、财富、患难时的保护以及天堂永远的福分。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当时有人嘲笑基督能救别人却不能救自己,而今天他的众多跟从者却急着进人教会这只他们心目中的诺亚方舟,一心想救自己,却不顾广大人民的安危。

我们在这里所看见的上帝的形象基本上就是怀特海所称的“统治一切的凯撒”,他用权柄掌管人的命运。这与我们所认识和爱戴的福音书中的基督相去甚远,基督是温柔的,他拒绝用权柄胁迫世人。

说上帝是爱就是肯定上帝是宇宙的爱者,从而认识到爱是上

帝进行持续的创造、救赎和圣化工作的推动力。爱是上帝的最高属性,其他的属性和爱相比都居于次要地位。基督徒通过基督所表现的爱来认识上帝。基督所启示的上帝的最重要的属性就是爱。上帝在自然和人类历史中的创造活动也是出于这爱。我们首先要从上帝不间断的创造活动来看他的爱。单从个人的荣辱兴衰来看上帝的爱,这不是一个高级宗教的标志。上帝期盼着新人类的出现,并在为此工作着。他们出于自由意志,愿意与上帝合作创造真善美以及一切有价值的事物。上帝的爱不带强迫性,它通过教育、劝说和圣化开展工作。在上帝的创造进程中,世界和我们迄今为止都是半成品,通过这一进程,世人由被动地服从命令转变为自愿地回应爱的召唤,也就是说,从必然王国进到了自由王国。

我们所受的教育使我们想象上帝是一个能把我们贬入地狱,或是能使我们升至青云之上的最高权威。这每每反映了我们自己的权欲,以及具有役使性和垄断性的社会结构和大众心态。但是《新约》却告诉我们,上帝的能力来自软弱,他施行权柄不是通过征服,而是通过十字架。我们不要再按古代埃及、波斯、罗马和中国统治者的形象来造作上帝,也不要把法老和凯撒才有的属性归给他。我们要把他的绝对权威、绝对知识、他的永不变更、绝对统治、专断和不容异己这些由人所加给他的属性放到一边,这些其实反映了人,特别是男性自己的意愿。

上帝不是强迫人服从他的暴君。他循循善诱,等待人出于自愿的回应。这就是为什么我们发现福音书中种子和作物受阳光雨露滋润茁壮成长的比喻较之羊群遭杖竿管束击打的比喻要更有吸引力。上帝是团契意志,不是权力意志。我们要离开那威胁人的上帝,一个行事像推土机的上帝,那不是福音书里基督所启示的上帝。我们喜欢《何西阿书》第 11 章第 4 节里那位用慈绳爱索牵引

我们的上帝，他把我们举起如同父母举起自己的孩子，他也俯下身来喂养我们。我在做神学生的时候，曾苦苦思索基督的神性和人性问题。今天，对我来说，承认基督具有神性还不如肯定上帝具有基督的性格以及上帝用基督的那种爱驾驭整个宇宙来得重要。诚如你们所看见的，在肯定爱为上帝的最高属性时，他的全能和全知已被置于次要地位。他乐此不疲地工作着，为要使他已经植入到创造中的潜力发挥出来。上帝因着爱，盼望着在宇宙中出现能与祂进行团契的人。团契就意味着自由，意味着上帝尊重人的选择。人可能会不顺服上帝，这是上帝给人自由所付的代价。

上帝是爱。我们越来越多的人看到，把上帝比作父亲不一定是最好的比喻。在中国，多少世纪以来，人们总是想当然地认为父亲应当严厉，而母亲则是慈祥的。人们在对话中礼节性地称自己的父亲为“家严”，而“家慈”这称号则留给母亲。我们都知道，很难说爱是父亲们的必有属性，有些《圣经》章节很直截了当地用母亲的形象来比喻上帝。在《以赛亚书》第66章第13节里上帝说：“母亲怎样安慰儿子，我就照样安慰你们。”在《以赛亚书》第49章第15节上帝如此说：“妇人焉能忘记她吃奶的婴孩，不怜恤她所生的儿子？即或有忘记的，我却不忘记你。”在《诗篇》第131篇第2节里诗人说道：“我的心平稳安静，好像断过奶的孩子在他母亲的怀中。”所以，说上帝有父亲的属性并不等于说她没有母亲的属性。

基督是宇宙的基督，上帝是宇宙的爱者，这并不意味着在自然界和人类历史中所发生的一切都是出自上帝的旨意。许多事情的发生是与上帝的慈爱相矛盾的，也危害到整个世界的福利。创造是一个漫长的过程，至今尚未完成，就像保罗所说，是不完全、要经过曲折的，特别是当这牵涉到作为上帝子民而不是作为奴隶的自由人的完善时，就更是如此了。在一个处在完善过程中的世界里，

丑恶现象必定仍有其存在的空间。世界上的事情告诉我们,通往自由博爱的完美社会的道路是多么地曲折,上帝和人类向该目标推进的每一步要付出多么沉痛的代价。

上帝是爱,他对世界有个远景,并一直在为其实现而工作着。这就使我们认识到整个存在不是停滞的,而是在发展的过程中。这也使我们对历史和永恒充满盼望。我们不知道历史的最后发展,但是我们确信,那将是爱和恩典的胜利。

保罗在《罗马书》第5章第15至17节把基督的恩典和亚当的堕落作了对比,指出基督对人世的影响大大超过亚当对人世的影响。读这段《圣经》我们受到莫大鼓舞,得到一种解放的感觉。道成肉身深深影响人们和宇宙的整个生活,没有哪一个领域会不受基督恩典的影响。但是基督徒常常把罪普遍化,而把恩典限于向基督认信的少数人。这实在等于声言,上帝的儿子道成肉身的影响还抵不上亚当堕落的影响。这一看法和上帝是爱的观点是不相容的。上帝要救赎、教化和圣化人类,使之臻于完美,有自由、有智性,可以作为上帝的代理人和创造过程中的同工。

从阿拉法到俄梅戛的路不总是平直的,但是爱伴随朝圣者前进。但丁所说的“推动太阳和星宿的爱”将世人从生活的琐碎无奈中救拔出来,使人生变得有意义。我们的确得行经曲折的道路,但是我们记得基督对我们所说的话:“妇人生产的时候就忧愁,因为她的时候到了;既生了孩子,就不再纪念那苦楚,因为欢喜世上生了一个人”(约 16:21)。破晓之前有黑暗,而黑暗之后,黎明终将来到。《诗篇》第30篇第5节说得好:“一宿虽然有哭泣,早晨便必欢呼。”用发展的观点来看待自然、历史和我们自己,这种前瞻性的世界观使得我们的生活有了目标和意义。德日进曾作过这样感人的预言,他说:“到一天,在我们能够管好风雨、潮汐和地心引力之

后,我们将为上帝驾驭爱这一能源,那时,人类将像是在世界史上第二次发现火种那样。”我也同样喜欢现代中国最伟大的作家鲁迅先生所表达的宇宙观和历史观:

“许多美的人和美的事,错综起来像一天云锦,而且万颗奔星似的飞动着,同时又展开去,以至于无穷……”

“诸影诸物,无不解散,而且摇动,扩大,互相融合;刚一融合,却又退缩,复近于原形。边缘都参差如夏云头,镶着日光,发出水银色焰……”

“一切事物统在上面交错,织成一篇,永是生动,永是展开……。”

基督引领着整个创造进入上帝里的团契,这一远象使基督徒深受激励。人类一切的进步、民主和人道主义运动都同基督的救赎工作汇合。教会作为人们公开地认识、承认、敬拜和传讲基督的所在是重要的。世界需要教会所传有关赦免、复和与和平的福音。但是,上帝的救赎工作并不限于教会,而是遍及整个宇宙。就像“梵二会议”所说:“在有形教会之外存在着圣化和真理的因素,因此,对于所有遵从良心命令的人来说,得救所需的帮助总是随处为他们预备着。”我愿意这样想,如果这些因素是组成一个圆的段段弧线,那么基督就是那整个的圆,在他里面一切得以成全和统一。

尽管在这世上有很多令人沮丧的事情,但是信心坚定的人总是相信,上帝的恩典终将胜利,我想引用雨果的话来作为结束:

“将来是否终于会到来?——我们还该向上仰望吗?我们在天边看到的一点光亮,是不是就会消失?理想是难于眼见,很小,很孤立,像个针尖,像在深处失落,像将被周围的黑暗势力所吞没,然而,并不比似乎要被黑云吃掉的一颗星辰处境更危急。”

在认识上帝的道路上,人类还在寻求和摸索着。我在今天的讲话中已告诉各位,圣灵带领我和我的同工同道们现在走到了朝圣路上的哪一站。为了继续成长,我愿意自己思想敞开,接受来自各位和任何一方的亮光。

我们正在怎样办好教会

(一九九四年四月)

于南京在浸会世界联盟退修会上的演讲)

我应邀在此向各位介绍今日中国基督教会的情况。我将试着从几个方面来谈。

首先,我们说我们是宗派后的教会,这是何所指?

宗派架构在三十多年前就已经不再存在。绝大多数的基督徒是宗派后时期的基督徒,也就是说,他们从来都不是任何一个宗派的成员。在一些老年信徒当中,宗派感情依旧存在。在信仰和崇拜上,我们持守彼此尊重的原则。但是,保持多样性并不只是为了有宗派感情的老年信徒之故,我们想要通过鼓励多样性,在耶稣基督的教会中实现他的丰富。我们希望看到一个具有创意的多样性的教会。在这里,差异不仅受到宽容,而且得到尊重。要达成这一广度,我们还有很多工作要做。

中国基督教协会是我们中国基督教宗派后的团结在教务组织上的体现。它不同于一些国家的全国基督教协进会,因为现在中国已不存在组成这一性质的机构所需的教派。但是它也不是中国联合基督教会,因为具有某些宗派背景的基督徒还不准备走那么远。比如,有的教派给予信徒皆祭司的解释使按牧成为毫无意义。他们也把教会的地方性解释为,一个教会要成其为教会,就必须而且只能是地方性的。这就使他们不可能加入一个地区性和全国性的教会组织。几年以前,我们不得不作出选择:是向前跨一步,组成不包括这些教派在内的中国联合基督教会,还是不跨这一步,仍

使这些信徒留在中国基督教协会之内,维持较低程度的宗派后团结。我们选择了后者,这样,所有相关的新教宗派都表示满意。有些希望更快地向前推进的个人则表示失望。

我们很高兴能够享有这样的团结局面。这与基督要我们合而为一的祷告较为接近。但是,过去三十多年来的经验也告诉我们,这种包括有着形形色色主张的新教徒的大联合,因为要避免在某些敏感问题上冒犯人,维护依然脆弱的团结,所以会压抑创造性的神学思维以及教会论方面的实践。这似乎表明了人所要面对的一个两难处境:没有一种选择是不带拖累的。

过去,在中国至少有六七十个大小的宗派。我们之所以能进入宗派后时期,主要是因为宗派在中国历史较短,基督徒对宗派的感情相对较弱。从社会层面来讲,解放后,即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后,有着较强烈宗派意识的传教士的撤出,以及社会上对全民团结的强调,确实对我们基督徒在作选择时有较大影响。

我们的宗派后团结在我国这些年来的对外开放中受到考验。宗派主义在我们以外的世界里是根深蒂固的。国外有些团体希望在中国恢复旧日的宗派。到目前为止,我们的联合足以抵制住来自外部的牵引力,对此我们感到欣慰。

第二,今天我们如何看待三自?

我们的教会多年以来一直注重保存和发展中国基督教的自我。我们不满足于只是作为西方教会的传教地图上的一个点,尽管这是比较大的一点。中国教会不必成为西方教会的复制品,而是应当有一个自我,这样才能名正言顺地向我们的同胞传达它的信息。因此,就有了我们的三自运动。三自运动的目的是使中国教会达到自治、自养、自传。经过三十多年的努力,我们现在已初步实现了自治、自养和自传,即由我们自己来传扬基督教的信仰。

换句话说,中国现在没有西方传教士,也不再是别的教会的传教区,是我们自己在建设教会。这就使得中国教会有了一个中国形象。这一点在解放后的中国是至关重要的。

纵观教会历史,教会一直是在寻求与本地和本国的文化作某种程度的认同。当基督的福音首次传到犹太以外的世界时,关于传教士是否得拘泥于犹太习俗并勉强外邦人归化成为犹太人这一问题就出现了。就这一问题,耶路撒冷会议作出了非犹太化的决定。当福音传至欧洲时,一些具有远见的人们在神学、灵性和艺术方面进行了开拓性的尝试,以使基督教的信息能够面向欧洲人的思想和心态说话。任何时候教会进入新的处境或新的时代时,文化若制约其向前的发展,那么变革便势所难免。

有鉴于此,我要说,三自运动并不是一个反对传教的运动。我们并不反对传教士。是他们将基督的福音带到我们的国家。对于传教士所作的一切好事,我们要向他们表示感谢,也要感谢上帝。但是,传教士们来有时,去也有时。凡是出色的传教士都努力地工作,为的是使自己可以及早脱身,让本地同工来接替他们。我们希望以前在中国工作的传教士不要把今天的中国教会看作是对他们所做的奠基工作的否定,而是应当把它当作他们辛劳的结果。我们对传教士与西方殖民主义和帝国主义是加以区分的。

三自并不是中国基督徒的发明,更不是中国共产党的发明。英国圣公会差传会的负责人亨利·樊(Henry Venn)早在一八五〇年就首先将这三者结合起来,作为传教工作的目标。

三自运动是非常重要的,但是在以下两个方面仍显不足:

(一)我们在力求自治、自养、自传之余,也要注重治好、养好、传好。在这三个方面我们还做得不够,这就是现在我们强调要建设好教会,即办好教会的原因。中国基督教协会继三自运动后成

立,表达了广大信徒要求办好教会的共同心声。今天,我们在中国基督教协会内设有神学教育委员会、《圣经》出版委员会、文字工作委员会、妇女事工委员会、农村工作委员会、圣乐委员会等专门委员会。

(二)一个教会只顾自己是不够的,也是不好的。普世教会向各个教会提供灵性滋养。一个教会如果意识不到它源于普世教会,不与普世教会发生联系,那么它的自我必定会枯竭。普世性和特殊性两者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彼此丰富;在时间上贯穿历史,在空间上遍布全世界的教会最终进入耶稣基督里的丰富。因此,今天我们不但不回避,而且欢迎国际的和普世的交往、对话、分享。中国基督教协会现已成为世界基督教教会联合会的会员。我们接待了来自世界各地教会的访问者,也参加在国内和国外举行的有关教会问题和宗教问题的国际性研讨会。国外的神学家和语言教师现在可以在我们的神学院校和大专院校讲课。爱德印刷公司是世界各地的基督徒通过联合圣经公会援建的,今年将生产出十年内的第一千万部《圣经》。

第三,我们能否说,中国基督教已经完全联合了?

大多数的中国基督徒是在三自运动和中国基督教协会支持下的教会和聚会点的成员。总共有至少八千间教会以及几万个聚会点。

有些聚会点同三自运动和基督教协会没有联系,或者联系较少,这常常是因为它们和两会所在地的地理距离较远,有时也是出于对当地两会领导层这样或那样的不满。然而,只要这些聚会点是实行自治、自养、自传的,我们就不应视他们为反对三自运动和中国基督教协会的。

也有少数聚会点领导人对三自组织和基督教协会采取敌视的

态度。香港和海外一些所谓“中国事工”声称向他们提供秘密支持。他们竭力在中国基督徒中间鼓动分裂情绪。

中国基督教协会和三自运动的政策是：一视同仁地向所有的基督教单位提供服务，寻求和睦，加强沟通，藉此扩大团结面。

第四，“文化大革命”对教会产生了怎样的影响？

我们的教会经历了“文化大革命”。那时，我们因着信仰的缘故深受极左路线之苦。极左路线是任何革命运动都可能有的弊端，它不顾实际情况及人民的参与意愿，试图通过灌输恐怖，强制推行过激的变革。在中国，极左路线在“文革”时期达到了极致，而“文化大革命”也成了“大革文化之命”。在“文革”期间，我们所有的教堂都被关闭了，许多更被移作他用。失去了教堂，这只会使我们基督徒认识到，耶稣基督的教会并不依存于任何建筑物。许多牧师和信徒遭受到各种各样的逼迫。我们的境遇——就如《希伯来书》第10章第33节上所说：“被毁谤，遭患难，成了戏景，叫众人观看。”但是，处于软弱无力之中的基督徒和教会却博得了不少人无声的同情和善意。中国教会无权无势，但是福音本身却是满有能力的。基督徒的无权无势正衬托出基督的大能。他们以良善的生活表现，使人们给予他们公正的评价；藉着他们在逆境中所作的无声的见证，带领人进入对基督的信仰。

“文化大革命”的经历使基督徒懂得：当我们软弱欲绝的时候，新的生命却正在生发；我们的能力来自软弱，生命来自死亡。基督的复活告诉我们，温柔的人必承受地土。

“文革”之后，随着极左路线受到全面批判，宗教信仰自由的原则得以重新贯彻。在过去的十四年中，平均每两天就有三间教堂开放或建成。此外，还存在着几万个聚会点。在某些地方，贯彻宗教信仰自由政策还有困难。三自组织和中国基督教协会收到了这

些地方信徒的申诉,将这些案例转到适当的政府部门,要求予以纠正。

极左路线也使我们在长达二十四年的时间里难以进行完整的神学教育,所以今天教会领袖不但人数少,而且大多数年纪很大。在一个有着几百万信徒的教会里只有一千二百位牧师,而他们中很多人还是在四十年代被按立的。这一比例在世界上其他地方很可能是闻所未闻的。直到近几年,随着十三所神学院校的神学生陆续毕业,教牧队伍才充实起来。

在一个处于这样一种境况中的教会里,义工队伍是必不可少的。我们大部分的教堂和聚会点的工作是由义工负责的。义工培训是各级两会的工作重点。加之在农村地区不符合《圣经》教训的异端邪说容易滋长,所以就更要加强义工培训工作了。由于各堂点的领导层中绝大多数是平信徒,因此,教会中的圣礼部分,例如圣餐、洗礼和按立,没能得到应有的重视,出现了一些不正常的现象,这是非常遗憾的。

第五,我们如何看待无神论,如何看待一个无神论的政府?

信奉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共产党主张无神论,不相信宗教,但是和前苏联的共产党又很有不同,因为它非常重视统一战线。现在我国的头等大事是国家的繁荣,而不是宣传意识形态。共产党懂得,它必须团结和依靠所有希望国家繁荣的人们,其中也包括基督徒。为了达成团结,意识形态方面的分歧必须置于次要地位,宗教信仰应当受到尊重。这是党的领导层愿意看到人民享有宗教信仰自由的一个很现实的根据,只要这一自由不被用来颠覆政府就可以了。

和前苏联不同的是,在中国并没有一个“反上帝运动”,也没有以反对宗教为目的的刊物。有一个研究中国无神论历史的学术机

构,这是惟一和无神论有关的组织。在学术界以外,几乎没有人注意到它的存在。

在中国有人宣传无神论,我对此并不感到特别不安,因为上帝昔在、今在、以后永在的事实并不会因为有人否定他的存在而改变。在我们这高度世俗化的社会里,对上帝的否定至少向人们提出了有关上帝的问题,让人们看到,上帝问题至少是值得考虑的。就像在十九世纪的欧洲,尼采提出“上帝已死”的论点,这在其后的几十年里激发起了不少人对上帝问题的兴趣。

无神论者所要否认其存在的究竟是什么样的神明呢?是专制的宙斯,他因为普罗米修斯从天上偷取火种带到人间而用锁链将他锁在悬崖上;是中国民间宗教里残暴的阎王,他派出差役将人捉拿投入地狱永火,作为对世人的惩罚。我们可以和各类人道主义者联合起来,反对一切贬低人的尊严、阻碍人类解放的偶像崇拜。我有时讲一些欣赏某些无神论者和共产党员的话,对此我的一些海外朋友感到惊讶。作为基督徒,我在一定程度上对他们的主张和行为要说“阿门”,使我不愿意谴责他们,对反对他们我提不起热情;我情愿与他们合作去反对我们双方都要反对的势力,尽管我同他们各自有各自的信念来源。

有些西方基督徒责怪我们没有反对共产党,在与共产党打交道时缺乏斗争精神。他们总以为,共产党既是讲无神论的,一定会逼迫甚至消灭宗教,基督徒义无反顾地应与之对抗,甚至殉道。我们并没有接受他们的意见,轻易地要求信徒不顾教会和国家利益去“殉道”。只要基督徒和共产党作为中国人还有共同的立场,只要我们还有继续进行崇拜、见证和教会生活的空间,只要我们在统一战线之内就贯彻宗教信仰自由原则的对话和磋商的通道仍然敞开,我们就没有理由和无神论者相敌对。

我可以用堂点登记这件事来说明。政府主要是出于防止国外敌对势力利用宗教进行颠覆活动的考虑,要求所有宗教活动场所向政府登记。教会除了是基督的身体之外,也是一个公民组织,而在中国所有的民间团体都是向政府登记的,所以我们并不反对登记。然而,我们也要求政府向公众说明登记的标准,以便于公众监督。政府方面已同意我们的要求。

第六,一直以来在中国起重要作用的知识分子是否敌视基督教?

知识分子今天对基督教的态度比自景教传入中国以来的任何时期都更为开放和友善。

早期的传教士为了立足,不得不尽量表明基督教同佛教和儒家并没有多大的不同。当时中国的知识分子对他们抱怀疑和鄙视的态度。为了立足,传教士们把西方的天文学、几何学、数学和其他科学介绍给中国皇帝。他们借用佛经和中国古典著作中的语汇,模仿中国文人的穿着和举止。此后西方列强在中国的政治和军事介入使传教士的地位得以稳固。传教士在教育和医疗领域所作的贡献在一定程度上博得了中国人民的善意,但是并没有多少人皈依基督教。

一九四九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后,随着唯物主义世界观和历史观开始盛行,特别是在极左路线的影响下,基督教遭到排斥,被视为鸦片。把“宗教是人民的鸦片”当作唯一正确的马克思主义对宗教的定义,这忽略了马克思和恩格斯其他有关宗教的论述。马克思没有简单地把宗教斥为鸦片,而是看到了宗教作为“关于这世界的总的理论和包罗万象的原则”的重要性,又说:“要了解人类,就得了解世界;要了解世界,就得了解它总的理论和包罗万象的原则。”这就是指宗教。所以,鸦片一说并没有能够穷宗教的

究竟。

随着“四人帮”的倒台,在邓小平的领导下,极左路线在全国范围内受到批判,知识界的空气为之一新,对基督教的看法也进入了实事求是的阶段。人们对基督教和《圣经》表现出了前所未有的兴趣。“文革”之前或“文革”期间论述宗教的学术性文章几乎没有一篇不把宗教和鸦片相联系的。但是在过去的十几年的时间里,学者们开始转变立场,认为用鸦片来作为宗教的定义不够确切。他们认为,在某种情况下,就像恩格斯在《德国农民战争》中所写的,宗教起着进步甚至革命的作用。同时,他们中的许多人也不再把宗教和迷信看为等同,而是肯定宗教是人类文化的一部分,并为之作出过贡献。对于西方的基督徒和神学家来说,这些观点可能很平常,但是在中国,相对于宗教在此前所受到的诋毁,这可以说是具有划时代意义的。

在听了这么多关于宗教是鸦片,宗教是反动的和具有欺骗性的等等说法之后,再听到共产党最高领导层谈到“宗教在中国的五性”,那是颇受鼓舞的。这五性分别是:群众性、民族性、国际性、长期性和复杂性。很明显,对宗教的这五个特性的认识使得大家愿意公正地对待宗教,贯彻宗教信仰自由的原则。今天,一般认为,就各自的现实纲领而言,宗教和社会主义是能够相容的。

我们在金陵协和神学院尤其感到了周围学术空气的变化。在五十年代,我们神学院是南京地图上一个孤立的点,被人视为迷信活动的中心,不值一顾,所以各大学的教师和学生也与我们保持距离。今天,我们是南京大学的宗教研究中心,我们的教师也参与南京大学的教学工作。中心每半年出版一期《宗教》,在很多大学院校、社科院、各级政府的宗教工作部门和统战部门都能看到,这是我和非基督徒进行沟通的一个良好途径。

我们中国教会将知识分子,特别是向教会靠拢的那一部分知识分子视为我们开展事工的重要对象。他们中的一部分人已翻译了大量的西方神学著作,他们在著述中对基督教态度友善。我特别愿意提到“文化基督徒”,他们的态度和尼采所描绘的十九世纪欧洲的“鄙视基督教的文化人”正好相反。我们的“文化基督徒”除了不相信洗礼,不上教堂做礼拜以外,已经非常接近基督教信仰。他们是教会和知识界的桥梁和中介,是我们重要的同盟者。

从我以上所说,你们可以看出,教会在中国的职能有两个方面:一是在教会内,二是对于教会以外的世界。在教会内,我们强调发展中国基督教的自我,通过在信仰和崇拜上彼此尊重来维护宗派后的团结,重视信徒的灵性培养和爱国主义教育以及教会的团契生活,就教会的普世性加强自身教育,对平信徒进行培训,通过提供服务与寻求和睦来扩大我们的团结面,以求接纳一切尊奉耶稣基督为主的人。对于教会以外的世界,我们会尽力反对政治生活中的极左思想,提升基督教作为一个中国宗教的形象,为基督作见证,特别是要对目前知识界的开明态度作出回应,继续就维护宗教信仰自由同政府展开对话。就我所见,这几点已经概括了教会在中国社会中的职能或事工。

将中国教会描绘得一片美好,这并无益处。清醒地看待我们的处境是很重要的。然而,尽管教会今天和在历史上总是被各种问题、软弱和错误所困扰,却仍然为基督作见证,并且在逆境中成长。想到这里,我们便鼓起勇气,和基督在地上的教会一齐说:

她在争战喧声里,
艰难劳苦之中,
她却深信有平安,
安心静待成功;

直至欲穿的望眼，
看见天上远像，
到时凯旋的教会，
得享永憩无疆。

在布拉格伯利恒教堂的演讲

(一九六一年)

在此具有历史意义的圣殿里，历代的圣徒曾瞻仰过上帝的荣美，他们在世用言语和行为作见证时也曾因这殿而得力。当我们与他们汇集，齐来敬拜那配得我们敬拜的上帝时，我们是何等深切地感到他的同在和亲近。约翰·胡斯和他所代表的精神久已成为人类的共同财富。在此时刻，当我们转而念及上帝曾在过往各时代以不同方式藉着众先知向我们的祖先说话时，不禁谦卑感恩，意识到今日我们作为他们的继承者在同一历史进程中所担负的责任。

记载在《约翰福音》第21章第15至17节那里的一段经文启示我们有关基督对教会的期望和忧虑。基督把牧人的形象摆在教会面前——看护者、劝慰者、朋友。这就是教会在人们期望中的形象。但同时基督也担心教会可能失去起初的爱心，不能尽其牧人的职责，而置羊群于不顾，甚至给狼以可乘之机来骚扰羊群。出于高度的期望和担忧，他不断地问彼得：“你爱我吗？”

教会当如何来爱基督呢？让我们来考察基督对教会的爱，从中得些教益。

“……基督爱教会，为教会舍己。要用水藉着道把教会洗净，成为圣洁，可以献给自己，作个荣耀的教会，毫无玷污、皱纹等类的病，乃是圣洁没有瑕疵的”（弗5:25—27）。从这段话我们得知，基督对教会的爱乃是见之于他所做的净化和圣化的工作。

教会的首要特征不能是它的遍世之盟,无论这在人看来是多么堂皇。教会的首要特征必须是它的圣洁。

教会的圣性是在于它脱离此世的罪恶,把自己分别为圣,为人间的爱、正义与真理而服务。出于圣灵己意的合一,真正有助于推展教会的公性,自然是我们所祈求、所探寻的。但是一个试图超脱或忽略是非之分、曲解或搞混善恶之别的合一,常常会给教会引来各样的失误、污浊、堕落和苦痛。故此,可以想见,有时候分离可以跃升为教会的原则,恰如合一在别的时候为教会的原则。

在《启示录》里,七教会屡次为它们不圣洁的结盟而受责备,其中并无一次对这种结盟的鼓励。

这些天来,我们为求世界和平进程相聚布拉格,所要求于我们的就是要分清是非。“你们要追求与众人和睦,并要追求圣洁”(来12:14)。追求圣洁就意味着放弃道德虚无主义。

有时我们听到这样一种说法,即:分析事实和澄清问题不仅是徒劳的,也表明了人的骄傲和自以为义,因为,据说世界上的每一个人都是不安分的,都怀有邪恶的冷战精神。当人们欲探明某些紧张形势的症结的时候,有人会发话以“罪的普遍性”责难每一个人,并且不分青红皂白地驱人“悔罪”。这样,在我们弄清事实真相之前,我们基督教的纯正教训便被用来混淆对人至关重要的问题。对国际社会里的说法与紧张态势本该由有关的人承担责任,也因之而转嫁至所有的人。

我们在基督里得与上帝和好,这就促使我们与此世的罪恶为仇,当然也不放过我们自身的错失。尼哥迪大主教在他的演讲中说得好:“基督带给世上的和平并不意味着要我们与此世的罪恶相融合,相反地,是要我们坚决地胜过邪恶,将罪除灭……这是一场

艰苦而持久的争战。”

当狼攻击羊群的时候，牧人的职责是站在羊群一边，保护它们。若他以公正为名，把狼视为与羊同等，那他还算是什么牧人呢？同样道理，我们又怎敢在受害者和加害者之间作模棱两可、各打五十大板的判断呢？

弟兄姊妹们，我们是在伟大的约翰·胡斯的故土上举行这次基督徒和平大会。史蒂芬斯牧师已经向我们讲述了非洲的弟兄姐妹在过去乃至今天如何深受殖民主义之苦。费尔南德兹·赛巴洛斯牧师也告诉我们古巴最近所受到的人侵。我们已经听见了各国人民为和平而奋斗的呼声。所有这些都激励我们像胡斯当年一样，与世界各地为反对侵略而斗争的大多数的人民同心协力。这是上帝在今天对我们的呼召。回应这呼召乃是我们的历史使命。

今天，在这伯利恒教堂，我们在约翰·胡斯几百年前曾祷告过的地方祷告，在他曾赞美上帝之处放声赞美。胡斯痛苦地看到在外国政治势力的影响和国内反动独裁者的控制下教会中的腐败和堕落，奋而展开了圣洁的旗帜。这不是一种空洞、贫乏、消极、在现实世界里毫无意义的圣洁，而是有其实内容的。圣洁意味着真正地关注人民的疾苦和渴求，寻求他们的福祉，以及在罪恶出现之地与之作坚决的斗争。我们亲爱的赫罗马得卡教授告诉我，在捷克斯洛伐克国家文学博物馆的墙上刻着约翰·胡斯讲的一段话：“我若闭口不言就有祸了。若不反对巨恶，则不如死；因这等于是与罪和地狱同流合污。”直至今日，约翰·胡斯的声音感力犹存，仍在我们的内心深处激起波澜。

分清是非，明确立场是有悖于基督教信仰的吗？远非如此。这正是信仰要求我们去做。这是否表明我们缺乏对基督的爱？绝非如此。对基督的真爱要求我们那样做。这又是否是自以为

义？当然不是。这正是保罗在上帝面前所祷告的，他说：“我所祷告的，就是要你们的爱心在知识和各样见识上多而又多，使你们能分清是非，作诚实无过的人，直到基督的日子”（腓 1:9、10）。

但愿赐平安的上帝，就是那凭永约之血使群羊的大牧人我主耶稣从死里复活的上帝，在各样善事上成全你们，叫你们遵行他的旨意，又藉着耶稣基督从你们心里行他所喜悦的事。愿荣耀归给他，直到永远，阿门。

在美国纽约河滨教堂的演讲

(一九七九年九月)

如果我们回顾一下过去一个多世纪以来的中美关系史,有两件事会给我们留下深刻的印象:首先,尽管我们能回忆起两国之间一些敌对的事件,然而我们两国人民间的友好关系始终占上风;其次,我们两国基督徒在促进相互了解和友谊方面曾经做了不少工作,现在可以做更多的工作。因此,我的中国同道们十分高兴派我们四人前来北美访问,我此刻以十分喜悦的心情代表他们向你们致意。在我们之间的联系几乎完全中断的年代里,美国基督徒为我们祷告,我向他们表示感谢。你们有些祷告的话是根据误传,但我认为不要紧,上帝听的时候心里是清楚的。

我意识到,这次来北美访问数周,除了可以倾听和学习北美基督徒外,我们难免也得向一些听众讲讲话。过去三十年积累了那么多的话要在我们基督徒团契里来讲,我该讲什么才好呢?怎样把材料加以挑选和整理呢?我感到自己多少像你们大家常讲的那只蜈蚣似的,它有那么多条腿,反而不知道该先移动哪一条好。今晨,就让我同你们大家谈一下关于人,也就是关于我们自己这一方面的一些体会吧。这些是我作为新中国一个基督徒在将近三十年当中所获得的认识。

我不妨开始先说,在人是罪人和人需要基督救恩这一点上,我没有什么特别新鲜的东西可向大家报告。关于人,我在过去的三

十年中曾经看到充分的证据,足以坚定我的基督教观念。我曾经遇到过不少真正革命者,道德品质高尚的人,并为他们所感动。他们三十年、四十年或五十年之久,抛弃一切所有,献身于使中国人民能在自己的国土上过得美好一点的事业,他们那种坚韧不拔和自我牺牲的崇高精神,给我留下了极深的印象。他们为了维护革命事业,对于自己的缺点和不足之处非常敏感,对自己批评和自我改造要求非常严格。而正是这些令人钦佩的人物,对圣保罗所说的“我所愿意的,我并不作;我所憎恶的,我倒去作”(罗 7:15)这话,不是反对而是抱有同感。如果为自己树立这种崇高道德标准的人尚且如此,那么,在我们基督徒看来,十分明显,基督救赎和圣灵成圣之功的信息,是至关重要的,是大有意义的。

我们许多中国基督徒的一个新的洞悟倒是,人不但是个罪人,而且也是个受罪者。传福音工作不是去定人的罪,而是同社会罪恶的受害者站在一边,与他们息息相关,休戚与共。光定人的罪不是真正传福音的宗旨。光定人的罪不会导致悔改和接受基督为救主。约拿把宣布群众为罪人一事当作一件称心和高兴的事去做,因为这和他的沙文主义、孤傲心理正好一致。在他的判罪宣告中毫无爱心和怜悯心。这样传出来的信息是灭亡的信息,而不是拯救的信息。

在福音书里,我们常常读到关于耶稣对众人同情怜悯的章节。耶稣的怜悯心不光是对人表示可怜之情,不光是给予他们施舍,也不是表现出一个带着优越感的人对待地位低下的人的那种态度,而是同贫穷、饥饿和体弱的人,那些深受不公正制度损害的,那些世世代代被摒弃、蒙受非人待遇和被挤到社会边缘的无名小卒,总之,是同那些遭受严重损害的人们,一道分担忧患,同甘共苦。

仅仅说人都是罪人,这无非把人赶走。正是同情之心驱使耶

稣同人民群众打成一片,同时把他们引向自己这一边来。只有当中国基督徒丢下自己的那种漠不关心态度而去接近自己的人民群众,我们才能体会到他们受害程度之深,从而基督的同情之心在我们心中油然而生。这个同情之心使我们同人民群众有了共同语言。当我们带着对自己的人民长期经受苦难的认识再去阅读《新约圣经》时,我们仿佛进一步领悟到基督对受害者的同情心,也越发被他的挚爱所感动。我们带着《新约》中的教训再去聆听中国革命家给我们指出的:我们的人民曾经遭受帝国主义、官僚资本主义和封建主义,即我们通常称呼的“三座大山”的沉重压迫,并且直到今天还在承受其恶果。正是在这里,我们发现了中国基督徒和中国人民相一致的看法。我们认为,这个共同立场或共同语言,对我们极其重要,因为站在这个共同立场上,传道人可以作为人民群众的一分子来讲话,而不是作为来自海外,或来自上面或来自外面的人来发言。他说话出于对人民的真正挚爱,摆脱了像约拿对被他们遣往那个地方的人民极端憎恶的那种厌恶人类的思想。

有人说得很聪明:传道就像一个乞丐告诉另一个乞丐到哪里可以讨得到饭吃。不错,但这不是“传道”这个词的全部意义。乞丐更需要知道,他们的饥饿,他们的疾病,他们的失业,他们睡在人行道上,他们的婴儿死亡率,乃至他们的乞讨生涯,所有这一切都不是上帝的旨意,而是由于少数人为了贪婪权势金钱,也是由于他们本身的逆来顺受所造成的结果。我们必须帮助乞丐认清,不是上帝的旨意使他们沦为乞丐的命运。事实是:社会上层少数人在统治一切,在享受生活中一切珍贵美好的东西,然后从他们的财富中拿出一点点来周济乞丐,有的连这一点也不去做。只有当我们真正关心和热爱这些受苦的男女群众时,上帝才会把为拯救罪人的主耶稣基督作见证的话语放在我们的口中。只有在那时我们

才能说出有力量的话语来；也只有在那时，人民群众将乐于来听我们的声音。

换句话说，我们这才认识到我们从前对我们的人民的确是多么缺乏真正的爱心啊！热爱自己的人民不仅仅是向他们微笑和表示友好。把自己置于他们的地位，深入到他们的感情中去，和他们有共同的感受，了解他们的事业的正义性，与他们结成联合阵线，这就是把我们的共同事业和上帝的旨意以及整个宇宙间的灵性力量联系起来。爱心的确体现在所有这一切方面。

“再等四十日，尼尼微必倾覆了！”（拿 3:4）这个使约拿感到兴奋的消息，完全克服了约拿不愿去该城的心情，因为他对人民的解放毫不关心，尼尼微要毁灭的消息恰恰是他乐于说出的话。但是，以基督精神传福音的传道人，从来不敢宣布灭亡的信息，宣布这种信息会使他极其伤心。有爱心，才能真正传得出福音。

我想再进一步谈谈。世界上的受罪者感到自己如此无依无靠和失去了爱，以至于他们几乎总是倾向于使自己组成各种组织、集体和团契。我想，法西斯和半法西斯组织所犯的暴行不应该使神学家们对人的一切集体都抱反感。人的集体，即使那些不挂着基督名义的集体，往往会成为把上帝的恩典带给人群的渠道。

像我这样一个曾经受过高踞于广大人民群众之上的儒家传统熏陶而没有完全基督化的中国知识分子，在这些年中确实经历了一段不短的不寻常的生活历程，渐渐认识到在人们的社会组织中存在着莫大的教育意义和灵性的潜在力。个人总是有这样那样的弱点。但是，在人们志同道合的关系中，却能产生一种鼓舞作用，使同志们能达到单独个人所无法达到的高度。对个人起着鼓舞、改造和促进作用的，正是集体中的共同目标和共同热情。

我有一个学生朋友遇到了一桩严重的个人问题。他起初单独

只身与之作斗争,但没有取得胜利。他后来求教于他的伙伴们,从他们那里获得了帮助和力量。他开始对事情有了新的领悟,于是当他从磨炼中高兴地挣脱出来,成为一个更加坚强的人的时候,他说:“我现在认识到,今天在我们的社会里,总是有很多人愿意伸出他们的友谊的手来鼓励你、支持你。就像在盐海里,你是不会下沉的。”这向我们清楚地揭示,基督的信徒团体本来应该是个什么样子。我明白这也是你们河滨教堂旨在实现的目标。

我们用不着到中国去寻找实例。就在美国这里,有位非常出名的夫人是一个吸毒成瘾的人。因为这个坏嗜好给她和家人带来了痛苦,她的家属不得不将她送进医院。她在医院里样样都感到不顺心,因为她在那里只被当作普通病人看待,没有得到特别照顾。她不得不参加到她分配去的那个小组里。她在那儿不愿发言。但有一天,同组的一个病人带着轻蔑口气正在谈论养成坏嗜好是个人自由,它对别人不相干。这位夫人从她自己的亲身经历深知这种说法是错误的,于是她也开口了,她把自己的坏习惯如何使她的亲人遭到痛苦的事实说了出来。她立刻被这个小组所接纳,大家对她亲昵起来,开始叫她名字。从此,她不再仅仅是一个病患者,而是变成这所医院治疗力量的一分子。她的这一行为带来了新的生活,很快她完全从她的不良嗜好中解脱出来。不友好的人可以说,她被洗过脑筋了,但是,更确切的一个词也许应该是改造,或改悔,或转变;或者说,通过集体的帮助,她朝着上帝身边迈进了一步。

我们回忆当复活的基督即将升天之前,他嘱咐他的朋友的一件事就是,不要分散,而要在耶路撒冷聚集,一道祷告和等待。今天我们认识到,这就是圣灵降临的条件。因此,我们不应当对人的集体采取否定态度。越来越多的基督徒正在认识到,与超在者上

帝的交往与其说远在彼岸,倒不如说就在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之中。当我们进入到人类关系的深处时,且不论这些关系是多么属于人世不属于教会,我们实实在在地是向神圣的上帝打开了心门,迎接他进来。上帝是爱,我们只有在爱中,才能与宇宙至高无上的真体接触和接近,从而使我们自己与上帝的神性契合。

我们了解,某些存在主义哲学家坚持,人类生活由于其社会性质,本质上是给人们带来异化作用的。他们宣传人的团体必然比组成团体的个人更不讲道德。他们甚至说,人的有限和罪恶在集体关系中突出地表现出来。他们说在人性里面的邪恶冲动在集体行动中可以发挥到凶恶残暴的程度。所有这些对集体的否定,不符合我们中国人的经历,也和教会关于圣灵进驻人心与促进善行的恩典的教训背道而驰。我想知道,这种对人类集体的厌恶,究竟在多大程度上实际反映了有些文化中日益增长的个人主义思想,或者也反映了那些以使群众永远处于四分五裂状态为其基本出发点的对人的恐惧心理?也许我是在批评一种目前在附近一带已经不大时行的神学现象?我很想知道。

我今天在这里向你们大家拉拉杂杂地讲了一些我们中国基督徒关于人和关于人的集体的想法,这些想法是我和我在中国的同道们这些年来在头脑中逐步形成的。我一开始就说过,我来北美洲的目的应该是多听听和多学习一些东西,其他方面都是次要的。但是,事实却是,我在开始这次访问所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到这个讲坛上来讲话。这是我的自相矛盾。我答应,在今后几个星期里,为了克服这一点,我要多听少讲,好增进见识,以便有很多的东西可以带回给我在国内的同工同道们。

一个中国基督徒怎样看无神论者

(一九七九年十一月在温哥华一神学院的演讲)

由一个基督徒来讲肯定无神论者的话,各位可能没有思想准备,因为无神论者否认上帝的存在,甚至认为宗教没有价值。但是这里所涉及的灵性层面确是值得探讨的。

我发现,不能把所有的无神论者归入同一类型。无神论者至少可分为三类。

第一类人,他们之所以成为无神论者,是因为他们担当不起上帝存在的事实。他们没有道德心,自私自利,胡作非为,不负责任。如果有上帝,那么上帝肯定不会赞同他们的所作所为,会谴责他们的生活方式。他们的这种无神论其实是用来麻醉自己的鸦片,是自欺的。

然而,有时候这类无神论者也居然道貌岸然地想充当宗教的守护者。从古到今,很多政治人物曾装出敬虔的样子,为的是利用宗教达到他们自己不可告人的目的。比如,希律王就曾想以朝拜新生的基督为名,将他杀害。

我们可以称这第一类无神论者为不择手段的无神论者。陀斯妥耶夫斯基说:“假如没有上帝,那么任何事都可以做。”他在说这话的时候,心目中一定只有这一类无神论者。

第二类人,他们是诚实的无神论者。他们认真地对待上帝这一概念,觉得对此只能存虚无主义和不可知论的态度。

我们基督徒认为,上帝是父,也是全能的。但是你是否意识

到,在一个充斥着痛苦、贫穷和异化的世界里,这话是难以接受的?上帝要么是既不能够也不愿意消灭恶,要么是他能够但不愿意,要么是尽管愿意但不能够,要么是既能够也愿意。只有最后一种情况才与基督教所推崇的神性相配,但是对于生活在痛苦和绝望中的人来说,一位既全爱又全能的上帝似乎并不存在。非正义和邪恶的事情随处可见,这真是使人难以相信上帝是全能的父。我们倒是很容易感觉到我们是生活在一个冰冷无情的宇宙中,除了我们自己之外一无所依。所以,有些无神论者以严肃的态度费尽心思考虑这些问题,他们发自内心的怀疑和不信是值得我们理解和同情的。

第三类无神论者是社会改革者和革命者。他们的无神论是人道主义的无神论。就宗教所渲染的上帝而言,他们不得不拒绝他,因为他们认为,上帝只不过是现状的维护者,他反对社会结构和价值体系的改革,保护腐朽和不公道的社会秩序。他和压迫性社会里的非正义者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他站在压迫阶级和剥削阶级一边,所以被压迫和被剥削者理所当然必须拒绝他。

为什么当初中国具有改革和革命思想的知识分子会拒绝基督徒的上帝呢?因为全世界的基督徒似乎都站在蒋介石一边,因为在一九四九年人民解放军渡江前夕,基督徒曾祷告祈求上帝行神迹使解放军战士淹死在长江里。这一祷告是残忍和反动的。上海刚解放不久,一个基督徒领袖竟然从地面给敌机发出信号,以便于对方轰炸。尽管做了这事,还有人为他辩护说,作为一个重生的人,他是不可能犯罪的,因为他已不在律法之下。换句话说,一个被预定得救的选民,可以不受道德法的约束。这样说来,因信称义就可以不遵守法律了。假如你信仰基督,那么任何事都是许可做的。这就是“道德无用论”所宣扬的。它所推出的是上帝准许基督

徒和基督教国家做任何事情。

如果我们的上帝在政治上如此反动,我们又怎能期待人道主义者和革命者不坚持无神论呢?所以,很多无神论者之所以成为无神论者,是因为看到了有神论者的上帝观太荒唐了。可见,错误的上帝观实际上比无神论更令人远离上帝。这些无神论者所反对的是信徒荒谬的上帝观。这种上帝观使得这些无神论者对上帝的存在问题不屑一顾。

这种无神论是有其积极的内容的。它强调人的因素,它发掘人的潜力,它发出高举人类的呼声,它鼓励人们要把命运掌握在自己手中。它向宿命论和失败主义发出挑战。在一个沉寂了千百年的社会里,这种抗议正合时宜。在他们对上帝的否认声中,我们听到了人类要求解放和尊严的呼声。他们拒绝接受我们的错误的上帝观是为了人民的解放。

这类无神论包含着崇高的成分。这是因为它指出:人因其本性,注定得从事创造性的工作;人与人的疏离不符合人的本性,而是充满矛盾的社会造成的;人注定要过自由的生活,在创造性的工作中表现并实现人生的价值;在新的社会秩序中,劳动是劳动者对人群关爱的表现,是在人道、有尊严的条件下进行的活动。人道主义者和革命者的这些信念是构筑在对人和人类社会的希望之上的。

埃斯库罗斯讲述的普罗米修斯的故事令我神往。普罗米修斯是叛逆精神的一座传奇性的丰碑。他为了帮助人类与自然界作生存斗争,从天上偷取火种。宙斯大为恼怒,就用锁链把他锁在悬崖上,并且放出秃鹰来啄他的肝。如果他向宙斯屈服,他的煎熬就可以结束了。但他宁愿忍受痛苦,也不愿做宙斯的“听话的孩子”。他说:“放心吧,我宁愿承受这厄运,也不愿服侍你。宁愿做这岩石

的仆人,也不愿做宙斯听话的孩子。”

今天在中国以至全世界正在出现的人道主义革命者就是现实历史中的普罗米修斯。

当陀斯妥耶夫斯基说“假如没有上帝,那么任何事都可以做”时,他实际上是把无神论和道德虚无主义视为等同。或许正是他对上帝怀有恐惧,才没有随心所欲地去做各样坏事。帕斯卡尔也认为,若是没有对上帝的信仰,人们会变成怪兽,自然界将变得一团糟。这两人大概从来没有遇到过那种并不放任自己去做任何坏事的无神论者。他们严于律己,不容自己去做有损于人民解放事业的事。他们热爱人类,愿意为他人的幸福牺牲自己。他们不追求个人的好处,也不追求舒适的生活。他们以同志般的爱爱人民。革命者最重要的标志不是恨,而是爱。真正的革命者总是怀着强烈的爱。社会上的确有很多值得憎恶的事,但是革命者恨,是因为他们爱。他们对人类的爱使他们憎恶不人道的现象。他们强烈的正义感叫他们容不得非正义。汤朴(William Temple)大主教在数十年前所说的话非常在理:“被爱感动的无神论者是被上帝的灵所感动;遵照爱的原则生活的无神论者,尽管否认上帝的存在,也将得到他们所否认的上帝的祝福。”

这些人道主义革命者是人,因而也会犯错误。但是他们知道,个人的错误会危及革命事业,所以要进行严格的自我约束和自我批评。他们严肃地对待自己的错误,积极进行个人改造,以使自己不沾染低级趣味。说这是“洗脑”实在是不公允的。这完全是出于自觉和真诚的行为。

要挑革命者的毛病,这并不难,也很时髦。但是让我们来听听一位革命者、德国诗人、戏剧家勃托尔特·白莱赫德所写的一首诗。当时赫鲁晓夫作了秘密报告,把斯大林描绘得一团漆黑,在几乎全

世界引起了一场反苏和反共的高潮，诗人写了这首题为《致后代》的诗：

“到一天，你们得能从洪水中脱身了，
那时，你们会谈论我们这一代的缺点。
但我也要求你们想到，
那造成缺点的黑暗时代。
在阶级斗争中，我们奔走，
变换所在的国家比变换鞋子更加频繁。
我们失望，周围只见不公正的事而不见抵抗。

看到群众所过的非人生活，
我们双眉久久紧锁，
不公正的事令我们怒火中烧。
可叹我们这些要为和善打好基础的人，
自己不能和善。

但你们，当最后，
人与人之间得能享受和善的时候，
对我们的判断，
可不要太过严厉。”

我无意为斯大林辩护。遗憾的是，今天有很多基督徒为了表示自己信仰坚贞，喜欢大讲特讲别人的道德缺失和心灵空虚。我们基督徒没有权利借贬低别人来抬高自己。我们应当看到，上帝也通过这些挚诚的人们进行工作，尽管他们认为“上帝”这个词毫无意义，因而否认上帝的存在。

就是这些勇于奉献的革命者，使中国人民获得了解放，物质和

文化生活水平开始有了提高。今天,中国的可耕地只占世界可耕地面积的七分之一,却养活了世界四分之一的人口。人们的食物还不算好,但是没有人再以树皮充饥了。我们人口的四分之一在各类学校里接受教育。我们得感谢这些革命者,他们营造了一个较为公正的社会。人们正在努力克服社会上的阴暗面。基督徒所传讲的既慈爱又全能的上帝也因此更容易被人们感知了。

有人提出:基督徒能否把这些无神论者当作“同路人”?我的回答是肯定的。基督徒在历史上曾和各种各样的非基督徒和无神论者一道从事过各种各样的事业,为什么今天就该例外呢?

耶稣比我们一般所想象的要博大得多。《新约》的基督还有待我们进一步认识。我们在《约翰福音》、《以弗所书》、《歌罗西书》中所读到的是一位宇宙的基督,他在整个创造中居首位,他使创造归于完满,他使我们得以了解上帝创造工作的意义。这位基督是太初之道,光照、教导所有的人。他从人类,包括信徒和非信徒,有神论者和无神论者手中接过他们所成就的,不是要毁灭废弃,而是要加以提高,加以成全,加以祝福,献给上帝——我们所有人的父。

我们没有理由惧怕基督教以外的真理。真理不分彼此,真理是统一的。上帝允许人们各自循不同路径去认识真理的各个方面。我们要到最后的日子才知道如何把各方面的真理最终合为一体。现在我们只是相信,世界上的事情会越来越明了。当上帝在历史中的计划圆满完成的时候,我们的知识将成为一个和谐的整体。在接触到仍在发展过程中、尚未达至终极真理的真理体系时,我们应当心存欢喜和感谢,因为它会启迪我们,把我们引向基督所应许我们的终极真理。

我相信,甚至对中国的革命者来说,基督的信息还是有其独特性和启示性的。革命者也需要启示,需要圣灵带领他们进入更深

的真理。我愿意对他们说：请继续进行你们有意义的工作，但是如果能够认识到这工作和上帝在宇宙中的创造、救赎和圣化工作的联系，你们将更深地看到它的意义和重要性。这样，你们在从事工业、农业、科学技术、艺术和音乐事业的时候，会有更深邃的考虑。宗教信仰不会淡化你们的革命精神，反而会使它更为纯洁，更为高尚，更蒙上帝悦纳。从这方面来看，我们的确有责任传福音给他们听。但是另一方面，革命者的精神也给教会带来一股清新空气，使教会的僵化和机构化有所改观。我展望有一天这两个方面能够结合起来，那时，世界和基督教都将会有新的气象。就中国今天的情况来讲，我们才走到这一步：革命和基督教正在彼此发现对方，它们彼此不再视同陌路。但这离真正的相遇和了解还差得很远。我想，福音工作不只要求我们向人群传讲基督，同时也要求我们在人群中间发掘出基督的真、善、美来，用以造就我们自己乃至全人类。

所以，真正的基督教不一定非得与革命者和无神论者为敌。在我们的教会里，革命和基督教的对立常被夸大，复杂的问题常被简单化。基督徒在和他们不怎么了解而又需要去了解的人打交道的时候，常陷于自以为是。我们该问一问自己：教会对革命者不分青红皂白的攻击是否使教会在反对偶像崇拜的过程中失去了重要的同盟者？教会是否和这世界的现状结合得太紧，以致我们不能再期望它有进步的作为？虚假的神明为压迫和非正义祝福，因此，反对这些虚假神明的无神论者——他们难道不能成为教会在正义事业中的伙伴吗？我在中国的经历告诉我，大多数革命者为了政治上的团结，即为了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建设新中国，他们一点也不想把他们所信奉的无神论强加给别人，反而认真地贯彻宗教信仰自由的政策。你们已经听说了，自“四人帮”倒台以来，越来越多的教堂、寺院、清真寺正在开放。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岂不应

当抱持善意友好的态度？

我这么讲的用意是要请大家认识到谦卑的重要。我们应当在上帝面前谦卑，因为他行奇妙的事，他的奇妙远超我们所能测度的。如果我们能就此得些有益的启示，我会很高兴。

向母校汇报

(一九九四年十月在纽约协和神学院的演讲)

韩特立克斯院长,各位教授,朋友们:

回到协和来,熟悉一下今天的协和,这在我是一件快事。

我一九四八年离开协和,到世界基督教学生同盟担任干事。那是世界各国许多大学里的基督教学生团体的国际组织。明年它就要庆祝成立一百年了。

基督教学生运动和世界基督教学生同盟为培养基督教普世运动许多代的领袖起了重要作用。基督教学生运动和世界基督教学生同盟给了我的诸多帮助之一是让我看到,必须进入普世教会所体现的基督包藏的诸种丰富。我们作为个人,或作为一个教会,或作为一个文化所认识到的最终真理,至多也不过是暂时合在一起的若干点滴真理,有如一个圆圈上的许多个弧,尚待在基督里成为整圆。这一观点对我这些年都起着作用。

什么东西使我和我的妻子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已经在共产党领导下成立之后决定回国的呢?当时我们不过是觉得,我们是中国人,我们是在中国接受了我们大部分的正式教育,我们最能为人民和教会服务得好的地方是中国。对共产党我们并没有多少了解。我们想,既然都是中国人,我们有足够的共同点可以一起谈问题。在过去四十年中,这一点我觉得大体上还是正确的。这一假定只是在极左的“文化大革命”那些年间才是过于天真的。

我们五十年代初期回到国内,三自运动已经在进行中。我支

持这一运动,因为我愿意中国教会通过实行自治、自养、自传成为中国的教会。只有一个具有中国自我的教会才能赢得中国同胞的信任和聆听。三自并非中国基督徒的发明,一八五〇年,英国圣公会的教会传教会执行干事亨利·樊首先把三者放在一起,作为向非洲传教的指导思想。如果我记得不错,美国的罗佛斯·安特生在那时前后也提出了自治、自养、自传。不论何时,一切教会都想望和本地文化实现一定程度的结合。例如当基督福音开始进入非犹太世界的时候,一个问题出来了:传教者是否必须把犹太的风俗习惯带去,使听道者成为一种新的犹太人?耶路撒冷那次会议就此问题作出基督教非犹太化的决定,为基督教成为世界宗教开辟了道路。后来福音传入欧洲,眼光远大的人在神学上、灵修上、艺术上都不怕冒险,使福音得以进入欧洲人们的思想和内心。当教会受到其所处文化的限制或束缚、使它难于进入新的地区或新的时代的时候,那必然是应该有所改变的时候了。

回顾三自运动,我们体会到,我们不应在过长一段时间内专门关心我们的自我。任何具体的教会的自我无法独立于两千年的普世教会的自我,后者给前者提供营养,前者也给后者贡献它所见到的基督的丰富。因此,我们也重视我们同世界基督教会联合会和世界各国教会的联系。

在中国,有两方面的人我同他们有接触:(一)中国的知识分子,(二)中国的无神主义者和共产党人。现在我愿意向大家汇报我对他们的认识。

近年来,中国的知识界对基督教抱了前所未有的开明和友好的态度。自从第七世纪基督教景教传入中国以来的十几个世纪中,中国知识分子一贯抱自傲和怀疑的态度对待基督教。外来传教士为了生存力图表明基督教同佛教以及儒家思想有不少相同之

处。传教士为了迎合中国当局,带去了天文、几何和科学。他们采取佛教和儒家经典著作的大量用词,在穿着和举止上效法中国的知识分子。可是他们并不成功,中国知识界对基督教始终不抱好感。中华人民共和国于一九四九年成立后,尤其在极左思潮得势的时期,反基督教势力把宗教等同于鸦片,当时这也成为中国知识界对基督教的看法。

控制“文化大革命”的“四人帮”被打倒之后,对极左思潮的全国性批判把学术界带进了一个新的时期,基督教也受到了实事求是的对待。过去十多年间,越来越多的知识界人士指出,鸦片作用不过是宗教所起作用之一,鸦片不足为宗教的定义。他们认为,在某些情况下,例如像恩格斯在他所写的《德国农民战争》一书所描述的,宗教起了进步作用。这些开明的学者指出,必须区分宗教和迷信。他们认为,宗教是人类文化的组成部分,对文化的发展是有贡献的。他们对基督教和《圣经》显出好感。他们认为,基督教神学是西方哲学的一部分,值得研究。正由于此,中国知识界翻译出版了不少西方神学家的著作,包括蒂利希、利查·尼勃尔、汉斯·孔、拉纳、莫尔特曼等的著作。这在西方不足为奇,但在中国是划时代的。

我们南京金陵神学院的同工们特别感受到在全国批判极左以来宗教方面这一新的气氛。五十年代神学院不过是地图上的一个小点,人们认为这是一个搞迷信的场所,大家不大有兴趣,市内各大学师生对我们很冷淡。可是,今天,我们神学院同时也是南京大学宗教研究中心,中心的刊物《宗教》发到国内许多大学和社会科学研究所,它是我们同宗教研究学者进行对话的一个很好的工具。

让我特别提到中国的“文化基督徒”,这些和欧洲的“基督教的有文化的藐视者”正相反的一群。他们欣赏基督教的信仰,因此自

称基督徒,但他们不相信教会的圣礼,也不相信去教堂参加礼拜。他们是教会和知识界之间的桥梁,因此是我们的重要同路人。

中国共产党主张无神,但存在着各种不同的无神论者,有的至今把宗教与鸦片混为一谈,但越来越多的人已经放弃渲染宗教的“反动性”和“欺骗性”,转而同意中国宗教的“五性”,即群众性、民族性、国际性、长期性和复杂性。这一观点来自共产党著名的领导干部,导致人们对宗教采取比较公道的对待,使人们更慎重地贯彻宪法规定的宗教信仰自由政策。

我倾向于认为,中国共产党与当日苏联共产党的一个不同是前者十分强调统一战线。它把谋求中国的繁荣富强放在第一位,不把意识形态的宣传放在第一位。这个党理解,为了实现祖国的繁荣富强,它得团结尽可能多的同胞一起来干。而为了这一团结的实现,意识形态方面的差别必须放在次位;为了团结建国,宗教信仰方面的特点必须予以尊重。这是党的领导者所以主张宗教信仰自由的非常实际的基础。同当日的苏联不同,中国没有一个专事反对宗教和宣传无神的组织,也没有一份专事“反对上帝”的刊物。

主张无神和宣传无神我并不太在乎,因为上帝的昔在、今在、以后永在并不因为有人不信上帝的存在而有所改变。在我们高度世俗化的社会里,否认上帝有时正可以叫人想到上帝问题。在十九世纪的欧洲,尼采提出“上帝已死”的命题,曾使许多人对上帝问题发生兴趣。

无神主义者所否认的上帝每每是怎样的一位上帝呢?他每每是一个宙斯,把一个为人类服务牺牲的普罗米修斯锁在山崖上,或按中国民间信仰,是一个阎王,他派遣手下的小鬼来到民间,把人活活捉去投入地狱之火。基督徒大可和许多人道主义者联合,去

反对那些无视人类尊严和阻止人类解放的上帝观和其他观念。有些朋友对我有时对某些无神论者和共产党人作出很肯定的评论觉得惊奇。说实在的,我生命中有一部分对他们的主张和行动发出“阿门”的声音,使我对他们有好感,不愿轻易攻击他们,愿意同他们一起去反对共同要反对的东西,尽管他们和我从不同的来源接受道德的指令。

西方有人认为,中国基督徒应当反共,对政府应当发挥战斗精神,因为共产党人既是无神的,他们必然以消灭宗教为己任,基督徒只能进行对抗,只能准备殉道。我们没有那么容易号召殉道。轻易谈殉道对教会、对国家都是不好的。只要共产党人和基督徒都具有身为中国公民的共同点,只要存在着崇拜、见证和教会生活的空间,只要存在着探讨落实宗教信仰自由原则的对话的可能,我们没有理由认为无神论者是我们的敌人,需要进行你死我活的斗争。

我们能不能期望中国知识分子和无神论者接受基督教信仰?我认为我们可以期望,但必须避免两种传教方法:一是要求他们接受一套反理智的、原教旨主义的基督教,硬要他们承认整本《圣经》讲的都是真实的历史。我认为,如果他们能承认《圣经》包含的真理是象征性的,那就够好了;二是把基督教介绍为一种政治革命或政治解放的理念,主张国家权力转移到基督徒手中。这是提不出来的,因为对他们来说,中国已经解放,他们为这个解放出过大力,今天得巩固解放的成果。

根据我有限的经验,我们该向中国知识分子和无神论者介绍耶稣的爱。这位耶稣告诉我们那充满了爱心的父亲,他信任他出走了的儿子,企盼他的回归。那热爱他的一百只羊的牧羊人,连一只也舍不得失掉。我看到一位和哀哭的人一同哀哭、和快乐的人

一同快乐的耶稣。他保护一个犯了错误的人,使她不受伤害,殷切地劝她不要再犯。他爱他的朋友,爱他们到底。他离开他们的晚上洗他们的脚,并且说:“你们心里不要忧愁,你们信上帝,也当信我。”这位耶稣站在群众的一边,提出了新的价值观,把守安息日的规定放在满足人们的需要之下。我们在《新约》中看到的这位耶稣,足以拨动人性中最高尚的一些弦——一个孤独的人,没有自己的家,忘记自己,以爱心和同情浇灌他人;他忍受巨大的痛苦,他在十字架上仍在讲动人的话,直到最后获得对强权的胜利。根据中国知识界人士对宇宙和历史作为创造过程的认识,我试着帮助他们看到,在这一过程的背后存在着耶稣所彰显的那种爱。我不会一下就跳到耶稣的神性,我愿意人们想到创造宇宙和历史的这个爱是何等像耶稣。

斗争的哲学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曾是中国的统治哲学,它到“文化大革命”时期达到了顶峰,那时的教导是人不要爱别人,要怀疑别人可能是敌人,要到处防备和看到阶级斗争在进行中。中国需要爱。上帝是宇宙中的爱者,不是宇宙中的暴君。爱是上帝的最高属性,在一切其他属性之上。在上帝一直在进行中的创造、救赎和圣化的过程的背后是爱,一个大写的爱。

人们可能不用常用的名字来称呼他,甚至什么名字也不用,但他是那爱的能源,把善不断创造出来的那动力。在这过程中,整个人类至今是半成品,只有到成为上帝创造事业中的同工那一天才达到完全。

有人可能认为,我把基督教教义讲得过于简单,没有讲到人的罪性,也没有提出一个完整的基督观。但是我是在努力寻找一个接触点。我们不能要求人家一口气把整个基督教信仰吞下去。我想,一个人能在耶稣身上看到一位伟大的爱者,同时认为在宇宙中

就是那种爱在运行着,那已经是接受了基督教启示相当重要的一部分了。

中国基督徒可能只有人口的百分之一。在一九七六年“文革”结束的时候,我们得从零开始,因为我们没有了任何礼拜堂,原来很少的牧师也散失了。今天我们有很好的机会,也有很大的困难。保罗在《哥林多前书》结尾谈到,在以弗所,“有宽大又有功效的门为我开了,并且反对的人也多”,这正是我们的处境。令我感到有趣的是,两句话之间的连接词是“并且”,不是“但是”。这就显出,在保罗心目中,机会和困难时常同行。

我愿意这样想:我们在中国的小小作为,可算为代表全世界基督教所进行的一个试验。作为协和的一个校友,刚才又蒙母校颁发珍贵的协和奖章,我愿意相信,我们在中国所从事的工作带有协和的祝福。

赐人智慧和启示的灵
——《圣经》研读示范
(一九五四年)

基督的福音不仅是犹太人的,也是全人类的,这是多么重要的一个信息。在《使徒行传》第 10 章里,我们看见,这一信息在使徒的教会里得到肯定,是好不容易的。彼得原来把主的救恩看为犹太人的一个专利品。主却藉着哥尼流等一步一步带领他看见,这救恩实在是主为万民所预备的。这在彼得是艰苦的一课,但是他上了这一课。

外邦人同享主恩的问题是一个极大的奥秘。保罗说:“这奥秘在以前的世代没有叫人知道,……这奥秘就是外邦人在基督耶稣里藉着福音得以同为后嗣,同为一体,同蒙应许”(弗 3:5-6)。这奥秘不开启,基督教就始终是犹太人的宗教而已,连我们都无从信主。足见《使徒行传》第 10 章所记载的,不但在彼得个人经历上和教会史上是一件大事,在上帝对人类的救法上也有重要地位。

今天我们姑且把这外邦人承受救恩的问题暂时放置一边,我们要求主给我们看见的是圣灵如何一步一步地引领人,除掉人们的骄恣狂傲,开启人们的愚塞,让人们达到豁然开朗的境地。

保罗称圣灵为“赐人智慧和启示的灵”(弗 1:17)。他能够“照明你们心中的眼睛”(弗 1:18)。此次查经,就让我们一同来看这位圣灵是怎样带领我们的。我们多么渴望圣灵把智慧和启示赐予我们。那么就主藉着圣灵来告诉我们,圣灵的引领有些什么法则。

圣灵的预备布置和安排

有时主似乎不用直接的方法向我们宣示他的心意,他宁愿从各方面安排一切,来开启我们的愚顽。

看《使徒行传》第9章第36节至第10章第8节,我们就知道,在约帕早已有了信主的门徒的核心。由于多加的病,彼得来到约帕。硝皮匠西门在那里有他所置备的房屋。在凯撒利亚有哥尼流这个接近犹太人的外邦人。……这些事实孤立起来看,每一件都是偶然的,碰巧的,但是把它们联起来看,我们不能不认出主自己的作为来。它们都成为主完美的计划中的构成部分。

为了要让福音变为全人类的所有,神早已在主前数世纪中,在犹太教会堂的崇拜和生活的周围,安排了一些同情犹太教的外邦人。当时谁也没有预知这些人的作用是什么。但是,到了主自己认为合适的日子,他们就成为福音从犹太通到世界的桥梁。哥尼流就是这样的一个人,他是外邦人,但是“他是个虔诚人,他和全家都敬畏上帝,多多周济百姓,常常祷告上帝”(徒10:2)。

圣灵的布置是远超过人的聪明的,我们只见眼前的一点,一滴,一事,一物,而圣灵则是看见全局的。

我们每人回想一下吧:我们今天的光景是怎样来的?难道是我们自己在若干年前计划出来的吗?这不是许多“偶然”的事件陆续发生,把我们的计划一一粉碎,把我们带领到今天的地步吗?当我们不能控制的这些事件一一发生的时候,可能我们会发过怨言,曾经倔强过,曾经想逃避过。但是今天回头一看,我们看见了,原来主的手在运行,我们不能不自认愚妄,不能不赞美主,承认他的安排实为最好。

当保罗在亚细亚传道的时候,他曾一度似乎到处碰壁。他感

到多么苦闷啊。是的,他没有怨天尤人,他能够明白是圣灵在“禁止”(徒 16:6),是耶稣的灵“不许”(徒 16:7)。他果然不愧为一位圣使徒,能够看出这是出于主。可是他哪里能知道主把福音的门在亚细亚关闭,乃是为了要安排一切条件,让福音从此进入欧洲去?今天看来这真是历史上的一件意义重大的事,可是,在当时,连保罗也不能捉摸其中的意义。

可见我们是“瞎眼,只看见近处的”(彼后 1:9)。而圣灵是按照久长的、全盘的好处而进行安排的。

主曾经藉着先知以赛亚告知我们:“我的意念高过你们的意念”(赛 55:9)。此点我们时常忘记,引起许多痛苦。保罗说:“万事都互相效力,叫爱上帝的人得益处”(罗 8:28)。可惜我们爱自己太甚,爱主的心不够,因此时常看不见万事如何终究互相效力,反而不耐烦,发怨言。这是因为我们太体贴了自己,太重视了自己一时的利害好恶,忘了去体贴上帝的、更为远大百倍千倍的心意。

但是人的愚妄却并不能阻止圣灵。圣灵要完成他的工作,并不需要等待我们明白了他的心意,否则他将等到什么时候呢?他会主动去布置必要的条件,使主的计划得以实现出来。

我们该当认识:我们是坐井观天的,我们认为重要的,在主看来未必重要,我们认为不重要的,在主看来未必不重要,因此,我们不要向主坚持我们鼠目寸光看到的那一套吧。我们该当承认,“我们现在所知道的有限……心思像孩子,意念像孩子……仿佛对着镜子观看,模糊不清(原文作‘如同猜谜’)”(林前 13:9-12)。

既是这样,我们应当顺服,在主的仁爱的全局中,欣然做一个微小的局部。

需要我们朝圣灵开门

福音属于万民,这是神的心意,主何不直截了当告诉彼得,让彼得知道呢?何必大费周折去安排这许多条件呢?

不得不大费周折的原因,是彼得的灵性的骄傲。

主不是没有直接告诉过门徒们,他的福音是为一切世人的。在差遣他们的时候,主说:“你们要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太 28:19)。在他升天之前,他还告诉他们,他们不但在耶路撒冷犹太全地和撒马利亚应当为他做见证,他们也应当做见证“直到地极”(徒 1:8)。可是这些话对门徒们没有起作用,因为他们的灵性中有骄傲。他们是神的选民!是亚伯拉罕的子孙!他们有最高最好最完全的真理!他们是高人一等的!他们知道什么是清洁的,什么是不清洁的!外邦人哪里在他们的心目中!

彼得也这样。他是信主的,但是他的心灵很混乱,里面藏有许多和基督不相干的、甚至敌对的东西。他灵性的骄傲(那种几乎是犹太人生而具有的灵性的也是民族的骄傲)使他在不知不觉中把主的某些话当作耳边风一般,完全没有听进去。

在那天,彼得在房顶上祷告,主在异象中三次叫彼得吃一些犹太人素来不吃的东西,每次,彼得都拒绝了。他说:“这些都是不洁净的东西,我从来没有吃过这些。是的,圣灵要带领彼得吃一些他所没有吃过的东西。圣灵说:“上帝所洁净的,你不可当作俗物。”但是彼得却把那扇门朝着圣灵砰然一声关闭上了。

从来没有吃过的东西,就永远不该吃;从来没有想过的念头,就永远不该想;从来没有做过的事情,就永远不该做。就是这样,由于彼得在神面前坚持自己的片面的洁净的标准,彼得就限制了圣灵。他只允许圣灵在他所习惯、所熟悉、所认可的范围内运行,

不得越雷池一步。

可是圣灵是活泼的灵。“风随着意思吹，你听见风的响声，却不晓得从哪里来，往哪里去。凡从圣灵生的也是如此”(约3:8)。他的活动哪里能被人的胃口、人的习惯、人的成见所限制，所规定呢？

主自己告诉我们：“保惠师，就是父因我的名所要差来的圣灵，他要将一切的事指教你们，并且要叫你们想起我对你们所说的一切话”(约14:26)。“只等真理的圣灵来了，他要引导你们进入一切的真理”(约16:13)。现在圣灵果然来了，当他要带领彼得进入新的真理的时候，彼得却不肯。他说：“这我从来没有吃过。”就是这样，彼得把门关住了，封闭了。可叹三次否认了主的彼得，今天又三次抵制了圣灵的引领。他把自己的生命紧紧地缩在一只胡桃似的硬壳里面，宁愿过着不透空气、不见阳光的生活，还自以为是洁净呢。

今天圣灵也巴不得我们信徒肯让他带领进入许多的真理。他要我们吃许多没有吃过的东西，想许多没有想过的思想，做许多没有做过的事情。我们怎样呢？但愿我们会顺服，会开门，会怀着希望和信心，让主带领我们前去，让主把智慧和启示赐给我们。

从“房顶”到“地面”

在异象中，神一连三次叫彼得，去吃那些他素来认为齷齪的东西。彼得却没有顺服。可是这足够叫他开始怀疑和思索了。

“彼得心里正在猜疑之间，不知所看见的异象是什么意思，哥尼流所差来的人，已经访问到西门的家”(徒 10:17)。正是如此，世事发展得快极了。有多少时候，我们对一个问题感到困难，感到茫无头绪，巴不得能够搁一下，能有更多的时间，在房顶上等候，好让主把问题给我们看个清楚，而世事的发展竟不允许我们继续在房顶上享受这种闲暇，问题已经找上门来了，它已经在楼下敲门

了。生活要求我们作出迅速和大胆的决定。

可是不必怕,这一切还是圣灵的安排。圣灵向彼得说:“起来,下去,和他们同往,不要疑惑,因为是我差他们来的”(徒 10:20)。

圣灵带领我们到房顶去祷告,圣灵也带领我们下楼去面对我们不知该怎样面对的问题。圣灵在房顶上和我们同在,圣灵也在地面上和我们同在。当我们屈膝跪祷时,圣灵在旁帮助我们,当我们跟随他的引领而前去接触另一种人的时候,圣灵也伴同我们。圣灵通过异象和我们说话,圣灵也通过现实世界中事态的发展,和我们说话。他始终和我们说话,直到我们明白为止。

圣灵不得不打断彼得在房顶上的祷告。我们应当明白,由于我们的亏欠,由于我们的罪,由于我们的骄傲,主能在房顶上给我们领受的很有限。他得叫我们下楼去上一课。下楼不是离开主,而是顺服主。如果我们硬要留在房顶上不肯下来,这倒是拦阻圣灵了。

有人以为我们必须首先把什么都弄个明白,把一切奥秘全部打开,把上帝对世界的教法弄得一清二楚,随后才好起来跟随主行。其实这是荒谬的,可能是不肯跟随主的推托遁词罢了。只有我们凭着主已经给我们的一线光亮去行,我们才会开始明白。主自己说:“人若立志遵着他的旨意行,就必晓得这教训……”(约 7:17)。主招呼门徒说“来跟从我”,那时,门徒何尝洞悉“跟从主”的全部意义呢?可是他们毅然舍去一切面跟从了他。他们越跟越明白起来了。当东方来朝的博士看到明星的时候,又何尝明白基督降生的全部意义呢?可是他们并未因此而裹足不前。他们跟随了星光,就找到了基督。

主的安排就是这样:有些真理我们无法在房顶上进入。他要我们“起来,下去,和他们同往,不要疑惑;因为是我差他们来的”。

我们只有凭着主所赐予我们看见的一线亮光——由于我们的缺欠、软弱，它只能是一线——把自己的手安然放在主的手中，去走摆在我们面前的路程。我们是不能在知道一切之后才开步的。只有在开步之后，我们才越来越明白起来。这就是信心的生活。

纽门的一首圣诗中说：

“我不求主指引遥远路程，
我只恳求一步一步引领。”

这决不是信心小，也不是灵程低。这正是信心大、灵程高的人才做得出的祈祷。

我们传道人必须大大花费工夫在房顶上祈祷，把上帝所托付我们的一切在主面前次第谢恩祈求。这是当然的，绝对必要的。但是，莫想我们在房顶上即能对每人每事得到全部的亮光。我们可做的就是把一切全然交托给主，然后凭着信心，让圣灵带领我们下楼去，进入到世界中去。我们可以放心下去，因为是主要我们如此做，还是这同一位圣灵在继续带领我们。他无非要开启我们的愚妄，赐我们智慧与启示，照明我们心中的眼睛。

“我的佳偶，我的美人，起来，与我同去！因为冬天已往，雨水止住过去了。地上百花开放、百鸟鸣叫的时候已经来到，斑鸠的声音在我们境内也听见了。无花果树的果子渐渐成熟，葡萄树开花放香。我的佳偶，我的美人，起来，与我同去！”（歌 2:10-13）这是主给我们的多么温柔恩爱的催促。今天，他要我们以一种有似青年恋爱的喜乐雀跃的心怀，去领受主为我们预备的美好的一切。他在门外忍耐等待着，向我们诉说：“我的鸽子啊，你在磐石穴中，在陡岩的隐密处”（歌 2:14）。“我妹子，我新妇，乃是关锁的园，禁闭的井，封闭的泉源”（歌 4:12）。向着圣灵，我们岂该关锁自己，禁闭自己，避开圣灵的带领呢？我们岂该迟迟不动，忍心让他在门

外久等,让他失望呢?

圣灵是联合的灵

圣灵是联合的灵。神让彼得得到一个重大的发现:哥尼流和他自己同样是人。“你起来,我也是人”(徒 10:26)。这不是很平凡的吗?可是这在彼得,竟是一个付出了代价而学到的功课。他把自己从房顶上降下来,又把素来被他看为污秽而不配和他往来的外邦人视为“主所悦纳”的了。就这样,圣灵克服了人与人之间的鸿沟。

不仅如此,还要更进一步呢。彼得在数分钟之后,就又上了新的一课:哥尼流和他同蒙一位救主的拯救,同受一位圣灵的恩赐。长久的隔膜今天全然消除了。圣灵不但让人与人联合起来,他也让信徒与信徒联合起来。

可以想象,当时必会有人反对彼得如此轻易接受了哥尼流。哥尼流这些外邦人,不会把我们的教会弄坏吗?不会使福音冲淡吗?

岂知哥尼流对教会的贡献正大呢。圣灵用了他,不但开启了彼得的愚妄,不但建立了福音和非犹太人之间的桥梁,他更大大丰富了教会的生命。仅仅犹太信徒就能满足主自己对世界的渴求吗?清一色难道是教会应有的特征吗?绝不。基督的爱何等长、阔、高、深,得由世界无数信徒大家来领受、来见证。福音中蕴藏着的全部奥秘和全部真善美的生命,得由无数时代、无数地域、无数文化中的哥尼流们来探发、来分享。教会生命要成长到真正光荣灿烂的丰富境地,基督徒们对福音全部智慧的深切而广涵的体悟,都还在后面呢。过去历代圣徒们都已经做了美好的见证,丰富了教会后代的灵库。可是,“上帝给我们预备了更美的事,叫他们若不与我们同得,就不能完全”(来 11:40)。

反看我们,应当觉得多么惭愧。多少年来,不要说彼此尊重、彼此丰富了,就是彼此容忍,也难乎其难。猜忌、结党、排挤异己,甚至在细小到像一根头发的问题上还要分成互不容忍的两半。解放以来,此种情形大为好转。教会中各宗各派虽有不同神学观点、不同教制和不同礼仪,也能如同左右手一样顺利合作了。是的,教会这才真正成为教会,如同保罗所说的:“用和平彼此联络,竭力保守圣灵所赐合而为一的心,……彼此相助,便叫身体渐渐增长,在爱中建立自己”(弗 4:3-16)。

人和圣灵同工

“彼得还说这话的时候,圣灵降在一切听道的人身上”(徒 10:44)。

在这以前,圣灵始终在后面安排一切。可是现在他直接动工了。他打断了彼得的说话。彼得说:“我一开讲,圣灵便降在他们身上”(徒 11:15)。

彼得的话还未讲完,就被打断。这并不使彼得难受。他并不曾叫圣灵等他讲完了再降临。他立即把自己让开,把自己放到旁边去,放在一个不致阻碍圣灵的地方。

这给我们看到一个重要的真理——我们应当如何和圣灵同工的真理:我们所做的非常重要,因为我们是和圣灵在同工。同时,我们所做的却很不重要,也正因为我们是和圣灵在同工。圣灵借着我们去做一些前驱的准备工作。等一切条件都全备的时候,神就自己动工。那时,我们应当退到一个不致拦阻圣灵工作的地方去。

我们应当强调,我们所做的是毫不重要的(因为是主在做),免得我们狂妄。但是我们也应当强调,我们所做的极为重要(因为是

主的托付),好避免我们的自暴自弃。我们的工作是很重要的,我们应当负责。但是我们的工作也是不重要的,我们没有自负的余地。这是主的工作,谁也不配。但是也正因为这是主的工作,我们的配与不配无关紧要。

我是谁? 能拦阻上帝呢? (徒 11:17)

原先,彼得的心灵是堵塞的,“我从来没有吃过”这句话代表他的整个心情。可是,这两三天的经历给予彼得的改变太大了。他看见外邦人也实实在在地得到了圣灵的恩赐。他不能不说:“我是谁? 能拦阻上帝呢?”

彼得看见圣灵在外邦人身上的作为,他丝毫没有嫉妒,他丝毫没有由于发现犹太失去对圣灵的垄断而对外邦人产生仇恨,他只是谦虚地承认事实,感谢上帝。

今天,我们不是也有灵性的骄傲,致使我们认不出圣灵所要带领我们去进人的真理? 我们凭什么感到骄傲呢? 我们最宝贵的所有——救恩——也是由于主自己,而不是由于我们有什么好。

彼得说:“我真看出上帝是不偏待人的。”他是有了一番灵性的痛苦经历之后,才真看出这一真理的。但愿我们也能真正看出这一真理来。

“你们若知道他(上帝)是公义的,就知道凡行公义之人都是他所生的”(约壹 2:29)。既是这样,我们就当谦虚,理当感谢神。

圣灵是最奇妙的,他在想不到的地方做工。我们当怎样呢? 但愿我们不会说“我从来没有吃过”,就此拒绝了圣灵。但愿我们以谦虚感谢的心说:“我是谁? 能拦阻上帝呢?”

这样,我们就接受了圣灵所赐的智慧和启示,朝真理进入了一步。

和上帝摔跤的人(研习《圣经》)

(一九五五年在南京金陵协和神学院秋季学期开学典礼上的讲话)

在今天这开学的日子,让我们一起来细细思考记载在《创世记》第32章第22至31节上的以色列先祖雅各的一段奇特经历,看对我们的学习和教会工作有何帮助。

雅各是亚伯拉罕的孙子。上帝从世上的万民中选召亚伯拉罕,恩待了他和他的子孙,给了他们特殊的看顾、带领、磨难和祝福,因为按照上帝美善的计划,从亚伯拉罕的后裔中要产生救主基督,就是拯救的角、清晨的日光,就是荣耀的君王、道成肉身的主自己。

雅各从小就受到母亲的偏爱,是一个只想到自己的人。他做了不少对不起人家的事,其中大家最熟悉的有三件:(一)哥哥以扫从田野回家累昏了,雅各利用这机会,只藉着他的一碗红豆汤,就换得了以扫长子的名分;(二)父亲年老眼睛不好,雅各伪装为他的哥哥以扫,又骗取了父亲理该给予长子的祝福;(三)雅各的岳父也是很为自己打算的人,可是雅各耍了比他更高明的手段,使自己的羊又肥又多,而他岳父的羊又瘦又少。

雅各正是一个自私、善于为自己谋求利益、善于往上爬的人。他用了他的小聪明,把好处都归给了自己。他使别人吃亏,做得却是相当圆滑。

二十年之久,雅各依靠了自己的聪明和手段,似乎为自己解决了许多问题,对一切都应付得相当顺利。虽然他也有一定的痛苦,

可是总的说来,他是很有办法的。二十年离家在外的生活在他自己看来是成功的。他自己说:“我先前只拿着我的杖过这约旦河,如今我却成了两队了”(创 32:10)。

我们记得,当上帝呼召亚伯拉罕的时候,上帝曾经告诉他:“地上的万族都要因你得福”(创 12:3)。可见神呼召他,不是为了要他一个人或他一族人享福,神乃是托付他成为祝福的桥梁,成为传送福乐的器皿,好使全人类都得到神的祝福。这一点雅各是不能不知道的,因为祖父亚伯拉罕去世的时候,雅各已经十五岁了。何况他父亲以撒曾经从神得到同样的托付(创 26:4)。雅各自己也曾再一次得到这一托付(创 28:14),因此他更不该是毫无所知的。可是当这托付传到雅各手中的时候,他再也想不到别人了,他只想为自己抓住好处,甚至在伯特利神在梦中给他看到了通天的梯子,并且给了他最好的应许之后,他向神所许的愿还是有条件的、以自我为中心的:“上帝若与我同在,在我所行的路上保佑我,又给我食物吃、衣服穿,使我平平安安回到我父亲的家,我就必以耶和華為我的上帝。我所立为柱子的石头也必作上帝的殿。凡你所赐给我的,我必将十分之一献给你”(创 28:20-22)。这与其说是许愿,倒不如说是讲买卖。

“雅各”在原文的意义就是“抓住”。这正是雅各处世为人的特点。他生下来的时候就抓住着孪生哥哥以扫的脚跟。“抓住”就是雅各的人生观。就是他待人接物的原则。

同学们,今天世界上也有这种以拚命抓住为人生观的人。和雅各相比,他们有的小聪明更多些,有的小聪明要少些,有的机会更好些,有的机会要差些,但是以抓名、抓利、抓地位、抓权柄、抓一切为目的这一点却是相同的。他们还有人说“人不为己,天诛地灭”,那就比雅各更甚一筹了。甚至有人把这种人生观带进了教

会,在灵性追求上也好,在教会圣工上也好,都展开了为自己尽量抓取的活动,这是可叹、可怜的光景。

雅各别离故乡二十年,要回去了,次日,就要见到哥哥以扫了。以扫的态度将会怎样呢?他会把他当作弟弟吗?雅各未能预料,只知以扫方面已有四百人的队伍迎上来了。雅各呢?他还是那老的、精明的雅各。为了防备万一,他把自己方面的人口和牛、羊、骆驼等分成两队,这样,如果以扫来击杀这一队,另一队还可逃避。此外,为了争取以扫的好感,雅各又布置了若干先遣队,拿了礼物走在前面。从这一切,我们知道雅各正是用心良苦的。在这一切之外,雅各更做了祷告。在祷告中,他也是说:“求你救我脱离哥哥以扫的手,因为我怕他来杀我”(创 32:11)。对二十年前他所做的对不起神也对不起以扫的事,他却没有些许忏悔的表示。

同学们,雅各这二十年勾心斗角的生涯,做人做得连自己在哥哥心目中究竟是弟乎、敌乎都成为未知之数,这是神所愿意他过的日子吗?这是神的选民应有的光景吗?神所喜悦的、所赐予的是善良。雅各的善良哪里去了?

雅各把一切人牲都往前送走了,只剩他独自一人了。这对他很好,他可以面对一下上帝。就在那时,他得到了一个最奇特的经验。《圣经》所给我们的叙述很简单,可是它的含义很深,不是我能充分发挥的。在这开学的日子,愿意请同学们注意三点:

一、毗努伊勒和伯特利的次序问题

二十年前,雅各离家不久,就有了一次伯特利的经验。在那里,他梦见一个梯子立在地上,梯子的头顶着天,有上帝的使者在梯子上上去下来(创 28:10-17)。

同学们,伯特利是代表与主最甜蜜的灵交,与神无阻隔的亲

近。在那里，灵性经验似乎是达到了登峰造极的境地。那地方“乃是上帝的殿，也是天的门”。是的，伯特利是温暖的，甚至是火热的。

而在二十年之后，雅各反而经历了一次毗努伊勒的经验。在那里，他所遇见的不是神的甜蜜的悦纳，而是与神冲突、争斗、摔跤。

先有伯特利于前，又有毗努伊勒于后，这是什么规律呢？我们在主面前，岂不应当先经过毗努伊勒的罪的对付，然后才渡过约旦河，进到伯特利来永远享受神的同在和恩爱吗？按照我们的常识，神岂不应当给我们先苦后甜吗？现在怎么像是先甜后苦了呢？

希望同学们少从自己的感觉出发，什么苦呀、甜呀，来替上帝制造规律。伯特利的经历好果然是好，但是就在那时，就在那里，雅各还有许多隐而未显的罪，没有看见，没有承认，没有对付。神当时没有要他立即解决那些，却不是永远算了。罪总是罪，不因我们一时没有认识它为罪而就自动消灭了。经过二十年、二百年、二千年，人们看清楚些了，知道某些素来被认为天经地义的事在神看来是罪，而且实在是大罪，必须对付。这不是什么苦与甜的问题，这是更加有份于神的性情和更加接近神的心意的问题。

我们许多信徒都喜欢伯特利，不喜欢毗努伊勒，只愿意神来称许我们，不愿意面对一位前来和我们摔跤的神，让他来打伤我们的自恃、自负。结果，究竟什么是善，什么是恶，什么是是，什么是非，什么是神的大能的作为，什么是人的罪的表现，都全凭自己心中根深蒂固的雅各本性来决定，这是很危险的。

我们的《圣经》不但告诉我们保罗怎样到阿拉伯去度过一段清静的时光，它也告诉我们主怎样在约帕的房顶上和他所爱的彼得摔跤（徒 10:17-20）。就说主耶稣自己，他不但曾经在山顶上易容

显光,他还在客西马尼花园里有过伤痛恳切祷告、汗珠如大血点滴在地上的经历。

我们看到,伯特利好果然是好,但它给予雅各的改变不大,毗努伊勒却大大改变了他。从此,他不再叫雅各,他是以色列,是和神摔跤的人。

同学们,让这所神学院成为大家的伯特利。在这里,愿你们看见那通达天庭的梯子,并有上帝的天使上去下来,带给你们从上面下来的粮食。但是我们也不要逃避毗努伊勒。无论怎样,和我们摔跤的对手实在不是别人,正是主自己,他决不伤害我们。我想,在你们在此学习的四年之中,把大门关起、锁上,使你们和外界隔绝,在里面一味追求甜蜜的“山上的生活”,这也许是可能办得到的,如果我们真要这样办的话。可是,如果我们这样办了,不消四年,我们的同学一定都变成对教会没有益处的人。今天,真正的基督徒决不能在沙堆里埋着头过日子。凡诚实的、热爱真理的基督徒决不要畏惧自己在思想上、灵性上必定遇到的摔跤。因为这是正常的,只有经过摔跤,我们才会更认识主,更认识自己,更认识真理,更认识基督徒爱主爱人和爱国爱教的一致性,也更认识教会的前途。没有毗努伊勒,我们仍旧是雅各,我们就不能真正明白伯特利。

二、祈求是和上帝摔跤

同学们,我们来到神学院的目的之一就是祷告。祷告把你们带到了道里,希望你们在这里的时候,很多的时间还是用在祷告上。

真正的祈求的确具有和神摔跤的性质。可惜我们太多的祷告是滥调套语的堆砌,失去了祷告应有的性质。

真正的祈求就是：(一)确知我们所祈求的是和上帝本性相一致的；(二)根据我们在基督里面所享有的祷告的权利；(三)大胆地、甚至几乎无礼地，抓住上帝，不放他过去，向他祈求。

约伯说过：“惟愿我能知道哪里可以寻见上帝，能到他的台前；我就在他面前将我的案件陈明，满口辩白……他岂用大能与我争辩吗？必不这样！他必理会我。在他那里，正直人可以和他辩论。……”(伯 23:3-7)。

亚伯拉罕就是这样为所多玛祈求的。他说：“无论善恶，你都要剿灭吗？……将义人与恶人同杀，将义人与恶人一样看待，这断不是你所行的。审判全地的主岂不行公义吗？”(创 18:22-23)。他就是这样抓紧耶和華必行公义、恶恶好善的本性，不轻易放他过去，向他祈求。这就是信心的祷告。

那迦南妇人也是这样向主耶稣祈求的。主已经拒绝了她的，但是她说：“狗也吃它主人桌子上掉下来的碎渣儿”(太 15:21-28)。她不放手，不轻易放弃摔跤的机会，她抓紧主的怜悯慈爱的本性，甚至敢于向他争辩。这就是信心的祷告。

只要所求的是和神的性情一致的，基督徒就不怕求错，就可以放胆祈求。圣灵将会来帮助我们进行这样的祷告，使我们能从神手中取得祝福。这样的祷告神一定应允，所以我们甚至敢于在他应允之前就向他感谢，如像拉撒路在坟墓里还没有动静的时候，主耶稣就举目望天说：“父啊，我感谢你，因为你已经听我”(约 11:41)。

重要的是我们必须知道，我们所求的和神的本性是一致的。为此，我们自己必须“与上帝的性情有份”(彼后 1:4)。

我们时常看到另有一种祷告，可能也很诚恳，却是不合神的性情面是从自我的性情出发的。约翰和雅各的母亲不是来求主耶稣

让她的两个儿子坐在他的左右边吗？这祷告是为了自己，是“抓”的祷告，是为自己谋好处的祷告，是雅各在毗努伊勒以前的祷告，也像雅各在伯特利所许的愿。

有人要问，神是全能的，他怎么不制胜雅各、打倒雅各呢？《圣经》上怎么甚至说，上帝见自己胜不过雅各呢？

是的，同学们，神是全能的。要论能力，十个雅各在全能的神面前也是无能为力的。但是神还是只和雅各摔跤而已——在二十年之中，神始终限制了自己的全能，把自己的全能暂置一旁——为了要让雅各认识这一个全能，好学习谦卑顺服。

上帝是全能的，然而他甘愿让他的全能被我们的信心和祷告所胜过。这完全是由于他深切的爱。

关键是，上帝必须摸到你的大腿窝。大腿窝就是我们每个人身上的这么一点，只有让神碰到了它，摸到了它，我们才能谦卑下来，才能不再自恃，不再自负，我们的能力才不再被雅各式的抓的意志所控制，徒然奔波，而能归献与主，犹如小溪流入渊洋，翻作壮阔波澜。

大腿窝就是我们最引为自满的那东西，也就是我们最容易在它上面失败的东西。在雅各身上，这正是他的小聪明，因为他的小聪明很大。在押沙龙身上，这正是他美观的闻名全国的头发所象征的虚荣。他没有让主来摸到他的头发，这头发最后就为他带来了灭亡的悲剧。

同学们，主的手要摸到我们的大腿窝，但是这是医治的手，它决不击打我们过于神所认为必要的，它也决不破碎我们，折断我们，过于我们所必需的。可是我们总得要从神那里接受限度以内的一些击打、破碎和折断，好让我们的身上经常带着神的能力和我们的自己的软弱。保罗身上就带着耶稣的印记，就是有一根刺加在

他的肉体上,使他“更喜欢夸自己的软弱,好叫基督的能力覆庇我”(林后 12:9)。

请注意,雅各在伯特利的经验是在夕阳西沉之后得到的:“太阳落了,就在那里住宿,便拾起那地方的一块石头枕在头下,在那里躺卧睡了”(创 28:11)。他和神摔跤以后,白天就到了:“日头刚出来的时候,雅各经过毗努伊勒,他的大腿就瘸了”(创 32:31)。毗努伊勒并不代表痛苦,也不代表黑夜,它所引入的是神面上的光辉和白昼的喜乐。

三、我们当问的是神有没有祝福

雅各在摔跤的过程中提出两个要求:他要求对方祝福他,他要求对方说出他的名字来。第一个要求,神同意了,并给了他祝福。第二个要求神没有同意。他回答说:“何必问我的名?”

如若神果真告诉了雅各他的一个名字,这名字不论是耶和華(Jahweh)也罢,伊罗海(Elohim)也罢,或是什么别的也罢,在人们听来,都不过是一个公式。如果人们对神的名字发生了过大的兴趣,与神摔跤的灵性经验反倒黯淡了,从神得到的祝福也反倒忘却了,甚至还要产生门户派别之争,这岂不是轻重倒置了吗?

同学们,我们的主是赐福的主,这是重要的。至于他的称呼,神、主、上帝、耶和華都可以,因为你的上帝就是我的神,我的上帝就是你的神,他又是我们所共同侍奉的主。我们基督教里面存在着传统有所不同的各宗教会,这是事实。但是要紧的是我们只有一位赐福的主,他赐福给一切的教会。我们不必问:某人属于保罗吗?这是属于矶法的,还是属于亚波罗的?我们只需要问:神自己有没有祝福他?这是重要的。

在这所神学院里面,虽然我们以《圣经》作为我们团结的基础,

虽然我们的基本信仰是一致的,然而在某些观点、仪式和名称上还是存在着差别的。我们并不认为这有什么不好。我们认为这正可以见证主如何丰富地祝福众教会。这些差异到底是次要的。真正重要的是:这里是你的伯特利,就是上帝的殿,这里也是毗努伊勒,就是可以看见上帝的面的地方。真正重要的是:这里是神自己所祝福的地方。

这对于我们就够好了。

耶稣的抗议

(一九八三年于南京金陵协和神学院)

在从公元一九八二年转到公元一九八三年,历史又向前进展一步的时候,也许值得一提:人类用公元来纪年,在有意无意中把基督耶稣的出生承认为人类历史的中心,承认他的出生对人、对历史、对世界具有某种决定性的意义。

基督的全部意义是两千年间越来越为人们所认识的。鲁迅在《战士和苍蝇》里曾经引用过叔本华的这样一句话:“要估定人的伟大,精神上的大和体格上的大,那法则完全相反,后者距离愈远即愈小,前者却见得愈大。”基督在世的时候,他所讲的和所做的不都是一鸣惊人的,不都是叫人茅塞顿开的。许多话和许多事当时人们不重视,不理解,有的被人们所误解。像我们所熟悉的记在《约翰福音》第18章第19至24节的耶稣的一段话,当时听到的人不可能多,听懂的人一定更少。

那是一个审判的场面。在一个大院子里,人山人海,有的在那里叫嚷,有的在那里咒诅,很多人在观望。那些原来寄希望于耶稣的失望了,不知道该怎样来想他了。那些跟从耶稣、同情耶稣的,有的沉默了,有的表示同他划清界限了。有的人盼望,在这最后的时刻,上帝将派遣天使天军来救出这个耶稣。那些掌权的人,希律、亚那、该亚法、彼拉多对耶稣的命运关心得少得不能更少。不过有耶稣这样一个罪犯,倒很可以乘机用来调整一下他们之间积累的矛盾。这是一个昏暗、冷酷的大院子,一个是非颠倒、无法申

辩的地方。什么是对的,什么是错的,什么是是的,什么是非的,没有人要听,说了也听不见。这是一场死罪早已定了的审判。

在那里,耶稣讲了一句冒犯的话,一个差役就打他。耶稣没有还手,但是他还了口。他用一句严肃的、理直气壮的、充满了自尊心的责问和抗议的话,去回答了他的敌人:“我若说的不是,你可以指证那不是;我若说的是,你为什么打我?”这可以说是不卑不亢的回答。

耶稣这样自然地脱口而出的回话,反映了他心灵深处的一个不可动摇的信念:宇宙是上帝所统治、所管辖、所掌握,这是一个全能全爱的神,他是最高的是,在他里面没有非,无是无非决不是宇宙的根本大法,是不是非,非也不是是,历史是是胜过非的过程,是非可以暂时不明,暂时搞乱,但是非最后会清楚的。

在亚那的大院子里,耶稣这句话的声音是微弱的,但是那是一个叫人觉醒、叫人振作、叫人恢复希望的声音。两千年来,耶稣这句话的回音响彻了宇宙。亚那、该亚法、彼拉多可以联合起来压制耶稣,可是历史上一切亚那、一切该亚法、一切彼拉多合在一起也无法压制耶稣的责问和抗议,无法使人不闻风而起,来跟从这位耶稣。

耶稣这个话包含着他对人们辨别是非的能力的莫大信任。他相信人的理智终将能分别是非。希特勒曾说过,一个谎言你说它一千遍、一万遍就会变成真理。耶稣决不那样愚弄人。他说,你们说话,是就说是,非就说非。最后胜利的不是谎言,而是真理和公义。

请注意一件事:基督并没有因为他是上帝的儿子,就要求人们盲目依从。他没有说,我是上帝的儿子,我不会错,你们应该顺服。他倒是说“若”,就是“如果”：“我若说的是……”,“我若说的不

是……”这就是说,他情愿承认他有错误的可能,他让人们凭他的言和行作出他们自己的判断。他甚至不说打一定是不许可的,他只要求人们不急于动手,先考虑他的话是对还是不对。他说,“我若说的是,你为什么打我?”

在这一年的开始,让我们重新想到,语言的力量不在于叫得多么响,而在于语言的内容是不是同上帝管理整个宇宙的终极原则相一致。许多真理在刚被提出的时候每每声音微弱,但因为是真理,终必取错谬而代之。真理的声音、理智的声音、公义的声音,有时听来微弱,但它们并不真微弱。人们对复活之主的信仰、对升天之主的信仰,对坐在圣父右边、以他权能的命令托住万有的基督的信仰,就包括了这样一个乐观主义的信念。保罗说过,上帝的软弱比人要强得多。历史不是骄傲的人背叛着神所创造的。历史掌握在上帝手里,这位上帝的名字就是爱。在这位上帝面前,人间的纷扰吵嚷应当平静下来,代之以谦卑的崇拜,使整个宇宙进展而为爱的团契。

爱永不止息

(一九八三年九月四日在南京金陵协和神学院
秋季开学典礼上的讲话)

在西方文学里——其实,不但在文学里,也在人们的日常语言里——大卫和约拿单是友谊的象征。要形容两个人知心,人们就说,他们简直像大卫和约拿单一样。

大卫和约拿单的友情的全部故事,记载在《旧约·撒母耳记》。那时,扫罗是以色列的王,约拿单是王子,王位的当然继承人。大卫是服侍扫罗的,是个音乐很好的英俊青年。他打击敌人非常勇敢,为祖国立了大功,老百姓很爱戴他,这引起了扫罗的嫉妒。扫罗患有精神分裂,大卫忠心服侍扫罗。扫罗既要依靠大卫,又要消灭大卫,曾经多次用标枪投射大卫,要置他于死地。大卫虽然多次有极好的机会进行报复、杀掉扫罗,可是他没有想过要这么做。他始终保护扫罗,因为他知道,以色列需要扫罗这样一位领袖去抵抗外敌。而约拿单呢?他看到父亲的威望一天天下降,大卫的威望一天天上升,发展下去,大卫会受到人们的拥戴,取代约拿单做以色列的王。如果他有一点私心,他大可利用父亲的手把大卫除掉。可是他一点也不自私,一点也不嫉妒,他从心底里喜爱大卫的品德,觉得如果大卫做王,比他接位对祖国更有好处,所以他千方百计保护大卫,不让他的生命遭到危险。他在扫罗面前为大卫辩护,他把扫罗的情绪和动静告诉大卫,让大卫及时躲避。后世把约拿单和大卫的友谊传为佳话。后来在抵抗非利士人入侵的战斗里,扫罗和约拿单都献出了生命。那时,如果大卫有一点私心,他有理

由感到高兴,可是他决不是那么自私,他没有半点高兴,他为失去了好朋友而哀痛欲绝。

《圣经》里记载这一故事,这就告诉我们,无私的友谊是美好的,人与人相亲相爱是宝贵的,是值得歌颂的。

今天,在世界许多地方,不少人自以为看破了一切,什么理想呀,友谊呀,爱心呀,道德呀,都是荒谬的,只有为自己争取好处才是实在的。耶稣不但说“人为朋友舍命,人的爱心没有比这个大的”,而且把这话付之于实践,做多人的赎价。可他们说,什么朋友,什么舍命,这些都是呓语,人不为己天诛地灭,这才是真理。他们认为,人与人之间只有利害关系,只能冷酷无情,只能尔虞我诈,其他都是假的。

我想不会有玩世不恭到如此程度的青年到神学院来就学。但是,说不定有些同学也多少受到这种人生观的影响,有时会怀疑,友谊究竟有多少价值?道德究竟有多少价值?爱究竟有多少价值?基督的爱的福音究竟有多少价值?承认归服基督为主有多少价值?如果你有这种怀疑,那么,让我说,这种怀疑是可以理解的,但也让我请求你,切不要往玩世不恭那条路上滑,至少再给你自己一个机会,看看你对于爱的信仰能否重新点燃起来,让它发扬光大。

我们愿意更多的人发现爱,发现爱的宝贵,不但在人间发现人的爱,而且更在基督身上发现上帝的爱,并且进而发现,爱实在是这整个宇宙、整个现实、整个存在背后的最后最高的动因,最后最高的原则,一切能源背后的最后最高的能源。基督所启示的上帝的最高属性不是他的无所不能,不是他的无所不在,不是他的无所不知,不是他的自在永在,不是他的崇高威严,而是他的爱。这个属性超过人类所能感知、想象和摸索的范围。人类的头脑无法体

会这一个属性,人类的语言也没有合适的词语来表达这个属性,只有藉着启示,我们才发现,他有点像人间最好的父母。我们竭尽语言的可能,称他为天上的父。发现这个爱,认识这个爱,被这个爱所抓住,向这个爱投诚,我们才能彻底同“人不为己天诛地灭”论一刀两断。

我们愿意更多的人发现,只要我们有了基督的爱,世界上有许多东西都变得值得爱了。真理,科学的真理,救恩的真理,不值得爱吗?善良,心地的善良,行为的善良,语言的善良,像基督所彰显的本性的善良,不值得爱吗?美,健康身体的美,思想精神灵魂的美,文学的美,音乐的美,色彩的美,自然的美,崇拜的美,不值得爱吗?高尚的信念,坚贞的信仰,从这个信仰产生的希望,不值得爱吗?基督舍己以拯救世人的福音,不值得爱吗?藉着佳美的脚踪,报福音,传喜讯,让万民能够听到,这事业不值得爱吗?在这些可爱、可贵的事物面前,如果一个人还只顾惜自己,只追求自己的福乐,那就是很渺小的了。

有人以为,基督教既然讲爱,我们就不能讲恨,就不能分是非,连黑暗、罪恶、错误也不能反对。这当然是不对的。保罗说:爱“不喜欢不义,只喜欢真理”(林前 13:6)。爱和恨是一对,没有恨不可能有爱,有了爱也一定有恨。喜欢真理一定反对谬误,不喜欢不义一定拥护正义。法国十八世纪百科全书学派狄德罗告诉艺术家的话是值得听一听的:“使德行显得更可爱,使恶行显得更可憎,使怪事显得更触目,这就是一切手中拿着笔杆、画笔或雕刻刀的正派人的意图。”我想,我们一切手里拿着《圣经》,为主做见证的人,也应当包括进去。

保罗向哥林多信徒用了多么美的语言来歌颂爱。请大家特别注意一句话:“爱是永不止息。”今天,约拿单不在了,大卫不在了,

保罗也不在了,但是爱没有止息,几千年的历史没有把爱抹掉,爱的感染力越来越大。哪里有共同为之献身的理想,哪里就有爱,就有友谊。因为上帝是爱,而他是永活的上帝,所以爱永不止息。所以,即便对那些极端自私、极端玩世不恭的人,我们也不丧失希望,愿意他们最后也会被爱所吸引,所折服,悔改而来就主。英国作家 G.K. 契斯特顿指着玫瑰花说:“如果种子在墨黑的土地里能够改变而为这样美丽的玫瑰,为什么人的心在它的长途旅途中不会转变,去朝向那众光之源呢?”我相信,在一个爱的团契里,我们每个人心里的小小的爱可以得到阳光,得到滋润,得到培育、开放而为美丽的花朵。

各位新同学在来院以前大概都收到我的一封信了吧?在那封信里,我请同学们不要把神学院看为世外桃源。我们也是这世界的一部分。不能保证你们在这里的一切经验都是美好的。我说,你们最好这样来看神学院:它是一个主内共同体,一个大型的家庭,在这里师生们都在学习接受主的爱。我们还都在学习,谁也是半成品,谁也不是十全十美的。学习爱的功课,这是我们基督徒最重要的功课。我们这大型的家庭没有《红楼梦》贾府大观园那么复杂,但决不是人人在每件事上都知道应当怎样做好的。介绍大卫和约拿单,不是叫同学们都两个两个地结成朋友。我是想,让我们每个人同每个人的关系都像大卫和约拿单那样,让基督的爱继续成为神学院的主流,使我们每个人不只期望别人用爱来服侍我,而是多多自问,能够怎样更好地去爱,爱基督,爱教会,爱祖国,爱学校,爱师长,爱一切同学。记得歌德曾在一首小诗里说:“被人爱是有福的,而有所爱,那更是有福的。”

神学院里也有不够理想的事。但是奇怪的是,我们的校友几乎没有例外都对神学院怀有特别深的感情。这种感情好像由于离

开学校而更超过他们在学校的时候。前不久我在一个海外城市遇到一位校友,他在学校里的時候我曾给过他错误的批评,我请求他宽恕。他回答说:“什么不公平的批评我都忘了,我记得的是,当我离开学校的时候,你陪我走到大門,说希望我早日回来。”他说,他把母校看为母亲,要经常回来看看母校的一草一木。所以,你们看,随着时间的推移,我们的校友念念不忘的是什么,忘记得一干二净的是什么。这次我到福州,好几位校友坐了三四小时长途汽车来会面,仅仅讲几句话,拍几张照,我很感动,也很感谢。甜蜜的回忆是永不止息的,不愉快的经历很快就会淡薄了。你们来到了的这所神学院有这样一个特点,这是不大好解释的,为此我们只能感谢神。

大卫和约拿单的友谊是他们青年时代的友谊。他们是一对爱国青年。你们如果看大卫的一生,他爱神的一面也很突出的。他写了许多赞美上帝的诗,还有忏悔的诗。到了晚年,他念念不忘的是为耶和华建造圣殿。这志愿他不得不交给下一代。今天中国教会的处境也是这样。在《历代志上》第22章里,我们可以读到,大卫是怎样为所罗门建造圣殿作准备的:“我儿啊,现今愿耶和华与你同在,……建造耶和华你神的殿。……我在困难之中为耶和华的殿预备了金子十万他连得、银子一百万他连得,铜和铁多得无法可称。我也预备了木头、石头……石匠、木匠,和一切能做各样工的巧匠。你当起来办事,愿耶和华与你同在。”

我们不以大卫自居,也不以所罗门自居,可是这段《圣经》的信息是无法抵制的。我们中间新一代信徒不能不听见老一代的号召:“中国的青年信徒们,愿上帝和你们同在,好好建造新中国的教会。我们为主殿准备了一定的条件,打下了一定的基础。你们当起来办事。愿上帝与你们同在。”

我们的共同目的是要把上帝的殿建立在新中国的大地上,使万民看到福音的光辉。相信同学们都意识到我们任重道远。让我们学习爱的功课,使我们的教会成为主合用的器皿。

活着该有使命

(一九八四年九月九日在南京金陵协和神学院开学典礼上的讲话)

又一个新学年开始了。回家过暑假的同学回来了,我们欢迎;半年在外面实习的同学也回来了,我们更欢迎;还有六十多位新同学来到了,我们尤其欢迎。

请大家想一想,在南京这个地方,集中了两百多位同工、同学,好些人为了吃、住、清洁卫生、上课、崇拜、造新房子和种种其他活动忙个不停,我们究竟要干什么?我们为之献身的是一个什么事业?我们说顺服神的呼召,可是神在做什么?为什么要召唤我们?顺服这个召唤有什么价值?对这一系列的问题,我想,《路加福音》第1章第26至38节所记的天使去找马利亚这件事能够给我们启发。

歌德说过:“亲爱的朋友,生命之树常青,而理论是灰色的。”天使去找马利亚谈话的故事是活生生的、动人的,它充满着诗情,像生命之树一样常青,而我讲的是灰色的理论。可是我相信,歌德讲这话不是要降低理论的重要性。正由于理论的衬托、分析、综合、指导,生命之树将会更青,更有感染力,更会被人们所懂得,并且将会产生更多的生命之树。我们在神学院既要把灵性生命当作生命之树来培养,让它常青,又要学习理论思维,来认识、浇灌这棵树,让它壮大成长。

理论帮助我们用宏观的眼光来看历史,就是暂时摆脱事件的枝枝节节,先看到历史的全貌和全过程,把历史事件放在这个全貌

之中来认识。这样来看,《路加福音》第1章所记载的天使和马利亚之间的一段对话,在上帝整个创造、救赎、圣化的历史上,是一个标志,是极为重要的一个点。

我们的出发点是上帝的爱,或是爱的上帝。在一切创造的背后是爱。爱是揭开全部存在的奥秘的钥匙。上帝这个爱催促着他要进行创造,进行教育,进行宽恕,进行救赎,进行圣化,使越来越多的人找到这爱的能源。神的最后目标就是塑造出爱的宇宙,一个爱的世界,在里面有一个以自愿相爱为原则的人类共同体。上帝不是一辆压路机或推土机,把人的意志和自由全压倒、扫除。上帝的意志是爱的意志,是团契的意志。上帝正在按自己的形象塑造人。三位一体本身就告诉我们,上帝自己就是一个爱的共同体。

可以说,在神人关系发展史上,天使对马利亚的访问是一个标志:上帝创造世界、救赎世界、圣化世界的全过程的展开已经出现了这样一个重要的少数,上帝可以期望他们自觉地和上帝同工。如果上帝的这一期望不是落空,而是得到积极的响应,那么,道成肉身这件事就具备了人间的条件,就取得了人间的配合,就不必再等待。

我们知道天使向马利亚透露了神的计划——神为了继续他创造、救赎、圣化的工程,自己准备成为世人,来到世界——这是令马利亚万分兴奋的。她和她的家人以及好些以色列人长期以来所期望的不正是这个吗?但是,对她这样一个女青年来说,这里面所要求的牺牲也实在是大的。

道成肉身是一件具有宇宙意义的大事。问题是为这件大事,人类将提供合作和配合,使这件事得以实现呢,还是冷淡甚至抵制,从而拖延上帝创造史的进程呢?问题就是这样摆着。当马利亚在思索着天使给她带来的课题的时候,不但是上帝和天使等待

着她的自由抉择,而且是整个宇宙、整个自然界、整个世界都好像连呼吸也停止了,紧张地期待听到她表示同意的回答,因为整个受造之物还在等待释放,进入神儿女自由的荣耀。所等待的能不能实现,现在就看马利亚的回答。

我们知道她是怎样回答的:“我是主的使女,情愿照你的话成就在我身上。”由于这个回答,她就成了道成肉身的器皿,道成肉身的载体,神创造、救赎、圣化的历史就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

我喜欢杜甫推崇李白的诗:“笔落惊风雨,诗成泣鬼神。”马利亚是个简单的青年,不是诗人,甚至可能不会动笔,可是她的这一句话,难道不比李白的任何诗句更惊风雨和泣鬼神吗?

我们时常讲基督的顺服。可是在基督的顺服的背后,我们看到圣母的奉献。她的奉献是自由的,不是勉强的,是负责的,不是任性的或是冲动的。这是一种彻底牺牲自己的爱,一种彻底牺牲自己的奉献。上帝愿意藉着他的创造在人间大量出现的正是这一个爱。

我曾经向老同学引用德日进的豪迈的话:“到一天,在我们能够管好风雨潮汐和地心引力之后,我们将为上帝驾驭爱这一能源,那时,人类将像是在世界史上第二次发现火种那样。”马利亚对神不顾一切地爱,不顾一切地奉献,这是一个新的开端,使德日进敢于提出他的异象。

全宇宙有一切理由向马利亚怀抱感谢崇敬的心意。不但全宇宙,而且是天使和上帝自己,也因为她的爱心,她的奉献,她的合作,她坚强的意志,她的牺牲而感到高兴,感到激动。

从这里,我们可以理解,为什么多少年来在很多的基督徒的心里,在他们的神学思想里和灵性生活里,马利亚占有特殊的地位。连基督教新教的巴特也说,他也不反对礼拜堂里放马利亚的像,只

是这个像不要放在太高的地方,要放在会众之中。

让我们这样来想,马利亚的奉献不是她孤独一个人的回答,这回答是上帝长期塑造工作的成果,代表着人类中对神的爱的心志,那最有领会,最从善如流,按照自觉自愿同他配合的那个少数,那个尖端。我们常听到:“一切已死的先辈们的传统,像梦魇一样,纠缠着活人的头脑。”可这句话用在这少数人身上就不大贴切。

同学们,教会在地上的使命就是做道成肉身的载体,就是把这位太初之道送到人间。是的,我们得吃,得住,得做许多事情,但在这一切背后我们所求的是要使自己像马利亚一样,为了让道成为肉身,向世人彰显,甘心情愿让上帝的话成就在我们身上,不计任何代价。

我不愿意同学把这所神学院看为怎样好的地方,以为这是一切追求的终点和目的地。不是这样。我们每个人都还在接受着神的创造、救赎、圣化。我们都还是半成品,都有自己的软弱,都有言行不一的地方,叫人失望的地方。这里不过是一所学校,一所学习爱的功课的学校。在这里,人人都是学生,人人也都是教师。我们教学相长,一同来认识神的圣善和美好。人人都在学着这样做,这是对神学院比较恰如其分的看法。

在神学院的崇拜生活、灵修生活和神学探讨里,你们可能会遇到你们所不习惯的东西。这每每是对你们的一个要求,要求你们学习尊重别人,学习把别人看为比自己强,要求你们看看自己有什么可以向别人学习的地方。有一位很有名的人(马克思,见《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一卷第一篇)曾经说过:“你们赞美大自然悦人眼目的千变万化和无穷无尽的丰富宝藏,你们并不要求玫瑰花和紫罗兰散发出同样的芳香,但你们为什么却要求世界上最丰富的东西——精神,只能有一种存在形式呢?”保罗在《哥林多前书》第 12

章第3节里说：如果不是圣灵的感动，谁也不会承认耶稣基督为主。可见，凡承认耶稣基督为的都是圣灵所感动的。所以让我们学习尊重别人的功课，使我们的精神、我们的灵修、我们的神学思想丰富起来。只要把马利亚的这一句话“我是主的使女，情愿照你的话成就在我身上”融入我们每个人每天的祷告和奉献，我们就能够成为一个互相尊重、互相学习、互相扶持、互相促进的爱的共同体。

复活——从憧憬到信念

(一九八四年于南京金陵协和神学院)

我今天的讲话将是很短的。

人死了又活过来,这是违反常识的,是叫人难于相信的。基督复活就是基督教信仰本身所包含的一个难点。

但是,请大家想一想,今天全世界有四分之一的人相信基督复活不是可以轻易取消的。基督复活的事实人们不太清楚,但是有十亿人认为,复活所代表的真理很深远,这个违反常识的信仰,两千年来没有磨灭。尽管谁也讲不清楚,但是要把它一笔勾销的话,那是不能允许的。

用普通的语言来说,复活这道理是有群众基础的。如果说,死是一切的一切,死是一切的终结,不管好的、坏的、善的、恶的、美的、丑的、真的、假的,都一死了之,这是人们所接受不了的。人类的最后命运是毁灭,这也接受不了,因为太没有公义、公道、正义、是非,太没有爱了。像耶稣这样一个人生,也是以死为结局,这宇宙不应当是这样的。在这一点上,人同此心。

在基督教外面,也有接近复活的思想。诗人臧克家一首叫《有的人》的诗,是这样开始的:

“有的人活着,他已经死了;有的人死了,他还活着。”

你们知道我是很钦佩闻一多的。在他被国民党杀害周年祭的时候,郭沫若先生写过这样一段话:

“中国也快要天亮了,普天四海将要看见无数金的、石的、

石膏的、木的闻一多。

“你是一粒健康的种子，随着中国的天亮，随着太阳光的照射，普天四海而且无年永劫，将有无数活着的闻一多。

“由一而多，你的名字和你自己一样，便代表了真理。

“我现在不是纪念你的死，而是庆祝你的生。”

明代剧作家汤显祖在《牡丹亭记题词》里讲到，单凭了人的理智，死而复活是难于想象的，但是凭了人的至情，就是深切的感情和直觉，由死得生是“必有”的道理。他说：

“情不知所起，一往而深。生者可以死，死者可以生。生而不可与死，死而不可复生者，皆非情之至也。……嗟夫，人世之事，非人世所可尽。自非通人，恒以理相格耳。第云理之所必无，安知情之所必有耶。”

照我们基督教看来，这些诗人作家所探索、所向往、所憧憬的，用信仰的语言来说，就是上帝是主宰，是治理者。他主宰着宇宙、自然、历史、世界。不是说社会上、历史上发生的每一件事都是上帝的旨意，但是，通过所发生的一切好事、坏事、善事、恶事、美事、丑事、痛苦的事、快乐的事，上帝的爱在起着作用，在引领着一切，接受着一切，改变着一切，使一切变成基督给上帝的供奉。通过死亡达到生命，通过痛苦达到快乐，通过软弱达到刚强，这不但是复活的基督的经历，这也越来越成为我们亲身的经历。我们作为国家，作为教会，作为公民，作为信徒，这三十年来的经历都叫我们更加相信复活。在一切乌云、苦难、光明、快乐当中，我们听到那叫我们安心信靠的声音：“是主”（约 21:7）。在一切现象背后，在最后的最后，在最根本的意义上，“是主”，是主的手，是主的爱，是主的旨意。在这里就是我们基督徒安慰、平安、信心、希望的根源。

来自解放神学、德日进神学和 过程神学的启发

(一九八五年)

我想向同学们陆续介绍今天海外一些神学学派。它们有的对我们有参考价值。

为了使同学们能够理解一个神学学派,我不得不针对中国神学思想现状,突出它的某些特点,并且尽可能通俗化和简单化,这么一来,对一个学派未必很公道。这是首先要向大家打招呼的。

第二个招呼是:研究神学切忌给别人贴标签,说这个是“属灵的”那个是“不属灵”的,或这个是“正统的”那个是“不正统的”。做自封的审判官是容易的,但对自己的神学思想的形成、丰富、长进没有什么帮助。这是一个不准备提高自己的态度。遇到你听不大进的论点,先不要谴责,应当试图理解:究竟是什么东西使这个人提出这样的论点?他这样讲究竟要解决什么问题?这问题你自己能不能解决?是怎样解决的?这就是说,不要急于做裁判员,要做聆听者和对话者。我们对新观点不要求全责备,要有同情,要进入对方的体系,要看到它企图解决某个问题的善良意图。不同意某一论点是可以的,但先要好好了解它,知道它说了什么,没有说什么,不要歪曲它,给它无限上纲。先歪曲和丑化一个论点,赋予它以荒唐的形象,以便不费吹灰之力加以打倒,那不是神学家和任何正派学者应有的手法。

一、解放神学

解放神学 (liberation theology) 起源于拉丁美洲, 主要是拉丁美洲天主教。它现在在北美和亚洲都有影响。它甚至在福音派方面也有一定影响。在整个地球上, 中国可能是拉丁美洲解放神学最没有影响的地方之一。

解放神学突出和强调《圣经》里面出埃及这件事。出埃及是上帝在希伯来历史上所做的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他听了希伯来人民在痛苦中的呼求, 让他们经过斗争脱离埃及, 得到解放。《旧约》的许多书告诉我们, 在出埃及后几百年、一千年之后, 以色列人、犹太人经常不断地要回顾这件大事。“神为我们成就了大事。”这个话里的“大事”, 指的每每都是出埃及。出埃及这件事在希伯来民族身上打下了很深的烙印。

除了出埃及是解放神学突出的主题之外, 《圣经》里面解放神学家用得特别多的是马利亚的《尊主颂》——《路加福音》第 1 章第 46 节起的诗: “我心尊主为大, 我灵以上帝我的救主为乐, ……他用膀臂施展大能, 那狂傲的人, 正心里妄想, 就被他赶散了。他叫有权柄的失位, 叫卑贱的升高, 叫饥饿的得饱美食, 叫富足的空手回去。”此外, 他们的文章里面引用得特别多的是《路加福音》第 4 章耶稣在拿撒勒会堂里讲的那段话: “……传福音给贫穷的人, ……报告被掳的得释放, 瞎眼的得看见, 叫那受压制的得自由, 报告上帝悦纳人的禧年”。还有一处他们引用得特别多的, 就是《马太福音》第 25 章第 31 至 46 节, 讲到上帝根据人们对贫穷无告的人的态度进行最后的审判。

解放神学有一个特别重要的观点, 就是认为上帝不是不偏不倚的, 上帝有偏袒, 他偏袒穷人。解放神学最有代表性的神学家,

秘鲁神父古斯塔沃·古铁雷斯(Gustavo Gutierrez)写的一本书就叫《解放神学》。他是第一个把解放神学的旗帜打出来的。他说,传统神学集中注意力于不信的人(non-believers),而对被剥夺了人格的人(non-persons)却毫不注意。传统神学对这种人缺乏敏感。他说,告诉这样一个过着非人生活的人说,你是上帝的儿子,这句话会有什么意义呢?这位神学家更关心的是世界上那些穷苦的人、受排挤的人、被疏远的人、被人践踏在脚底下的人,这些人过着简直不是人过的生活。他认为,神学应该关心这样的人,不要专把注意力集中在不信者身上。他认为,上帝偏袒世界上的穷人,出埃及就表现了这一偏袒。

解放神学提出的几个词,现在在国际神学界用得很多,其中一个就是实践(praxis)。这个词有时指人民的一般实践,有时指基督徒在神学指导下的实践。解放神学不推崇大部头的系统神学,主张通过实践来取得神学思维更多的原料。

解放神学强调它是一个人世的神学,主张进入世界。古铁雷斯说:“神学的中心问题不是人死后(after death)怎么样,而是人出生后(after birth)怎么样。”死后上天堂呀,下地狱呀,他认为这不应该是神学的中心问题。神学的中心问题应该是人世。怎样使人生出来以后活得有人的尊严。

解放神学反对发展主义(developmentalism)。你们知道,世界上有些人一直在那里讲第三世界国家的发展,或是说开发,却不讲解放。解放神学认为,拉丁美洲和第三世界很多国家的问题首先不在开发,不在发展,而在社会制度的根本改造。这些国家越让外国来投资搞开发,对外国的依赖性就越大。巴西有个卡马拉(Camara)大主教说过:“当我给一个穷人面包吃的时候,人们说我是个圣徒;但当我问到穷人为什么没有面包吃的时候,就有人说我

是共产党。”他们认为,在这个二十世纪,最大的爱在于创造正义社会。他们说,真正的问题不在于不发展,而在于不独立。不独立带来压迫和各种痛苦,所以人们的出发点应该是寻求解放,而不是增加全国人口年平均收入的数值。

解放神学流派很多,其中至少有一部分人明确表示,必要的时候不得不使用暴力,因为统治者为了维持他们的统治使用大量暴力,这决定了反统治者被迫使用暴力去推翻他们。拉丁美洲现在至少已经有几十个解放神学派的神父被反动势力的暴力打死,或是在社会斗争中被暗杀。这些事迫使人们考虑使用暴力对付暴力的问题。

持解放神学观点的人对于教会当局,即天主教教阶制度中的上层领导,竭力维持正常关系。他们在教堂之外成立了许多基督教基层共同体。在这种小的聚会里面,神父跑去同大家一起做弥撒,一起做祷告,一起读《圣经》。读《圣经》有时每个人都讲话,谈谈读了《圣经》以后有什么体会。我看过三本书,记录了些普通的打渔的人,一般的工人,一般的农民,望了弥撒和读了《圣经》之后,一个一个的发言。这是在解放神学思想指导下产生的一种组织形式。

解放神学代表着一种解释《圣经》的原则和方法。我们研究《圣经》,大家都喜欢知道,这一本书或者这一段经文的背景是什么。我们知道,越知道背景就越能够理解经文。解放神学派并不反对研究背景,不过他们说,研究背景不总是很有成效的,《圣经》里面许多段落的背景究竟是什么,我们没有办法重新发现。他们认为,重要的是了解一段《圣经》从一代传到一代,从那批基督徒传到这批基督徒,积累了什么亮光。譬如说,《出埃及记》是《旧约》里的一本书。我们学习《出埃及记》,不但要知道出埃及的历史背景,

也要知道《出埃及记》那么许多年传下来，希伯来人和基督徒是怎样理解它、接受它的，这个知识是宝贵的。那就是说，我们今天读一节“经文”的时候，应该看到这节“经文”有它的教会性、历史性、公性。历史传下来的许多亮光都积累在那里，要加以认识。今天我们读《圣经》，我们又把新的亮光加进去，即便是没有多少知识的打渔的人、种田的人，他们在那些基督教基层共同体里面的共同发现也是宝贵的。按照我的理解，用民主精神读《圣经》，这是解放神学学者很重视的一点。这一点也正是我们重视的。

关于传福音，他们认为教会的历史使命不仅仅在于把基督带到人间。基督受父的差遣，一直不断地在来到世界，藉着圣灵在他自己选择的时间、在他自己选择的地方进行工作。因此，教会的使命不是把基督带到一个没有基督的世界里来，教会的使命是去认识基督已经在哪里工作，然后把认出来的基督作为好消息去告诉穷人。教会的使命主要是向人宣告上帝悦纳人的禧年。由于道成肉身，由于复活升天的基督充满万有，人间已经有了基督。教会藉着圣灵的光照，认出基督来，然后像耶稣所爱的那门徒一样去指出：“是主。”教会做见证的任务是把主的作为指出来。既然如此，传福音不仅是把基督带给穷人，而且也是发现穷人身上的基督。传福音不仅是把基督带到人间（bring Christ to），而且是要从人间把基督发现出来（bring Christ out of），因为世界上的人身上已经有一点基督。把他们身上的基督发现出来，这也是传福音。

持解放神学观点的人中有些人对普世教会合一运动评价不高。他们指出：“基督教共同体这一神话，必须要破除，因为它使得人们认不清楚社会是分成阶级的，这些阶级是相互斗争的。”古铁雷斯说：“普世教会合一运动是上层公民间的一桩婚姻。”这当然是讽刺话。他还讲，世界人类没有合一以前，教会是不可能合一的。

他们这个观点我们中国基督徒比较容易理解。我们认为,教会的标志首先应当是圣洁,然后才是它的“一体”或“大公”。把“一体”提到不恰当的高度,一切服从“一体”,这每每会混淆是非。

解放神学的影响达到世界很多地方,产生了一些神学激进派。譬如说,美国有黑人神学(black theology)。黑人神学就是解放神学在北美的体现。还有妇女感觉受压迫,她们得到解放神学的启发,就出来了女权主义神学(feminist theology),认为妇女对于基督教的真理有一种特殊的敏感,两千年来受到了压抑,现在她们要解放,解放之后她们可以对基督的丰盛作出独特的更加深切的贡献。在这个神学的影响下,她们反对男权中心主义,有的还反对称神为父、却不称为母之类的神学语言。

持解放神学观点的人对于国际政治问题的表态是很少的,所以我不能够说他们对苏联怎样,对中国怎样。他们对古巴是有同情的,觉得古巴代表解放。对我们中国偶然也有一点友好的表示。古铁雷斯作过一篇演讲,专门讲中国,他是很肯定新中国的。解放神学书本里提到古巴,有时也要提到中国。提到苏联的话我没有见到,解放神学似乎没有反对苏联,也没有拥护苏联。对美国 and 西方资本主义的批评比较多。

解放神学开始于六十年代,当时别人觉得这也是一家之言。当拉丁美洲主教团一九六八年在麦德林(Medallin)开会的时候,请了解放神学家去做顾问,出来的决议有不少解放神学的语言。不是这些主教都完全拥护解放神学,是因为主教们依靠一批神学家替他们起草文件。解放神学的观点集中表现在麦德林会议的文件上。材料发到全世界,神学家中间拥护的人很多,反对的人更多。过了十年,拉丁美洲主教团在普埃布拉(Puebla)又开会。这次开会教宗若望·保禄二世亲自驾到。他也不敢表示反对解放神

学,因为解放神学已经有不少群众。可是看来他也不甘心让解放神学继续扩大影响,所以讲了一些模棱两可的话,一句是:“神父不是社会工作者。”这句话的含意很清楚,是不利于解放神学的。还有一句话是:“阶级斗争不是一条达到社会秩序的道路。”这是否定阶级对抗社会中的阶级斗争的。他要维护的是所谓“社会秩序”。

尼加拉瓜这个国家推翻了法西斯统治,成立了一个民主政权,这一起义有好多位解放神学的神父参加。因此,今天尼加拉瓜里面有三个部长是神父,其中一个 是外交部长,一个是文化部长。全国扫盲运动委员会主任也是神父。教宗要他们辞职,说神父不能参加政府。美国有一名神父是国会议员,他先奉命退出了国会,此后教宗就好对付尼加拉瓜的几个神父了。现在据知尼加拉瓜的神父拒绝退出。他们说,神父不参加政府,原则上固然是对的,但是在特殊情况下,应该有例外。一个神父说:“譬如说,我作为一个神父,在通常情况下不应该去做驾驶员,但是在革命运动需要的时候,我开过大卡车。”

外国朋友时常要问:你们中国基督徒对解放神学抱什么态度?我们是拥护解放的,我们也是重视神学的,我们也认为,神学应该从旧的传统中解放出来,从它在资本主义社会里受到的束缚中解放出来。解放神学用大量事实揭露社会黑暗,揭露殖民主义、帝国主义,有很大的启蒙作用。拉丁美洲持解放神学观点的人要改造社会制度,我们中国基督徒是欣赏的。解放神学主张神学应该多同社会科学对话,少同哲学对话,这我们也觉得是很好的。关于上帝有偏袒,上帝在有钱人跟穷人之间并不是各打五十板的,解放神学把这一点指出来,对我们中国基督徒读《圣经》是有启发的。解放神学是那么好的一个东西,我们不能完全把它拥抱着起来,我们感到难过。但是,许多中国基督徒到底还是认为,基督教和它的神学

的永恒主题,不应该是政治解放这一限于一定时期的任务,而应该是神人和好。如果不把神人和好作为神学的主题而以解放作为神学的主题,这个弯转得很大,即便我们中国已经解放了三十多年,许多基督徒也感觉到很难转。人与神和好,这是基督教神学的永恒的主题。社会、政治解放是这一主题之下应有之义,不容抹煞,但不是主题。我们中国经历了政治解放,神人和好的问题仍旧存在着。持解放神学观点的人中有的给予“解放”广义的理解,那就很好,但有的不这样。纽约协和神学院詹姆斯·孔在他的一篇文章里是这样说的:“我还是坚持,基督的福音同穷人脱离社会政治压迫的解放运动是等同的。”他说的是等同的,他不是说支持,如果说支持,我们就可以同意了;如果说包括,也可以;如果说要求,也是很好的。但是他说是等同的,福音和社会、政治解放等同了起来。对这个我们就有保留了。

我国解放以后,人民的生活有重要的改变和提高,人民的精神也有很大的改变和提高,这些我们都是欢迎的。但是我们在中国看到的变化,不能同保罗在他的书信里讲到在基督里面成为新人相等同。解放是非常重要的,但是解放并不接触,更不解决与神和好的问题。奥古斯丁曾经说过,我们的心如不安息在上帝怀中,便不会安宁。任何社会制度下都有许多人渴求这种灵性上的释放。我们不要把这个释放同社会政治的解决混为一谈。

解放神学讲上帝是偏袒穷人的,这是有启发的。穷人值得我们同情,但是穷人不是世界的弥赛亚,好像只要解放穷苦的人,穷苦的人就能解放世界似的。我们中国基督徒不是这样看的。我们同情和支持穷苦的人,这是应该的。一般说来,穷人更有条件接受革命的道理,这也是对的;改造社会,解决贫穷问题是不容忽视的。但是不要把穷苦的人理想化、绝对化。我们中国人民要富起来,但

是我们不是平均主义者。硬要人人一块儿富,人人一样富,如果全国人口平均每人每月收入五百元,就得人人拿五百元,不可以有一个人拿一千元,这个平均主义是不行的。事物总是参差不齐的,要富起来,总有一部分人先富,总有人后富。如果穷人由于穷就是救星,那么昔日的地主的土地被剥夺之后,他已经穷了,那他又变为革命的动力了。本来是受穷的人,今天他劳动得好,收入多了,他先富起来了,他倒变为革命的对象了。这不又是“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吗?我们在“文化大革命”十年当中已经尝过味道了,社会被搞得一塌糊涂。在旧社会,被压迫者是穷的,压迫者是富的,大体上是如此,但不能说,革命就是穷人反对富人。社会发展所按照的规律不是这么简单。尤其在人民政治上得到翻身和解放之后,再要号召穷人反对比他们富的人,社会就乱了,这是破坏人民自己的事业,是亲痛仇快的。在帝国主义侵略的问题解决之后,在土地改革的问题解决之后,在生产资料所有制问题解决之后,我们就要安定团结,提高生产,让人们参差不齐地从贫穷过渡到富有。

再者,穷人尽管穷,他的头脑里也可能接受了不少统治阶级的思想,穷人不一定是最有觉悟的,所以我们不要把穷人偶像化。正确的理论往往不是穷人自发产生的,每每是较富有的家庭里的知识分子在比较安定的条件下才能发展出先进的理论来。

尽管我对解放神学有这么一些保留,我还是觉得解放神学是基督教史上出现的一个伟大的新事物,它是了不起的,胜过许多传统的系统神学体系。我很爱护它,而对某些反对解放神学的人,我倒是并不同情的。

解放神学是不是统治阶级把人们从马克思主义引向宗教从而放弃斗争的一种手段或阴谋?我认为不是,因为就拉丁美洲的大

部分来说,马克思主义还没有到达;对第三世界的天主教、基督教信徒,马克思主义并不是具有多大吸引力的思潮。正相反,解放神学是把宗教信徒从忍受痛苦引向现实,引向觉醒,引向斗争。就它二十来年的历史来看,他不是把群众从斗争引向顺服。

喜欢以“宗教是鸦片”一句话来对待任何宗教现象的人,在解放神学面前有一点为难。宗教就是鸦片之说,未免太简单化。一个人吸了鸦片,处在麻醉状态底下,不会主张解放,不会自觉去斗争,不会去为解放事业牺牲生命的。如果解放神学也不过是鸦片,那么教宗就不必到拉丁美洲去浇冷水了,南非反动政府也不必大张旗鼓反对黑人神学,没收它的出版物了。我想一个比较科学的态度是在各种不同的宗教现象之间细加区分,承认有的宗教现象比较另一些宗教现象要好,而不把它们看为铁板一块。

二、德日进神学

德日进(Teilhard de Chardin)是法国人,是一个考古学者,一名耶稣会士。他许多年在中国参加考古工作,发现北京人的工作他也参与。我国抗战时他一直在内地,五十年代死于美国。

德日进的神学视野跟解放神学一样,不局限于一个信与不信的问题。有的人的神学绕来绕去以信与不信为轴心,解放神学同德日进的视野很开阔,超越了这个问题。

按照我的理解,德日进要我们看见上帝进行创造的宏伟目的,和上帝创造事业的整个过程。他要我们把目光转移到那个上面去。有的人可能会说,我不在信与不信或得救不得救的问题上转圈子,那我的基督教信仰还有什么呢?德日进告诉我们,基督教信仰可丰富呢,处理的不仅仅是救赎问题。也可以说,救赎是个极广阔的问题。

在德日进的心目中,整个历史不完全就是人类的历史。历史就是从最初创造开始一直到历史的终了。整个历史的大部分时间是没有人类的。人不过是在这久长的历史“最近几分钟”才出现的动物。按照德日进的看法,整个历史,或整个的时间,就是上帝为实现他的目的而努力的历史。

让我们至少暂时不要看人,把信与不信的问题放一放,暂时转眼去看上帝。

上帝的目的是什么?上帝的目的就是要创造出一个对象来,要在受造之物当中出现一个品种,或是一种动物,或是一种对象——上帝渴望要创造出来的这一对象是摆脱了低级趣味、具有神的形象的人。神的形象究竟是什么呢?神是一个共同体,是一个三位一体。三位一体告诉我们,上帝是一个团契,一个集体。上帝的创造就是要使宇宙中出现人的共同体,或是共同体的人。上帝要扩大他的共同体,光是圣父、圣子、圣灵的共同体不够,还要扩大,使人类都进入爱的共同体。用德日进的话来说:“上帝不是权力意志,上帝是团契意志。”先要理解德日进对上帝的用心的认识,然后我们才能够理解德日进。

有人要问,上帝是无所不能的,他既然希望要同人有团契,希望世界上出现一种甘心愿意同上帝保持团契的人,那么上帝只要说一句话就可以成功了,为什么这种人到现在还难于出来?回答是:自觉自愿是非常重要的。人要做到同上帝共享团契,首先要自觉自愿,如果不是自觉自愿,如果是被动的,如果上帝得施加压力,那怎么谈得上团契呢?譬如说,在《红色娘子军》电影里,人家迫使一个女青年同一块木头结了婚,成为这一家的媳妇,一块木头放在床上,说是她的丈夫。他们两个能够谈得上团契吗?能够组成共同体吗?当然不能。上帝发出命令所能得到的最多不过是

一个木偶，一个机器，一个机器人。上帝同机器人是不能够相爱、建立共同体的。因此，创造不能不是很长很长的历史过程。德日进不会赞成上帝用六天的时间进行创造，然后就永远休息了的观点。这个观点是同德日进格格不入的。德日进的观点是，上帝一直在创造，而且还要继续创造下去。创造的过程是很长很长的，创造的目的就是最后要有一种新的人出来。这种新的人的出现就是保罗书信里面讲的基督里面的新人到了完成的地步。这是多么浩大的工程。

我们是人，不是神，所以讲整个创造的过程宜粗不宜细。要很细地讲，德日进也没有讲过。在毛主席的诗词里，点到唐宗宋祖、成吉思汗等几个人就代表了中国古代史，至于曹操怎么样，乾隆怎么样，用不着一个一个去讲，至少毛主席的诗词没有一个一个都讲，粗粗点一下就可以了。德日进的神学也是这种诗词，横扫历史，气魄雄伟，不是很细的工笔画。

有一点在德日进思想中是很突出的，就是这个创造也是救赎的过程，也是圣化的过程，也是教育的过程。创造、救赎、圣化、教育是合而为一的。

基督教里有人把三位一体的三位分得很清楚，上帝圣父是创造的主；圣子是救赎的主；圣灵使人成圣。甚至有一种观点，是从孟他努主义(Montanism)这异端开始的，索性把历史分成三个阶段：第一阶段是上帝圣父创造的阶段，然后是基督圣子救赎的阶段，现在是圣灵的阶段。德日进不是这样分，他强调创造、救赎、圣化的统一。关于三位一体，有人强调三位的分开，很容易把救赎主和创造主对立起来，这样就会重复早期教会阿里乌(Arius)学派的异端。当时教会不得不开一系列会议。教会历来主要不是强调三位的分立，而是强调三位虽然是三位，但是是一个上帝。创造、救

赎、圣化这三者是同一上帝一直在进行中的工作的三个方面。

今天有人把自然神学同启示神学拆开,或者否定自然启示,也要造成同一个不好的后果,就是鄙视创造,在三位一体的第一位和第二位之间形成对立,同时也削弱第三位的作用。

《尼西亚信经》讲到圣灵的时候说:“曾藉着先知训言。”加上这句话,就足以说明,圣灵早就有了,就是圣灵的先在。基督教强调基督的先在和圣灵的先在。基督不是圣诞之夜才从无变有的,圣灵也并不是基督升天之后才从无变有的,基督和圣灵早就在那里工作。圣父、圣子、圣灵从创造之前,就在一块儿工作。提到基督和圣灵的先在,是为了要保护创造、救赎、圣化三者分不开的观点。

我们知道,德日进和解放神学所代表的,并不是一般的所谓社会福音。从前西方的社会福音是很简单的,在基督论方面特别简单:基督是一个伟人,一个教师,我们应该好好向他学习,以他为我们榜样。它没有一个《新约圣经》的基督观。而德日进有一个很高的基督观。他不是只讲拿撒勒人耶稣,他时常讲到宇宙的基督。这位宇宙的基督《新约》有许多地方是讲到的:“太初有道,道与上帝同在,道就是上帝。这道太初与上帝同在。万物是藉着他造的;凡被造的,没有一样不是藉着他造的。”耶稣基督不光是教师,也不光是救赎主,他是参与了创造,万有不是通过他的话,不可能创造出来,这就是宇宙的基督。《约翰福音》第8章第58节、第17章第24节也有这个意思。还有《哥林多前书》第8章第6节,《以弗所书》第3章第9至11节等等,大家可以自己去看。特别是《歌罗西书》第1章第15至20节值得读一下:“爱子是那不能看见之神的像,是首生的,在一切被造的以先。因为万有都是靠他造的,无论是天上的、地上的、能看见的、不能看见的,或是有位的、主治的、执

政的、掌权的，一概都是藉着他造的，又是为他造的。他在万有以先，万有也靠他而立。他也是教会全体之首，他是元始，是从死里首先复生的，使他可以在凡事上居首位。”我从前在做神学生的时候，我们的教师是从来不叫我们背《圣经》的，唯有两段经文，有一位神学教师希望我们能背得出，这就是一段。另一段就是《希伯来书》第1章第1至3节：“……早已立他为承受万有的；也曾藉着他创造诸世界。他是上帝荣耀所发的光辉，是上帝本体的真像，常用他权能的命令托住万有。”德日进要我们重新认识这样一位宇宙的基督，先在的基督。

在创造、救赎、圣化的神的手掌底下，历史究竟是怎么回事呢？历史大体上分成这样三个阶段：第一阶段是准备有机物的出现。历史开始是根本没有有机物的，都是矿物，植物都没有。这第一个阶段是个很长很长的时期，神在那里准备有机物的出现。因为德日进是一个考古学家，他对这个特别有兴趣。他写的很多东西都有关这个阶段，是我们看不大懂的。第二阶段是从有机体的出现直到人的出现。开始有机体是非常简单的，分化和个体化的结果是有机体越来越复杂，最后在有机体里出现了人。他认为，人的出现是历史特别重要的一点。第三阶段，就是人的共同体的完成。人是出现了，但是共同体还没有完成，人与人之间还在那里闹矛盾。这一阶段要以什么为结束呢？要以共同体的完成为结束，这个是圣灵的圣化工作，也是基督的救赎工作，也是上帝的创造工作。

上帝是父，他的无限权能受到爱的制约。上帝的权能是大的，但是他的爱约束了他的权能的使用。上帝所憧憬的人在万有之中是一个独特的、非常高级的品种。上帝与人的关系，不是建筑师同大厦的关系，好像建筑师在那里设计了一个图样，然后造出一幢楼

来,不能用这幢楼同建筑师的关系来看人同上帝的关系。也不能说是一只表,而表的设计者和制造者就是上帝。不是这样的。上帝同人的关系是父母与子女的关系,是教育和成长的关系。上帝在宇宙中要培养出一个自我来,这将是一个能够正确地运用自由去进行选择的自我。他既然是个自我,就应该有自由,能够作出选择,因为如果没有这自由,就谈不到自我。但是因为这个自我已经认识了上帝的爱,所以他又不愿意去作错误的选择。能自觉自愿地运用自由来作出正确的选择,这才算是上帝心目中后来要实现的人,新人。照德日进看,到今天为止,人是过去的创造或进化的一个半成品,他是今后进一步改造的对象,又是进一步人化的力量。我们在一定的程度上已经有了这个自觉,有点愿意同上帝建立共同体。因此,在这个意义上,我们是半成品。尽管我们是半成品,上帝已经要用我们去促进历史,促进进化,促进创造。这正是半成品成为成品的过程。

《罗马书》第5章第15节有这样一个意思:恩典胜过罪恶。我们承认人是罪人,我们希望人能够认识自己是罪人,从而接受基督的救恩。但是我们不把罪说得神乎其神,好像罪天罪地,好像世界上除了罪没有什么别的了。按照保罗的这一段话,基督里面的恩典胜过亚当里面的罪。他是这样说的:“过犯不如恩赐。若因一人的过犯,众人都死了,何况神的恩典与那因耶稣基督一人恩典中的赏赐,岂不更加倍地临到众人吗?”是的,亚当犯罪影响了整个人类,但是基督对整个人类的恩惠胜过了亚当的作用。是的,亚当一个人的罪把人类都牵连进去,但是基督一个人的恩惠更加倍地在人们身上起了作用。让我们注意“更加倍地”这个副词,那就是说,起决定作用的是基督的恩典,不是亚当的遗害。现在有的基督徒传起道来,或者写起文章来,把亚当在人们身上的烙印说得那么

深,比基督的恩惠的烙印还要深。保罗不是这样想的。德日进特别强调基督的恩惠。我们整个人类同基督的一体,大大超过人类同亚当的一体。基督给人类的好处大大超过亚当给我们的害处。恩强于罪,新亚当的恩强于老亚当的罪。福音的信息是上帝的爱,是基督的恩典。原罪不是福音。原罪已经伏在基督的原恩之下。

我们在看德日进的神学著作的时候,觉得他要我们作一个过渡,就是从一个较小的、只同教会信众联合的基督,过渡到一个很大的、充满万有的基督。基督不是光同教会联合,基督不仅是教会之主而已,基督是那充满万有的。德日进要我们过渡到这样一个认识。这也就是从以信与不信为轴心的、局限于救赎论的、比较狭隘的那么一个神学观,过渡到认识三位一体上帝的伟大、荣耀、圣善、恩惠,看到上帝在宇宙中的创造、救赎、圣化。

在德日进心目中末世就是这个第三阶段的终结。这个由特殊品质构成的特殊品种的人,就是享有自由而又能够正确地作出选择的人,同上帝和同别人相团契的人,这种人涌现出来了。上帝创造的奇功实现了,上帝满足了。这一个历史阶段告终了,新耶路撒冷降临了。这就是人们较能理解的末世观。而这个末世也是一个新的历史阶段的开始。至于下一个历史阶段是怎样的,我们无法推测。德日进是这样说的:“到一天,在我们能够管好风雨、潮汐和地心引力之后,我们将为上帝驾驭爱这一能源,那时,人类将像是在世界史上第二次发现火种那样。”我们知道,第一次发现火种,对人类文化的提高起了多大的作用。我们能够用火了,文化大大地丰富起来了。第二次发现火种是指人类能够把爱这个能源驾驭好,发挥好,就是能够自治、自理。达到这一目标的那个点,用德日进的话来说是 Omega 点。Omega 是希腊字母最后一个。耶稣基督是 Alpha,又是 Omega,他是创始,又是成终。历史到了这一点,

我们目前这世界是到了终点。这是德日进的末世论。

德日进的思想是很开阔的。他不是在一个小圈子里转圈子。他感觉到基督是这个宇宙之主,是历史的主宰。所以他做人非常坦然自如。他看到真、善、美的一切,就肯定是基督的,是上帝的。有一次有人带他到上海玉佛寺,他看到玉佛,喜爱得不得了,尽管他是基督徒。他说,“我爱玉佛,看见玉佛使我觉得,基督教应该摆脱其地中海的框框,把玉佛的美吸收进去。”我的理解是,玉佛是一个美的作品,里面积淀了无数人们追求善良和真理的汗水,而一切美的东西不在基督之外,所以基督教应该加以吸收。梵蒂冈就在地中海,他认为,真正的人类的宗教应该摆脱地中海的局限性,而能够把广大的真、善、美的东西都吸收进去。难怪梵蒂冈要不喜欢德日进,几十年间不让发表他的书了。

德日进的英国好友李约瑟(Joseph Needham)是一个专门研究中国科学史的自然科学家,他是很接近德日进的观点的。他把德日进的观点引伸到现代世界史,在一篇讲中国的文章里,他谈了这样一段话:“我们没有任何理由假定,我们西方当前的文化就是人类组织化的最后成品,就是自然所赋予的最高秩序。有很多根据使我认为,有一种我们所能赞同的集体主义,是人类一种更高级的组织形式,它比西方中产阶级国家的文化要高,正像西方中产阶级国家的文化要比原始部落文化高一样。从经济个人主义进到生产资料公有制这一步,好比无生命蛋白质进到活的细胞,或是从原始野蛮生活进到第一个社会共同生活体一样重要。这个过渡有进化史的全部事实为其后盾。”他这话反映出他对中国的友好态度。

德日进认为,今天世界上认识基督的人尽管少,但是我们对这个世界,要在升天的基督的光芒里头看。这就是说,这个世界的地位已经有了变化。基督的道成肉身和复活升天使这个世界的处境

有了变化。基督不但是基督徒的先知、祭司、君王,他更是那首生的、永恒的逻各斯,上帝的圣子,万有的托住者。

圣灵不但是在教会里工作,他首先是在世界中工作,教会只不过是世界的一部分。教会是世界上的一个标志,提醒人们想到存在着一个灵性的方面,有一个超在的方面。德日进说,“我认为,世界不会接受基督教,除非基督教先接受世界,并且把世界的希望加以圣化。”持解放神学观点的人也好,德日进也好,他们都认为,真正的教会只能是一个小的组织,它是要在世界上起作用的。主耶稣说,你们要在世界上做盐;他没有说,你们要把整个世界变成一大块盐块。他说,你们是世界上的酵,要使世界这面团发酵,变成面包;可是耶稣并没有说,把整个世界变成一大块酵母。因此,真正的教会总是一个比较小的组织。

信与不信是有差别的,不是无所谓的。全世界的人都是天父的创造,但并不是人人都是耶稣基督的朋友。耶稣基督渴望友谊,但是能够称为朋友的是少数。基督徒就是认识神,认识基督的,我们应该比别人对上帝的用心有更深的体会,让上帝能够更好地享受同我们的团契。但不能说不相信上帝的人就不是上帝的儿女,更不能说他们都是与上帝为敌的。上帝是非常伟大的,以中国来说,他的关心不限于几百万基督徒。上帝的气量是那么大,以致尽管今天有许多人不承认他的存在,不感谢他,上帝不太计较,只为他们可惜,巴不得他们自觉地和他相认。上帝不像我们,只知道在信与不信一个问题上做文章。

你们听得出来,我是有点欣赏德日进的神学观点的。德日进令我失望的是,他到底是法国文化和法国高等教育的产儿,有他局限性的一面,突出地表现在他的欧洲中心主义。他对西方世界以外的主要兴趣在考古。他认为,当代的东方没有多少可以向全世

界提供的价值。他心目中的东方是“无所作为”。我国抗战是伟大的事业,他当时生活在中国,可是对我国人民的奋战的历史意义,他视而不见,只就战争的苦难表示伤感。他对历史前进的阻力,对罪恶势力的猖獗,也嫌估计不足。

三、过程神学

进入二十世纪以来,西方人的世界观发生了重大的变化。原来,在欧几里得、伽利略、牛顿等影响下,人们把世界看为稳定的、静止的。爱因斯坦的相对论和随之而来的学说指出宏观世界和微观世界都在不停地动着、变着。从柏拉图起,哲学总是谈存在(being),这个存在是静止的。今天,人们承认,一切——包括最小单位的物质——都是在变动和“成为”(becoming)之中,连一位毫不接受世界的影响、毫无变更的上帝也难于想象了。辩证法的要点,特别是量变、质变和联系,已经为越来越多的知识分子所接受。在这样的思想气候里,怀特海(Alfred North Whitehead)提出了过程哲学。这一学派影响到神学,出现了过程神学。“过程”意味着变动、发展、新陈代谢、肯定事物和现实的根本状态是这些而不是静止。

过程神学论上帝:

过程神学肯定并且突出上帝是爱。也许有人会说,这是一切神学学派的老生常谈,怎么成了一个学派的第一特点?这里要求我们细加区别。

怀特海在《过程与现实》一书里指出,传统的基督教神学实质上总是容易倾向于三种错误的上帝观:把上帝视为“统治一切的凯撒,或是严峻冷酷的道德家,或是自己不为任何事物所动的推动者。”他认为,被传统神学忽视的是那“加利利的远象”,就是看见上

帝为爱。一般教会所推崇的上帝，“具有属于凯撒的性格”，“赋予他以帝国统治者的形象”，或者把他看成为“无情的道德力量的人格化”，或者把他看为“终极哲学原则”，某种“存在自身”(being itself)，他以外的一切的一切的终极始因，但绝对不受他以外任何事物的影响。

过程神学思想谈上帝的属性，首先肯定的是他的爱，而他的无所不能，无所不在，无所不知，自在永在，超过一切，绝对公义等等，都被置于从属地位。

“上帝是宇宙的爱者，他不但是始因，而且也是受到事物影响的承受者”(诺曼·比廷格 Norman Pittenger)。舒伯特·奥格邓(Schubert Ogden)说，上帝是“第一个原因和最后一个结果”。上帝同世界密切相连。他不但是创造者，他也接受世界对他作出的反应，并对之作出他的反应。这不否定上帝的超越性，因为上帝的超越性并不意味远离世界或不受世界的影响。超越性意味无穷，意味永久的忠诚，意味能承受恶的刺激，能吸收它，把坏的事物转化而去为善良服务，去增长善良。怀特海说，“上帝很在乎事物是怎样的，事物是怎样对上帝是能造成这样或那样的后果的。”超越性首先意味这宇宙挚爱的无穷无尽，而内在性则是指这个挚爱和整个被创造世界同在。上帝的超越性决不意味他的无动于衷。

如果宗教的上帝不也是宇宙的上帝或世界的上帝，如果这位上帝不能给人一个关于世界的远象，那么，他只管宗教，他就不是至高者，他可能只是某些人崇拜的对象而已。

比廷格下面这段话很说明问题：

“当我阅读基督教史中一些最伟大的神学家——奥利金、奥古斯丁、阿奎那、路德、加尔文等等——的著作的时候，我在他们每个人身上遇到两个不同的人物。一方面这个人对上帝的深信，强调

上帝的恩爱眷顾,反映自己是一个正在受造和成长中的爱者,愿意向上帝这位最大的爱者作出好的反应。这是明显的,感人的。可是同时还有另一个神学观念存在在他们身上,强调上帝的绝对性,人世间诸多事物同上帝的不相关性,以及上帝的不变,他不能感到痛苦,不能有份于人类的遭遇。”本来,系统神学应当使我们自觉地寻找统一的、和谐的神学思想,可是事实上一个人的神学认识内部就会不自觉地存在不少矛盾。

什么是“上帝的荣耀”?比廷格是这样说的:“一切都是为了上帝更大的荣耀。这个荣耀不是全能的统治者施行权力或自高的帝王辉煌登座的那种。这个荣耀无非是发诸行动的爱,它无私地把自己给予人们,它在恩爱中从人类接受一切有点价值的成就,将这些成就用在世界上,因为在这个世界上,上帝正在工作着,为的是在更大的场合出现更多的善良。”

早期教会有个“致戴沃乃德斯书信”,其中有这样一段话,为持过程神学见解的人所欣赏:“上帝是不是像人们所设想的那样,差遣基督来到世界,用强权、畏惧和恐怖来统治人们?远远不是这样。他从和善出发,差遣他来;……他愿望藉着说服而不藉着强迫来拯救人。使用强力不是上帝进行工作的办法。他差遣他来爱,不是来审判。上帝显出他实在是人类的朋友。他不恨我们,不赶走我们,对我们毫无恶意。”

哈特桑(Charles Hartshorne)写过一本书名是《神的相对性》的书,这是针对传统神学单单强调神的绝对性而写的。“在上帝的生命的每一时刻,世界上都在发生着新的、事先不知道的事情。上帝的具体知识得随从人们就世事作出的决定。上帝的具体知识和世界保持内在的联系,因而他的‘知’是相对的”(考勃 Cobb 和格里芬 Griffin:《过程神学初解》)。

人世所发生的事并不是每件都由上帝决定的。由于他尊重人的自由,他决定不了的事可多呢。基督所彰显的上帝不能不是这样的上帝。上帝是爱。只有团契才能满足爱。只有有自由才谈得上团契。只有既能作出好的抉择,又能作出坏的选择,才是真的自由。这样,上帝的全能和全知就接受了限制。

一位画家画出一张好画之前,天上也好,神的头脑里也好,都没有这样一张先在的画挂着。尽管颜色、形式、画家的潜在能力,这些都是上帝的创造和赐予,但是这张画是画家的自由创造。不管他信与不信,神照样尊重已经属于他的自由。

为了便于理解,怀特海设想上帝有他的原始性格和他的后有性格。前者存在在创造之前和创造之外,是不受限制和没有变化的。它永恒,绝对,独立于世界。后者是他向世界认同的部分。它是面向世界的,相对的,被影响的,一直有变化的。在后者的范围内,上帝受到我们所作反应的影响,也参与被造秩序中的快乐和悲痛。

根据以上介绍,我想大家能够同意,怀特海等对上帝是爱的肯定,是有其特殊内容的。

论基督:也许是在基督论方面,中国信徒会认为过程主义颇嫌单薄。可是我们将会发现,一个宇宙性的爱是可以容纳而不是排斥一个宇宙性的基督的,它也可以容纳关于基督救赎的观点。

过程主义承认,基督启示了上帝,但强调,这一启示不是对其他真理的否定,而是给予它们以深度。

比廷格说:“上帝的作为不限于 (confined to) 耶稣基督,而是被他所说明 (defined by)。”他反对基督教中某一个人把道成肉身进入世界说成神的一次“救援的远征”,好像除了基督道成肉身以外,上帝就不在世界似的,因而他的进入简直是他突然到

了一个此前上帝还没有到临过的地方。他还说：“就我来说，基督的终极性就在于把上帝作为受苦的、拯救的、感动极深的挚爱作出了决定性的显示。什么也不能比这个更具终极性了。但是，存在着若干其他可能的途径、预示、轮廓、准备。”他说：“基督论不带排斥一切的特质。如果基督中心主义被理解为只能在耶稣身上才看得见神的实在，因而把他全然看为上帝和世界关系史上的一个反常的变态，那么，在怀特海的上帝观中是没有这种基督中心主义的。在那更广泛的关系中，耶稣只能是一个具有集中性、代表性的典型，一个最说明事实的点，而不是一个绝对独特、任何其他事物都不能同他相提并论的点，以致他的来到世间，竟然事先在人间毫无准备，比晴天霹雳更没有先兆和期待，同先于他的和后于他的一切都毫无连续。”

对人们在道成肉身之前和之外的看见、探索、认识和对神的活动和同在的反应，道成肉身不是否定其一切，而是，用汤朴(William Temple)的话来说：提供一个“纠正和提高”。正是基督才能对启示于其他方面的关于上帝的一切加以纠正、成全，使之达到顶峰。

关于人的使命：

怀特海认为人的使命或“真正的命运”是在“创造过程中成为参与者”，“成为宇宙中创造者的同工”。

人们都是“正在受造和成长中的爱者”，“因此是有限的，有缺点的，但正在成长的路途上，日益学会有份于宇宙的挚爱，后者正是上帝他自己，——按卫斯理的一首赞美诗的说法——他的‘性格和名字’就是爱”(比廷格)。

海德格尔(Heidegger)认为，每个人的孤独是他的终极的实在，默念死的孤独是他得到自我实现的不二途径。怀特海不同意

这个观点,认为我们首先存在于人的共同体之中,在其中得到我们的相对独立性。参与和个性不是相克而是相辅相成的。我们的个性越得到发展,我们越能丰富共同体的内容。

作为与神同工的创造者,人双手的作为的意义不是虚无的。比廷格这一段话值得推敲:“为人类解放而投入的一切努力,以及这些努力的一切成就,在上帝里面必然不会失落,而是会安全的,即会得到保存的。上帝不但是最初最根本的创造者,他也是一切后果的最后的接受者。上帝珍视世间人们所行的善,他能够也必然利用这个善,使善得到更多发挥。他正在进行努力,要从受造秩序中即便顽梗得很的原材料中引出和谐来,使多种多样的有意义的对比和区别,不会导致无意义的破坏性的冲突。对任何一个真正献身的基督门徒来说,为这一目的而努力,像依纳爵·罗耀拉(Ignatius Loyola)说的那样‘除了知道这是神的旨意之外’,不求任何其他好处,这就够了。”

他认为,恶主要是拒不前进,在一个社会性的宇宙中拒不合作。它是自我中心地满足于现状,也是故意作出那低于至善的抉择。怀特海说过:“保守主义者是在反对宇宙的实质。”

怀特海在《成长中的宗教》一书中指出,就原始宗教来说,“你寻求上帝的旨意是为了得到他的保佑,”在一个高级的宗教,“你寻求神的善良是为了能像他。”

这一切具有永恒价值。

比廷格说:“人的记忆是片面的。很多有价值的事都会忘记。上帝的记忆是永恒的、可靠的。受造世界中发生的一切都保存在他的知识之中。没有什么被忘记,没有什么被当作垃圾,被丢入空虚深渊之中。连罪恶也不是简单地丢去,而是得到改变,使之成为善的原料。”他引用本世纪初美国诗人礼查·荷韦(Richard Hovey)

的一段诗：

“上帝说，到一天你将会消失，
但你今晚所有的快乐和感动，
我将珍爱存在心头，
即便诸世界都不再存在。”

比廷格还说：“我们生命中好的、高尚的、有价值的东西，在我们死后将由上帝取去，放在他永恒的现在之中。他记得我们。”

怀特海说：“人由于参与创造过程，就有份于上帝的事业，这一有份就是他的不灭。在宇宙中作为与神同工的创造者，这是人的尊严和华美。”

以上是对过程神学的一个粗线条介绍。希望大家看到一个轮廓，看到一些特点。

四、结语

让我再说，光凭自己原来的观点，去评判别人，说他们多么离经叛道，那不是我们神学研究的首要目的。应当研究的是：他们企图解决什么问题？我有没有考虑过这些问题？我所持守的观点是怎样对待这些问题的？能否说我的对待能更好地照顾到诸多方面的因素？

世界神学学派很多，其中相当部分同我们格格不入，如果研究，不过是增长知识，不值得加以吸收。像解放神学、德日进的神学、过程神学，我认为有值得我们参考和吸收的东西。做今天中国的神学生和从事神学建设工作的人，必须懂得鉴别，有批评，有吸取，这样才能为自传服务。

有些神学承认事物在变动中，并且把这种变动看为同上帝的圣爱和创造相关联，这就使这一神学学派同世界上期待变革的人

有了共同语言。我们中国是个变化极快极大,尚待变革的事物也是极多的国家,人们寄希望于改革。处在这样一个环境中进行神学建设,在大方向上必然会同过程神学以及解放神学和德日进等人的神学比较合拍。我们可以从它们得到一定的启发。

从今天一直到上帝旨意中的人类共同体的最后完成是一个长的过程,其间有许多环节。关于中间环节,据我所知,德日进和过程神学家们没有说过什么。在他们的思想体系里,这些是空白点。他们对资本主义有一定反感,他们也预见变革的来临,可是怎样变和以什么来代替,他们没有提出什么见解。因此,他们一面由于强调变而不受那些力求保持现状的既得利益者的欢迎,另一面也未免使要求变革的人们失望。据我所知,德日进至死停留在那个阶段上,有些过程神学家则对这一点已经有所察觉。约翰·考勃的《过程神学和政治神学》一书可以说在这一点有所突破。

解放神学很强调实践。求解放就是当前的实践,其具体内容就是反对帝国主义,反对专制,实现独立自主的人民政权,有的则还包括反对资本主义,憧憬社会主义。有人以为做基督徒不应反对任何东西,那等于是说,基督徒要无是无非,没有爱憎。保罗·蒂利希(Paul Tillich)说过:“消除违反爱的事物,这正是爱的一项奇特的工作。”

就中国而论,要求变革是和上述三个神学派别共同的,但是就反帝反封建反官僚资本主义和结束剥削的解放任务来说,我们已经处于解放之后的阶段,即历史发展的下一阶段。在这一阶段已经可以,因此也应当,不再以阶级斗争为纲。

在历史的这一环节,我们是建设社会主义。作为一个社会制度,社会主义比资本主义更能体现爱。

资本主义保护生产资料的私人所有,保护剥削,使广大劳动人

民的命运操在资本家的手里,使中国等少数国家之外的广大第三世界国家人民的命运操在跨国公司和它们的政治代表手里。资本家为了同其他资本集团竞争以求维持自己,即便有好良心也不由自主地麻木了。

由于历史的重担和各方面的压力阻力,实现社会主义理想是个艰难的过程。但是它排除剥削,走向各尽所能,按劳分配,使人类达到前所未有的公平程度。把爱普及到大众,这就是社会主义的目的。社会主义是大规模的爱,有组织的爱,形成为社会制度的爱。

公平、公义、正义——这些不是爱的对立面,这些都仍旧是爱应有的内容。当我们不仅仅在一个小范围里实行爱,当我们把爱合理地分配给大众的时候,爱就取得了公平、公义、正义的形式。

今天,中国还没有很好地、充分地实现爱。这本来是个艰巨的事业,但是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为完成这一步从社会制度上提供了保证。

这个事业是值得基督徒为之努力的。爱不是一男一女互相欣赏,我看着你,你看着我;爱是他们面对同一方向,一起看着前方,一起迎着困难迈步向前。这样的爱足以使人们互相鼓舞,互相激励,互相扶持,共同成为神的创造工程中的同工。

与金陵同学谈人的终极性问题

(一九八五年于南京金陵协和神学院)

中国人也好,外国人也好,在教会里也好,社会上也好,人们时常要提出一个问题来:今天,在中国,为什么还有人要来归从基督?是什么东西在吸引着人来到教会?

这问题的引起,有时是由于考虑到,今天中国人民离开侵略、战争、饥荒、剥削、失业等等祸害比较远了,物质生活和文化生活提高了,社会世俗化程度也提高了,人们怎么还会想到上帝的事?有时是由于考虑到,今天做基督徒不再像过去那样可以享受某些好处和特权;有时是由于考虑到,中国信基督教的只占人口百分之一还不到,中国不少人至今把基督教看为不值一顾的迷信或洋教,在这些人心目中信教没有什么光彩;有时是由于考虑到,中国这一基督教不但弱小,而且又得不到海外的物质支援,能存在下去吗?那么,究竟是什么东西使一些人要唱“我今来就主”?

对这个问题,不同的人给予不同的回答。

有的人就事论事,说是由于父母、家庭、朋友和基督教书刊的影响。影响是这么来的,没有错,但是这个回答绕开了原来的问题,把“为什么”改变为“怎么样”了。

有的人说,是因为有宗教信仰自由政策;有信仰自由,信主的人就有了。有宗教信仰自由,这当然是重要的。但是,仅仅有自由来信,人家就会来信了吗?这个回答指出了一个重要条件,但没有触及根本原因。

有的人说,信教的人增加是由于中国发生了“信仰危机”,人们对社会主义不满,对政府失去了信任。这个回答有点不顾事实。广大信徒很拥护社会主义,他们积极投身社会主义建设事业,被推举而为先进生产者和先进工作者的也不少。一九四九年前,人们对当时的政府怨声载道,绝无信任可言,为什么基督教人数始终停留在几十万呢?

有的人完全归功于三自;中国基督教摆脱洋教形象,人们就愿意听基督教有以告人的福音。三自当然是必要的,但这个回答也是把一个重要条件说成为根本原因了。

有的人说,教会吸引人是因为教会里人和人的关系好,亲切,同情,团结,像弟兄姊妹。是的,教会应当这样,许多地方的教会也正是这样,但有些教会却并不总是这样,人与人的关系常常令人失望。光靠这个吸引不住多少人的。有的人失望了,也还不走,说要看神,不要看人。

有的人归功于奇迹,归功于医病赶鬼,但实际上有些人正像当年求耶稣治病,以及因吃饼得饱而跟随耶稣的人,到一定时候就又离开耶稣了(参约 6:66)。何况今天某些地方的医病赶鬼,靠祷告起死回生,偶然性甚重、欺骗性不小,怎能真正把人吸引到生命之主面前来呢? 保罗就不是把基督福音降低为医病的法门来对待的。他告诉我们,他肉体上的病患,基督始终没有同意他的祈求给他去掉,基督倒是告诉他:“我的恩典够你用的,因为我的能力在人的软弱上显得完全”(林后 12:9)。能认识这一点岂不是比奇迹更高更深的灵性收获吗?

以上这些解释,都不能令人满意。看来我们要寻找的首先是内因而不是外因,而且在内因之中必须首先找到最根本的内因。

《约翰福音》第 6 章第 68 节记载的彼得的回答,在我看来是最

满意的回答：“主啊，你有永生之道，我们还归从谁呢？”

人是按神的形象造的。只有人会提出许多终极性的问题。基督教的信息所处理的正是这些问题，因此当然会吸引人来听，有些人听了就决意归向基督。

永生之道的问题就是终极性的问题。

人不是矿物，不是植物，不是禽兽，不是一般动物。人会思考，但是人也不仅仅是一台思考的机器。人比这一切都要高得多。人有上帝的形象，人是万物之灵。

《诗篇》第8篇第3、4节说：“我观看你指头所造的天，并你所陈设的月亮星宿，便说，人算什么，你竟顾念他？世人算什么，你竟眷顾他？”为什么只有人才会产生这个问题呢？底下第5节给了回答：“你叫他比天使微小一点，并赐他荣耀尊贵为冠冕。”人是这样一种动物，能够提出终极性问题来。

譬如说，为什么要活？是不是因为自杀很痛苦，就活着吧？是不是为生而生，为活而活，或仅仅是为了衣食情欲而活？该怎样活？不死就算是活吗？继续在呼吸，心脏继续在跳动，就算是活吗？靠剥削发财，踩在别人身上往上爬，这种活的方式怎样？有的人只求自己内心平安；一个人心里平安，这就算活得有意义了吗？

世界上有个东西叫善良。谁也知道应当善良。康德是这样说的：有两件东西使人惊奇不已，一是充满着星辰的高天，二是人们内心的道德律。康德所说的这个道德律在人们内心不断催促，不断提醒，告诉我们要做善良的人，要不做好事。这一自我完全的催促，起的作用大得不得了。正是这个道德律在起作用，才使世界成为人们大体上能够生活得下去的所在。如果人们都没有这个良知，如果人人都作恶多端而不会有自我谴责，这个世界会乱成个什么样子呢？那么，善良是哪里来的？善良的根源是什么？许多人

之所以相信上帝,相信神,相信天主,相信创造者,就是因为他们在这里找到了善良的根源。否则就无法说明善良是哪里来的。

不但是善良,还有美,还有真理,还有许多高尚的思想感情,都有一个来自何处的问题。

《第九交响曲》是好听的。如果仅仅说,《第九交响曲》是贝多芬给我们的,那不免是一个过于简单的回答。较能令人满意的回答是:宇宙里存在着美,是贝多芬这一位在这方面处于人类尖端的音乐大家,被这个美所吸引,并把这个美体现在《第九交响曲》里,正像太初就存在着道,是基督把这个道体现出来。

小提琴演奏是使我们神往的。如果有人说,这音乐不过是拉紧了的马尾和拉紧了的钢丝相磨擦,加上处在某种意境中的提琴手的手指活动的产物,我想你们是不能满意的。但是,如果有人说,一方面是某种宇宙性的永恒的美,另一方面又是敏感到一定高度的人们的心灵,面前者通过音乐家作用于后者,扣拨了后者心中的弦,使后者进入了音响美的享受和欣赏,我想大家会同意,这是比较完整一点的认识。

还有许多终极性的问题,例如:这世界为什么不那么好?为什么没有更多的善良和更多的好人好事?那些坏人为什么得势?

死是什么?一切是不是都以死为结束?死毁灭一切,善与恶,美与丑,真与假,坚持原则与出卖灵魂,这些最后的命运都一样,全部一笔勾销,化为空无,是这样吗?我们读了四福音,觉得这不可能是基督的看法。是这个死的问题,使许多人摸索,使其中有些人在摸索中来到了基督跟前。

更切身一点的问题是:我知道该做的,我偏会不去做,我知道不该做的,我偏会去做,这是怎么一回事?越有良心的人,有自我要求的人,包括一些一心为人民的革命者,越对这个有高度的敏

感。许多人之所以前来就主,之所以在试探和压力底下不肯离开标志基督救赎的十字架,就是因为他们体验到,信赖基督才能摆脱这一恶性循环。

还有许多其他可谓高级的人生问题,世界上除了人就不会问的问题。

社会主义是好的,它正在改变中国一穷二白的面貌,我们理所当然地拥护。但是社会主义要解决的是提高社会生产力,进行物质建设、文化建设、道德建设的问题。回答那些终极性问题不在社会主义任务之内。

为了关心国家大事,报纸是应当读的,但是报纸所报道和刊载的是政治、经济、社会、文化、教育、艺术等等领域的材料。这些报纸认为:我们所谓终极性的问题是不必大事渲染的,至少是为了保证人民的团结,不应当让人利用报纸来加以探讨的。

但是基督教却探讨这些问题,回答这些问题。我不是指那种以医病赶鬼为招牌的基督教,也不是指只讲究生活细节,把骆驼吞下去、蠓虫倒被滤出来的那种基督教。我指的基督教是放在瓦器里的宝贝,不是那瓦器。

彼得说出的那句话——主啊,你有永生之道,我们还归从谁呢?——代表人类寻求真理的进化史上很高级的阶段。人能够达到这水平,人就是崇高的。

有的人认为,人除了是一架能犯罪的机器之外,什么也不是。尼采心目中的人是“地球表皮上的一种疾病”。我们有时在基督教里也听到一些把人奚落得不成样子的话。加尔文说过人一些好话,但是他也说过,人不过是“一条五尺高的蛆虫”。

如果人是这样,人是决提不出什么终极性问题来的。那么,基督的福音不过是回答了谁也没有提出过的问题,不过是对牛弹琴,

不,是对虫弹琴,对皮肤上的病菌弹琴。

道成肉身是对人的肯定,肯定人提出的问题是值得回答的,肯定人是值得教育、救赎的。能提出这些高级问题来的人,上帝是不能以毁灭了事的。

古代教会有查斯丁等神学家,提出过一个很有影响的观点:在任何一个人身上,生来就具有逻各斯——道——的种子。

可以设想,如果基督是一个完整的圆圈,我们人都是一些长长短短的弧。在绝对和相对之间,不是什么共同点或什么连续性都没有。

今天照常有人要来寻找基督,照常有人不肯离开基督,最根本的原因不是什么别的,而是由于人们感到,基督针对我们在自己心灵深处含含糊糊地觉察到的一些问题,提供了亮光,提供了信息,他对我们有所倾吐,有所责备,有所安慰,有所激励。这是一个深渊和深渊互相响应的经验。

最根本的是福音本身内含的真理性在吸引着人。正因为这真理性,见证的工作就重要了,三自就重要了,宗教信仰自由就重要了,洁净教会、使教会不成为人们归向基督的绊脚石、而是引人归主的明灯,就重要了,神学教育要办好、我们要做怎样的神学教师 and 神学生的问题,也就重要了。这一系列的东西就是这样来的。

让我们求主整理我们的思想,认识什么属于瓦器,什么属于宝贝,使我们的爱心在知识和各样见识上多而又多,能分别是非,叫荣耀称赞都归于上帝。

现在让我们用十一世纪末、十二世纪初一位神学家圣安瑟伦(Anselm)的祷告。有的基督徒不习惯于用古圣徒传下来的祷文来祷告,这是一个损失。在人与人之间,我们总是努力用最确切、最美好的语言来表达自己;我们同上帝讲话,难道不必寻找最真

切,又最能造就自己的语言吗?让我们现在试试进入圣安瑟伦的灵性意境,让他帮助我们祷告:

上帝,你是生命、智慧、真理、丰富、祝福、永恒、唯一的至善。主,你是我的希望,我心的喜悦。我怀着感恩向你承认,我是照你的形象被造的,所以我爱你,我所有的思想转向你,以便爱你更深,以你为乐,接受你。因为在地上难以完全享受这蒙福的光景,就让我每天成长,直到在来世达到完满。在这里,我渐渐地认识你;到那里,我会完全认识你。在这里,我对你的爱渐渐增长;到那里,这爱将要成熟。在这里,我在盼望中有喜乐;到那里,这盼望将会完全实现。阿门。

《中国神学年鉴》前言

(一九八五年十一月于南京)

我很高兴应邀为东南亚神学教育基金会出版的《中国神学年鉴》写前言。

中国教会今天普遍使用中文,这使没有掌握中文的海外朋友难以了解中国基督徒的思想,这本英文文集就应运而生。我希望它今后每年出版一期。

海外有人渲染中国教会和她所推行的自治、自养、自传的三自运动是偏离原则的,说这个教会所传的信息,不是完整的基督教信息。只要翻翻这些文章,就可以知道这一判断是多么缺少事实根据。这一判断其实暴露了他们对中国基督徒的一种傲慢和蔑视的态度。事实是,在我们已经没有宗派的教会里,我们的热爱《圣经》、尊重《圣经》、研究《圣经》的广大信徒,在神学上决不是那么盲目无知,会让讲道者任意抛出偏离《圣经》的错误教导。

另一方面,海外有些朋友由于没有能在解放已三十多年的中国找到“解放神学”而表示意外和失望。在这些朋友心目中,中国基督教似乎同社会脱节,仍旧处于解放前的阶段,他们甚至说中国基督教仍然是殖民地式的。他们渲染中国基督徒在神学上保守而在政治上又拥护社会主义,呆在神学和政治两个互相隔开而不统一的世界里。

固然,这些朋友参加的礼拜和听到的讲道,未必能够代表全国基督教,但是我想他们这一印象不是完全错了,这本文集里的文章

很可能也会给予读者这一印象。我并不企图为这一印象作什么辩护,但是我觉得在这方面有一个中国的角度,还是值得一提的。

灵性和社会相分离,把属灵和属世隔开,使两者分属两个互不干预的范围,这在教会里是有长久历史的,并有相当有力的神学在支持着。这在十九世纪和二十世纪传教运动传统中有重要的地位,在今日中国仍旧保持着可观的影响。成了我国基督教三自运动的一个重要口号的“爱国爱教”,至少也是许可这一分隔的。在我国解放以来的年月里,这种分隔没有给我们带来多少祸害。根据三十年来的观察,这种分隔并不必然导致基督徒的非政治化,这些基督徒在参与社会生活和政治生活方面,并不少于其他公民,何况他们在神学思想上决不是没有变化的,不过,这些变化不如有些朋友所期望的那样剧烈罢了。

三自爱国运动委员会和较近成立的基督教协会旨在把基督教信仰的男男女女都团结起来。海外一些国家的基督徒不是属“普世派”就是属“福音派”的情况,我们要避免。信、望、爱的经验合在一起告诉我们:在中国,我们可以使这种情况不再出现。既然如此,我们要保障我们的一体,不让任何事物破坏我们的一体。我们很不愿意看见团契的分裂。为了这一体,在信仰上、在崇拜上、在神学上,我们的方针是互相平等和互相尊重,而不是抹煞特点,触犯人们的宗教感情。我们并不认为,我们有责任去转变那些倾向于把神学和政治分隔开来的基督徒,使他们接受任何一种社会政治意识较为明显的神学观点,或者使后者转变为前者。我们当务之急是让基督徒尽量在可能合作的各方面一起合作,例如开启教堂,出版《圣经》,进行基督教文字工作,兴办神学教育院校,使宗教信仰自由政策得以更好的落实,加强对教堂和家庭的信徒的培养工作等等。这些正是使我们团结一致,进而互相发现,互相学习的

工作。我们这团结值得为之付出代价。

这一团结没有使我们停滞不前。三自是中国解放独立以来的新事物。它怎么是解放前的遗物,或者是殖民地的东西呢?它是许许多多基督徒共同一起前进的运动,尽管其前进速度不如有些人期望的那么快。

现在神学处境化受到了那么大的重视,以致我要说的可能不太时兴:神学不但应同其社会文化环境保持节奏,它也应反映教会怀抱中的广大信徒的思想感情。如果一个处境化的神学只能被远处的一些具有社会意识的知识分子所欣赏,而自己的教会本身的信徒却认之为陌生的异物,那总是一个不正常的现象。我们在精神、物质上都受我们自己祖国和祖国基督徒的喂养,我们依附他们,离不开他们。我们的神学家应该能真正成为教会身边的儿女,这是我们最大的光荣。我们的写作,首先是为了供应国内信徒,那就是,为了中国基督徒的营养和建立。我们到他们所在的地方,通过他们能接受的方式,去同他们相会,而不把他们接受不了的东西强加给他们。神学思想是在变迁中,但这些变迁不是去适应其他国家少数专业人员的胃口,而是反映并推进(即使较慢)广大中国信徒灵性和知识上的发展。神学家和一般信徒需要保持一个互相给取、互相学习、互相培养的对话关系。同文化的对话、同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的对话、同哲学的对话和同神学家国际群体的对话要有价值,必须最后有助于建立基层广大信徒。神学家能抛弃他们的个人英雄主义,能谦虚地而不自觉高人一等地同他们周围普通基督徒保持密切联系,能诚恳地聆听他们的话语,向他们学习,总结他们所看见的亮光,能帮助他们对上帝的启示的接受达到新的高度,这样的神学家的工作我们认为才是真正有价值的。中国基督徒支持社会主义给中国社会带来的一切积极变化。基督

徒的宗教和灵性生命不能不被他们这一社会政治立场所影响,不论他们原来的神学倾向如何。当然,这每每不过是影响,有时比较微弱,不是什么剧烈的冲击波。神学家对这些影响应当有敏感,在工作中诚实而恭敬地把神学上的演变反映出来。

过去三十年间,我国基督教的“普世派”更加福音化,“福音派”更加普世化了。这两派已经越来越融化在一起,从而给中国基督教的一体带来了前所未有的宽广幅度。这是中国神学更新的真正重要的前沿之所在,值得更多的注意和感谢。

如果以上是一种辩护,那不是为神学和政治的分隔作辩护。我们要为之辩护的是各种神学倾向的基督徒有得到平等对待的权利,我们有吸收各种类型的基督徒在同一团契之中的责任。神学家必须接近自己的信徒群众,成为其中的一分子,学习他们,反映他们和影响他们。

我最诚恳地向本文集的编辑,香港道风山基督教丛林和香港《大公报》的魏恺贞先生,以及该丛林研究员兼爱德基金会海外联络员魏克利博士表示我自己和读者的感谢。他们广泛阅读中文资料,慎重地选择了文章,细致精确地作了翻译。我也要感谢东南亚神学教育基金会马温·霍夫博士努力操劳,使这本书顺利印刷出版。

我相信,这本文集的出版将有助于向国际基督教介绍今日中国基督徒的一些思想情况。我想我可以代表文章的作者和中国其他基督徒感谢读者的兴趣、关怀和祈祷。我们欢迎你们就今日中国基督教作出思索和反应。

从所罗门的智慧想起

(一九八六年在南京金陵协和神学院的神学演讲)

近来我几次在这里讲话,都从妇女讲到上帝。人类几千年来生活在男权中心的社会里,习惯于把上帝看为一位男性,习惯于从父亲来领会上帝的爱心,不习惯于从母性和母爱来领会上帝的爱心,结果我们对神爱的认识不够丰富,不够完整。让我再次强调妇女信徒在上帝观上所能作出的特殊贡献。希望妇女信徒有在这方面作出贡献的使命感,敢于独立研究《圣经》,独立进行神学思考,让教会得到更完整更丰富的上帝观。

今天且让我们来想想在《列王记》第3章第16至28节的那个故事。在一个房间里有两个才生了孩子的妇女,一个活的孩子,一个被母亲压死了的孩子。谁是那活的孩子母亲,只有她们两人知道。所罗门准备用刀把活孩子切成两半,一个母亲拿一半。对这个做法,两个妈妈的反应完全不同。那压死了自己的孩子的妈妈看来心里充满了嫉妒,听说要杀掉那活的孩子,感到一阵满足。她想,大家都没有孩子也好。她表示赞成所罗门的判决。那活着的孩子的亲生妈妈就不同,她爱自己的孩子,她愿意孩子活下去。这孩子的生命是那么宝贵,只要活下去就有希望,就有前途。孩子最后能不能归回自己,以后再说,可是万万不能让他死。想到把孩子劈成两半,她“心里急痛”。她立刻说,怎样也要让他活,就让那女人拿去吧。

我们看到,一个妈妈心里充满着嫉妒。嫉妒使得她残暴,使得

她仇恨生命。为了使另一个人得不到做妈妈的喜悦,不惜让一个无辜的婴孩被活活劈开,她可能还感到痛快呢。

另一个母亲大为不同。区别在内心深处:这一个母亲心里充满着爱,对孩子的爱,对生命的爱。她能够忍受委屈,因为她的爱使得她有希望,使得她相信,是迟早会胜过非,真迟早会胜过假,生迟早会胜过死。

这个故事我好久没有想到了。近来大家讨论香港回归祖国问题。香港本来是中国领土,鸦片战争之后被英国侵占去了。现在中英两国政府草签联合声明,香港归还中国,双方保证香港的繁荣安定,香港和全国有爱国心的人都非常高兴。可是世界上和教会里也有人不甘心香港回归祖国母亲怀抱,希望对中国采取所谓“强硬手段”,即使香港闹得大乱,只要谁也得不到好处,也在所不惜,这岂不太像那满心嫉妒的坏妈妈了吗?

从香港转到南京,转到我们这所学校,这个故事也有合用之处。它问我们,我们的共同生活能不能许可互相嫉妒、互相仇恨、互相拆毁呢?当然不能许可。用毁坏别人来达到自己的目的,是最不好的。我们所要的是互相建立、互相爱护,大家相互间真正成为哥哥姊姊弟弟妹妹的手足关系。最近有几位同学来看我们一些教师,代表很多同学表示对校风的关切。他们怕如果我们学校对一些很不好的事不严肃处理,许多同学对这所学校要失去信任了。这对我们是提出了重要的正确的要求,也是很大的支持。我们一定不要叫同学们失望。

让我们回到《圣经》上这位好母亲身上。在她身上,我们若明若暗地看到上帝的爱的性格。这个爱包括对生命的爱惜和保护。他为了让人不丧失生命而得到生命,宁愿牺牲自己,道成肉身来教诲,来献出自己的生命。对这一位上帝,我们的认识仅是

点点滴滴的。希望我们大家能够通过更多的灵修，通过更多的读经，通过更多的神学思考，通过更多的交通，特别重要的是通过更多的实践，能够得到更多的启示，这样可以对上帝的爱的辽阔高深有更丰富的领会。

基督所显示的上帝是爱，他不是要毁灭，他是创造之主，不是毁灭之主。我们只要读一下《创世记》第18章上帝和亚伯拉罕的那段对话，以及《约拿书》结尾上帝和约拿的那段对话，我们就知道，把上帝看为一切的毁灭者是同上帝的性格多么不符了。

女性、母性、神性

(一九八六年在南京金陵协和神学院的神学演讲)

当基督教导我们要向“我们在天上的父”祷告的时候，他当然不是指神就像是人间任何一位父亲。基督心目中的父亲乃是以慈绳爱索牵引着孩子的父亲，孩子饿了，他就给好东西吃。浪子漂泊在外，他仍殷殷盼归。

人世间的许多父亲并不像基督心目中的父亲，他们有着多重的形象。很多人在他们的生活中从来没有体验过父爱。依照从前中国人的传统看法，为人父者必当严厉。人们在正式场合礼节性地称自己的父亲为“家严”。有太多的父亲不但严厉，而且脾气不好。当他们在工作中受了亏待，回家便找自己的孩子出气。在一个家庭里，打孩子的常常是父亲。所以在很多人的经历中，父亲是不讲理的。很有可能，他对妻子也同样地态度粗暴。在乡间，还有人责备妻子生下了女婴，甚至有溺婴的事情发生。多少世纪以来，我们的社会是宗法主义的，所以父性也被扭曲了。人间的父亲形象每每不是那么美好，不堪表显神的性格。

随着妇女的觉醒，在教会里面有一种新的见解初露端倪，即：我们对神的认识不应为我们对男性的认识所限制。对神的爱的理解当从女性和母爱的角度加以拓宽和深化。我们已经渐渐地认识到：当耶稣称神为父的时候，他并不是指神是有性别的，不是指神为男性而非女性；而是说神是爱，他绝非大权在握冷酷无情；同时也意指世界为一大家庭，而神是这家庭里的慈爱的父

亲。人世间一切美妙无私的爱，包括母爱在内，都能帮助我们更好地理解神。道成肉身的信息就在于神自己已经成为世人的一分子。至于耶稣适为男性，这就如同他的身高和眼睛的颜色一样地偶然。我想，从神学上来看，以马内利并没有必要一定得发生在一个男性的形体中。

今天，越来越多的基督徒和《圣经》学者们发现，撇开《圣经》作者所生存年代里的父权制度所产生的习俗不谈，《圣经》中尚有多处章节是从母性的角度来讲述神之爱的。女性基督徒对这些章节特别敏感，因为作为女性，她们在男性主导的社会和教会里是受到歧视甚至压迫的。我们知道，社会地位低下的人对某些真理常易有直人的先见之明。所以在认神为父的时候，她们不会那么容易把神与男权统治等视。我们的教会长期以来为男性中心论所苦，由此导致了我们对神的形象的偏见，这就需要如今已觉醒了的女性基督徒来帮助我们克服。

比方说，女性基督徒特别会为《以赛亚书》第49章第15节中神的形象所打动。神在这里被摹比为乳哺自己孩子的母亲。这是上帝的自述：“妇人焉能忘记她吃奶的婴孩，不怜恤她所生的儿子？即或有忘记的，我却不忘记你。”

在《以赛亚书》第46章第3至4节中神说：“雅各家、以色列家一切余剩的，要听我言：‘你们自从生下，就蒙我保抱；自从出胎，便蒙我怀搆。直到你们年老，我仍这样；直到你们发白，我仍怀搆。我已造作，也必保抱，我必怀抱，也必拯救。’”

《诗篇》第131篇第2节刻画了诗人在神怀中的恬然之情：“我的心平稳安静，好像断过奶的孩子在他母亲的怀中；我的心在我里面真像断过奶的孩子。”

这几节经文在提到神的关爱的时候都毫不犹豫地用母亲的形

象来比拟。

耶稣自己则用母鸡看护小鸡的比喻来说明他对世人的爱和关怀。面对着耶路撒冷，他如是哀叹道：“我多次愿意聚集你的儿女，好像母鸡把小鸡聚集在翅膀底下，只是你们不愿意。”

在《路加福音》第15章里，就在慈父与两个儿子的故事之前，耶稣用一个妇人在一块银钱失而复得后的大喜过望来昭示天上的神接纳一个悔改的罪人时的心情。

在《创世记》第1章里我们读到了神按自己的形象造人——“照着他的形象造男造女。”这样看来，神不是只有男性形象，也有女性形象。女性的良善、温柔、恩慈、柔和、关爱、忍耐、默默地爱人、默默地奉献自己——这些都充充满满地得见于神的性情中。

希伯来文中有一个字，意指神之爱，这个字的字根有“母腹”之意。这仿佛告诉我们，这种爱不但涵容、保护和培育胚胎，并且有而弗居，待时机成熟便放手任其到外部世界独立地成长。

公元二世纪的后半叶，亚历山大的克雷芒讲了些颇富启迪的话：“神是爱，神只能在爱中被感知，父的存有难以言表，母亲则施怜爱于我们。”同是这位克雷芒又说：“对孩子而言，道是一切。道既是父，也为母，是教师，也是护士……用以喂养孩子的是父亲的奶，唯有道才以爱之奶哺育我众幼童。由这乳房吮吸者可得至福。故而寻求乃与吮吸无异。父以他乳所出的奶喂养寻求他道的人。”因为教会浸润在父权统治的气氛中，这类讲法便一直很少见。

除了女权主义本身之外，神学界大气候的改变也是目前从女性角度来认识神这股思潮出现的原因。认为神是永不变更、不被推动、无动于衷的陈年老调是再也站不住脚了。阿尔弗雷德·诺斯·怀特海在他的《过程与现实》一书中指出：基督教的神学传统长期以来错把神当作“统治一切的凯撒，或是严峻冷酷的道德家，或

是自己不为任何事物所动的推动者”。他要我们重见那显神为爱的“加利利的远象”。上帝的最高属性不是他的无所不能，而是他的爱。他是宇宙间的爱者，与我们一同受苦，因而理解我们。在爱的至高统治下，一切真善美必不致失落。就是在这种神学思想抬头的大环境下，母爱的光辉启发我们去寻求对神的属性的更完备的认识。

你们也许注意到，我今天始终说“神”，没有说“上帝”。我们的神是一位有许多称呼的神，每一个称呼都反映神一个方面的属性，但作为人的语言又有一定的欠缺。“上帝”是一个好的称呼，可这称呼包含强烈的男性意味，对有些人，说不定还带有帝王权贵以自己的意志强加于人这一非爱形象，所以今天暂时不用。

也许你们要问，我今天究竟想说什么？我想说的是：神是爱，神的最高属性不是他的无所不能，他的无所不在，他的无所不知，他的自在永在，他的尊贵威严，而是他的爱。神就是爱。这是比人间的父爱和母爱更长、更阔、更高、更深的爱。公义和爱不是神的两个对立的属性，好像有时讲神的爱就不讲神的公义，有时讲神的公义就不讲神的爱。公义也是爱。把爱在人间付诸实施，把爱普及几万几亿人，爱就变成公义，或叫公平，或叫正义。家里有几个孩子的父母都容易领会这一点。对神的爱何等长阔高深，我们知道得不够，需要凭人类——不但是男人，还包括妇女——最美好的爱的表现去探测，去捉摸，去进入。我们要用对神的这一宏观的认识来建立我们的世界观，去看和理解人们遇到的一切经验。希望同学们在暑假能够有更多的工夫去联系实际进行独立的、《圣经》的、神学的思考，使自己的神学世界观更好地成长，达到比较完整统一的地步。

现在我建议大家一起用赞美诗“仁爱，不忍弃我的爱”（《赞美

诗(新编)》第 253 首)来献上我们的祷告。有人认为,只有脱口而出的才是好的祷告,用别人写好的祷告文是不大好的祷告。这样想就剥夺了自己灵性长进的一条重要途径,剥夺了自己投身地上教会的浩荡的队伍,享受使用经过历代圣徒千锤百炼的最美好的语言向神倾吐的权利,损失很大。让我们试试进入这篇祷告的作者的内心里,把他的语言变成我们的语言,来向神诉说。

人心向往和好

(一九八六年在南京金陵协和神学院毕业典礼上的讲话)

今天,我们有一批同学经过几年的学习,要离开母校,到教会工作岗位上去。我们对各位毕业同学这几年的学习,有比较高的评价,认为可以到教会去工作了;教会也迫不及待地要你们去。学习和工作能够形成节奏,学习不忘工作,工作也不忘学习,这是最好的。

被欢送的毕业同学对自己前面将走怎样的一段路程,当然心里不大有数,因此在期待之中难免有点茫然。在这个时候,我们更加应当重新想到我们献身福音事业的初衷。不论我们在工作岗位上将做些什么事,我们要站在一个比较高的地方来理解我们这福音的事业。

基督福音之所以是福音,不在于它承认有一位上帝,不在于它肯定一个彼岸世界,不在于它指出人是有罪的,是无能的。这些还不是基督教,还不是福音。福音之所以是福音,是在于它宣告:这位神是爱,这位神要人同他和好,也要人与人和好,为此,这位神道成肉身,在十字架上,开启了和好的门。这位复活升天的基督是万有之主,他用他权能的命令托住万有,一切的丰盛都在他里面居住。他是和好的源头,他正在把和好的种子撒向世界。他要人与神和好,人与人也和好。福音之所以是福音,就在于这个。

在神人和好、人际和好这两者之中,神人和好当然是更根本的。人同神和好了,人就有了动力去做人际和好的工作。但是,正

像《马太福音》第 25 章第 31 至 46 节主耶稣关于审判日子的教导所指出的,即便不认识神的人所做的人际和好的工作,神也是悦纳称好的,因为这个工作客观上也还是做在基督身上的,比自以为认识基督而不去做人际和好的工作要强得多。当然,最正常的是首先藉着基督同神和好,然后藉着神的爱心投身于人与人的和好相爱的工作,在这工作中加深对基督的认识。

你们到工作岗位上去,从讲道、探望、领会、上课到接电话、拖地板、刻钢版、收拾办公室,可能什么都要做,说不定还要买菜、烧饭、洗碗。不管我们忙于什么,只要所做的有利于教会传播这和好的福音,使人与神和好起来,使人与人也和好起来,我们的工作就是有价值的,我们自己多吃一些苦,也算不得什么。

教会传播这和好的福音已经近两千年了。这个福音以十字架为标志。这是一个羞辱的标志。这个福音又要人们在十字架面前服罪,认罪,因此,两千年来,人们并不真正欢迎这个福音,甚至抵制这个福音,也有人设法冲淡这个福音,或者拿掉福音里不中听的成分。这是我们所不该做的。三自无非是要使一个西方的宗教变成中国的宗教,使中国人更容易接受基督,但决不是要传另外一位基督,一位没有能力使神人和好和使人际和好的基督。

在福音传开的两千年历史里,有的时候环境中有些情况对于福音的传出比较有利,有些则比较不利。以今天我们中国来说,在人类历史演变过程里,我们比许多其他国家更早地离开了阶级之间持续斗争的阶段,进入到一个新的阶段,资产阶级和地主阶级作为敌对阶级已经不再存在,因此,以阶级斗争为纲已经属于过去,今天主要要安定团结,从事建设。这不但是人类历史的重要转折,这对于人们接受基督的和好的福音也提供了一个崭新的、有利得多的环境。

人类自从离开无阶级的原始共产主义社会以后,所经历的奴隶社会、封建社会、资本主义社会都是阶级社会,充满着阶级斗争,包括民族斗争。不管我们喜欢不喜欢,斗争停不下来。有压迫就会有反抗。在那样的社会里,和好云云是不协调的。“顺我者昌,逆我者亡”,“人不为己,天诛地灭”,这才是那个世界里的声音。在那个世界里,强者在桌面上讲和好,在桌子下面却踢断你的腿。弱者讲和好,一不小心就滑到无是无非和阶级调和、取消斗争的泥坑里。像抗日战争那时,和好太难讲了。讲和好每每成为背叛民族利益的汉奸哲学。

在存在着剧烈的阶级对抗的日子里,不但敌我之间斗争不止,就在人民内部,也难免要发生必要的和不必要的斗争,会误伤不少的人。应当和好的地方不能和好,这是很不幸的。在我们今天能够基本摆脱阶级斗争和运动,为安定团结努力的日子里,我们怎样来看待当日的伤痕呢?

一九五六年赫鲁晓夫做了一个反对斯大林的报告,西方如获至宝,认为从此反共有据,掀起反对社会主义和进步运动的高潮。针对这一情况,东德已故诗人、剧作家、评论家勃托尔特·白菜赫德写了一首题目是《致后代》的诗,不是说斯大林没有错误,而是用老一代革命者向后代恳谈的口吻,要后者保持冷静和清醒,不要因为革命者的局限性而否定了革命的必要性。请让我念一念这首诗:

“到一天,你们得能从洪水中脱身了,
那时,你们会谈论我们这一代的缺点。
但我也要求你们想到,
那造成缺点的黑暗时代。
在阶级斗争中,我们奔走,
变换所在的国家比变换鞋子更加频繁。”

我们失望,周围只见不公正的事而不见抵抗。

看到群众所过的非人生活,
我们双眉久久紧锁,
不公正的事令我们怒火中烧。
可叹我们这些要为和善打好基础的人,
自己不能和善。

但你们,当最后,
人与人之间得能享受和善的时候,
对我们的判断,
可不要太过严厉。”

我要念这首诗,一是为了说明在阶级对抗社会,你死我活的斗争是必然的,不是什么人想要有才有的,也不是什么人想要没有就会没有的;二是为了说明,人都不是完人,革命者也没有能够在那复杂的阶级斗争为纲的日子里,特别是在前人没有做过的开拓历史前进道路的事业中,有那么大的智慧,事事作出科学的判断。

今天的中国还不是没有斗争,但已经宣布,不以阶级斗争为纲,要力求安定团结,开始向一个人与人相互友好的社会过渡。在一个安定团结的社会里,人们更容易理解基督赐予人们的和好,而基督和好的福音也更能对安定团结作出贡献。如果基督和好的福音在一个阶级对抗的世界里听起来格格不入,那么,在一个以安定团结为重的环境里,这福音是能够找到更多的共鸣的。

中国经历了千百年阶级斗争和民族斗争的历史。从太平天国农民革命算起,也有一百几十年的压迫和解放的斗争。“文化大革命”把斗争哲学发展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上下相斗,夫妻相斗,父

母子女相斗,老少相斗,人同人不能友好相处,互相伤害。今天,要把人与人的关系转到友好团结,多么需要爱的福音,需要爱的治疗。在人与人之间建立相亲相爱的关系,设身处地的关系,互相饶恕宽容的关系,要消除猜疑心理,耿耿于怀的心理,消除对人无限上纲的习惯。要做到这点,我们的爱与和好的福音岂不应该大有贡献吗?在今天要求安定团结的空气里,人们会觉得基督和好的福音不是空洞的,而是言之有物的。

这些年间信基督的人有增无减,其中原因固然很多,但据我看来,重要原因之一是人们对斗争厌倦了,人们心向和好。人们觉得,不少斗争都是浪费,他们更愿意寻找团契。主耶稣说:“凡劳苦担重担的人可以到我这里来,我就使你们得享安息”(太11:28)。《以赛亚书》说:“你们得救在乎归回安息,你们得力在乎平静安稳”(赛30:15)。这些话今天听来十分亲切。请特别注意,这两段《圣经》提到“归回”,提到“安息”,提到“来”,这正是人们爱听的。为什么爱听“归回”?因为人们尽管有房子住了,不流离失所了,可是内心有个“无家可归感”,他们要有所归属。“和好”正是他们在寻找的东西。

在“文革”时期,许多基督徒宁愿被人看不起,遭受打击,但不肯做假见证,不随便在攻击人的大字报上签名。在农村里,基督徒家庭和睦,婆媳关系好,父母子女关系好,兄弟姊妹关系好,生产也努力,不弄虚作假,这些给人印象很深。许多人要问,这基督教究竟是怎么一回事?它怎么能产生这样的一些人?有的人说,我要信基督教了,因为基督徒都和和气气的。在城市里,不少女信徒参加居民工作,哪里有纷争,她们就到哪里去散播和好。有些闹着要离婚的夫妇,由于她们一次、两次、五次、十次的劝说,就不离婚了。长辈小辈之间的关系也由于她们的劝说而协调了。家庭这个为四化建设而努力的人们的后方巩固了。这些不都是很有

价值的工作吗？

有的外国朋友以为我们的工作困难大得不得了，而最大的困难据说是铺天盖地的无神论宣传。其实，我们知道，不做工作则已，做工作总是有困难的。至于无神论宣传，有是有一点，可基督徒并不害怕，因为无论如何，无神论宣传总是把神的问题提了出来。叫人想到神的问题，这不是坏事。今天，更应当看到的是有利条件：从大的形势来说，中国的历史已经进入一个非阶级对抗的阶段，安定团结变成重要的了，在这情况下，在基督里神与人合而为一，人与人也合而为一的信息，听起来就顺了，会受较多的人欢迎的。

正由于此，我们是不是大可期望一个中国基督教神学的春天？这个神学将不是重复外国神学家讲过的话，而是反映中国信徒怎样在一个不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时代里向中国的人们传扬基督和好的福音，反映这和好的福音怎样改变中国的人们，反映中国的人们又怎样丰富教会对这一福音的认识。各位毕业同学在读了许多书之外，现在又去投身教会的实践，我希望你们在这样一个有中国特色的神学的开拓工作上有所建树。

请让我说，我们爱护每一位毕业同学。不论各位毕业同学今后在哪里，请像已往所有的校友一样，把自己看为金陵的人，保持自己同母校的联系，成为不断为金陵祈祷的集体的一分子，关心金陵的工作，对金陵的质量负责，对金陵的声誉负责。我们将会期待、欢迎你们写来的每一封信的。

怎样看待基督教会以外的真善美？

(一九八七年于上海)

在基督教内外,有些人很看不起神学,甚至敌视神学。我们教会里有人公然表示,“属灵”就够了,神学是属世的智慧,研究神学只会冲击信仰。在这一思想指导下,有一所神学院不称为神学院,取了另一个名称。在社会上,至今仍然有人认为,宗教是反动的,神学比宗教更反动,宗教是欺骗人的,神学有更大的欺骗性,宗教是鸦片,神学是浓度更高的鸦片。在这样的指导思想下,有人就把整个宗教,不问宗教内部的层次,都一古脑儿地放在一起:反动派讲的宗教是宗教,进步派讲的宗教也是宗教,都是鸦片,都是反动的,都是欺骗人的。基督教内部的各种层次完全用不着分了。

神学是教会在思考,如果宗教是客观存在,教会是客观存在,那么,这个教会就一定会思考,思考许多有关《圣经》的问题,思考许多有关教会的问题,思考许多有关社会和国家的问题,思考许多价值观念方面的问题。这样思考和那样思考当然有出入,有区别。譬如说,对于《圣经》,抓住《圣经》的片言只字,还是让整本《圣经》讲话,这是两条不同的理解和讲解《圣经》的路线。同样一本《圣经》,讲道者多讲什么,少讲什么,大有不同,是受人们的神学思想制约的。我认为,在教会里面,总的来说,研究神学的人是比较开明的,比不研究神学的人要开明,因为神学家需要把自己的论点加以整理,使之合乎理性,他有许多看法不得不比较开明。一个没有神学家的宗教,一定是低级和原始的宗教,不思考问题的宗教,一

定是同理性格格不入的宗教。现在有许多同工努力在《圣经》上、神学上处理现实问题，为历史前进进行辩护，也有许多人在那里用《圣经》阻止人世进步。说他们都是搞宗教，都是贩鸦片，我想这是非常不公道的。这不是科学分析的态度，不是实事求是的态度，不利于使神学和文化向好的方向发展。

也有人说，你们搞自传，提出一些新的讲法来，使得你们的宗教和你们的讲道同社会主义比较协调，这样你们的欺骗性就更大。我不是这样想的。我们不是欺骗人，我们是要发挥《圣经》里面的道理。如果说，基督徒讲了爱国，并且言之成理，使信徒内心平平安安地爱国，就是欺骗性增加了，那么，我想，周总理那个时候不应该鼓励中国基督徒学习爱国主义，进行三自爱国运动，他应该听任基督徒去落后，越落后越好，那我们三十几年走的路完全错了，“文化大革命”对待基督教的办法倒是对了。

我这次来参加这个会也准备了一个题目。这是一个今天全世界教会都面临的、都在讨论的神学问题：怎样对待教会外面的文化、宗教、科学、艺术、哲学、历史、人民运动，即基督教外面的一切真善美？

这个问题为什么会变得如此突出呢？拿我们中国来说，当然是因为解放以后，我们接触到了许多过去不接触的人和事。譬如说共产党，譬如说人民，譬如说革命者，譬如说解放运动和人民政权，这些都是教会外面的。过去我们基督徒关着门做基督徒，现在门开了，我们怎样从神学上来看待它们就成问题了。

西方国家，还有许多第三世界国家的教会关心这个问题也有许多原因，一个原因是他们发现了许多东方宗教。过去并不是不知道存在着这些宗教，但是过去总是认为真理在西方，把其他宗教看为是荒谬的、低级的、不值一驳的。最近几十年，第三世界国家

抬头了,殖民主义不吃香了,他们发现,许多其他宗教就在他们的隔壁。英国许多城市里相信印度教的人,相信伊斯兰教的人,相信锡克教的人都很多。像英国伯明翰市,那边有锡克教的庙,有印度教的庙。基督徒直接和他们接触之后,发现其他宗教的人并不像他们所想的那样愚昧。他们发现,人家的祷告有许多话同我们基督教的祷告差不多。其他宗教并没有使人堕落,像印度教能够产生泰戈尔、甘地这些伟大的人物。因此,究竟基督徒怎么看待其他宗教,就变为新的神学问题了。另外一个原因是,基督徒越来越发现,在科学方面、艺术方面,许多作出巨大贡献的人并不是信基督教的。像西方的医学,要追查它的历史,阿拉伯的影响是很大的。现在,我们中国的针灸在西方很时行,中国的针灸也不是基督教里面出来的。基督教外面有那么许多东西对于人类的进步作出贡献,这使好些基督徒提出一个问题来:怎样从神学上看待这些东西?另外还有一个原因就是看到基督教外面有许多人人品很好,道德水平很高,有伟大的自我牺牲精神,像白求恩、雷锋这样的人。没有基督教,人家也有很高的品质。而我们基督徒未必都有令人满意的品质。是的,今天世界上品德特别高尚的人是少数,但是这少数也已经构成了神学问题。还有一个原因,使人更加要问,基督教外面这许多真、善、美,我们怎样从神学上来理解,那是因为现在在基督教里面越来越多的人发现,基督教和它的神学好像有不少缺点。譬如说,基督教神学每每为殖民主义者所利用,它也曾被利用了去反对和残杀犹太人。

由于最近几十年在人们思想中产生了这些问题,我们看西方神学刊物上,大量的文章都在谈这个问题。

我现在为了便于叙述,把基督教处理这一问题的各种办法勉强归纳为五种,来逐一介绍一下。

我们既然是研究,我想我们不要随便说,这属某某一个派,那属某某一个派,好像这样就研究完了。说一个人是某某派,这是扣帽子,扣帽子就是把某某一个人或某某一个论点放到一个格子里去,但这没有真正解决问题。我想,不管某个人发表什么主张、什么观点,我们要相信,他也是在那里努力使基督教言之成理,他也是在努力要为基督教进行辩护。今天在全世界范围里,对基督教反对的或冷淡的是主流,大部分人对基督教是没有兴趣的,是冷淡的。在这样的情况下,一个人能够为基督教讲话,我觉得难能可贵。我们应该承认,我们同他有共同点。他提出的一个观点,也许我们认为不怎么好,但且慢否定他,或说他不属灵,不正统。我们应该问一下,他是想要解决什么问题?为了要解决什么问题,他才会提出这样一个看法来的?他解决问题的办法你不满意,你又是如何解决那个问题的呢?他说了什么?他说到什么程度?他没有说什么?我们都要弄清楚,我们不要强加于他。现在中国的神学论争是很少的,如果有一点论争,每每会发生一个情况,就是把对方的观点歪曲得面目全非,然后把它打倒。先把它曲解一番,然后打倒起来很容易,等于是打倒了一个稻草人,它不会抵抗的。事实上,我们可能失掉了一个对我们很有贡献或很有启发的观点。因此,这个人说什么,没有说什么,我们都要搞清楚,不强加于他,不无限上纲,这是实事求是、探讨真理的态度。

五种态度的第一种就是对于我们要处理的问题,不理不睬,若无其事,不觉察到它的存在,不去接触这个问题,不考虑这个问题,或是认为没有考虑的必要。尽管基督教外面有许多论点存在着,等待着我们的基督徒去正确理解、对待,可是有一些基督徒,包括神学家,不承认存在这一类的问题,因此根本不考虑。持这一态度的在基督教中占相当大的比例。

基督教从第四世纪开始,就成了欧洲统治势力的一部分。十几个世纪之久,这个状态保持下来了。现在外国把这十几个世纪称为 Constantinian Era,就是君士坦丁时期。这个时期,基督教占统治地位,是当然的真理,是天经地义的。如果发现有人讲的同基督教有所不同,那么有教会当局或异教裁判所来对付这些人。整个权力集团或是统治势力和正统教会是结合在一起的。由于当了权,这个教会的思想封闭,在一个特定的天地里维持它的权威,外面的事是不闻不问的。这个长期以我为中心,以我为圆周,对外面的一切不理不睬的自高自大态度,至今还难于消除。基督教传到第三世界国家,这种态度也跟了去,为第三世界不少信徒所接过去,至今还大面积地存在。像我们中国,即便从来没有什么君士坦丁时期,可是从欧洲那个时期所带来的那种对教外文化视若无睹和一味轻视的殖民主义态度,在一定程度上还继续保存着。这一类信徒和同工认为,神学就是从《圣经》的一部分联系到《圣经》的另一部分的问题,要处理教会外面的文化啊、信仰啊、信念啊、运动啊等等,都不是神学的事情。这一态度基本上是个不稳定的态度,遇到风吹草动,每每容易转到第二种态度上去。

第二种处理这问题的态度,我们暂且就叫它“两军对抗论”或“光明天使论”吧。它认为,在福音和教会外面,世界上如果有点什么好东西,都是撒旦装作光明天使来欺骗诱惑我们的。这是一种神学观点。这个神学观点的特点就是认为基督教之内和基督教之外截然分开,截然对立,截然对抗。在“唯有基督”的口号下,认为基督之外都是败坏的、罪恶的、撒旦的。基督不但同罪对立,基督同善也是对立的,因为人的善良毫不足道,实质上还是撒旦装作光明天使。古代教会有一位教父叫德尔图良,他提出过一个问题:“雅典同耶路撒冷有什么相干?”这里,耶路撒冷代表教会,雅典代

表世俗的知识、世上的哲学。他觉得雅典同耶路撒冷没有什么相干。据说另外一句名言也是他说的：“正因其荒谬，我才信之。”意思就是，某个论点如果不荒谬，那还要信仰做什么。因此，信仰的内容一定是荒谬的，信仰基督就得不怕荒谬。

十八至十九世纪西方教会很大一部分传教运动基本上是在这样一个指导思想底下进行的。传教士到第三世界国家去传教，他们有意无意地否定第三世界国家的一切民族的东西。民族的宗教、民族的文化都一无是处，都是要否定的，不管是进步的，还是不进步的，好的还是不好的，都要否定。有一个传教士到非洲去传教，曾经说过这么一句话：“我们要使非洲人除了皮肤颜色以外，都变成欧洲人。”

也许有人要说，这是基要派才有的观点。不一定。基要派不一直都是这样看的，而所谓现代派也不一定不是这样看。比如说，有些西方神学家就代表这样一种观点。他们也强调耶稣基督为主，这本来是很好的，但是这个话在他们文章里的意思就是：因为耶稣基督是主，凡不承认耶稣基督为主的都毫无价值。国际传教协会一九三八年在印度马德拉斯开大会，大家探讨克雷默一本书，他强调基督和基督之外的非连续性，认为基督徒传教就得否定基督教外面的一切的一切。他有一句话是这样说的：“亚洲一切宗教现象都是人的骄傲和狂妄的表现。”这样，民族文化、民族宗教和民族运动当然被全部否定。一九五七年，西德一位神学家在金陵神学院演讲，他在黑板上画了一幅画，左边有一个台阶，踏步一曲曲的，从左边到右边，从上面到下面；右边也是一个踏步，一级级地下来，在当中两边会合，在这会合的地方竖起了一个十字架。踏步是代表人类的文化，文化越是上升，离开十字架越是远；文化越低，越是近十字架，文化同十字架是对立的。我们要传十字架的福音，我

们一定要否定各民族的文化。这一种否定第三世界国家固有文化的传教神学,在传教运动里配合帝国主义侵略活动,影响是很大很长期的。现在西方教会常有文章批判这种神学观点,用的一个词是 triumphalism,就是以胜利者自居的心态。这第二种态度就是认为基督耶稣之外一无是处,全部加以否定。中国解放之初,教会里这一种论点也很抬头,有人仅仅抓住“卧在恶者手下”(约壹 5:19)一句话,不顾整本《圣经》其他的话,宣扬基督徒仇视世界,仇视人生,仇视文化,仇视历史进程。

第三种和第二种正相反。他们肯定基督教外面一切真善美的东西也是神的工作。它们虽是在基督教的外面,可是它们不是在神的外面。它们也带有神的启示。它们的领袖或提倡者也是神的仆人。他们代表人对神的探索,对神的发现,对神的认识,对神的侍奉。这种观点我想不妨称之为“平行启示论”。他们认为,启示不是只从耶稣基督一条线上来的。

这一种观点在新旧约《圣经》里面不是没有一定根据。譬如说,以色列可以接受另外一个民族的祝福。亚伯拉罕接受麦基洗德的祝福。古列(今译“居鲁士”)是波斯的王,他也遵行神的旨意,重建圣城圣殿。尼布甲尼撒也为神工作,所以神赐给他埃及地。在《以赛亚书》第 19 章里,埃及被称为“我的百姓”,亚述被称为“我手的工作”。在《旧约圣经》里,外邦人被肯定的是很多的。譬如说,亚伯、以诺、挪亚、罗得、约伯、示巴的女王、法老的女儿、摩西的岳父、喇合、路得等等。

主耶稣关于好撒玛利亚人的比喻似乎也说明这一点。《新约》里有好些经节告诉我们,使徒们对世界的种种并没有抱绝对弃绝的态度,例如:《哥林多前书》第 10 章第 26 节:“地和其中所充满的都属乎主。”《提摩太前书》第 4 章第 4 节:“凡上帝所造的物,都是

好的，若感谢着领受，就没有一样可弃的。”《雅各书》第1章第17节：“各样美善的恩赐和各样全备的赏赐都是从上头来的，从众光之父那里降下来的。”《约翰一书》第2章第29节：“你们若知道他是公义的，就知道凡行公义的人都是他所生的。”

古代教父克雷芒是这样说的：“真理的河是一条，但是它这一边、那一边有许多小的河流流到大河里去。”托马斯·阿奎那也讲过：“一切的真理，不管是谁说的，都是从圣灵来的。”加尔文在我们许多人心目中代表正统，但是他是这样说的：“当我们遇到外教作者的时候，让我们从他们的作品中学得其真理之光。人的头脑尽管是堕落的、败坏的，也还是有上帝赐予的很高的才能。如果我们相信，上帝的灵是一切真理的泉源，我们就不应当拒绝也不应该轻视真理本身，不管它在哪里出现，否则我们会污辱了上帝的灵。”

这里还有几段话是国外有些现代神学家讲的。美国神学教授罗勃特·麦克菲·勃朗说：“有的学生有时感到惊奇，我怎么如此推崇亚尔伯特·加缪（法国无神主义的存在主义者）。我告诉他们，在我里面，有那么一个部分，和加缪正能合拍；在我里面，有那么一个部分，愿意对加缪的话说一个热情的阿门；在我的里面，有那么一个部分，不想驳斥加缪，而想拿起武器同加缪一起去反对共同鄙视的敌人，尽管我们是从不同地方得到命令的。尽管我们不能在世界之内享受到最后的平安，我却不愿意谴责这个世界，鄙视这个世界。”

前坎特伯雷大主教考根在一部书里是这么说的：“对上帝的圣灵，我们需要有一个合适的观点。在上帝广大的创造之中，圣灵是一切真善美的载体。哪里只要在神学方面、哲学方面、艺术方面、科学方面，进入黑暗、无知、错误的地带，真理的圣灵就要在哪里做工作。哪里只要疾病、死亡的势力被战胜，哪里生命的圣灵就在活

动着。哪里丑恶受到阻止,哪里上帝的美善的灵就在进行着创造和再创造的工作。上帝不是一位专对教会事务保持兴趣的超级领袖,他是在一切发现、发明和学术的背后,他是一切真理的源头,一切美的根源。因此在实验室里,在书房间里,在美术室里,在贫民窟里,任何人只要成为上帝圣工的器皿,他就是最高者的仆人,即使他自己不知道这一事实,即使因而他的真善美较不丰富。”

印度有一位神学家讲过这样一句话:“把耶稣的底片放在印度哲学的溶液里,相片上将会显出过去不为人知的特色来,这些可能正构成今日时代的福音。”

我引了这许多的话,想说明,平行启示论今天是为许多基督徒知识分子所倾向的。它也有一定的《圣经》根据。

值得指出,刚才一些人的神学观点虽然被引用了,但他们不是每一个都停留在平行启示论上。譬如说,像前坎特伯雷大主教考根,他还有很好的基督观。不过我在介绍平行启示论的时候,觉得他这一段话很能够作为代表。我们中国基督教也有不少人是愿意接受这种观点的。

我并不反对这个观点。我们基督徒听了这个观点后,一方面很得到满足,一方面又觉得不满足。为什么呢?这观点引起一个问题:基督耶稣还有什么地位?都是启示,基督耶稣究竟还有什么独特的作用?基督福音仅仅是许多启示当中的一个,是吗?因此我要介绍第四、第五两种观点。

第四种认为,耶稣基督是成全者。是的,全世界各处的宗教、各处人民的运动、艺术家的创作……也许能够体现一些神的启示,但是它们是不完全的,它们等待着成全,而耶稣基督是它们的成全者。刚才引用过的克雷芒有一句话:“哲学为《新约》作准备,它是希腊人的教师,正像《旧约》是犹太人的教师。哲学作为神的启示

并不亚于《旧约》，柏拉图无非就是隐藏在希腊文后面的摩西。”他的大意就是，以色列人有《旧约》做他们接受基督的准备，希腊人不是以色列人，希腊人有希腊人自己的《旧约》，就是希腊的哲学。他认为，希腊的哲学作为神的启示，并不亚于《旧约》，甚至柏拉图也无非就是用希腊文讲话的摩西。

这个观点在基督教的历史里是很受到重视的。长期以来，在基督教里有一句话，就是传福音的准备，用拉丁文讲就是 *Praeparatio Evangelica*。这里说的是，世界上有许多东西，并不是福音，是在福音的外面，但是它们的存在，具有为人们接受福音做准备的功能。基督外面有许多东西都是略有所见，是一种指点，好像一个手指头，点着基督，指向基督，帮助人看见基督。用坎特伯雷又一位前任大主教汤朴的话来说，这许多东西在基督耶稣那里得到纠正和完成。他说的是：*correction and coronation*。*correction* 就是校正、改正、纠正；*coronation* 原义是加冕，可以说是提高、完成的意思吧。希腊的哲学、中国的哲学、教外的许多思想、观点、艺术，它们能够达到一定的高度，但是要到基督耶稣里它们才能达到顶峰。

各位也许听说过，从前有一个北欧的神学家叫艾香德，到中国来，在香港办了一个中心，专门向佛教徒介绍基督教。有许多和尚跑到他那里，大家进行对话，互相学习。艾香德也是属于耶稣基督是成全者这个看法的。他打这样一个譬方：有一座山，里面有银矿。在山上一些地方，挖一个洞，底下可能就有银子，这个银子是和石头、其他金属以及泥土等东西混在一起的，是很杂的。但是如果你跟着这一条矿脉找到银矿的中心，就可以找到很纯的银子。一般的宗教或其他教外的真理是混杂的、不纯的，而基督耶稣是这个矿的中心，在那里可以找到纯银。另外有人也作过一个譬方，说下雪的时候，我们在房间里朝外面看，玻璃窗每块玻璃的周围部分

都是雪,但是中央部分还没有被雪掩盖,因此在玻璃窗的中央望出去,还是可以看见外面的景色的。意思就是说,许多其他宗教还是能让光线透一点进来的,但是看起来模糊不清,而基督耶稣就像没有雪的中央部分,通过它我们可以看见上帝更多的真理。我想这个观点和《希伯来书》第一章头两节的话可以印证。《希伯来书》是说:“神既在古时藉着众先知多次多方地晓谕列祖,就在这末世,藉着他儿子晓谕我们。”这是第四种。

第五种就是认为,我们应该认识基督耶稣的宇宙性,基督耶稣不但有人性、神性,他还有一个宇宙性,关于这一点,命题是非常之大,人的智慧没有办法测度,但是我们也不能放弃它,我觉得是值得我们探索的。这就是认识基督耶稣的先存性,他是在创造宇宙之先已经与神同在,是三位一体里面的一位,万有都是藉着他造的。他是道成肉身的道。他照管的范围是整个宇宙。

让我们读六段圣经,让《圣经》的话来帮助我们探索基督这宇宙性:

(一)《约翰福音》第1章第1至4节:“太初有道,道与神同在,道就是神。这道太初与神同在。万物是藉着他造的;凡被造的,没有一样不是藉着他造的。生命在他里头,这生命就是人的光。”

(二)《约翰福音》第1章第9节:“那光是真光,照亮一切生在世上的人。”

(三)《约翰福音》第1章第14节:“道成了肉身,住在我们中间,充充满满地有恩典,有真理。我们也见过他的荣光,正是父独生子的荣光。”

(四)《腓立比书》第2章第6至11节:“他本有神的形象,不与自己与神同等为强夺的,反倒虚己,取了奴仆的形象,成为人的样

式,既有人的样子,就自己卑微,存心顺服,以至于死,且死在十字架上。所以神将他升为至高,又赐给他那超乎万名之上的名,叫一切在天上的、地上的和地底下的,因耶稣的名无不屈膝,无不口称耶稣基督为主,使荣耀归于父神。”

(五)《歌罗西书》第1章第15至20节:“爱子是那不能看见之神的像,是首生的,在一切被造的以先。因为万有都是靠他造的,无论是天上的、地上的、能看见的、不能看见的,或是有位的、主治的、执政的、掌权的,一概都是藉着他造的,又是为他造的。他在万有之先,万有也靠他而立。他也是教会全体之首,他是元始,是从死里首先复生的,使他可以在凡事上居首位。因为父喜欢叫一切的丰盛在他里面居住,既然藉着他在十字架上所流的血,成就了和平,便藉着他叫万有,无论是地上的、天上的,都与自己和好了。”

(六)《希伯来书》第1章第2、3节:“早已立他为承受万有的,也曾藉着他创造诸世界。他是神荣耀所发的光辉,是神本体的真像,常用他权能的命令托住万有。”

宇宙的基督是一个很大的命题,《圣经》里所讲的也不是非常直接,因此大家不大重视,也不大敢接触。但是现在越来越多的神学家重视了,像德日进,就直截了当地提出,基督不但有人性、神性,而且有宇宙性,整个宇宙是在基督为主的范围之内。

古代的教父像殉道者查斯丁,像奥利金,像克雷芒,都有一个叫做 logos spermatikos 的理论。logos 就是“逻各斯”就是“道”。他们提出的观点就是:由于基督是先存的宇宙的基督,所以在一切人身上都有道的小小种子。

印度有一个叫马太以·撒加拉雅的神学家,讲过这样一段话:“在过去,我们所看到的远景是教会出去,把各国各方的人召来归入教会的怀抱(指传教运动)。今天,感动许多基督徒的远景是另

外一幅了。我们看到的是基督带领所创造的整个世界和整个人类走向同他合一的目标。在这一拯救工程中,它使用人类的一切进步、解放和人化的运动。”(“人化”这个词我们是不大用的,指的是,现在许多地方的社会不把人当作人,把人当作非人,因此提出要人化,即把这些非人重新变成具有人的尊严的人。)教会不是神唯一的器皿,但教会仍然占据中心地位,在这里,人们认识他、宣扬他、崇敬他,但基督拯救的工作并不受教会的限制,这个工作涉及到整个宇宙。看到救恩的宇宙性是当今神学思潮的一个特点。正如“梵二”所说,在教会轴心结构之外,可以找到很多有关真理和成圣的因素,对那些愿意遵照自己良心指使的人来说,蒙救的帮助是到处存在的。我们知道,在六十年代,梵蒂冈召开了第二次大公会议,这会议引起了天主教很大的改革。在神学方面也有很大的改革,其中很重要的一点,就是“梵二”承认,在教会的外面并不是一切只有沉沦,只有毁灭。

“梵二”整个思想发展的方向促使天主教德国神学家拉纳提出一个命题:把一些人当作“不称为基督徒的基督徒”,他的意思就是,教会外面也有许多基督徒,他们自己不称自己为基督徒,他们也许从来没有接触过基督教,“基督教”三个字也许听都没有听到过,但是他们的行为品德很好,他们可能从其他宗教也得到了不少有价值的启示,因此可以承认他们为不带名号的基督徒。他这样讲,许多基督徒是很欢迎的,但是也受到另一些人的反对。反对的理由就是:这样讲,还是基督徒自以为是,那么,佛教徒也可以把一些人看为不带名号的佛教徒,你愿意不愿意呢?

从教会传统来看,拉纳的观点也不是完全凭空杜撰的。奥古斯丁曾经讲过:“各个宗教都包含一些真理,各教所包含的真理,实在是基督的真理,虽然基督的名字没有用上。”奥古斯丁认为,基督

来到世界之前，教会已经存在，从亚伯以后，一切义人都属于基督，都属于教会。殉道者查斯丁这位古教父说：“我们相信，凡努力行善的，在上帝里都有份。按照我们的信仰，藉着上帝的恩惠，他们将有份于上帝的居所。我们相信，这一原则可以应用于一切的人。在上帝的道基督里面，整个人类都有份，凡按他们的认识去行的，都是基督徒，即使别人说他们是没有神的。”他举了例子：一个是苏格拉底，一个是赫拉克利特，说他们事实上是在基督里面。

我不能说这一观点是错误的。这一观点包含一个很高的基督观。《马太福音》第25章里有主耶稣的教导，讲到末日审判的时候，上帝问的问题不是你高举了基督没有，问的是你有没有拿一杯冷水给一个饥渴的人。“这些事你们既作在我这弟兄中一个最小的身上，就是作在我身上了。”我们对主耶稣这样一个教导，不能不严肃对待，不能只当他没有说。

这是我所要介绍的第五种，就是宇宙的基督观。这个基督观好像能够照顾到更多的面，使我们一方面肯定《新约》里面的基督，肯定约翰和保罗的很高的基督观，但另一方面，对于世界上的真善美，还可抱一个开放的态度。

可以设想，教外有些同志对三、四、五各点可能大不以为然，说我们怎么把世界人类的成就都归到上帝和基督那里去了。我要说的是，既然允许人们信仰基督教，就得允许人们在基督教神学上想通一些问题。想通了，对历史进步的事业会更投入而不是相反；不想通，势必把世界一切真善美都视为来自撒旦，宗教信徒就变为敌对势力的俘虏。信徒寻找一个比较最合用的神学去抵制引向反动的神学，这是值得鼓励的。

从创造看降生

(一九八七年圣诞节在南京金陵协和神学院的讲话)

最近爱德印刷厂成立。我请何慧冰同学画了一幅画,一个母亲抱着孩子,还有满天飞翔的和平鸽,作为圣诞卡,里面印的是《路加福音》第1章第38节这句话:“我是主的使女,情愿照你的话成就在我身上。”

在上帝创造他自己意念中的那个完全的世界的过程里,马利亚讲出这句话来是一个重要里程碑。

上帝是创造的主。他的创造工程今天在继续着。他创造的目的是一个既包括今世也包括来世的和谐的世界。在这个新天新地里,再也没有黑暗,没有人骗人、人吃人的事。人与人是弟兄,是姊妹。在那个世界里,人都顺服上帝。这个顺服不是压服,不是出于不得已,不是因为善有善报,恶有恶报,而是出于乐意,出于喜爱这样做,出于认识神的旨意是最好最美的,是一种自觉自愿的自由选择,是在意志上和神认同。

在那个和谐的世界里,红灯绿灯我想总还是要的,所以交通警察还是有的,但是战争、凶杀、抓人、监禁、枪决这些事,不会有了。那个世界不是“无差别境界”,差别还是会有有的,而且比现在更要多得多。这样,生活、思想都能丰富多彩,否则,如果差别都没有了,生活思想也会太单调的。但是,人与人之间的冲突,你死我活的斗争,什么“踩上一只脚,叫你永世不得翻身”这样的咒诅,什么“砸烂你的狗头”,都不会有了。

上帝为了达到这个目的，他在叛逆、野蛮、吵吵嚷嚷的、不听话的、完全不体贴天父心意的人类之中，通过长期的启示、管教、教育、启发，培养出一小群知道敬爱主、等候主、服侍主、向主献上自己的人来。他们日夜盼望的是神用膀臂施展大能，叫那狂傲的正心里妄想，就被他赶散，叫有权柄的失位，叫卑贱的升高，叫饥饿的得饱美食，叫富足的空手回去。这一群人成为道成肉身在地上的准备。而在马利亚身上，我们看到这一准备过程的顶点和结晶。在她身上，上帝终于能够盼望出现足够的奉献精神，来成为道成肉身的载体。上帝自己，和整个宇宙，可以说是屏住了呼吸，在等候她的回答。她的回答是关乎万民的。她完全有自由和权利说，不，不行，我是一个少女，我不能让这件事发生在我身上。但是，她所受到的教养使她尊主为大，她的灵以上帝她的救主为乐。她不觉得这将是一场灾祸，她觉得自己是有福的。她看到，上帝将施展大能，赶散那些狂傲的人，剥夺那些有权柄的人，抬高那些卑贱的人，让饥饿的有饭吃，她以自己能参加这样的创造过程而高兴。这就是说，她有她自己的价值观，她正确使用了她的自由，为道成肉身献上了她的合作，让自己成为道成肉身的母体。

是一个人长期接受某种教养所养成的价值观，决定这个人在关键时刻怎样作出选择。当某种价值观使一个人走在时代前面，为历史、为人类在做某种一时不为人所理解的事情的时候，这个人要受到痛苦，但是也为自己能从事这件事而感到已经是胜利者。

最近我读到危地马拉诗人奥托·雷乃·卡斯铁洛的一首诗，正可以刻画马利亚的痛苦和欢欣。这首诗的题目是《明天在天平面前》。它是这么说的：

“到有一天，当我们
把我们这一代的热情，

去告诉那些
至今还没有出生，
但将带着和善的面孔
生活的人的时候，
我们这些受苦最多的人
将成为胜利者。

走在时代的前面
就得承担更多的痛苦，
但是，
能用那些即将出生的人的眼睛，
去爱世界，
那是多大的美事。
而能在周围一切还很冷很暗的时候
就知道自己是胜利者，
那也是多好的事啊。”

天使同马利亚的那一次谈话开始了马利亚痛苦的一生，但是她坚定的，因为她知道，上帝最终不会失败，她在忍受痛苦的时候已经是胜利者。

我们讲不大清楚，道成肉身为什么在上帝的创造工程里是必要的；也讲不大清楚，在我们和上帝的和好这件事上，基督和他钉十字架是怎样起作用的。但是，我们的切身经验和好大一部分人类两千年来的切身经验告诉我们，基督是拯救的主，藉着他的启示、启发、榜样、教导、感动，我们是悔改了，是得到了救赎，得到了新生。我们不是凭推理，不是凭听闻，而是凭灵性的眼睛，像抹大拉的马利亚一样，看见了主，认出他真是死而复活的拉波尼(夫子)。

在实现道成肉身的过程里,马利亚的同意起了决定作用。上帝愿意继续他的创造工作,但上帝不是一台推土机,他不用强权,他不强加于人,他只能争取人的首肯。被造世界经过上帝的工作,在两千年前,终于达到一个水平,有了马利亚那样一个与神同工的代表。马利亚在救恩历史上的地位就可想而知。两千年来,她成为与上帝合作的榜样,得到了应有的崇敬。

巴特(Karl Barth)曾经说过:“为马利亚立像,我原则上不反对,只要不把她的像放在圣台上,而把它放在会众之中,并且面对圣台。”

是的,马利亚首先是人类的优秀代表,她站在我们中间,以她的爱,她的奉献,她的合作,把救主耶稣基督带到了人间。

我们时常讲为主做见证,时常讲传扬主的道。传扬主的道和为主做见证就是像马利亚那样,用牺牲自己来实现我们的奉献,做基督的载体,把基督送到人间。

今天,在不少人心里,忘记了艰苦创业,存在着贪图物质享受,要这个要那个的欲望,喜欢过奢侈的生活,一切为自己的考虑多了,为高尚的目的而牺牲自己被认为是傻瓜。人与人之间的关系虽然不是你死我活,但也容易紧张,缺乏和好精神。在这个时候,教会不应随波逐流,同这种情况看齐。我们更应当高举基督,效法马利亚。圣诞最重要的信息不是聚餐,不是篝火,不是玩个痛快,而是效法马利亚和她那时一切等候基督降生的人,更深地认识基督,更有效地介绍基督,使上帝来到人间的爱传遍世界。

爱到底的爱

(一九八八年三月二日在南京金陵协和神学院的神学演讲)

两三年前我在中山陵一所疗养院住了一段日子。许多人知道我信基督,吃饭的时候时常议论宗教问题。多数人态度很好,但有几个人很粗野,拿复活等问题来开基督教的玩笑。记得有一个水平特低的人说:“你说有神,你且把神拿出来给我看看,我就信。”

不信基督的人从外面看,基督教就是一套教义。他们觉得没有这些还好信一点,有了这些更不值得一信了。而有些文化很高的却信基督,不认为基督教是荒谬的。反对基督教的人觉得这些人不可理解,无法解释。他们在写到这些人的时候,关于他们的宗教信仰索性只字不提。像孙中山先生,像爱因斯坦,像老舍,像林巧稚,像徐光启,像巴甫洛夫,写文章和传记的人不去提到他们有宗教信仰,似乎他们都是无神论者,这未免有些自欺欺人。

其实,基督徒之所以是基督徒,几乎没有例外,都不是先被一套教义所说服而归向基督的。我们都是首先受到了爱的感动,爱的激励。他们首先感受到基督爱人们的那种爱。他们被世界上最高、最美、最好的爱所感动,意识到自己有亏欠,是罪人,因而甘愿放弃一切接受基督。我们不是首先用脑袋去把教义一条条搞通的。我们首先是在感情深处,在心灵深处,为基督的爱所吸引,所融化,因而五体投地地归服于基督,投诚于基督。

教义当然是重要的,它是用一种特殊的语言保护着一个信息、一个福音,就是上帝爱世人的福音。上帝是爱,是基督所显示的那

种爱。这是一个爱的宇宙。宇宙的最根本原则、基础是爱。我们都是上帝所爱的对象,为了我们,上帝不惜付出重价。基督教是动人的,是激动人心的。他动人的地方首先不在它的教义,而在它显示了爱,高举了爱,散播了爱。它期待一个爱的世界的最终来临。它吸引无数男男女女来为推广爱的事业而献上一切。

教义更关心的是正统与否。它必然倾向于排斥异己的思想信仰。过于强调教义的正统,每每容易单调,沉闷,缺乏生气,产生矛盾。而爱是活泼奔放的,多姿多态的,富有创造力的。爱是世界上最丰富多彩的精神。它最有感染力,最不可测度,最不能预知,最不可估计。

有人强调,爱不可能没有私下的目的,爱总有其不可告人的动机。我们看见了基督的那种爱,就要宣告:不带目的的爱,没有自我打算的爱,是有的。基督表现了这样的爱。在很多忠诚的基督徒身上也看得到这样的爱。

如果疗养院的那些朋友能够虚心进入四福音,他们必然能领略到这种真正的爱。

浪子回头的比喻里的父亲的爱多么深,多么不变。这个爱使他知道,儿子一定会回来。他切盼儿子回来。是这个爱融化了儿子的铁石心肠,重新让父亲把他作为真正的儿子接纳回去。

那拥有一百只羊的牧养人是怎样地爱那一只迷失了路的小羊。他不是等待小羊的回来,而是去找,找到小羊所在的地方,把它抱回家去,和朋友们一起欢乐。

耶稣是那么爱他的朋友,当他看到他的朋友为了家庭里的生死离别而难过的时候,他也不禁流出了眼泪。

耶稣看到一位有向上之心的青年,就爱他,向他指出他还缺乏什么。

他的爱使他为耶路撒冷哀哭。

他深深地爱着世界上饿肚子的人,没有地方住的人,赤身露体没有衣服穿的人,生病受苦的人,被监禁的人,说,人们为这些人做的,就是做在他身上了。

那有过五个丈夫被世人看不起的妇女,那犯奸淫被自以为义的人定罪的妇女,那因为悔罪而用自己的眼泪和头发擦耶稣的脚的妇女,耶稣爱她们。

那看见耶稣来了,爬到树上去看他,又表示愿意悔改,把欺侮人之所得几倍还清的人,耶稣爱他。

他最亲密的朋友在他受难的时候有的逃了,有的否认了他,他很伤心,但是他还是爱他们。

一句话,他既然爱世上属于自己的人,就爱他们到底(约13:1)。

为朋友不惜舍命,世界上没有比这更大的爱,这就是基督的爱。

是这样的一位基督,使我们敢于相信,爱是人生的真谛,爱是最重要的真理,爱是上帝最根本的属性,爱是这个宇宙的本质属性。宇宙中有风暴,有地震,有火山爆发等等自然灾害,我们不理解,但尽管不理解,我们不相信宇宙的真谛是恨,是毁灭。不,我们相信,宇宙的真谛是爱,是成全,是基督所显示的那样的爱;宇宙中有了这个爱,我们就有了后盾,我们能够平安,能够生活有力量,有意义,发出感谢、赞美。

这是一个缺乏爱、需要爱的世界。能得到爱,人们心里就踏实了。许多人渴望能得到爱而不可得。

我们知道,从半封建半殖民地转到社会主义是一个长的过程,其中充满着变动,人们会受到折腾。中国老百姓向往过“日出而

作、日入而息，帝力何有于我哉”的与世无争的田园生活，但这个生活已不可得。在不停的变动、折腾的过程里，人际关系每每容易紧张，互相伤害的事时常会发生。加上一些不必要的运动，折腾面更广泛。许多人丧魂落魄，觉得世态炎凉，感到自己没有的爱，想望得到爱。基督的爱福音正能满足这种想望。

“以阶级斗争为纲”的人是听不进爱的福音的。他们会觉得讲爱就是唱反调，是破坏斗争，是不问是非，不问敌我，是投降敌人。今天我们中国已经不再处于“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历史阶段。今天大家要求安定团结。爱的福音、和好的福音是比较中听的。你们看，信主的人是增加而不是减少。

前几年巴金访问日本，到一处地方，接待他的主人剃的是光头。后来此人自己讲了原委：在中国“文革”时期，他接受了当时中国极左派的宣传，也成了一名极左派，在日本打击了許多人，伤害了許多人。后来他很内疚，觉得对不起人，没有别的办法来偿补，决定今生要一直剃光头。

我读了巴金的文章，感触很深。五十年代后期起，“以阶级斗争为纲”的路线、“左”的路线、恨的路线在我国日益抬头，在教会里也有影响。我是这条路线的受害者，但在一些问题上，我也不是没有接受这条路线的影响。我不必像那位日本朋友那样用剃光头这种不是办法的办法来表达自己的忏悔。我正在按我今天的认识，投身于反“左”。现在我在神学院，在教会，在社会，都尽我的力不让“左”的东西继续害人。我求神悦纳我的这一忏悔的表现。“左”在政治上打击人，扩大打击面，缩小团结面；从信仰来看，“左”把爱践踏在脚底下，是对福音的否定。我们今天反对“左”，就是高举爱，把彼此相爱的精神在人间推广，让爱，基督的爱，苏醒许多冻冷的内心。

对我们神学院同学来说,情况不大相同。对同学们来说,不管你来院的时候灵性光景怎样,首先一条是要进入和再进入四福音,进入和再进入《圣经》,在那里看到这位基督,认识这位基督,熟悉这位基督,为他的爱所感动,坐在他的身旁聆听他的教诲,迎接他进入我的里面,使自己越来越像他。这样,在不知不觉中,我们成了他的合用的器皿,能够出发把基督的爱带到人间去,进入到更多人的心坎里。在这学期开始的时候,让我们的追求也有一个新的开始。

降 生 与 超 越

(一九八八年十二月二十三日在南京金陵协和神学院的神学演讲)

在生物界,比较高等的动物能够使用发音器官来表达自己的喜怒哀乐。人类更进而使用语言来表达自己的思想感情,那是跨了很大的一步。用语言来交流使人们的思想感情更提高,更细致。不久,人们又发现,有许多思想感情不是语言所能表达的。我们时常听到这样一句话:我真不知道怎样用语言来表达我对你的感谢。康德曾经说过:“美是一件不可言传的东西。”他提出:“模糊观念要比明晰观念更富有表现力。”正由于这个,人类又进而使用一般语言之外的其他表达手段。诗是其中之一。一般语言难于表达的,一首诗每每能够表达。有的手段甚至完全摆脱语言,譬如说美术。诗和画发向人们的是比较模糊的观念,正是这个模糊性,使他们更有表现力,给人留下了想象和创造的余地。这个我们叫发人深思。音乐是语言之外另一种带有模糊性的语言,在人们内心诉说许多欢乐的话,悲痛的话,忏悔的话,感谢的话。人们心里一些永恒的主题,哲学家、神学家没法说清楚,就发之于音乐。

人类文化里还有一种重要的语言,是传神的,那就是象征。我们用做一件事的方法来表达一个信息、说明一条真理。先知何西阿把一个失落的妇女娶回家去,就象征了上帝的大爱。耶稣用洗脚的语言,用在地上画字的语言,用让抹大拉的马利亚用眼泪擦他的脚的语言,用掰饼的语言,用十字架的语言,还用许多其他不说话的言语,让历代信徒通过想象、祷告、默想、等候进入到更深的经

验。它们为我们提供了进入基督内心世界的渠道。

围绕着基督的降生，早期教会收集了无数最美最好的报道、故事、诗歌。历代的教会更是这样，人们拿最美最好的美术、音乐、舞蹈、诗歌、戏剧、雕刻来朝见基督，敬拜基督。基督降生季节的象征是最多不过的。天上的天使，地上的群羊，贫困的牧养人，东方的星，简陋的马槽，美丽的、志愿与神同工的圣母——这些含意越来越丰富的象征，都在人们心灵里诉说用嘴说不出来的话。它们经过历史的筛选，流传下来，是一些具有永恒价值和永恒信息的东西。

基督为什么是这么伟大，导致两千年来越来越多的人的敬仰崇拜呢？可以从许多角度来回答这个问题。我愿意从一个角度来谈一下。

我们常说“道成肉身”（约 1:14）。这四个字的含意是极丰富的。道成肉身首先就是肯定一位超越自然，超越世界，超越历史的上帝。没有这个超越性，就谈不上成为肉身。正是这位超越一切的上帝进入人间，让人们为上帝的超越性所吸引、从上帝的超越性得到启示。上帝观每每决定人们的人生观。认识超越一切的上帝，不能不把超越的概念接受过来，成为人生的意义，成为在人们耳朵旁边不断催促的声音，催促人们不满足于他们的处境，要求人们超越现状、超越今天、超越自己、超越一切罪恶和一切黑暗、超越既有的成就，超越自己的命运。

在有些情况下，在有些人身上，基督教信仰的确起了一种麻醉作用。有人说宗教是鸦片，我们不能完全否认。但是基督教更重要的作用是超越，是引导人超越，引导人前进，引导人突破现状，进入更高级的人生。上帝不但内在于人间，内在于世界，内在于历史，他更是超越这一切的。这是基督教的上帝观，这上帝观不能不

影响我们的人生观。接受这样一个上帝观的人,迫切要求超越现状,决不消沉,正像先知耶利米说的:“我的肺腑啊,我心疼痛!我心在我里面烦躁不安,我不能静默不言。”可以说这是基督教上帝观种在我们心田里面的一个超越的冲动。

近来我们社会上道德水平下降,有些人为了得到钱、得到权,什么也做得出来。被批判了多少年的“人不为己,天诛地灭”,今天似乎又时兴了,又理直气壮了。据说,在有个地方,如果有人讲学习雷锋,会引起一片笑声。对这个,许多人很担忧。最近有好几个人对我说:“看来你们基督教讲的原罪,还有些道理。”

一个人接受原罪论,并不就是一位基督徒。原罪论就其本身来说,是一个令人悲观的观点。一个人接受原罪论,并且把原罪论按照逻辑推理推到它的最后结论,他要么就是放纵,要么就是自杀。原罪论不成其为基督教的福音。基督教让人认识一位拯救的上帝,一位消灭罪恶权势的上帝,一位超越的上帝。正是这样的一位上帝,在人们道德沦丧的日子里,使许多人不甘心随波逐流,而来归向基督、来接受拯救、来重新得力。

一个人能够有罪恶意识,承认自己是罪人,并不意味他是弱者。正因为他看到了上帝的高,才意识到自己的低,而这个低正是超越的起点,说明他听到了超越的呼召,接受了超越的挑战。

罪恶意识就是意识到并不是一切都很好,它应当升华而为忧患意识,就是忧天下之忧。只有以这个为出发点才能谈改善和提高。这就是说,感觉到心灵里的空虚,认识到罪恶的实在,害怕人生的虚度,渴望摆脱空虚感、无意义感,这一切不一定是消极颓废的,这一切正是超越现状,让生命得到解放和实现的前提。

南京师范大学有一位同学到苏北响水县作了调查。那儿有基督徒八千八百三十一人,他们大多同亲友和好,遵纪守法。有一个

信徒告诉他：“我信教前偷窃、打架、骂人、赌博样样都干，但信教后我再也不干了。”有一个乡原来集体的东西常有缺少，但随着人们信主人教，这一带东西就不再时常少掉了。有个法院一九八七年上半年民事纠纷二百三十八件，刑事案件五十八件，经济案件六十件，其中没有一件是信徒犯的。一位乡派出所所长说：“我工作九年，没有发现教徒作案进派出所的。”那儿提倡火葬，非信徒火化率百分之五十三，信徒百分之一百。上帝的超越性等等这些信徒可能听都没有听说过，但是他们信主之后，热心按照“非以役人，乃役于人”，“施比受更为有福”，“你们要完全，像你们的天父完全一样”等等的教导去生活和工作，实际上超越成了他们的动力。这怎么能不吸引更多的人来归向主呢？

不满足于现状，得到超越现状的动力，这解释了为什么基督教上帝观能够拨动人们的心弦，说明了基督伟大之所在，这也正是基督的降生和道成肉身令人神往的原因。

基督教是这样—个宗教：它使用大量的象征来保存历代信徒认为宝贵的想法、说法、做法。它并不要求我们在今天回到两千年前，用两千年前的想法去想问题。它要我们超越表面的形式，去探索隐藏在象征里面更深更多的意义而不被形式所禁锢。它要我们“心意更新而变化”，在老的象征中“察验何为上帝的善良、纯全、可喜悦的旨意”（罗 12:2）。

我们很高兴，今天比过去任何时候有更多的知识分子重视基督教的信息，有的对基督教持友好敞开态度，欣赏基督徒在邻居中间和在社会上的良好表现，有的欣赏基督教高举上帝超越性的上帝观，有的向这位上帝献身成为基督徒，有的则愿意做不受洗的、文化的、神学的基督的皈依者，我们都欢迎。本来，基督降生普世欢腾的声音不是清—色，而是多种多样、多色多彩的。

马丁·路德说过,基督降生在马槽里,但是,马槽里不但有基督,那儿也有稻草。让我们今天把这个话应用于教会。人们愿意在教会里只看见基督。让我们清除多余的稻草,彰显基督,使教会真正成为教会。这就是把我们结合在一起的共同目标。

在两位朋友婚礼上的致词

(一九九〇年于南京金陵协和神学院)

今天我们很高兴,在这里参加郑则初、张桂洁两位的婚礼。我欢迎大家到金陵神学院来。神学院近来举行过几次婚礼,都没有人讲什么话。今天有不少教会外面的亲友在这里,我得到新郎新娘的同意,先说几句话。

我想要说的是:基督教不是一个灰色的宗教。它不是一个出世的、否定人生的宗教。基督教不仇视人生的快乐和幸福。它不要我们板起脸过日子。它愿望人与人之间和好,这和好发展过程的其中一个高点就是两性相爱,各人把自己的心灵和身体献给对方。基督教认为这是美事。耶稣曾经参加朋友的婚礼。当酒喝完的时候,耶稣为主人解难,使主人能拿出更好的酒来,大大增加了婚筵的美满。“存天理,灭人欲”,那是宋明理学的教导,不是基督的教导。

在基督教看来,两性相爱,不是放纵情欲,不是互相包庇,而是互相激励,互相托住,互相提出更高的要求。

桂洁和则初是美术家。让美术把两人联结起来,这是很美的事。十八世纪法国大百科全书派狄德罗说过:

“使德行显得更可爱,
使恶行显得更可憎,
使怪事显得更触目,
这就是一切手中拿着笔杆、画笔或

雕刻刀的正派人的意图。”

现在我们就按照基督教的婚姻礼文来举行婚礼。这礼文已经在教会里用了一千几百年,在此我们看到教会的历史性和连续性。不是没有更动,例如过去要求新娘发誓顺服丈夫,现在没有那样的话了。

《金陵神学文选》序言

(一九九二年九月十一日于南京)

《金陵神学文选》得以问世,是一件值得高兴的事。

如果说神学是教会在思考,我认为《金陵神学文选》的确能在较大程度上反映中国基督教新教教会这些年间在思考什么,我们又是怎样在思考的。我们的神学工作理所当然地受到历史的、普世的教会的制约,但今天它不是模仿,它是中国基督徒针对中国教会自己的问题的思考。海外神学家的旁听和指教我们当然是欢迎和感谢的,但他们不再是是非的标准,而中国基督徒则既是神学要提高其信仰素质的对象,同时又越来越从旁听和消极接受地位转而为对话的积极参与者。

这三四十篇文章并没有接触到中国教会思考的所有神学问题,但从这里已经多少可以看出,这些年中国教会的视野和思考范围比较局限。国际神学界的一些热门,诸如教会体制方面的问题、《圣经》观方面的问题、历史观方面的问题、国际和平和社会正义方面的问题、妇女解放的问题、现代生活中的两性、家庭和环境、生态方面的伦理问题,如此等等,在我们这里想得较少,甚至还是空白。世界任何一个教会在任何一个时期的神学思考也都会有局限性和空白部分的,中国并不例外。这正告诉我们,普世教会提供条件让我们相互交流,相互弥补和互相丰富有多么必要。

就中国来说,神学思考未免局限除一般原因之外,我想和下述情况很有关系:我国基督教的全国以至各级组织的团结面比许多

其他国家和地区的基督教联合会或协进会都广泛得多。它们包括范围之大是空前的。为了保持这么大的团结面,全国基督教在信仰问题上和崇拜礼仪上遵循和强调互相尊重的原则。我国基督教中轻视甚至否定神学思维和神学教育的价值的人并不少,他们也在我们团契之内。为了团结,神学思维和表达的随意性受到一定的自我约束,形成照顾有余而创新不足的情势。可以说,这是为了团结支付的代价,但弄不好会造成神学思想的冻结。苏轼曾以“出新意于法度之中”赞扬画家吴道子。我们的经验是,教会为了安宁相处,每每强调“法度”,“新意”就出得少。如果我的观察不错,看来其他国家的教会也难免面临类似的情况,就是神学上的创造性同团结面的大小形成反比。

这一点是实在的,但我也不愿读者把这一点夸大到不恰当的地步。原因是中国神学工作者十分意识到自己对广大信徒有教育和提高的责任,为此,他们本来就不愿意不顾效果但求自己说得痛快,那样自由就成了由自。他们平时不以海外同行为自己的听众和对话者。他们谦卑自己,与中国信徒相认同,相交流,以他们的问题为自己的问题,以能帮助他们从原有水平不勉强地提高为喜乐,脱离信徒的惊人之言宁愿不说。

从大的环境来看,我国基督徒一百几十年来始终处在极少数地位,被非基督教的以及敌视基督教思想和势力从四面八方包围着。新教人数至今不到人口的百分之一。我国仍有那种以激进自命,与宗教为敌的人,不时在这里那里抬头,利用一些新运动和新口号的声势,制造加罪宗教的舆论。在这样的形势之下,我国宗教信仰自由政策尽管贯彻得不够平衡,但有这个政策同没有这个政策相比,大不一样,对基督教的存在和运作大有好处,至少使基督教赢得时间实现自治、自养、自传,进而努力治好、养好、传好,能

在一个较为有利的条件下与同胞相见。这就是为什么我们坚持，只要教会在这块大陆上能有空间向主献上崇拜、向人们为基督作见证，宗教政策和其他政策的贯彻有对话的余地，我们就应以感谢的心怀享受和利用这些机会。海外有些人似乎认为转入地下进行对抗和准备殉道才是中国教会正确的路线，这在今天情况下是对主的教会和信徒不负责任、对祖国也是不顾安危的盲动，是广大信徒所不同意的。不过，教会处在这样的境况下，相当一部分信徒会自觉或不自觉地倾向于简单地突出基督救赎之道为教会独特信息而不及其余，也是可以理解的。

经过这么许多年，中国基督教已经形成一个中国的系统神学吗？我只能说还没有。不是没有个别有抱负的人进行尝试，但作品完成后有多少代表性是很大的问题。我说下面的话也许是“自我解嘲”：保罗面对各地新兴的教会忙于探访和写信，从神学上只处理一时一地的紧迫问题，至于他的系统神学，由后人加以整理出来不迟。

但这不是说中国基督教四十年间杂乱无章，一个相当共同的神学倾向也没有出现。我想，中国教会神学思考的一个中心观点正在形成过程中。一个为越来越多的基督教知识分子，特别是他们中的中青年，所认同的中心思想就是宇宙的基督。他在上帝的创造过程中始终与上帝同工，是神爱的启示者，是以他全能的命令托住万有的复活之主。

我们之所以说这位基督是神爱的启示者，那是因为我们读了四福音，基督对人们那种爱到底的爱留给我们的印象太深了。他使我们体验到，他向人类展示了宇宙间最高存在的存在模式。这一最高存在的属性，首先不是他的强力或他的无所不能、无所不知、无所不在、自在永在、威权能等等这些把人们压倒的属性，而

是那爱到底的爱。爱是宇宙的第一因素,是创造的第一推动力。一个爱的宇宙正在被创造。爱将充满宇宙。我们都是这创造过程中的半成品,也是创造工程中的同工。我们凭人间父亲、母亲、恋人的爱去憧憬测度这一最高存在,学着基督称之为天上的父。

我们越来越摆脱基督人性神性的繁琐论争,在人性神性问题之外,从基督的宇宙性上得到神学思想的解放、深化和共融。基督的宇宙性正是《歌罗西书》、《以弗所书》、《约翰福音》等《新约》书卷所提供的基督观,它是一个内涵十分丰富的概念,能大大突破传统思维的禁区,丰富基督徒的崇拜和灵性精神生活,更能冲击宗教偏见,导致信徒间的信任和团结。我并不是说“宇宙的基督”这五个字已经进入了广大神学工作者的词汇,但是可以说,越来越多的基督徒正在通过不同的途径遇到这位基督,正在用各自不同的语言帮助人们来认识和崇敬这位基督,并正在被这位基督非以役人,乃役于人,为人赎价的博大而无上的爱心所带动,去进入世界,发挥光和盐的作用,以造福人群。这样,个人的生命就和天地宇宙相酬和了。

就中国知识界来说,我们不少人有个共同感觉,认为今天知识界对基督教比基督教进入中国以来的任何时期都更为开放,具有较大的好感和同情。金陵协和神学院图书馆就有一百多种近十年教外学者研究、介绍和欣赏基督教的书籍和他们主动翻译的西方神学著作。估计《金陵神学文选》将会引起相当一部分教外知识分子的注意和兴趣。

我想在这里提出一点以供他们参考。常有教外朋友表示,基督教和教外的人都是中国人民,都是爱国的,也都是拥护社会主义的,不同处不过是多了一个死后上天堂的信仰。这些朋友这样说是为了表示,基督徒和广大人民之间没有一条鸿沟;肯定基督徒为

我国统一战线的一部分,从而维护宗教信仰自由政策,反对宗教歧视,对此,我们基督徒当然是感激的。同时,我们当然也同意,的确有仅仅为了死后上天堂享永福而修持灵魂的基督徒。但是,值得指出,就基督徒的多数来说,关心生前远远超过关心死后。他们和常人一样,得生活,得工作,得学习,得建立和照顾家庭。他们有理想,追求真善美。既然如此,他们必然关心人世间的事。我想《金陵神学文选》的读者会发现,这些文章没有把基督教信仰说成为死后上天享受福乐的人场券。在一些不大时兴又不大好改的语言背后,它是一个宇宙观、世界观,一个精神文化,它指导人们观看人生,投身现实,并且通过教会共同体使自己也使人们进而获得基督所说的“丰富的生命”。这些文章显示,基督教旨在帮助人活,活下去,活得好,没有了这一点,教会人士也在统一战线之内云云就无从谈起了。前几年某社会科学刊物曾发表文章认为信教的人只想上天,活在地上“浑浑噩噩”,“目不敢视五色,耳不敢听五声,经典上没有的连想都不敢想”,硬说信徒认为“改善物质生活的合理要求”是“灵魂犯罪的根源”。之所以会这样刻画宗教,大概是因为作者从来没有同宗教信徒交过朋友。

《金陵神学文选》由金陵协和神学院陈泽民、汪维藩、张贤勇同工编辑。为他们投入的劳动我们深为感谢。就在《文选》的各位作者之间,观点也不是统一的。我们希望《文选》的出版将有助于思想交流,促进我国神学园地的繁荣。

创造和救赎

(一九九五年在南京金陵协和神学院的讲话)

有一位不认识的信徒写来好几封信,指出《信徒问答》里“世人都是上帝所生的”这句话说错了,应当说的是“世人都是上帝所造的”。我理解他的意思是:上帝把人分为两个等次,一般人不过是上帝所造的,因信得蒙救赎的才是上帝所生的。

我对于《圣经》字义没有多少研究,只感觉,论到人,说生或说造不是一个大问题。在谈基督的时候,《圣经》的确说,他是父所生的独生子,说他是首生的,不是被造的。《尼西亚信经》也有“是生而非受造”的话。但论到人,《圣经》说得较多的固然是“造”,例如说“上帝造人”,但说“生”的也有,例如《使徒行传》第17章第29节:“我们既是上帝所生的”(当时保罗是在亚略巴古向雅典敬拜未识之神的人讲话),又例如《约翰一书》第2章第29节:“凡行公义之人都是他所生的。”

我的意思是,对基督,说他是上帝所生的独生子而不是受造的,有其必要,可是对于人,把基督徒说成为上帝所生的,把非基督徒说成为上帝所造的,没有必要,而且有害,《圣经》上也没有提供明确的根据来强调“生”和“造”的区别。强调这一区别,会造成神学上的困难。现在通常有人说,人都是上帝的儿女,我想我们大可不必去反对,不必去说:“不是的,你们教外的不是上帝的儿女,我们信主的才是。”这样不利于引人归主,而且引起一个问题,如果上帝只把信他的人作为儿女,给他们永生,那么,他不断造出广大人

群,其中大部分因为不认识基督而最后成为地狱之子,这还是一位可信爱的上帝吗?

我想这里存在一个怎样把创造和救赎统一起来的问题。这位信徒把世界分成两个部分,一部分是上帝所造的,像矿物、植物、动物,像花草树木、飞禽走兽,像自然的人,都是上帝造的。对这些,上帝似乎没有多少感情,今天造出来,明天就过去,其中的人甚至将去忍受永刑。另一部分是上帝所生的,比受造高了一级,是被挑选的,在受造之外又得到基督的救赎。在这位信徒看来,生与造是不能混为一谈的。他显然把创造和救赎分得很清楚。我推测,他可能是这样看的,上帝是创造之主,基督是救赎之主,他们各搞各的。

这个神学思想有其典型性。这一思想发展下去,就会演化出这样一个看法:世界固然是上帝所创造,但创造早已停止,世界已经被撒旦所接管,所占据,世界是撒旦统治的地区。基督来到世界,好比是深入敌占区,把能抢救到的人尽量抢救出去。不少基督徒的世界观就是这样。

把救赎和创造对立起来,把救赎主和创造主分家,只重视救赎,不看重创造,圣父和圣子是分裂的,他们各搞各的,这种破坏三位一体的观点,教会史上早就有了。有的甚至把创造主和救赎主说成为两个相反的神,这是到了极端。我们这一位仅在“造”和“生”两个字上做文章的信徒,看来还不像已经走得那么远。

《歌罗西书》第1章第15至20节讲得很清楚,基督既是救世主,又是创造主。这段《圣经》一方面说,他是教会全体之首,藉着他在十字架,成就了救赎,另一方面说,万有都是靠他造的,他在万有之先,万有也靠他而立。《以弗所书》第1章第22、23节也同样说,基督既是万有之首,是充满万有的,天上地上一切所有的在基

督里面同归于一。又说他充满着教会,教会是他的身体。我们不要只看到基督和教会的关系,也要看到基督和创造的关系。《约翰福音》也讲得很清楚:万物都是藉着他造的,凡被造的,没有一样不是藉着他造的。《希伯来书》指出,基督藉着他权能的命令托住万有。上帝藉着他所进行的创造,一直进行到今天。创造没有失败,没有输给撒旦。尽管约翰说过“全世界都卧在那恶者手下”(约壹5:19),这只是指出罪恶的猖獗,要读者同罪恶划清界限,不是提出基督教的完整世界观。保罗在《提摩太前书》第4章第4节说了:“凡上帝所造的物,都是好的,若感谢着领受,就没有一样可弃的。”《新约圣经》承认基督的创造,也承认他的救赎。是同一位基督,不是两位,创造和救赎是统一的,不是对立的,不是有两位不同的上帝各管各的。

今天,我们欢送一批同学离开母校进入教会工作,其他同学也会在一年、二年、三年之后到教会工作。我们去一个国家要知道国情,我们进入教会,也应当知道教情。我愿意这样来介绍一个方面的教情,希望大家能够同意,至少不要急于反对:中国的教会在神学思想上偏向了一边,就是只高举了一个教义,就是救赎的教义,很忽视甚至完全忽视创造的教义。文艺界从前有个“一本书主义”,就是有的作家写了一本书,一举成名,从此就不写别的了。中国基督教似乎只有一个教义,就是得救,死后上天堂。有那么多丰富内容的基督教只剩下了这么一条。

几个世纪以前,托马斯·阿奎那提出,恩惠决不否定或取消自然而是成全自然,或说把自然带到完全的地步。这可能是阿奎那所讲的最有名的一句话。恩惠和自然的关系问题就是救赎和创造的关系问题。这是中国教会没有很好解决的问题,没有解决的最明显的标志是许多人加入教会仅仅是认为相信耶稣可以使自己得

救和得福。

《罗马书》第8章告诉我们，一切受造之物一同叹息劳苦，直到如今。这就是说，创造还没有完成，世界和其中的人都是上帝创造工程在进行中出现的程度不同的半成品。救赎的对象不仅是若干个人。整个受造之物以至整个世界都是基督救赎工作的对象。我们这些半成品的任务就是做上帝创造工程的帮手，在帮助这工程的同时使自己越来越从半成品变为成品。创造包含救赎，救赎是为了完成上帝的创造。

有人向《天风》信箱提出一个问题：信教的人可否吸烟？意思就是基督徒吸烟最后会不会影响他得救？会不会下地狱？可是许多涉及怎样对待创造的问题，我们头脑里很少想到，或者完全想不到：为什么用那么许多农田种烟叶？用许多农田去种烟叶，甚至种鸦片，是不是善用自然，是不是符合上帝创造的意愿？更进一步，西方国家国内吸烟的人越来越少，而烟叶却不少种，香烟都往第三世界国家出口，像中国今天许多人都在吸美国香烟，对此基督徒是赞成？是反对？是无所谓？这样的问题都大大超过了个人可否吸烟以及个人得救得福的问题，都同千千万万人的祸福相关，是伦理道德问题，都是基督徒理应关心的。扩大信徒关怀的范围，指导信徒从信仰出发，考虑一些超越个人祸福的伦理道德问题，这我认为提高我国基督教教会素质之道。关心救赎，就得关心这些。

上帝藉着基督进行的创造正被人破坏，被人糟蹋。战争使几十万、几百万、几千万人生灵涂炭，家破人亡，流离失所。地球生产的粮食足够养活全部人口，但是由于人的自私、贪心，每年有多少人饿死。我想我们都看到过地球上有些地区大人小孩瘦得只剩骨架，很快要死的照片。这上帝的世界，人没有好好去看守、保护，只知砍伐树木，燃烧木材和油料，破坏生态平衡，最遭殃的是第三世

界。这种少数人为了自己利益拆掉地球,剥夺广大人民维持生存和享受美好生活的权利的行径,花样层出不穷。拿更近的来说,今天中国社会上贪污浪费,以权谋私,也够多了。一个对一切熟视无睹,认为这一切与福音无关,认为福音只讲个人得救得福的基督教,不是两条腿的基督教,是一个瘸腿的基督教。

中国大面积的基督教只讲个人得救得福,对世界没有道德信息,而《圣经》用大量篇幅讲的正是贫穷的问题,显示一位特别偏袒穷人的上帝。美国一本刊物作过统计,《圣经》每十六节就有一节讲贫穷和财富的问题。《旧约》先知多么高举社会正义和社会公义。现在听讲道,绝少听到牧师讲《旧约》先知或基督的登山宝训,基督教成了一个非道德、无道德的宗教。现在世界上正在发生那么许多违反上帝创造世界的本意的事,对这一切基督教说与我无关,基督教甚至限制上帝管治的范围,传讲一位只管信徒个人灵性,只管教会,不管世界万事的上帝。这岂不近似上帝创造了世界,已经让位给撒旦这么一个上帝观和世界观吗?

我希望金陵的毕业生到教会工作的时候把一个基督教的完整的上帝观、基督观、世界观、《圣经》观带去,在适当的场合,在适当的条件下,用适当的语言,按照《圣经》的教导,加以传扬,从而提高我们教会的素质。大家记得主耶稣在被钉十字架的时候,有人说,他能救别人,却不能救自己。这是讽刺的话,但至少有一点是真实的:基督不求自己得福,他为世人牺牲自己。可是今天我们正相反,我们只顾救自己,把教会看成诺亚的方舟,上去了自己的福分就有了,至于别人,他们的穷和他们的苦与我无关。

基督的福音不光是个人得福,甚至完全不是个人得福。个人得福,仍然还是满足个人的私欲。基督的福音包括配合上帝的创造,更新这个世界,使这个世界符合上帝藉着基督创造它的美意。

这就要求教会发出道德信息。主耶稣自己说的：“人子来不是要受人的服侍，乃是要服侍人，并且要舍命，作多人的赎价。”请注意这里说的是“并且”两字，不是“不过”，不是“但是”，这就是说，舍命救赎人和服侍人不是对立而是统一的，舍命作多人的赎价统一于服侍人，包括在服侍人之中，舍命作多人的赎价仍旧还是服侍。让我们带着帮助上帝实现他的创造的思想去服侍人群，在服侍之中彰显救赎之主舍命为人的伟业。

不论同学们去到哪里，祝愿主与你们同在，使你们把基督所包含的真善美和一切丰盛整个彰显在人们面前，用美好的见证吸引人们认识基督。

在九五届毕业典礼上的讲话

(一九九五年七月五日于南京金陵协和神学院)

关于人和上帝的关系,《圣经》里有许多类比,最常见的也是我们最熟悉的,是羊和牧人的关系,此外还有仆人和主人的关系,儿女和父母的关系,泥土和泥工的关系,小鸡和母鸡的关系,花草树木和庄稼人的关系,如此等等,《圣经》提供的类比很多。

犹太民族有畜牧业背景,所以羊和牧人的关系提到得最多。《诗篇》第 23 篇说“耶和华是我的牧者,我必不致缺乏,”《诗篇》第 95 篇说“我们是他的民,是他草场上的羊。”耶稣曾讲到一个人有一百只羊,失去一只到处去找,找到了扛在肩上,回到家里,同朋友和邻居一同欢喜。

牧人所要求于羊群的是要羊群顺服,听命令,依头顺脑。在驱赶羊群的时候,牧人口里不断斥责,他手里拿着杖和竿管住羊群,不让一只羊离群走失。羊没有多少自觉,要它走到哪里它就走到哪里。能这样服从,拿羊来说可以算一只好羊。但是拿人来说,服从未必是所能达到的最高德行。一个只会服从命令的人,也许能算为一个好的奴隶,但不能算是一个有较高德行的人。

中国是一个有几千年农业文化的国家,大概因为我是一个接受了中国文化教养的中国人,我更喜欢《圣经》把人和上帝比作花草树木、麦子庄稼等植物和庄稼人的关系。庄稼在农民的栽培和阳光雨露的滋润下欣欣向荣,成长起来。这成长的过程是人同羊不一样的地方。在四福音里,我们读到耶稣关于撒种的比喻、果树

的比喻、百合花的比喻、芥菜种的比喻、葡萄园的比喻、无花果树的比喻,这些花草树木的生长,不是靠庄稼人不停的斥责,不是靠庄稼人拿了杖竿去敲打。庄稼人要松土、撒种、浇水、施肥、除虫、拔除杂草,做这些耐心的工作。他不能拔苗助长。在做了一切应做的事之后,他就得耐心等待,让阳光雨露起作用,让大自然完成它成长的过程,最后得到一个好的收成,结果“有一百倍的,有六十倍的,有三十倍的”。所谓“十年树木,百年树人”,就是告诉我们,有一个成长的过程,一个更新而变化的过程。

我讲上面这许多话,无非想要说明,中国基督教广大教牧同工,特别各位毕业同学进入教会以后,该做怎样的传道人。我们是牧师,是奉上帝的名去牧养人的。但我们要做好的牧人。我们所牧的不是真的羊,他们是人。耶稣说过,“人比羊何等贵重呢”(太12:12)。我们不要总是拿杖和竿去驱赶人,去打击人。

好牧人应当像一位好的庄稼人,以十年树木,百年树人的心志去帮助信徒成长。在这个意义上,他是一位教育者,一位艺术家,正是我们和上帝这创造之主合作同工,使人从原始粗糙的状态提高而为半成品,最后成为成品的过程。艺术家或雕塑家在不需要他加工的地方,他就不去加工,凡不需要的,一笔也不去增加,让自然的美在艺术品里表现出来,并且保持下去。凡神交给我们去看顾的每一个人都是上帝创造工程中的半成品,或还没有完成的成品。他们都有他们的神圣性,不容我们不去尊重,不容我们任意对待。

中国是一个文化教育不够普及的国家。我们身为有文化的人,我们没有权利为所欲为,我们必须尊重我们的同工同道。我们的堂点应当成为民主的学校,在这里大家得到民主生活的经验。一切由牧师说了算,牧师成了一个堂点的“老板”,这是不健康的。

牧师应当鼓励信徒参与堂务的决定,成为堂点的主人翁。如何做一个好的领袖,既是领袖,又实行民主,这是我们要学习的功课。特别因为在我们的处境中,独断专行的试探是很大的,我们很容易发展独断专行。

长期以来中国是一个封建社会。封建社会尊敬长者,那是好的。但是封建社会推行家长制,一切由一个人说了算,经济权、人事权都控制在这个人手里,这叫独裁,而独裁不是基督教的特征。

我们中国基督教今天的一个大问题是,在不少地方权力过于集中于个人。我们日常收到的许多来信都反映这一问题。不少基层教会经济多少年都不公开,不报告,人事也没有改选,全由牧师委任,而有些牧师实行的是“顺我者昌,逆我者亡”的人事路线。在这样做的地方一切智慧似乎都属于牧师,牧师是无所不知的,而群众是什么也不懂的“群氓”。基督的教会不能这么来办。在基督的教会里,像十年树木,百年树人那样,人人要成长,信徒要成长,牧师也要成长,一同进入基督里面,享受基督的丰盛。

我们特别需要重视妇女信徒的成长,培养她们的自信心。现在教会里男女不平等的现象很多,妇女信徒受到歧视,受到排挤,她们有的人自己还不觉得。我们要保护妇女,让她们在教会里有较大的发言权,参加到领导层之内。

实行独断专行的地方,信徒感到压抑,敢怒不敢言,但这只是表面上的一时的太平,许多人心里不以为然,到一定时候会爆发的。

没有病的人用不着医生。我想教会可以比作一所很特别的医院。在教会这所医院里,牧师和信徒人人都处在上帝创造过程之中,都是上帝创造工程中的半成品,人人或多或少是病人,同时人人也或多或少是医生。

民主不仅是在表决选举的时候少数服从多数。民主是一种做人的态度,和人相处的态度,它是一种作风。

最近全国政协通过《关于政治协商、民主监督、参政议政的规定》。这三项就是社会主义民主,一是解决问题要协商,二是行使权力要接受监督,三是群众要参与。我想整个社会以至我们教会也应当这样:一、凡事要协商,不由一两个人说了算;二、要监督,哪里有权力,哪里就该有监督;三、让群众参与讨论大事。这就不是把教牧人员看作超人或把群众看为笨人,而是让大家走向成长的道路。

我希望随着金陵以及其他神学院校一批一批同学进入教会,把民主作风带去,使教会成为平等、团结、友爱的教会。母校在物质上不能给你们多少支援,但是我希望,在思想上、精神上你们不要同母校脱钩,而是保持主内团契关系,在各自的岗位上团结信徒,爱国爱教,一同前进。

我们希望中国教会因为有一批一批新一代的同工陆续参加到同工队伍中去,越来越成长起来,成为主心爱的教会。

谈基督徒一个思想深处的问题

(一九九六年在五个宗教东北座谈会上的发言)

作为一名主教,又是基督教全国两会(中国基督教三自爱国运动委员会和中国基督教协会)的主席和会长,我经常收到全国各地教会人员的来信。有些来信者表示,不问一个人道德如何,信者死后上天堂,不信者死后下地狱,并说这是上帝的“公义”,这一信念令他(她)们焦虑,内心不得平安,又不敢轻易拿出来同人谈。

我愿意把它拿出来谈一谈。

“义”本来是一个伦理道德概念。我们从小就知道,我们在世界上应当行出仁义来。但是犹太教里那些假冒为善的文士法利赛人(耶稣多次斥责他们为假冒为善),为了欺侮老百姓,证实他们的不义,给“义”这个字定下了许许多多常人办不到的律例和规条。例如十条诫中守安息日这一条,本来是一条具有人道主义精神的诫命,让人七天中有一天可以休息,也可以纪念上帝,但是法利赛党作出许多严格的规定来束缚人:在那天必须停止一切活动,连在那天许可走多远的路也有规定(有一派说只许走丢一块石子那么远的路),收麦子也是禁止的,羊掉在井里也不许救上来。据知这种规定有的法利赛教派有几千条之多,奉行了就算是义人,否则就是违犯了守安息日的上帝诫命。耶稣反对法利赛人,说“他们把难担的重担捆起来,搁在人的肩上”,他们自己“能说不能行”。保罗忠于耶稣,他在《新约圣经·罗马书》和《加拉太书》中提出因信称义,正是为了要把人们从这些束缚中解放出来,让人性得到解放。

保罗提出因信称义的道理,让人们摆脱法利赛人关于割礼、守安息日等等所定下的不人道的繁文缛礼,基督福音才能突破犹太教的框框,得以传给地中海一带犹太人地区之外的外邦,基督教才能从犹太教中的一个小小支派,演化成一个世界宗教。

中世纪欧洲天主教也是束缚人的。当时欧洲天主教把森严的教阶制度强加于人,并且推行卖赎罪券制度。信徒家里死了人,家人很难过,教会渲染家人可以出钱,向教会买赎罪券,越多买越能缩短死者呆在炼狱里等待的这段痛苦时期。为了抗击这种欺压老百姓的制度,马丁·路德在保罗之后又一次高举因信称义的旗帜。他们创立的教会,一直到今天称为“信义会”。

所以,从历史上看,保罗和马丁·路德这样的宗教先进人物提出因信称义,都是为了伸张正义,反对宗教当局的黑暗势力,纯洁宗教,简化宗教,为人民争取自由。可见因信称义原来有进步的意义,它是一面解放人的旗帜,目的绝不是把人送进地狱。

时至十九世纪、二十世纪,许多外国传教士来到我国,他们之中不少人急于吸收中国人信教,把因信称义和天堂地狱联系在一起。我国不少人也因为上天堂心切,跟着接受,因信称义的信息就变了样:上帝不问你有没有仁义的行为,不问你是自私了一生还是为了大众服务牺牲,只问你生前信了还是没有信。如果生前信,那么不管你多么自私害人,卖国卖友,死后还是进天堂享受永福,而如果生前不信,不管你为别人为社会作过多大的贡献,死后必送人地狱,那儿有永远不灭的火。他们鼓吹道德无用论,说上帝看中人的善行。他们就是这样否定了福音的伦理道德内容,把上帝说成一位自私的(信我就好,不信就恶)不分是非善恶的上帝。这当然不是《圣经》的上帝观。

现在我国基督教有越来越多的信徒觉得这种只讲信不讲行的

观点难于接受。像一位牧师一封来信中告诉我说：“我的良心不允许我再宣讲不信的人死后下地狱的话。”原因很简单，他看到不少没有接受基督福音的人，像张思德、雷锋、焦裕禄等等，表现出舍己为人的品格，为他人不惜牺牲自己的生命，他们是高尚的，我们怎么忍心说他们今天是在地狱里呢？

对这些给我来信，不怕把他（她）们深藏内心的信仰上的疑难坦率向我诉说的同工同道，我抱的是同情、理解的态度，而不是谴责的态度。

我相信，基督所彰显的上帝是一位爱的上帝。在上帝其他一切属性之上和之先，是他的爱的属性。这一上帝观不允许我把他看得如此残酷粗暴，竟然会把千千万万的人一一送入地狱永火。我们一个大城市里仅仅一个妇产医院一天二十四小时就会把多少新的生命迎入人世，父母的喜悦是难于描述的。上帝明知世人中的大多数生前不会成为信者，却每时每刻仍旧在把新的人创造出来。如果其中大多数几十年后等待着他们的是地狱永火的话，这就不是爱的上帝了，这更像是我国民间信仰里令人害怕的阎罗王了。我们基督徒是不是受到了这种信仰的影响，才会这样去想象我们的上帝？

科学家爱因斯坦指出，从惧怕的宗教发展为道德的宗教是宗教演化史上前进的重要的一步。

《圣经》中四本福音书（马太、马可、路加、约翰）都是讲耶稣生平，从其中我们得知，耶稣谈吐中有时虽然也讲到天堂、地狱，但是请读一下《马太福音》第25章中这一段经文：

当人子在他荣耀里同着众天使降临的时候，要坐在他荣耀的宝座上，万民都要聚集在他面前。他要把他们分别出来，好像牧羊的分别绵羊山羊一般，把绵羊安置在右边，山羊在左

边。于是王要向那右边的说：“你们这蒙我父赐福的可来承受那创世以来为你们预备的国，因为我饿了，你们给我吃；渴了，你们给我喝；我作客旅，你们留我住；我赤身露体，你们给我穿；我病了，你们看顾我；我在监里，你们来看我。”义人就回答说：“主啊，我们什么时候见你饿了给你吃，渴了给你喝？什么时候见你作客旅，留你住，或是赤身露体给你穿，又什么时候见你病了，或是在监里，来看你呢？”王要回答说：“我实在告诉你们，这些事你们既作在我这弟兄中一个最小的身上，就是作在我身上了。”王又要向那左边的说：“你们这被咒诅的人，离开我，进入那为魔鬼和他的使者所预备的永火里去，因为我饿了，你们不给我吃；渴了，你们不给我喝；我作客旅，你们不留我住；我赤身露体，你们不给我穿；我病了，我在监里，你们不来看顾我。”他们也要回答说：“主啊，我们什么时候见你饿了，或渴了，或作客旅，或赤身露体，或病了，或在监里，不伺候你呢？”王要回答说：“我实在告诉你们，这些事你们既不作在我这弟兄中一个最小的身上，就是不作在我身上了。”

可见在最后审判的时候，上帝不是问你曾经信或不信，他是看你对贫困无告的人们抱什么态度。这就是说，上帝关心的是伦理道德。我们的上帝的心胸是那么宽广，那么富于爱心，他不会因为有些人没有信他，就把他们抛入地狱。

这是一段十分重要的经文。我国基督教至今有人不重视这段经文，读到这段《圣经》轻轻翻过。我国四十多年无数人们在努力从事的正是拯救贫苦无告的人们的一项大工程，要使他们摆脱贫困，进入小康，再进入富足，这不正是同这段《圣经》相一致的吗？我们基督徒在这方面要多多努力才对。

在整本《圣经》里，从《旧约》到《新约》，高举伦理道德的经文极

多极多。十条诫命中的六条讲的都是伦理道德。全部《箴言》都是“劝人为善”的。耶稣说：“人子来不是要受人的服侍，乃是要服侍人，并且要舍命，作多人的赎价。”（人子就是指耶稣自己。）这里，耶稣没有把救赎和服务对立起来。他说的是“并且”不是“但是”，意即为众人舍命也还是服务。我们不应当用救赎去否定服务。在礼拜堂的讲台上，在神学院的课室里，我们要根据《圣经》多多宣讲全面的福音。

基督教有许多教义，因信称义之外，有上帝是爱，有上帝永不停止的创造，有道成肉身，有基督复活更新万有，有圣灵降临赐人智慧，有登山宝训，有最大诫命就是爱上帝和爱人如己，有你要人怎样待你，你也要那样去待人家，有非以役人，乃役于人。保罗说，如今常存的有信、有望、有爱，这三样，其中最大的是爱，可见爱德高于信德。这些岂可弃之不顾？《圣经》的信息是极为丰富的。现在我们如果只推崇一个教义，讲这教义又不顾先人提出时的历史背景，被我们用来渲染信与不信的矛盾，势必破坏人民的团结，引起无穷的分裂，这样我们还能作出什么见证？

高举道德是基督教以及其他宗教的优势之所在。中国是文明古国，是道德礼仪之邦。特别是对中国知识界来说，讲伦理道德比讲天堂地狱更令人欣赏，令人愿意听听宗教有以告人的信息。

为汪维藩同工作品所写的序言

(一九九六年七月十四日于南京)

我十分高兴应邀为汪维藩同工的《中国神学及其文化渊源》写序言。

第三世界基督教不少神学家有一个通病,就是他们的神学思考和神学写作每每以西方国家神学家作为听众。他们熟悉西方神学家超过熟悉自己本国沉浸于本国文化的信徒。他们的神学著作每每是用外文写的,如果在本国出版,还得翻译为本国语言。我认为这是殖民主义留下的遗迹。道成肉身需要马利亚作为母体,中国神学需要中国文化为其母体。汪维藩同工通过这一作品所介绍的既是基督教神学,又是中国文化。这是一本紧紧扣住中国民族文化的中国基督教思想史。

由于不必在此追究的原因,我国基督教实际存在的“大众神学”突出一个“信”字——信就是好,今世可以享受种种福分,死后可以上天堂;不信就是不好,不管为人民作出多大的贡献和牺牲,还得下地狱。这决不是基督的爱的上帝观,这是阎罗式的上帝观。汪维藩同工在这本书里不以信与不信为焦点。他在基督教神学和中国文化之间找到的会合点是“生”：“自强不息,生生不已,借助天力,有所作为。”这就为我国基督教三自爱国运动的自传指出了一个路向。“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福音不是教我们做弱者。“认识上帝的子民必刚强行事”(但 11:32)。

汪维藩同工是刚强的。他带着病,在金陵协和神学院负担大

为汪维藩同工作品所写的序言

量工作。他的思想为许多理解他的人所欣赏和欢迎。我们在共同上下求索的道路上能有这样一位同工,值得引以为幸。

回顾与展望

(一九八〇年十月六日于南京在中国基督教
第三届全国会议上的开幕词)

中国基督教全国会议已经好久没有开会了。今天我们能够共聚一堂,这是我们全国人民反对并粉碎了“四人帮”的结果;是四年来拨乱反正、实现安定团结的结果;是全国信徒三十年来坚持爱国爱教,坚持教会自治、自养、自传的结果;是全国各地许多同工同道在十年浩劫中得到基督的保守,坚持信仰,坚持主内团契,坚持为教会祷告的结果;归根结底,是我们天上的父、永生的上帝、慈爱的神引领、祝福、赐恩的结果,因此,我们大家都以感谢的心怀来参加这次会议。

在粉碎“四人帮”以来的四年时间里,特别在筹备这次会议的几个月里,全国很多教牧同工和信徒都在瞻望未来,都在思考、讨论:今后中国基督教该怎么办?全国三自常委会曾经在今年二月底开过一个星期的扩大会议,讨论的就是这个问题。特别是那个会议三月一日发出《告全国主内弟兄姊妹书》以后,全国各地信徒更加关心这个问题,提出了大量的意见和建议。

大家有个深切的体会:现在的确不同于解放前了,中国基督教该怎么办是我们自己的问题了,由我们自己作出决定,不是由海外来人代我们作出决定。大家发挥主人翁精神,讨论非常热烈,教会独立自主实在是做到了。大家感到十分高兴,受到莫大鼓舞,觉得三自爱国运动极为宝贵,中国基督教事业大有希望。

特别值得指出,尽管大家分散得那么远,又是那么久没有见

面,这些年又有许多不同的经历,海外反华势力又在不断挑拨离间,可是大家在一些重大问题上的看法竟然非常一致,真可以说是“意念相同,爱心相同,有一样的心思,有一样的意念”。如果不是圣灵在工作,使我们在基督里相通,又有什么其他办法来解释全国信徒能够这样同心合意呢?

我现在要做的不过是把大家的意见集中一下,以便我们今后几天进一步讨论。

我想可以把所要说的归纳为三句话:(一)三自成就巨大,(二)三自任务未了,(三)教会不但要自办,而且要办好。

(一)三自成就巨大

基督教要实现三自——自治、自养、自传,早在解放以前就有若干传教士和中国教会领袖提出来了,可是在全国范围真正实现三自,那是在解放以后才有的事。中国人民长期受到封建主义的压迫,十九世纪以后,又受到殖民主义、帝国主义的压迫,中国人民有反帝反封建的传统,而基督教正是在西方殖民主义对中国人侵的时候,在西方列强保护下传入中国的。中国人民痛恨不平等条约,而外国人的传教权正是靠不平等条约强迫中国接受的。这么一来,原来那么好的基督教从它传入中国那时起,就难于为中国人民所接受,因为它像是列强侵略机器上的一个部件似的,同殖民主义、帝国主义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三座大山长期压在中国人民身上,传教士和中国教会领袖同情和支持中国人民解放事业的固然也是有的,但总的来说,基督教大体上没有站在中国人民解放事业一边。就我们不少人来说,因为接受了那样一个基督教,我们的民族观念的确淡薄了,我们不同自己的人民想在一起了,我们好像成了半个洋人。所以当时中国有的老百姓有一句痛心的话:“多了

一个基督徒,就少了一个中国人。”这话不是完全没有道理。那时大家把基督教称为“洋教”,对它反感很深。特别在解放前后,基督教里面反共反人民的声浪格外高涨。在这样的情况下,中国基督徒和祖国人民缺乏共同语言,基督的福音怎么能传得开呢?当时,中国是西方差会花钱最多、派遣传教士也最多的传教区,可是信徒始终不多,其中有些人还是所谓“吃教”的。

这样一个以外国为后台的基督教,解放以后,失去了列强的保护,在国内又很孤立,就面临了困难的局面。就在那时,基督教发现,上帝为我们作了两个安排,使中国基督教这盏将残的灯火不致熄灭而能慢慢地亮起来。一个是毛主席、周恩来制定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宗教信仰自由政策,另一个是基督徒自己发起的三自爱国运动。完全可以说,这两样是神不抛弃我们,为要给我们新的机会和新的开端所做的准备。

共产党人是无神论者,怎么又会主张宗教信仰自由呢?我们不少人本来也有这个问题,可是经过许多年的体验和观察,我们觉得这不是什么难于理解的事。

共产党人是坦率的,他们对宗教的看法,不是遮遮掩掩,而是和盘托出,摆在桌面上。世界上有些政党和政客,为了要利用宗教,装出一副赞助宗教和推崇教会的样子,而共产党是不想利用宗教的,它就能坦率地把他的宗教观讲得一清二楚。我们完全有自由不接受共产党的宗教观,但是这并不意味我们就要反对共产党的全部观点,譬如说,连共产党提出的统一战线,我们也去反对,这是毫无道理的。

中国共产党非常重视统一战线。共产党比谁都更清楚,建设新中国不仅仅是共产党一个党的事业,而是全体人民的事业,必须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人们共同来奋斗。信仰基督的公民同其他公

民一样,殷切期望祖国繁荣富强,当然愿望早日实现四化,因而理所当然地是统一战线的一部分。至于宗教信仰、宗教观、世界观、《圣经》观,那就各有自由,互相尊重。这样,安定团结就可能了,组成统一战线就可能了,实现四化就可能了。西方有人硬说共产党人要统一人们的世界观,不准人们信宗教,我们的经验告诉我们,这不是事实。他们实在太无知了,把共产党人看得这样愚蠢。

“四人帮”同共产党根本不同。“四人帮”不要四化,不要安定团结,不要老干部,不要知识分子,不要宗教信徒,不要统一战线。他们要消灭宗教,当然就不要宗教信仰自由政策,也不要宗教事务部门,因为宗教事务部门的职责就是代表政府贯彻执行宗教信仰自由政策。“四人帮”不是共产党,共产党不是“四人帮”,这两者是不应当混为一谈的。

正因为中国共产党有宗教信仰自由这个政策,我们基督教解放前尽管相当不得人心,解放以后还是得到了国家的保护,这才使基督教有了继续存在下去的机会。

不仅如此,上帝还感动基督教中有先进思想的领袖,发起三自爱国运动。

基督教要在新中国存在下去,并为主作出见证来,光靠国家的宗教信仰自由政策还不够,还必须同中国人民有较多的共同语言,从一个洋的宗教变为中国自己的宗教。三自爱国运动是中国基督徒的爱国运动。它提倡中国基督徒发扬民族自尊心,热爱祖国,同祖国同胞走在一起,想在一起,投身祖国的事业。在教会方面,它主张真正的自治、自养、自传,主张中国教会独立自主,由中国信徒自己来办。

三十年来,三自至少取得了下面三大成就:

第一,使中国的基督徒变成了爱国的基督徒。三自帮助我们

明辨政治上的大是大非,知道理应爱国。在一九四九年,许多基督徒对人民解放运动很不理解,很有抵触,甚至当解放军将要横过长江解放全国的时候,有些信徒会听从某些人的话,祈求神使解放军淹死在长江里。今天,我们中国信徒不论在哪里聚会,绝大多数都拥护人民解放运动,都为社会主义新中国的成就在祷告中献上感谢,都愿为祖国四化作出贡献。基督徒应当爱国,这一句话成了天经地义。自从十九世纪中国有了基督教以来,整整一代爱国的、同祖国人民有共同语言的基督徒在中国大陆上出现,这还是第一次。

“爱国”是个很好的词。《圣经》里摩西、但以理以及其他许多先知都是爱国的。不过在有些西方国家,“爱国”这个词被人妄用了,因此,不少有正义感的人对它产生了恶感,一听“爱国”就想到民族沙文主义者欺侮弱小国家,想到顽固分子为反动政权摇旗呐喊,高呼“不论是非,我的国家就是我的国家”的口号。可是,我们对任何国家作出评价,首先看这个国家为广大人民带来了什么。新中国是人民的中国,它是为人民大众的,它给人民带来解放、利益、幸福,它是革命的、进步的。这样的国家我们当然热爱。固然,新中国也还有旧社会遗留下来的不好的东西,人民自己身上也存在毛病,但是,人民正在努力加以批评、克服、清除,使自己的事业从胜利走向胜利。爱这样一个祖国,我们感到理直气壮。

爱国主义是人们对祖国深厚感情。这种感情集中表现为民族自尊心和民族自信心,表现为人们为争取祖国独立富强而英勇献身的奋斗精神。一个爱国主义者会积极努力去克服祖国的落后面,但没有妄自菲薄的自卑心理,也决不做有损民族尊严和有失国体的事情。

我们全国信徒今天有一点比过去看得更清楚:基督教信仰没有要求我们否定或轻视我们的民族性,而是要我们很好地承认我

们的民族性。《启示录》告诉我们,到一天圣城新耶路撒冷要自天而降,那时,圣殿没有了,今天世界上的许多东西都没有了,民族性可能也会消失。这些在基督里都将同归于一,基督成为一切的一切。但是今天还没有到那一天。今天,照神的安排,人们都是属于这个或那个民族和国家的。圣子道成肉身,也不是变成一个无国籍的民族虚无主义者。耶稣和好些门徒都是犹太人。福音采取了同犹太民族的生活和文化相结合的形式。保罗也有强烈的民族感情,他称他的同胞为“我弟兄,我骨肉之亲”。我们生下来就是中国人,这不是由于自己或父母的选择,而是由于上帝的命定。在这一个世界上,我们只有首先同中华民族站在一起,做一个好的爱国主义者,才能在世界人类中做一个好的国际主义者。

第二,改变了中国基督教的面貌。今天,中国基督教大体上已经摆脱了帝国主义、官僚主义、封建主义的控制利用,成为信徒自治、自养、自传的宗教团体。它已经不是外国传教差会的附属物,而是中国一部分公民出于对基督的信仰和热爱而自己组合起来、带有中国特征的基督教。这个基督教不以欧美基督教为准则,但不是排外的。我们肯定基督教的国际性,但是我们中国基督教要摆脱它的殖民地性质,不做外国基督教的复制品,同祖国人民的事业不再游离、疏远以至对抗,而和祖国人民走在一起,植根于中国文化,形成为一个中国的自我,一个中国的实体,才谈得上对世界基督教有所贡献。

中国基督教无法改变或者掩盖自己的历史,但是我们完全应当接受历史教训,为自己的历史写出新的篇章。三自爱国运动改造了半殖民地半封建旧中国基督教的面貌,使它同社会主义新中国的面貌相称。它洁净主的教会,使福音的光辉得以彰显。

三自爱国运动这两个成就必然带来第三个成就,那就是三自

逐步改变了各界人民对中国基督徒和中国基督教的观感。

中国基督教领袖一九五〇年一提出三自,就得到周总理的肯定,不久《人民日报》从舆论上给予支持和鼓励。这些年来,在三自爱国运动倡导下,基督教实行了自治、自养、自传,全国基督徒有许多爱国主义的表现。在越来越多的同胞心目中,基督教不再是个洋教,也不再是崇洋的,或吃教的。越来越多的人认为,基督徒同样是有民族自尊心的中国公民,基督教是中国公民完全有权利经过自己的选择来信奉和维护的一个宗教。舆论上有了这种变化,贯彻国家的宗教信仰自由政策,阻力就小了。当前各地落实宗教信仰自由政策,三自爱国组织正在进行许多工作。我们在工作中接触到许多干部和群众,他们中间不少都知道基督教不是四化的障碍,他们对我们怀有善意,尊重我们的信仰,坚决按政策办事。三十年来,有不少人接受基督的福音,参加了教会。全国信奉基督的人可能有相当的增加,至少看不出有减少。如果没有三自爱国运动创造条件,为中国基督教树立新的形象,这怎么可能呢?有许多事实告诉我们,由于我们进行了三自爱国运动,基督徒和基督教有了变化,因此越来越多的人对基督徒和基督教也有了新的看法,新的关系。前些年我们基督教为“四人帮”所不容,这是光荣的。正是由于基督教解放后进行了三自爱国运动,“四人帮”虐待我们基督教和基督徒就很不得人心。广大人民知道,那样做不符合国家的政策。我们得到了他们的同情,这是很宝贵的。

我们基督徒有在自己的祖国为基督作见证的使命,可是,由于基督教传入中国同帝国主义侵略中国连在一起的历史事实,福音的门始终没有打开。从我们为基督作见证的长期使命来看,取得这三方面的成就的历史意义有何等重大,太显然了。现在回过头去看,在一定意义上我们可以说,反对三自不但是缺乏爱国主义,

也是否定基督教的福音事业,是破坏基督教。现在回过头去看,反三自的道路政治上是不正义的,宗教上是一条基督教自取灭亡的道路。离开三自爱国运动,中国基督教不可能有今天,更不可能有明天,这在我们中国基督徒早已是十分明确的了。

中国基督教三自爱国运动在第三世界基督教历史以至世界基督教历史上代表着一个意义重大的转折,一个崭新的发展阶段。这一发展或转折,给教会带来了希望,向世界一切关心教会前途的基督徒传来了不容忽视的信息。正由于此,亚洲有一位有历史眼光的基督教领袖最近写道:“中国教会非殖民地化的经验,必须在亚洲许多教会强有力地提出来,它们为了要获得教会的独立自主,实现其自我,必须考虑中国这一个重要典型范例。”

中国基督教处于这样一个特殊地位,是由于中国在人类历史进程中的特殊地位,不是因为我国基督徒自己有什么长处和建树。保罗告诉哥林多教会说:“你们蒙召的,按着肉体有智慧的不多,有能力的不多,有尊贵的也不多。上帝却拣选了世上愚拙的,叫有智慧的羞愧;又拣选了世上软弱的,叫那强壮的羞愧”(林前1:26、27)。我们完全应当多用这个话来提醒自己,谦虚地领会上帝的美意。

三自爱国组织在工作中也有缺点和失误,我们已经重视,也应当继续重视,力求改进,但是三自的正义性、合理性、必要性已经由它的巨大成就所证明。我们在回顾过去的时候,满心感谢上帝兴起像我们亲爱的吴耀宗先生以及陈见真主教、江长川会督、谢永钦牧师、崔宪祥牧师、贾玉铭牧师、赵紫宸牧师、涂羽卿先生、丁玉璋院长等等走在前面的先辈们。他们的信心、远见和勇气继续在激励我们前进。

(二)三自任务未了

三自的成就很大,但三自的任务还没有完成。

三自的创业阶段已经过去,但三自爱国运动的成果要巩固,要保卫,要扩大,要发展。这些都要求我们继续进行三自爱国运动。

长期以来,三自爱国运动高举爱国主义旗帜,帮助我们分清是非,爱国爱教,使我们做良好的信徒,同时也做良好的公民。三自必须继续高举爱国主义旗帜,鼓励信徒加强政治学习,鼓励信徒同全国人民一道,为维护国家的安定团结作出贡献,为祖国实现四个现代化作出贡献,为实现台湾回归祖国作出贡献,为反对霸权主义、反对侵略、保卫和平作出贡献。

现在有不少新的信徒,他们除了缺乏灵性栽培以外,对三自爱国也缺乏认识。信徒们很渴望得到三自爱国运动的教育和再教育。我们应当把自治、自养、自传的道理和爱国爱教的道理讲给大家听。我们要教导全国信徒,特别是青年信徒,在基督教三自爱国运动帮助下,热爱祖国,热爱社会主义,为祖国的历史和进步感到自豪。我们要帮助他们遵循基督的教训,提高对自己的要求,努力学习,努力工作,抵制国内外种种不健康思想的腐蚀,在家庭里,在邻居中,在生产和工作的岗位上,都作美好的见证,结出美好的果子,为主发光,为祖国发光。

今天,基督徒或者到教堂参加宗教活动,或者在家庭聚会,只要是赞美上帝,侍奉上帝,只要是互相劝勉,互相造就,那都是荣主益人的。可是现在国外有几个公然标榜“地下教会”的反华骗钱组织,想在中国发展他们所谓的“地下教会”。试问,他们如果没有不可告人的目的,不做非法违法的事,为什么要钻入我们的地下呢?这些组织的某些头头生活极度败坏,根本不配使用“传教”二字。

我们为了保卫教会的纯洁,保卫祖国安全,对这种利用宗教骗取钱财,进行反华宣传,对我进行颠覆活动的阴谋,要提高警惕。我们教会同工和信徒要坚持爱国守法。我们要维护教会的声誉,不让国内外任何人借基督教的名义,进行非法违法活动,破坏社会治安,危害信徒身心健康,羞辱教会。

维护宗教信仰自由是中国人民维护社会主义民主和法制所作努力的一个组成部分。我们宗教界在这方面所作的努力,中央领导最近在全国人大会议讲话中加以肯定,说是“宝贵的努力”,这给了我们莫大的鼓励。今天,各地都在落实宗教信仰自由政策,基督教方面已经有了可观的进展,这是叫全国信徒感到欢欣鼓舞的,但是由于种种原因,不少地方宗教信仰自由政策的落实还有困难,还有大量工作要做,三自组织要继续尽力协助政府和有关单位做好这方面的工作。

这些都是今后三自的任务,所以我们说三自任务还没有完了。

(三)从自办教会到办好教会

在教会方面,三自运动要解决的,主要是一个中国教会应当由谁来办的问题,答案是很清楚的:自办,中国信徒自己来办。解决了这个问题,我们就面临了第二个问题:怎么把中国教会办好,把基督的身体建立好?自治、自养、自传所强调的是“自”,自己的“自”,现在我们要进一步,要治好、养好、传好。

三自从来不是为三自而三自的。三自爱国运动在发起之初所看到的远象,就是基督的一个治得很好,养得很好,传得很好的教会在中国大地上建立起来。主使我们看见,为要在中国把信徒们建立为的身体,我们就必须效法使徒时代教会的榜样,服从神在《圣经》中的启示,吸取教会历史的优良传统和严重教训,让圣灵指

引我们走出一条适合中国的、前人没有走过的道路来。我们要敢于离开其他国家、其他时代、其他早先的追求所得和信仰象征。我们要让自己的灵性开花结果,使中国教会的智慧和身量,并上帝和人喜爱她的心都一齐增长。可是,由于“四人帮”所代表的那条极左路线的干扰和破坏,这些年来宗教信仰自由政策像共产党许多其他政策一样,遭到破坏,要实现基督给我们的建立教会的托付,也受到了拦阻。

我们感到难过,虽然我们的弟兄姊妹是那么热心,但是教会这些年来没有做好牧养他们的工作。教会信徒如果在信仰上、在灵性生命上得不到好的、合乎《圣经》的栽培,他们就会受到不好的、不合乎《圣经》的影响,教会就会发展到旁门左道上去,出现各种混乱现象,这对信徒、对教会、对社会都十分不利。

我们知道,讲解上帝的话语应当战战兢兢,谦虚谨慎,传述基督的真理必须中肯全面,不从人意,因为我们原不是传自己,乃是传耶稣基督为主。信徒聚会和教会生活不必讲究场所,但应当像保罗所提醒的,“凡事都要规规矩矩地按着次序行”(林前 14:40),这样配称为对主的侍奉,好造就主的肢体,作出对外的见证。现在有的地方不是这样,基督的真理讲得偏了,不够全面,失去了完整性;聚会的时候,任意而为,有的人不惜哗众取宠,以抬高自己,把侍奉主变成了生财之道,结果使教会很不纯。今天信徒是饥渴慕道的,我们一定要做好看顾他们、引导他们、造就他们的工作。这样坏人得不到可乘之机,教会才得以健康发展。

教会的教牧同工和信徒如今在同一位圣灵的感动、引导下,有一个共同的想法:今天,在我们继续进行三自爱国工作的同时,牧养主的群羊,办好主的教会问题已经提上了中国基督教的议事日程。

经过“四人帮”带来的浩劫，我们的信徒迫切需要《圣经》。为了做好牧养工作，中国基督教应当出版《圣经》。为了应付急需，也为了照顾信徒的习惯，目前通用的版本正在陆续出版。

几十年来，我们中国的语言文字有了发展，《圣经》的古卷也有新的发现。为了使《圣经》的汉语能够更好地表达原义，《圣经》汉语译文的修订工作也需要进行。但是这是一项严肃的圣工，必须组织力量，慎重进行。什么时候可以出版新的译本供信徒试用，现在无法作出估计，这总要在若干年之后。

大家还希望有各种书刊，在介绍基督教基本教义方面，在研究《圣经》方面，在培养灵性方面，在提高同工的工作水平方面提供帮助。

大家还认为，金陵协和神学院的本科教学工作应当即速恢复，进行适合我国情况的神学教育，培养主合用的仆人。

现在全国各地的信徒虽然在一起聚会，享受主内团契，互相劝勉，但大家比较分散，同其他肢体缺乏联系，得不到应有的供应、交流、帮助，因此有时容易走偏。大家感到，我们应当想办法让各地信徒，不论他们在哪里，凡愿意的，得能相互联系，一同长进。

为了进行诸如这里罗列的以及其他种种办好教会的工作，按照自治、自养、自传原则给教会和信徒提供服务，成立一个基督教教务组织的意见提出以后，各地纷纷表示赞成。看来这的确是全国信徒普遍的愿望。

经过大家研究讨论，我们看得比较清楚了：全国三自组织和全国教务组织都是以全国基督徒为主体的组织，一个是全国基督徒作为人民组成的人民团体，一个是全国基督徒作为信徒组成的教务团体；如果三自是一个全国基督徒的爱国运动，那么，这个教务组织将代表一个三自爱国的中国基督教运动。这两个都是爱国爱

教的团体。

在任何涉及信仰的问题上,我们的原则是互相尊重,不是干涉信仰或统一信仰。

有人曾经提出,教务工作为什么不放在全国三自爱国组织之内作为它的一个附属部门,例如作为它的教务委员会,何必另立一个机构?另立机构,会不会降低三自爱国的旗帜?

我们知道,在没有教务组织的情况下,全国三自的确不得不负担了建设教会的一些工作。比如说,全国三自没有等待成立教务组织,为出版《圣经》做了许多工作。但是,我们也知道,全国三自是我们全国基督徒的爱国运动。按照中国基督教三自爱国运动委员会的章程,它的宗旨是:团结全国基督徒,积极参加祖国社会主义建设和各项爱国运动,遵守国家各项政策法令,协助政府贯彻宗教信仰自由政策,促进中国基督教会彻底实现自治、自养、自传,肃清帝国主义影响,反对侵略,保卫和平。全国三自是根据这样一个宗旨组织起来的。有这样一个宗旨的组织,怎么能够经常地、长期地以开展教会本身的种种工作为自己的任务呢?如果把我们所设想的许多教牧性质和教务性质的工作都交给三自,那么,三自就得花很大的力气去做教牧性质和教务性质的工作,这实际上就改变了这个组织原先的性质和宗旨。如果这样,倒是把三自爱国的原则和要求冲淡了。

同样,为了继续高举三自爱国旗帜,把三自爱国组织归入教务组织,成为它的一个组成部分的设想,也是不妥当的。

因此从我国基督教目前的和历史的的具体情况出发,大家认为,在全国一级,成立两个性质不同的机构比较最为适宜,尽管在人事上可能有一定重复。全国教务组织同全国三自爱国组织是平行的,各有各的侧重,两者有似一个身体上的左右手那样,是密切合

作的关系,不是一个领导另一个的关系。有了这两个组织,我们的团结面就更扩大了。

至于各地要不要成立教务机构和怎样成立,各地可以从长计议。

关于成立这个组织的问题,全国三自常委扩大会议上大家寻求了上帝的指引,也作了详细的探讨,决定进行必要的筹备工作。现在我们举行全国会议,希望大家就这件事继续寻求上帝的指引,充分交换意见。

这次举行全国会议,让我们进一步瞻望未来,商讨中国基督教今后该怎么办。这并不排斥谈过去和谈当前,也不排斥谈一省一地的问题,不然谈全国基督教的未来也会谈不好的。希望我们做到知无不言,言无不尽。特别是关于怎样把教会治好、养好、传好,大家有宝贵的经验,值得交流。

在组织方面,这次一是要修改基督教三自爱国运动委员会章程,选举下一届委员,二是商讨教务组织问题,如果条件成熟,可以在已有的筹备工作的基础上,利用这次会议的机会,成立这一组织。

同工同道们,在我结束发言以前,我愿意谈一下我们的国际关系。我们大家高兴地注意到,国外教会里也有不少对新中国基督教表示友好的个人和团体,其中包括一部分前在华传教士。他们为能看到中国各方面的进步而高兴,他们无意于干涉我国和我国教会的内部事务,他们正在通过祷告和其他途径,支持帮助我们。我们不把他们同海外反华势力混为一谈。我们对他们的友好态度表示欢迎。我们对他们的祷告和协助表示感谢。中国基督教珍视自己的特殊道路,但这并不排斥有益的国际交往。我们珍视这种国际交往。国外的教会和信徒,凡是尊重我们的独立自主原则立

场、以平等态度对待我们的,作为基督的肢体,我们愿意在力所能及及范围里同他们开展友好互助、取长补短的联系。

现在国外宗教界除了不少对我友好的人以外,也还有一部分人在那里煽动反华风。他们利用我们的十年浩劫,欺骗国外信徒。他们依靠政治经济势力,不择手段地造谣诬蔑新中国,攻击中国基督徒的爱国主义思想、言论、行动。他们不谈过去国外对华传教活动的历史教训,抹煞中国的福音事业独立自主和自治、自养、自传的正义性、合理性、必要性,把三自视为眼中钉,或者对三自装聋作哑,妄图把中国基督教拉回到殖民地状态去。中国基督教比过去任何时候更加团结,他们对此极为不满,力图分裂我们。对这种外来的渗透和干预,我们全国信徒要提高警惕,保卫三十年果实,坚持我国教会的三自道路。我们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信徒要用保罗的语言正告那些妄想使我们放弃三自道路的人:“我宁可死,也不叫人使我们所夸的落了空”(林前 9:15)。

我们要向全世界宣告:中国国内的教会工作和传教工作,是我们中国教会的主权和职责,身处海外的人,不论什么肤色,如果没有得到中国基督教当局同意,一律不得擅自对国内进行任何传教性质的活动。假定这些人果真是出于宗教动机,那么,他们至少也应该想到保罗的话:“我立了志向,不在基督的名被称过的地方传福音,免得建造在别人的根基上”(罗 15:20)。当哥林多已经有了教会的时候,保罗向哥林多的信徒表示,他要“将福音传到你们以外的地方”,他不愿意“在别人界限之内”传福音,免得借着他人现成的事夸口(林后 10:16)。现在国外有人一定要发动基督徒离开他们最有条件传教的地方,进入我们界限之内,来拆毁我们三十年来三自的根基,我们不禁要问,这究竟是为什么?

我们要团结各国信徒,向他们说明我国信徒独立自主的愿望,

帮助他们明辨是非,做新中国的朋友,做新中国基督教的朋友,识破反华阴谋,起而反对国外宗教界反华分子所进行的宣传、渗透和干预。

同工同道们,三自爱国运动是正义的、合理的、必要的,它有重大的政治意义,更有重大的神学或属灵意义。这个运动今天还要向前发展。同时,我们大家特别清楚地看见,牧养好主的羊群是基督复活以后对彼得的托付,也是复活的主今天对我们的托付。今天的信徒迫切需要教会带领他们,他们像当日来听主耶稣讲道的那五千人,我们不能打发他们去乱跑乱找,结果受骗上当。我们应当按照主的吩咐,让大家围绕着主耶稣整整齐齐地坐下来,我们应当拿出自己的五饼二鱼交给主,让主接受、祝福、掰开、分给大家。这样,大家能够吃饱,教会也能够在正道上健康发展。这对信徒、对教会、对祖国都好。我们自己的力量是微弱的,但是我们相信,在上主赐恩祝福下,一个自治、自养、自传的,与祖国相称的中国教会将在我们可爱的国土上,在我们的人民中间,成长壮大起来。有了这样的教会,我们就能够对祖国、对世界作出较大的贡献。

三自再认识

(一九八二年九月十六日于北京在中国基督教
全国两会委员会扩大会议上的讲话)

三自是可有可无的,还是必要的?它究竟有多大的意义?对这个问题,中国基督教十分重视。

十九世纪中叶起,教会里就有人提出三自。当时提三自,有人是意识到,教会要在一个国家存活下去,不能长期依附外国,总得由当地信徒自己来维持才好;有人对教会中存在与肤色等因素有关的种种不公平现象颇有不满;有人出于民族觉醒,对传教士和本国教牧人员每每教导信徒不爱祖国有反感。这些都是可贵的。此外,有人高叫三自口号,用中国化做门面,或以早已实行三自为标榜,借以掩盖其原封未动的洋教。当时从教会的性质来论证三自的合理性的很少,也难得有人从明确的保卫祖国的角度来提出三自的必要性。

我国解放前夕,教会里三自问题谈得少了。当时最突出的问题是:中国在共产党领导下,有没有宗教信仰自由?能不能许可教会存在下去?不少人曾经准备坐牢,准备遭受种种迫害。不过,拿我国国内信徒来说,这个问题大体上在五十年代就已明朗。那时,中国基督徒已经越来越意识到,最大的问题不是这一个。

这样说倒不是意味五十年代以来宗教信仰自由政策全国到处都落实得很好。我们知道,一九五七年以后有过“左”的干扰,特别在“文化大革命”时期发生过大反复。粉碎“四人帮”以后,各级政府在落实宗教信仰自由政策方面做了大量工作,但有不少地方至

今仍旧存在一些问题,需要三自组织和基协继续会同各级政府认真做好工作,解决这些问题。只要还有抵制、违反宗教信仰自由政策,拦阻正常宗教活动,侵犯宗教正当权益的事,我们就有责任加以重视,和有关部门共同谋求妥善解决。同时,教会本身也要从内部反对一切歪门邪道、非法违法活动、海外渗透活动。

必须承认,在信仰自由问题上,全国人大、全国政协、中央党政领导、国务院宗教事务局等等重要决策、立法、执行机关的态度非常明朗,剩下的不过是各地加以贯彻和实施的问题,而这个问题,目前也正越来越受到重视。国务院宗教事务局明确表示支持宗教界关于修改宪法宗教条款的提案,这是很大的支持。以全国来说,这三年来,每两三天基督教就增加一两个堂,这事实也很能说明情况。

解放后不久,中国基督徒就开始觉察到,教会要有一个光明前途,单靠国家宗教信仰自由政策是不够的。是的,人们有自由来信仰基督教,但是,人们愿意不愿意运用这个自由来信仰基督教呢?当时不就有人运用信仰自由而离开基督教吗?我们反对用物质好处吸引人,那么我们该怎样做,好使人们愿意使用他们的自由来听基督教有以告人的福音呢?

圣灵通过历史使中国教会向自己提出了这个比宗教信仰自由更重要得多的问题。这是中国基督徒第一次在全国的规模上向自己提出了一个真正是自己的问题,一个只能由自己来解决,不能照搬外国的问题。这是中国教会的素质的问题,就是教会怎样从它不愿意去的地方摆脱出来,进入新的境地,怎样悔改、转向、变化、更新,把自己建立为基督的身体,使教会不仅在世人心目中是教会,而且首先在基督心目中是教会。教会能够实现这种转变,真正成为教会,这就是教会世界的无上贡献。

对这个问题,中国基督教不是没有回答。一个通俗、简明、扼要,全国信徒都能接受拥戴的回答就是:走三自爱国的道路。

凡是历史上大一点的运动,其全部意义每每不是当事人所能充分预见,而要经过几年、几十年、几百年才越来越向后人显明出来。

基督教最初不过是犹太教中的一派,除了接受基督为主以外,仍旧要求人接受割礼等等犹太教律法的规定,因为它还没有冲破犹太教的民族狭隘性。保罗提出因信称义,大声疾呼,反对靠守律法称义,使基督教突破犹太教框框,从教义上为它能够变成地中海周围各民族广大人群共同的宗教信仰提供了必要的条件,也为它成为西方宗教和最后成为世界宗教提供了必要的条件。这个创新使基督教闯过了历史上的第一关,也是极重要的一关。《使徒行传》第10章、第15章所记载的事,对教会历史以至对世界历史的进程起了决定性的作用,这是保罗和彼得无法预见的。

经过这一突破,基督教向希腊思想有了开放,终于成为一个西方宗教,后来它传播的地域日益扩大,终于成为一个世界宗教。但是它基本上是一个西方的世界宗教,或者世界的西方宗教。人们叹息劳苦,直到如今,盼望再一个突破的来临,那时,在历史的地平线上,在西方的基督教之外,我们可以看到东方的基督教、南方的基督教、北方的基督教,以至带有各个民族文化特色的基督教。那时,基督教所呈现的五彩缤纷的景象,才动人心腑呢。近几十年各国教会里不断有先知先觉的人们出来倡导基督教在各国的本国化。对这方面的努力和成就,即使由于各种局限性而是点滴的,我们也给予很高的评价。

中国的教会是很小的,但是中国基督教三自爱国运动在两个意义上具有世界教会史上又一个重大创举或突破的性质。

(一)在地域上,在世界的东方,在中国这样一个国家里,基督教在全国大规模范围里,正在以比较快的速度和比较大的深度努力实现它的本国化。世界不少信徒(包括一部分传教士)梦寐以求的那个愿望,正在中国这块大陆上得到实现,尽管它同历史中的任何运动一样,在其过程中有这样那样的曲折和错失。这一创新同海内外很多信徒的理想是一致的。

(二)在历史上,在出现了社会主义社会制度这一新事物之后,在一个具有数千年封建制度历史和一百多年半殖民地历史的社会里,当长期苦难深重,至今身上带着历史创伤的几亿人急于改变自己的命运、正在以双手建设社会主义新生活的时候,在一个工农业生产、文化思想、道德伦理、精神生活都在变化,许多新事物令人激动,却仍旧有许多旧事物叫人叹息的环境里,占人口极少数的基督徒,正在努力从事一个将基督教植根于其土壤中,使之带着新的素质成长起来、开花结果的实验。我们中国基督教的本国化就是在这样一个特殊环境里进行的。这在历史上还是从来没有的。这是我们中国基督徒的使命的独特之处。我们的成功将加强中国和世界许多人对基督和对教会的信心,我们的失败将是中国和世界基督教的损失。

同工同道们,我们这么做,不是由于什么人好高骛远,想要一鸣惊人,硬要去做不必要的事。不,祖国的复兴需要中国基督徒这样去做;为福音作见证的使命需要中国基督徒这样去做;基督教会的公性或普遍性的自我实现,也就是教会历史发展的规律,需要中国基督徒这样去做。以下就从这三方面来谈。

(一)祖国的复兴需要我们这样去做。

鸦片战争以后,中国被看作“东亚病夫”,受尽外人的轻视欺凌,外国军舰和军队到处可去,外国的货物占领了我们的市

场，民族工业无法存活，人民贫病交困，乞丐满街。今天这种情况早已过去，中国基督徒为之高兴，为之感谢，热爱祖国的今天，这是极合理的。

道成肉身的真理不但向我们显示上帝由于他的大爱而进入人世，受尽世人的苦楚，最后在十字架完成他的教法，这个真理同时也启发我们应当怎样看待肉身和物质。既然肉身和物质是道进入世界的途径，那么，肉身和物质就不是可鄙弃的，而是可贵的，能够成为，而且应当成为，体现圣爱的器皿。我们相信，上帝对人类的关怀和爱心是全而的，肉身生活、物质生活、智育发展、社会政治、伦理道德都不在上帝爱顾之外。他愿意人们摆脱困苦，在一个比较合理的社会制度下享受安康，而这样一个环境比较有利于人们寻求真理、发现真理，有利于人们看见神的启示，归服于神的启示。

我们看见，道成肉身的基督具有特定国籍，他不是无国籍的游民，他对自己的民族不抱虚无主义态度。他学习本民族的文化和宗教传统，说不是来废弃，而是来成全。当时他的民族处于罗马统治之下，他看到耶路撒冷，为之哀哭。这是当时情况下的爱国主义。

《圣经》里大量的爱国主义感情都属于祖国危亡、人民悲愤的那种。《诗篇》第 137 篇是很典型的：

“我们曾在巴比伦的河边坐下，
一追想锡安就哭了。
我们把琴挂在那里的柳树上，
因为在那里，掳掠我们的要我们唱歌，
抢夺我们的要我们作乐。……
我们怎能在外邦唱耶和華的歌呢？
耶路撒冷啊，我若忘记你，

情愿我的右手忘记技巧。
我若不纪念你，
若不看耶路撒冷过于我所最喜乐的，
情愿我的舌头贴于上膛。”

但是《圣经》里也有因祖国复兴而欢欣鼓舞的爱国主义。《诗篇》第126篇是个例子：

“当耶和華將那些被擄的帶回錫安的時候，
我們好像作夢的人。
我們滿口喜笑、滿舌歡呼的時候，
外邦中就有人說：‘耶和華為他們行了大事！’
耶和華果然為我們行了大事，
我們就歡喜。
耶和華啊，求你使我們被擄的人歸回，
好像南地的河水復流。
流淚撒種的，必歡呼收割。
那帶種流淚出去的，
必要歡歡樂樂地帶禾捆回來。”

在中国人民灾难深重的日子里，中国基督教方面不少人没有和苦难中的同胞同哭，这成为我们永难消失的内疚。中国人民推翻三座大山的统治以来，变化很大。今天，我们能够以地球七分之一的可耕地养活世界几乎四分之一的人口，这是不小的成就。现在我国更着力于实现四化。对祖国复兴的景象，我们基督徒理应欢欣鼓舞，与喜乐的人同乐。

但是，解放事业是个长过程。今天中国还不是很理想，还有相当大的落后面、阴暗面。人们正在各个领域努力发展光明面，克服阴暗面，努力前进，克服落后。中国基督教对这种努力自然不应冷

眼旁观,在国家生活中自然应当明辨是非,拥护、学习、提倡好的东西,使它们成长得更快,批评、反对、削弱恶的东西,使它们尽快趋于消灭。这就是今天情况下的爱国主义。

至于基督教本身,我们自然应当使它同祖国的面貌相称。基督教传入中国,同西方殖民主义的人侵密切相关。这对中国、对基督教都有深重的后果。中国基督徒必须为基督教开创新的历史。今天国家独立自主了,如果独有基督教不求独立自主,继续仰仗他人,教会岂不成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上的一块外国领地?如果让海外利用宗教遂行其目的的人长驱直入,损害祖国权益,颠覆人民的新生活,我们基督教岂不成了新中国的罪人?

总之,爱国主义,不论由于祖国危亡而显得悲愤壮烈,或者由于祖国前进而显得欢欣鼓舞,都发自人们内心的是非感、正义感和民族归属感,导致人们为推进祖国的事业而不惜作出种种努力和牺牲。这是十分可贵的,我们基督教应当培养而决不当鄙视这种精神。这些年来,全国各地信徒在三自方面作出很大成绩,在各行各业涌现许多热心爱主,为祖国人民作出贡献的基督徒,有的还作出较为突出的贡献,他们没有辜负祖国和教会的教导和期望。这种爱国爱教的动人事例是中国人民的骄傲,也是中国教会的骄傲,值得我们好好学习。

现在海外有个怪论,批评我们中国基督徒的爱国主义,认为好的基督徒必然要做反对派,做持不同政见者,谁当权就反对谁,说这才是先知的使命。类似这样的说法,我们在“文化大革命”时期也听到过,就是要人们起来,去革革命者的命。这是一剂以革命为外衣的毒药,我们不同意。中国人民付出极大代价才取得了政权,现在刚可以开始改造旧社会,建造自己的新生命,怎么立即又成了革命对象?那不是由自己来破坏自己的事业吗?爱国主义要求我

们拥护人民赢得的新社会制度,保卫它,清除遗留的垃圾,改进它,完善它。那种永远反对权力,反对一切权力的理论,同爱国主义完全相反,同无政府主义、反革命和颠覆活动倒可能谈得拢。要我们接受这种理论的人,怎么不在他们自己的国内试试把这理论付诸实施呢?

(二)为福音做好见证需要中国基督徒推行三自。

中国的佛教和伊斯兰教都是外国传人的,可是今天谁都把它们看为中国自己的宗教。基督教就不然,一直到前不久,人们还把它看作洋教,因为它在人事、经济、思想上的确没有中国化,有时甚至政治上也站到侵略者立场上去。这是一百多年间中国人民抵制基督教的最大原因。

五十年代,虽然基督教在吴耀宗先生等先进同道倡导下开始推行三自,《人民日报》还发表社论予以支持,可是积重难返,许多人仍旧视基督教为洋教。当时基督教主要还是依靠国家有个宗教信仰自由政策才得以存留,但仅仅是个存留而已,谈不上什么见证。

但是三自符合教会本性,顺应历史潮流,是上帝圣意,它既经发起,必然得到全国信徒的响应和广大人民的同情,人们对基督教改观,那是不可逆转的。时至八十年代的今天,纵然我们的工作还做得不好,中国越来越多的人却已经认识到,基督教不能再以洋教目之了。

这一变化对我们为福音作见证的事业意义太大了。我们和祖国人民在一起的机会多了,同他们的共同语言也多了。我们摆脱了同群众隔离的状态。基督徒在政治方面、文化方面、工农业生产方面、医卫方面、科技方面都很活跃。我们能够广交朋友,和人们交换观点。我们从祖国人民那里学到许多东西,不少人也愿意听

听我们基督教的信息。

基督教信徒三十年来不是减少而是增加,达到中国有基督教以来的最高点。此中原因分析起来固然是很多的,但重要原因之一那就是中国基督教走了三自爱国的道路。如果没有这个三自爱国运动,那么,当“洋油”、“洋火”、“洋布”都一一从中国人的词汇中消失的时候,还剩一个“洋教”,这是能允许的吗?要是这个洋教果真还能存留一些日子,它的光景会怎样?人们会不会愿意接触这样一个基督教?会不会对之产生好感?会不会进而接受基督为主?所谓接受基督为主,又会意味什么?它将吸引怎样的人?形成怎样的一个集团?如此等等,大家是不难想象的。

基督教两千年的传教史和它一百多年的在华传教史在正反两方面都有无数经验使我们摸索到这样一条极端重要的规律:对移植过来的异体的排斥,不仅是个生物学和外科医学的现象,它也是传教史上的大问题,并且在民族觉醒状态下每每显得格外尖锐,甚至爆发成为强烈的冲突。教会要人们来听它,不能靠国内外政治势力的支持。教会实行三自,成为本国的教会,这是赢得发言权的唯一途径。

凡曾经试图领人归主的都知道,引导一个人接受基督的福音,绝不像带人游一次公园,或者送人一本《圣经》那么容易。这是因为基督的福音首先要求人知道,存在一个罪的问题,而这个罪的观念,特别自己是个罪人的观念,正是常人所认为是愚蠢的,所不愿理会的。它正是福音内在的一个绊脚石。它往往使人们拒绝福音,排斥福音。可是我们又不能为要使人便于接受福音而取消这一点。没有了这个,救恩也莫须有了,福音所剩下的不过是一般的劝人为善的教导,这纵然也是好的,但就不是福音了。这就是说,由于福音是福音,世人归从福音不是那么轻而易举,那么没有阻力

的；福音本身就带着人们接受它的阻力。既然如此，传福音的人就格外有责任护卫福音进人人心的通道，不让福音之外的任何其他外加物搀杂其间，免得人为地增加接受福音的阻力和困难。这样，人们要拒不接受福音的话，那只是碍于福音内在的绊脚石，而不是出于传的人加进了不属福音的东西的缘故。

现在海外有些人拒不理会历史教训，践踏我三十年三自原则，渲染向中国传福音，在中国人民中间给基督教重新树立一个洋教的形象。他们所凭的无非是某种经济优势，无非是香港等地一些反华政治势力的庇护，无非是他们所持有的外国护照，凭这些就自觉高人一等，居高临下，无视我国原则立场。以世界之大，这种故意和我国三自为敌的行径，想来一时总也可以吸引一些盲目追随者，可势必得罪今天已经站立起来了的中国广大人民，引起他们极大的反感和厌恶。这一传教路线如果得以贯彻，只能给基督带来耻辱，关闭福音大门。正是由于这种人，我们才不能不提出在中国大陆传教和建立教会的主权问题。前几年海外华人教会一位牧师回国探亲，接触了许多信徒，最后得到一个结论：任何传道人离开了中国二十年，就没有资格在国内传道。这里的确有个频率不同的问题。他们已经无法摸到中国人民的脉搏，无法理解中国人民的精神世界。那些不顾“神所量给我们的界限”（林后 10:13），离弃自己熟悉的园地，偏想到中国来越俎代庖，“仗着别人所劳碌的分外夸口”（林后 10:15）的人，应当听一听这句话。

总之，三自是基督徒为福音作见证的不二道路。中国三十年的经验充分证明，这是天经地义。

（三）基督教会为了最后实现其公性，需要中国和各国基督徒走自己的道路。

保罗说过，上帝要将他极丰富的恩典，就是他在基督里向我们

所施的恩慈, 显明给后来的世代看。基督那测不透的丰富, 有似一个宝藏, 等待来自无数不同文化教养的基督徒去加以开发, 使之成为教会的共同财富, 在这过程中教会得以更加实现其公性或普世性。各国文化需要基督福音的恩泽来加以升华, 基督教会也要吸收各国文化才能繁荣起来。

今天基督教号称为世界宗教之一, 这仅是就它不是一个民族或少数几个民族的宗教, 而被传到世界各大洲很多国家这一事实而说的。而这一地理上的世界性的实现, 在相当程度上同资本主义的殖民扩张事业有关, 因而有其先天的缺陷和软弱。教会的公性或普世性固然包括教会在地理上的广泛性, 但这到底只是个广度的问题, 不是公性的全部含义, 全部含义应当包括一个更本质的深度的问题, 就是教会在各个特殊文化中生根, 让福音的光芒透过各种特殊文化棱镜发出激动人心的光辉, 从而大大丰富普世教会的宝库, 使上帝座前的崇拜呈现一片百花齐放、万紫千红的景象, 这就增加了神人共享的喜悦。

按这一含义的要求来衡量, 今天世界基督教距离教会的公性或普世性还远得很。以中国教会来说, 我们在政治上、人事上、组织上、经济上向三自是已经迈出了重要的几步, 这是极宝贵的, 是基础性的, 但还不能说已经治好、养好、传好。特别在正确理解和吸收中国当代文化和历史遗产, 使基督教在信仰许可范围内与之达到最高度的结合, 摒弃种种不必要的西方传统方面, 我们做得还不够。

前一两年, 亚洲某国一位教会领袖写文章声称, 该国教会至今仍旧只是西方传教运动地图上的一个点。这话令人深为感慨。请大家设想, 当新耶路撒冷自天而降, 它东西南北十二座门向“各国、各族、各方、各民”的队伍开放, 让他们通过的时候, 我们中国教会

将形成自己的一个队伍呢,还是仅仅作为其他队伍奉献盘中一张地图上的一点呢?

保罗告诉我们,父喜欢叫一切的丰盛在基督里面居住。这内蕴于基督的那丰盛,那百般的智慧,还有待于来自各个特殊文化背景的人们加以消化吸收,互相交流,成为世界教会所共有,使教会日益向实现其公性目标迈进。按保罗教导,基督的爱是何等长阔高深,是要等待众圣徒一同来明白的。《希伯来书》也告诉我们,上帝为教会“预备了更美的事”,叫历史上因信得了美好证据的圣徒“若不与我们同得,就不能完全”。

可见个性和公性,特殊性和普世性,不是相对立、相排斥,而是相辅相成的。各国教会越实现其特殊性,整个教会的多样程度越高,它的普世性也越有内容。一国教会如果连独立自主(independence)都办不到,几个教会相互依靠(interdependence)云云,只能是空谈。

在这里不妨提到发生于五十年代中国基督教中的神学再思群众运动。这个运动是自发的,不是谁组织的,有极大的群众性和广泛性。在进入新中国历史阶段之后,千千万万普通基督徒在爱国主义觉醒中不愿那么轻易地离弃他们对基督的信仰,但又不能原封不动地保持自己昔日被灌输了的神学观点,就在树立新的政治观点的同时,自己进行神学思索,以求对现实不仅在政治上拥护,也在神学上想通。这是一个自下而上的运动,投身其中的神学专业人员起初并不很多,特多的是处身于教会与社会的接壤地带,卷进时代激流之中的基督徒工人、农民、教师、职员和知识分子,以及接近这些人的部分基层教牧同工,其中有特别值得我们怀念的黄培永牧师。

世界是不是魔鬼所掌握? 在上帝心目中世界究竟处于什么地

位？基督徒究竟应当怎样看历史？基督徒应否只问有无生命，只问信与不信？该不该问是非，分善恶？怎样才是属灵？应否抹煞理智？上帝的关心的眷爱和圣灵的工作有个怎样的范围和宽广度？怎样看待存在于教外的真善美？怎样看国家？怎样看爱国主义？怎样看《圣经》在启示中的地位？教会当时揭发出来不少罪恶，怎样看待教会的圣洁性？怎样重新认识上帝的圣爱，他对世界进行创造、救赎、圣化的用心？怎样在上帝远大的工程中认识《歌罗西书》、《以弗所书》所启示的基督的崇高地位？此类问题促使中国基督徒思考、探讨，写出成千篇文章，一小部分曾在《天风》、《恩言》、《神学志》等刊物发表，形成中国教会广大信徒神学思想无比活跃的热潮，开出了神学群众化的花朵。

非常可贵的是这些由历史带来的问题被中国基督徒自己提了出来，自己加以讨论。这是一个基督徒自我启蒙的群众运动，难免有些过激的言论，但过激是可以矫正的，我们不能因为它有些过激言论而否定运动的实质和主流。神学的创造性活动从神学专业人员那里转到一般信徒那里，这是令人神往的。我不知道欧洲宗教改革和德国农民战争时期曾否出现过类似的神学群众运动。无论如何，这是教会史上罕见的现象。今天我们正应当在这一神学再思运动基础上继续前进而不后退。应当提倡那种敢于思考、敢于创新的精神，使神学思想向世界现实开门，该认同的就认同，该存异的就存异，既有必要的融通，又有应有的保留。这样就不但为中国基督教带来了同人们交谈的可能，而且也培育了中国基督教的神学根基，发展了中国基督教的特点，充实丰富了教会公性的内容。

现在有人不谈教会的公性、普世性、国际性则已，一谈就流露无是无非的温情主义，将一切分歧置之脑后，好像什么原则、什么

立场、什么警惕也无所谓,谁同谁也可以相亲相爱,这才算“主内团契”。这是对教会公性的庸俗化,使之沦为极肤浅的、叫人不问祖国安危祸福的世界主义。真正的公性是教会的一个发展过程。一个民族的教会越在本民族中扎根,它越具有个性,它也越能丰富普世教会的公性内容。为此,我们虽然承认教会的普世性,也发展一定的国际联系,但是我们不把这个普世性放在高于一切的位置上。旧中国由于海关被外国所掌握,中国没法利用关税政策来保护民族工业的发展,因而吃了大亏。今天,为了保护中华民族的教会的成长,使之免于受到来自海外的过大的冲击(即便这是“爱的冲击”),从而脱离三自的道路,我们对国际联系不得不有所限制和选择,此中没有什么秘密。中国基督教所要的国际联系,必须有利于三自,至少无损于三自。

同工同道们,经过了这三十年,我们对三自的意义有了比较深刻一点的认识。三自不但从爱国主义的角度来看是正确的、必要的,从教会作见证的角度来看,也是势在必行的,从教会实现其公性远景来说,从历史的终极观点来看,三自更不是可有可无的。《尼西亚信经》说:“信使徒所立独一圣而公之教会”,提及教会的一体性、圣洁性、大公性、使徒性。三自同这四者的实现密切相关。海外有人攻击三自,并企图通过电台等手段向我国内暗示和渲染三自错了,借以离间我们,制造分裂。我们应当清楚地看到,在教会史上,三自不是什么错误,而是代表一条教会自我实现的必由之路。只有走这一条路,一个国家或民族的教会才真正成为教会,最后基督教这样一个世界宗教才真正实现其普世性。

中国信徒是热心爱主、热心爱《圣经》、热心爱教会的信徒,也是热心爱祖国的信徒。对信徒的这一个热心,我们往哪里引领,我们在上帝面前和在祖国人民面前都有责任作回答。现在时常听到

说,要满足信徒的需要。这在原则上讲是对的,但是我们应当首先检验,这种需要是否符合上帝的性格和旨意,是否符合他今天对中国教会的启示和引领呢?属灵是好的,但是按照《圣经》的教导,并且联系今天中国基督徒的生活,什么叫做属灵呢?今天,在中国教会里,关于牧养工作,关于培灵工作,关于崇拜和聚会,关于讲道,关于祈祷,关于教会生活,关于健全的属灵品质的养成等等这些方面的新的、适合新中国基督徒的生活和见证,适合三自爱国精神的观点、思想和方式正在力求突破旧的框框而出现,而成长。这些是教会里的新生事物,将是广大信徒所喜爱欢迎的。我们应当爱之欲其生,促使它们早日开花结果,没有理由鄙视它们,抓住自己从前学的、旧的、今天已经没有生命力的一套不放。

至于有几个地方,一些根本不属基督教也不懂基督教的人,假借基督美名,用类似反动会道门那套做法,为非作歹,欺骗忠实的人,有的大搞打砸抢,犯罪作恶,无所不为,完全不属信仰问题范围。对这些,不论是在堂里、家里或在任何其他场所,我们都必须揭穿其信仰外衣,明确加以反对,支持政府部门绳之以法,从而使我们基督教的声誉不受败坏。

三自有其深远的现实意义、历史意义和终极意义。既然如此,我们为之付出劳苦,不是徒然的。

今天,中国教会的实际离基督心目中的教会样式还很远。在许多地方,教会牧养工作荒废的情况没有很好地扭转。有的地方崇拜、聚会内容贫乏,信徒有意见,但久久没有改进。有的地方光有扩大,不知道我们今天更应重视培养,致使信仰走向片面,甚至出现异端。有的地方信仰上不互相尊重,损伤、疏远一些信徒。有的信徒还没有听说过三自爱国。有的地方出现非法违法活动,把种种不属基督教的东西带进了基督教。还有外来的干扰和诱惑,

想使我们走回头路,瓦解我们。这些告诉我们,三自和基协任务很重,也很光荣。值得指出的是,尽管问题成堆,好像要吓倒人,尽管我们都并不高明,不过是小小的“五饼二鱼”,可是主的工作总是排除一切拦阻而大有进展,超过我们所敢于想望的。这对我们的信心是一锻炼,对我们的同心合意也是一种呼召。让我们说,凡一切按《圣经》教导,奉耶稣基督为主的人,不管他们在哪里,都是教会的肢体,都是三自和基协的服侍对象、团结对象、建立对象、保护对象。在信仰上我们要互相尊重,不互相攻击。我们非常需要聆听保罗的提醒:用爱心说诚实话,凡事长进,连于元首基督,全身都靠他联络得合式,百节各按各职,照着各体的功用,彼此相助,便叫身体渐渐增长,在爱中建立自己。

至于三自和基协,它们不过是暂时的器皿,不过是建筑物在建造过程中的脚手架,我们每个个体,都不过是互相紧密搭配,构成脚手架的无数根毛竹或钢管。一俟这座建筑物——基督的身体——最后建立好,以独有的姿态屹立在地平线上,那时脚手架就无影无踪了。可是,今天,三自和基协还大有可为,必须好自为之。让我们像用爱的绳索捆在一起的许多根普普通通的毛竹一样,存心谦卑,谁也不突出自己,总体上成为一个牢靠的脚手架,在建立主的中华教会这一圣工中,找到我们每个微小的个人的使命和意义。

在三自爱国组织成立三十周年 纪念会上的开幕词

(一九八四年八月五日于北京)

今天,一九八四年八月五日,我们在这里纪念中国基督教三自爱国运动委员会成立三十周年。我们非常高兴,中央统战部、全国政协、国务院宗教事务局、中国人民对外友好协会、北京市委统战部、北京市宗教事务处、国务院机关事务管理局等的领导同志能够来参加这个纪念活动。虽然三自爱国运动最早的发起人吴耀宗先生,还有三十年来诸多领导人陈见真主教、陈崇桂牧师、涂羽卿博士、谢永钦牧师、丁玉璋院长、赵紫宸博士、崔宪祥牧师、江长川会督、贾玉铭牧师以及竺规身牧师、王镇牧师等——其中不少是早期的领导人——都不在了,我们还是高兴,因为不少位其他发起人和三自爱国运动早期以来的领导人都能够参加这个会。

今天上午在感恩礼拜的时候我曾经说:从第一世纪开始,两千年来,基督教传到哪里,三自的问题就跟到哪里,尽管“三自”两个字不一定被用上。像今天非洲就有许多独立教会,还有许多教会正在争取独立,争取摆脱所谓“母会”的控制,可见,三自顺乎天理,是历史所赋予各国信徒的命题。早在中国有共产党之前,中国与外国就有人提出自治、自养、自传。香港有反华的人说:三自是共产党强加于中国基督徒的,这些人既没有研究《圣经》,又没有研究历史。

可是三十年来,三自的确受到了我国党、政、舆论界和各界人士以及广大人民群众的支持和鼓励。特别在今天,我们不能不想到我

在三自爱国组织成立三十周年纪念会上的开幕词

们敬爱的周总理,我们亲密的朋友张执一部长、何成湘局长、肖贤法局长、乔连升局长、高山副局长,他们为贯彻宗教政策,为我们的工作花费了不少精力。宪法规定:“宗教团体不受外国支配。”这就是中国基督教实行三自得到全国上下支持鼓励的集中表现。

现在全国信徒是增加了,不是减少了。三自虽然走过不少弯路,工作中有不少缺点,但是它改了。当时一些对三自有各种保留的人也赞成三自了,所以三自是壮大了,不是削弱了。国际基督教中对我们三自表示赞成的教会和个人越来越多,不是越来越少。

今天,中国基督教不但要自治、自养、自传,还要治得好,养得好,传得好,所以又成立了中国基督教协会,做许多教务工作。摆在我们面前的任务很艰巨,我们要更好地顺从圣灵的引领,做圣灵合用的器皿。我们要更好地尊重各种不同背景的信徒信仰上的特点和要求,使中国基督教丰富多彩,巩固我们的团结,扩大我们的团结面,发动广大信徒来投身祖国四化建设的事业,同时投身建立主的身体工作。我们要继续在党和政府的政治领导下,为做好全国和各地的工作负起自己的责任,使中国基督教以更好、更新的姿态出现于世界。

纪念三自爱国组织成立三十周年的讲话

(一九八四年八月五日于北京)

基督教最初出现的时候,还没有从犹太教里分出来。第一批基督徒都是犹太教徒,他们承认耶稣基督为主,等候他再来,可是他们继续行割礼,遵守犹太教一切律法和习惯,认为这样才能蒙神喜悦。但是,很快就发生了一个问题:当不是犹太人的外邦人听了福音也接受基督为主的时候,该不该要求这些外邦人也同时接受犹太教,遵守犹太教的一切律法和习惯呢?当时有的人想当然,认为既然耶稣是犹太人,既然基督教是犹太教内部的一个派别,既然向外邦人传福音的也是犹太教徒,那么,外邦人信了主,当然应该同犹太人一样,接受割礼和一切犹太人的律法和习惯。但是彼得、保罗、巴拿巴他们不这样看。他们曾经亲眼看见,不守律法的外邦人接受了主,同样得到圣灵的恩赐,所以不赞成把犹太教的种种要求强加于他们。保罗提出因信称义。他在《罗马书》第3章说:“人称义是因着信,不在乎遵行律法”,任何人要在神面前得称为义,不是用“立功之法”,“乃是用信主之法”。

这是两个极不相同的主张。前一个主张要把基督教继续框在犹太教的圈子里,框在律法的圈子里。这样,基督教要从希腊思想得到营养会受到极大的束缚,发展不出完整的教义,像基督是太初之道的教义,道成肉身的教义,因信称义的教义,教会的教义,圣灵的教义,三位一体的教义,等等,都不可能发展成长。这样一个带有强烈的犹太民族性的基督教,不可能推广到全世界。面照后一

种主张,就是保罗的主张,基督福音向一切民族的人宣告,他们都因信称义。它突破犹太教小框框,从犹太律法和礼仪解放出来。经过这一个突破和这一个解放,福音就能够突出基督,让人看见守律法毫无功效,唯有信靠基督才能出死入生。这个福音重点突出,不拖泥带水,是上帝为世界万民预备的福音,我们中国今天能有几百万信徒,也是因此才成为可能的。

《使徒行传》第15章记载了彼得、雅各、保罗等等使徒在耶路撒冷开会商量这个事。那个会非常重要,关系到教会将是怎样的一个教会,人类此后多少世纪的历史将是怎样的一个历史。在会议上,圣灵亲自动工,亲自带领,感动一些人的心,使他们愿意听彼得和保罗在外邦人中作见证的时候所看到的神自己的作为。他们就作出决定:向外邦人传福音,应当撇开犹太教律法的框框。会议给外邦信徒发了一封信,里面说:“圣灵和我们”——这是一个不寻常的提法——“圣灵和我们定意不将别重担放在你们(指外邦人)身上”(徒15:28)。那次会议由圣灵和使徒同工,一同作出决定,因此,高举因信称义,呼吁从犹太教解放出来的主张,得到极大的胜利,“犹太派”受到很大的挫折。由于这个会议,基督教从犹太教脱胎而出,一切地方的外邦信徒都可以在圣灵引领下自己来办教会了,它们不再是耶路撒冷教会的附属物了。从此,为了更好地彰显基督的真理,教会在进入任何新的环境的时候,都应当摆脱旧的民族牢笼。我们看到,在《新约》时代,许多地方都出现了教会,它们都是圣灵所关怀、所指引的,都是地方性的,都带有本地色彩和各不相同的特点。它们同耶路撒冷教会是互相支持的,但也是平等的,不是上下级关系,也不是父子或母子关系。

有人说,《圣经》里找不到“三自”这两个字,这是对的。但是,三自这个原则、这个课题《圣经》里有没有?我想不能说没有。《使

徒行传》第15章所处理的，正是这个原则、这个课题。保罗代表外邦教会所要求的，正是三自的这个“自”。提出因信称义，反对因守律法自以为立功称义，就是让外邦教会摆脱所谓“母会”的束缚，走出自己的道路来。

两千年来，不论福音传到哪个地方，哪个民族，哪个国家，这走不走自己的道路的问题就跟了去。这问题就是：这个地方、这个民族、这个国家的人，在接受基督为主的同时，是否得把来传福音的人的国家和文化也接受过来？信基督是否意味使自己摆脱同自己的人民的联系，变成没有祖籍的人，或是变成半个洋人？

有个到非洲去传教的传教士，说要使非洲信徒除了皮肤以外一切同白人一样。这是好的传教路线吗？今天非洲有许多独立教会，实行人事独立，经济独立，传教工作独立，这就不对吗？

有两句话要讲一讲：（一）要广传主的福音，必须实行三自；（二）要建立主的身体，必须实行三自。

信基督就可以称义，这的确是福音。可是，要人家接受这个福音有个前提，那就是他们首先得承认，他们有称义的必要，也就是说，认识自己是不义的，是罪人。保罗曾经说，他自己有个经验，就是他想做的好事，他每每做不出，而他不要做的事，却偏偏会去做。这就是罪的律在人身上起作用。一个虚心的人如果扪心自问，本来应当也有同样的经验。可是传过福音的人都知道，要叫人家承认自己是罪人可不容易，自然的人是不会承认这一点的，因为人总是把自己看得很美，罪这观点是一个异己的观点。可这个异己观点又是属于福音本身的，是内在于福音的，我们没有权力为了要方便人们接受福音，就取消这个罪的问题，因为这罪的问题一经取消，人就是义的了，再也没有称义的问题，再也不需要什么福音，而这一个不讲罪的福音也不成其为福音了。讲这一切是为了要说

明,基督对传福音的人有一个要求:在传的时候,只能允许突出罪这个属于福音本身的无可避免的异己观点,却必须排除此外一切人为的、外加的异己因素,排除一切福音之外的障碍,搬掉一切使福音更难于接受的绊脚石。譬如说,传福音而同殖民主义有联系,同不平等条约有瓜葛,传福音者本人言行不一,如此等等,都会使福音的传送遇到障碍,都应当排除。

请想一想,十九世纪后半和二十世纪前半,在西方国家基督教一切海外传教区中,中国是最重要的,传教士最多,所办的大学、中学、医院也最多,但是信主的人很少,最多也只到七十万,其中还包括吃教的。今天,经过这三十多年,没有传教士,没有差会经费,不办学校医院,信徒没有好处可图,信主的人却不是少了,而是多了,而且多了三四倍。原因当然很多,但一切原因背后在起着作用的原因,是中国教会经过三自爱国运动,在较大程度上改变了它的洋教形象,使更多的人愿意听听基督福音讲些什么。神的确是使用了三自这个器皿。试想,在没有了“洋油”、“洋灯”、“洋布”的今天,如果还有个“洋教”,这对传福音的损害可太大了,原来的七十万是不会增加到三百万的。

所以,为了传扬主的福音,三自是非常必要的。

此外,三自之所以必要,还有一个原因:要把基督在地上的教会建立好,必须由各个时代、各个民族、各个国家的基督徒从他们各自的背景来认识基督无法测度的丰富,集中起来,互相分享,充实教会的灵性宝库,使教会的普世性真正得以实现。

在《启示录》第2、3章,圣灵写信给小亚细亚七个教会。这些教会各有各的处境,各有各的优点、缺点,对基督各有各的领受。圣灵不是一刀切的,他没有要七个教会都变成一个模样,他写给每个教会的信息是不同的。可是七封信的结尾都是一样的:“圣灵向

众教会所说的话,凡有耳的,就应当听。”可见圣灵愿意众教会交换彼此的领受,使恩赐由于分享越来越多。我们中国基督徒讲三自,里面没有“自足”这一条,也没有“自我孤立”这一条,原因就在这里。我们加强国内众教会的联系,保持和发展同国际教会的联系,原因也就在这里。我们不能不听“圣灵向众教会所说的话”。

我们看到,《启示录》第21章新耶路撒冷将自天而降。这座圣城东边有三门,北边有三门,南边有三门,西边有三门,共有十二扇门。这就告诉我们,到那时,信徒将从四面八方来到新耶路撒冷,形成一个个丰富多彩的行列,代表各地各族的教会。我们希望,在那时,中国教会将形成一个像样的行列,从东边一扇门进入圣城,向神献上我们自己。但是如果我们不按三自精神在中国建立主自己的身体,那么这就谈不上了,我们将仅仅是西方教会传教地图上小小的一点。

我们不要把教会的普世性仅仅理解为一个地域概念。地域概念只表达了它的广度,它还有一个深度,那就是让复活升天的基督的荣耀,透过各个地方教会和民族教会的棱镜反射出来,使基督得到更大的光辉。这就是保罗所说的:“凡事都是为你们,好叫恩惠因人多越发加增,感谢格外显多,以致荣耀归于上帝”(林后4:15)。普世教会在哪里?我们到哪里去找普世教会?普世教会不在纽约、伦敦,不在罗马、日内瓦,它就在一个个具体的教会里面。离开了一个个地方的、具体的、个别的教会,就没有普世教会,正像离开了你、我、张三、李四,一个个具体的男人、女人、大人、小孩,我们看不见抽象的人一样。中国教会越能在三自道路上走得好,就越蒙恩,对普世教会灵性财富的贡献也就越大。

以上是我从《圣经》得到的对三自的认识。从传扬主的福音来看,从建立主的身体来看,三自都是必要的。

海外有人说三自是共产党搞出来的。说这个话的人不但没有研究《圣经》，连历史也没有研究。远在中国出现共产党之前，在一八五〇年，英国就有一位亨利·樊，把“自治”、“自养”、“自传”这三个词放在一起，说这三自正是传教的目的。他要求传教士学着像保罗，不作长期呆下去的打算，应当尽快建立那地方的教会，使自己成为多余的人，不必要的人，早日离开所去的那地方。十六世纪英国基督徒摆脱罗马的控制，建立自己的独立的英格兰教会，按坎特伯雷大主教伦西的说法，“那也是一次三自运动”。

可以说，从《圣经》来看，从历史来看，两千年来，基督福音传到哪里，三自的问题也跟到哪里，尽管人们不一定用“三自”这两个字。

有人对三自没有意见，只因为看到有些标榜“三自”的人的所作所为，感到失望。对这样一些标榜“三自”的人，我们要劝导，要帮助，为他们祷告，求神叫他们认识错误，改正错误。但是，我们也应当知道，我们不要看人。人总有人的软弱，总有人的虚妄。如果我们看人，那我们连教会也会看不顺眼的，因为还不是同样有这样的人吗？我们自己又比他们强多少呢？我们要从《圣经》看清三自的本质，抓住三自的本质，同其他信徒团结，坚定不移地努力实现三自的本质。

我自己也不是天生就认识三自、拥护三自的。吴耀宗先生等教会前辈发起三自的时候，我还住在瑞士。后来我回国了，我并没有立即拥护三自，当然我也没有反对三自。我要观望一下，认识一下。我抱的是迦玛列态度：“他们所谋的、所行的，若是出于人，必要败坏；若是出于上帝，你们就不能败坏他们，恐怕你们倒是攻击上帝了”（徒 5:38、39）。后来我看清楚了，我从《圣经》上认识了《新约》的教会路线，知道三自是保罗的路线，是出于主自己。复活

的主有一次向门徒显现,约翰轻轻告诉彼得:“是主。”我好像也听到“是主”这两个字,是主他自己,是复活的主的手在主宰。我就放胆拥护三自。

我们敬爱的先辈贾玉铭老牧师对三自也有个观察的阶段。到一定的时候,当他在主前等候的一个半夜,他从主得到了“源头不浊”四个字,就决心拥护三自,接着大家选贾老牧师为全国三自副主席。所以我们不要看人,我们要看《圣经》,看源头,就错不了。

让我们把三十年所走过的路程放在主的台前。让我们把中国教会前面的路程放在主的台前,以得着圣灵的指引。

教会在哪里有腐败,求主洗净。

在哪里有错误,求主纠正。

在哪里有缺欠,求主补足。

在哪里有分裂,求主赏赐爱心。

在哪里失去为主作见证的能力,求主挽救。

在哪里有骄傲,有自恃,求主管教。

在哪里有谦虚,有善良,有团结,有相爱,求主祝福,求主巩固。

这都是靠着教会的元首,我们的主耶稣基督。

教会要在爱中建立自己

(一九八六年八月二十三日于北京在中国基督教
第四届全国会议闭幕式上的讲话)

我们今天在会议临结束的时候,来探讨一下记载在《启示录》第2章第1节至第7节那里的圣灵感动约翰写给以弗所教会的信,看对我们的工作有什么帮助。

这封信表扬了以弗所教会。以弗所教会的美德是不能容忍恶人,能把假使徒识别出来,能同尼哥拉一党划清界线。以弗所教会是一个分清是非、有所斗争的教会,它能为主的名作见证,劳苦不疲倦。但圣灵也指出,以弗所教会的亏欠是离弃了起初的爱心。

请大家注意,这封信没有责怪以弗所教会划清界线,进行斗争,而是为此表扬了它,因为在一定情况下,为了教会的见证,纯洁教会实在有其必要。但是这封信提醒以弗所教会,光嫉恶如仇还不够。教会是爱神的人的团体,也是神的儿女相爱的团体。保罗写信给以弗所教会,提到教会要在爱中建立自己,提到教会里要用爱心说诚实话,用爱心互相宽容。斗争难免伤害教会的肌体,损伤教会爱的原则。所以,到一定的时候,圣灵要教会悔改,召唤教会把离弃了的爱心重新拾起来,在爱中建立自己。

《启示录》第2章第7节说:“圣灵向众教会所说的话,凡有耳的,就应当听。”可见这封信不但是写给以弗所教会的,也是要一切教会听的,当然包括今天的中国教会在内。

我们代表全国基督教和全国信徒在北京开会,我想,这两段经文里在今天有重要的信息。

从发起三自爱国运动之初起,三自始终有一个目的:把中国的教会办好,使它能够很好地为主作见证。但是,为了办好教会,为了作好见证,我们曾有一段时期不得不比较突出斗争。很多斗争是为了纯洁教会,是必要的,是少不了的,是圣灵称许的。没有这些斗争,今天教会的光景不堪设想。因此,对在斗争中做出贡献的同工,我们要感谢他们做了好事。但是,到了一定的时候,我们要想到在爱中建立教会。这正也是广大信徒的祷告和要求。三自越能这么做,信徒越会拥护三自。

我不是说,从前没有做建立教会的工作,也不是说,现在什么斗争都要取消了,连混乱现象也要去爱了,非法违法活动也要听之任之了,逆着三自而行也算是好的了,有人利用香港对我们采取反华反三自攻势,我们也要欢迎了。不是的,但总的来说,拿我们全国通盘工作来说,今天“破”要让位给“立”,斗争要让位给和好,拆毁要让位给建造。三自要高举,三自也要落实。我们要把三自落实到办好教会,用办好教会来宣传三自,来说明三自的正确性、必要性。现在有些地方有些同工同道对三自有意见,每每不是反对三自的原则,而是觉得在三自名下所做的有些事,似乎是在损害教会,不是建立教会。只要三自以办好教会为己任,信徒对三自就心悦诚服,三自就成为众望所归,成为天经地义。坏人要在教会里为非作歹,信徒就甘心乐意站在三自和基协一边去反对他们。

我们三自早就在爱中建立教会。一九五六年曾发出这个号召,六年前成立中国基督教协会更是这一用意。我不是说我们五十年代、六十年代没有致力于办好教会,但是最近这六年的成绩比较显著。我们感谢神,有他的许多忠心仆人在这方面作出了重大贡献,像不在这里的郑主教就是一位,我们想到他们。

在批判空头政治的时候,时常有人提出,政治要落实到业务,

“红”要落实到“专”。那么我们的“独立自主、自办教会”的口号，也要落实到办好教会；自治、自养、自传也要落实到治好、养好、传好。落实宗教政策以来，各地有那么许多堂，那么许多点，怎样来办好它们，此中值得研究的问题太多了。我们三自的骨干，不论有没有圣职，都要好好学习、好好追求，使自己成为满有基督爱心的、脚踏实地的教会建设专家。我们全国省、市、县各级三自和基协，如果还有斗争时代养成的老心理、老习惯、老态度，一定要改掉，要教会化、教牧化，要像做牧养工作那样来处理一切问题，要同情第一线教牧同工的困难，为第一线教牧工作服务，不回避而是及时解决他们工作中的问题。建立教会，提高教会素质，使教会为神所悦纳，为众民所喜爱，更为信徒所喜爱，这应当成为三自和基协的中心工作。

在我们国家里，一个努力从事科学研究、提高自己的科研水平、拿出科研成果来造福群众的科学家，就是一位政治上好的科学家；一个努力从事教育工作、提高自己教学水平、给祖国培养出新一代人才来的教育家，就是一位政治上好的教育家。医生、售货员、服务员、工人、农民、艺术家都一样。那么一个忠于主的托付，不断提高自己的神学和灵性水平，勤勤恳恳做好教牧工作，让群羊灵性上得到饱足以致能够积极投身祖国四化建设，努力把教会办得有高的质量的教牧人员，就是一位真正爱国爱教的教牧人员。要办好——这是主的托付，是信徒对教会的盼望，也是祖国对其一切事业的要求。我们祖国的各项事业像一个家庭里的许多孩子，要每个孩子都成长得好，这个家庭才好。教会也是祖国各项事业之一，祖国期望我们把教会办好。办好教会是爱教，也是爱国。

在我们的同工中，拥护三自，教牧工作做得好，能在灵性上供应信徒的同工，我们格外要爱护。如果我们真要扩大团结面，就要

尊重他们,依靠他们,重视他们的意见。他们的意见每每代表广大信徒的想法。

我们要处理好三自和教会的关系。教会是基督的身体,是复活之主的居所,是历代圣徒的团契,不是三自爱国组织的下属单位。教会是主体,而三自和基协都是在一定历史条件下的产物,都是为教会服务的。

我们也要处理好三自和基协的关系。三自是中国基督教信徒的爱国爱教团体,基协是爱国爱教的中国信徒的教务组织。这两个团体是左右手的关系,密切结合的关系,不能分开,更不能分家。如果基协离开了三自,基协就容易把信徒带上一条不问三自不三自的道路,回潮、复旧、分裂都会发生,三自就名存实亡,事实上是被取消了,教会必然失掉“众民的喜爱”,它应有的见证也必然失掉听众。如果三自离开基协,三自就脱离了教会信徒群众,只是唱一些政治高调,搞一些形式主义,实际上是架空了自己,它的团结面会越来越小,它也就难于同假使徒,同尼哥拉一党进行斗争。可见三自和基协分家,正是海内外反对我们的人所欢迎的。三自必须为建立中国教会服务,这正是老一辈发起三自的时候的初衷,许多同工同道所以投身三自的原因。只有这样,三自和基协才能扩大团结面,成为带动信徒共同进步的火车头。

三自是整个中国基督教的三自,基协也是整个中国基督教的基协。只要是在中国国内,只要是尊奉耶稣基督为主的基督徒,只要不是反革命或做其他非法违法的事,无论他们在哪里,我们三自的工作、团结的工作、教育的工作、协助排除困难的工作,也就应该做到哪里。

我们在爱中建立的教会,在信仰上、礼仪上不是清一色的,是允许多样的。保罗在《哥林多前书》第12章第3节说,若不是圣灵

所感动,人们不会承认耶稣基督为主,凡承认耶稣基督为主的,都是圣灵所感动的,我们不要轻易否定别人。信仰上、礼仪上,我们不硬要少数服从多数,我们希望多数照顾少数。但是我们也希望任何少数首先以感谢的心承认,各种背景的基督徒都是基督所救赎的,基本信仰都是一样的;首先以感谢的心承认,这共同的信仰都来自基督,是基督的启示,是基督的赐予。抹煞这个共同性,一味强调自己的特殊性,用小的区别冲掉大的一致,这就否定了基督的作为,离开了保罗的教导,重新去走分裂基督的老路。在《哥林多前书》第12章保罗告诉我们:“眼不能对手说:‘我用不着你。’头也不能对脚说:‘我用不着你。’”我们是属于一体的,这是基督身体的真理,是天国的奥秘,是耶稣向父的祈求,是他离世前对门徒的嘱咐,是我们轻慢不得的。我们只有相爱,人们才能认出我们是基督的门徒来。

主耶稣告诉我们,教会像田地的庄稼,并不一定是很纯的,有好种长出来的麦子,也有撒旦在人睡觉的时候所撒的稗子。有稗子的教会仍旧是教会。像《启示录》里那七个教会,毛病都很大,但它们仍还是金灯台,那右手拿着七星的,还是在那七个金灯台中间行走。耶稣没有要我们一天到晚花大力气把稗子从田地里拔出来,也没有要我们把麦子移栽到别的田地上去。他说:“容这两样一齐长,等着收割”(太13:30),就是到那时才把它们分开。今天,在教会里,我们的责任是生长,使麦子长得超过稗子,不让稗子长得太快,挤掉麦子。谁认为自己是好的种子,就该撒到田里来,让它生长,不应当把自己放到教会外边,指责这个人、那个人都是稗子。今天我们的责任不是指责,不是拔,而是进到田地里,生长壮大,把教会办得更好。

在好久以前,在巴勒斯坦,有两个弟兄分居在一块田地的两

头。哥哥已经结婚成家,弟弟还没有。收了庄稼以后,在一个晚上,哥哥想,我已经成家,劳动力多,弟弟一个人,生产有困难,让我把田里的产品送一点到弟弟那里去。正在这时候,弟弟也在想,我一个人,吃用很省,哥哥人多,让我把粮食送些到哥哥那儿去。弟兄两个同时都背了粮食,到对方那儿去,在黑暗中碰在一起,庄稼撒了一地,兄弟俩就拥抱在一起。他们这样做,正表现出来:“弟兄和睦同居,是何等的善,何等的美”(诗 133:1)。许多许多年之后,就在他们那拥抱的地方建造了耶路撒冷,建立了圣殿。这就是教会在爱中建立自己。

这次开会,让我们想到《使徒行传》第 15 章告诉我们的耶路撒冷会议。它不是一次例行会议。它是一次教会在圣灵引导下解放思想、进一步在爱中建立自己的会议。求圣灵也引领我们,迈开更大的步伐,在三自爱国精神下,在爱中建立基督的身体,使一个三自的、同新中国面貌相称的教会,在东方的地平线上出现,好吸引万民来归向主。

愿主坚立我们手所作的工,我们手所作的工愿主坚立。

给一位信徒的信

(一九八八年)

某某弟兄：

你六月十六日的信早已到达，但因我这一时不在南京，最近才回来，故而迟复，请原谅。

我同意你的观点：目前落实宗教政策方面尚有不少问题，这于教会于国家都是不利的。信徒对那些强加于他们的所谓“守则”深有反感，我也同意。

但是你说：“中央对这个问题根本就不重视……而教会上层人物又没有人敢于据理力争，主要是怕丢掉饭碗和乌纱帽。”对此我不能同意。

如果中央对落实政策根本不重视，基督教怎么十年来开了四千多所教堂，印了三百万本《圣经》？当然不能说中央每一部门都重视，但中央主管部门，即中央统战部和国务院宗教事务局，我认为是很重视的。否则今天情况一定大为不同。

教会里不是没有怕丢掉饭碗的人，但是说没有人敢于向中央和政府各级反映情况、要求落实政策，这不是事实。最近全国两会还写信给中国海关，并抄送全国人大常委会等，就查抄进口宗教书刊问题据理力争。

我是这样估计我们今天的情况的：宗教政策的落实有种种困难，但落实是在进展中，不是在后退中。

对这样一个政府，我们是讲对抗和战斗，还是讲对话和沟通

呢？这是一个十分重要的问题。香港基督教中一些反华出版物认为，同政府对抗和战斗的才是真正的基督徒。我希望你和另一位弟兄不这么想。只要我们同一个政府有对话和沟通的余地，我们就不应当轻举妄动。至于政府中人不信神，这也构不成反对政府的理由。

正是由于全国宗教界不少人经常努力在向政府反映问题，争取宗教政策的落实，政府也从团结广大人民出发，愿意接受我们的正确意见，才有今天这么些宗教自由。不管有人多么反对各级两会，他们今天享有的这么些自由，也是和各级两会的努力分不开的。他们引用宪法关于宗教信仰的条文，却不知道在这条文的形成过程中，全国两会作出过不少的努力。

我们可以说宪法宗教信仰自由条目的落实遇到不少困难，可以说落实得太慢，可以说有的地方有的干部拒不落实。但是我是全国人大宪法修改委员会委员之一，我知道这条文的形成过程，说“这一条的目的乃是为了欺骗国内人民和世界舆论”，这太不公道的了。

总之，只要有通过摆事实、讲道理，使情况好转的可能，我就决不认为我国基督徒到了粉身碎骨一拼了事的时候。我不相信上帝会赞许这种盲动的“殉道者”。这涉及到基督徒对自己国家的看法问题。

你提到的那位弟兄看来是爱护教会的，但他所写的东西不少都和事实不符，同香港某些反华的人的论调则十分吻合。香港某刊物得到了他的信件和发言稿，如获至宝，大加渲染，这就不足为奇了。

欢迎你写解放神学的文章。它的发起人是秘鲁一位天主教神甫，名叫古斯塔沃·古铁雷斯(Gustavo Gutierrez)。它接受马克思

主义中基督徒能够接受的东西,但他所写的是神学,不是马克思主义。据我所知,他同苏联并无联系,我没有看到过他赞扬或贬低苏联的话。我认为今天值得向国内知识界信徒介绍解放神学,但不应当提倡。一是因为神学的永恒主题是和好——与神和好,与人和好,而不是解放;二是对人民的国家谈不上解放,应当讲的是安定团结和建设。不知你认为然否?

顺祝

主偕

丁光训

走出一条新路来

(一九八八年六月二十六日在上海祝圣主教典礼上的讲话)

教会是信徒的家。今天,在我们家庭里要办一件喜事,就是按立我们亲爱的孙彦理同工和沈以藩同工为上帝的教会的主教。今天有这么多信徒来参加,可见大家都很重视这件事。

近几年来,有一件事叫全国信徒分外高兴,满心感谢,那就是“办好教会”的呼声越来越高。教会不是要拆毁,而是要办好,这一点越来越深入人心。在五十年代、六十年代、七十年代,教内教外有不少人都认为教会的命运是拆毁。有的认为拆毁教会是好事,有的认为是坏事,但有一点是相同的:教会在中国已经来日无多,等待她的是拆毁,是消亡。今天,许多人已经放弃这种观点,有的人不放弃也已经收起来了。今天,大家都在讲教会的建设、建立、建造、办好,认为这件事意义重大,连教外也有许多朋友支持我们办好教会。这叫我们兴奋,很受鼓舞。

办好教会不但是一个呼声,它已经化成不少行动:

八年来,在上海、南京、福州三市印刷了《新旧约圣经》和《新约附诗篇》近三百万本。现在更有爱德印刷厂优先接受教会所委托的印刷《圣经》的业务,仅今年将印刷《圣经》九十万本,包括简体字《圣经》和串珠《圣经》。

神学院校现在共有十二所,有六七百位青年正在接受造就,准备前赴教会工场。

礼拜堂修复的和新造的已有四千多所,此外还有几万处家庭

聚会,这些堂点大多在进行着正常的宗教活动。

现在基督教信徒有好几百万。

我们出版《天风》等刊物。《教材》近几个月来在内容上正在转向基层教会。《金陵神学志》是世界发行量最大的神学刊物之一——每期一万九千册。

这样,目前中国教会是在建设中。信徒欢迎治好、养好、传好的方针。

但是,建造教会的工作还远远没有完成,教会里还有许多不好的、不应有的、叫信徒痛心的事。有了这些事,信徒在礼拜的时候心里不痛快,不好受,像有块石头压在心头。正像一首赞美诗里说的,“爱她我常流泪。”我们要看到这一点。

在有些地方,牧师之间、同工之间关系不正常。

在有些地方,信教的人同干部之间关系不正常。

在有些地方,灵性供应贫乏。

在有些地方,对处于少数地位的信徒在信仰上和礼仪上的尊重不够。

在有些地方,不重视救灵培灵的工作,却去做图名的事、赚钱的事。

在有些地方,信徒在露天聚会,夏天冬天都一样,下雨下雪打伞聚会。有人听到这种情况心里难受;有人却说,他们活该,谁叫他们聚会的!这是对人民、对教会两种相反的态度。

以上种种都说明,办好教会千头万绪,难怪广大信徒暗暗流泪、着急。

一九三七年在英国牛津举行一次教会生活和事工的会议。会上提出:“让教会成为教会。”这正是历来广大信徒和广大教牧同工的愿望和要求。不要把教会办成衙门、机关、文娱场所、经济实体

或是其他部门的派出机构。教会首先要成为教会。

现在社会上对基督教的观感比过去好得多。人们认为基督教同社会主义可以协调,并且希望更加协调。我同意这个观点。我们的信仰要求我们的教会同社会主义相协调。当然,教会也要与上帝的爱的旨意相协调,同《圣经》的训诲相协调,同教会之所以为教会的本质相协调,同广大信徒的正当愿望相协调。这样的教会才是教会。

中国教会是普世教会的一部分。哪一部分?是普世教会中年轻教会的那部分,而且在那部分中又是处在一个有几千年历史文化,却又进入了社会主义历史阶段的社会的那个部分。约书亚的话“这条路你们向来没有走过”(书3:4),用在中国教会身上正合适。我们走的是前人所没有走过的路。论条件,我们这教会是很差的。但是上帝没有安排条件好的教会来走这条新路。那么我们就好好地走吧。我们愿意独立自主,在普世教会的代祷中,在它的关怀下、祝福下,在中国大陆这崭新的环境里为主作见证。

按立两位主教也要放在办好教会这大前提之下来看。

有人曾经用老眼光来看,说这是恢复宗派,特别是恢复圣公会。不是的。我们有掰饼,但不是恢复聚会处;我们尊重安息日,也有谦卑礼,但不是恢复安息日会。这些都是尊重各种信徒在信仰上和礼仪上的特点,来保证我们的团结。

从世界教会的历史和现状来看,天主教会、东正教会、东方(实为西亚和北非)教会,以至北欧、北美的信义宗教会和美国的联合卫理公会,都实行主教制。实行主教制的岂只圣公会一家呢。

何况我们不过是有主教,并不是实行主教制。《新约》时代的教会就是有主教(或译为监督)的。

有主教,我们教会的圣职就可以齐备,或更加齐备。这是重要

的一步。

主教在中国教会中的作用究竟怎样？现在很难给以系统的说明，我们且让圣灵来引领我们，使我们渐渐看得清楚起来。做了再回过头来认识做的意义，这在我们已经有好多经验了。彼得下楼出门朝向哥尼流那里去的时候，也是很不明白行将发生什么和发生的事的全部意义的。这本来就是前人没有走过的路嘛。

有一点是清楚的：我们是有主教，不是实行主教制。我们的主教圣职不是行政职务，我们的主教不管理某一教区。主教是有权力的，但这权力不来自章程规定，不来自行政地位，而来自他灵性上、神学上、道义上的威望，来自他的服侍、侍奉、服务。主教是仆人中的仆人。他侍奉得越好，他越有发言权。他越民主，他越能号召。

我特别希望我们的新任主教能在下列四方面做好侍奉的工作：

(一)神学思想的建设；

(二)崇拜精神的更新和提高；

(三)维护宗教自由和政教关系的正常化；

(四)加强同工间的团结，包括注意尊重处于少数地位的信徒的信仰和礼仪的特点。

我们牧师也好，主教也好，不是靠权力，而是靠爱心和榜样。

保罗在《哥林多前书》第11章第1节说：“你们该效法我，像我效法基督一样。”

保罗敢于这么说，因为他是尽心尽力效法了基督。我不敢说这句话，因为我知道我在效法基督上差得太远。我们感到痛苦，因为这段《圣经》的要求太高，我们的实际太低；要求与实际之间距离太大。但是，主既然把建立教会的使命托付给我们，他对我们不能

提出更低的要求。

我们只有求圣灵赐予力量,帮助我们重新立志效法基督,使我们也敢于说,“你们该效法我。”

我们是在走前人没有走过的路(书 3:4)。让圣灵引领我们,让我们彼此帮扶,为中国教会和世界教会走出一条新路来。

理顺三自组织和教会的关系

(一九八八年十二月十三日于上海在中国基督教

全国两会常委联席会议上的讲话)

亲爱的委员们：

这次我们在这里开会，要研究一个广大教牧同工和信徒十分关心并时常议论的问题，那就是怎样理顺教会内部的关系，首先是三自组织和教会的关系。

请让我把此中的背景按我个人的了解介绍一下。

吴先生所发起的三自爱国运动的功劳和成绩，是十分巨大的，它对中国基督教和世界基督教导致了一些重大的变化：

(一)在新中国教会里高举爱国主义旗帜，团结广大信徒热爱祖国，投身社会主义建设。

(二)基督教通过实践三自爱国，改变了它在广大人民中的形象，减少了落实宗教信仰自由政策的困难，给基督教赢得一个较好的活动环境，经受得住像“文革”那样的冲击。

(三)在全国范围实现了中国教会先辈独立自主，自治、自养、自传的遗愿，为今天的治好、养好、传好开辟了道路。

(四)促进了教派之间的和睦共居，为后来的无宗派局面准备了条件。

(五)开创了第三世界教会在全国范围独立自主自办的先河。

(六)揭示了传教运动遭受殖民主义、帝国主义的损害，引起世界各国教牧领袖和广大信徒以及历史学者的重视，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他们对传教工作理论上的反思和实践上的更新。

(七)在国际教会中赢得了许多对华友好的领袖和同道,同时也使他们更多地看到教会的希望,加强了他们的信心。

和人们的任何运动和组织一样,由三自组织领导的三自运动不是没有它的缺点和错误,但是它的功劳是很大的,是有目共睹的,我们不能不把三自运动看为上帝手中的一个器皿。

我们知道,三自运动的宗旨只是在教会里提倡爱国,提倡教会自治、自养、自传;它的目标是比较有限的,办教会和管教务不在它的目标与任务范围之内。历届三自组织的章程也都没有说过它有办理教务的职能。

三自发起之初就重视这一点,它一再向同工同道清楚交代:它不是领导或管理教会的,它只是号召中国信徒政治上要爱国,同时主张中国教会的权力不要由外国教会掌握。

广大信徒当年之所以拥护三自(三年里就有当时全国信徒的半数签名),是因为三自告诉信徒,信徒也认识到,教会只有实行三自才有前途。他们要的是办好教会,作好见证,他们在三自爱国运动身上找到了办好教会和作好见证的希望。三自不干涉信仰,不指挥教会,只提倡独立自主,能为教会开辟前途,这样信徒就放心。

但是到后来,三自组织在职能上发生了变化。这变化是可以理解的。朝鲜战争爆发,中外资金冻结,差会的补助突然停止,好些宗派领导管理教务的体制运转不灵,甚至瘫痪,各级三自组织不得不在最低程度上承担各宗派教会领导管理部门的一些职能。随着一次接着一次的政治运动,整个国家越来越强调高度集中的一元化领导,这也影响到教会。在不少地方,教会一些必要工作的实际领导就无可避免地集中到三自组织。这不是三自组织的初衷,但是,就这样,在不少地方,三自从一个高举爱国旗帜和提倡自治、自养、自传的信徒群众运动和群众组织,变成了处在教会之旁或之

上,像教会又不是教会、像政府又不是政府那样的一个教会领导管理部门。对此,许多同工和信徒不理解,解释不清,工作上也就会遇到磨擦和矛盾,三自要扩大团结面也就困难。这就是说,三自组织和教会的关系不顺,出来一个理顺的问题。

我们做教会工作,凡事都要在信仰上、神学上有充分根据。教会是一个社会团体,但是从基督徒的信仰、思想、心态来看,教会又和妇联、红十字会等不同,不是一般的社会团体,它有它的神圣性。它不但是信徒的属灵团契,它还是神的家,是圣灵的殿。基督是它的头,它是基督的身体。我们的赞美诗说:它是“圣水圣言所造成,是主的新创作。”赞美诗还说:“教会是金灯台。”《使徒信经》和《尼西亚信经》在表达我们信上帝圣父、圣子、圣灵这三段之后,接着第四段就说,我们信教会。可见历代信徒把教会当作一个奥秘,当作基督教信仰的一个组成部分。

正因为教会在基督教的教义中有这么崇高的地位,如果任何机构凌驾于教会之上,信徒信仰上就觉得不顺不通,觉得别扭,觉得作为教会元首的基督的地位被取代了,心里就有压抑感。因此,“三自领导教会”等提法,中外信徒听了觉得不顺。这并不是因为信徒不爱国或不拥护三自,也不是外国信徒敌视新中国,这里面的确有信仰的缘故。这一点每每是不信基督、不懂基督教或不理解基督徒思想感情的人所不加重视的。

保罗在《以弗所书》第5章讲到“基督爱教会,为教会舍己。要用水藉着道把教会洗净,成为圣洁,可以献给自己,作个荣耀的教会,毫无玷污、皱纹等类的病,乃是圣洁没有瑕疵的。”在三自的早期,我们常用这段《圣经》来说明洁净教会的道理。现在值得一提,要洗净的是教会,水不过是为洗净教会服务的。马丁·路德发动宗教改革运动,这个运动也是为教会服务的,而教会是常存的。运动

和它的组织是为教会服务的,基督教的主体是教会,不是一个运动,到了一定的时间调整运动的职能,是可以设想的。

由于这些考虑,许多同工同道都认为,现在已经到了作出调整的时刻。为使教会得到更多的保养顾惜(弗5章),必须让教会按《新约》教导和教会优良传统,用教会的办法来办,这不是其他组织所能代替的。

同工同道们,这些时我时常想到施洗约翰,他是那么重要,又是那么虚己。他才出生,他父亲撒迦利亚就预言说:“孩子啊,你要称为至高者的先知;因为你要行在主的前面,预备他的道路。”这话点出了施洗约翰在上帝拯救史中的地位。三十来年之后,约翰和基督相遇,约翰自己说:“我不是基督,是奉差遣在他前面的。”他还说:“他必兴旺,我必衰微。”约翰好像是说:一个准备道路的运动如果忘记它的使命就是准备道路而不是取代基督,它势必会走向它的反面,它的促进作用会变为障碍作用。

有的同工提出疑问:今天,我们自治、自养、自传还存在问题,我们内部还有离心倾向,随着开放,出现了海外渗透,此外还有人在搞非法违法活动,因此,目前是不是提理顺关系的时候呢?关于这个,我们得搞清楚,正是因为情况严峻,理顺关系更有其必要。三自爱国运动的目标是很有限的,不过是提倡爱国和三自,超过这个而取代教会的职能,许多问题就发生了。像按三自爱国原则办好教会,像治好、养好、传好,像为各种教派背景的同工和信徒作出妥善安排,得能安定团结,像神学思想建设和教育,像牧养教导信徒,培养灵命,使他们能抵制一切歪曲《圣经》真理的异端邪说,像见证基督,传扬福音,这些工作是做不完的,却都是教会分内的事,在教会和基协名义下进行这些工作,就可以更加名正言顺,更加有效。正是为了要做好这些工作,才提出理顺关系的问题。事实告

诉我们,由于关系没有理顺,我们的工作受到不小的损害,扩大团结面云云,每每成为一句空话。至于海外反动势力的渗透和非法违法等活动,那是根据法律加以取缔的问题,是政府有关部门的职能,三自组织没有这个职能。

有的同工问:既然三自是个职能有限的运动,那为什么不是更早面到今天才提出这个问题呢?我想,原因之一是,五十年代后期起,全国“左”的路线日益抬头,最后甚至占据了统治地位,教会圣工受到干扰和损伤,这个问题根本摆不上我们的议事日程。原因之二是,拨乱反正以来,我国教会上下忙于收回教产,开建教堂,设立家庭聚会点,出版《圣经》和书刊,开办神学院校,这个问题一时也排不上队。原因之三是,只有经过比较充分的实践,我们才能比较充分地把握问题之所在,得到着手予以解决的条件。一九八〇年成立基协,提出治好、养好、传好,可以认为是走向理顺的重要的一步。

那么我们是不是取消三自呢?决不是的。三自是我们的原则和指导方针,三自组织在职能上的任何改变决不意味放弃三自的原则和指导方针。应当认为,高举和宣传三自是中国教会和全体信徒的经常工作。在高举和宣传三自之外,由教会和基协以治好、养好、传好的事实来说明自治、自养、自传的正确性和可能性,其效果将是更好的。不但我们不是要废除三自原则,许多同工同道都认为,三自组织也不应撤销。有人设想,今后三自组织需要结束它的管理教会的职能,但是作为中国基督徒高举三自原则,服务教会和服务社会的组织,它们是可以大有作为的。这意见值得重视。

不管用什么方式来理顺关系,对各派信仰和礼仪特点给予尊重的原则,今后在我国基督教不但不变,而且一定要更好地予以贯彻,不使任何一派感到若有所失。特别要求处于多数的用更多的

爱心去体贴处于少数的,制订规章制度必须顾到少数的特点。同时我们希望处于少数的也能以大局为重,不要夸大信仰和礼仪方面的个别特点,无视我们基本信仰上基督所赐的一体,从而做出有损于团结的事。

教务机构同下一级组织和基层教会的关系,不是行政式而是教会式、牧羊式的,不体现在依靠权力去管束,而是应当体现在神学上和原则上的指导和帮助。

广大信徒所期望于我们的是认真办好教会。只有办好教会,我们的基督教才能成为全国一切信奉耶稣基督为主的人们的团结中心。为此,基督教人事使用上必须反映办好教会这个要求。我们要不拘一格,广开门路,一切愿意服侍基督和教会,能为办好教会作出贡献的同工同道,特别是在培养信徒灵性和维护教会合法权益方而深得信徒欢迎和器重的,不论年长年轻,我们都要重用,决不许嫌恶排斥他们。过去有隔阂的,让我们在主内互相宽恕,求得和好。这样,中国基督教将出现一个新的大团结的局面。我们要求全国教牧传道同工,重温蒙召当时的热心,重立奉献的志愿,摆脱次要的事务,精心修持,使自己成为大有灵命供应的牧者,成为我国教会的宝贵财富。

同时,我们也知道,办好教会是一个大的工程,需要各样人才。不管怎样调整理顺,我们不能失掉任何一位愿意继续为教会效劳的同工。对同工们今后工作,一定要作出好的安排,使人尽其才,各得其所,同心协力做好教会的工作,生活上待遇上也应照常得到照顾。

我们的一切作为,应当考虑怎样能有利于基督教会的建立,为此,凡不合教会体统和信徒大众所不喜欢的事,我们要坚决不做,至少不要急于去做,且等征求全国教务机构和全国三自组织意见

以后再决定。有的朋友不信宗教、不懂宗教、不理解信徒的思想感情,他们好心所作的建议有时不为信徒所喜欢。我们理当从工作利益出发,好好说清楚这种建议为什么不妥。

长期以来,政府宗教事务部门对我们的帮助是极大的,但是有不少同工提出,今天,基督教本身理顺关系尽管是必要的,但如果只理顺教内关系而不理顺同政府的关系,能完全解决问题吗?是的,这是个重要问题,但是我们知道,党政领导部门对情况早已察觉,对于按十三大精神,理顺政府同宗教界的关系的问题十分重视。我相信我们可以期待,政教分开的原则将进一步得到贯彻。对大量的正当的宗教团体和活动,应当坚决放松,对小量的反革命的、非法违法的、配合海外敌人渗透的,才应当坚决管紧,而不是相反。政府部门大力落实党的宗教信仰自由政策,根据党的方针政策和国家的法律规定,从政治上来帮助宗教界,对宗教界提出建议,为宗教界服务等等,我们都是欢迎的,但对教会人事、财产、经济的自主,应充分给予尊重,让教会按教会固有的办法办好,这样正足以改善和加强领导。这些精神,我们有理由相信,将会得到重申,并在基层和各级进一步付诸实践。我们宗教界作为党的诤友,也有责任帮助促成实现这些精神。教会内部关系和政教关系两个方面的同步调整,是我们做好工作,使更多信徒拥护两会的重要关键,否则非国家之福,也非教会之福。

有人想到,我们的酝酿和探索将会招致海外教会中反华势力的攻击,例如说我们承认三自搞错了,要收起来了,等等。是的,不论我们对三自组织和教会的关系作不作调整,或作什么调整,他们都不会说好话。他们是唯恐天下不乱的,我们做好事,他们格外仇视。但是我们该问的,不是他们将怎么说,而是我们怎样更好地建立主的教会,使上帝得到更大的荣耀,信徒更满意,更靠拢,团结面

更扩大。

理顺关系的问题的提出,对有些较少接近下层的教会领袖固然有些突然,但是各地同工同道早就觉察这问题的存在,而且早已存在大量的议论。最近我们曾约集少数同工进行讨论。我很高兴地看到,讨论十分热烈,人人都能以教会大局为重,没有一点本位主义,这是令人感恩的。

究竟要不要有所改变?应当怎样改变?我们不急于作出结论,我们大可等待,希望各位同工同道投入讨论,各抒己见,真正做到知无不言,言无不尽,为了一个目标,就是把教会在神州大地上真正建成基督的荣美的教会。

谈当前教会若干问题

(一九八九年圣诞节前答若干神学生问)

问：您怎样看待十年来中国教会工作的得失？

丁：这十年是我国政府在各界配合下大力落实宗教信仰自由政策的十年。在这形势下，我国教会教牧同工和广大信徒投身社会主义建设和服务人群，努力为主作见证，很见成效。教会越来越得众民的喜爱，人数有正常的增加。教外有不少知识分子对基督教摆脱成见，愿意研究、靠拢以至接受。自治、自养、自传已经从号召和启蒙发展到自治要治好、自养要养好、自传要传好的新阶段。这是办好教会，建立基督身体的号召，使信徒很振奋，将大大巩固和扩大我们的团结面。教会在文字出版、神学教育和制订规章制度方面做了许多实事。《圣经》供应的紧张状态已经缓和。理顺三自爱国组织和教会以及和基协的关系的问题，已经进入议事日程。实行三自的我国教会，作为世界教会的一个肢体，得到普世信徒的肯定和欢迎，建立了广泛的国际友好联系。国际教会中反华势力主要只是依靠金钱来维持它们的活动。

存在的问题也不少。同工高龄化局面还没有扭转。牧养工作和神学思想工作薄弱，甚至荒废。信徒信仰素质偏低。三自爱国教育亟需加强。进入无宗派历史阶段所遗留的问题尚待更好解决。有些地方对落实政策缺乏热忱。有些地方没有把三自落实到办好教会，结果三自也难能办好。有些地方反华势力的渗透和非法活动有抬头之势。

问：您怎样看待传扬福音的问题？

丁：基督吩咐门徒把福音传到地极。一个人归向了基督，自然会愿望为主作见证的。谁也不能否认，我们中国的教会是个传福音的教会，要不然，怎么会有许多新的信徒呢？说了这一切，我还得提醒一下，教会还有其他职责。在今天，通过崇拜、讲道、查经、谈话去帮助信徒培育灵命十分重要。只讲传福音而不讲深化和提高，信徒的信仰素质必然缺乏培养和训练，就无从抵制歪门邪道，这决非教会之福，也决非国家之福。你们应当准备自己成为既能传扬福音，又能牧养羊群的仆人。传福音的力量和牧养的力量应当同步和配合。

问：我们有的同学说三自任务已了，有的则认为三自任务未了。您怎么看？

丁：我想同学们与其在“已了”和“未了”上争论，还不如探讨“任务”是什么。

一切事物的运动都呈现阶段性。三自最初旨在解决中国教会的自主权问题。它所要求的政治上是爱国，宗教上是独立自主，自办教会，也就是自治、自养、自传。当时的中心问题是：中国教会由外国差会或其他代理人来办，还是由中国同工同道来办？今天，在三自爱国运动影响所及的范围内，自主权问题已经大体解决。如果我们还只在自主权问题上做文章，文章会无可多做的。

总的说来，今天已经到了三自深化的阶段。如果说，从西方控制下争取自治、自养、自传是文章的上篇，那么，今天努力按三自爱国原则从事治好、养好、传好是这篇文章的下篇。这是中国教会基本实现独立自主之后必然要提出的使命和任务。自主权不是供观赏的，要用这个权去办好教会。光说自办是不够的，自办得办好，这样才能为三自爱国运动树立好的形象。正像收回租界是对的，

但收回了要把市政工作做好,否则人民还是要失望的。把办好自治、自养、自传的教会看为重要任务的,不但有广大信徒,也有许多教外朋友。像习仲勋同志一九八六年就向我国基督教领袖说过:“基督教已成为我国基督教徒自办的宗教事业,希望我国基督教界朋友们继续坚持三自爱国的正义立场,不断巩固和扩大基督教徒在三自基础上的团结,为办好中国基督教自治、自养、自传的教会而努力。”这个办好教会的任务今天已经落在我们肩膀上。我们全国各级两会以及十三个神学院校都必须就怎样治、怎样养、怎样传进行研究和提供指导。神学生也应当研究这些问题。

问:办好的“好”有什么标准?

丁:大家的标准不会一律或统一的。这就要求好好探讨和互相尊重了。我想,差别也不会太大。大家总会同意,办好教会应当按三自原则,按爱国爱教原则,应当遵照《圣经》教导和教会传统,应当尽量尊重广大信徒愿望,应当重视并提高妇女信徒在教内的地位,应当勤俭节约,应当尽量鼓励平信徒的参与,应当实行民主管理,如此等等。如果我说,以(一)信徒满意和(二)“得众民的喜爱”为办好教会的两个标准,我想信徒也会同意的。

问:办好教会是不是指理顺关系?

丁:办好教会是一个更大的概念。在一个办得很好的教会里面,各种关系应该都是比较顺的,但办好教会的含义大大超过了理顺关系。后者不过是办好教会的一个必要的组成部分。

问:请您说说理顺关系是何所指?

丁:要理顺的关系当然很多,目前在谈的是理顺三自爱国组织和教会的关系。根据中国基督教三自爱国运动委员会的章程,它的宗旨是:“在中国共产党和人民政府的领导下,团结全国基督徒,热爱祖国,遵守国家宪法与法令,坚持自治、自养、自传,独立自

主,自办教会的方针,保卫和发展三自爱国运动的成果;协助政府贯彻宗教信仰自由政策;开展国际友好往来;并为把我国建设成为高度民主、高度文明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现祖国统一,维护世界和平而贡献力量。”这宗旨是好的,必要的。这宗旨没有赋予三自爱国组织领导、管理教会的职能,那就是说,三自爱国组织不是教会实体。因此,从神学上看,这宗旨也是通得过的。在有些三自爱国组织担当了领导、管理教会职能的地方,关系就不顺,同工和信徒中间的意见就多,觉得信仰上不通。如果这些三自爱国组织摆脱管理教会的职能,只在它们的宗旨所规定的范围内进行工作,而治理教会则由教会和基协按教会的传统和常规方法去进行,关系就顺了。这样,两会真正分工合作,一起为教会服务,真正成为人体上的左右手了。三自爱国组织按其章程摆脱了管理教会的种种杂务,三自爱国原则将更能为信徒和教牧同工所看清、理解和支持,我们将能更好地按三自爱国原则办好教会,三自爱国运动将有更好的形象和坚实的群众基础。有了这样的凝聚力,我们将能更好地对付国内外敌对势力的分化瓦解。

问:有人以为,理顺关系意味结束三自爱国组织,对此你作何评论?

丁:理顺关系和结束三自爱国组织这两者是互相排斥的命题。如果三自爱国组织行将结束,它同教会以及基协的关系行将消失,哪里还有什么理顺不顺的问题呢?要理顺关系,前提是肯定关系的存在,也就是肯定存在的是两会而不是一会。有些人未及细细研究,就把理顺关系和结束三自爱国组织混同起来,看为同一件事。他们一听“理顺”就理解为取消三自爱国组织,甚至理解为取消三自爱国原则。这在一部分人中间一度引发了一个可以理解的,却是莫须有的保卫三自小热潮!可见理顺关系是个敏感的

问题,大量的解释工作是少不了的。

问:三自爱国组织若不领导、管理教会,它们还有什么工作?

丁:有许多工作要做。三自爱国组织应该是基督教教牧同工和信徒的群众性组织,它协助党和政府贯彻宗教信仰自由政策,坚持教会独立自主自办,联系广大信徒和教牧同工,推动他们热爱祖国,拥护社会主义,积极开展社会服务,兴办社会公益事业和支持教会的自养企业,参加两个文明的建设,以及在三自章程中规定的其他任务。为了更好地做好这些工作,我也恳切期望各级两会和它们的骨干人员更加教会化,更加接近广大信徒群众。

问:刚才你说,我国基督教牧养工作薄弱,甚至荒废,是不是讲重了?

丁:拿整个中国基督教现状来说,我想情况正是这样。我们的牧师们大多是努力尽职的,但是牧师和信徒人数是一和几千之比,能说有过得去的牧养工作吗?这能不影响到信徒的信仰素质吗?所幸的是我们十三所神学院校每年约有两百位同学毕业,成为教会同工,十年就有两千,加上各地培训班培养的人才,今后情况将会好转。到一定时候,牧养工作将能分工化、专业化。

问:神学思想工作呢?

丁:中国基督教在神学上突出基督的救赎,这是可取的;重视中国教会自我的成长,重视信仰上互相尊重,维护教会的一体,这也是好的。但到目前为止,中国基督教的神学思维还很不够,还有待于展开。对于上帝的创造和圣灵的圣化还不敢发挥。教会观和许多伦理问题还处在视野之外。上一代的同工不得不投身于更紧迫的任务,他们大多已经很累了,我把教会神学建设的希望寄予新进的同工们。此外,现在有相当一部分教外知识分子对基督教产生了好感,摆脱了成见,愿意研究,愿意做我们的朋友。他们译出

好些基督教重要神学著作,还有他们自己的评介和研究成果。在我书桌上就有十几本,其中不乏“出新意于法度之中”的内容,有的成了我们神学课的参考书。这事实上帮助了我们的神学工作。知识界这一现象的出现,未尝不是三自爱国运动的一个果实。

问:您怎样看待中国教会存在的问题和毛病?

丁:社会主义是人类历史上的新事业,一帆风顺是不可能的。在一个这么大,这么古老,人口这么多的国家建设社会主义,是人类的新课题。在这样一个社会里独立自主办好教会,那更是教会史上的新事。因此,在工作中暴露出许多问题,那是必然的。希望我们的同学永远保持青春的理想、活力、原则性,但是,同时也要知道,谦虚谨慎,求同存异,安定团结有多么可贵。关心和分析中国教会存在的问题和毛病是必要的,但是,我们不要忘记,两千年来,教会在神引导下,始终是闯着诸多问题和毛病而过来的。对教会中种种病态和缺陷,我自己既是十分痛心和关切,又是比较安然,因为一切都在主的手中。我们有的同学带了某种义愤到教会去,才到不久就四面出击,左右开弓,结果很快使自己陷于孤立,甚至呆不下去。我们任重道远,到了教会如果不能首先立定脚根,虚心学习,什么别的就谈不上了。所以请同学们一定不要自以为是,一定要谦卑,力求同一切有关的人团结好。我们不要被问题弄得惊慌失措,对问题我们既要重视又要藐视。

回顾走过的路

(一九九五年四月二十四日于南京)

(在中国基督教全国两会主席、会长会议上的讲话)

隔了一段时间,我们回过头去,看看我们现在走到哪里,这有其好处。

五六十年代,我国基督教走出了举世瞩目的三步:(一)高举爱国主义,实现自治、自养、自传;(二)办金陵协和神学院,培养新的教会人才;(三)突破宗派格局,实现联合。

“文革”结束后,我们所做的一件要事,是成立中国基督教教务组织,定名为中国基督教协会。我们主要考虑的是,现在要办好教会,就要重视教务。三自组织提倡爱国和教会自治、自养、自传,十分必要,但我国教会今后将有大量教务方面的工作,由三自组织兼管,不合它的性质,也非其所长。三自组织之外成立基协,就是宣告,我们不能满足于教会的自办,我们要把它办好。我们不但要自治,而且要治好;不但要自养,而且要养好;不但要自传,而且要传好。正像“红”必须落实到“专”,政治必须落实到业务一样,爱国和三自必须落实到办好教会。办好教会势必得把更多的人卷进来参加工作,这就扩大了团结面。

三自爱国落实到办好教会,这是十多年前新的一步。成立基协是其组织上的表现。这是重要的一步,从此,我国基督教教务上开始有了带领,也开展了许多办好教会的事工。

第二,调整对海外基督教的看法,否定排外主义。

五六十年代提到传教士,姓名前面几乎必然出现“帝国主义分

子”六个字。当时我们的确有点“孤芳自赏”，谈不上多少国际联系。“普世教会”四个字和“中国教会是普世教会的一部分”都是不说的，说了就像有问题，好像反帝立场不坚定。这方面改变的主要标志是基协成为世界基督教会联合会的一分子。不是说帝国主义没有侵略中国，或侵略中国没有利用宗教和传教士，但对人对事作判断必须实事求是，不要说过了头。

第三，神学思想宽阔化。这不是很显著，但有了十分重要的开端。对这一点，请许可我多说几句。

就我国大面积的基督教来说，很可惜，真正重要的教义似乎只有一条，那就是：你信基督，你在上帝眼里就算是义的；你不信基督，你在上帝眼里是不义的。从单单突出这一点演化出许许多多违反常理的观点：某某人是信的，尽管反革命，还犯奸淫，死后还是上天堂。帝国主义侵略是不好的，但侵略者信基督，在上帝眼里是义的；被侵略者不信基督，是不义的，被侵略是活该，是上帝的刑罚。今天把这个话放在口上的人已经不多，但这个思想还是存在在那里的。请看，在信仰上单单高举一点，不及其余，会把是非颠倒到什么程度。按此观点，上帝明知世人中的大多数将因不信而最后下到地狱永火，还日日夜夜、每时每刻不断地把世人创造出来，这是怎样的一个上帝观呢？上帝的慈爱从何谈起？

我们知道，保罗当时讲因信称义，是因为犹太法利赛党攻击基督和门徒不遵守律法。他们强调，必须遵守繁琐的犹太律法，行割礼，守安息日，遵守种种饮食禁忌等等，才能得救。因信称义是针对法利赛人靠守律法得救面来的。因信称义从神学上大大扩展了获得救恩的人的范围，犹太人之外的外邦人这才能蒙受救恩，基督教才得以从犹太教中的一个派别演化而为世界宗教。

后来马丁·路德也突出因信称义，那是因为他反对罗马的教阶

制度和卖赎罪券等等压迫群众的做法。

我们研究一个教义,除了问它说什么之外,还应当问它反对什么。基督教有许多教义,因信称义之外,有上帝永不停止的创造,有道成肉身,有基督复活、更新万有,有圣灵降临、赐人智慧,有登山宝训,有最大的诫命就是爱上帝和爱人如己,有你要人家怎样待你,你也要那样去待人,有非以役人,乃役于人。保罗说,如今常存的有信、望、爱,其中最大的是爱,可见爱德高于信德。这些为什么不加重视呢?现在中国基督教如果只推崇一个教义,这教义又容易用来促进信与不信的矛盾,这样就引起无穷的分裂,破坏祖国的团结,这难道是神的旨意?

情况正在起变化。神学的再造正在进行之中,现在越来越多的同工讲道不再突出信与不信,不专讲上天堂下地狱或谁得救和谁不得救了。有良知的、对人民负责的牧师再也讲不出把无数正直的人打入地狱的话了。

今天,中国基督教的讲坛上有更多的道德的信息。宗教和道德有密不可分的关系。一个不讲道德的宗教是很原始、低级的宗教。很可惜,我们中国基督教至今仍旧有人为了突出信与不信的矛盾,竟然否定道德的价值,多方宣扬道德无用论,把救恩和道德说成为对立的两件事。他们以高举救恩为藉口,不惜把道德说成为无关紧要的。岂知全部《圣经》大量的内容都是高举道德的。十条诫命有六条都是规范我们的行为的伦理道德。

神学涉及信仰,涉及人们心灵深处的信念,所以调整是慢的,充实信仰的道德内容只能逐步发展。但神学的变迁是很根本的变迁,对于我国基督教已经开始的起步,值得我们重视。

第四,伴随着神学思想的变迁,中国基督教的社会关怀也有了提高。爱德基金会十年前可以说是应运而生。越来越多的省市教

会也都办起了专门的机构以服务社会,解决老百姓的困难为职责。攻击所谓社会福音的话不大听见了。最近我们举行了全国教会社会福利工作经验交流会。

第五,目前,我们正在改变对处身于三自组织之外的信徒和聚会点或称家庭教会的看法,调整同它们的关系。

这些聚会点大多数也是自治、自养、自传的,同海外以基督教为外衣的渗透势力认同的只能是少数。它们之所以呆在三自组织之外,有种种原因,例如:(一)路太远,行走不便;(二)觉得信仰和礼仪不同,不习惯于大堂的礼拜和讲道;(三)嫌大堂每周宗教活动太少;(四)对大堂教牧同工有意见;(五)“左”的路线令他们受到伤害,因此他们至今害怕;(六)三自方面和政府方面有些做法失掉人心,损害了三自和政府的形象,有人至今歧视他们,增强了逆反心理;(七)来自海外的挑拨离间。

尊奉耶稣基督为主的,就是我们的主内弟兄姊妹,我们没有排斥他们的理由。我们应当帮助他们,为他们服务。

为了避免强加于人或勉强联合,为了寻求到一天能自觉自愿地合而为一,成为一体,我们向国务院宗教事务局提出,许可登记不以是否参加或尊重两会为准,经国务院宗教事务局同意。登记的六个条件中就没有拥护三自组织这一条。我们不利用政治压力强求统一,只求一切进行正常宗教活动的堂点都能享受合法存在。

我们正在走的这一步,国内有不同情或大不同情的人,国外也有渗透势力多方造谣挑拨,加深分裂,因此是艰巨的一步,但符合基督合而为一的祈祷,也符合广大信徒的心愿,我们不能不努力进行。

为了扩大团结面,我愿意在这里谈一下所谓“私设点”向政府登记的工作。

登记可以让“地下”的聚会点转到“地上”来。任何一个国家，如果有些宗教信徒不得不秘密信教和秘密聚会，总不是好现象，总不能说明宗教信仰自由。在“地上”，周围群众和政府都看得见，可以放心，信徒也可以安心。国务院宗教事务局所颁布的登记条例规定，凡堂点只要符合六条很简单、很容易办到的要求，就可以申请和批准。这说明政府不是利用登记来压缩堂点，来同堂点为难，而是要让一切正常的宗教活动都可以公开合法。

说实在的，从事正常宗教活动而被分为批准的和未批准的，即地上的和地下的或公设的和私设的两部分，这是昔日苏联的模式，不是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这次我国宗教场所登记工作若能做好，让一切正常的宗教活动都能取得公开合法地位，这成就是够大的了。这宗教工作可以说是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宗教工作了。对此，我深抱希望。

为了登记问题，我同罗冠宗同工曾约请会见国务院法制局局长。这位局长说，登记就是登记，登记工作和经常工作要分开。登记条例没有规定要做的事，即使是好事，也不要附带去做从而增加登记工作的内容。这精神值得我们领会参考。

有人想趁登记之机，对境内全部教牧同工由两会来进行一次资格甄别，这是不行的。首先这扩大了登记工作的内容，为登记工作制造困难。有些所谓“私设点”不承认两会，硬要它们接受两会的甄别，岂非强人之所难？第二，面广量大，两会哪有能力甄别这许多陌生人？第三，我们扩大团结面还来不及，岂可轻易成为人家有无资格的评定者，从而扩大我们的打击面？在向政府登记过程中，两会的职责在于鼓励和帮助堂点去进行登记，及时把教会方面的问题和意见向政府反映，疏通交换意见的渠道。

想不到至今还有些人以“我们是天国的子民，只听上帝的，不

听人的”为理由,反对登记。这些人在我国进行人口普查的时候倒没有以此为理由,说自己不能算在中国人中间而拒绝普查。他们不同政府打交道,那么他们居民身份证领不领呢?教会固然是属灵的团体,但它在地上总也是一个群众团体。最近有人给我看一份来自美国的以相仿的语言号召我国信徒抵制登记的印刷品。如果我们在登记工作上实行关门主义,把登记搞得很难,岂不正好同海外反华势力合流了!

以上这五个步骤都爱国爱教,都使基督教更适应社会主义,之所以可能,一是由于政治上的拨乱反正,批判极左路线;二是因为时机成熟,广大信徒认为合情合理,赞同支持。

我们今天来看这五步路,我们看到它们的共同点是摆脱斗争哲学,讲爱心,讲和好,讲团结,将能扩大团结面,是信徒所喜欢的。

在《启示录》里,圣灵嘱咐约翰写信给七个教会,第一封写给以弗所教会,表扬以弗所教会为主劳苦,特别是不能容忍恶人,恨恶尼哥拉一党的人的行为,认出他们是假使徒。这是好的。但圣灵也责备以弗所教会把起初的爱心离弃了,教会失掉了爱心,应当回想是从哪里坠落的,并要悔改,行起初所行的事。我想我们中国教会大可从圣灵对以弗所教会的训导中得到启发,从而听从圣灵的要求,在爱中建立基督的身体。

最后,在此顺便谈一下另外一个话题。

“加强对宗教事务的管理”这一提法引起不少信徒担心,认为政策变了。我愿意谈谈我个人的理解。

(一)原则上来说,管理不是坏事而是好事。工业、农业、马路交通、市场买卖、医院、学校、图书馆莫不需要管理,宗教也不例外。礼拜时按一定程序进行,也是一种管理。我们说办好教会,也可以说管好教会。因此我们不要反对对宗教事务的管理。

(二)加强对宗教事务的管理,管理者不仅是政府宗教事务部门。各教爱国宗教团体,包括从全国到基层的三自和教务组织都有管理的义务,也都是管理者。

(三)加强管理和监督的对象不仅是各宗教从全国到基层宗教活动场所的各级组织,政府各级宗教事务部门也在接受管理、监督之列,也是被管理者。

(四)管理者必须加强自身建设,宗教事务部门如此,基督教各级两会和基层堂点也如此。近几年教会内部矛盾增多,我们应当提倡通过协商解决分歧,应当让信徒的爱国爱教在参与监督教会的工作上也表现出来。

(五)政府对宗教的管理主要是管政治,管不法,即管超出宪法、法律、政策许可范围的行为,不是管理教务。在教务方面政府应尊重教会信仰和教会长期形成的民主管理的好的传统和制度。

(六)管理必须依法,不得有打人、抓人、没收《圣经》和《赞美诗》、强取财物、巧立名目乱收费乱罚款等非法违法行为。

(七)教内人事须按教内规章。依法管理宗教事务不包括教外决定教内人事。政府对教会人事如有意见,教会方面应持欢迎态度,应慎重考虑,好好协商。处理教会经济问题也应按同一原则。国务院 145 号文件规定,“宗教活动场所的财产和收入由该场所的管理组织管理和使用”。

(八)熟悉教务的全国两会在教务方面应多起领导或指导作用。这样有利于加强管理。明确这一点并不否定协商原则。

(九)国务院发布的第 145 号文件对宗教活动场所的管理有明确规定,我们应当学习、遵守。

以上如有不妥之处,请大家指正。

给金陵协和神院校友的一封信

(一九九五年)

各地“金陵”校友：

几年来收到各地校友许多来信，表达对母校和对我个人的关爱和祝愿，非常感激。因为人手少，没能一一回复，请同学们原谅。现在通过校友工作组发这封写给大家的信，谈谈大家关心的事。

如果你离别母校多年后现在回来看看，东楼还在那里，西楼已经拆除，在那儿建造了一座综合楼。该楼楼下是厨房和学生食堂，二楼有大小会客室和小食堂，三楼有十间客房，四楼有较大的会场。大铜银巷十三号已经变为十七号。神学院除了本科和研究科，还有《圣经》函授科、《教材》编辑部、《金陵神学志》编辑部。大院之内还有爱德基金会、基督教全国两会南京办事处、江苏省两会办事处、南京大学宗教研究所和它的《宗教》编辑部。

关于“金陵 人事新陈代谢的问题，可以向大家报告，它是在平稳地逐步进行中。说平稳和逐步，指的是正在变化，但不会有大起大落。我们感谢同学们为此献上的祷告。

我们教会里有人根本轻视神学，对神学院只求它成为讲道人员培养所就够了。有人也同样根本轻视神学，只求它成为一所政治上提高教牧人员的地方。不错，神学院应当培养学员的讲道能力，神学毕业生政治上也是应当优秀，但是要办好教会，我们少不了神学思维的指导。神学思维来自钻研《圣经》，来自进人教会历代的经验和神学探讨，来自国内以至普世教会的广阔视野和

交流，它反过来可以指导教会实践。中国教会太需要神学了，怎么可以说不要神学呢？基督教《圣经》是一部神学巨著，怎么可以以《圣经》中没有“神学”二字为藉口，以之否定神学呢？《圣经》通过它的话语，藉着它的诗意和它给人的美感，给予我们大量神学思维的材料。

为了推广国际神学交流，推进我国的神学建设，这些年全国两会在输送我国学生出国学习方面，做了不少工作。这工作得到美国、加拿大、联合王国等国的基督教联合会的热情支援和配合。

同学们来信大量提到我国教会问题。关于全国教会，我们在前不久举行的全国两会常委会议上针对当前情况指出坚持独立自主和办好教会两点。我们不能说，因为五十年代提出独立自主，今天九十年代再提，就是“后退”了。我们中国是独立自主的国家，我国教会是独立自主的教会，这需要提多久就该提多久，提过了还得提。至于基层教会，不少地方由少数人甚至一两个人说了算，经济也不公开，办得不像基督的教会，信徒很痛心。我们大大需要召唤信徒来参与和监督，把基层教会办成民主管理的学校。这本来是基督教新教的一大特点，不管长老制、公理制、主教制，信徒掌握一定权力，那都是一样的。

值得向校友们报告，全国两会对两会之外尊奉耶稣基督为主的广大信徒和他们的领导人，不是取敌对歧视的态度，而是取主内一体的态度。他们都是我们的弟兄姊妹，包括对三自组织有这样或那样意见的人。对他们所提的批评意见我们要虚心考虑。如果我们在工作上有什么优势，应当同他们分享，或者利用我们的条件给予帮助。同海外反华势力相认同的人，教会内外都有，但都是极少数。

最近来信议论特多的是宗教活动场所向政府登记的问题。

关于登记,首先要搞清楚的一点是,登记工作旨在让“地下”的聚会点转到“地上”来。任何一个国家,如果有些宗教信徒不得不秘密信教和秘密聚会,总不是好现象,总不能说明宗教信仰自由。经过登记,地下就转到地上,就是在光天化日之下公开聚会,周围群众以及政府可以放心,信徒可以安心。只要我们进行的是正常的宗教活动,不做什么公开不得的事,我们欢迎群众来看,来听,来监督。试看,国务院宗教事务局所颁布的登记条例规定,凡堂点只要符合六条很简单、很容易办到的要求,就可以申请登记,这说明政府不是要压缩堂点或利用这次登记工作留难堂点,而是要让一切宗教活动转到地上。从地下或半地下转到地上的越多越好。

说实在的,正常宗教活动被分为批准的和未批准的,即地上和地下的两部分,这是昔日苏联的模式,不是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模式。这次我国宗教场所登记工作若能做好,让一切正常的宗教活动都能取得公开合法地位,这成就就是够大的了,这宗教工作可以说是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宗教工作了。对此,我深抱希望。

为了登记问题我同罗冠宗同工曾约请会见国务院法制局局长。这位局长说,登记就是登记,登记工作和其他工作要分开。登记条例没有规定要做的事,即使是好事,也不要去做,不要增加登记工作的内容。这精神值得我们领会参考。

有人想趁登记之机,对境内全部教职同工由两会来进行一次资格甄别,这是不行的,首先这扩大了登记工作内容,为登记工作制造困难;第二,面广量大,两会哪有能力甄别这许多陌生人;第三,我们扩大团结面还来不及,岂可轻易成为人家有无资格的评定者,从而扩大我们的打击面。在政府登记过程中,两会的职责在于鼓励和帮助堂点去进行登记,及时把教会方面的要求和意见向政

府反映,疏通交换意见的渠道。我想这也正是校友们应尽的责任。

想不到至今还有些人以“我们是天国的子民,只听神的,不听人的”为理由,反对登记。这些人在我国进行人口普查的时候倒没有以此为理由,说自己不能算在中国人中间而拒绝普查。他们不同政府打交道,那么他们居民身份证领不领呢?教会固然是属灵团体,但它在地上总也是一个群众团体嘛。最近有人给我看一份来自美国的以相仿的语言要我国信徒抵制登记的号召。如果我们在登记工作上实行关门主义,把登记搞得难上加难,岂不正好同海外反华势力合流了!

人所共知,我国的执政党不信神。海外有些人就利用这一点,热衷于渲染共产党和政府与宗教为敌,正在消灭宗教。这些人也太不顾事实了。就以基督教来说,拨乱反正以来的十多年间我们每两天增加礼拜堂三所,不算为教堂的聚会点十多年来开了几万处。我们基督教发行的《圣经》已经超过一千万本,办神学院校十三所,有神学生数百人。尽管落实宗教信仰自由政策有不能令人完全满意处,但以上这些是与宗教为敌,是消灭宗教吗?

但是我们也不能满足于这些数字。中国基督教面临的问题很多,值得我们“金陵”的老同学重视和深思。让我仅仅接触一个方面:

我国知识界近十几年以前所未有的开放态度对待基督教,可是基督徒太缺乏相应的与知识界对话的能力了。我们多么需要一支多样专业的多层次的受人尊重的基督徒知识分子队伍。这些基督徒知识分子不应当仅仅来堂礼拜,他们应当进入各级两会的领导层,在那儿参与领导工作。他们也应当进入各自的专业队伍,在那儿和同行交朋友,进而切磋信仰,同时提高这些专业的水平,在国际放出异彩。这些专业包括艺术创作和表演,以及作为社会科

学分支的宗教研究,基督徒应当在其中作出贡献。我们需要形成一个强大的有独到之见、能言之成理的神学知识分子队伍,在国际神学界作为来自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祖国的基督徒发表见解。

因为好久没有交流,一说就话很多,就到此为止吧。

感谢校友工作组赵志恩同工代表母校和不少校友保持联系。

祝各位校友身心灵健康丰盛,不论在哪里都为祖国和祖国教会献出全力。

在三自爱国运动四十五 周年庆祝会上的讲话

(一九九五年十一月二十一日于上海)

今天,我们在这里热烈庆祝中国基督教三自爱国运动四十五周年。我们将听到许多精彩的发言和祝愿。我代表大家向各位来宾表示欢迎,特别是远道而来的和教外的朋友。

在上帝眷顾下,也在党的关怀下,三自的功绩十分巨大。我想可以归纳为七句话:

一、提高了广大信徒的爱国主义觉悟,使他们热爱祖国,投身祖国的社会主义建设。

二、在全国范围基本实现了中国教会的独立自主和自治、自养、自传,使我们在“文革”之后进而提出自治要治好,自养要养好,自传要传好,就是要办好教会。

三、改善了基督教的形象,使社会上更多的人对它有好感,减少了落实宗教信仰自由政策的阻力。

四、促进了教派之间的和睦共居,为今天无宗派局面准备了条件。

五、为不少第三世界国家的教会提供了一个在全国规模上独立自主的榜样。

六、揭发殖民主义、帝国主义利用传教侵略我国,引起世界各国教会人士和历史学界的重视。

七、中国基督教有了中国基督教的特点,从而在国际教会中提高了中国教会的地位,赢得了许多朋友。

三自的成绩是巨大的。以上七点我们今后要继续坚持,继续发扬。

但是,一切事物的运动必然呈现其阶段性。今天中国基督教大体上已经实现了自治、自养、自传。在庆祝三自四十五周年的时候,我们不要躺在过去的成绩上。历史已经把我们推进到一个新的阶段,向我们提出了新的课题,三自爱国已经有了更丰富的内容,就是已经到了自治必须治好、自养必须养好、自传必须传好的阶段。

第一阶段要解决的是中国教会该由谁来办的问题。回答是:该由中国信徒自己来办。解决了这个问题,我们就要团结更多的人走下一步,真心实意地把教会办好。

尽管三自成绩很大,但我们不得不承认,还有许多信徒没有被我们团结过来,他们中的多数并不反对自治、自养、自传,更不反对爱国,但对三自组织和基协抱怀疑和不信任态度,主要是认为两会同办好教会无关,对办好教会没有兴趣,不起劲。为了实现三自的初衷,改善三自的形象,从而巩固我们的团结,扩大我们的团结面,我们必须真心实意来办好教会。

广大信徒热爱教会,他们之所以寄希望于三自,所求的是把教会办好,要教会摆脱种种使教会不像教会,令信徒痛心的东西,好作出有力的见证。三自发起之初也是一再这样许诺和保证了。如果我们今天不承认三自爱国运动发展的阶段性,依然故我,不把指导思想转到办好教会上来,听任某些乌烟瘴气的东西在教会里泛滥,那么,不管我们把三自爱国运动说得多美,我们岂不是向广大信徒开空头支票?广大信徒怎么能拥护我们?怎么能欢迎我们?今天,谁为办好教会出力,谁就得到信徒的爱戴。谁对办好教会不起劲,敷衍了事,谁就不能得到信徒的信任。事情就是这么简

单而明白地摆着。

“按三自爱国原则办好教会”是一个比较好的、适合现阶段的口号，因为它提到了办好教会。但是它不应仅仅是一个放在嘴上的口号，必须变成行动。时至今日，我们作为中国教会的当权者，必须意识到，我们是处在和国内外反动势力争夺群众的形势之下。光讲三自昨天的成就已经远远不够。今天，三自必须以办好教会为己任，这样才能吸引广大信徒站在三自爱国的旗帜下。否则，广大信徒会说我们“不爱教会”，我们一些所谓“高举三自”的人，会变成他们厌弃的对象。很可惜，在有些地方，当年的三自爱国运动领袖，今天已经变成信徒不欢迎的人。

办好教会的“好”，我想有两层意思，一是得到广大信徒的喜爱和拥护，二是得到广大人民的认可和同情。

有人说：提办好教会会淡化三自。不是的，办好教会是三自的深化。只有努力办好教会，才能团结广大教牧同工和广大信徒于三自爱国旗帜之下。办好教会是比政治表态更艰巨的也是更高级得多的政治。不办好教会，才使三自的威信扫地，才使三自丢失教会同工同道。今天要把信徒团结过来，必须努力办好教会。

现在有海外渗透势力反对、破坏我们，在我们中间制造分裂。怎样来对付海外渗透势力？回答是：努力把我们的教会办好，使信徒喜欢。多做信徒喜欢我们做的事，不做信徒不喜欢我们做的事，我们就能把信徒团结好，海外渗透势力就难以插入了。

我们三自爱国运动内部在一些次要的问题上各有各的见解。譬如说，在新老两代人之间想法不尽相同，这是正常的，不足为怪，大可互相尊重，求同存异，因为在办好教会这一点上，大家有足够的共同语言。办好教会能把大家团结在一起。把办好教会作为我们的大方向，大家就能够团结好。

要办好教会,我们在工作上就得鼓励我们的同工一起来重视和研究许多问题——爱国爱教的人怎样讲好道,怎样领好礼拜,怎样提高教会的诗歌和音乐水平,怎样查好经,怎样开好堂委会,怎样引导信徒来参加建设教会,怎样从信仰上帮助信徒在爱教之外也能爱国、在爱国之外也能爱教,怎样在信仰上和礼仪上实行互相尊重、保证团结,怎样抵制异端邪说,怎样把《圣经》解释好,怎样建立我们属灵和属世相统一的神学思想,使教会和社会主义相协调,怎样办好神学教育,造就灵、德、智、体、群同时发展的神学生,如此等等,要让广大同工同道一起来研究、来实践。探讨这些问题就能发动、团结许多同工同道。

办好教会是有障碍的。特别是基层教会以至各级两会少数人独断专行很突出,一切由少数人甚至一个人说了算,不让信徒知道和参与教会的事工,当开的会长期不开,经济不公开,许多腐败现象就是由此产生,信徒很不满意。

如果我理解得不错,基督教和有些其他宗教不同。有些其他宗教的人能进庙过好自已的宗教生活就满足了,但基督徒不能满足于有堂可进。他是教会的肢体,教会的事就是他自己的事,教会办得好坏,他觉得自己有责任,不能漠不关心,他要参与。

最近全国政协通过,政协的功能有三:政治协商、民主监督、参政议政。我想要办好教会,同样有这三方面,应当提倡协商,提倡信徒对教会事务的监督,提倡教会信徒多多参与教会的重大决策。

今天,全国在邓小平同志提出的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指导下,各行各业都在努力做好自己的工作,医生在努力办好他们的医院,教师在努力办好他们的学校,工人、农民在努力办好他们的工厂、农村。这种奋发图强正是爱国主义的表现。既然中国教会已经是中国人民自己的宗教事业的一部分,我们爱国的教牧

同工理所当然该努力办好我们的教会。否则，各行各业都办得很好，唯独教会办得很糟，这怎么对得起全国人民和全国信徒？我们能把教会办好，全国信徒一定感谢我们，我们也能无愧于祖国的托付。

吴先生发起的三自爱国运动功绩很大，我说了七点。还有个第八点，希望在三自五十周年的时候可以加上，那就是为办好教会的许诺兑了现，在中国大地上正在出现一个满有基督身量的既爱国又爱教的教会。

答《天风》记者问

(一九九七年一月)

问：丁主教，您这次提出退休，有没有来自任何方面的压力？

答：完全没有。在今天，中国基督教全国两会提出的“八十不留”是一个很好的原则。我希望超过八十岁的同工都能退休，让年轻的同工负担更大的责任，也希望再过几年，我们能够做到“七十不留”、“六十五不留”，让年长的同工能早日“下岗”休息，年龄较轻的同工能够上去。

问：两会的主席、会长十五年来由您兼任，现在分别由两位同工担任，这是否标志分裂，或会不会导致分裂？

答：不，这正说明我国两会是团结的。如果真有分裂的危险，我大可暂时不提退休的。

问：罗冠宗同工和韩文藻同工固然有不少优点，但都不是圣职人员，您认为这是很合适的选择吗？

答：我认为是很合适的选择。两会章程没有规定主席、会长必须由圣职人员担任。吴耀宗先生就不是一位圣职人员。海外不少教会团体也由平信徒担任领导职务。重要的是他们两位长期以来都坚持三自爱国，坚持办好教会，又都以团结为重，为同工同道作出了好榜样。像韩文藻同工这次在闭幕礼拜中的讲道，大家觉得深得教益，有三位代表告诉我，他们听了很想鼓掌。

问：您对中国教会的前途是乐观，还是悲观？

答：我们很多人是经过“文革”的基督徒，今天要我们悲观是

很难的。今天,党和政府的宗教信仰自由政策深入人心,尽管还有不足之处,值得高兴的是存在着交换意见和进行协商的渠道。教会负责人员年轻化正在进行中,这次全国会议的代表平均年龄比上届低了七岁多。妇女和平信徒的参与率也有所提高,尽管还不能令人满意。最高领导层的年龄一时不能下降得太快,这是可以理解的。对这次选举,国内外基督徒,包括海外华人教会的反应良好,尤其对韩文藻同工,海外教会不少人并不陌生。我国广大信徒有重《圣经》、作见证、爱教会、爱祖国等特点,这使我乐观。我国知识界对基督教抱着一种前所未有的开放态度,这也使我乐观。

问:几年前你指出,三自是脚手架,今天你还如此认为吗?

答:是的,但我当时的原话不是那么简单。我当时是说,基协和三自这两个团体都是建立中国教会这座大厦过程中的脚手架。我的远象是到一天一个治得很好,养得很好,也传得很好的,符合《新约》原则的中国教会将以其无比的荣美屹立在东方地平线上。当这座大厦完成的时候,脚手架就看不见了。今天我还是这么想,那就是说,两会是重要的、必要的,但并不具有永恒性。两会从属于教会,是为教会服务的。把两会当作永恒的事物,或说两会领导教会,《圣经》上没有根据,神学上讲不通,国内外信徒也接受不了。我是这样为教会、基协和三自定位的。我想,为明日的教会而做脚手架,两会的意义已经够大了,也已经够我们做的了。高举三自是好的,但讲话要顾及《圣经》,顾及神学,顾及信徒,讲过了头会适得其反。

问:我国有相当一部分信徒至今没有参加三自,您有什么看法?

答:三自是教会的一个运动,也是办好教会的一个原则,它没有会员制,无所谓参加或不参加。五十年代吴先生等发起三自之

初,中外教会里曾有不少人由于不了解而反对,但时至今日,还在那里反对三自的人是很少的了,因为大家知道三自就是自治、自养、自传,足以使信徒和广大人民增加共同语言,这就有利于见证基督。三自做了不少好事。光谈《圣经》,到目前为止,三自和基协合力印制了一千几百万本。不少所谓“不参加”三自的信徒也在研读两会供应的《圣经》。两会还在做许多其他有利于教会和信徒的事,信徒为什么要反对呢?至于对某些问题有不同观点或对两会某些人的所作所为有意见,那是很自然的,也是难于避免的,可以探讨,可以改进。对人家的批评,我们大可不必紧张,更不要轻易说人家“反三自”或“代表官方”。我认为,凡尊重《圣经》教导,承认耶稣基督为主的,都是主内弟兄姊妹,要互相尊重,好好团结,凡事用爱心说诚实话,好好协商。

问:您退休后有什么打算?

答:目前我还是金陵协和神学院院长,希望不久也能退下来。我愿意细细地读这些年来来不及读的一些书,整理过去多年间在国内外的写作和讲话稿子,同时有时间回到我的数学癖好。

问:丁师母去世以来您的生活怎样?

答:谢谢您问起。我同一个儿子(南京大学英语副教授)、他的妻子(医生)和他们的孩子(高中生)住在一起,我受到他们很好的照顾和体贴。

问:您对今后中国基督教有什么希望?

答:一是坚持团结,真心实意和不折不扣做到信仰上、礼仪上互相尊重,同时各派也要坚持团结,不过分突出自己的特点。二是发扬《圣经》中的伦理道德信息,和我国重视道德的固有文化相携手,消除道德无用论在教内的影响。

问:您对神学教育很满意吗?

答：不能说很满意。对神学师生的教学也好，牧师传道人的讲道也好，文字工作同工的写作也好，我希望大家不要因今天不愁信徒少而马虎。我愿意大家在“满足信徒”之余，不忘记还要提高信徒，像保罗为腓立比信徒所祈求的，要他们的“爱心在知识和各样见识上多而又多”，“能分别是非，作诚实无过的人，直到基督的日子，并靠着耶稣基督结满了仁义的果子”（腓 1:9、10）。

问：您还有什么要对《天风》读者说的？

答：在过去十五年里，我越来越意识到许多信徒一直在祈祷中记得我，海外也有越来越多的同工同道为我祈祷。这些祈祷不但是出于对我的关爱，更凝聚了大家对我国教会和三自精神的爱护和期望。我并没有大的才能，但是上帝听了这些祷告，这些祷告把我托了起来，像一个人在盐海里沉不下去一般，因此可以说那些祷告变成了物质力量。我要感谢一切为我祷告的人，不论是在国内的或在国外的，不论是相识的或不相识的。我愿望他们今后同样用祈祷支持新任职的同工们。近一时我也收到许多来信，还有圣诞贺卡，我几乎都没有回复，这是很无礼的，请大家原谅。我祝大家身灵健康，有一个进步的一九九七年。

谈宪法第三十六条

(原载《天风》一九八三年第三期)

经过全国批判极左路线和拨乱反正,经过我国关心社会主义民主和法制的人们和法律专家两年多的精心努力,特别是经过长达四个月的全民讨论,我国人民终于得到一部适合国情的新宪法。

因为我是全国人大宪法修改委员会委员,我参与了这部宪法的全部制定过程。现在我要就宪法中宗教条目(第三十六条)的形成过程,向同工同道作一汇报。

早在宪法修改委员会成立之前,我们基督教方面的全国人大代表和全国政协委员都已经联合其他宗教的领袖向人大和政府提出了正式提案,主张除去一九七八年宪法有关宗教条文中“左”的提法。具体来说,我们不赞成在这一条文中只提“有宣传无神论的自由”而不提有宣传有神论的自由。至于“有不信宗教的自由”,我们也认为可以不提,因为“宗教信仰自由”这一概念已经包括了不信宗教的自由。像“言论自由”就不必附加“不发表言论的自由”,“通信自由”也不必附加“不写信的自由”。我们认为,一九五四年宪法第八十八条“公民有宗教信仰自由”最简明扼要,应予恢复。

在我们看来,这些是十分合情合理的主张,但是,由于“左”的思想的长期影响,我们提出之后,遇到了一些人的反对,其中有些人还有相当的地位和影响,他们主张保持一九七八年宪法宗教条目的措辞。

所幸我们的主张不但得到全国宗教界和各教信徒的赞同,面

且还得到知识界、政法界以及国家干部队伍中很多关心社会主义民主和法制的人们支持。国务院宗教事务局曾经向宪法修改委员会提出书面意见，支持我们宗教界的主张。这一事实本身就足以说明，国务院宗教事务局所考虑的是落实宗教信仰自由政策，维护各宗教合法权益。海外有人攻击它旨在消灭宗教云云，是太肤浅愚妄了。

我们知道，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中共中央坚决拨乱反正，落实各项政策，在宗教方面也坚决克服主观主义、教条主义，落实宗教信仰自由政策，这是全国大的形势。宪法修改委员会也坚决拨乱反正，坚决排除在宗教方面“左”的看法和提法，采纳了宗教界所提出的合情合理的意见。同工同道们一定注意到，交给全民讨论的宪法草案上恢复了一九五四年宪法关于宗教信仰自由的措辞，全国各教广大教徒如释重负，衷心高兴。

在修改宪法的两年多的时间里，我们中国基督教协会和中国基督教三自爱国运动委员会的领导同工们提出过不少意见，这些意见宪法修改委员会十分重视。有关宗教政策的一些意见可以说全部得到采纳。港澳基督徒同胞也开座谈会，就宪法草案提出过宝贵意见。

在宪法草案最初的一稿里，曾经出现过宗教不得干预政治，不得干预教育，不得干预婚姻的措辞。不信任何宗教的人在这方面每每缺乏敏感，体会不到这几个“不得干预”，在信仰宗教的人们听起来是很不顺耳的。我们宗教界的人有责任向宪法修改委员会反映这个情况。我们反映了，宪法修改委员会很重视，经过研究就避免了这种措辞。从这一类的事，我们看到我们国家政治生活中所表现的民主协商精神。我们同时也看到，单方面是不能实现协商的，我们应当积极主动发表意见，协商才能实现。如果

我们不把意见提出来，这次通过的宪法里就可能会保存某些不大合适的措辞的。

再举一个例：同工同道们可能记得，发到全国进行四个月全民讨论的那一宪法草案里存在任何人不得利用宗教进行反革命活动的话。这话当然是不错的，但是，反革命分子可以加以利用的岂止宗教一项，言论、出版等等，他都可以利用。今天，我国各教大多数教徒都是爱国的，为什么单单在提到宗教的时候就联上反革命呢？这个问题一经佛教方面的朋友提出，其他各教人士也觉得有理，我们就提请宪法修改委员会考虑删掉这个话。宪法修改委员会也重视这个意见，经多数同意，决定删除。这不是又体现了民主协商的精神吗？

现宪法规定，宗教组织和宗教事务不受外国势力支配。这是全国人民对我国天主教实行独立自主和基督教实行自治、自养、自传的有力支持，对我们新生的自办的教会的爱护。不能更清楚了，这里所反对的是来自外国的“支配”，毫不影响我们同国际宗教界正常的平等的交往。我们认为，正是一个独立自主的中国教会才真正能有益于国际教会，也才真正能从国际教会得益。海外有人莫须有地说，宪法中这句话是禁止我国教会有国际交往，他们难道是不懂“支配”二字的意思吗？

我参与了修改宪法的整个过程，我深切感到，我国最高领导部门决心落实宗教信仰自由政策，使各教教徒心情舒畅地为祖国的事业作出贡献，决心推行社会主义民主和法制，决心通过民主协商处理国家大事。由于中国之大，人口之多，由于前些年“左”的东西在人们思想上所造成的混乱，今天要把这一精神贯彻到各级、各部门、各角落，的确还有阻力。但是，中央领导既然有这样的决心，我们就可以乐观，知道我们为落实政策和争取

社会主义民主和法制所作的努力，决不是徒然的。这部宪法代表了全国人民的利益和意见，我们一定要遵守它，爱护它，保卫它，反对任何离弃它的人和事。

学习“十九号文件”心得

(一九八四年一次向政府干部的发言)

《中国社会主义时期宗教问题的基本观点和基本政策》，即中共中央一九八二年十九号文件，是一重要文件。要知道这个文件的价值，必须作比较，把它同来自苏联的有关宗教的文件、文章作比较，把它同我国过去一些有关宗教的文件、文章作比较。从比较就可以看出，这一文件没有因袭苏联的东西，没有因袭我国以前的东西，讲的是许多清新精辟的东西。这个文件的一大特点正是它不从概念、定义出发，而是从中国的实际出发，从中国的社会和宗教的现状出发。这是极可贵的实事求是的文风。

从实际出发最明显地表现在这一文件的取题：“中国社会主义时期宗教问题的基本观点和基本政策”。这就是说，文件不是抽象地谈宗教问题，而是谈中国的宗教问题；不是泛泛地谈中国的宗教问题，而是谈中国社会主义时期的宗教问题。中国宗教问题有其特殊性，中国社会主义时期的宗教问题更有其特殊性。研究事物不停留在共性而注意其特点的方法，是毛主席一向提倡的方法。毛主席曾经谈到研究战争，认为战争的一般规律固然要研究，革命战争的规律更要研究，而中国人民的革命战争的规律更是非研究不可。马克思、恩格斯除了研究一般宗教之外，主要了解的是西欧的宗教。列宁主要熟悉俄罗斯的宗教。他们对我国的宗教不甚了解。宗教在中国有其特殊性。譬如说，在中国，宗教所起作用始终比在欧洲小得多。中国历史上没有欧洲那种神权凌驾于政权之上

的事。欧洲曾有一个得罪了教皇,不得不半夜赤着双脚,长途跋涉去求得教皇宽恕的皇帝。中国历史上这种事情是不可想象的。在我国汉族,宗教始终从属于政治。在欧洲,教会教条同时就是政治信条,法学久久处于神学的控制之下,所以“对宗教的批判是其他一切批判的前提”(马克思语)。可是在中国,宗教从来不是那么神气的。地位上相当于欧洲的宗教的,在中国倒是宗法礼教和名教纲常。所以,五四运动所喊出来的口号是“打倒旧礼教”,“打倒孔家店”。在中国,批判封建主义或宗法主义才是“其他一切批判的前提”。把欧洲的东西照搬到中国来是不尽恰当的。

马克思、恩格斯没有进到社会主义历史阶段,列宁也来不及很好地研究社会主义时期宗教问题。人民取得政权之后,宗教以及它的地位和作用有什么变化?怎样处理社会主义时期的宗教问题?这是十分新颖的课题。照搬欧洲的、老的、反动阶级统治时期的东西,已经不行了。譬如列宁当时说:“现代宗教根源就是对资本盲目势力的恐惧,而这种势力确实是盲目的势力,因为人民群众不能预见到它,因为它使无产者和小业主在生活中随时随地都可能遭到,而且正在遭到‘突如其来的’、‘出人意料的’、‘偶然发生的’破产和毁灭,使他们变成乞丐,变成穷光蛋,变成娼妓,甚至活活饿死。”这些话十分符合当时俄国的情况,也相当符合资本主义国家以及人民还没有当家作主的第三世界国家的情况,但同社会主义新中国就不相符合。单靠本本上的话,怎么能解释当前我国宗教问题呢?现在还有人信教,难道是因为存在着资本盲目势力,使人们突如其来变成乞丐和娼妓吗?列宁还说过:“所有一切压迫阶级,为了维持自己的统治,都需要有两种社会职能:一种是刽子手的职能,另一种是牧师的职能。刽子手镇压被压迫者的反抗和暴动。牧师安慰被压迫者,给他们描绘一幅在保存阶级统治的条

件下减少痛苦和牺牲的远景，……破坏他们的革命决心。”如果引用这个话来谈今天的中国，实在太南辕北辙了。人民的国家机器难道对人民有什么刽子手的职能吗？我们的国家难道要使用宗教作为“精神的工具”来“破坏他们的革命决心”吗？又例如马克思在青年时期说过：“宗教里的苦难既是现实苦难的表现，又是对这种现实的苦难的抗议。宗教是被压迫生灵的叹息，是无情世界的感情，正像它是没有精神的制度的精神一样。宗教是人民的鸦片。”把这段话机械地搬到社会主义中国来应用，也会出问题的。中国人民还是“被压迫生灵”吗？那么压迫者是谁呢？十九号文件第一段就说到，“剥削阶级需要利用宗教作为麻醉和控制群众的重要精神手段”，可今天中国没有剥削阶级在统治，共产党和人民政府决不要麻醉人民，如果还强调宗教是人民的鸦片，我们就得要说得出来，今天需要利用宗教麻醉人民的是哪个阶级？

既然反动统治阶级利用宗教麻醉人民，既然今天使人民接受剥削压迫的情况已经不再存在，那么，鸦片云云充其量不过同以酒解愁有相似之处，虽然不大好，但完全可以容许。如果我们不加区别，把今天同昔日统治阶级操纵利用宗教来麻醉人民混为一谈，那在理论研究上至少未免不够细致，政治上势必仍然“以阶级斗争为纲”处理今天的信仰问题，在工作上就难免会导致种种“左”的做法。

现在有新的信基督教的人，其中不少人之所以转向基督教，用他们的话来说，是“信教使我们做好”。

基督教所讲的仁爱、勤劳、诚实、和好、忍耐、克己、与人为善等等，在旧社会都可能有利于反动阶级的统治，所以反动阶级欢迎宗教宣传这些，利用这些麻醉人民。但是，今天，政权已经掌握在人民自己手里，情况起了根本变化。基督教这些劝导的政治作用和

社会作用已经不同,它们对加强安定团结,增加生产,不一定仍是阻力,可以成为助力。愿意实践这些劝导的人在“文革”时期总不大轻易去参加“造反”组织的。基督教《圣经》中有“在上掌权的是上帝委派的,人们应当顺服”这个意思的话。国民党就是利用这个话来麻醉人民,使人民俯首帖耳。可是在今天的人民政权之下,基督教徒再说这个话就不能算反动了,对有些基督徒来说,它倒是有利于加强信教群众和政府的关系的。信基督教的人能实践这一行为规范,对社会安定和人民安居乐业有好处,同社会主义比较协调,比打砸抢和追逐个人私利要强得多。很多农村教徒只要每周能聚一次会,参加生产就很积极,交公粮成绩也好,牧师劝导教徒交公粮一定要交干的,如此等等,信徒很听从,地方干部对他们有好感。可见宗教不是在任何条件下只起一个鸦片作用,在不同时期和不同情况下,它可以起许多不同作用,它同社会主义不是必然势不两立的。

总之,中国社会主义时期宗教问题有其特殊性,不能照搬外国的和阶级社会的一套。这一文件首先一个特点就是摆脱本本主义,从实际出发。今天中国人民已经进入了一个不再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历史时期,我们对宗教问题应当有适应这时期的认识。

我们注意到,“鸦片”二字在十九号文件中没有出现过一次。文件只在谈到昔日剥削阶级统治的时候,才用上了一次“麻醉”二字:“剥削阶级需要利用宗教作为麻醉和控制群众的重要精神手段。”文件的这一现象是同苏联和我国过去许多处理宗教问题的文件大不相同的。过去有人简直认为,谈宗教而不说它是鸦片,那决不是马克思主义。文件不提“鸦片”二字,我想不完全是偶然的,这正是摆脱教条主义,摆脱本本主义,不从定义和概念出发,只从实际出发的党的优良传统的表现。用鸦片论来解释全部宗教现象,

本来就是不够用的,用它来解释社会主义时期的宗教,更不能解决问题。那为什么一定要用呢?有的人懒得去研究实际情况,喜欢抓住一两句名言去处理问题,就认为“鸦片”二字道出了宗教的本质,认为宗教是鸦片之说是一普遍真理或永恒真理。他们还说这是马克思的创见和发明。其实,在马克思之前几十年间,这句话早已被德国和欧洲许多资产阶级开明学者,包括宗教界开明学者,放在口上。把这个话说成为马克思的创见,决不是高举马克思,正是把马克思降低了。

其实,关于宗教,马克思、恩格斯、列宁和毛主席的论述和教导非常丰富、全面、深刻。可是有的人只记得“宗教是鸦片”一句话,凡涉及宗教的一切问题,都凭这一句话去处理,结果就难免简单化。对于有人到了社会主义历史时期还在鸦片论上大做文章,周总理早已不以为然了。一九五〇年全国政协会议期间,周总理给人们指出:不要以为革命时期提出的口号胜利后就该提得更厉害,其实恰恰相反,革命时期是要把原则讲清楚,现在有了政权,有些时候倒不必要去强调“宗教是鸦片”了,问题是要善于孤立少数顽固的反动分子。这话值得我们重视。十九号文件的第一个特点是排除陈言,从当前中国实际出发研究当前中国宗教问题,提出了崭新的观点。

第二,对中国社会主义时期的宗教和宗教界作出了恰如其分的估计。

在宗教工作指导思想的论争中,至今存在着五性和二性之争。五性就是指群众性、民族性、国际性、复杂性、长期性。提出这五性是中国革命运动对马克思主义有关宗教的理论的一大贡献,或一大发展。文件没有用“五性”二字,但它全文的精神无疑是肯定这五个性质的。在文件第二段的后一半,这五个性质都逐个提到了,

很集中的。

所谓宗教的“二性”就是指反动性和欺骗性。这一文件完全没有鼓吹和渲染中国社会主义时期宗教的反动性和欺骗性。

“反动”是个政治概念，宗教最多只能说是错误的认识，或认识上的错误。而认识上有这样那样错误的人是极多的，作为主观主义的唯心主义更是到处皆是。认识上有错误的人们政治上可能是反动的，但也可能是革命的，也可能是进步的，也可能是爱国的。把宗教信仰和政治反动等同起来，是“文革”的做法。

文件是这样估计今天中国的宗教和宗教界的：“解放以后，经过社会主义经济制度的深刻改造和宗教制度的重大改造，我国宗教的状况已经起了根本的变化，宗教问题上的矛盾已经主要是属于人民内部矛盾。”“我们清除了教会中的帝国主义势力，推行了独立自主、自办教会和‘三自’（自治、自养、自传）的正确方针，使天主教、基督教由帝国主义的压迫工具变成为中国教徒独立自主自办教会的宗教事业。我们废除了宗教封建特权和压迫剥削制度，揭露和打击了披着宗教外衣的反革命分子和坏分子。”“宗教职业人员总的说来，其中绝大多数是爱国的、守法的和拥护社会主义制度的；反对宪法、反对社会主义甚至里通外国的反革命分子和坏分子，只是极少数。”应当说，文件对宗教的态度是科学的、冷静的、实事求是的，不是谈虎色变的，对解放三十年后的宗教界的估价也是很高的。这也符合邓小平同志几年前所说的“宗教界也大有进步”。

至于欺骗性，恩格斯和列宁都指出，如果认为宗教是笨蛋遇上骗子的产物，那是资产阶级的观点。倒不是说宗教方面没有任何欺骗行为，但宗教有更深刻得多的根源。把宗教说成为骗子手的杜撰，没有骗子就没有宗教，那是很大的简单化。

片面强调宗教的反动性和欺骗性,势必导致同宗教作斗争、力图消灭宗教信仰的工作路线。我们吃这一路线的亏已经够了。

这是第二点。

第三,文件就党为什么要在宗教方面做工作,做什么工作,做这个工作的根本出发点、落脚点和基本任务是什么和不是什么,都交代得一清二楚。

有的人有一个假定:既然马克思主义是无神论,那么,通过这样那样的办法为信教设置障碍,使信教的人不信教,想方设法同宗教作斗争,限制、压缩宗教,就必然是党在宗教方面进行工作的意图和目的。这样一条路线,在“文化大革命”时期得到了充分表演。

党在宗教方面的真实意图是什么,文件交代得非常清楚。

文件是这样说的:“使全体信教和不信教群众联合起来,把他们的意志和力量集中到建设现代化的社会主义强国这个共同目标上来,这是我们贯彻宗教信仰自由政策,处理一切宗教问题的根本出发点和落脚点。”“党和政府对宗教工作的基本任务就是:要坚定地贯彻执行宗教信仰自由的政策,巩固和扩大各民族宗教界的爱国政治联盟,加强对他们的爱国主义和社会主义教育,调动他们的积极因素,为建设现代化的社会主义祖国,为完成祖国统一大业,为反对霸权主义,维护世界和平而共同奋斗。”值得注意,文件在谈到党的宗教工作的根本出发点、落脚点和基本任务的时候,诸如减少信教者人数,同宗教作斗争,限制以至消灭宗教这些说法,完全没有被放进去。

可是有些人对文件的这一现象视而不见,硬是认为宗教信仰自由云云是说说的,认为尽量扫除宗教才是党的真正意图,这样,粗暴地对待群众的信仰问题,造成党群关系的紧张,也在所不顾了。为了言之成理,他们把宗教方面出现的少量混乱现象和反常

现象夸大而为几乎全面的情况。这就同文件对情况的估计大有出入了。

对所谓“宗教泛滥”我们不要大惊小怪,更不要夸大,它决不是落实宗教政策的结果,倒每每是宗教政策和其他政策不落实的结果。一听到“宗教泛滥”就惊慌失措,对落实宗教政策发生动摇,高叫“宗教失控”,高叫“宣传无神论”等等,为下面乱搞一通和压制群众开绿灯,这是制造后患的做法。宗教狂热是持久不了的。应当做的是让政策兑现,群众对党向心了,坏头头(如果有)也就突出,就孤立,就好对付了。

“宗教泛滥”是个对宗教胡子眉毛一把抓,全面出击的提法。它不一分为二,不区别对待,不扩大团结面,是个容易扩大打击面的提法。前两年湖北某地基督教信徒有增加,有人笼统称之为“宗教泛滥”。但一经调查,原来至少有两种应加区别的情况:(一)有人大事鼓吹医病赶鬼,大讲天地末日来临,骗取财物;(二)有两个矿工,也领导着一部分教徒,但他们反对医病赶鬼,拒绝接受赠与,他们教导做人要做到“三满意”,即党满意、神满意、人满意。这后一种是符合爱国主义的,是宗教中比较好的类型,不应和前者混为一谈,好像都是“泛滥”。我们对帝国主义国家尚且区别对待,何况对信宗教的人呢。

教徒中大量存在的是正常的宗教活动。在正常活动之外,文件还提到三个东西,不算在正常宗教活动之内。文件是这样说的:“坚决保障一切正常的宗教活动,同时就意味着要坚决打击一切在宗教外衣掩盖下的违法犯罪活动和反革命破坏活动,以及各种不属于宗教范围的,危害国家利益和人民生命财产的迷信活动。”这里是两个“坚决”。

文件并不认为宗教将来永远存在下去,但是,现阶段还不是宗

教消亡的时候,更不能要求我国宗教事务部门干部去负责同宗教作斗争,以实现它的消灭。如果宗教事务部门干部既要团结信教群众,又要消除他们的信仰,那是无法统一的矛盾,工作是做不好的。党中央看到这一点,所以在文件中说:“应当懂得,在现阶段,信教群众和不信教群众在思想信仰上的这种差异,是比较次要的差异。”信与不信不说是矛盾,只说是差异,而且是比较次要的差异。说这个话,我想为的是使那些热衷于鸦片论,热衷于鼓吹宗教的反动性、欺骗性,热衷于横扫宗教、打击宗教、限制宗教的人清醒清醒。

宗教事务部门的任务就是落实政策,团结教徒,他们没有反教或向教徒宣传无神论和使教徒不信教的任务。这一点能够明确,并且公开告诉与宗教相关的人们,对于纠“左”大有好处。过去好多年间“宗教的反动性”,“同宗教作斗争”,“促进宗教的消灭”,“建立无宗教地区”,“宗教信仰自由是讲给外国人听的”等等,讲得太多了,今天非明确否定这些就难于纠“左”,难于改变一部分教徒心目中政府宗教事务部门是“反教部门”的形象,难于解除信教群众的顾虑,难于同教徒建立知心的友谊,难于团结他们。

以上是第三点,明确了党在宗教方面进行工作究竟意欲何为,我认为这是文件的精神核心之所在。

第四,文件要求改善有些地方的政教关系。

现在全国正在实行政企分开,而反顾宗教,政教不分的情况有些地方相当严重。问题是在于,这样做非常不利于发挥宗教界爱国力量在党群之间的桥梁作用,因此非常不利于团结广大教徒群众于党的周围。

这一文件有三段话,强调干部要重视各级爱国宗教组织的作用,善于领导,避免包办代替,让它们有职有权,能密切联系信

教群众。

“各级爱国宗教组织的基本任务,是协助党和政府组织贯彻执行宗教信仰自由政策,帮助广大信教群众和宗教界人士不断提高爱国主义和社会主义的觉悟,代表宗教界的合法权益,组织正常的宗教活动,办好教务。

“必须健全和加强政府主管宗教事务的机构,并且使一切从事这一方面工作的干部,系统地学习马克思主义关于宗教的理论,深入地理解党对宗教问题的基本观点和基本政策,密切地联系群众,同宗教界人士平等协商,合作共事。

“一切爱国宗教组织都应当接受党和政府的领导,党和政府的干部也应当善于支持和帮助宗教组织自己解决自己的问题,而不要包办代替。只有这样,才能充分发挥爱国宗教组织的积极性和应有的作用,使他们在宪法和法律的范围内主动地开展有益的工作,真正成为有积极影响的宗教团体,成为党和政府争取、团结和教育宗教界人士的桥梁。”

现在有个别地方的情况不是这样,一切事(包括宗教本身的事)都是干部说了算。这些干部不懂宗教,不理解宗教信仰徒的思想感情,不尊重宗教传统,宗教界人士不敢开口,结果做出许多伤害宗教信仰徒,把他们赶到坏人和敌人怀抱里去的事情来,使爱国宗教团体失掉许多群众。

像有的地方假借宗教组织名义搞的“爱国公约”、“八不准”、“十不准”,对于团结教徒于爱国宗教组织周围极为不利。把这种没有爱教气息,没有群众基础的东西,强加于爱国宗教组织,只会使信教群众看不起宗教界爱国人士。这种形式主义的东西应当快快收掉。当然,如果爱国公约没有不爱教的内容和语气,的确经过信教群众酝酿,有群众基础,那当然另当别论。

现在海外敌人说我们国内宗教官办,我们国内则有些人认为宗教就得官办才好,就不让宗教界的人在本宗教当家作主,说这才是党的领导。这说法是错误的,不符合文件精神。宗教官办之说是丑化党的领导。党的领导是把党的正确的路线、方针、政策交给群众和有群众基础的领导,让他们有职有权去落实,去贯彻。

宗教界有的“领袖”没有代表性,不代表宗教界合法权益。他们会逢迎,好像言听计从,很接受领导,可所作所为,不是起桥梁作用,只是增加群众对党的隔阂,使干部陷于孤立。干部如果要团结教徒,就不要讨厌爱教的宗教领袖,不要一味欢迎和依靠不爱教的宗教领袖,因为正是爱教才使领袖有群众基础。为了图工作方便而撇开爱教的领袖,依靠不爱教的领袖,最终只会使工作受到损害。帮助教会领袖不脱离群众,更群众化,今天大有必要。

邓小平同志指出:“我们的各级领导机关,都管了很多不该管、管不好、管不了的事,这些事只要有一定的规章,放在下面,放在企业、事业、社会单位,让他们真正按民主集中制自行处理,本来可以很好办,但是统统拿到党政机关,拿到中央部门来,就很难办。谁也没有这样的神通,能够办这么繁重而生疏的事情。这可以说是目前我们所特有的官僚主义的一个总病根。”这个话对我们宗教工作的改革来说看来是非常恰当的。

最后,我想说一下,这一文件是党中央落实宗教政策的绝大决心的表现之一,但还不是唯一表现。

前一时宪法修改过程中关于宗教条款的修订,也集中体现了党中央的精神。我身为宪法修改委员会的委员,从宪法修改委员会两年间的大量材料看,关于宗教那条,主张保留一九七八年宪法措辞(即提“有宣传无神论的自由”)的,原来颇有人在,其中有的还是重要的干部和知名的学者。可是党中央坚持拨乱反正,所以宪

法修改草案一次次出来,都修改掉了一九七八年宪法中宗教条款的提法。国务院宗教事务局写信给宪法修改委员会也表示支持宗教界所提的提案,这是同中央精神一致的。特别值得一提的,宗教不得干预这个,不得干预那个之类的容易使人感到宗教受到排斥的语气,也都除去了。整个过程反映党中央坚持真理,拨乱反正,落实政策,团结教徒的决心。

还值得指出,十二大删掉了党章草案中党员不得相信宗教那一条。这一删节当然并不意味党中央赞同党员信仰宗教,但它又一次反映了党中央为团结信教群众,避免刺激教徒感情而接受宗教界意见的苦心。

这些事实说明,党中央在宗教问题上反对和克服“文革”遗留的错误想法、做法的决心是很大的。各部门、各地区许多干部也在努力理解中央精神,并付诸实施,从而把团结信教群众的工作做好,这使我们乐观,怀着希望。

可以肯定,十九号文件这一理论性文件将随着实践的检验而发生越来越大的作用。

以上发言,仅仅代表个人,不妥处请指正。

与教外友人谈“鸦片问题”

(一九八五年)

在我国,宗教主要是作为统一战线问题而不是作为意识形态上你死我活的问题来对待的。这体现了毛主席、周总理、党中央的一贯教导:在宗教方面,中心任务不在于所谓“同宗教作斗争”,进而削弱消灭宗教,不在于使有神论者转化为无神论者,而在于求同存异,加强同教徒群众政治上的团结,而把人们信仰上的差异放在互相尊重的范围之内。正像周总理一九五七年所说:“不管是无神论者,还是有神论者,大家一样能够拥护社会主义制度。……人的思想有各色各样,只要他不妨碍政治生活,不妨碍经济生产,我们就不要干涉。”宗教工作上这一高举统一战线的观点,是人们对宗教的群众性、民族性、国际性、长期性、复杂性的深刻认识分不开的。

我们看到,有些自命为马列主义者的人不是这样。他们把宗教主要作为异己的意识形态来对待,而且不必要地夸大这一异己性,使之等同于政治上的反动性。他们夸大宣传无神论的作用,想当然地和粗制滥造地宣传无神论,宣传反教。他们运用行政手段对付群众的宗教活动的要求。这些都刺激群众的宗教感情。他们自以为做了限制、削弱宗教的“好事”,其实徒然使干群关系紧张,使党和政府丧失人们的好感,做了损害统一战线和党的利益的蠢事。

就我们中国来说,随着拨乱反正,批判“左”的错误和学习中央

一九八二年十九号文件,坚持后一种观点和做法的人正在大大减少。现在正在出现一种新型的干群关系:宗教工作干部和教徒在搞好经济生产,发家致富,振兴中华的目标上所找到的共同语言代替了往日的限制反限制的对立。人们发现,在一般情况下,教徒同常人相比,是多了一个宗教信仰和一些宗教活动,此外和常人一样,也关心生产和生活,关心国家的兴亡,关心青少年的成长,因此,只要宗教上适当照顾教徒特点,共同语言是大量的,顶牛状态完全可以避免。

值得在此提到,信教的公民也是正常的公民。有些宗教研究人员把一切有宗教信仰的人都称为“信仰主义者”,这是不恰当的。世界上信仰成为主义的人,即狭隘到排除常识和科学,只以信仰为出发点去认识和处理一切问题的人,实在是很少的。论主义,我国绝大多数宗教信仰徒至少都是爱国主义者,这才符合事实,也符合中央(例如在十九号文件中)的估计。

为了使坚持那后一种观点和做法的人更加减少,我愿意就马克思所讲过的一句话谈一些看法。

这句话的重要性被有些人提高到了很不恰当的地步。我指的是“宗教是人民的鸦片”这句话被有些人从上下文和马克思、恩格斯、列宁关于宗教的全部论述中孤立出来,把它说成为马克思对宗教所下的定义,指出了宗教的本质,是马克思的创见,是马克思主义宗教观的核心或精髓,如此等等。他们认为,用这一公式去理解、处理一切有关宗教的问题,可以万无一失。

其实,马克思著作中提到宗教是鸦片只有一次,即一八四四年在《〈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中提到的,在那里只是一带而过,而且那还是在他大谈异化问题的青年时期。

认为宗教是人民的鸦片,决不是马克思的创见。仅仅在德国,

在马克思提到这话之前的几十年间,至少有下列知识界人物在他们的著作中都发表过类似的观点,有的还用上了类似的词句。

(一)P. H. D. 霍尔巴赫在一七六一年所写的《揭穿了的基督教》：“宗教是一个使人们被他们的热心所迷醉的艺术,为的是要使他们不去对付他们的统治者在地上压制他们的种种罪恶。有人用那不可见的威力威胁他们,强迫他们在静默中忍受强权加于他们的痛苦,因为据说,只要他们甘愿在现在吃苦,在来世就可以得到快乐。”

(二)歌德批评德国基督教奋兴布道家 F. W. 克伦玛许于一八二八年出版的《仁慈王国一瞥》讲道集,称这些为“麻醉性的讲章”。

(三)黑格尔在《宗教哲学》中把印度宗教比作一个这样的人：“身体和灵魂都腐蚀了,觉得存活下去难于忍受,力求找到一个梦境的世界和疯狂的欢乐。”

(四)费尔巴哈在一八三八年所著《彼得·培尔》第一版注解中说,有人“用永恒的欢乐来诱惑人,用永恒的地狱来威胁人,向他施用鸦片,使他的视觉被畏惧和希望的强烈感情所掩蔽。”

(五)费尔巴哈在一八四一年所著《基督教的本质》中又提到基督教语言的“麻醉性作用”,提到基督给婚配加上“神圣的光圈”,使人失去清醒的头脑。

(六)海涅同路德维格·鲍乃进行讨论书稿第四卷中有他一八四〇年所写的话：“正像有人在绝望中割断自己的动脉,以死摆脱凯撒的强暴,很多人投身出世主义和拿撒勒的宗教,用教堂的琴声和钟声麻痹自己发病的头脑,摆脱今世的苦难。”“天堂是为那些从尘世得不到什么的人发明的。好啊这么一个发明! 好啊这么一个用甜蜜的麻醉药,用精神的鸦片,用几滴信、望、爱滴入受难人民的苦杯的宗教!”十年后,他又说过：“有人把一些灰黑的粉末倒进你

的伤处,你的苦楚就停止了。宗教不就是起的这种作用吗?鸦片与宗教的关系比大多数人所设想的要密切得多”(同亚多尔夫·斯塔爾和芬尼·利沃尔特的谈话)。

(七)布鲁诺·鲍威尔一八四一年还在柏林做神学教授的时候,在他的论文《基督教国家和我们的时代》中说:“在这一基督教影响最大的国家里,神学组织能够施用它的像鸦片一般的影响到那么大的程度,以致人们都被它送入梦境,任何自由人类的本能以及任何反抗都没有了。”

(八)次年(一八四二年),鲍威尔又说:“宗教以其鸦片迷雾讲述彼岸世界的新境况。”

(九)爱特迦·鲍威尔(布鲁诺的弟弟)在他一八四二年所著文艺作品《自由和我自己的事情》中说:“有人用宗教麻痹自己,他们愿望升上那七重天,在那儿忘记尘世。”

(十)摩西·海斯一八四三年在他所写的《瑞士的二十一个湖湾》中把“麻醉剂、鸦片、宗教、白兰地”四者相提并论,并说:“宗教很能使屈从者安心忍受他的痛苦处境,正像鸦片对痛苦的病患者能有所帮助一样。信仰把不真实的视为真实的,把真实的视为不真实的,它的确给予受苦的人一种消极的快乐。”

可见马克思不过是把当时知识界和宗教界一些开明人士常说的一句话引用了一次。把这句话说成为马克思的首创和发明,马克思在天有知,会感到不好受的。说它一语指出了马克思主义宗教观的核心,这在理论工作者不仅是一个不幸的常识性错误,而且是把马克思主义宗教观降低到资产阶级知识界和宗教界开明学者早已达到的水平。

马克思、列宁处在阶级对抗社会。我们先谈谈阶级对抗社会里的宗教。

宗教是一错综复杂的社会现象,它们起的作用是很多的,不是单一的。宗教在阶级社会里的鸦片作用、麻醉作用、磨灭劳苦大众的反抗精神的作用,当然是实在的,但这不过是宗教所起作用之一,并非宗教所起的唯一作用,也并非在一切情况下都是宗教的主要作用。

鸦片使人昏迷消沉。今天西方国家宗教在一些反动人物(例如美国自称为“道德多数”的基督教福音派组织上层)操纵下,通过说教,煽动教徒的狂热,把他们拉向极右,成为支持反动政治势力执政和打击群众的工具。因宗教而产生的这一现象,显然是大大超过了鸦片的作用。

宗教每每给农民运动提供革命理论,起到联系群众和发动群众的作用。在《德国农民战争》一书中,恩格斯肯定农民运动领袖闵采尔“传播了革命的、政治性的宗教思想”。“闵采尔的政治理论是和他的革命的宗教观点紧密相连的;他的政治理论远远超出了当时的社会政治条件,就如同他的神学远远超出了当时通行的看法一样。……闵采尔的纲领要求立即在地上建立天国,建立早经预言的千载太平之国。”恩格斯认为,中世纪德国教会神职人员的贫民派“为运动提供了理论家和思想家,他们之中很多人是平民和农民的代表人物,为此死在断头台上”。这方面其他例子很多,像太平天国等等都是,不必列举。宗教在这些农民运动中所起作用,远非“鸦片”二字所能概括。

在欧洲一些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甚至在无产阶级的某些斗争中,宗教也起过类似的作用。恩格斯认为,“加尔文的宗教改革作了日内瓦、荷兰和苏格兰共和党人的旗帜,把荷兰从西班牙与德意志帝国手里解放出来,并为在美国进行的第二幕革命供给了意识形态的服装。”马克思指出,在英国,“克伦威尔和英国人民为了他

们的资产阶级革命,就借用过《旧约圣经》中的语言、热情的幻想。”列宁不主张把宗教看成铁板一块,他重视俄国宗教内部的分化,认为“俄国的教派运动从许多方面的表现来说,是俄国的民主主义思潮之一”,主张“把他们吸引到社会民主党方面来”。他说:“我们社会主义者应当支持这种运动,使僧侣阶层中那些正直和诚实的人士的要求彻底实现。”列宁还指出,有这样的情况,“民主派以及无产阶级的斗争采取了以一种宗教观念反对另一种观念的斗争形式。”可见,在一定情况下,宗教所起作用同鸦片所起作用大不相同。

今天,第三世界国家的民族民主运动斗争有相当一部分宗教信仰徒和宗教界人士支持、参加,甚至成为领袖。在南朝鲜,许多教徒投身反法西斯的游行、罢课、示威。在拉丁美洲和菲律宾,在“解放神学”的旗帜下,不少神父(也有主教)由于投身群众运动和武装斗争而牺牲了生命。

在阶级对抗社会里,宗教方面凡此种现象以及许多其他现象,如果单单用一个鸦片说去解释,必然是很勉强,难于自圆其说的。

所以,比较符合客观事实的认识是承认,在阶级社会里,鸦片不足为宗教的定义,它只是宗教所起的作用,而且只是一个作用,不是唯一的作用。

毛主席在延安整风运动中说:“直到现在,还有不少人,把马克思列宁主义书本上的某些个别字句看作现成的灵丹妙药,似乎只要得了它,就可以不费力气地包医百病。”这个话在今天还值得重视。

关于下定义,列宁有过这样的见解:“下定义是什么意思呢?这首先就是把某一概念放进另一个更广泛的概念里。例如,当我

下定义说驴是动物的时候，就是把‘驴’这个概念放在更广泛的概念里。”同样地，我们要给宗教下定义，首先也应当把它放在一个比它更广泛的概念里才对。而鸦片作用不过是宗教所起诸多作用之一。说宗教是鸦片，是以偏概全，不能包罗宗教的万象。难怪有人试图以鸦片去说明一切宗教现象的时候，时常捉襟见肘，说明不了多少问题，有时他们索性自欺欺人，对宗教的其他诸多现象抱“不屑一顾”的态度。

马克思绝没有因为宗教在不少情况下有其鸦片作用而号召对宗教进行挞伐，加以消灭。他认为，致力于改造尘世是使宗教趋向消亡的不二途径。马克思在同一篇著作中呼吁把“对天国的批判”转到“对尘世的批判”，把“对神学的批判”转到“对政治的批判”。几乎在马克思写下这些话的同时（一八四三年），他在另一篇文章里把宗教说成为一种“狭隘性”，指出宗教“不是世俗狭隘性的原因，而只是它的表现”，所以他反对以克服人们的“宗教狭隘性”作为“消灭世俗狭隘性”的途径，提出“只有消灭了世俗桎梏，才能克服宗教狭隘性”。因此，他并不幻想能破除人们的宗教信仰，他倒是把“政治解放”作为人们摆脱宗教桎梏的前提提了出来。

马克思主义认为，只要人类在自然和社会异己力量面前还是盲目的，还无法完全掌握自己的命运，宗教这一社会现象就必然会出现和继续存在。在这一意义上来说，有群众要信宗教本来是正常的，不足为怪的现象。只要宗教的存在的自然根源和社会根源继续存在着，即使把无神论宣传得很好（这是极难的），接受宣传而离开宗教的人也不会多；而宣传得不好，势必刺激信教的人们的宗教感情，还会引起人们为教徒抱不平，对宗教发生同情和兴趣，这不是起了间接帮助宣传宗教的作用吗？这些观点，我

们宗教徒未必很同意，但总是比较欣赏的。

如果在阶级社会里，鸦片的麻醉作用不过是宗教诸多作用之一，不足以穷宗教之究竟，它主要是适应反动统治阶级麻醉控制群众的需要，那么，到了剥削阶级作为阶级已经不再存在的社会主义历史阶段，没有哪个阶级要发挥宗教的麻醉作用来为本阶级捞到好处了，我们还要把鸦片作为宗教的定义，怎么能讲得通呢？

在社会主义社会，宗教问题发生了什么变化，这是一个要照抄马、恩、列的话也办不到的新问题。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所谈的宗教，是阶级社会的宗教，马、恩所熟悉的主要是西欧阶级社会的宗教，列宁所熟悉的主要是帝俄的宗教，他们对于社会主义社会的宗教问题，没有研究。

我国解放以后各宗教团体在党的正确领导下，为团结各自的教徒作了大量努力。它们一面清除教内反动势力和非法违法活动，进行宗教改革，一面引导教徒走爱国主义社会主义道路，为我国实现四化和扩大国际统一战线作出贡献。我国各宗教已经发生了部分质变，已经转到一条比较健康，同社会主义新中国比较协调的轨道。

如果在社会主义社会还要说，宗教如同在阶级对抗社会一样，是人民的鸦片，那么，这么说的人就得要说得出来，是哪个阶级需要这一麻醉人民的作用？否则，充其量不过是一种自我麻醉，虽然不大好，但同以酒解愁相像，不是什么值得大事反对，力求消灭的东西。而为了达到消灭的目的而给它联上政治问题，也许自以为得计，其实是会丧失人们的同情的。

我们应当把宗教在今天这一自我麻醉意义下的麻醉作用，同昔日反动统治阶级利用了来统治人民的麻醉作用加以区别，承认

其严重性大为减小。如果把二者混为一谈，那在理论研究上至少是粗枝大叶，而在政治上势必仍然“以阶级斗争为纲”去处理今天的宗教问题，造成很大的危害。

今天，我们更应当看到宗教劝人为善的一面。这一面对社会主义社会的安定团结和经济生产，可以起良好作用。如果统一战线不是以共产主义为标准，而是以爱国主义为标准，那么，人们大可欣赏教徒有利于祖国的“好行为”，不必因为他们的非马克思主义出发点而奚落他们的“好行为”。只要教徒的实践是可取的，那就是宗教同社会主义比较协调了，我们就应当允许殊途同归。

基督教宣讲的仁爱和好、忍耐顺服等，在旧社会可以被反动政权用作麻痹人民、维护统治的鸦片，但在今天情况已起了根本变化。如《圣经》中有话说“凡掌权的都是上帝所命的”（罗13：1），过去国民党就是利用这个话来麻痹人民，企图使人民对其统治俯首帖耳。可是在今天的人民政权之下，基督徒再说这话就不能算反动了，它倒是有利于安定团结的。可见宗教并非在一切条件下只起一个鸦片作用，它可以起许多作用，同社会主义也不是必然势不两立的。

中央一九八二年十九号文件在论及宗教时不再沿用“鸦片”二字，摈弃教条主义和本本主义，从中国的社会主义历史时期的宗教现象的实际出发，这充分体现了实事求是的优良传统。

其实，马恩等无产阶级革命领袖对宗教的论述是很丰富的。在中国，早在一九五〇年全国政协会议期间，周总理就指出，革命胜利后不必总是去强调宗教是鸦片了，问题是要善于孤立少数顽固的反动分子。

马克思等讲鸦片，指的是一种麻醉剂，可是我们中国有过帝

国主义把鸦片和鸦片战争强加于我们的惨痛历史，我国群众对鸦片格外恨恶，宗教即鸦片之说就给宗教赋予了罪恶的性质，有的作者更把“鸦片”二字改为“鸦片烟”，信教公民成了吸毒分子，宗教领袖成了贩毒犯，因此，这一口号特别在我国大大助长极左路线在宗教工作方面的推行。其实，人们至多只能认为宗教基本上不过是人类在一定历史阶段认识上的一种偏差。有的人尽管不信宗教，是无神的，但在思想上和工作上表现为主观主义的唯心主义偏差，也还是很多的，而且这种偏差所造成的后果每每比群众信宗教的后果严重得多。前一时有关宗教研究的学者一再提出，不破除宗教信仰不能实现四化，有的宗教工作干部不求团结教徒于爱国主义旗帜下，却以禁止和消灭宗教为己任，这都是片面强调宗教即鸦片甚至是鸦片烟的必然结果。这在思想方法上是主观唯心主义，结果则挑起宗教仇恨，对安定团结极为不利。

其实，要说是鸦片，那岂止宗教呢？能够成为人们鸦片的东西多着呢。政治也能令人着魔入迷，成为鸦片的。“文革”中有些造反派一味“凡事左三分”，“理解的要执行，不理解的也要执行”不就是例子吗？一位闻名的文学家是这样自述他牛棚时期的思想状态的：“当时我的确把‘无知’当作改造的目标，”“承认这一生没有做过一件好事，”“承认我写的全是毒草，”“真的相信只有几个‘样板戏’才是文艺，”“只是往牛角尖里钻，完全跟着造反派的逻辑绕圈子，”“越想越觉得造反派有理，越想越觉得自己有罪。”接受麻醉剂到这样的程度，许多宗教信仰徒也要自叹不如的。我说这些，不是要丑化政治，只是要指出，我们说某一事物是鸦片，对这一事物的究竟并没有揭开多少。单个的人总是有人的软弱处，不大能避免，而是容易接受这样那样的主观主义错误认识的。

关于我国社会主义时期宗教问题的基本认识和基本政策，中共中央经过缜密的调查研究，总结了建国三十年间的经验教训，在理论、方针、政策上提出了完整的一套，并且指出这个问题能否处理得当，对于国家安定和民族团结，对于发展国际交往和抵制国外敌对势力的渗透，具有不可忽视的重要意义。这一文件对我帮助极大，我至今还在学习、吸收的过程中，今天只能算是提出问题，希望大家一起来研究解决。

《中国社会主义时期的宗教问题》介绍

(一九八八年四月)

同学们，这几年来，我国社会科学界思想大为活跃，在宗教研究方面也一样。在实事求是的要求下，新的思想和新的观点从四面八方被提了出来，讨论热烈异常，比我们神学界活跃得多。可喜的是我们基督徒也有参加于其间的。

我们不要把今天社会科学的宗教研究仍旧看成铁板一块。正由于思想活跃，出现了健康的多层次的分化。譬如说，在宗教研究人员中，很明显地存在着两种不同的方法论。一种只愿意看到一切宗教现象的共性，总只是在宗教与非宗教之间划界线，认为宗教就是宗教，是一整块铁板，是单一的，与非宗教没有或绝少共同语言。这一种不想细加区别的作法颇有胡须眉毛一把抓的味道，讲到末了就搬出“一切宗教总是鸦片”之类的话来定调子，这就难免令人有讨论深不下去的感觉。另一种则发现，对宗教现象不能一概而论，它们尽管都是宗教现象，其所起的历史作用、政治作用竟大不相同。这一种不热衷于或不急于为宗教找到一个总的定义，它深感对具体的宗教现象作具体分析的必要。有的作者无视各国文化的不同，无视所处时代的不同，无视有关宗教的特点，泛泛地、抽象地谈论宗教，好像他们的论点可以放在任何时代、任何国家、任何宗教而皆准似的。

最近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由我国著名学者罗竹风先生主编的《中国社会主义时期的宗教问题》就不是这样。这本书所取的书

名是值得我们注意的。它不是泛论宗教问题，它处理的是中国的宗教问题；它也不是泛论中国的宗教问题，它处理的是中国社会主义时期的宗教问题。这本书遵循马克思主义者的最好传统，不从某一定义或某一概念出发，而从今天中国实际存在的宗教出发。因此，信教的读者不大感到隔靴搔痒，更不感到委屈，只感到言之有物。这本书从理论上把中国共产党的宗教政策来龙去脉交代得一清二楚，使人们信服，认识到这一政策具有科学性，不是权宜之计。

毛主席曾大力反对本本主义，可是，就宗教研究来说，摆脱本本主义似乎分外困难。其原因可能是不少宗教研究者连一名宗教信徒都不认识，更不用说同一位宗教信徒交朋友，去进入他的思想感情。他们闭门造车，只接触书本，不接触宗教。由于他们从小就听说宗教是鸦片，甚至是鸦片烟，又由于他们深知我国曾吃了鸦片战争的亏，他们太厌恶宗教了，不知不觉中让感情代替了科学。如果再要摆原因，那么另一原因是，拨乱反正以来，“左”的路线在宗教工作和宗教研究中的表现没有受到充分的暴露和应有的批判。尽管如此，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情况已经开始发生变化，社会科学界出来了再思性质的文章，发表在大专院校的哲学社会科学学报里。《中国社会主义时期的宗教问题》就是一本集其大成的书。

这本书有下列特点：

一、把宗教作为具有多要素多层次的社会实体来研究，不专在教义上做文章。

教义在我们信徒是重要的。凡信徒和教会的言行都不得违反教义。这并不是说，只有教义所规定的事信徒才可以去做，凡教义没有规定的，就不准信徒去做。不是这样的。社会上有许多新

的思想和新的事物，信徒完全可以去接受，去拥护而不违反教义。这就是说，信徒自由的范围是宽广的。但是某些宗教学者想当然地认为上帝和宗教都是实行极权主义的，认为信徒只能做教义所规定的事，因此他们认为信徒被教义压得透不过气，应当把信徒从教义的牢笼中解放出来。他们就以教义的批判家自命。对他们来说，宗教研究就是教义研究，就是教义批判，就是宣传无神论，就是“解放”信徒。这是一个很大的误会。尤其解放以来，我国各教在开明化和自由化方面都前进了不少。在这样的情况下，十亿人中有几分之一信教，大可不必嫌多。

几年前有人写文章，认为一个人只要有些宗教信仰，就成了一个“信仰主义者”，从此，宗教信仰会把他变成一个怪人。这个人变成“浑浑噩噩”，认为“肉体是灵魂的坟墓”，把“改善物质生活的合理要求说成是灵魂犯罪的根源”，甚至“目不敢视五色，耳不敢听五声”，“经典上没有的连想也不敢想”，如此等等。为了宣传宗教的危害，就这样简单化地刻画信教的人，这只能叫信徒深觉委屈和反感。究其原因，还是由于研究宗教的人没有同宗教信徒交朋友的缘故。这使我想起列宁的话：“把显然愚蠢的思想加到他的论敌身上，然后加以驳斥，这是不大聪明的人惯用的手法。”

此刻我们姑且不谈教义本身的是非。让我们问这样一个问题：即便教义是错了，一个信了教的人是不是就此一错百错，就此荒唐透顶，一无是处，做什么也闯祸？我相信列宁的回答是“否”。你们看，列宁知道，列夫·托尔斯泰是个笃信上帝和基督的地主，在宗教信仰方面甚至有点狂热，可是列宁肯定他为“一个天才的艺术家”，说他“无情地批判了资本主义的剥削”，“是最清醒的现实主义者，撕下了一切假面具”，“创作了世界文学中

第一流的作品”。列宁自己是不信神的，可是他和信神的托尔斯泰之间共同语言有的是，并不因为托尔斯泰是个宗教信徒而矢口不提他在文学和社会斗争方面的贡献，也并不因为他是个天才艺术家而掩盖他笃信上帝的事实。这种胸襟，令人赞赏。我们中国按统一战线原则处理人们的宗教信仰问题，它包含着同一思想：一个人有了宗教信仰仍旧是爱国主义者和社会主义者，仍旧能够成为统一战线的一员，至于他的宗教信仰，应当受到尊重和保护。这胸襟也是伟大的。

教义对人们思想行动的影响到底是有限的。试看古代到现代的科学家，其中很多都有宗教信仰。他们有宗教信仰并不排除他们在科学上作出创新业绩。有的科学家还把他们的科学成就和宗教灵感联系在一起。

《中国社会主义时期的宗教问题》一书并不忽视宗教各有其不同的教义，也不忽视教义在各教占有地位，但是编写者不是钻进教义而钻不出来。他们把宗教作为一个社会实体，有其教义，有其信众，有其组织，有其派系，有其教职体制，有其规章制度，有其文学艺术，有其神学和历史，有其伦理道德，有所办各种社团，有其对各种现实问题的主张，有其对社会的危害，也有其对社会的贡献。对宗教的科学研究必须综合这些而不执其一端。

二、对“宗教是人民的鸦片”之说，这本书有个恰如其分的评论。

有些只知马克思的一些字句，没有掌握马克思主义精神的作者，在处理宗教问题的时候，最容易走的路线，就是把宗教和鸦片等同起来，认为只要不忘这一公式，任何涉及宗教的问题都可以迎刃而解。他们把“宗教是人民的鸦片”这一判断说成为马克思的创

见,是马克思主义宗教观的精髓,它一语道破了宗教的本质。奇怪的是,如果鸦片是宗教的本质,马克思怎么只是轻轻提上一笔,从来没有加以发挥?马克思在宗教问题上的创见,怎么不过是这么一句在他那时早在德国知识界有不少人说过的话呢?这是提高还是降低马克思呢?可喜的是,今天,在研究宗教的社会科学学者中,继续在宗教的“鸦片本质”上做文章的已经很少了。

很可惜,我们不能说宗教不起鸦片作用。我们身为基督徒应当自问,我们有没有让宗教在我们身上起到鸦片作用?我们记得,当耶稣在十字架忍受苦难的时候,有好心的人向他送上麻痹痛感的药品,他一尝之后就拒绝不吃。

宗教在社会上所起作用很多,包括动员和团结人们投身革命斗争的作用。这一点恩格斯在《德国农民战争》一书里也曾加以肯定。鸦片作用或麻醉作用只是宗教所起作用之一,不是唯一的作用,也并非在任何情况下都是主要作用,因此鸦片不足为宗教的定义。

巴西圣保罗市天主教大主教卡马拉(Don Kelder Camara)对信徒说:“当我给一个穷人面包吃的时候,人们说我是个圣徒,但当我问到穷人为什么没有面包吃的时候,就有人说我是共产党。”像这样的讲道,对于暴露社会的黑暗和启迪人们的良知都有很大的作用,这一叫人觉醒的作用同鸦片叫人昏昏沉沉的作用岂不是正相反吗?这句话提出了“改善物质生活的合理要求”,决不是把“改善物质生活的合理要求说成为灵魂犯罪的根源”。向人们提出“穷人为什么没有面包吃?”“共产党是怎样一个党?”等一系列重要问题的宗教,难道同叫人逆来顺受,甘心忍受敌人的拳打脚踢的宗教一样都是鸦片吗?

同学们,我们的人民解放运动、社会主义建设运动和基督教三

自爱国运动,和卡马拉的工作都是一路的,都是相承的,都是人民的正义事业。我们不是在麻醉信徒,我们正在把信徒培养成为头脑清醒的信徒。

至于宗教即鸦片之说,我认为它虽然有一定启发性,但在理论上不是一个很有突破意义的论点。那就是说,它对于解决理论问题并不具有多大的开拓性。

《中国社会主义时期的宗教问题》一书没有让鸦片论左右它的探讨,该书编者是在“结束语”中才处理这“鸦片问题”的。它指出三点:

(一)“鸦片”是对宗教在阶级社会中一定条件下所起消极作用的形象化比喻。

(二)历史上的宗教的作用因时代、社会条件不同而不同,不能一律用“鸦片”来概括。

(三)社会主义时期宗教的作用,更不能用“鸦片”来说明。

这三点,我想是科学的,公正的,我们基督徒对这三点当能心悦诚服。

三、这本书承认宗教有其伦理道德的内容,并对这一内容在社会主义时期对宗教信徒的作用抱肯定态度。

宗教总是“劝人为善”的——这是人们最普遍的看法。今天,不少地方基层干部反映,在信教的人多的地方,犯罪行为就少。宗教对人们的行为,是有一定指导作用和制约作用的。可是,曾有一个时候,有些宗教学者在“左”的影响下,为了丑化宗教,竟然硬把宗教的教义和其道德伦理拆开,说宗教道德是社会生产关系在人们行为规范上的反映,不属宗教本身,宗教只管人和神明的关系,人际关系不属宗教范围。有人甚至说,基督教十诫中,后六条讲的都属行为道德,因此不属宗教本身,宗教讲六诫,那是宗教干预了

道德生活。幸亏教义不由这位先生决定,否则我们的十诫只剩四诫了。值得提醒这位先生,按历史唯物主义,宗教本身又何尝不是社会生产关系的产物呢?

《中国社会主义时期的宗教问题》完全没有这种堂·吉珂德式的攻击。它主张殊途同归:“宗教教规和宗教道德对教徒来说,大多具有避恶从善的制约作用。不管是什么人,只要多做对国家和群众有益的事,不管其出发点、动机怎样,但落脚点都对社会主义现代化有利。从这个角度来说,宗教是可以和社会主义社会相协调的。”

这对我们基督徒也是一个重要的提醒。基督教是一个重视伦理道德的宗教。《圣经》讲是非,讲善恶,讲什么行为好、什么行为不好,以及讲社会应当怎样,政治应当怎样的部分,占了很大的篇幅。可是现在有的基督徒只问个人得救,责备讲究伦理是非的基督徒为信仰不纯,还说什么基督徒是不问是非善恶的,不信基督的怎样好都是坏的,信基督的怎样坏也都是好的,如此等等。请他们注意,他们身在教内,却和教外那些热衷于强调信与不信的分野的极左论点相合拍、相呼应了。

四、这本书从理论上阐述了社会主义和宗教相协调的问题。

在“左”的路线统治下,马克思主义者谈社会主义和宗教的协调,可能会被认为有失立场;宗教徒谈社会主义和宗教的协调,可能会被认为投机。

解放已经三十多年,我国宗教界各级领导层人士绝大多数都拥护社会主义,以各教信徒来说,他们绝大多数天天在参加社会主义劳动生产。据我们所知,基督教信徒而被他们的同事评选为社会主义先进工作者、先进生产者 and 劳动模范,所占比例在许多地方还高于一般群众。我国各教还发生了不少变革,同过去相比,它们

朝适应社会主义方向已经迈出了几个大步,这是有目共睹的。这是从宗教方面来看。

从国家来看,尽管领导党主张无神,但它承认宗教存在的合理性、合法性,反对任何消灭或歧视宗教的行为,只打击宗教外衣掩盖下的违法犯罪活动和反革命破坏活动,以及各种不属于宗教范围的、危害国家利益和人民生命财产的迷信活动。

既然不是谁消灭谁的问题,怎么办呢?只有要求双方共同努力,使双方比较协调。

提出协调这一课题,就是一方面要求各教在自己的信仰许可的范围之内,进一步发扬符合社会主义的东西;另一方面,要求教外进一步坚决摆脱“左”的影响,清除灭教思想的残余,落实政策,向各教提供办好教务的条件。

这几年,我们基督教提倡按三自原则办好教会,使信徒喜爱并支持我们的教会,同时也使教会同社会主义协调,得众民的喜爱。我们知道,只强调与社会主义协调,教会有越办越不像教会、团结不了信徒的可能。但只以办好教会为标榜,不顾三自爱国原则,不顾同社会主义协调,教会势必遭到人民的唾弃,较有认识的信徒也要游离于教会之外的。

以互相协调代替互相消灭,这在世界上是个新的精神。这也给我们的神学同学投身办好教会的事业开辟了很大的可能性,是大大值得欢迎的。

五、这本书不排斥而是欢迎宗教信徒一同来研究宗教,欣赏宗教信徒对宗教研究所能作出的贡献。

刚才我提到有人研究宗教却不认识一两个宗教信徒。更有甚者,有人认为,宗教研究只能在没有宗教徒参与的情况下才行。他们反对让宗教信徒参加宗教研究。

列宁说过,马克思主义之所以“赢得了世界历史性的意义,是因为它并没有抛弃资产阶级时代最宝贵的成就,相反地却吸收了两千多年来人类思想和文化发展中一切有价值的东西”。

在马克思之前和之后,信宗教的自然科学家、社会科学家以及宗教学者在科学研究方面作出过多么巨大的贡献。今天真正的科学研究工作者急需继承一切有价值的东西。因为有人信仰宗教就不能与之合作,这不是宗派主义又是什么呢?可以说,要排斥非马克思主义宗教学者的宗教研究成果,完全由一些以马克思主义者自命的人来另起炉灶,这种宗教研究必然得不到好结果。恩格斯写的三篇研究初期基督教史的文章由于引用了大量德国教会学者研究的成果,就显得比较扎实。

事实上,当我阅读我国马克思主义宗教学者的研究成果的时候,我发现,他们引用许多西方学者的作品,有的被当作权威来加以肯定,而这些西方学者每每又是宗教信徒。结果,他们把自己放入一个啼笑皆非的处境:宗教研究可以同外国宗教徒合作,不能同中国宗教徒合作!

参与编写这本书的大多不信宗教,但也有信宗教的。它进行的是科学研究,把宗教作为历史现象和社会现象加以研究,不是传教,也不是反教。从基督教信仰的角度来看这本书,我们感到不足,特别在处理宗教长期存在的原因的部分。可是我们毫无理由要求它写成一本书籍。同宗教研究方面相当一部分其他著作相比,那么,我认为这是教条主义最少,解释党的宗教政策最透彻,论点最有说服力的一本书。希望同学们重视这本书。

近几年宗教研究上的若干突破

(与汪维藩同工合作联名发表于一九八九年六月)

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我国社会科学界思想大为活跃,在宗教研究方面也是如此,许多新的思想和新的观点被提了出来,讨论异常热烈。在全面改革开放的新形势下,宗教研究上对旧思想、旧观点等旧框框的突破,更是方兴未艾。就意识形态的宗教来说,它是离经济基础最远的,但就社会实体的宗教来说,它又离我们的现实生活、离我们的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如此之近。千百万教徒就生活在我们身边,并且在各自不同的岗位上参与我国社会主义两个文明的建设。近年来宗教研究方面某些理论上的突破,有助于我们实事求是地认识和对待我国社会主义时期的宗教问题,从而有利于将广大信教群众的意志和力量集中到将我国建成一个强大的社会主义国家这一宏伟事业中来。

摆脱本本主义,代之以实事求是的研究方法

在我国社会科学界,本本主义的影响是由来已久的,其根源可以追溯到苏联对我国学术界“左”的影响。在宗教研究问题上,“左”的影响可以说是更甚三分。甚至在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少数从事宗教研究的权威,仍然抱着马克思的“宗教是鸦片”这一就阶级社会而言的断语,作为“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永恒不变的真理,把宗教研究工作简化为“批判宗教神学”。他们的所谓研究工作,实际上是一种从概念到概念,只知书本不知宗教实际的“空对空”

的闭门造车式的研究工作,而根本无视各国文化的不同,无视宗教所处时代所起作用的不同。他们甚至连一名宗教信徒都不认识,更不用说同一位宗教信徒交朋友,去进入他们的思想感情,去观察了解、调查研究宗教徒在现实社会的经济、文化、政治生活中所起的作用,所作出的贡献,而是以一种几乎是“与生俱来”的对宗教的偏见和厌恶,以感情代替了实事求是的方法。

早在一九八四年,我国著名学者罗竹风在一篇题为《建立中国特色的宗教学理论体系》的发言中,就已经指出:“马克思有关宗教的论述,都是‘就德国而言’,而不是泛指一切或包罗万象的……学习马克思关于宗教的理论应当是全面地、正确地加以理解,不能随心所欲,各取所需;即使列宁在论述宗教问题时,也是从俄国当时的实际情况出发,就‘俄国而言’的……我们今天应当就‘中国而言’,因为中国有自己的国情,和德国、俄国都不一样……学习马克思有关宗教的理论,我们应当从中国的实际情况出发,建立具有中国特色的宗教学理论体系,而不是去寻章摘句,生搬硬套。如果不是这样,那岂不是变成学术上的侏儒了吗?”

由罗竹风担任主编,上海社会科学院于一九八六年出版的《中国社会主义时期的宗教问题》,正是遵循“就中国而言”,从中国的实际出发,理论联系实际,实事求是,在实践中检验真理和发展真理这一思想路线编写而成。为编写这部“六五”期间国家重点项目的著作,上海社科院宗教研究所派出十多批同志,走出书斋,到全国十三个省、市的一些城市和农村,进行了广泛的社会调查,共搜集到繁简不一的个案材料数百例,写出调查报告数十篇。在调查工作中,他们一不带框框,坚持从实际出发;二是广泛涉猎,打开思路,经过分析研究,然后有针对性地进行比较系统的调查。正是由于思想路线和研究方法对路,彻底摆脱了本本主义,上海宗教研究

所的同志才编写出《中国社会主义时期的宗教问题》这本在宗教研究方面具有划时代意义,并对我国宗教研究产生深远影响的书。

把宗教作为具有多要素、多层次的社会实体来研究,不只在哲学上、教义上大做文章

宗教包含哲学观点和教义思想,但宗教又不只是哲学和教义。宗教徒相信有神论,相信各种教义,并以自己所信奉的教义来规范自己的行为。但宗教徒并非一个狭隘的哲学家,更不是某些人所谓的所谓“信仰主义者”。

在哲学思想领域里,划分唯心论和唯物论、有神论和无神论是有用的。但真正的历史唯物主义者,从来不以这种哲学上的分野来作为政治上落后与进步、反动与革命的分野。哲学上坚持唯心主义乃至有神论而在政治上却相当进步的人,历史上大有人在,今天也大有人在。今日拉丁美洲的解放神学家、南非的黑人宗教领袖图图均属此类。因为宗教不只是一种意识形态,也是一种十分复杂的社会现象。马克思在《一八四四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说过:“如果只有宗教哲学等等对我说来才是真正的宗教存在,那么我就只有作为宗教哲学家才算是真正信教的,而这样一来我们就否定了现实的宗教信仰和现实的信教的人。”而现实的宗教信仰者是可以容纳、接受许多不同的思想和不同的事物的。

一些把教徒视为“信仰主义者”的人,把宗教徒用画漫画的手笔勾勒成“浑浑噩噩”,“目不敢视五色,耳不敢听五声,经典上没有的连想也不敢想”,把“改善物质生活的合理要求说成是灵魂犯罪的根源”的钟楼怪人。这种全凭主观想象对信教群众的刻画,使教徒感到委屈和反感。正像列宁所嘲讽的:“把显然愚蠢的思想加到他的论敌身上,然后加以驳斥,这是不大聪明的人惯用的手法。”事

实上,宗教教义对人的消极作用每每是很有限的。启蒙运动和理性主义思潮的倡导者多数是当时的僧侣和神学家。自一五一六年莫尔的《乌托邦》到十九世纪空想社会主义达到顶峰时,三百多年间绝大部分空想家都带有基督教色彩。试看从古到今的科学家,其中很多人都有宗教信仰,但这并不妨碍,因而也不能排除他们在科学上作出的创新业绩。《辞海》有关徐光启的条目里,在介绍他是明代科学家以及他对当时社会生产的贡献时,只字不提徐光启是一位虔诚的天主教徒。这种“讳莫如深”,若不是顾忌宗教会玷污科学,便是顾忌科学会抬高宗教。其实,宗教与科学集于一身的人,历史上是举不胜举的。列夫·托尔斯泰是个笃信上帝和基督,在宗教信仰上甚至有点狂热的作家,但列宁却肯定他为“一个天才的艺术家”,说他“无情地批判了资本主义的剥削”,“是最清醒的现实主义者,撕下了一切假面具”,“创作了世界文学中第一流的作品”。列宁并不因托尔斯泰笃信宗教而全盘抹杀他在文学和社会斗争方面的贡献,也并不因为他是天才艺术家而掩盖他笃信上帝的事实。陈耀庭在《论宗教系统》一文中,尝试以系统论哲学认识宗教。他认为:“以系统方法来认识宗教,任何宗教系统都是由宗教徒、宗教组织和宗教思想组成的社会实体,是人类社会的精神系统的一支。它既反映着自然界和人类社会给人带来的苦难,也寄托着宗教徒对于现实苦难的抗议和哀叹以及对于理想生活的希望和追求。……宗教系统的三要素之间,在一般情况下对系统发展起关键作用的只能是宗教徒。”他又指出:“宗教徒作为活生生的‘人’,同自然界以及社会的政治经济等要素有密切的关系,这是因为宗教系统本是一个开放系统。……宗教徒之所以成为宗教系统中最活跃的,也正是由于他们反映着社会的物质生产和精神生产的最新要求。把宗教徒理解为不食人间烟火,和人类生活格格不

人的‘异人’是不符合事实的,把宗教徒描写成除了‘天堂’毫不关心人间的国家、政治、社会经济等生活的‘超人’,也是不符合宗教系统的客观事实的。历史上有关宗教‘异人’和‘超人’的记载无不曲折地反映着当时社会生活中存在的种种问题”(以上引自《宗教》一九八六年第一期)。不在哲学上、教义上大做文章,而把宗教作为具有多要素多层次的社会实体来研究,运用系统论哲学而不是用机械唯物论来对宗教系统进行研究,这正是能正确认识宗教的根本原因所在。

对宗教是人民的鸦片之说,有了恰如其分的理解和评论

某些只知马克思主义的片言只语,没有掌握马克思主义精神的作者,在处理宗教问题的时候,最容易走的路线,就是把宗教和鸦片等同起来,认为只要运用这一公式或标签,任何涉及宗教的问题都可以迎刃而解。他们把宗教是人民的鸦片这一判断说成是马克思的创见,是马克思主义宗教观的精髓,是一语道破了宗教的本质。

其实,在马克思之前的德国哲学家、社会学家乃至文学家,至少有十多人说过宗教是人民的鸦片或类似的话,马克思只是重复了前人的话,谈不上创见。而当时,鸦片是药用的镇痛剂,和后来的毒品也不同。在论及“宗教是鸦片”可否作为宗教的定义时,罗竹风曾指出:“马克思又何尝是劈头一句,只把‘宗教是鸦片’作为‘定义’呢?前边不是还有与‘抗议’、‘叹息’相关联的话,怎么可以断章取义,只见‘鸦片’而不及其余呢?”

宗教在历史上所起的作用,有其消极的一面,有人民自我麻醉和被利用来麻醉人民的社会作用。但这并不是宗教在历史上所起的唯一作用,也不是在任何情况下所起的主要作用。宗教曾经起

过动员和团结人民投身革命战争的作用,这一点恩格斯在《德国农民战争》一文里也曾加以肯定。少数作者发明过一种所谓的“外衣论”,认为宗教只不过是农民革命战争的“一件掩耳目的外衣”,并且终于导致了农民战争的失败。这是一种对历史的歪曲和简单化。实际上恩格斯不只用过“外衣”一词,还用过宗教是农民革命的“旗帜”和“武器”等字眼。试问,如果宗教纯粹是鸦片,又怎么可能成为人民起义的旗帜和武器呢?至于农民运动的失败,那需要作科学分析,把“披上宗教外衣”说成为导致这一失败的至终原因,这至少是轻率的。

巴西圣保罗市天主教大主教卡马拉在讲道的时候对信徒说:“当我给一个穷人面包吃的时候,人们说我是个圣徒;但当我问到穷人为什么没有面包吃的时候,就有人说我是共产党。”像这样的讲道,对于暴露社会的黑暗和启迪人们的良知都有很大的作用。这一叫人觉醒的作用同鸦片叫人昏昏沉沉的作用岂不是正相反吗?卡马拉的宗教信仰提出了“改善物质生活的合理要求”,决不是像有人所说的宗教把“改善物质生活的合理要求说成是灵魂犯罪的根源”。

中共中央一九八二年有关宗教政策的文件中,丝毫没有在宗教是鸦片这一论断上做任何文章,只在述及我国解放前剥削阶级控制群众时才提到宗教曾被作为麻醉群众的精神手段。上面提到的《中国社会主义时期的宗教问题》一书,同样也始终没有让“鸦片论”左右它的探讨和研究。该书编者是在“结束语”中才处理这鸦片问题的。它指出三点:

(一)“鸦片”是对宗教在阶级社会中一定条件下所起消极作用的形象化比喻;

(二)历史上宗教的作用因时代、社会条件不同而不同,不能一

律用“鸦片”来概括；

(三)社会主义时期宗教的作用,更不能用“鸦片”来说明。

这三点,是对“鸦片论”的一个重要突破。有人将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宗教研究领域里关于“宗教是鸦片”的论争戏称为“第三次鸦片战争”。看来,这一场“鸦片战争”已经基本结束,在从事宗教研究的学者中,继续在宗教的“鸦片本质”上做文章的已经很少很少了。

宗教有其伦理道德内容,这一内容在社会主义社会中仍有其积极的、辅助的作用

宗教总是“劝人为善”的——这是人们最普遍的看法。宗教对教徒的作为,是有一定指导作用和限制作用的。可是,曾有一个时候,有些宗教学者在“左”的影响下,为了丑化宗教,抹杀宗教道德的积极作用,竟然硬把宗教教义和其道德伦理拆开,说什么宗教道德伦理是社会生产关系在人们行为规范上的反映,不属宗教本身,宗教只管人和神明的关系,人际关系不属宗教范围。有人甚至说,基督教十诫后六条讲的都是行为道德,因此不属宗教本身。宗教讲后六诫,那是宗教干预了道德生活。

对此,严北溟在《谈社会主义时期的宗教道德问题》一文中指出:“各种宗教不仅有它自身所提倡的道德,而且强调道德修养、持戒和维护道德尊严的一套信条、手法,还要远远超过非宗教的伦理学派。……作为宗教道德约束力量之大,简直是无出其右的。说宗教没有道德,真不知从何说起。……也正是由于宗教道德的这种巨大约束力量,首先它在各个宗教内部信徒中产生了显著的实际效果,这是有事实为证的。在国内,特别是少数民族地区,通过实际社会调查,发现一极堪注意的现象:凡是教民中人,不管

哪一宗派，大都能遵法守纪，热心助人，不做坏事。……据一位从事青年犯罪调查研究工作的同志告诉我：‘在历次被逮捕的青年流氓犯罪分子中，出自教会、寺观、庵堂的，几乎很难找到’，更说明宗教道德的约束力量不仅对中老年影响大，对青少年同样发挥了不小的作用”（上海社会科学院宗教研究所《宗教问题探索》一九八四年文集）。

还有人认为：宗教虽然包含伦理道德，但就其本质来说，宗教道德是阶级社会中为反动统治阶级服务的道德，因而和社会主义社会水火不能相容。对此，罗伟虹在《宗教道德在社会主义时期的变化及其社会作用》一文中指出：“宗教道德是一种通过宗教世界观来论证的，与宗教教义紧密联系的道德观念、行为规范和戒律的体系，是社会意识形态中一个特殊的领域，它把宗教与道德这两种不同的意识形态密切地结合起来，既是道德的一个门类，又是宗教的一个部分。……历史上不少反动统治阶级，都曾借神的意志，作为强制、欺骗人民服从他们的反动统治的手段，宗教道德说教则成为他们维护反动统治的精神工具，起了消极的作用。在社会主义社会中，宗教道德这一错误的理论体系并不会改变，但是它已不依附反动统治阶级，不再为推行反动统治阶级的道德作论证，其政治上的反动作用也随之消失。……社会主义时期，宗教道德仍鼓励信徒行善，宗教界也积极为社会做好事，现在的善，无论从实质与内容上看，都与阶级社会有了变化。……社会主义道德，是人类道德发展上的崭新阶段，同以往历史时代的道德有本质区别，但是，它与以往历史时代的道德并不是割绝的，没有任何联系的。相反，它要批判继承历史上道德遗产中的精华部分。在社会主义道德中，理所当然地要包括人类社会长期发展所形成的，并为不同阶级所接受的全人类社会生活的普遍道德准则和规范的。这种社会道

德,虽属较低的层次,但也是维持正常的社会秩序最起码的、不可缺少的道德。因此,宗教道德中反映这一部分内容的准则和规范,在客观上是能够与社会主义道德相适应,与社会主义精神文明是一致的”(同上)。

宗教可以和社会主义相协调

宗教和社会主义冰炭不能相容,水火不能两立,这也许可以说是自十月革命以后所有社会主义国家宗教研究理论上的传统观点。马克思主义者谈社会主义和宗教的协调,可能被认为“右倾”或丧失立场,教徒谈宗教和社会主义的协调,可能被认为是投机和别有用心。

但我国解放三十多年来的事实是,各教领导层人士绝大多数都拥护社会主义,从各教信徒来说,他们绝大多数天天参加社会主义脑力或体力劳动生产。据我们所知,被评选为社会主义先进工作者、先进生产者 and 劳动模范的基督徒在信徒中所占比例在许多地方还高于一般群众中的先进比例。我国各教还发生了不少变革,同过去相比,它们朝适应社会主义方向已经迈出了几个大步,这是全国人民有目共睹的。这是从宗教方面来看。再从国家来看,尽管领导党主张无神,不信宗教,但它承认宗教存在的合理性与合法性,反对任何消灭和歧视宗教的行为,只打击在宗教外衣掩盖下的违法犯罪活动和反革命破坏活动以及各种不属于宗教范围的、危及国家利益和人民生命、财产的迷信活动,但对正常的、正当的宗教则坚决依法予以保护。上述两个方面,是我国宗教和社会主义能够相协调的基础。

首先提出宗教和社会主义相协调的是胡乔木同志。一九八二年十月,在制定社会科学“六五”规划时,胡乔木在报告中提到,宗

教研究的课题应当是研究宗教这种现象在中国的发生、存在的根据是什么。它怎么样能够同中国社会主义社会相协调,而起一种应起的作用(转引自《宗教问题探索》一九八三年文集)。

上海社科院的萧志恬在他一九八五年发表的《试论我国宗教同社会主义社会相协调问题》一文中指出:“协调是以爱国主义、社会主义为基础,以宪法为准绳,而不是以唯物主义为标准,或以‘消灭’宗教为目的。在十亿人口的大国里,人们的思想必然是多层次的,要进行空前宏伟的社会主义建设,必须搞五湖四海。强求思想信仰上完全一致,是办不到的,发动有神无神之间的争论,也是有害的。只有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允许宗教信仰自由,才能调动一切积极因素。……有人极力强调宗教与社会主义的对立,认为宗教徒作为劳动者可能参加社会主义建设,但他们信仰的宗教却只能对社会主义事业起着阻挠破坏的作用。这是与事实相悖、与道理相违的。人们的行动总是受一定的思想支配。宗教信仰者参加四化建设,一方面是由于接受了党的思想教育,接受了社会主义政策,同时也不可能不在宗教教义上对自己的行为作出自己的解释。有些教徒消极厌世,超脱现实,除社会原因外,固然同其宗教信仰有关;有些教徒爱国守法,积极进取,除党的教育外,同样有宗教信仰的因素”(引自《宗教》一九八五年第一期)。

萧志恬认为,宗教在教徒中所起的有益于社会的作用表现为以下几个方面:(1)广大信徒中的工人、农民和知识分子响应党的号召,发展工农业生产,提高科学技术水平,努力开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新局面;(2)在爱国主义旗帜下,宗教界提倡的某些思想信仰可以动员教徒积极参加四化建设;(3)某些宗教道德可以引导教徒离恶行善,有利于社会的安定团结;(4)宗教界发扬为社会公益事业服务的传统,有利于社会主义文明的建设(同上)。

当然,宗教与社会主义之间既有协调的一面,也有不甚协调的一面。为促进四化建设,就需要不断克服不协调现象。从宗教方面说,这就要求各教在自己的信仰所许可的范围之内,进一步消除不合社会主义的东西,发扬符合社会主义的东西,而从教外来说,这就要求进一步坚决摆脱“左”的影响,消除灭教思想的残余,落实政策,向各教提供办好教务的条件。

以互相协调代替互相消灭,这在世界上是个新的精神,是我国社会主义时期宗教问题研究上的一个重大突破。

把宗教作为社会主义继承历史文化而来的内在物

有些人在谈到社会主义对历史文化批判地继承的时候,总是把宗教文化作为历史文化的糟粕部分,作为必须抛弃而不能继承的部分。这是一种对历史文化的浅薄与无知。

纵观世界历史可以知道,各个民族在成长发展过程中都不同程度地在许多方面受到了宗教的影响,如哲学、文学、美术、音乐、道德伦理、社会风俗及生活方式等等方面。在我国如敦煌艺术宝库,《西游记》,《红楼梦》等;在欧洲如但丁的《神曲》,达·芬奇的《最后的晚餐》,弥尔顿的《失乐园》,巴赫、亨德尔、莫扎特、贝多芬等人的许多音乐作品,中世纪的全部哲学思想等等,这些都是深受宗教影响而出的人类文化产品,如果仅仅因为它们有宗教色彩或宗教形式就视为历史文化中的糟粕,这未免显得过于简单和偏狭。

赵朴初在一篇题为《要研究佛教对中国文化的影响》的谈话中指出:“如何看待宗教和文化的关系,这是每一个民族在发展文化过程中必然会遇到的问题。佛教对中国文化发生过很大影响和作用,在中国历史上留下了灿烂辉煌的佛教文化遗产。……那么佛教在发展社会主义的民族新文化过程中还有没有作用? 人类文化

发展是一个连续不断的过程,传统文化和现代文化不可能完全割断。我们要汲取传统文化中一切有价值的精华来充实发展社会主义的民族新文化。中国传统文化也包括佛教文化在内。……因此,今天在制订文化发展战略时,应该提出认真研究佛教文化精华问题”(引自《法音》一九八六年第二期)。

王蒙在《现代文化与民族传统文化》一文中指出:“宗教现象并不是作为一个简单的宇宙观存在于人类生活中,宗教现象实际是一个文化现象。它包含着道德、艺术、心理、哲学,甚至于科学、风俗习惯以及某一个民族的情感的凝聚。……从宇宙观上来说,马克思主义学说没有什么办法同情和同意宗教,但作为一种文化现象,必须要科学地对待它。”

把宗教和历史文化相联系,把宗教现象看为一种文化现象,肯定宗教文化中有可以继承的、有助于我国社会主义新文化建设的精华,这可能是在宗教研究上一个更大的突破。所以高放在《社会主义与宗教是否相容》一文中得出的结论是:“我们不要把宗教作为社会主义不得不加以承受的对立物,不要只看到宗教的消极作用,而要把宗教作为社会主义继承历史文化而来的内在物,要千方百计地发挥宗教在社会主义建设中的积极作用”(引自《理论信息报》一九八八年四月二十五日第一四八期)。

认为宗教工作领导管理体制必须进行改革

我国宗教工作领导管理体制,长期以来存在权力过分集中、包办代替严重的情况。在中共中央十九号文件公布后,有人在一篇学习心得中指出:“现在全国正在实行政企分开,而反顾宗教,政教不分的情况有些地方极为严重。问题是在于,这样做非常不利于发挥宗教界爱国力量在党群之间的桥梁作用,因此非常不利于团

结广大教徒群众于党的周围。这一文件……强调干部要重视各级爱国宗教组织的作用,善于领导,避免包办代替,让他们有职有权,能密切联系信教群众。……现在有些地方的情况不是这样,一切事(包括宗教本身的事)都是干部说了算。这些干部不懂宗教,不理解宗教信仰徒的思想感情,不尊重宗教传统,宗教界人士不敢开口,结果做出许多伤害宗教信仰徒,把他们赶到坏人和敌人怀抱里去的事情来,使爱国宗教团体失掉许多群众”(引自《宗教》一九八四年第二期)。

党的十三大以后,赵朴初在全国政协七届一次会议上的发言中,进而提出了宗教工作领导管理体制的改革问题,亦即“政教分开”问题。赵朴初指出:“所谓‘政教分开’,是指政府主管部门与宗教团体、寺观教堂职能分开。……解决‘政教分开’的关键,又在于理顺政府主管部门的领导同宗教团体按照自身特点独立自主地开展工作,寺观教堂由教徒自己管理的关系,来使之制度化。政府主管部门行使国家行政机关对宗教的领导,贯彻宗教信仰自由的政策,保障和监督宪法和有关法律、条例和政策的实施,协调宗教同社会其他方面的关系。要改变对宗教团体实施的那套行政机构化的领导管理制度和办法,真正把宗教团体办成在党和政府的领导下,在宪法、法律和政策范围内,按照自身特点独立自主地开展工作,享有自身的人事、财务、业务自主权的民间性团体。”

目前,宗教工作领导管理体制的改革问题,已引起某些从事宗教研究工作的同志的思考和关注。他们在思考这样一个问题:在社会主义国家,政权机关与宗教团体应当是什么样的关系?有的同志认为,许多提法不如简化为“政治上领导,宗教上自理”,即党政有关部门的职能是执行宗教信仰自由政策,解决政策贯彻中的矛盾和问题,对宗教团体从方针政策上给予帮助,而不干预宗教团

体的正常事务和活动,同时制止并打击非法宗教活动。有的同志对近几年来一度被提倡和推广的“三定”制度提出异议,认为这种做法未经同宗教界协商,偏离了宗教信仰自由政策。

还有的同志认为,所谓加强管理的原则并不都是区别正常与违法,有时还掺杂着限制宗教、压缩宗教的指导思想。我们所了解的有些实际情况也确实如此。少数地方以时间宜短不宜长,规模宜小不宜大,仪式宜简不宜繁,次数宜少不宜多的精神,作为加强对宗教活动管理的原则。更有甚者,个别地方用一种“只许出不许进”的管理办法以公约形式强加给宗教团体,以种种规定限制人们入教,却又规定“本堂教徒可以退教”。如此种种,正都是以加强管理为名,行灭教路线之实,从根本上违背了宪法规定的宗教信仰自由的精神。结果则是宗教活动从地上转入地下,为坏人提供了活动余地。

改革宗教领导管理体制问题的提出,是在我国深入改革的形势下,按十三大精神在宗教研究理论上一个新的突破。我们希望有关部门能够重视理论界的意见,倾听宗教界的呼声,因为这对调动教徒群众的积极性有利,对使宗教由地下转到地上和团结游离于爱国宗教组织之外的教徒有利,对在国际上树立中国政府认真贯彻宗教信仰自由政策的形象有利。

知识分子的道德责任

(一九四七年在加拿大发表于《加拿大学生》)

医生和医科学生一般总是这样想：“只要我在医治疾病，我就不会有什么问题。这世界的问题的确复杂，但是对医生来说，问题很简单，只要他在忙着医治疾病，他就错不到哪里去。”

但是他们真有权认为他们的职责是“简单的”吗？诊所是不是与外界隔离的象牙塔？在这“一体化的世界”里，从事技术性工作的人能不考虑他们的工作对他人生活的影响吗？

有一部题为《十字架和箭》的小说，讲述了一群纳粹军官把十二个美貌的姑娘关在一所房子里，一同在那儿的还有一位医生，他的职责是保障她们不受疾病传染，目的是要保护纳粹军官。医生的工作做得很出色，十二人中没有一位患上性病，纳粹军官们可以随便地对待她们。但是很快这些姑娘再也忍受不下去，她们都精神失常了。

医生的工作简单吗？是否可以想当然地认为：“只要我能医治疾病，没什么好怪我的。”医生在治病的时候是否不必考虑病人是一个完整的人？医生所做的是否就是像抗拒人体内病菌这样简单的技术性工作，抑或是一项医治人的工作？故事里的医生是否对姑娘们的精神失常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他是把她们当作人来治疗，还是把她们当作供人利用的物品？当他在夜深人静时扪心自问，他的良心会平安，他仍会认为自己是个“好医生”吗？

还有一个故事，题目为《未死的战士》，是一位日本小说家写

的。他因为在战时发表这篇小说,曾被关入监狱。他讲述了自己的思想斗争。作为一名在东京学习的医科学生,为了救死扶伤,他不得不刻苦地学习解剖学和外科学等课程。但当他发现,人在战场上活活地被杀戮,在工厂里劳累而死,或因缺乏营养和合乎卫生条件的住房而死去时,禁不住感叹:“我们非常仔细地医治一个一个病人,但是看看战争和社会不公所带来的死亡和残疾吧。我们的社会制度正使我们的艰苦努力化为泡影。”每一个诚实而有思想的医科学生都会产生这种挫折感!

这种两难处境不但医生和医科学生要面临,从事各个专业的人都会面临。一名社会工作者夜以继日地追踪一例个案,但是世界上一天之内所发生的个案可能是所有社会工作者在一年之内都处理不完的。工程师认为他的工作就是为了他人的便利造桥铺路和修建住宅,但是这些可能在战争中毁于一旦,连他自己也会被征召去侵略邻国。再如牧师的工作是传和平和爱的福音,但是政治、经济和军事方面的势力所做的抵销了他尝试去做的事情,而且还大大地超过。诊所、教会、实验室、工厂、农场都不是我们可以独善其身于其间的象牙塔。

尤其是在原子弹的发明和使用后,越来越多本着良心的科学家开始思索科学是否可以不受道德的约束,科学家是否有权把自己限制于“纯科学”。事实上,他们已渐渐认识到,在今天的世界上再也没有“纯科学”或“中立的科学”。他总是为某一事业服务。问题是为什么样的事业或为谁的事业服务。过去,我们或曾对自己说:“我们的工作纯粹的研究工作,我们对别的事情不感兴趣。我们所关心的只是事实和过程。别人怎么用我们的研究成果,那不是我们所关心的。”但是今天科学家们认识到那种态度是自私和具有危险性的。他们开始说:“我们不能满足于把我们的技能和知

识卖给出价最高的人。我们要问,我们的工作成果是被用于什么目的。是否这将使少数人得利,却危害到整个世界的福利与和平?是否这将造福全人类?假如我们埋头于‘技术科学’,从而在无意中使这世界变得更为悲惨,我们将无颜面对我们自己良心的审判。”科学家开始走出实验室,要放眼看世界上正在发生的正义和非正义的战斗。

在一九四七年一月号的《大西洋月刊》杂志上,有一篇题为《一位科学家的反叛》的文章,记叙了诺伯特·怀爱纳教授的故事。在战争年代,这位数学界权威在导弹理论的发展中起了重要作用。在对德、日作战胜利后不到两年,美国政府方面有人要求他提供某些信息以使原子弹更为完善。怀爱纳教授对此表示极大的愤慨,他说:“……过去,因着学者们的礼让,向任何郑重其事提出要求的人提供科学信息已成为普通的事。但是……(现在)提供科学信息不一定是无辜的行为,这可能带来严重的后果……曾经参与原子弹研究工作的科学家们的经历表明,过去科学家总是把研究成果毫无保留地交给那些他们最不该信任的人。我今后不会再轻易发布我的研究成果,因这可能被不负责任的军国主义者用来危害他人……”

科技知识是重要的,但更为重要的是要由适当的人来应用这知识。换句话说,在接受技术训练的时候,我们得问自己:“我们将为着什么样的目的来应用所学?”我有兴趣知道一把刀是否锋利,但是我更想知道这把刀握在谁的手中,特别是当这是一柄利刃时。我们的技能高低好比是刀的锋利度。如果教育只是传授某些资讯和技能,这就如只顾磨刀,却不顾用刀人的清醒与否。我们需要明确人生的目的,关心我们的价值观和人生哲学,把我们的知识和技能贡献给真善美的事业。

这就把我们引入了大学教育的目的这个问题。如果大学教育只是传授专业技能，那么这是否算是好的大学教育？是否应当帮助学生正确地回答这样一个问题：你准备用所学到的技能来做什么？

在危机和决断的时刻，重要的不是技术知识，而是要看我们是怎么样的人。斯罗廷博士的英雄举动清楚地表明了这一点。他是来自加拿大温尼匹格的年轻科学家，参加了在新墨西哥州的原子弹研究工作。一天，当大家正在实验室里做实验时，他发现了一处将要爆炸的迹象。如果不立刻上前采取行动，房间里所有的人都会遇难。在这千钧一发之间，他毫不犹豫地以自己的生命换取了其他科学家的生命。是他的科学技术知识使他这么做的吗？不，那是别的。那到底是什么呢？这是否当归功于他所读的大学？他是否期望其他科学家继续进行原子弹的试验来毁灭这个世界？抑或他的死是为了带给世间男男女女美满和幸福？

今天世界上有些大学的存在似乎不是为了培育完整的人，而是为了制造技术人员。由于专业技术的深化和学科的细分，它们已不再是真正意义上的“大学”了。它们已成了取得成块的知识在某些专业技能的地方。一个学工程的学生在这类大学毕业之后被认为会成为一名好的工程师。但是如果他没有首先作为一个完整的人来受教育，我想他很难成为一个真正好的工程师。在作为一个完整的人受教育时，他在取得技能的同时，也重视其他方面的发展，特别是注重对人类丰富的文化遗产的兴趣和欣赏能力的培养。这样他各方面的发展就均衡和谐。但是，不幸的是，就他的情况来讲，我们有理由将他与他所熟悉的滑尺、T字尺、图钉以及混凝土归为一类，而难以把他当作具有社会性和个性的完整的人。当然，这种狭隘化并不一定只发生在工程师身上，也可能发生在任何一

个学科的大学生身上。比如,有一位作家曾问过这样一个令人难堪的问题:“有多少学生是在读大学时开始排斥犹太人或黑人,并且有了种族优越感的?”

大学的最高使命就是感召学生把他们的生活目标同全人类的幸福相联系,就此寻求更丰盛的生命。基督教学生运动就是为实现大学的这一最高使命而努力,并且为师生履行这一使命提供帮助的。有些大学生是基督徒,他们想尽量过好大学生活,并与其他基督徒相互交流。基督教学生运动就是由这些学生所组成的团契。

纪念贾文逊牧师

(一九八〇年)

我以沉痛的心情从加拿大友人发来的电报得知好友贾文逊牧师逝世的消息。这消息使我好些日子在悲戚怀念中度过。他的逝世对我和我的全家,对加拿大教会,对中国教会,对加中友好都是不可弥补的损失。基督福音是伟大的桥梁,打通了人与神、人与人的关系。但是即便对深信永生的基督徒来说,今天死仍旧是一个鸿沟,一个不能突破的奥秘,友情的纽带不能把此岸和彼岸统一起来。我不禁也要像当日大卫那样发出“何竟死亡”的问号。

我同贾文逊牧师是三十多年的朋友了。

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加拿大基督教学生运动(教会团体名称)在顾问贾文逊牧师等推动下,决定邀请一个中国青年牧师前去担任干事,经国内一些同工介绍,我就同我的爱人于一九四六年前去任职,我同贾文逊牧师的友谊就从那时开始。

贾文逊大学时代先后主修数学和神学,三十年代曾在我国东北做传教士,回国后在加拿大长老会任职。后来他到美国做基督教学生工作,我在世界基督教学生同盟任干事,不时在美国,我们又时常在一起共事。记得那时我们常一起吃午饭。一九五〇年我同我的爱人带孩子去日内瓦居住,他曾来过。后来我们回到中国,从此就不通音讯。一九五六年我们去伦敦,他正巧也在,我们就同他会面谈心。此后又是长期没有来往。这时期他一度担任加拿大长老会全国总会会长。一九七二年起,贾牧师前后五次访问我国,

每次都来南京看我们。第一次他的夫人吉蒂也来了。有一次他带了生在我国的女儿来访,我很高兴那次能陪同他们从武汉沿长江到南京。

贾文逊对新中国态度的转变很符合情理。他曾告诉我,在很长一段时期里,对海外报刊上的反华宣传,特别是对那种带些学者味道的反华文章,他一概信以为真,没有什么免疫力。这些宣传使他认为,中国共产党像洪水猛兽,什么道理也不讲,新中国是个地狱,一无是处。他所爱的中国是那古老的中国,那已经是个历史陈迹。一九五六年他带着这样的头脑,突然在伦敦发现我们夫妇还活着,而且谈话、生活和工作都很正常、很愉快,这给了他“很大的震动”,他“觉得受了骗”,就决定要心平气和地阅读他的叔父英国坎特伯雷座堂主任牧师休莱特·约翰逊介绍新中国的著作。他们两个有叔侄关系,我也是那时才知道的。这样,他重新开始关心和研究中国问题,有意识地抛弃了不少对新中国的成见,对新中国产生了善意和友谊。加拿大有个驻北京记者写反华文章,贾文逊根据他历次访华所见所闻,作了新旧对比,仗义执言,加以驳斥。为了向北美广大基督徒介绍新中国,提倡对华友好,他联合了加拿大基督教其他几位领袖,出了大力在加拿大基督教会联合会之下成立了一个加中委员会。正是这个组织,在贾文逊和白理明等其他友好人士主持下,出版了期刊,召开了大大小小各种会议,特别于去年十月在加拿大蒙特利尔举行了一次以“新的开端”为主题的国际基督教、天主教对华友好大型会议。为了表示支持,我国天主教、基督教派去一个十人代表团。同近几年类似的一系列会议相比,那次会议具有广泛得多的普世性、代表性。许多第三世界国家教会领袖也来了。在那个会议上,新中国人民和教会得到朋友们诚挚的支持,我们也从他们那里发现了我们所欠缺的。那是主内一次宝

贵的交流,是贾文逊牧师许多年努力的成果,是他付出心血的结晶。会议由他致欢迎词,这是最恰当的。

贾文逊的转变告诉我们,反华宣传和任何其他歪曲宣传一样,是纸糊的,经不起事实的雄辩,因此并不可怕。中国问题很多,并非十全十美,这我们从来不否认,可是有人出于某种动机,以“关心”中国为名,或者以帮助人们为中国“祷告”为借口,根据一星半点事实肆意加以扩大,把新中国描绘得完全不像个样子,尽管一时似乎“成功”了,但是歪曲产生不出真理,到头来还是拿起石头砸自己的脚。

贾文逊的转变也告诉我们,凡早先真是为了中国人民的利益而到中国来的传教士,即便一时对新中国有误解,但当他们进行新旧对比,看到中国进步了,人民的痛苦解除了或缓和了的时候,他们就觉得,没有理由必须反对新中国。在事实面前,这些人的良好动机决定了他们会为中国人民感到高兴,向上帝献上感谢,祝愿新中国人民继续前进,更快地摆脱落后。今天,在前在华传教士中,不但有文幼章等早已同情中国人民解放事业的人,也有越来越多的类似贾文逊这样勇于转变的人,我们十分欢迎他们的友好态度。

一九七二年“文革”时期,贾文逊夫妇接受对外友协邀请,第一次访问新中国,提出要到南京看我。我们有两天时间在一起。我根据我的了解,向他们介绍了国内基督教当时的情况——没有礼拜堂,没有神学院,没有牧师,没有洗礼,没有节日,没有几百人一同崇拜的条件,只有我们基督徒以家庭成员为主自然形成的小集体一同祈祷,一同读经,一同喝茶,互相劝勉,互相牧养,互相支持。由于贾文逊本来以为基督教已经从中国土地上全部扫除,他听了之后的喜悦出于我意料之外。他引用耶稣的话说:“只要两三个人奉主的名聚集在一起,他必与你们同在。”他把他自己口袋里的一

本《新约》小圣经送给了我。

在他后来几次访问的时候，他看到我国在粉碎了“四人帮”的极左统治之后宗教信仰自由政策又恢复起来，越来越多的教堂重新开放，宗教活动不再处在地下状态，他是多么高兴。他细心地聆听中国基督徒要在圣灵指引下把中国教会建设好的雄心壮志，感到十分高兴。他认为，解放既然给中国人民带来了新的生活，教会就不能墨守成规；进行新的神学思考，实验新的模式，开辟新的途径，这是中国福音事业的需要，也是中国基督徒对第三世界其他国家教会以至整个世界的教会的灵性财富可能作出的一项贡献。同时，只有一个独立自主的中国教会才更能知道怎样从其他教会受益。对于国外那些无视中国人民独立自主，无视中国教会主张，假借对华播道名义，大事募捐以满足自己的人，贾文逊是最为反对的。

贾文逊心脏不好，我们早有所知。他最后一次在南京，我们曾让他试用过舒心丸。蒙特利尔会议那时，他已经显得衰弱了，尽管还是那么轻松愉快。中国代表团在太平洋城市温哥华准备回国的时候，他以深情专程从加拿大东部多伦多飞来和我们再次会面，渡过快乐的两天，最后同我们一一握别。对他那次长途旅行，当时我理解得不够，但今天回顾，这实在是一个圣灵所催促的美好诚挚的举动，预示我们同他在主内的团契将是永恒的，也是一个祝愿加中两国人民和两国信徒将永远团结，一同前进的祈祷。

让我用约翰听到来自上天的声音结束我纪念的话：

“我听见从天上有声音说：‘你要写下，从今以后，在主里面而死的人有福了。’圣灵说：‘是的，他们息了自己的劳苦，作工的果效也随着他们。’”

先进的吴先生

(一九八一年十二月二十二日)

吴耀宗先生的逝世是我国基督教一大损失,也是我国人民一大损失。我们发表文章纪念吴先生,不是仅仅出于个人感情,而是让更多的人知道吴先生对教会、对社会、对中国、对世界的贡献,使后代更熟悉先人经历过的斗争,从而能更好地知所抉择。

我国基督教老一代神学思想家最难于摆脱的是西方资本主义文化教养所加于他们的桎梏。他们是有偏见的,突出的表现是:正当历史的发展已经把社会的根本变革这一命题无可避免地向人们提了出来的时候,正当中国人民解放事业在共产党领导下如火如荼地在进行着,解放区已经出现,并且在日益成长、巩固、扩大,要求每个人对之表示自己的态度的时候,这些神学思想家暴露了他们极度的盲目性、片面性、局限性。他们一叶障目,想当然地认为,只有西方的和国民党的那一套,尤其是国民党以基督教信仰点缀起来的那一套,是正统的,稍加修补便可以适用于救国,其他一切都处于视野之外。只要看他们当时的著作,我们就可以发现,在他们的视野里,中国人民解放运动和解放区这些客观存在,这些铁的事实,竟然是不存在的,即或存在,也不过被他们视为一时的不正常现象,无足轻重,不值得加以研究,少数人则给这些事实一场怒骂以泄其愤。这些神学思想家大多要到我国解放以后,才开始严肃对待人民解放的课题。

唯有吴先生真正重视历史,在三十年代之初就觉察了我国人

民解放运动的伟大意义,开始寄希望于它,并且使自己在神学上和实践上同它结合,带动许多青年基督徒投身人民事业,同时从中获取神学营养。吴先生觉察到,神学家在上帝面前和人民面前有其社会责任和政治责任。许多神学家名义上以神为研究的对象,标榜客观和超脱,似乎高高在上,事实上他们的阶级性在起作用,他们所写所讲大有政治含义,往往与列强以及国民党声息相通,客观上成了欺骗、压迫人民,使人们安于不翻身、不解放状态的喉舌。吴先生就大声疾呼起来,要求教会回到先知和基督的立场,站在人民一边,为正义作见证而不计代价。正由于此,他遭到教会领导层和国民党方面很多非难打击。其实,正是吴先生,使中国基督教开始具有一点新的特质,在中国人民间树起一个新的形象。

我接触吴先生是在三十年代中期。那时,吴先生是一位处于最后阶段的唯爱主义者。在回答问题的时候,他还会表明自己在一切情况下反对使用武力的信念,但是他已经不主动宣传这非暴力的一套了。他讲得特多的是中国基督徒有个爱国的问题,有个中国怎样有救的问题。他说,基督徒仅仅关门修灵,或者寻求一己的得救,谋求取得死后进天堂的保证,这仍旧是自我中心,仍旧是从私字出发,是不足为训的。基督徒应当了解,有个社会制度的问题。中国的社会制度必须根本改造,个人的改造才有了条件,而当前首要的是民族的独立和解放。必须改造中国的政治,使之适应民族解放斗争的需要。吴先生在演讲中介绍耶稣怎样站在受苦受难的老百姓一边,不惜为他们的彻底解放而忍受十字架酷刑,流出自己的鲜血。耶稣这样的素质同天地的根本大法相融和,是永生的。吴先生宣称,这位耶稣是他的基督、中心,从他得到丰富的生命,也从他认识到,使大众得到丰富的生命是人生的无上意义。

即使在恭听吴先生演讲的时候,我一只口袋里装着希腊文生

字本,另一只口袋装的是几个世纪前英国国教圣公会《三十九条》的系统神学教材。我当时所受的教育导致我浸沉在基督的神性、人性和他在救赎奇功中的地位和作用等等问题。像吴先生这样把耶稣放回到当时历史和当前现实中去的基督观,对我十分清新,在基督教信仰上为我打开了一个我过去还不知其存在,更没有进入过,而现今正在向我招手的领域。当时我一方面以超世自居,有看破红尘之意,一方面对蒋介石实行不抵抗主义而丢失东北三省,也很不满意,对有的同学醉生梦死竟谈论“中国亡给谁好?”更觉气愤。看到吴先生能把对基督的热爱和对祖国的热爱如此紧密地结合在一起,看到他由于忠于基督而成为一个对真理、对理想、对人民具有如此巨大热情的人,我作为一个有所追求的青年,感到喜悦,感到这里是我追求的方向。

我至今认为,吴先生在上帝观上批评片面强调上帝对人世的超越,突出他内在于自然,内在于历史,内在于人民的运动,在神学上和政治上都有其启蒙作用和解放作用,为基督徒投身救亡爱国运动开放了闸门,同时也挽救了一部分基督徒,使之免于成为教人消极忍受痛苦的安眠剂或止痛剂。

我到今天也还不是一个全盘理解和全盘接受马克思主义的人。不过我对马克思从恶感到好感的转变,也是当时受吴先生的影响。此前,我从来没有直接读过马克思、恩格斯等人的任何著作,只从西方和国民党以及我国某些知识分子那儿知悉,马克思主义简直是洪水猛兽,已经被驳得体无完肤,是个一无是处的主义,不值得一顾。可是吴先生在演讲中对马克思主义抱开明态度。他引用过一位马克思主义者下列一段话:

“劳动给富人生产了奇迹般的东西,但为工人生产了赤贫。劳动创造了宫殿,但是给工人创造了贫民窟。劳动创造

了美,但是使工人变成畸形。劳动用机器代替了手工劳动,但是使一部分工人回到野蛮的劳动,并使另一部分人变成机器。劳动生产了智慧,但是给工人生产了愚钝和痴呆。”

当时我感到震动,因为这一段话是如此真切中肯地描绘了中国社会的两极分化,所用的语言又是那么美,那么动人,却出之于马克思主义者之口。这不但促使我更加同情社会压迫的受害者,它也促使我开始不那么轻视马克思了。从这件事也可以说明,今天马克思主义的敌人毫无水平的围攻鼓噪,正是搬起石头砸了自己的脚,不能阻止马克思主义影响的日益扩大。

重视历史,把传统基督教所看不起的人类历史从地上拾起来,用人民的观点加以观察,还其本来面目,在其中找到基督徒的使命和完成使命的同路人,这就是吴先生的理论和实践不同于其他神学思想家的地方。同今天拉丁美洲的解放神学所达到的高度相比,吴先生当时在基督论和解经学方面的完整性上有所不及,但在方向上他无疑是第三世界神学演化的前驱。

在抗日战争爆发前后较多领受吴先生教益之后,我再次见到吴先生是在一九四九年五月人民解放军正在解放南京、上海的时候,吴先生为了参加世界和平大会来到布拉格,当时我作为世界基督教学生同盟干事也从西欧来到捷克访问该国的基督教学生组织,吴先生同我有一次较长的会面。那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宣布成立前夕。

那次吴先生向我介绍了解放区欣欣向荣的情况,特别是人民群众翻身做主人所带来的新型的精神面貌和人与人的关系。他引用《马太福音》第25章说明,共产党人口头上否认基督,却实践了爱,而基督教口头上不停地承认基督,实践上却没有能彰显他,因为没有对大众的爱。

我问了吴先生一个他想不到我会问的问题。我问：新中国是美好的，但是如果政府要取消宗教，你是否还拥护新中国？吴先生说我太听信了国外所谓解放区迫害宗教的许多谣传。他说：“退一万步来说，只要祖国是美好的，那么，即便宗教受到打击，我还是爱祖国。”然后吴先生向我解释，在新中国，一切问题可以通过协商来妥善解决。他讲解了统一战线在新中国国家生活中的重要地位，以及共产党和人民政府宗教信仰自由政策的来龙去脉。他表示，我国宗教信仰自由政策从根本上说来将是有保障的，但实践上一定会出现各种问题，需要对干部和对信徒双方经常进行政策教育。看来当时吴先生同我国许多教会领袖一样，主要强调于宗教信仰自由政策的落实，却没有渲染中国基督教不能躺在宗教信仰自由政策上睡大觉。基督教要在新中国存在下去，要取得同中国人民进行对话的地位，从而为福音作出见证，还得重视其自身改造的问题，也就是三自的问题，那时吴先生还没有谈到这一点。

那次吴先生也谈到，对基督教信仰来说，天国的来到是个超历史的盼望，我们不能说新中国就是天国，或者直通天国，但是基督徒不能由于这一盼望而无视历史以内的任务；这些历史任务的完成和超历史盼望的实现，决不是互不相关的；至于如何相关，这是一个重要的神学课题。我当时领会，吴先生所谈的，大体上和西方一些既要忠于教义，又要进入世界和改造世界的神学家所提出的至终性和次至终性概念相吻合。至于这二元观点的统一，那正是我们要予以解决的一个召唤。吴先生在这段谈话中所流露的思想，已经包含了日后被归纳在“爱国爱教”一语中了。

我从日内瓦回到中国，是在我国解放之后。一九五四年起我又常同吴先生在一起。

如果吴先生在解放前在神学观点上较多致力于上帝论、基督论和伦理方面，解放以后，就他的公开言论来说，他更致力于教会论。

基督教在任何国家应当实现自治、自养、自传，成为本国的宗教，这是第三世界国家一切教会在教会论上必须放在首要地位的命题。这本来是老调，从十九世纪中叶起就有先知先觉的西方传教士和本国信徒如此提倡了。可是这始终是一个高调，大家只唱不做，极少数人不过在很小的范围里和在较短的时期中作出一些成就。唯有吴先生在我国解放之后，利用祖国独立自主的形势，以高屋建瓴的姿态，领导全国信徒一鼓作气地付诸实践。这是一场群众运动，又发生于一定历史条件之下，有不少不以人们意志为转移的曲折，这是势所难免的，但三十年来，这一三自爱国运动至少产生了下列良好结果：

(一)基督徒爱国不后于人越来越成为事实，“多一个基督徒就少一个中国人”这种情况，如果曾是事实，也越来越成为历史陈迹，许多基督徒在祖国建设的各条战线上正在作出贡献。

(二)中国基督教在人事、组织、经济、政治等方面已经实现了独立自主，成了一个自办的宗教，为今后一个富有中国特质的基督教的问世奠定了基础。

(三)由于以上两个原因，我国越来越多的有识人士对基督教改变了看法，他们不再把它视为洋教，它同中国人民之间的关系越来越正常化。

以上变化，对基督教事业来说是重要的，对我国的安定团结来说也是重要的。我们饮水思源，首先固然想到上帝的厚爱和恩遇，但接着就不能不想到上帝合用的器皿吴先生坚强的信心和他果敢的精神。

三自旨在谋求我国基督教的独立自主。基督教在任何一国只有独立自主,摆脱外国政治势力的利用和历史传统的拘束,才能让基督的光芒得以射过本国文化的棱镜,发出异彩。这种异彩国人对之既深感亲切,国际教会对其深藏于基督里面的丰富也因之而更得启发,从而一个特定国家的教会对普世教会才谈得上“贡献”二字。我们知道,如果一国教会不独立自主,不走自己应走的路,那么普世教会中的分享交流和互相依靠云云,都是有名无实的。

今天中国基督教三自的任务还没有完成。中国基督教的文化改造和文化建设比政治归属问题的解决更为艰巨。当我们想到,我们在神学战线上至今举步不前,受到许多老框框的束缚,我们在崇拜生活上至今保持着那么多洋的、老的东西,和三自的口号很不相称,我们深感有负于吴先生等先行者的初衷。我希望今后的三十年将是三自运动向文化的深度发展的时期。在这一时期,我们中国基督徒将以中国自己的问题和心得开路,更深地进入基督,发掘出其内蕴的真理宝藏,这样也可以告慰于吴先生。

五十年代中到六十年代中是我同吴先生交往比较最为密切的时期。除了工作问题之外,我们常在一起探讨在我们二人之间渐渐命名为“神学建设”或“神学路线”的一些问题。探讨这类问题完全是我们两个基督徒私人之间的交心,我至今常把这种探讨同吴先生家里吃鱼生粥的早餐联在一起。

在那些谈话中,我发现吴先生对保罗有高度景仰,并不因为当时有些人专事突出保罗因信称义,借以贬低教外不信主的革命者,挑拨信徒同他们的关系,面对保罗产生什么成见。吴先生认为,保罗的特殊贡献在于把犹太的智慧和崇拜扩展到世界。他使基督福音脱出犹太教的外壳,使之可能成长而为普世人类的财富,这一突破在世界史和世界文化史上具有不可估量的意义。从造成这一突

破来说,保罗是一位伟大果敢的叛道离经人物。当时提出因信称义决不是要制造信与不信的对立,它正是一个调和受割礼者和不受割礼者之间的对立的口号。因信称义就是不因割礼称义,它大有克服犹太民族狭隘性,扩大视野,宣传上帝面前世人一律平等的解放作用。基督教之得以从犹太教内部的一个小宗派转变而为世界宗教,保罗的功劳是特大的,他实在是一位出众的宗教改革家。五十年代上半期我国基督教中刮了一阵小小的风,利用因信称义的教义把不信基督的一概归入不义之列,政治上固然是反动的,神学上也实在是错误的,大大曲解了保罗的精神实质。

今天回顾,如果保罗当日起了那样一个伟大的历史作用,吴先生发起三自,也是一个可以与之比拟的开辟历史新阶段的创举,运动的目的在于使基督教摆脱某些狭隘性,使之得以成为无愧于独立自主的社会主义祖国人民的宗教信仰。

我们时常谈到,一个以信与不信为运转轴心的神学是单薄的,基督不过为我所用,用来使我得救,使我得到平安,说到底还摆脱不了自我中心,这是对保罗神学的一种背弃。如果我们不各取所需,不先入为主,让《圣经》的全部总和向我们说话,发现《圣经》启示的最高点,那么,我们会看到,上帝关怀所及大大超过一些承认他的人,也大大超过一个信与不信的问题。像《希伯来书》说基督是“承受万有”和“托住万有”的,《歌罗西书》说“他在万有之先,万有也靠他而立”,“父喜欢叫一切的丰盛在他里面居住”,还说“既然藉着他在十字架上所流的血成就了和平,便藉着他叫万有,无论是地上的、天上的,都与自己和好了”,如此等等,对处在人民翻身之后的新中国的我们,不能不有所启发,我们不能不加以重视,据以进行我们的神学想象。

吴先生不喜欢那种把创造主和救赎主对立起来的神学路线。

那是古代诺斯替异端的重演。他热情支持倾向于强调上帝的创造工作、救赎工作、圣化工作的统一的思想。古代教会一些会议所作结论的要旨不在于强调三位的分立和同等,更不在于把创造、救赎、圣化视作三个历史阶段,而在于保住一条重要真理:三位正代表着独一上帝恒常性格的几个方面。吴先生对圣灵的圣化工作特感兴趣,认为圣灵是人间一切价值和德行的根源,反对将圣化活动局限于教会和它的正统礼仪之内。

吴先生对将恩典和自然对立起来的种种说法很有反感。要是自然果真是那么败坏,成了恩典的绝对对立物,那么,创造主和救赎主必然具有本质的差异。既然恩典得否定自然所呈现的全部真善美,那么,基督同人类毫无共同点,他从神界的彼岸进人人世,对世人来说,是个十足的异己分子,这样,真正的道成肉身也给否定掉了。

也许有人要问,吴先生这样把整个创造(不仅是救赎问题)作为神学处理的对象,把整个人类(不仅是教会)作为神学关心的目标,把整个宇宙(不仅是基督信徒)作为基督临驾和圣灵作工的范围,即便更符合《圣经》的总意,难道不仍是在钻牛角尖,毫无现实意义吗?

我想现实意义是很大的。吴先生是在从神学上帮助基督徒扩大视野,使他们从鄙视世界和历史转到重视世界和历史,从疏远人群,忽视人群祸福转到爱护人群,关怀人群祸福,让他们在信与不信的矛盾之外,更看到善与不善,正义与非正义,顺着历史潮流前进与逆着历史潮流倒退的诸种矛盾。这对那些渴望保持自己的宗教信仰的基督徒走向现实和走向爱国主义,具有解放作用。

吴先生认为,某些宗教有其鸦片作用,这无可否认,但把任何宗教现象都一律用“鸦片”二字加以概括,那是危害极大的简单化。

在特定情况下,不同的神学观点可以起不同的作用,有的起麻醉作用,有的起启发思想的作用,有的对反动统治起保卫辩护作用,有的对之起批判作用。像反映我国三自爱国运动的神学思想,就不能同解放前后为国民党反动统治歌功颂德的神学思想相提并论,一概归纳为“鸦片”二字的。麻醉是宗教所起作用之一,但不是宗教所起的唯一作用,也不是宗教在一切情况下所起的主要作用。

我在这里把我所知道的吴先生本人临近晚年那时神学观点若干片段略作记述,借以说明吴先生的思想始终是活跃的,也是不断深化的,一直到他的晚年,他还在进行精神劳动,力求在他主观认识和客观存在之间达到更高度、更完整的统一。

吴先生这样一个人不可能没有敌人,也不可能没有一时听信敌人的谣言的误解者。从三十年代起就有人乱扣“异端”、“不信派”、“无神主义者”、“共产党”等等的帽子。世界上的确有这样的人,他们以属灵自居,似乎超然物外,与世无争,而在对待别人的时候,却又是无所不用其极的。他们因为吴先生拥护人民事业,就不择手段地诋毁他。记得有人以吴先生所写的一本取名《没有人看见过上帝》的书的书名为根据,硬说吴先生写书宣传无神。其实吴先生是引用《约翰福音》中的半句话,所要带出的正是道成肉身的真理,因为那下半句就说,“只有在父怀里的独生子将他表明出来。”吴先生的书和他的一生无非是向人们指明,在基督身上,那不可眼见的上帝的性格是彰显了出来。吴先生呼唤人们来看,来认识,来崇敬,然后按所得启示去付诸行动。

其实,吴先生对基督的信仰是最为坚定不移的。我不知道中国有哪一位基督徒能像吴先生一样,不但坚守自己的信仰,而且不断就基督真谛同一些无神主义革命同志细心进行对话。有好几位党政领导干部都谈到过吴先生生前如何把自己的信念向他们传

述,其中有的还因此发生了阅读《圣经》的兴趣。那些攻击者对此岂不应当自觉羞愧吗?

现在世界上有许多人在追求属灵,可是他们每每没有深入到《圣经》中去好好钻研一下“属灵”二字的含义,结果流于轻信,捕风捉影,如同打空气一样,甚至受骗上当。我认为,如果属灵就是属于圣灵,归属圣灵,如果我们按照基督教导,用一个人所结出的果子来判断这个人,如果圣洁、正直、公义、慈爱、信心、盼望都是圣灵的果子,那么,吴先生在他人格深处是最属灵的。他对黑暗和罪恶恨之欲其死,对光明欢乐的新天新地爱之欲其生,这种感情难道不是圣灵启发引导的结果,而是个人的自我创造吗?

记得吴先生曾经多次精辟地告诉大家,祈祷的意义不在于促使上帝改变他圣善的旨意,使上帝去为我们做违反他本性的事,而在于开启我们自己心灵的窗户,让上帝的阳光照临我们内在的黑暗,融化我们的顽固,改变我们的成见,使我们的思想、感情、言行、赞美,都同上帝的性格合拍,符合上帝的节奏。这是最高超的祈祷观。如果一个人在灵修上不具有真正的经验体会,在钻研《圣经》方面不具有深邃的教养,他能凭空产生这样的领悟吗?

吴先生是我们的良师益友,是中国人民和中国基督教的骄傲。上帝只能通过中国的历史和中国的教会铸造出这样一位思想家和实践家。我们解放前任何一位其他神学家,由于他们对人民这一历史上的重要因素带着恐惧,对中国人民解放运动这一历史上最大现实具有当时无法克服的盲目性和成见,置这个运动于他们神学视野之外,他们的神学工作的价值就怎样也高不起来,怎样也不能同吴先生相比,尽管国外至今还有些人把他们的著作视为珍宝,而把吴先生当作异己。

我认为,我国传统的“寿终正寝”也好,西方传统的“永享安息”

也好,都不能用来作为吴先生这样一种生命的结束语。在中国和第三世界不少其他国家,他的见解今天正在为越来越多的基督徒所接受,正在发扬光大,虽然其中不少人未必知道吴耀宗这个名字。我愿意这样来设想:今天,在一个更加接近上帝的光明所在,吴先生正在继续寻找真理,继续实践真理,继续他的祈祷、侍奉、崇拜,也继续和我们同工,加益于我们的努力。

在吴贻芳先生追思会上的讲话

(一九八六年一月十九日于上海)

今天,我们吴贻芳先生生前的同工、同道、学生、朋友在这里追思她,怀念她。此时此刻,我想到了《约翰福音》第1章。

我为什么要提《约翰福音》第1章呢?

过去三十多年间,外国有时报道吴先生精神失常,有时报道她失去自由,有时报道她已经自杀,前几年又报道说吴先生放弃信仰,否认基督了。我曾特意问她,你是不是放弃信仰基督了?她回答说,从中国到外国,我看到基督教的种种,我的确觉得,许多模式的基督教都是我所不能接受的,我觉得同这些模式越来越远,说放弃也可以,但是我相信《约翰福音》第1章所讲的基督,我同那位基督越来越近,我的基督教是《约翰福音》第1章的基督教。

我想,在过去的三十多年里,中国有不少基督徒都是这样走过来的。我们对某些形式的基督教疏远了。基督教中某些外加的、非核心的东西我们不那么看重了,而基督耶稣自己显明出来的,变得亲近、实在了。基督的福音是宝贝,这宝贝藏在瓦器里,我们渐渐知道要区分什么是宝贝,什么是瓦器,我们不把瓦器当作宝贝了。

一个人能够接受《约翰福音》第1章里启示的基督,那么我们应当说,这个人的信仰不是后退了,不是缩小了,更不是放弃了,而是更精深,更高大了。从前三福音到《约翰福音》,不是离开了真理,而是更深人到真理里面去了。

在《约翰福音》第1章里,我们没有看到一个为人治病大有异能的耶稣,我们看到的,是一位先在的基督,一位太初就与父同在的道,这个道就是上帝。这位先在的基督,不是受造的,而是首生的,万物都是藉着他造的。他是一切真理,一切善良,一切美好的源头。道成了肉身,住在我们中间,充充满满地有恩典有真理。这位基督是承受万有的,是神荣耀所发的光辉,是神本体的真像,常用他权能的命令托住万有。能相信这一位托住万有的基督,一个人的宇宙观、历史观、人生观、为人之道,不能不大大改变,改变得越来越像基督。中国许多基督徒在三十多年中经过了这个历程,达到了《约翰福音》的基督观的高度。吴贻芳先生是其中的一个。对这一位基督,我们不约而同地像彼得一样说:主,你有永生之道,我们还去归从谁呢?(约6:68)

过去三十年,我和吴先生一同在南京,我们时常见面。她本来是金陵女大校长,后来先后当省教育厅厅长,江苏省副省长,全国人大代表,全国政协委员,全国民主促进会副主席,江苏省政协副主席等等。由于她担任这些职务,海外对新中国怀有敌意的人毁谤她,也毁谤新中国。我是这样认识、理解吴先生的。她所服膺的这位先在的道,造成了她一副正直的心肠,使她从善如流,一直在追求真理,一直在突破自己,一直在超越自己,以她有限的一生,寻找、拥抱、体现无限的真善美。在一切岗位上,作为一个有良心的人,一个热爱祖国的人,吴先生要求自己每时每刻做有益于人民的事。同时,作为这位基督的追随者,她始终在努力,通过她的行为,克服人们同基督之间的距离,使更多的人改变对基督的观感,从而靠近基督。她不大在口头上传讲基督,但她的一言一行事实上在拆掉人们同基督之间的墙壁,改善人们对基督的感情,缩短人们同基督的距离。这难道不也是传福音,不也是作见证吗?

让我举一个例。在“四人帮”横行时，宪法里关于宗教的条文的措辞是很不公平的，在正面，只提公民有信教的自由；而在反面，不但提了有不信教的自由，还提了有宣传无神论的自由。对于有些人在“四人帮”失败之后还反对修改这一条的现象，我们的吴先生十分气愤。她认为，以全国来说，宣传无神论的自由有的是，宪法完全可以不提。吴先生还认为，信教自由当然意味着也有不信教的自由，反面的话不必讲，讲了只会使信教的人感到不愉快，像说公民有通信自由、言论自由等等就够了，不用画蛇添足，加上有不写信、不开口的自由。吴先生的说理很公平合理，很通俗，很有趣，很有说服力，大家很爱听。当她听说，国务院宗教事务局乔连升局长向全国人大宪法修改委员会写信，表示支持我们不提“有不信宗教和宣传无神论的自由”的主张时，她非常高兴。后来全国人大正式通过这部宪法，吴先生更是十分高兴，对宪法第三十六条关于宗教的措辞，她特别满意，说比她原来希望的还好。

我们回顾吴先生这一段事实，觉得这既是她爱国的表现，也是她爱教的表现。她为祖国的民主法治出了力，她也为教会得到作见证的条件出了力。

关于作见证，我们不要限于狭隘的见解，以为只有向不信主的人开口讲耶稣是救主才是作见证。应当开口而不开口，那是不好的，但不开口的见证也是见证，也是主所悦纳的。争取一部好的宪法，投身祖国的正义事业，改善教会的面目和形象，使教会得众民的喜爱，让人们更愿意听听教会有以告人的福音，这些都有传福音的性质，因为这些都是预备主的道。这一点我们可以从吴先生身上得到很大的启发。

吴先生终年九十三岁。她工作了一生，是一位不退休的人。她最后两年不得不住在医院里，可她没有停止工作。有许多人到

病房里去同她商量工作，她许多次请假出来参加会议。

在吴先生逝世之后，南京举行过一次极其拥挤的追悼会，悼词中提到她是一位基督徒，是三自爱国运动的领袖，还念了中国基督教三自爱国运动委员会、中国基督教协会和海外教会团体的唁电。报纸上也报道了她是基督徒。这不是很好吗？这就是见证。一个有高尚品格的人能被人称为基督徒，这个人就已经为预备主的道做了美好的工作。预备主的道和传开主的道都是美好的见证。

吴先生一生把爱撒向人间。她没有直系家属，但是我难得在一个追悼会中看见那么多人淌眼泪，其中许多人是她的学生。她是一位深得人爱的人。许多流泪的人并不认识吴先生认识到的《约翰福音》第1章里的基督，但这位基督已经藉着吴先生影响到他们。这是我们应当看到的。《启示录》第14章讲到，在主里面而死的人息了自己的劳苦，作工的果效也随着他们。吴先生作工的果效随着她遍及全世界，这个果效在我们这些人身上都有。我们要为吴先生所作的工感谢神。

几年前我写文章纪念吴耀宗先生。我想现在用那篇文章的结束语来结束我现在的話：

我国传统的“寿终正寝”也好，西方传统的“永享安息”也好，都不能用来作为吴先生这样一种生命的结束语。我愿意这样来设想：今天，在一个更加接近上帝的光明所在，吴先生正在继续寻找真理，继续实践真理，继续她的祈祷、侍奉、崇拜，也继续和我们同工，加益于我们的努力。

敬 爱 与 祝 愿

(一九八八年在江苏国际文化交流中心
庆祝黄友葵教授执教六十年会上的致词)

今天,我们非常高兴能在一起庆祝我们敬爱的黄友葵先生执教六十年。

音乐给予人们的是音响美。音乐家是美的学生,也是美的教师,是美的体现者,也是美的传布者。你们的工作是使世界充满美。

现在世界上一边有无数的人在那里严肃工作,在各个领域辛勤劳动,为的是使世界美好一点和再美好一点。另一边我们也见有人在那里散播丑恶,使丑恶势力更加抬头、更加嚣张。

黄先生这六十年来是美的代表。她把美撒向世界,使人从音乐的灵感中认识自己的软弱,也得到力量,得到信心,知道在美与丑的搏斗中,丑恶的嚣张只能是一时的,而真、善、美将最终得到胜利,因为在人的内心深处,那向真、向善、向美的向心力到底没有毁灭,等待着仁爱、音乐、宗教、道德来把它唤醒。

最近我参加一次音乐会,发现听众里有人非常不尊重音乐,把音乐和音乐家看得很轻,不讲礼貌,打扰许多愿意欣赏音乐的人。

有一种论调很适应这种行为,认为音乐没有什么了不得,无非是把若干音响放在一起。据说小提琴演奏贝多芬《第九交响曲》很简单,只要用拉紧的马尾去同拉紧的猫肠(现在可能是钢丝?)互相摩擦,加上一个人的手指的某些动作就是了。当然,用不着一位音乐家用六十年的时间去提高自己的造诣,去培养学生。

我不是这样看的。我认为这宇宙不是一堆乱麻,这宇宙是有秩序的。美属于宇宙的根本属性。贝多芬经过长时期的刻苦锻炼,在他精神达到最高敏感度的情况下,同宇宙的这本质有了接触,记录在五线谱上,后来的音乐家进入到贝多芬的精神世界,才把感受到的美传达给对音乐有听觉的人。歌唱家也一样,不过他们的乐器不是小提琴,而是经过训练的喉咙。音乐家是把他们收听到的宇宙里的美的信息,传播到人间的使者。他们使音响成为营养我们的精神的食粮。

我喜爱法国百科全书学派狄德罗这段话:“使德行显得更可爱,使恶行显得更可憎,使怪事显得更触目,这就是一切手中拿着笔杆、画笔或雕刻刀的正派人的意图。”黄先生和她几代学生所从事的正是这一事业。

音乐家以及文学家、科学家和真实的宗教信徒一样,大多有较高的正义感和敏感度,能够超越所看得见、摸得着的事物,接近精神世界的顶点,同时达到对人群的人道主义热爱的高度。古代希伯来一位音乐家曾经赋诗说:“诸天述说上帝的荣耀,穹苍传扬他的手段。这日到那日发出言语,这夜到那夜传出知识。无言无语,也无声音可听。……上帝在其间为太阳安设帐幕。太阳如同新郎出洞房,又如勇士欢然奔路”(诗 19:1-5)。

莎士比亚用弹琴一样的语言歌颂了人,叫我们去挖掘人们心中那些被罪恶所掩盖的洁白:“人是多么了不起的一件作品!理性是多么高贵,力量是多么无穷!仪表和举止是多么端庄,多么出色!论行动,多么像天使!论了解,多么像天神!宇宙的精华!万物的灵长!”谁也不会认为这是现实世界中现实的人们的写照。现实的人大多没有这么伟大。但这正是基督教所憧憬的人的最后形象。这种人的最后出现也正是进步世界的实现。为之不懈努力的

队伍之中有无数艺术家。

有一位有名的人曾经说过：“你们赞美大自然悦人心目的千变万化和无穷无尽的丰富宝藏，你们并不要求玫瑰花和紫罗兰散发出同样的芳香，但你们为什么却要求世界上最丰富的东西——精神，只能有一种存在形式呢？”讲这个话的人不是耶稣，或什么别人，而是马克思，记载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一篇里。

黄友葵先生使我想到这段话。这段话把精神和花的芳香连在一起。我好像看见六十年来黄先生教导培养了的无数少年、青年、壮年、老年都拿了玫瑰花和紫罗兰，还有许多别的花，从四面八方奔到黄先生面前，向您献上。我们感谢黄友葵先生，也感谢几千几万个黄友葵先生，过去的、现在的、将来的，中国的、亚洲的、欧洲的、世界各地的，因为你们丰富了人类的精神。

黄先生，因为您是这样一个可爱的人，因为你做的是这样可爱的事，因为您说的是这样可爱的话，因为你唱出来的是这样可爱的声音，我们感谢您。我们相信以后还会有许多次来庆祝您。

《圣经新语》序言

(一九八九年)

《圣经》不但是指导基督教信徒信仰和行为的具有权威性的宗教经典,它也是人类文化的一个重要产物和结晶,同时还不断对人类文化产生影响。《圣经》已译成一千几百种语言。正像不研究佛教就无法深入了解中国文化一样,不研究基督教《圣经》也就无法深入了解西方的语言、历史、哲学、文学、音乐和美术。恩格斯在他的探索中十分重视对《圣经》的研究。关于早期基督教的史实,他根据《圣经》材料写过三篇重要论文。在他《德国农民战争》这一著作里,他描述了当时教会在动荡中的分化,研究了以闵采尔为代表的神学激进派怎样解释《圣经》去配合群众斗争。

《圣经》形成在亚、非、欧三大洲交会的巴勒斯坦。它是希伯来民族给予世界的一份贡献。它不是一本书,而是不同时期的六十六卷书的一个文集。它最早的材料编成于公元前一千年。最晚的部分属公元一二世纪之间。它的内容除了古代关于创世和人类幼年的故事外,有历史、法律、民谣、诗词、传奇、政论、书信、格言,还有宗教热情和爱国主义密切结合的,充满慷慨激情的言行记录等等。在整本《圣经》里,我们不时看到希伯来民族优秀人物在艰难处境中的忧患、紧迫、忏悔和向上帝呼求救助的心态。而这种心态每每是用他们的特殊语言和象征来表达的。

在一段不短的时间里,“鸦片”二字被说成为马克思给予宗教的定义,似乎足以点明宗教的实质。因此,处理任何涉及宗教和宗

教徒的问题,一概不得脱开“鸦片”二字,否则就是背道离经。在那时候,对一切宗教现象的研究都由那个定义来主宰,来搜集所需的材料。正像黑格尔在《哲学史讲演集》里说过:“天下最容易的事,莫过于随意依照一个原则去乱抓材料。”既然如此,《圣经》不用翻阅,就可以断定它充满了鸦片毒汁。至于就人类文化来说,《圣经》有多么重要的地位,就置之不顾。它就这样几乎成了一本禁书。结果之一是剥夺了我国知识界几代人接触这份重要历史文化财富的权利。

今天情况正在发生变化。越来越多的学者发表文章阐述,纵然宗教在一定条件下对一些人起了麻醉作用,但是麻醉作用不过是宗教所起作用之一,不是宗教的全部作用,也不是宗教在一切情况下对一切人所起的主要作用,因此鸦片不足为宗教的定义。谁都知道,宗教在历史上和在今日世界里还起着其他作用的,例如它每每是联结群众的纽带,动员过群众起来参与对压迫者和侵略者的抗争。在民族获得新生之后,它团结信徒投身建设。这都不是鸦片所能做到的。今天,人们更加科学地、冷静地、实事求是地对待宗教。

《圣经》被扭曲了的形象,今天有了恢复其本来面目的迹象。

我十分欢迎杨惠林、方鸣、耿幼壮三位青年学者编写的《圣经新语》这本书。我是否同意所收集的文章中的一切观点;那不是重要的问题。重要的是:在对宗教和《圣经》的态度上,这批作者能摆脱简单化和反教传统的框框。他们欣赏一种文化型、道德型、服务型的,反映人类终极关怀的宗教。他们象征着地平线上新一代知识分子的出现。能够同这一群将为提高我国人民的文化素质作出贡献的青年学者在一起探讨和合作,在我是一件特别高兴的事。

“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求索。”这本书是求索的记录，也将吸引更多的人来一同求索。

思想不断更新的吴耀宗先生

(一九八九年九月七日在中国基督教全国两会纪念
吴耀宗先生逝世十周年北京纪念会上的讲话)

足足有四十多年,吴耀宗先生是我的良师益友。我深深觉得,吴耀宗先生的一生是思想不断更新的一生。

很多人从出生到死,一直保持着上代传下来的思想,谈不上思想更新。可是吴先生不是这样。

一九一七年吴先生认识基督为“一个伟大崇高的人格”,从而接受了基督教信仰。据我所知,这是吴先生思想更新所走的重要的一步。他自己在一九四七年是这样描述那段往事的:

“是三十年前一个春天的晚上,我在一个美国朋友的家里,初次读到《马太福音》的‘登山宝训’,像闪电一般,这三章书好似把我从睡梦中震撼起来。我睁开眼睛,我看见一个异象,我看见一个伟大崇高的人格,尊严、温厚、深刻、锐利——他把握了我的灵魂,他几乎停止了我的呼吸。回到寓所以后,我快乐,我欢呼,我感动到流泪。我不由自主地对这个异象说:‘主,你是我的救主!’”(吴耀宗:《基督教与唯物论——一个基督徒的自白》,原载《大学月刊》一九四七年七月号)。

基督教有男女青年会的组织,它们的会训一个是“非以役人,乃役于人”,一个是“尔识真理,真理释尔”。吴先生接触了基督教青年会,在那里被改造社会的理想所感染,毅然决然放弃海关的优厚待遇,转到青年会,负责出版工作和全国学生青年会的工作,通过这些工作吴先生接触了广大进步青年,深受广大进步青年的影

响,也为帮助青年学生进步做出了贡献。

对“九一八”事变吴先生是十分气愤的,他反对日本军国主义侵略中国;对国民党置外敌入侵于不顾,一味企图消灭共产党,也很反感。当时吴先生在中国基督徒青年学生中提出一个问题,在许多教会和各地一系列夏令会、秋令会、冬令会和春令会里展开讨论:基督徒只讲个人得救够不够?基督徒应否也关心社会改造?那是一个具有重大启蒙意义的问题。所谓个人得救,指的是基督徒独善其身,通过灵修、祈祷、读经、忏悔、崇拜、引领别人信仰耶稣等等,实现自我完善,认为只有这样才是救国的根本之道,其他都是唱高调,不值一顾。而社会改造,那是指认识中国社会的半封建半殖民地性质,认识拯救中国于危亡的力量和途径,认识个人在救亡运动中的责任,认识解决国家所面临的问题才能解决个人改造的问题。我自己在这些讨论中深受其益。当时我在上海圣约翰大学读书,不关心社会改造问题,基本上属于讲个人得救的阵营,但是还不甘心做亡国奴,听到有些同学在醉生梦死之余争论“中国亡给哪个国家好”,心里也很反感。至于中国怎样才能不亡,却深感茫然。听到吴先生介绍耶稣基督为一位爱国爱民,为拯救人民于水火而献出自己的生命的英雄,似乎吹来一股清风,顿时觉得大有启发,从此认识到改造我们的国家实为当务之急,从此我对吴先生也摆脱了先入为主的成见,产生了好感。

我国基督教中有人称吴先生为“社会福音派”,那是一种偏见。只要看吴先生底下两段话,就可以知道,吴先生是主张社会福音和个人得救相结合的:

“复活了的耶稣,不只要做我们个人生活的主宰,在今天混乱黑暗的世界中,他也应当是我们社会生活的动力和南针”(*《黑暗后的黎明》*,载*《天风》*一九四七年四月五日号)。

“世界是在火焰中，社会的斗争越来越厉害，世界的对立越来越尖锐，而基督徒学生所面对困难也将越来越多。我们究竟应当走那一条路呢？我们怎样才能把耶稣整个的福音——个人福音和社会福音，和平福音和革命福音——在这大时代中充分地发挥出来呢？”（《中国基督教学生运动的回顾与前瞻》，载《消息》一九四八年一月二十五日号）

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西方基督教中有一批有正义感的知识分子，深感那次战争双方的不正义性，对支持那场战争很感内疚，同时在印度甘地非暴力和不合作运动的影响下，主张和平主义，反对一切战争，认为压迫和侵略是应当反对的，但手段只许限于政治、经济、文化、宗教和各种群众运动，却不许动用武器。这批人自称和平主义者，“唯爱主义”是传入中国之后取得的名称。吴先生深受这一理想的影响，还担任中国唯爱社的领导人。

“九一八”之后，吴先生一方面批评国民党的不抵抗主义，一方面又主张唯爱主义，他发现在这一点上和他志同道合的人越来越少，唯爱云云他就开始少讲了。但是吴先生最后放弃唯爱主义或和平主义，成为一个彻底主张武装抗战的人，那是在他亲眼看见日本侵略军在上海狂轰滥炸之后。就我所知，这是吴先生思想发展中的第二次重要飞跃，作为一个基督徒，抛弃了唯爱主义或和平主义。

为了保持历史的真实，在这里值得指出，客观上，唯爱主义是可以被不抵抗主义和投降主义加以利用成为它们的同盟军的。但是，吴先生是一位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爱国主义者，国内抵制日货，不同日本合作，国际上给予日本经济、政治制裁等主张，他都拥护，并在国际上予以号召。他就是反对动用武力。把他那种理想主义的主张同亲日的不抵抗主义等同起来，那是不公正的。

在抛弃唯爱主义之后,吴先生毫无保留地投身抗战救亡的行列。在基督教方面,他帮助广大基督徒在信仰上转过弯子,使他们得能如释重负地拥护、参加抗战救国的事业。

吴先生并没有像当时基督徒中不少其他领袖那样留在一般地拥护抗战上。随着抗战的持续,抗战的阵营里出现了明显的分化,甚至有人公开叛变投敌。吴先生的思想和信息增加了新的内容:他进而呼吁团结,反对摩擦,呼吁民主,反对独裁。当时我国基督教领导层中,拥蒋反共是主流,帮助八路军和解放区的人也是有的,但不多,而且是不声不响的,而吴先生却公然亮出“民主联共,抗战到底”的旗帜,这在基督教是难能可贵的。

在人事方面,在吴先生的保护下,很多进步青年进入了男女青年会,担任各种职务。在抗日战争时期和解放战争时期,在沦陷区和国民党统治区,基督教男女青年会在许多城市和学校都是帮助青年走向进步的社会团体。

吴先生从来没有接近过国民党或对它有好感,但在一段较长的时期中,他还是寄希望于国民党,愿望它尊重民意,治好国家。但是从抗战后期开始,吴先生对国民党不再保持任何希望和幻想。

与此同时,共产党和解放区在吴先生的思想认识上越来越占据重要的地位。在他的心目中,共产党已经从合作和联合的对象上升而为中国革命的主要力量,是中华民族的希望。那时,吴先生已经不是一个一般的爱国者、一般的抗日派、一般的民主人士,他已经是中国共产党的好友。他对于新中国的来临充满信心。他是用这样的话去指引当时的基督徒青年的:

“时代的末期,是黑暗,也是光明;是混乱,也是秩序的开始;是死亡,也是新生命的萌芽……”

我们不必为旧时代的没落而悲,却应当为新时代的来临

而喜。这就是我们的远景,这就是我们的信心;这个远景与信心,可以使我们坚强,使我们忍耐,使我们不留恋着腐烂的躯壳,而为萌芽了的新生命,像一个先知,像一个战士,贡献我们全副的力量”(《时代的末期》,载《天风》一九四六年九月二十一日号)。

一九四九年五月,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的前夕,吴先生作为代表团成员到布拉格参加世界和平大会。我从日内瓦前去晤面,畅谈了半天。那时,吴先生对于我国人民在共产党领导下解放全中国,建设新中国,满怀激情,他完全同这一事业融合在一起。那次我问了吴先生一个令他失望的问题:如果宗教受到压迫,你还拥护共产党吗?吴先生回答说:是的,我还拥护共产党,因为中国之大,宗教无论如何是个小小的局部。接着他讲了许多共产党必然执行宗教信仰自由政策的道理和事实,认为偏差总是会有的,但是能够纠正的。吴先生要我注意提防西方反华宣传的影响。

现在让我介绍吴先生的下一个思想突破,对其意义和艰难,教外朋友可能不太容易理解。

吴先生当然是深深崇奉基督的,但是在解放前,尽管他也参加一个教堂,他对于有形教会的上层领导组织总的说来相当悲观,他游离超脱多于投入参与。他讲得更多的是一个难于捉摸也难于下定义的“基督教运动”。这个“基督教运动”同教会上层领导组织是分开的,不“同流合污”的。在教会方面,有的人看他为一位头脑很新,略带高傲的知识分子,有的则带着贬意称他为“青年会派”,更有的诬蔑他为“不信派”。解放前后,吴先生进入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成为整个中国基督教的代表。教内教外的情势把吴先生放在了领袖地位。这固然是再也合适不过的人选,但是,这时,他立即面临了怎样作为中国整个基督教的代表,把整个教会的

人们团结和领导好的问题。就吴先生来说,这在他思想更新过程中又是一个里程碑。如今要团结整个中国的基督教,其中包括许多二三十年来谈不大拢的教派的领袖。吴先生这时思想上作出调整的必要性和他要求之大,局外人也许难于理解。值得指出,周恩来一九五〇年多次同吴先生等基督教领袖恳谈,恳谈中对基督教过去提出过的自治、自养、自传这三自原则的热情赞赏,以及他多年间对吴先生的工作不时的关怀和协助,对吴先生在工作上从青年和文字转向整个教会,也就是越来越教会化、群众化,是起了相当影响的。

作为全国基督教的领袖,吴先生发起了三自爱国运动,在爱国主义的基础上,团结全国教会,使中国教会实行自治、自养、自传,成为第三世界第一个在全国范围完全独立自主的教会,博得全世界基督徒的赞佩,也为下一步治好、养好、传好的工作创立了条件。为了使全国各派信徒在三自和爱国的基础上团结一致成为可能,吴先生主张在信仰和礼仪问题上,不强求统一而实行互相尊重。这一原则现在正贯彻在基督教整个工作之中。作为各派信徒的领袖而不是一派的领袖,吴先生在落实宗教信仰自由政策方面为各派做了大量的工作。

吴先生一生中也有思想难于“更新”的时候,那就是在“文化大革命”时期。据我在南京所闻,吴先生表示对“文化大革命”的种种“很不理解”。他大部分时间是闭门在家度过的。他去世于一九七九年,那是在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他看到党的各项政策逐一重新落实,这是令他欣慰的。

吴先生逝世之后,中国基督教三自爱国运动委员会和中国基督教协会继续高举吴先生发起的自治、自养、自传原则和办好教会的遗志,进一步进行治好、养好、传好的工作。办好教会是广大信

徒的愿望,是用事实来说明三自的正确性和必要性,是最能把广大信徒团结在三自爱国旗帜之下的。同时,办好教会也是祖国对基督徒的要求,是基督徒对祖国应有的贡献,是基督徒的爱国主义表现之一。这就是说,把教会建设好既是爱教应有之义,也是爱国应有之义,这正是实现吴先生发起三自之初的远象。

我们看到,不少人一生中思想原封不动,谈不上有什么更新。有的人只能保持一个阶段的革命性,此后就庸庸碌碌,终其余生,弄不好甚至成为革命的阻力。吴先生数十年之久能够一而再、再而三地接受新事物,突破旧框框,思想更新又更新,的确是一生从善如流,永葆革命青春,实在是我们的良师益友。

全国政协宗教委员会召开这次纪念会,是对吴先生表示崇敬,也是对中国基督教坚持吴先生倡导的三自爱国运动的肯定和鼓励。请允许我代表全国基督徒,向全国政协宗教委员会致以深切的感谢。

庆祝政协四十周年发言

(一九八九年九月于北京)

今天我们大家非常高兴,在一起庆祝政协成立四十周年。

在这四十年中,我大约有四分之三的时间担任政协委员。但是说实在的,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我的参与是不大积极的,是时常要请假的。任何一个东西,你失去了才觉得它可贵。是在“文化大革命”的那几年里,我时常想到政协,时常怀念政协。特别有一次我到上海去,有人告诉我,在上海政协的围墙上出现了六个大字“政治岂可协商”,我不敢去看,但是,那时我就想,不知道以后还会不会有政协。如果有一天再有政协,我应当做一个不马虎的委员。

政治协商会议不是国家的行政部门,也不是国家的立法机关。它的性质是协商,由各界人士就国家重大问题进行协商,做到集思广益,使大家的认识能够提高,能够统一,然后去带动各界更广大的成员,国家的事情就能办好。这是实在得多的一种民主。它不像少数服从多数那么简单。它比举一下手,投一下票要复杂得多,因为得摆许多事实,讲许多道理,有的时候还要等待,因此可能会慢一点。但是它让大家想清楚,使力量不是抵消而是集中,做到群策群力。我觉得这是社会主义民主优越于西方民主的地方。

政协是中国共产党统一战线这一方针政策的重要体现。据我所知,虽然一切革命运动和社会运动总少不了要联合一些人来一起努力,但中国共产党在世界一切政党之中特别重视这一点。二

十年代毛主席提出,谁是我们的敌人,谁是我们的朋友,分析社会各阶层人们的政治态度,统一战线已经成了一门科学。中国共产党高度发展了统一战线的理论,在它自己的组织里设立了各级统战部,根据统一战线的原则,处理关于知识分子,关于民族资产阶级,关于民族,关于宗教,关于华侨,关于港、澳、台,关于争取团结世界各国人民的各种问题,并且制定一系列政策。四十年的历史告诉我们,什么时候照这些政策办,什么时候人心就向着党,国家就安定团结,什么时候违犯这些政策,国家就不得安宁,人民就痛苦。十三届四中全会所成立的党中央领导班子宣布,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路线、方针、政策不变,这宣布大受欢迎,原因就在这里。

各位可能知道,我们一些基督徒发起了一个爱德基金会,是个以服务社会为宗旨的人民团体。它的海外联络员美国朋友魏克利写了一本专门研究中国统一战线的书,最近出版。这本书是他的博士论文,在它的封面上写的“求同存异”四个大字是赵朴初先生题的字。作者作为一个学者,研究了中国的统一战线,人民政协和宗教政策,讲了许多深刻的话。美国普林斯顿大学看了他的这一著作,给了他哲学博士的学位。我很高兴现在有这样一本书,让国外多了解我们。国外只知道立法、司法、行政这三权,统一战线和政治协商在国外是很陌生的,大大值得我们介绍。我在国外曾几次专门讲了中国的统一战线和政治协商,听的人觉得很新鲜。我时常告诉外国人,共产党不过是领导党,不要称呼中国为共产党中国,你们与其称呼中国为共产党中国,还不如说统一战线中国。

当然我们各级人民政协的工作也有不够的地方。一可能是协商不够,二可能是监督不够。监督是特别重要的。人不过是人,掌握了权力每每容易忽视民主,甚至以权谋私,因此,哪里有权力哪

里就应当有监督,完全靠自觉和靠自己的良心是不行的。有了监督,还是会出毛病的,但是纠正可以及时得多,不致等到问题十分严重的时候动大的手术。我希望,也相信,在今后的年月里,协商和监督必然会加强,我们国家的社会主义民主将有大的进展。

今天我们向吴耀宗先生学习什么？

(一九八九年九月十五日在中国基督教全国两会纪念
吴耀宗先生逝世十周年上海纪念会上的讲话)

吴耀宗先生是中国基督教中一位杰出人物。他的特点是他始终和时代对话,始终同时代一起前进。他思考时代向他提出的挑战,他接受时代对他的教育,他也影响他所处的时代。他和大多数中国其他神学家不同,不盲目崇拜外国的书本,也不轻易接受国民党官方宣传,他在同时代的对话中,特别在同那些代表时代前进方向的青年的对话中,发展自己的神学思想。用今天国际基督教中流行的一个名词来说,吴先生的神学思想是十分“处境化”的。处境化的反面就是神学家脱离处境,不顾现实,把自己局限于讲述那些同所处时代不搭界的东西,忘记自己的社会责任,不问自己的论点的社会后果。

在我国解放前,吴先生摸索时代前进的道路,踏着这条道路前进,决不是把对基督的信仰抛在路旁,或者是把它像一个包袱那样背在身上,而是深化了自己对基督的信仰,使这个信仰成为他的动力,同时帮助教会里无数具有正义感和救国急迫感的青年,转过各种弯子,指引他们一同前进,带着信仰投身祖国前进的洪流。与此同时,吴先生也吸引了部分教外青年,一同来参加救亡运动。吴先生的主要工作不是做一位站在台上讲道的布道家,然而谁也不能否认,他以他独特的姿态,为基督作了别人不会作的见证,使人们对基督教从恶感转而为好感。这能不算布道吗?这正是很有效的布道。当时教牧人员虽然不少,但没有几位能像吴先生那样把福

音传到那些救亡心切的优秀青年中去。由于吴先生在许多见解上是进步的,基督教中出现了进步的一翼,基督教的声誉因此得到了提高。这样,吴先生为其他人的布道开了路。我愿意提醒那些喜欢对吴先生多方提出挑剔的人:要是没有吴先生当时以至解放以后所倡导的一切,今天人们对基督教的观感会怎样?愿意站出来帮助基督教享有自由权利,维护它的合法权益的人会多吗?那么你们又能享受到多少宗教自由呢?

今天已经到了八十年代之末,时代不同了,处境也不同了,今天中国教会怎样学习吴先生的问题也出来了。就这个问题,我愿意提出几点初步意见。

(一)我们应当像吴先生那样,重视与上帝交通,在他面前宁静、等候、聆听,积累灵性的“体认”(这是吴先生喜欢用的两个字),使灵性每天有每天的长进。

吴先生从来不夸耀甚至绝少谈到自己的灵修生活,但他是最相信祈祷和重视祈祷的功课的。我们不妨引用他三段话:

“基督教修养的主要方法就是读经和祈祷。……”

“基督教的修养,就是叫人常在静默之中,面对上帝,永远保持这个生活态度。”

“祈祷的主要意义,不是祈求,而是在静默中体认真理。祈祷的目的,不是叫客观的事实俯就主观的愿望,叫上帝答应我们任何的祈求。……相反的,祈祷是要我们从真理的体认中,发现应走的道路。……祈祷是要把我们一切主观的愿望,都摆在上帝的面前,让真理的日光,把它的黑白是非,轻重缓急,分别清楚,从而决定我们的态度和行动。……祈祷把我们的生活,放在一个更高的水平线上。”(《论修养》,载《天风》一九四五年十二月六日)

“所谓祈祷，基本上就是一种渴慕真理的态度……一个宗教家，……在祈祷的时候，他会得到一种特殊的鼓舞和安慰，因为他相信：上帝所显示的真理，是道路，是生命，是智慧，是能力，而当他把自己奉献给真理，也就是奉献给上帝的时候，这一切的东西，他都可以享有。”（《基督教与唯物论》，载《大学月刊》一九四七年七月号）

“祈祷使人生一切都统一于上帝旨意之下，而得到和谐。最伟大的祈祷不是为自己和别人求这个，求那个，而是祈求明白真理，明白上帝的旨意，使它得到成全。……一个善于祈祷的人，他的终生不断的祈祷，应当是‘愿你的旨意成全’。”（《没有人看见过上帝》，一九四三年初版）

这里我们看到吴先生极为崇高的祈祷观。这一祈祷观是同基督当日教导门徒的祷告（现在称为主祷文）和他在客西马尼花园里的祷告十分吻合的。这是一个很高超的灵性生活。它不是以自我为中心，藉着祈祷调度上帝为我们办我们要他办的事，而是以上帝为中心，藉着祈祷调整我们同上帝的关系，使我们摆脱私心，和上帝的真理取得协调，从而把我们内在的可能性奉献给上帝，得以发挥、升华，使我们获得力量，能在上帝的创造、救赎和圣化工作中和他同工。

今天，我们的教会显得软弱，一个重要的原因是同工们忙于各种会议和各种事务，在上帝面前宁静、等候、聆听的功课有些荒废，由此失去了力量，而这个功课不受时代和处境的限制，是在一切时代，在任何处境都不可忽略的。

（二）我们的神学思想工作应当重视处境化，重视伦理道德，我们在工作中应当加强服务项目。

吴先生在人们开始使用“处境化”这名词前二三十年，已经实

行神学处境化了。他把自己的基督教神学思想同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不是生硬地而是有机地结合在一起。他解放前讲的是名副其实的“解放神学”，尽管没有用这四个字。我们只要读一下拉丁美洲基督教中讲述解放神学的书籍，就可以知道，在那里，基督是上帝的儿子，是道成肉身，是藉着十字架把人们从罪恶中解救出来的救主——这些是毫不含糊的。那些作者不过是联系着拉丁美洲人们普遍关心的社会、政治、经济解放问题，去重读《圣经》，去论证福音，使基督徒从基督的救法和他的大爱想开去，觉悟到自己对人类解放事业的责任。当时吴先生也那样。可惜的是，这处境化的神学路线在中国中断了，它始终处于弱小地位。我们的神学思想同时代和现实缺乏充分自觉的对话和渗透，它尽讲天边的话，少讲身边的话。

是的，福音传达给人们的是永恒真理，我们要传的正是这个真理，但是永恒真理进入人世所采取的是道成肉身的方式，这对我们的启发和意义是够大的。

我国人民在一九四九年得到了解放，中国人民站起来了，这是伟大的。但是，我国今天还处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不少人至今仍然不同程度地处于愚昧贫困之中，不时受到天灾人祸的束缚捆绑，社会主义需要进一步完善。这是一个很长的历史过程。在这一意义下，吴先生所代表的神学处境化，对新中国基督徒具有现实意义。

反观我国今天的基督教，虽然在不少地方有不少教牧同工和信徒是新中国的良好公民，参与社会主义四化建设，有人甚至不遗余力，可是，在神学见解上，他们还保持着不少同处境很不相称的以摆脱现实世界为主题的東西，并且不时把这些东西灌输给别人，让基督徒对现实世界不分青红皂白，一概视为粪土，予以鄙视。这

就是神学思想同处境脱节的现象，也就是基督徒的作为缺乏神学思想基础，缺乏神学思想指导的现象。那些不相称的神学观点所起作用一时似乎不明显，但在一定气候下，它们转而发生指导作用，其后果将是不幸的。

第二次世界大战时期因为参加反纳粹组织而被希特勒处决的神学家潘霍华生前曾竭力强调基督和他的福音的人世性质。他指出：“一个人可以企图逃离世界，可是他找到的决不是上帝，只是另一个世界，就是自己这个世界。他不能真正找到上帝，因为上帝的道是进入世界的。为了寻找上帝而逃离世界，结果找到的还不过是自己。”在他临死前几个小时，他在监狱里还说这样的话：“对基督徒来说，并不存在一条通道，可以让他逃离世界而避入永生。基督自己就在地上喝干他应喝的杯子。唯有这样，那被钉十字架，死而复活的主才和我们同在。这个世界是不能过早离弃的，在这一点上《旧约》和《新约》是完全一致的。”

这些话同吴先生说过的许多话不谋而合。神学思想处境化，使之和处境相对话，这是吴先生生前所做的，我相信也是吴先生愿意我们在今天做的，不是一两个人这样去做，而是形成潮流。

吴先生最为关心的是人民的疾苦。他投身救亡运动，从事民主运动，支持解放战争，拥护共产党和社会主义，都是出于他对人群的关爱，出于他把人民从水深火热中解救出来的急切愿望。

今天，我国人民的生活已经有了显著的提高，这在一个十亿人口的国家是不简单的，但是，离开大家想望的水平，距离还不短。缺医少药的现象，经不起天灾的现象，文化低下缺乏文明的现象，弱智和聋盲的现象，都还不是少见。我们基督徒对这些不应当无动于衷，这些应当激发基督徒的爱心和人道主义感情。

目前我国教会有些地方存在一个不健康现象：如果有人提倡

服务,有人会攻击此人“不属灵”,奚落他为“社会福音派”。这样把属灵与服务对立起来,把属灵与社会对立起来。那么,按照他们的逻辑,最属灵的人势必最不肯服务,最不关怀社会,最自私自利,是个拔一毛以利天下也不为的人。难道属灵可以这样来曲解吗?

是的,基督教信仰以救赎之主耶稣基督为中心。人们需要认识这位救赎之主。帮助人们认识他,正是我们教会的职责。但正是这位基督说了这样的话:“人子来,并不是要受人的服侍,乃是要服侍人,并且要舍命,作多人的赎价。”这段话的最后十来个字时常被人用来否定服务精神,就是把基督的舍命救赎和服侍人对立起来。其实,从整个这句话来看,“舍命”和“作多人的赎价”也还是“服侍人”的应有之义,是“服侍人”的最高榜样,怎么可以用来否定服侍或服务在基督教里的崇高地位呢?

今天,中国要办的事太多,不能全由国家来办,国家愿意民间为服务社会兴办各种事业。我想,教会去办许多服务项目,这是符合基督教导的,也正是吴先生愿意看到的。现在已经有人提出,我们讲爱国爱教,不要仅仅停留在学习上或口头上,应当见诸服务社会和服务教会的行动,这是很值得考虑的。

至于服务的项目,那就多得很,像识字扫盲,清洁卫生,医药保健,反对买卖婚姻,建立相亲相爱的家庭生活,实行男女平等,婚丧喜庆实行俭朴简化,关怀照顾弱智和贫病的人以及孤寡老人,从事社会公益事业,保护生态环境,如此等等,都值得提倡,都是基督徒服务人民和见证基督的途径。

要在教会工作上注重服务,那么,我们的神学思想应当高举伦理和高举道德,让伦理道德在我们的神学建设中占有其应有的重要性,相当于它在《圣经》中所占有的地位。就我国基督教现状来说,神学处境化的起步点是恢复基督教的伦理道德内容。

基督教是一个讲究伦理道德的宗教，全部《圣经》里爱人之道和社会公义的内容占着极大的篇幅。一个鄙视伦理道德的基督教决不是基督教。

今天教会里有时出现一股贬低伦理道德的风，认为谁探讨伦理道德，谁就是贬低福音。他们甚至利用“因信称义”的教义，渲染什么一个人只要有“信”，他就保了险，一切行为都有基督予以遮盖，好坏都无所谓，自己不必为自己的行为负责，而一个没有“信”的人，什么好的行为和巨大的贡献也必然是反对神的，没有价值。难道基督的福音许可引申出这样的道理吗？这离谱太远了，滑进了“以信废行论”和“道德无用论”的异端。特别在我们深受孔孟影响的中国，伦理问题从传教学来看格外重要。许多人之归向基督，首先是被福音的伦理内容所吸引。像吴先生青年时代同基督教接触之初，正是登山宝训的最崇高无私的伦理观打动了他的心。他自己是这样说的：

“是三十年前一个春天的晚上，我在一个美国朋友家里，初次读到《马太福音》的‘登山宝训’。像闪电一般，这三章书好似把我从睡梦中震撼起来。我睁开眼睛，我看见一个异象，我看见一个伟大崇高的人格，尊严、温厚、深刻、锐利——他把握了我的灵魂，他几乎停止了我的呼吸。回到寓所以后，我快乐，我欢呼，我感动到流泪，我不由自主地对这个异象说：‘主，你是我的救主！’”（《大学月刊》一九四七年七月号）

值得我们思考的是：今天，不少人正点着灯笼寻求善，寻求美好的为人之道，他们寻到教会里来，如果我们教会却瞧不起道德，瞧不起登山宝训，很少讲道德和登山宝训，这不是一个可悲的现象吗？

加强服务和神学思想上的处境化和伦理化，是互为表里的，

是行与信的统一，也是行与知的统一，是基督教信仰应有之义，是爱国信徒的愿望，也是教会在我国处境中更新自己和见证基督的需要。

(三)教会和教会所办事业都应当是民主精神的学校，要通过养成民主习惯来办好教会。

在国民党时代，吴先生高举民主旗帜，反对独裁。今天，国民党统治在大陆早已消失，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实行社会主义，民主有了新的内涵。在新的时代里，社会主义民主的充分实现还有待于广泛的民主教育，对此，教会不应置身事外。

基督教相信上帝为全人类之父，基督的救恩向一切人敞开，圣灵启发一切人的智慧，这里就存在了民主思想的萌芽。经过宗教改革而出现的基督教新教，带有更多一点的民主色彩。

今天，我们提出教会不但要自治、自养、自传，而且要治好、养好、传好。治好的重要的一条就是发扬民主精神和民主作风。办好教会包含着民主管理的思想。办好教会就是用民主精神去办好。各地教会目前面临的问题是很多的，这些问题很多同缺乏民主精神有关。教会要真正办好，不能让任何一个人或少数几个人说了算。民主精神应当渗透到各级教会组织。

由于中国长期以来的国情，家长式和一言堂式的办教方式还是相当普遍的。这是同《新约》时代教会的传统相违背的，也是同社会主义民主精神格格不入的。

解放前吴先生住在上海，那时他参加某一个堂为堂友。当时我想，像吴先生这样一位有进步头脑和神学教养的知识分子，那个堂能给他什么呢？我问过吴先生。他的回答是：该堂用广东话举行礼拜，很适合吴先生夫妇。此外，吴先生指出，那是一个比较民主的堂，有正常的信徒代表组成的堂务组织，不是一两个人说了

算。吴先生这一回答给我的印象很深。

教会内部要避免摩擦,成为爱的团契,那么,让民主精神贯彻到一切关系中去——包括同工之间的关系,牧师、传道和信徒的关系,牧师和堂务组织的关系,堂务组织内部的关系,信徒之间的关系,三自爱国组织和教会的关系,教内和教外的关系,如此等等——是个必要的前提。民主精神不仅是少数服从多数,它还包括尊重别人的意见和职权,相互之间多多通气,较大问题经过充分协商讨论,慎重考虑别人的愿望,多用爱心和团契精神去寻求一致,少用权力去压服别人,注意团结,不轻信传言,防止有意无意的挑拨离间。

近来大家正在探讨理顺关系问题,就是理顺三自爱国组织和教会的关系,归根结底,这也还是一个民主的问题。中国的事要办好,不能没有集中和领导,同时,也不能不由群众来当家作主。正确理解集中和分散,领导和民主,把二者很好地结合起来,我想这是毛主席给我们出的课题,小到基督教的一个基层堂点,也得好好解决这个课题的。

把教会建设好,这不但是广大信徒的要求,也是社会主义新中国向基督教提出的要求,因为如果我们国家各项事业都办好,独有教会办得很糟,这决不是国家之福。所以,把教会建设好既是爱教,也是爱国,是爱国爱教的汇合点。我们翻阅吴先生发起三自爱国运动以来的著作就知道,吴先生决不是为三自而三自的,他的目的是把中国的教会建设好。今天,我们要把教会建设好,需要向各位前辈学习的东西是很多的。他们每一位都有值得我们好好学习的东西。今天我们纪念吴先生,依我一孔之见,我想最应当向吴先生学习的是上述这三点。我的意见难免有偏,请各位同工同道以及教外友好不吝指正。

追悼郑建业主教

(一九九一年五月五日于上海)

基督教举行丧事或追思礼拜的时候时常会引用《启示录》第14章第13节：“……是的，他们息了自己的劳苦，作工的果效也随着他们。”我想我们今天引用这节《圣经》分外合适。郑建业主教的一生的确是劳苦的一生，他劳苦的果效的确将一直传下去。

我同建业相认是在一九三七年，已经有五十四年了。我不但认识建业，我还认识建业父亲郑和甫主教和建业的好几位兄弟姊妹。五十四年以来，我同建业有时天天见面，有时几年不见。不管见或不见，他知道我的思想，我也知道他的思想。我们在一起的时候有说不完的话。一九四九年，他和寿宁在加拿大，我去看他们，我们在一起谈了几天。我们有时见解不同，但是我们相互非常了解。

开始认识后不久，他进了上海东吴大学，是一位看书特别多，思想特别丰富的学生。这一点他一生始终没有变。他收集材料，了解情况，想问题，同人探讨，提出见解。在上海基督教学联和学生礼拜堂也好，在国外学习也好，在河南圣公会和中华圣公会也好，在全国三自委员会和基协也好，他一贯如此。他最能摆脱事务堆和老框框，把问题提到理论的高度，因而能够事半功倍。

郑建业的一个特点是从实际存在的事实和情况出发，从中找

到规律性的东西,这就是实事求是。他最不喜欢用高的调门去呼叫好听的口号。马克思讲过,“一切已死的先辈们的传统,像梦魇一样,纠缠着活人的头脑。”可以说,在我的朋友之中,拿整个一生来说,建业是最能够摆脱旧传统的束缚,获得思想的自由的。他熟悉教会的理论,也熟悉广大信徒的心情,他决不硬要去做勉强的事。前几年有一次中央统战部有一位领导同志对我说:“信徒不喜欢的事,你们决不要去做。”建业就是这样。我想不起他曾经在教会工作中提出要做广大信徒不乐意或有反感的任何一件事情。因此,建业很得人心,在广大教牧同工和信徒中很得好感。他总是从实际出发,提出适度的方案,不提出好听但会坏事的意见。

我们中国基督教为了团结,有一个重要原则:背景不同的信徒信仰上、礼仪上的特点都要尊重,我们称之为“互相尊重”。为了互相尊重以求最广泛的团结,建业想尽了办法。记得五十年代有一次举行全国会议,为了团结某一派,他说了许多理,甚至因为说不通当场哭了起来。后来有人在背后带着批评的口吻责问:“这是什么感情?”很清楚,这是爱国爱教的感情,无可责怪,因为团结是祖国对我们的期望,也是基督的祷告。在建业病倒前不久,他提出了基督教大团结七个原则,到今天还时常有人提到。

这十年来,我们一再提出,要办好教会,自治要治好、自养要养好、自传要传好。值得我在这里指出,郑建业是最早把办好教会付诸实施的。他接受中华圣公会河南教区副主教的职分,当时同我谈过,我清楚知道,他是带着办好河南圣公会的志愿,前去担任这困难的工作的。此后,他帮助陈见真主教到一个一个教区去,组织学习,整顿教区,祝圣主教,重整中华圣公会全国机构。

郑建业不但研究神学,也研究社会科学。举一个例:马克思早期在谈到德国思想界的时候,曾经讲过一句话,大意是对宗教的批

判是一切批判的前提。我们国内有些人就想当然,要照搬,要大张旗鼓批判宗教。建业写过一篇有极大说服力的文章,用大量材料说明,这话不能从德国照搬到中国来,因为中国不是德国。在中国,起着同宗教在德国所起的那样的作用的,不是宗教,而是几千年之久的封建宗法思想,这才“像梦魇一样,纠缠着活人的头脑”,所以批判这个才是一切批判的前提。再举一个例:前几年郑建业同社会科学界一些同人合作编辑一部《宗教词典》。他始终坚持实事求是的态度,反对把宗教同鸦片混为一谈。经过建业努力说理,在那本词典的序言里和条目中,我们找不到把鸦片当作宗教的本质的话。这在那时候是难能可贵的。

我不应当讲得太长。我要说的是,五十四年之久,建业实在是我的一位益友,是我的一位良师。我相信许多同工、同道、朋友、同事都也有同感。

在我们年轻的时候,死是不大想到的,只觉得在我们心中充满着生的喜悦。现在不同了,我们亲爱的人、同时代的人正在一个个去世。我们从什么地方得到慰藉呢?我们基督徒从“过程”两个字得到慰藉。上帝所创造的一切是美好的,特别是上帝所创造的人,像莎士比亚说的,“是多么了不起的一件作品。”上帝是爱,因此,一切美好的事物和人物的命运不是毁灭。像当日基督接过几块面包和几条鱼一样,他要接过去,他要祝福,他要感谢天父,他要掰开,在他手中他们要改变,要增加,他们将被献上在上帝面前。

在圣公会的圣餐礼文里有这样的祷告:

“我们为已经去世信奉主敬畏主的仆人赞美主的圣名,求主使他们在敬爱主服侍主上常有长进。”(注意:是常有长进,不是停滞不前,更不是消逝得无影无踪。)

死是生命的改变,不是生命的终结。在上帝的爱的统治范围

里面,决没有什么真正善的、好的事物会失落,会毁灭。正像歌德所说的:“亲爱的朋友,生命之树常青。”死不过是人生从一个过程进入另一过程的过渡。我们在祷告里,特别在主耶稣设立的圣餐里,还是相通。我们的慰藉就在这里。

忆故友黄培永同工

(一九九二年九月)

黄培永同工和我的友谊是抗战时期我们一同在“上海联”(上海基督教学生团体联合会,当时上海三十多所大专院校和中学内部基督教同学的青年会、女青年会以及团契的全市联合组织)投身基督教学生工作的时候开始的。我们很谈得来,时常一同从“上海联”总部(当时的静安寺路九九九号基督教女青年会学生部)步行回家。那时他是沪江大学学生,我才出校门不久,任基督教(男)青年会学生干事。后来他去了内地。

我们再次在一起,那是在解放几年后的上海。当时他在中华基督教青年会全国协会校会组(即学生部)工作,是该组主任江文汉先生的助手。我先在上海广学会,后在金陵神学院工作。培永和我始终保持密切的交往。

培永对我国基督教最重要的贡献我想是在神学建设方面。

五十年代上半期,我国基督教存在两个相反的极端思潮。一个认为上帝已经退出(或被赶出)他所创造的世界,世界已经是魔鬼的占领区,世界上一切美好的事物无非都是撒旦装作光明天使来诱惑人的。基督在十字架献身无非是要在世人中救拔少数信他的,使他们免于地狱永火。信基督的人和不信基督的人形成对立的两大阵营,无共性、共识可言。另一个认为一九四九年的解放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建立就是基督福音在中国的实践,就是天国在我国的来临,基督是革命的无产阶级,使徒教会就是共产主义的雏

形。地上的教会旨在感动人们按照登山宝训而行,舍己为人,天国就将这样普及在地上。这两个思潮是相反的,但在导致许多信徒对教会失望,离开教会,另找出路这一点上,又是相成的。

对前一思潮,培永出于他爱护《圣经》真理和爱护祖国的情,是无法赞同的;而对后一思潮,培永也深感是对基督教信仰的一种不应有的政治化,不符合《圣经》,不是信徒所能接受。在那时期,许多同工既怕“左”,又怕右,时常叹息“自传难”,不大敢对这两个思潮根据《圣经》提出批评。培永针对这两个偏向,从《圣经》教导出发,通过讲道、演讲、写作,提出令人信服的观点,从神学上保卫了基督教信仰,使它不受歪曲,帮助广大信徒既敢于爱教,又敢于爱国。他就一系列遭到曲解的经文提供了正解,让许多基督徒如释重负,放心投身三自爱国运动。

当时有人只想突出政治,无视神学建设的必要,甚至表示中国基督教不需要神学。培永有一中肯的论点,在今天也并不过时:神学探讨不能代替政治思想,但通过神学探讨,把被人扭曲了的信仰端正过来,使其不成为基督徒接受新事物、新观点的障碍,其作用是不容忽视的。

正在培永在中国教会可以大有作为的时候,他离世而去。我们无法理解这是为什么。所幸我国教会的人才不是越来越少,新生力量正在涌现、成长。这是可以告慰培永的。

为陈泽民先生所著《基督教常识问答》写的序言

(一九九三年七月二十日)

基督教问世已两千年。自从它在第七世纪作为景教传入我国以来,我国知识界大体上始终对其持冷淡、戒备态度。但最近一二十年情况有重大变化。今天,我国知识界对基督教的开放程度超过以往任何时期。我们知道,基督教表达自己的语言每每为历史传统所限,其表达方式有时甚至未免原始,令人望而止步。但是,今天对相当一部分知识界人士来说,它却能引人入胜,使人不愿意轻易把它全部否定。我们看到人们今天正从各种角度对基督教教理作估价:有的欣赏基督教的音乐和艺术;有的肯定《圣经》的文学价值和它对欧洲语言、文化、哲学的深远影响;有的同情基督教的伦理道德;有的赞赏基督高超完美的人格;有的向往基督徒集体中的团契互爱;有的在基督教神学和崇拜中看到人生的终极处境和意义,听到使人不虚此生的信息。可以说,今天我国知识界有许多人对基督教持友好态度,任何粗暴的反宗教或反基督教行动是不得人心的。

之所以出现这一现象,除了基督教所固有的丰富深刻内涵而外,还有种种其他原因。值得在此一提的有二:(一)我国是一个保护宗教和保护宗教信仰自由的国家;(二)我国基督教已经实行自治、自养、自传,由国人自办,不再是个“洋教”。

我的同事陈泽民先生是金陵协和神学院系统神学教授兼副院长,南京大学宗教研究所研究员,从事基督教研究和神学教育四十

为陈泽民先生所著《基督教常识问答》写的序言

余年,在学术上、写作上是一位勤恳严谨的学者,说他桃李满天下绝非过分。他所著《基督教常识问答》必能大大有助于扩大各界读者的知识面,有助于他们对基督教的了解,也有助于促进教内教外的互相理解、团结和对话。我怀着深切的祝愿为之作序。

《基督教传教运动和上帝 的审判》再版前言

(一九九四年)

一九五三年,伦敦基督教学生运动出版社出版了一本七十九页的小书,竟然在海外教会中引起了好些人的激怒。他们认为这是一本大逆不道的书,是一本“不合时宜”的书,因为那时,大批在华传教士才从中国大陆不得不撤走,他们还没有安顿下来,他们在中国留下的工作也无从交代接替。这本书对西方差会的传教士工作,特别对在华传教士工作,作了尖锐的毫不客气的批评。这本书的书名——《基督教传教运动和上帝的审判》听起来就难于接受,因为上帝要审判的话,审判的对象只能是传教士前去的地方的一些人,怎能是差会和传教士呢?

可是,在出书以后的四十年中,要买这本书的人越来越多,各方传出要求续印的声音,国际间普遍认为,这本书对一个新的传教学的产生和成长起了极好的作用。

中国有一句老话:“良药苦口,忠言逆耳。”《基督教传教运动和上帝的审判》可能有言过其实的话,但这不是一本反传教的书。正在该当开始对传教运动作出一个恰如其分的评估的时候,这本书提出了先知式的远象。正当世界许多信徒灰心失望的时候,该书送来了苦口的良药。作者引用 T. R. 密尔福特校长的话:“基督徒在每一时代得重新学习列代基督徒早就知道的:如何在暂时看不到希望的时候活下去。”

作者大卫·斐顿是圣公会的牧师,和我是国际基督教学生运动

中的同事,曾在福建一所神学院执教。他和另一位英国前在华传教士罗伦·艾伦在传教问题上属同一学派,他们主张,传教士到另一国家去,应集中全力让本国信徒自办教会,传教士越快成为多余的人离开那个国家越好。中国基督徒过去四十年的经验告诉我们,使我国教会实现自治、自养、自传,从而得以进而治得好、养得好、传得好,这是一条正确的路线。

我国解放以后大卫·斐顿没有来过中国,但是他一直关心、爱护中国基督教三自爱国运动,并发起一个称为“中国教会之友”的团体,为介绍我国基督教真实情况在病床上做了大量工作。他正是上帝赐予普世教会的一件无价礼物。

愿为祖国统一尽份力

(一九九五年三月七日于北京在宗教界学习江泽民总书记
关于促进祖国和平统一大业的重要讲话座谈会上的发言)

在全国人民,包括台湾人民喜气洋洋欢度春节的日子里,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江泽民就海峡两岸人人关心的祖国统一问题,发表了重要讲话,使全国人民深感喜上加喜。

为了发展两岸关系,推进祖国和平统一进程,江总书记这一重要讲话进一步阐述了邓小平同志所提倡的“和平统一、一国两制”的基本方针。在重申一个中国的前提下,就若干重要问题提出了一系列新的政策主张,特别为台湾当局和台湾各界人士考虑得十分周到,丝毫没有居高临下的口气,令人感到仁至义尽。如此深刻的矛盾以如此宽阔的胸怀来处理,这在全世界作出了一个范例。

我特别注意到,江泽民总书记提出,首先就正式结束两岸敌对状态进行谈判,并达成协议。这是实事求是的态度,是海内外中国同胞和全世界爱好和平的人们都会热烈拥护的一步。我们无意于使用武力去突破两岸政治僵局,愿意双方平等协商,放下武器,言归于好。凡有良知的人都不能不觉察到此中的一个诚字。所谓诚之所至,金石为开。

有了这一步,进入海峡两岸和平统一谈判的气候就有了。和平统一谈判决不是以大压小、以强压弱的谈判,重要的在于开诚布公,共同寻找双方都可以接受的解决问题的办法。固然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我不敢幻想双方达成共识会是轻而易举的,但谈总比

不谈好。

江总书记提到,欢迎台湾各党派、各界人士同我们交换有关两岸关系和平统一的意见。这就是说,交换意见的对象、范围都扩大了。我想,作为宗教界一分子,我可以说,我们宗教界完全赞同江泽民总书记的讲话,拥护讲话中提出的看法和主张,也欢迎海峡两岸宗教界有更多、更广泛的交流。

江总书记特别提出,反对台湾独立。我作为中国的一个基督徒,特别要就这个问题说几句话。

我们每个中国人从幼儿园或者小学一年级那时起,就知道台湾是中国的领土,台湾回归祖国是天经地义的。台湾独立是一个莫须有的命题。在台湾的基督徒中,特别是一些很有影响的上层和教牧人员,在同我们接触中,常常流露出祖国早日和平统一的愿望,这既是我们骨肉同胞又是主内弟兄姊妹的感情。但是今天台湾基督教中还有一股势力,鼓吹台湾独立,正在活动要用“台湾国”名义进入联合国。美国基督教个别教派领导人竟然支持他们,说什么“十九世纪台湾是个独立国”。我们中国基督徒不论在大陆还是在台湾,要警惕“一中一台”分裂祖国的图谋,要反对台独。国际基督教有识之士同情我中国基督教协会和中国基督教三自爱国运动委员会在台湾问题上的立场,我们深为感谢。

基督教有一个故事,古时以色列有一个财主,临终把田地分给两个儿子,一个在东头,一个在西头。到了收获的时候,哥哥想到弟弟家的需要,弟弟也想到哥哥家的需要,在同一个晚上各自带了许多粮食往对方的方向走去,黑暗中撞在一起,粮食撒了一地,两人就拥抱起来。后人听到这件事就说:“弟兄和睦同居,是何等的善,何等的美。”这句话至今在《圣经》里。据传说,就在那兄弟两人拥抱的地方,后人建造了耶路撒冷圣城。撒冷就是和平的意思。

我多么期望海峡两岸一切问题迎刃而解,也能像传说中的兄弟一样拥抱起来。

在中国宗教界纪念中国抗日战争胜利 五十周年座谈会上的发言

(一九九五年八月十五日于北京)

一九四五年八月十五日,日本帝国主义宣告投降,中国人民的抗战到此胜利结束。从一九三一年“九一八”开始,日本帝国主义侵略军的疯狂残杀,中华民族所遭受的惨绝人寰的伤害,全国军民前仆后继的英勇奋战,在人类历史上都是绝无仅有的,实实在在是惊天地而泣鬼神的。

在中国历史上,八年抗战像是一所大学校,它唤醒了我们,改造了我们。

在抗日战争爆发之前,我在上海租界的一所教会学校接受中学和大学的教育。今天很难相信,那时在我的同学中竟然有人在讨论中国亡给谁好。有的说亡给美国好,有的说亡给英国好,也有个别同学说亡给日本算了。那时希特勒已经上台,很耀武扬威,有的人就说亡给德国好。后来抗战爆发了,这个学校政治空气迅速发生大的变化。不少同学奔赴延安,许多同学到苏北、淮南新四军那儿,投身抗日救国的工作。在工作中,他们自己经历了很大的改造,入党的人也不少。

列宁曾经说过:“革命之所以必须,不仅是因为没有任何其他的办法能推翻统治阶级,而且还因为推翻统治阶级的那个阶级,只有在革命中才能抛掉自己身上一切陈旧肮脏的东西,才能建立社会的新基础。”把这个话搬到我们的历史上来,我想可以说:抗战之所以必需,不仅是因为没有其他任何办法能推翻日本帝国主义的

统治,而且还因为推翻日本帝国主义的那个力量,只有在抗战中才能抛掉自己身上陈旧肮脏的东西,才能为建立新中国作准备。

基督教和一切社团一样,里面有比较先进甚至投身革命的人物,也有比较落后甚至反动当汉奸的人物。在抗战的八年里,西安的沈子高主教和开封郑和甫主教都是共产党人旅行途中得以安全歇脚的地方。沈主教在西安暗暗地接待过并保护了一批批前去延安的青年学生。在这两位主教的影响下,香港英国主教何明华也同情抗战,支援广东东江游击队。陪同记者斯诺从上海到延安的是一位牧师。我至少知道一位海外来华的传教士在我国抗战时期和解放战争时期利用她的合法身份为八路军输送药物。我还亲眼见过董必武同志等署名的邀请中华圣公会前去解放区开辟工作的信函。在沦陷区和蒋管区的许多城市,基督教青年会、女青年会和教会为进步群众团体和个人提供活动条件和合法掩护。我还应当提到基督教青年会的军人服务工作,和刘良模先生发起的青年救亡歌咏运动。以上种种在当时固然不是普遍的,大多也是隐蔽的,但在今天,他们应当作为中国基督教的优良传统来继承,供我们仰慕和学习。

从这些事实,我们可以看到,政治上认同和信仰上存异,这在抗战时期已经是共产党和解放区的原则了。我们也可以看到,这统一战线原则执行得有多好多成功啊。像沈主教、郑主教,在信仰上是不折不扣的圣公会,他们的信仰受到极为细心的尊重和关照,而在政治上,他们拥护抗战,反对蒋介石国民党的独裁,拥护共产党所主张的联合政府,拥护民主团结。当时,基督教方面最为先知先觉,不畏强暴,引领广大青年走在民主、救国道路上的吴耀宗先生,后来的基督教三自爱国运动的发起人就是吴先生。这些事实都说明,信教并不等于完全拒绝科学世界观,不

信教也并不意味完全接受科学世界观。我们人人都有逐步掌握科学世界观的过程。

歌德说过：“生命之树常青。”这一求同存异的统一战线法宝一直保持到今天，是非常宝贵的传统，是常青的生命之树。最近全国政协规定三条：政治协商、民主监督、参政议政，所继承的也就是这一非常宝贵的求同存异的传统。

今天我们纪念抗战胜利五十周年。我们知道，统一战线是这场胜利之所以可能的三大法宝之一。我们要重视历史的经验，认清谁是我们社会主义事业的朋友，多宣传统一战线，多宣传民族团结，多宣传政治上团结一致、信仰上互相尊重，多宣传求同存异，把求同存异的原则充分地应用到宗教工作和一切工作上来，彻底根绝压迫、歧视宗教和宗教徒的不文明现象，这样做有利于我们的社会主义事业。我们要珍惜这一统一战线求同存异传统，保护这一传统，让这一传统发扬光大，让全世界的人都认识这是社会主义民主，也是更高级的民主。

今天我们纪念世界反法西斯战争和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五十周年，我不得不提到世界历史的一个怪现象，一件不光彩的丑事，就是今天日本军国主义还在那里伪造历史，美化自己，丧心病狂地说历史上没有日本侵略中国和亚洲各国这回事。在他们手下，历史是可以随心所欲加以打扮的，一个穷凶极恶杀人不眨眼的刽子手，可以打扮成一个美女。他们靠的是强权，认为敢于说出口的就是真理。我在一本最近的美国杂志上看到，日本每年的军费比我们中国多得多。这就告诉我们，为了我们的子孙后代能够过和平的生活，我们不能不反对军国主义的复活，防止军国主义的复活，保卫我们的和平生活，使和平的生活永远不受侵略势力的威胁。

《圣经文学词典》前言

(一九九七年)

基督教的《圣经》是一本影响极大的书。整本《圣经》和其中部分内容的单行本已经被译成一千多种语言。在我国,在过去十年里,南京爱德印刷厂已经印制汉文《圣经》一千几百万本,此外还印制了多种少数民族语言的《圣经》。正像不研究佛学就无法深入认识中国文化一样,不研究《圣经》也无法深入了解西方的哲学、历史、文学、语言、艺术。恩格斯十分重视对《圣经》的研究。他分析了十九世纪基督教学者对早期基督教的研究成果,根据《新约圣经》材料,写过三篇关于早期基督教的革命性的重要文章。在他所著《德国农民战争》一书里,他描绘了教会在中世纪后期在动荡中的分化,特别欣赏以闵采尔为代表的神学激进派怎样解释《圣经》,去号召和发动基层群众投身反封建斗争。既然如此,我们就不能简单以“鸦片”二字来概括宗教和《圣经》的性质。

《圣经》不是一本书,它包含有六十六卷长短不一的书卷,写作时间最早的在公元前一千多年,最晚的在公元后一百多年。它是希伯来民族关于世界起源和人类幼年的故事,有历史、法律、诗词、民谣、传奇、政论、格言、教会内部书信,还有宗教热情和爱国主义密切结合,慷慨激昂的言行记录。

有人认为,《圣经》中包含不少不合现代科学的观点,不值得我们重视。这是一个有害的见解。《圣经》的价值不在科学方面。如果我们的兴趣是在科学方面,我们大可参阅当代的科学论著,不必

到《圣经》里去找现代科学真理。我们对任何其他一本古代传下来的书籍也不会要求它符合今天的科学观点的。《圣经》的价值不在科学方面。但是谁能否认《圣经》在文学方面、在伦理道德方面、在哲学思维方面和在精神方面具有很高的价值？这些价值并不因为它的原始科学观点而受到损害。我们对任何一本古代著作都应抱这个态度。

今天中国知识界越来越多的人对基督教和《圣经》除去了恶感，增加了好感，愿意知道《圣经》有以告人的信息，只是由于历史和文化的差距，读《圣经》不像读一本当代文艺作品那么容易。《圣经文学词典》正可以帮助我们克服这一障碍。我十分欢迎《圣经文学词典》中文版出版，尤其因为它是中美两国学者友谊合作的结晶。

怀念匡校长

(一九九七年)

南京大学匡亚明校长已经离开我们了。我无法停止对匡校长的深切怀念。

一九六〇年,匡校长和我都是江苏选出的全国人大代表,但当时我们还不相识。在北京开会的某一天,匡校长叩门来到我的房间,表示愿意同我谈谈宗教问题。这是我们的友谊的开始。他是这样介绍他自己的观点的:一个好的马克思主义者和一个好的宗教信徒有许多共同点,完全可以合作。在此后的岁月里,他在同人谈话的时候又多次回到这一观点。

在我的朋友中,匡校长是“文革”之初最早被打成“走资派”的一位,也是最晚被“解放”出来的一位。

“文革”之后,中国社科院世界宗教研究所同志来宁访问,他们向匡校长建议,以金陵协和神学院全体教师为班底,成立南大宗教研究所。匡校长本来就认为,宗教是一个值得研究的课题,立即同意。当时他雄心壮志不小,想吸收各宗教学者一百人左右为研究工作人员和写作人员。当时北京世界宗教研究所所有的领导同志认为,信宗教的人不得参加研究宗教的队伍,匡校长反对这一限制,指出:“恩格斯能写出三篇研究早期基督教的扎实文章,他所用的参考书大多是研究《新约圣经》的德国教会学者的著作。”后来事情的发展是,为了为教会培养有爱国主义觉悟的教牧人员,金陵协和神学院应尽快复课,神学院教师得集中力量从事神学院教学和文

字工作,投入南大宗教研究所的力量就很小了。匡校长坚持南大宗教研究所应予保留,尽管规模缩小。他要我担任副校长兼所长。

当时我国宗教研究学者正在进行一场所谓“鸦片战争”或称“南北战争”(南主要指南京、上海,北主要指北京)。我写了一篇以《鸦片不足为宗教的定义》为题的文章,匡校长逐字逐句念了一遍,表示值得发表。他特别感兴趣的是文章中提到,在马克思讲“宗教是人民的鸦片”这话之前二三十年间,德国知识界至少有十名作家和学者都说过相类似的话,这足以说明,马克思那话不是他的首创。匡校长要我一一介绍这十位的姓名和他们是怎样说的。那次谈话给我的鼓励很大。

匡校长从校长岗位上退下以后,我们的接触更多,有时在他家里,有时在我家里,谈宗教问题约占百分之五十。两位夫人丁莹如教授和郭秀梅教授时常参与。

我们两人对妈祖文化都发生了兴趣。妈祖是一千年前生于福建莆田湄州岛的一位姑娘。她略通气象,对出海捕鱼的人们不时提出警告,好避免危险。一次她单身乘小船在风雨中出海呼叫渔民回岸,不意坠海牺牲,时年二十八岁。渔民把她当作神来供奉,妈祖庙在台湾有几百所。值得研究的是:供奉妈祖几乎一千年来没有发展而为一个典型的宗教。它没有神职人员,没有教义,没有神学;它突出的是伦理道德,要大家做好的人。这一现象引起了匡校长和我的莫大兴趣,在他的鼓励下我曾专程到湄州岛去参加妈祖文化节,想一窥究竟,因为我国宗教如果都能走突出伦理道德的路向,岂不是同社会主义祖国更易相称的美事。我这已经讲到匡校长重病时期,我还来不及向他汇报前去莆田的事,他就离世了。

我深感失去了一位良师,也失去了无法填补的友谊,略写一些往事以寄托我的哀思。

怀念陆恂如同志

(一九九七年)

在一个人的一生中可以算得上知己的朋友和同事，一般是不多的。我深以为幸，我可以有陆恂如同志这样一位知己。

我们两人开始认识那时，陆恂如同志才从苏南调来南京担任江苏省宗教事务局局长不久，我则才从国外呆了六七年回国，基督教三自爱国运动委员会派我到金陵神学院当院长。这样我们就来到一起了。当时金陵神学院是华东十多所各派神学院的联合体，后来又有燕京协和神学院的并入，内情比较复杂。

陆恂如同志和有些宗教事务部门干部不同处是他不满足于在办公室就事论事地处理日常事务，在远距离作出决定。他花很多时间在神学院，和师生交朋友，不因他们有宗教信仰而视他们为外人。他到课堂去听课，在礼拜时间听牧师讲道和祈祷，力求理解人们的宗教信仰的来龙去脉。他以一颗同情的心去体会宗教是怎样吸引人的。为了同一目的，陆恂如同志也研读《圣经》，经常找内行谈话。可以说，陆恂如同志从事宗教工作带有浓厚兴趣。

曾有一次周总理同国务院宗教事务局领导同志谈及应当怎样做宗教工作，当时我正在北京，要我也去参加。周总理谈到了同宗教界人士交朋友，也谈到了阅读《圣经》的必要。我深觉陆恂如同志那样做政府宗教事务的领导工作，正符合周总理的要求。

后来我听说，在极左思潮抬头的日子里，陆恂如同志在运动中遭到批判，批判的内容之一就是他深入研究宗教界的教义，过于靠

拢宗教界,所谓“失掉了界限”。这是很不公道的。

我又听说,“文革”初期“红卫兵”到神学院破“四旧”,抓“当权派”,陆恂如同志出于坚持党的宗教信仰自由政策,保护党的一批朋友的用心,曾挺身而出,告诉“红卫兵”,神学院没有“当权派”,神学院的“当权派”在省宗教事务局。他这样做,充分反映出一个共产党员的政治品质,我深为钦佩。据我所知,当时在另一个大城市,政府宗教事务部门的干部以“造反派”自居,去冲击宗教界和三五自爱国组织领袖,说他们是“当权派”和“走资派”。

陆恂如同志在我的记忆中还有不少难忘的事。我想以上两件已经足够说明他的忠忱和人品了。他已经离开人间,但是我仍旧时常想到他。就写这些以寄托我的怀念。

怀念罗竹风同志

(一九九七年)

人在一生中认识的人总是较多的,他们都可以称为朋友,但是称得上知己的,那是很少的,甚至是极少的。我同罗竹风同志成为知心朋友的过程,我说不清楚,总的说来,我们的友谊是通过共同寻求知识,讨论工作和研究问题,渐渐发展起来的。

五十年代初期,我国基督教若干所神学院校联合成立金陵协和神学院,中国基督教三自革新运动(后改为三自爱国运动)委员会(吴耀宗先生任主席)派我到南京该院工作。罗竹风同志当时任华东宗教事务局局长,对“金陵”的工作十分关心,对政治是非在神学思想上的反映和神学思想对信徒政治态度所起作用,他特感兴趣,他和我就有了共同研讨的大量题目。他多次来宁住在神学院,晚上我们一起喝咖啡,谈话经常持续到深夜,我获益良多。

当时原老金陵神学院院内设有基督教三自革新运动委员会,它独揽大权,领导一切,院长、教务长、院务会议形同虚设。它像政权又不是政权,像党团又不是党团,像教会又不是教会,主其事的大多不懂神学,又无意于办好神学院,群众对此很有意见,但不敢公开声张。见此情况,罗竹风同志主张理顺关系,认为三自是一群众组织,应还其本来面目,院务应按正规由院长和院务会议主持。我们作出这一调整,关系就顺得多,教师等的积极性就有了发挥的可能。拨乱反正之后我国基督教着重办好教会,在三自组织之外成立教务机构,定名为中国基督教协会,一九八八年又提出理顺关

系,所依循的也还是同一精神。

罗竹风同志在政府宗教工作干部中一个少见的特点是他能十分重视神学。有人粗枝大叶,认为一切宗教都是反动的,都是鸦片,神学则更为反动,是更强烈的鸦片,可做的不过是尽量让它们自生自灭,神学不值得重视,也不值得研究。罗竹风同志绝不以“反动”二字或“鸦片”二字去概括一切宗教和一切神学,因为他实事求是,看到诸如吴耀宗先生、黄培永牧师等人的神学帮助信徒脱开来自信仰的障碍,使他们走上爱国主义和社会主义的道路,而另有一些人的神学指使信徒同共产党和新中国闹对立,怎么可以说二者都是鸦片呢?我是在罗竹风同志鼓励下开始研究在我国基督教占上风的基要派神学,并继续注意国际基督教神学动态的。

曾经有一次周总理同国务院宗教事务局领导同志谈细细研究宗教的必要性,特别提到必须精读基督教《圣经》和搞清各个宗派信仰上的特点,当时要我也参加。我深感罗竹风同志做宗教工作在方法上就像周总理所要求的那样。

“文革”期间,造反派审查我在《金陵神学志》上发表的神学文章,拟给我扣上“反对无神论”的帽子,到罗竹风同志那儿去“外调”。罗竹风同志对他们说,“共产党办党校,校长总是会写宣传马克思主义的文章的,那么,怎么能够期望一个基督教神学院院长写出宣传无神论的文章呢?”造反派就没有话说了。当时罗竹风同志自己受到很重的打击,在一座大楼底层楼梯转弯处伸不直腰的地方放一只床,就住在那里。我听到这个深受感动——自己在患难中,为了坚持党的宗教信仰自由政策,为了保护党的一位朋友,挺身而出,这和有的人为了保护自己,或为了博得好感以求升迁,不惜对他人落井下石相比,一个多么渺小,一个多么伟大。

我同罗竹风同志身处两地,每次见面,一般都时隔数月,但是

我们每次谈话,有似继续昨天的谈话,的确可以说是知己。他的去世在我生命中留下一个无法填补的黑洞。我时常怀念罗竹风同志,谨写一些回忆以寄托哀思。

纪念爱克尔斯顿牧师

(一九九七年)

尽管艾伦·爱克尔斯顿牧师在英国教会不大被人理解,他一九九二年十二月十四日逝世,对教会仍是非常大的损失。他是一位好牧师、一位神学家、一位英国文学的教授、一位很有主见的人、教会的一位改革者、人们的一位好朋友。在他身上,牧师的宗教性和人民性,基督徒的灵命追求和正义行动,知识分子的学术造诣和简单贫苦生活都融合在一起。

远在四十年代末,我遇见两位来到日内瓦开会的英国人,他们谈起英国有一位加入了英共的圣公会牧师,他神学上突出道成肉身和三位一体,牧养工作上重视崇拜和圣餐礼,同时高举社会正义。这引起了我的兴趣。不久我就作为这位爱克尔斯顿牧师和他的夫人的客人来到英国夏菲尔得这一钢铁工业城市。当时他是该市达纳尔牧区的主任,该牧区的信徒大多是钢铁工人和他们的家属。此后我又对他们作过多次拜访,特别难忘的是一九五六年我和夫人郭秀梅在他们家住了几天,在那儿享受了这个家庭简单的饮食,旁听了牧区信徒一周一次在那间很大的厨房里举行的教会、社会和政治问题讨论会,参与了很具有特色的圣餐典礼。给我印象特深的是堂里悬挂的旗子之中有一面上面绣有“真理必胜”四个大字,是我早先去访时给写的。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冷战开始,英国国内掀起了反共高潮。艾伦早在三十年代就接受英国圣公会康莱特·诺威尔等左派牧师

的进步影响,同情社会主义,反对资本主义,二次世界大战之后也反对冷战。作为对冷战的抗议,也为了对遭受不公打击的英共的同情,他毅然于一九四八年申请加入英共。英共和中共不同,只要赞同党的政治纲领,教会人士也可以加入。从此他终身是一位共产党员,有四十多年的党龄。他对我说过:“共产党鼓励我做一个好的牧师,我的宗教信仰要求我做一个好的党员。”

对于他参加英共,英国教会领袖大多深感遗憾,也有大事攻击的人。

他十分同情新中国,为此他让三个儿子中的一个到中国来教授英语。

退休后他写了好几本书,其中一本他从英国文学著作中选集了他认为最有价值的句子和段落。那些大多是蛮有正义感的段落。

艾伦生于一九〇四年,死于一九九二年。

在追思礼拜上,我寄去的悼词由一位主教念了。其中关于他的加入英共,我是这样说的:

艾伦参加英共,我认为这是他针对冷战年代人们的偏狭头脑,在一个基督不被真正认知的环境里为基督所作的见证,就像《旧约圣经》里有些先知那样,艾伦采取一些行动作为象征,来传达上帝的信息。他高举“真理必胜”的口号,正像你们的诗人约翰·弥尔顿在一首诗里说的:“如果真理被推上了战场,谁也不要害怕战斗的结局。”

我很高兴,当英国蒂姆·高林其先生为艾伦·爱克尔斯顿牧师写传记的时候,他用上面这段话作为全书的结尾。

为德国古爱华博士介绍赵紫宸教授 神学思想的著作所写的前言

(一九九八年)

赵紫宸先生是中国基督教新教的一位神学家、文学家、诗人。他不是一位奋兴家或布道家，因此他在广大信徒中不是一位“知名人士”，但他的著作是研究中国基督教的学者所必读的。一直到最近，南京金陵协和神学院还再版了他的《用爱心建立团契》。我国现代著名诗人臧克家有这样的诗句：“有的人活着，他已经死了；有的人死了，他还活着。”我们可以恰如其分地说，赵先生的思想还在影响着今天中国教会神学师生的思考，因此他还活在我们中间。

赵先生是一位理智型的学者，但不能用无动于衷来描绘他。他感情丰富强烈，许多事令他激动，也有许多事令他悲愤。不理解他的人说他多变，说他变得突然，难于预测——接受圣公会圣职，抗战时期到昆明文林堂任牧职，一度对带些封建共产主义特点的耶稣家庭发生好感，解放后政治上亲共，朝鲜战争时期辞任世界基督教联合会会长一职以示抗议，神学上从他早期的自由主义转向新正统，再转向批判尼勃尔。最后他被人误解为虚无主义者，说他转到了无神论，实则和我国教会另一位著名领袖金陵女大吴贻芳校长一样，归宿到《约翰福音》第一章的基督观。这是最高的基督观，怎么是虚无主义或无神论呢？这一切不是为多变而多变，是有理可据的发展，是一位对信仰负责，一位敏感而对信仰持诚实态度的基督徒在追求真理过程中的写照。

正因为赵先生是这样一个人，一个紧随真理而不甘心背叛真理的人，他不能不是一位孤独的人，一位不被人理解的人。

解放以后若干年间，我们基督教里时常有人提到，据说是中国老百姓的一句话：多了一个基督徒，少了一个中国人。如果是为了勉励基督徒爱国不后于人，说这么一句话有时也许是可以理解的，但是这句话在多大程度上反映了历史真实，我很怀疑。现在有越来越多的事实说明，解放前许多作为中国人的基督徒和教会领袖都有不少爱国表现，他们甚至这样或那样投入了人民解放事业。赵先生在抗日战争时期被日军禁闭监狱（见他所著《系狱记》），后来长途跋涉从北京到简陋的昆明在大学生中工作。那时我第一次遇见赵先生。第二次是一九四八年在荷兰阿姆斯特丹世界基督教会联合会成立大会上。那是我国解放前夕。对解放，他有一点害怕，但更多的是期待和希望。他没有同与会的美国杜勒斯等人多噜苏。经过介绍，他同捷克和匈牙利几位爱国的、热情拥护他们的社会主义祖国的神学家多次来往，建立了深厚的友谊。后来中国也解放了，赵先生很快就在美国《基督教世纪报》发表兴高采烈的文章欢迎解放，影响很大很好。

我提到这些是为了说明，赵先生是一位爱国者，解放前是，解放后仍旧是。

赵先生并不自命为马克思主义者。他是一位一般意义下的爱国者。这一种一般性质的爱国，有的时候遇上某些以政治上高明自居者就不被放在眼里，甚至不被信任，不被容忍，遭到排斥。

鲁迅曾经指责过那种想叫人“知道点革命的厉害”的人：“他们……将革命使一般人理解为非常可怕的事，摆着一种极左倾的凶恶的面貌，好似革命一到，一切非革命者就都得死，令人对革命抱着恐怖。其实革命是并非叫人死而是叫人活的。”赵先生碰上了

一些这样的人。

他向国外兴高采烈地报告解放给中国人民带来的好处,在国内他却成了“批判对象”。世界基督教会联合会通过决议谴责中国的抗美援朝,赵先生一气之下写信去辞掉该会会长之一的职位,在国内却有人说他“别有用心”。他渴求能在教会里找到同情,找到支持,写书号召“用爱心建立团契”,但教会里有些人给他的待遇是“划清界限”。

这样,在相当长的一段时期里,他不能不是一个渴望友情而不可得的人,一个被人疏远的人,一个孤独的人,一个悲剧型的知识分子。

我愿意引用一位极有名的人讲过的一段话来结束我的前言:

“你们赞美大自然千变万化、无穷无尽、悦人眼目的丰富宝藏,你们并不要求玫瑰花和紫罗兰散发同样的芳香。那么,你们为什么却要求世界上最丰富的东西——精神,只能有一种存在的形式呢?”

说这个话的人不是耶稣,不是哪一位神学家,也不是哪一位自由主义的提倡者,而是马克思,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一卷第一篇里。

我感谢古爱华先生经过精心调查研究才完成了这本介绍赵先生神学思想的著作。现在用中文出版,我深为欢迎。我想,赵先生所能给我们的最重要的信息应当是:更多的信任、更大的宽容、许可更多的不同的芳香,让精神用更多的形式表现出来,为人类造出更丰富、更多彩的文化。

后 记

中共中央 1996 年 10 月 10 日通过的《关于加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若干重要问题的决议》指出：“应当在全社会认真提倡社会主义、共产主义思想道德。同时要把先进性要求同广泛性要求结合起来，鼓励支持一切有利于解放和发展社会主义社会生产力的思想道德，一切有利于国家统一、民族团结、社会进步的思想道德，一切有利于追求真善美、抵制假恶丑、弘扬正气的思想道德……”在这段话的鼓励下，我选编了这本书。

首先让我深谢陈泽民副院长花费精力和时间为这本书写前言。基督教全国两会南京办事处吴恩扬先生把若干篇英文稿译成中文，矫捷女士输入全部的文稿，中共中央统战部前副秘书长李佐民同志和金陵神学院语文教师田童心先生阅读全部稿子，并提出许多改进意见，美国好友魏克利博士为我在国外教会档案中找寻我在国外的讲稿，我深为感谢这几位的支持和协助。

丁光训

1998. 8. 14

